



文革 機密檔案

——
廣西報告

○ 美國收藏本
《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
宋永毅序

明鏡出版社
mirrorsbooks.com

《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和“文革”研究的新課題（序言）

宋永毅

近年來，美國一些主要大學的亞洲圖書館陸續收藏了一套《廣西“文革”檔案資料》。這套機密檔案由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輯，自1985年廣西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結束開始，到1988年12月完成內部出版，歷時4年。這套珍貴的《檔案》按地縣和區直機關共編印18冊，每冊600-800頁。它共分兩大部分：第1冊至第7冊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8冊至第18冊為“文革”大事記部分。這套檔案中的一些主要內容也已經被收入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中。¹ 經我推薦，明鏡出版社決定出版其中最具有宏觀視角的第18冊《廣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另換書名為《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下簡稱《機密檔案》），以還民眾瞭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的知情權，更提供給他們一個“身臨”近半個世紀前的血雨腥風的機會。作為一個“文革”研究者，我還覺得這一機密檔案的出版將給當前海內外的“文革”研究帶來不少新課題和新挑戰。

值得追究“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起源

上世紀90年代中，王友琴博士以她的一篇題名為“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論文² 揭示了“文革”初期北京地區對教育工作者大規模的暴力和殺戮。尤其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校長下仲軀女士在1966年8月5日被學生活活打死的血案，更成為這一“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象徵和圖騰。直至今日，和這一血案有關的“文革”紅衛兵代表人物的宋彬彬等人的“道歉”事件還是“文革”研究的一大熱點。但是，這些研究的焦點還基本上集中在“紅八月”、即1966年8月以北京老紅衛兵為代表的學生暴力造成的“紅色恐怖”上。

然而，《機密檔案》卻揭示了一個不太為人注意的盲點：早在1966年7月“文革”剛爆發不久，不少省市的中小學的教師就開始成為“文革”的第一批血祭品，而向他們揮起屠刀的卻不是狂熱的學生而是各級冷酷的黨組織。《機密檔案》是這樣記載的：“全區各地、市、縣根據自治區黨委的佈置，利用學校放暑假期間對中、小學教師集訓，開展‘文化大革命’。玉林地區從7月16日到8月23日把53所中學的1421名教師，145名學生代表，151名四清工作隊員集中到專區集訓（小學教師到縣集訓）。……北流縣平政中學教師黃運球（四清時被劃為地主分子），批鬥後投河自殺。貴縣木枱中學校醫梁厚聯被批鬥後服毒自殺，這是玉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最早死人的事件。……（欽州地區）在集訓中，所採取的批鬥手段殘忍、刑罰名目繁多：如掛牌戴高帽遊鬥，扛幡跪拜，丟塘浸水，烈日下暴曬，燙屁股，跪石子，針刺，拳打腳踢，假活埋等。全地區11,979名中、小學校教師在集訓中，有1495人被扣上地、富分子、修正主義分子以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帽子進行批鬥。其中，有108人被鬥打致傷致殘，有266人被逼死、打死；有231人受到不應有的黨、政紀處分；有5668人被下放回原籍生產勞動。這場‘文革’對教師迫害之慘、對文化教育摧殘之深是歷史上罕見的。”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充當打人和殺人凶手的“學生代表”，是廣西區黨委邀請去的！這樣，王友琴博士揭示的“革命”便又有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前綴：“共產黨領導和指揮下”的“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文革”初期各省市黨委對中小學教師以“集訓”的名義大規模的迫害是相當普遍的，甚至新疆這樣的邊陲之地都搞得轟轟烈烈³。為什麼各地會產生這種不約而同的迫害形式？是否有來自中央的秘密指示？對這一“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前奏和起

源，至今還鮮有人做出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破除各級黨組織“抵制文革”的迷思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裡說：“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都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4換句話說，“文化大革命”在一開始就遭到了“黨”——各級黨組織的抵制。但是看完《機密檔案》，讀者便會發現這是一個“迷思”，與歷史的真相大相逕庭。

首先，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和黨組織，在“文革”剛發動之際都是持支持態度的。毛的“5·16通知”就是在劉少奇的支持下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毫無異議地通過的。從劉鄧到各地的省委書記，他們中或許有人會認識到“文革”的開展可能會對自己不利，但是他們從不直接抵制，而是通過嫁禍於人，即通過整同事、整下級、犧牲底層百姓來保全自己。在《機密檔案》裡我們可以看到：廣西區黨委對“文革”的發動非但緊跟，還有著自己創造性的主動。例如，1966年6月份，當時毛澤東和劉、鄧等人還沒有向民主黨派下手，但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就開始死整廣西著名的民主人士，以示自己對文革發動的擁護。《機密檔案》是這樣記載的：“（1966年6月5日）韋國清在自治區政協全體人員會議上作《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報告》中提到原區民革主委、區交通廳副廳長呂集義的《綠珠唱和詩》是‘大毒草’。會後，區政協即開展對呂集義和馬萬里（著名畫家，區文史館館長）的批判。……六月二十六日，群眾發現畫家呂牧石（馬萬里的女婿）燒‘四書書畫’，當天晚上便拉呂牧石來遊鬥，說他是‘毀滅罪證’。呂被遊鬥後投河自殺。之後，又連續對呂集義進行批鬥，呂集義的愛人石定康（原區民革會計）因見呂連遭批鬥，思想害怕於九月七日上吊身亡”。

其次，廣西區黨委還搶先對自己宣傳文教系統的黨內高級幹部下手，把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據《機密檔案》記載：僅在1966年6月，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南寧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南寧晚報》總編輯曾東江；《南寧晚報》副總編輯秦祖蔭等“一千多……新聞、宣傳、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就被區黨委組織批鬥、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在“文革”研究中，從1966年6月-10月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的路線被稱為“劉鄧路線”。它在“文革”以後被官方美化為“保護老幹部”的“正確路線”。然而我們在《機密檔案》裡卻處處可以看到：在迫害有“自由化”傾向的黨內老幹部上，他們和毛澤東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從劉少奇到韋國清，他們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保自己。因此，為毛所憎惡的一大批黨內教育文藝和宣傳方面高級幹部變成了被他們犧牲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他們一心以為只要把他們全部打成“黑幫”和“三家村”等等，就能滿足毛澤東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革命”欲望，自己便可以在混戰一場中得以脫身。

軍隊“支左”使“文革”從動亂迅速走向災難

對於“文革”中毛澤東命令解放軍“三支兩軍”（支工、支農、支左、軍訓、軍管），官方的說法至今還都是持基本肯定態度的，其主要觀點是“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其實就“三支兩軍”而論，“文革”的新創造是“支左”。其他四項任務，軍隊在“文革”前就一直是在執行的。但是“支左”則不一樣，首先是誰係“左派”？軍隊根本搞不清楚，因而“支左”只能是“支派”。而“文革”中的兩派都至少有幾十萬群眾，支持任何一派都只會造成整個社會的更大撕裂。其次是軍

隊帶有大规模殺傷性武器，支持任何一派都可能使武器流入群眾組織，使雙方一般性的肢體衝突向真槍實彈的戰爭演變。最後，中共的軍隊本身就派系林立、且人文素質極差，讓他們再捲入地方的派系鬥爭無疑是火上加油，愈搞愈亂。

已經有學者的研究認為：當時在廣西支左的廣西軍區和野戰軍55軍（及47軍某部）各支持一派（前者為“聯指”，後者為“四·二二”）背後其實有毛、周和林彪在地方的權鬥背景。5

在《機密檔案》裡我們可以看到：廣西從一般性的兩派對峙到武裝衝突的轉折點是群眾組織（主要是聯指派）的大規模的“搶槍運動”。而支持聯指的廣西軍區的軍隊根本就是在有意送槍。《機密檔案》記載廣西的第一次搶槍如下：“（1967年）14、15日南寧地專‘聯指’搶了南寧軍分區槍支906支，子彈80萬發。在劃策搶槍的會議上有人說：軍分區暗示，軍分區的槍地專‘聯指’不去搶，外面的人可能來搶。”

《機密檔案》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它徹底顛覆了中共解放軍熱愛人民的“雷鋒神話”。檔案裡的史實表明，在廣西各地區支左的軍隊幹部，從軍區司令員到各公社武裝部部長，絕大多數都策劃、直接指揮過大規模的殺人事件。用中共以往醜化“敵人”的套話來說，就是“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而且，對不同意見的幹部群眾，這些軍代表們則動輒公開誣陷、殺戮、甚至淫人妻女，無惡不作。

例如，在自治區一級，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等夥同韋國清在1968年6月製造了一個莫須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分區”，並把它誣陷為“四·二二派”的黑手，因而大開殺戒。在地縣級，軍隊支左人員更是血債累累。例如，在賓陽縣革委會主任、6949部隊副師長王建勳的策劃指揮下，該縣亂打亂殺和逼死了3681人。灌陽縣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公開支持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幾天內就殺害了158人。他還給上級寫報告把亂殺人罪行錯誤地說成是什麼“就地處決、先發制敵革命行動……”1968年2月中旬，靈山縣召開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代表暨貧下中農代表會議，有10,060人參加。武裝部政委單英德主持開會、副部長鍾沛洪作報告，軍分區司令員魯俊德作總結部公開倡導殺人，“會議期間，靈城公社勒死三人陳屍示眾。與會人員紛紛去現場‘參觀’。至8月1日，全縣鬥打、亂殺、逼死共達3220人。全家遭殺絕的全縣共529戶。”

為了爭奪革委會的領導權，許多支左軍人還直接對地方幹部進行陷害和謀殺。例如，據《機密檔案》記載：“凌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禧等11名幹部、教師和學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間，不僅主謀策劃危害趙永禧和幹部群眾，而且利用職權，先後多次強姦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鬥的女學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惡極的王德堂，曾被封為‘支左’的好幹部。”1967年10月6日，駐靖西縣支左軍人伍祥勝、曾克昭，盜用“四·二二”靖西“造反大軍”名義，由曾克昭執筆寫了一封信寄給黃小林（靖西縣委書記），要黃站到“四·二二”一邊支持靖西“造反大軍”。此後，他們便以此信為藉口，誣陷黃小林參加派性活動，以致“聯指”派將黃活活打死。在軍人政權指揮的亂殺人中，灌陽縣一些領導幹部、群眾作了堅決抵制，但遭到支左軍人不同程度的迫害。如原縣委副書記彭川，將殺人情況報告了廣西軍區，結果被關押五十多天，後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宣佈為現行“反革命”。

眾所周知：軍隊是國家機器最主要的組成部分。由於三支兩軍，支左的軍人成了各級“紅色政權”的第一把手。在這本《機密檔案》裡讀者可以看到：絕大多數的廣西大屠殺的案例都是由軍人領導、指揮、縱容甚至直接動手的。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甚至是為國家機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參與這些暴力和殺戮的軍人、警察、武裝民兵和中共的黨國骨幹，是這一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論，把“文革”中的暴力殺戮的責任一概推卸到某種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眾頭上是不對的。這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極大地扭曲了我們民族應有的正確的集體記憶，從而混淆了錯與非錯，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而廣西“文革”的失控——從一般性的社會動亂快速地墜入武裝屠殺的人間地獄，其轉折點是正是軍隊的所謂“支左”。

解構毛澤東的農民革命神話

根據美國學者蘇揚對全中國近三千份縣志中數據的統計，“文革”中的大屠殺現象主要發生在農村，受害者主要是“黑五類及其子女”。他認為最保守的估計也有75-150萬人死於集體殺戮（Collective Killing）之中，6 而廣西則是重災區之一。中國作家譚合成也在香港出版了他對於湖南道縣大屠殺近50萬字的調查報告，說明發生在“文革”中的大屠殺現象，非但和“文革”中對所謂的“黑五類”的迫害有關，還有著自土地改革以來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的集體無意識積澱。7 確實，在中國共產革命的神話體系中，毛澤東的農民運動無疑是其精義大要之一。毛澤東早年以鼓吹北伐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起家，往後也一直津津樂道於自己是在農民問題上最終打敗了蔣介石。而中共建國初期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也正是土地改革，並由此奠下了共和國的第一塊基石。雖然勝利者並不等於正義者，但歷史卻常常是由勝利者們長期書寫的。為此，毛澤東的農民運動神話的非正義性和非人性，一直較少受到學界和異議者的激烈挑戰。

在《機密檔案》裡我們可以看到：毛氏的農民革命的神話，至少從兩個方面被挑戰和顛覆了。其一，是農民運動對所謂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及其子女）鬥爭的合法性和肉體消滅的正義性。因為中共的階級政策至少在書面上並不主張對“黑五類”肉體消滅，策劃者和施暴者便只能以政治謠言來製造合法性。在亂打亂殺盛行的1967-1968年間，廣西農村關於“黑五類”要反攻倒算、殺貧下中農的謠言到處流行。於是，在軍隊支左人員和原公安人員的支持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等非法組織蜂擁而起。廣西“文革”的受害者主體——“黑五類”及子女在“文革”中和“文革”前處於一種什麼狀態呢？《機密檔案》告訴我們：他們作為飽受歧視農民群體非但從來沒有過任何“亂說亂動”，甚至已經被長期的無產階級專政馴化到在臨死前都不敢質問一句。例如，在1967年10月2~4日，由全州縣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率武裝民兵製造的集體坑殺的血案裡，“地主出身的劉香元”在被殺前唯一的請求是：“留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愛人”。而這一要求也被滅絕人性地拒絕了。而且，“被坑殺的76人中，最大的65歲，最小的不足一歲，七歲以下的十人，最多一戶被殺九人”。簡言之，地主、富農及其子女從來游離於任何派別鬥爭以外，都是百分之百的和平守法者。由此，對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乃至婦女、老人和兒童的屠殺，無論在國際法、還是在中國自己的法律、甚至共產黨的表面政策（如“黑五類”和子女的區別）中都不具有起碼的合法性。長期以來，中國官場甚至學界中流行一種“文革”中“人人有錯”的貌似有理的說法。但看完這些記述，讀者便會幡然醒悟：至少有一個數千萬人的社會群體——“黑五類”——在“文革”中一點錯誤都沒有犯過，他們是清白無辜的純受害者。

其二，《機密檔案》中的記載還解構了大屠殺受害者身份的正統性和支撐他們的階級鬥爭理論的神聖性。初一看來，這些瘋狂的群體都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他們的殺戮還有著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使之合理化。但《機密檔案》從根本上顛覆了這些虛假的表象。根據那裡的調查和引證的內部檔案，這些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貧下中農”們幾乎都是有前科的農村流氓賭徒，貪污犯、搶劫犯、強姦犯和虐待狂。他們殺人的動機根本不是為了什麼美好的革命理想，相反是出於赤裸裸的姦淫擄掠的惡欲。首先，在幾乎所有的殺戮案件中，殺人者在完成了血案後都要在被受害者的家裡，用被害者的米糲雞鴨大吃一頓，然後把受害者的所有財物劫掠一空。其次，凡是在受害者是青年女性的血案中，幾乎她們都先被強姦輪姦，後或被殺人滅口，或在他們的父親、丈夫被殺以後強行分配給一個“貧下中農”（大多數情況下為劊子手）當老婆。換句話說，醜惡卑劣的犯罪動機在這些凶手中中早就存在了，而“革命”則是激發他們獸欲的催化劑和掩蓋邪惡心靈的旗幟而已。

除了掌權軍人的策劃指揮以外，在廣西的血雨腥風裡直接動手和參與殺人的又是一些什麼人？《機密檔案》也會告訴你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主要是農村共產黨員！據“文革”後“處遺”核實統計資料，廣西自治區有近五萬共產黨員是殺人凶手，其中“有20,875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

9956人是殺人後被吸收入黨的。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達17970人。”在1984年後“處遺”工作中，全自治區共有2萬5000名黨員被開除黨籍。

於是，《機密檔案》裡的血淚記載便提供給了讀者這樣一個十分簡單卻令人信服的反推邏輯：如果說毛氏農民運動在它濫觴半個世紀後的“文革”（和平時期）中都還造成如此無法無天、恐怖殘暴的慘案，那麼在它發源的戰爭時期和成型的“暴力土改”的建國初期，還會有什麼基本的人性和正義可言？

韋國清的不倒翁之謎

“文革”的廣西中出了一件奇事：那就是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是全國29個省市中唯一沒有倒台的省級第一把手。廣西群眾組織在“文革”初期分為反韋的“四·二二”派（造反派）和保韋的“聯指”派（保守派），韋國清自然成了整個廣西“文革”的焦點。廣西的大屠殺的緣起，便是他在1968年重新出任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後，對反對他的造反派大肆報復，動用軍隊和重炮、機槍進行鎮壓。

但在該本《機密檔案》裡，我們卻吃驚地發現：其實早在1966年8月24日，“中央決定免去韋國清廣西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調任中南局第二書記……任命喬曉光為廣西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但更令人吃驚的是：韋並沒有去中南局（廣州）上任，還是在廣西當他的第一書記，竟然也一直當了下來！這種情況，如果沒有足夠的理由和在中央沒有人為韋講話，是無法想象的。在《機密檔案》裡，我們可以發現周恩來有過一系列堅決保韋的指示。例如，1967年3月13日，韋國清在廣西因為執行資反路線，當時已處於“靠邊站”狀態。但是周打電話給韋，指示：“廣西地處援越抗美前線，要實行全面軍管，你站出來當軍管主任，黃永勝搞廣東，你搞廣西”。韋國清大嘆苦經說：“現在搞得不像個樣子，‘站不出’來了。”周卻說：“我們做工作。”周還馬上指示軍區給韋國清拿一套軍裝穿，並要空七軍派專機把韋國清送到廣州。周的這一動作實在是異乎尋常：要知道韋國清當時已經是一個文職的區黨委書記，提出讓他來當“軍管主任”在全國屬史無前例。但周的這一指示當然把本來就和韋關係緊密的廣西軍區直接推向了韋的陣營。

1968年7月3日，周恩來直接參與起草了把廣西“四·二二”派在韋國清的武裝鎮壓下被迫搶劫武器的錯誤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所謂“七·三”布告，並在7月25日接見廣西兩派時聲色俱厲地指責造反派和肉麻吹捧韋國清：“韋國清同志是中央委託的廣西革籌小組負責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戰爭中有過貢獻，今天越南人民還把他看成是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老戰友。你們貼出這張標語，對中央是什麼態度？你這張標語是向誰宣戰？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戰。你想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面對越南人民的國際主義的老戰友，中央這樣信任他，你們還這樣搞！”8

周恩來的態度當然不可能不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機密檔案》裡透露：毛說過：“韋國清是好同志，好黨員”（1967年6月1日），據說也是因為韋國清和越共的關係密切，對抗美援朝有利。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毛澤東還是周恩來，歷來是把他們的政治野心——“世界革命”的大業看得遠遠高於國內普通老百姓的生命的。正是因為毛、周所代表的黨中央對韋國清這個廣西大屠殺頭號劊子手的強挺，才使韋無所顧忌地向反對他的幹部群眾祭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據《機密檔案》透露：廣西“文革”中被亂殺死的群眾高達“84,762人”——這還是1985年處遺時對有名有姓的受害者的初步統計，而無數的官方正式公開出版物卻一直對此語焉不詳。只有1992年出的廣西區志透露了一點非正常死亡人數：“八萬多人”9。最近，當年參加廣西清查處遺工作的公安部幹部晏樂斌寫文章揭露了最後的統計數字：廣西自治區“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8.97萬人”，“另外，全區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10 由此可見，中共的內部檔案中的真相比公開出版物中的“歷史”要真實得多。當然，民間調查中的對

“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估計還要更高一些，有近20萬之多。

我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讀者，都會在讀完這本中共《機密檔案》後認識到共產主義的非正義性和非人性，認識到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生俱來的嗜血性。

注釋：

1,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大學服務中心，2002-2013年）。

2, 原載《二十一世紀》總30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8月）。

3, 見方廣錫《也談文革中學生打老師》（2014年1月31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4/0131/99883.html>

4,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

5, 申曉雲《文革中槍桿子裡面出革委會——廣西“武鬥”真相》，載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季刊，2014年第1期。

6, 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8, “中央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志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指示”，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

9, 《當代中國的廣西》，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10, 晏樂斌《廣西文革紀略》，《炎黃春秋》2012年11期。

一九六六年

一月

本月，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北京召開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中心是如何研究貫徹執行林彪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提出的所謂“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在會議前後，林彪、康生利用廣大人民群眾崇敬領袖的感情，鼓吹毛澤東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等，竭力宣揚對毛澤東主席的神化。（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二月

二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作出關於深入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定，《羊城晚報》發表社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頂峰》。

三日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下稱自治區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區掀起群眾性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據區黨委檔案33卷）

二十五日 廣西全區學習毛澤東著作推進三大革命運動積極分子代表會議在南寧召開，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二千五百七十多人。原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和自治區黨委代理第一書記喬曉光，書記處書記賀希明、安平生，候補書記霍泛等出席會議，喬曉光在會上作了題為《進一步突出政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推進三大革命運動，為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而奮鬥》的報告。強調學習毛著，雷打不動，樹立毛澤東個人絕對權威。（據區黨委檔案33卷）

四月

十九日 《廣西日報》轉載《解放軍報》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五月

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十六日，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席主持製訂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簡稱《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此《通知》是指導全國開展“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這次會議標誌著“左”傾方針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七日 毛澤東主席寫給林彪的信（簡稱《五·七指示》）。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

“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毛澤東還指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個指示廣為推行，在許多方面造成消極影響。（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八日 江青主持寫作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刊登在《解放軍報》上，它不僅給“三家村”定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的基調，還發出了打倒一大批的叫器。

同日 《解放軍報》、《光明日報》聯合刊登《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的材料摘編，每段都加上了駭人聽聞的“編者按”，定了具體的“批判”口徑。（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以上文章《廣西日報》均給予轉載。

十一、十三日 《廣西日報》發表姚文元的《評三家村》，對鄧拓、吳晗、廖沫沙進行錯誤的批判。十三日在一版《徹底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通欄標題下，發表全區工人、部隊、新聞工作者聲討鄧拓的消息，以後連續發表了區內聲討鄧拓的文章（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本月中旬，自治區黨委對區內各大專院校布置。在學校黨委領導下，按照江青、姚文元定的調子對鄧拓、吳晗、廖沫沙寫的《三家村札記》進行批判。當時，還是側重在學術上的批判，學校半天上課半天停課開批判會，這標誌著廣西“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學校開展。（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廣西日報》）

十九日 自治區黨委通知：我區各大專院校每個院校派二名代表（有些機關也派了代表）到廣州聽取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關於中南局地區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代表回來傳達後，各大專院校即宣布由半天上課半天批判到全天停課搞“文化大革命”，把學校裏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揪出來批鬥，使大批知名的學者、教授、講師和知識分子遭到了殘酷的迫害（據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六月

二日至五日 《廣西日報》連續轉載《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民靈魂的大革命》、《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同時，還轉發了聶元梓等七人攻擊北京大學黨委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的《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評論員文章，以及新華社電訊《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中共北京新市委改組北京大學黨委》的消息。（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二日 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說：目前一個偉大歷史意義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全國興起，這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關係到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不是批判幾篇文章、幾個電影、幾個戲的打筆墨官司的小事，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區同全國一樣，思想文化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嚴重的、尖銳的；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解放以來許多思想文化陣地的領導權問題還未解決，必須開展文化大革命，清除混進黨、政、軍和各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通知》具體部署了我區“文化大革命”的開展：1、繼續搞好四清運動；2、開展“文化大革命”；3、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做到以工農兵為主體，三個運動同時搞。（據區黨委檔案33卷）

同日 自治區黨委根據《五一六通知》精神，成立自治區黨委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伍晉南（區黨委書記處書記）；副組長：賀亦然、侯靜波、郭永昌、段遠鍾、段純和、羅立斌等五人（據區黨委組織部資料）。

五日 自治區黨委文化革命小組召開區直機關“文化革命”動員大會。韋國清作動員報告。《報告》內容共四點：一、當前國內外大好的革命形勢；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義；三、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大學毛主席著作；四、開展“文化大革命”措施：1、加強領導；2、必須放手發動工農兵群眾和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積極參加戰鬥組織和壯大左派隊伍，開展一個真正的革命群眾運動；3、在運動的布置上不論什麼地區都要以學習毛主席著作為中心，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搞好“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4、清理文化領導機關，調整充實文化部門的領導骨幹，韋國清在報告中點了《廣西日報》副刊問題嚴重。同時，自治區黨委文化革命小組把《廣西日報》作為文化革命的試點單位，並向報社派出文化革命工作隊。不久，任命空七軍軍務處處長劉福生為隊長，區黨委宣傳部副處長荊纓雲為副隊長。十二日伍晉南到《廣西日報》社作開展文化革命的動員報告；工作隊動員鳴放。當天《廣西日報》社有人貼出大字報，攻擊辦報方針。“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廣西日報》社燃起（據區黨委檔案33卷、《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 韋國清在自治區政協全體人員會議上作《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報告》中提到原區民革主委、區交通廳副廳長呂集義的《綠珠唱和詩》是“大毒草”。會後，區政協即開展對呂集義和馬萬里（著名畫家，區文史館館長）的批判。區統戰部副部長、戰線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梁華新，在會上宣布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同時進行，工作組進駐政協。組長黃惠民（區政協副主席）、副組長戴羅才（區統戰部幹部處處長），號召大家結合學習毛主席著作，開展大揭大批，狠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十六日，群眾發現畫家呂牧石（馬萬里的女婿）燒“四書書畫”，當天晚上便拉呂牧石來遊鬥，說他是“毀滅罪證”。呂被遊鬥後投河自殺。之後，又連續對呂集義進行批鬥，呂集義的愛人石定康（原區民革會計）因見呂連遭批鬥，思想害怕於九月七日上吊身亡（區政協“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日報》發表韋斌撰寫的所謂《徹底批判“三家村”的修正主義辦報路線——駁鄧拓對〈桂林日報〉部分編委的談話〉的文章（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七日至十四日 玉林地區集訓“文革”工作人員，傳達中南局陶鑄的講話和韋國清在自治區直屬機關作“文革”動員報告和伍晉南的總結（據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九日 自治區黨委文化革命小組向各地、市、縣委發出《關於印發韋國清同志在全區文化大革命動員報告的通知》，要求將《通知》精神傳達到工礦企業工人、大中學校師生、農村黨員、基幹民兵、生產隊長、生產隊幹部、積極分子；民主人士由統戰部門傳達（據區黨委檔案材料）。

十三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鑒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沒有一定時間是不行的”。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必須徹底改革”，“決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通知下達後，全區各大專學校分別集會表示擁護改革的決定（據區計委“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 自治區黨委派出工作隊進駐各大專院校、區直各化部門。《廣西日報》社，進駐單位的工作隊取代了單位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旨在穩定局勢。有的工作隊進駐院校後重新放映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時的歷史記錄片，示意攻擊黨委的就是“右派”或是“右派”言行，也就是“反革命”。學生對此極為不滿。桂林廣西師範學院（現改為廣西師範大學）少部分學生貼出了“炮轟桂林市委”的大字報（據區“處遺”材料——大事記表）。

十五日《廣西日報》發表自治區黨委文化革命小組辦公室組織撰寫的《〈故人〉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同時發表“編者按”，開始點名批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故人》的作者陸地。二十八日，《廣西日報》公布自治區黨委《撤銷陸地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同時發表“編者按”，聲稱要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到七月十九日止，《廣西日報》連續用十八個專版批判陸地及其作品《美羅的南方》、《故人》、《瀑布》、《國慶節》、《中途》等（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 伍晉南到《廣西日報》社，提出在十天內弄清鍾林（《廣西日報》社黨委書記、總編輯）的問題，然後動手寫批判文章，公開見報。事後，駐《廣西日報》文化革命工作隊活動頻繁，召開報社“積極分子”會，劃分戰鬥小組，動員揭發整理鍾林材料。七月一日，伍晉南、賀亦然聽取駐《廣西日報》社工作隊的彙報後，說：打擊對象主要是鍾林，黃耿、鍾紀民是分化對象，秋查看一段再定。（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前後，玉林縣三百六十八人的工作隊分別進入一、二、三、四中、農校和部分機關單位，傳達韋國清講話，組織遊行示威，揭露學校、機關“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牛鬼蛇神”。從十九至二十四日貼出大字報二萬八千多張，把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張昭弘和教育、文化部門的一些領導幹部、教師以“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鄧拓黑幫”、“牛鬼蛇神”等罪名進行批鬥。（據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河池地委常委開會，李均傳達韋國清於六月二十五日對河池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指示，分析研究全地區“文革”情況，認為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牛、鬼、蛇、神專了我們的政，我們要與之作堅決鬥爭。（據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廣西日報》發表黎福榮撰寫諷刺陸地的《國慶節》是一張“反革命傳單”的文章，號召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時，結合批判我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據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廣西日報》）

接著，各地、市紛紛揭批新聞、教育、文學藝術界中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三家村”在文化界中的代表者和讚賞者。在南寧市，把《南寧晚報》的曾東江（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南寧晚報》總編輯）、秦祖蔭（《南寧晚報》副總編輯）、餘凱（《南寧晚報》副刊組長）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並對南寧市的藝苑、欽南等群眾文藝團體打成所謂“三家村”黑詩社。在此期間，全南寧市被鬥批的領導幹部、知識分子一千餘人，其中主要人物均為新聞、宣傳、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一般的知識分子也難幸免。南寧五中工作隊的成員說，教師是革命對象，領導者是大當權派，班主任是小當權派，一百零八名教職工中有七十人被批鬥。（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七月

二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這些企業單位要在保證完成生產任務的條件下，結合四清運動，分期分批開展“文化大革命”。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工交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補充通知》，再次強調指出：“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在縣以下單位、基本建設單位、設計單位以及科研單位，應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結合起來，分期分批進行”。（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三日《廣西日報》在《堅決清算陸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把他徹底鬥倒徹底鬥垮徹底鬥臭》的大幅標題下刊登對陸地的所謂批判文章。

同日 南寧市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到會的三百多人表示堅決擁護自治區黨委的決定，痛斥陸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

連日來全區各地、各族人民群眾大量來信來電，表示堅決擁護自治區黨委撤銷陸地的一切職務的決定，嚴厲痛斥陸地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

同日 韋國清、喬曉光、伍晉南、賀希明等分別到《廣西日報》社、廣西大學觀看大字報，並對

工人、幹部、師生作了指示：號召他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並特指定《廣西日報》工作隊長劉福生到區直機關“介紹經驗”。事後，駐《廣西日報》工作隊即叫在江濱醫院治病的鍾林回報社進行批鬥。（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四日自治區黨委決定對張雲堂（桂林師院院長、黨委代理書記）、陸文中（院黨委副書記）、吳元慶三人以鎮壓“文革”為名，停職反省。七月底，桂林師院出現《炮轟區黨委》、《火燒伍晉南》、《火燒工作隊》的大字報。二十八日，桂林市委召開全市各級領導幹部和四清工作隊長會議，介紹所謂“師院反右不徹底”等，並組織其參觀師院大字報，引起了工農群眾和師生之間的對立，把“文革”引向社會。二十九日，在桂林師院工作隊的組織下，給反對工作隊的學生扣上所謂“右派翻天”、“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小鄧拓”、“政治野心家”等大字報，進一步加深了不同觀點之間的對立情緒。（據桂林“文革”大事記）

七日柳江縣公辦教師集訓搞“文化大革命”。集訓期間對小學校長黃林恩進行批判，黃進行駁斥和反抗，被以所謂“現行反革命”宣布開除黨籍逮捕法辦。歷時二十天，集訓共揭發“五種人”（即1、戴帽的伍類分子；2、三反分子；3、漏網的四類分子；4、特務、特嫌；5、嚴重違法亂紀分子）七十五人，重點批判二十二人，集訓結束留下勞動九十六人。（據柳江縣“文革”大事記）

十一日《廣西日報》文化革命工作隊長劉福生代表自治區黨委宣布撤銷鍾林總編輯職務。十二日，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組辦公室電話通知，同意撤銷鍾林職務和在報上公開點名批判。二十五日，自治區黨委文化革命小組派人到《廣西日報》社宣布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組批准撤銷鍾林黨內外一切職務。（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自治區黨委派駐區各大學工作隊被迫撤出。廣西大學師生要求進駐西大工作隊長尚持（自治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回學校作“關於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的檢討；民族學院、醫學院師生也要求駐學院的工作隊回學校檢討。從此，自治區黨委派駐各大專院校的工作隊改為派聯絡員來指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據區黨委“處遺”材料、“文革”大事記）

七、八月間，全區各地、市、縣根據自治區黨委的布置，利用學校放暑假期間對中、小學教師集訓，開展“文化大革命”。玉林地區從七月十六日到八月二十三日把五十三所中學的一千四百二十一各教師，一百四十五名學生代表，一百五十一名四清工作隊員集中到專區集訓（小學教師到縣集訓）。集訓中採用所謂大鳴大放大字報的辦法，揭階級鬥爭蓋子，揪出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牛鬼蛇神及有嚴重問題的人共一百四十九人，列為重點批鬥對象的十五人。北流縣平政中學教師黃運球（四清時被劃為地主分子），批鬥後投河自殺。貴縣木格中學校醫梁厚聯被批鬥後服毒自殺，這是玉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最早死人的事件。（據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欽州地委書記林在中在地委常委會上傳達區黨委領導人韋國清、伍晉南在區黨委會議上的講話指示：中小學教師要清理一部分，把最反動的清理出去。總之，地、富、反、壞、右要清理，有些要送回農村勞動改造，有些要法辦。清理後力量不足，從農村知識分子中吸收，再就是從工作隊的幹部、勞動大學學生中抽一些。關於教師集訓，地委集訓中學教師，縣委集訓小學教師，時間一個月。集訓中要求：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發現一批重點對象線索；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要鬥一下。在集訓中，所採取的批鬥手段殘忍、刑罰名目繁多：如掛牌戴高帽遊鬥，扛幡跪拜，丟塘澆水，烈日下暴曬，燙屁股，跪石子，針刺，拳打腳踢，假活埋等。全地區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學校教師在集訓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扣上地、富分子、修正主義分子以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帽子進行批鬥。其中，有一百零八人被打致傷致殘，有二百六十六人被逼死、打死；有二百三十一人受到不應有的黨、政紀律處分；有五千六百六十八人被下放回原籍生產勞動。這場“文革”對教師迫害之慘、對文化教育摧殘之深是歷史上罕見的。（據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南寧地區賓陽、武鳴等十個縣，集訓了中、小學教師一萬六千四百八十六人，集訓中被批判的三千三百六十八人，佔集訓人數百分之二十。（據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柳州地區集訓中、小學教師九千六百人，被批鬥的四百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一般教師。集訓後，留下所謂有“嚴重問題”的教師五百零四人。等待處理。有的送到農場或生產基地去勞動，實行“小勞改”；有的把學校教師當犯人派公安人員看守。（據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梧州市集訓教師前，三中女教師梁士槐因受到大字報的圍攻而跳樓自殺身亡。集訓中，責令教師自我檢查，人人過關，市教育局副局長尹遠和梧州衛校副校長等一百多人作為重點對象進行批判鬥爭。（據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決定“從今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並指出：“高等學校選拔新生，必須堅持政治第一的原則”，“貫徹執行黨的階級路線”。這兩項通知由於“停課鬧革命”，當時並沒有得到執行。（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二十七日駐《廣西日報》社“文革”工作隊長劉福生在區直機關“文革”戰地練兵會上介紹《廣西日報》社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所謂經驗。伍晉南肯定了《廣西日報》的“經驗是成功的”，“做法是好的”。（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八月

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十六條》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傳來了毛澤東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寫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一封信和八月五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廣西日報》在八月九日給予刊登。（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一日毛澤東主席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後，南寧市的紅衛兵運動從八月至十二月，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紅衛兵“總部”、“司令部”、“指揮部”、“聯絡站”、“戰鬥隊”等二百多個組織及一千多個戰鬥隊，紅衛兵人數達一萬多人，遍及全市各行業、各個單位。（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本月上旬商業廳文革領導小組，對幹部進行排隊，對所謂屬於四類幹部進行批判，當時由工作隊的白文普、王志春、廳黨組的張沛然、唐子培、李英等研究決定。被批判的有廳黨組成員李德，石油公司支書李文才、糖業公司支書王永信、五金公司副經理張璽玉等，強加給王永信的罪名是：反對掛毛主席像。（王永信說“毛主席像不要亂貼，亂貼不嚴肅，被當作反動言論）反對毛主席，反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重用壞人等十條之多。被劃為四類幹部、“三反分子”，批鬥十次。於九月二十三日含冤逝世。（據商業廳“文革”大事記）

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撤銷大、中學校文化革命工作組的決定》。根據中央決定精神，南寧市委發出通知，宣布撤銷市委派駐各單位的“文化革命工作組”（到八月二十二日全部撤銷）。廣西師院“多數派”的部分學生貼出送瘟神的對聯。另一派學生則強烈不滿，為此引起兩派學生鬥毆，到七日打傷十多人，即所謂桂林“八·七”事件。（據廣西日報、南寧市委、桂林市委“文革”大事記）

同日 自治區黨委召開會議，宣布撤銷派駐各學校、機關的工作隊（組）。（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日 桂林“八七”事件發生後，廣西師院學生派出代表赴京向中央告狀，要求改組桂林市委，要求韋國清（當時在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到桂林處理問題。韋國清八月十三日從北京到桂林，召集喬曉光、伍晉南、賀希明、安平生、霍泛等到桂林，研究如何解決桂林問題。（據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十七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給廣西師院學生打來電報（開始用密碼後來用明碼，電報公開張貼在大街上），決定派韋國清全權解決桂林問題，並說韋國清是身經百戰的老戰士，又是中央委員，要求師院學生相信韋國清。韋國清得到這份電報後，便公開出面在桂林處理問題。同日《廣西日報》發表趙群聲所謂《揭批鍾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必須徹底清算》的文章。十八日自治區黨委代理第一書記喬曉光在師院禮堂公開宣布黃雲、徐為楷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區黨委決定並經中央批准，撤銷黃雲市委書記、徐為楷市委副書記兼“文革”組長的職務。當日，自治區黨委還宣布撤銷徐為楷駐廣西師院工作隊隊長的職務，並任命王同連為桂林市委副書記。儘管這樣，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學生繼續受到圍攻。廣西師院學生文可義被劃為“反革命”，“南下串連隊”張鐵錨、張順喜被關押起來，全區各地喊抓黃雲陽。（據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日報》公布自治區黨委有關撤銷鍾林《廣西日報》總編輯職務的決定，定鍾林為“三反分子”，大量報導全區廣大工農兵群眾、知識分子、革命幹部等聲討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鍾林的滔天罪行。廣西日報社職工也連日開會，聲討鍾林的“反黨罪行”。（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主席在三個多月的時間中，在首都連續八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林彪多次在大會上講了話，一個以青少年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運動席卷全國。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震撼祖國大地。紅衛兵在全國到處鼓動“造反”，揪鬥所謂走資派，搞亂了地方的各級黨委。

八月中旬，北京紅衛兵串連隊前後三批三百多人來到南寧進行“革命串連”，走上街頭橫掃“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到處鼓動“造反”，矛頭直指自治區黨政領導。南寧市的紅衛兵組織相繼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總部、司令部、指揮部、聯絡站等二百多個組織和一千多個戰鬥隊，紅衛兵發展到一萬多人，開始走出學校，“殺”向社會。（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年表、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師院和南下串連隊的學生拉桂林市委副書記徐為楷戴高帽遊街，當時引起地社會上級大的反響，街上到處出現圍攻廣西師院和南下串連隊學生的情況。當晚，韋國清正在桂林主持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桂林市委領導同志參加）開會，認為學生這種過火行動是“右派”翻天，布置桂林全市加強警衛，這樣對立情緒更加激化。（據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是日 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主席出席大會，林彪在會上講話，周恩來總理也講了話。會後，百萬群眾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檢閱。北京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南寧市紅衛兵連日來也走上街頭，橫掃“四舊”，南寧市很多主要街道和主要建築物、商店都強令改名。有的改為興無路、解放路、滅資路；有的改為朝陽樓、造反樓、長征樓等等。桂林、柳州、梧州等城市也同樣出現這種情況。這樣一改，弄得很多顧客找不到原來商店，而出現混亂。隨著紅衛兵的串連活動，破“四舊”運動迅速遍及全區城鄉。（據區黨委檔案6卷、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 梧州市由市文革小組從各中學挑選八十多名學生，在市委禮堂開會，宣布成立該市第一

批紅衛兵。（據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一日 南寧市紅衛兵和各群眾組織共六萬人在區體育場集會，熱烈慶祝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四日 中央決定免去韋國清廣西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調任中南局任第二書記（韋實際上沒有離開廣西）；任命喬曉光為廣西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據區黨委組織部組織史）

同日 柳州市柳高、一、二、三、四、五、六中和柳鐵一、二中學校五千多名紅衛兵，走上街頭，張貼標語，散發傳單，進行破“四舊”立“四新”宣傳。（據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 廣西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南寧市二、三、四、五、六中學和珠江子女學校等六所學校，成立了南寧市第一個紅衛兵聯合司令部，並召開成立大會。覃應機、伍晉南、霍泛、劉毅生（自治區黨委秘書長）、南寧市委書記肖寒、市長韋純束、副書記王恩厚等參加了大會。當晚，南寧市各界群眾代表一千多人在朝陽廣場集會，支持紅衛兵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動。二十六日晚，朝陽廣場七百多群眾集會並遊行，堅決支持學生的“革命”行動。（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本月下旬至九月初，桂林市紅衛兵群眾組織開始分成兩派。“工人赤衛隊”、“紅旗紅衛隊”為一方，桂林師院“多數派”即“老多”、“工人紅衛兵”、“機關職幹造反隊”為一方，前者提出要“誓死保衛市委”，後者提出“要改組市委”。九月六日，桂林市二十六個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和“南下串連隊”三十人向市委和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賀希明提出召開全市大會的“三點要求”大會由紅衛兵主持，市委在會上公開引火“燒身”，黃雲、徐為楷作檢查），以處理“八七”事件的問題，未獲同意。九月七日上午十一時廣西師院學生二千多人在市委院內靜坐，進行絕食鬥爭，抗議市委破壞“文革”。九日，靜坐絕食的隊伍擴大到七十六個單位，三千人，靜坐達六十二小時。（據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九月

三日 韋國清在廣西大學貼出一張大字報：

《歡迎大家向我開炮——我的一張大字報》：

廣西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同志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你們向一切牛鬼蛇神大舉進攻，我堅決支持你們這一切革命行動。與此同時，你們向區黨委的領導同志也貼出了一些大字報，提出了批評和意見，我表示熱烈的歡迎，並決心在今後的實際行動中堅決改正我的缺點和錯誤，但至今為止，你們向區黨委（特別是我）貼出的大字報還不夠多，火藥味還不夠濃，我再一次地向革命的師生員工同志誠懇地要求向我們開炮，炮轟司令部（區黨委）。（據區黨委檔案6卷）

三日、五日 三日晚，廣西農學院、北京國際關係學院等一千多名大專院校紅衛兵沖進廣西日報社，對該報八月九日刊登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沒有套紅色，以及《人民日報》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一文晚發一天，提出強烈抗議，並誣陷為現行破壞活動，命令孫鴻泉、鍾林、鍾紀民等人到球場接受批判。總編輯孫鴻泉表示支持紅衛兵的“革命”行動。五日，《廣西日報》重新套紅再次發表《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五日 中共中央通知：組織外地高等學校、中等學校師生代表和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

革命”運動，生活補助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開支。廣西各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師生開始大串連，全國各地和區內紅衛兵來南寧串連的近三萬二千六百八十人，其中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來南寧串連的共九十一批，一千零八十二人。本市與外來紅衛兵匯集一起，走上街頭，橫掃“四舊”。他們胸戴領袖像，臂佩紅袖套，帽戴五角星，手拿“語錄本”，口唱“語錄”歌，高呼口號搖“語錄”，鬥爭會上念“語錄”，派性辯論用“語錄”，牆壁上寫“語錄”（用紅油漆大街小巷到處寫，即當時所謂的“紅海洋”）跳表“忠”舞拿“語錄”，個人崇拜狂熱達到登峰造極。更離奇的是在大破“四舊”中，古建築、古書、古畫、古戲、文物等均列為“四舊”，機關、學校的圖書館、資料室以及部分領導幹部個人所存的古今中外精典著作、書畫、古董等等，燒的燒，搶的搶，橫遭破壞；甚至連婦女的長辮子、瘦褲子等也被剪。一時，打、砸、搶、抄、抓、剪、鬥之風盛行。南寧市據十月底的不完全統計，紅衛兵集中大抄的有六百七十多家；清理所謂“牛鬼蛇神”及其子女家屬回原籍監督勞動的有五千多人；橫掃水月庵一所、教堂二間；查封所謂封、資、修的物品達十五萬多件。貴縣在破“四舊”中，把南山寺遊覽區全部毀壞，太平天國興王亭、石達開的紀念塔和桂東南抗日起義的烈士碑均被嚴重破壞；防城縣文物館幾千部古典文物、資料和檔案全部燒毀。在破“四舊”中，大批文化遺產毀於一旦，造成了無可彌補的損失。（據區黨委檔案6卷、南寧縣“文革”大事記）

八、九月之間，區直、地、市、縣機關和街道紛紛成立紅衛兵、“赤衛隊”。任務是：“保護國家財產，維護社會秩序，阻止紅衛兵衝擊”。南寧市工交系統於九月六日成立工人赤衛隊，有一千七百一十人，並在朝陽廣場開會，市領導肖寒、韋純東、潘體彩出席了大會。街道系統十一個公社的赤衛隊也於同日宣布成立，人員二千多名。區直的農業廳、煤炭工業廳、石油工業廳等單位也先後成立了“赤衛隊”。直到十一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遭批判而解散。（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在南寧地區，“紅衛兵”組織迅速普遍地建立起來。全地區（包括四清和面上各縣）七十八間中學（包括十間耕讀學校）先後建立了一百五十八個“紅衛兵”和其他戰鬥隊組織，共有紅衛兵一萬多人。他們實行革命大串連，到十月份，全地區中等以上學校有七千多名師生和“紅衛兵”到北京、南寧市等地串連。僅大新縣，從六六年九月至六七年三月中央下令停止串連時止，到北京串連的達二千六百多人，耗資十萬多元。（據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六日 梧州市第一批紅衛兵三十人，赴京參加國慶典禮，十三至十九日，該市第二批紅衛兵六百多人赴京串連。（據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九日 桂林“老多”的請願代表二十五人到達自治區黨委大門前，被“赤衛隊”阻攔在大門之外，雙方開展辯論，消息傳開，廣西醫學院、廣西大學、南寧二中至十九所大中學校學生共兩千多人到自治區黨委門前表示支援“老多”代表，這些學生宣布就地參與靜坐和絕食鬥爭。“赤衛隊”和“盾牌”紅衛兵對靜坐的學生進行圍攻，“老多”不斷地增加紅衛兵來參加靜坐，在參加靜坐絕食鬥爭的學生中，因從桂林赴邕長途消耗，絕食時有一位女學生叫“衛東”（齊斷義）處在半昏迷狀態中。韋國清出來探望，對靜坐絕食的學生說：要吃飯鬧革命，別這樣，免得把身體搞壞了。韋國清摸一摸這位女學生的頭，“衛東”即把韋國清的手推開，說韋國清沒有階級感情；另一位女同學則把韋國清的草帽搶奪扔在地上。韋國清說：幹嗎？要打人？不要打人嘛！在區黨委大門口站崗的“赤衛隊”就說這些靜坐絕食的學生打韋國清，剝時間，全南寧市貼滿聲討靜坐學生毆打韋國清的大字報，說韋國清被打傷住院，要揪出毆打韋國清的凶手，這件事很快傳遍了廣西，全區各地來信來電，有的集會聲討靜坐學生毆打韋國清，於是參加靜坐的“老多”學生強烈要求韋國清出來澄清事實。韋國清於十月十八日晚在桂林劇院召開機關幹部大會時解釋說：“咱們還是實事求是，學生只打了我的手，並沒有打傷我住院”。這就是當時轟動廣西的“九·九”靜坐事件。到九月中旬南寧各大中學校和外地學生紛紛北上串連，“九·九”靜坐事件雖然很快平定下來了。但這一事件對後來形成廣西的兩大派組織起了較大的影響。（據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十五日 《廣西日報》報道全國革命師生進行大串連的消息。

二十日 廣西藝術學院音樂系師生寫了《剝開“劉三姐”的畫皮看伍晉南的修正主義面目》的大字報。《劉三姐》是好戲還是黑戲？當時爭論很激烈。有的說《劉三姐》是“文藝黑線”的代表作，伍晉南是《劉三姐》的黑後台。廣西大學等八所大專院校輪流揪伍晉南到學校批鬥，勒令伍晉南作檢討。從此，伍晉南成為眾矢之的。（據廣西藝術學院“文革”大事記）。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欽州地區第一批上北京接受毛澤東檢閱的紅衛兵先後出發，欽州一百多人、合浦四百多人、上思一百三十二人、靈山一百二十多人。（據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 南寧市中等學校紅衛兵聯絡站舉行成立大會，市委副書記王恩厚任聯絡站總站長。（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 桂林市“工人紅衛兵總部”（簡稱“工總”）及“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簡稱“紅總”）成立。十二月十日，桂林“市直機關幹部、職工革命造反團”成立；十八日，“五四鐵筆總部”成立；同日，“工總”和“紅總”兩群眾組織發展為“革命造反大軍聯合指揮部”（簡稱“造反大軍”）。以上群眾組織在桂林市“文革”中是有影響的幾個群眾組織。（據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十月

三日 廣西日報發表《紅旗》雜誌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文中提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八日，《廣西日報》發表張化聲批判周揚的長文《鏗聲擋不住文化大革命的長輪》，對周揚進行惡毒的攻擊。（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五日 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根據林彪建議發出緊急指示，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中共中央把這一指示轉發全黨。從這以後，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同日 南寧市紅衛兵總部發起召開南寧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辯論大會。內容是：以伍晉南為首的區文革領導小組到底執行一條什麼路線？參加大會的七十六個單位，有萬餘人。（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月，區直、地、市直屬機關出現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大鳴大放聲勢浩大，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且由機關院內推向街頭，圍觀的人群熙熙攘攘。各行、各業、機關、學校、各種群眾組織竟揪鬥本部門的所謂“走資派”（由於群眾組織對領導幹部的觀點態度不同，產生了群眾組織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矛盾）。南寧市朝陽廣場設立的大字報棚，從十九日開始張貼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字報。廣西大學“八·三一”紅衛兵在大字報中指責“區黨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採用各種手段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鎮壓革命學生”。（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 桂林市委決定並經自治區黨委同意，《桂林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林同群”的文章，公布《桂林日報》總編室主任餘國混的所謂“三反”材料。從此，在整個“文革”中，餘便成為桂林市兩派批鬥的對象。

十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桂林市各群眾組織分別召開批判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先後揪鬥原市領導馮邦瑞（市長）、劉竹溪（市委副書記）、蘇玉山（副市長）和自治區駐桂“文革”顧問林中以及四清總團領導李隆（區統戰部長）、段遠鍾（區工交部長）、王鳳枝（市委組織部副部長）等。“工人赤衛隊”、“紅旗紅衛兵”部分機關幹部也紛紛發表“造反”聲明，起來造反。（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 南寧市工人革命造反總部等九個組織發起，在朝陽廣場召開《揭發和控訴肖寒為首的

南寧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同日 百色醫專“長征串連紅衛隊”三十三名學生徒步到南寧進行串連，開創了我地區徒步串連的先例。到十一月十四日統計，全地區上京和到外地串連的教師、學生有八千一百人。（據南寧市、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一月

本月，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紅衛兵群眾組織，紛紛建立聯合造反組織。十一月二十三日，南寧市“革命工人造反委員會總部”成立，市委領導肖寒、王恩厚到會表示支持。十二月二十六日，南寧市郊區農民紅衛兵總部在朝陽廣場宣布成立，自治區黨委羅立斌出席會議。同日，南寧鐵路分局各群眾組織也聯合成立“鐵路聯合司令部”（簡稱“鐵司”）。十二月底，由汽車總站、區二五車隊、區糧食廳車隊、區外貿車隊、南寧市工交公司、市汽車運輸公司等單位的群眾組織聯合成立了“廣西汽車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汽司”）。以上是南寧市“文革”中有影響的幾個群眾組織。（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日《廣西日報》刊登《紅旗》雜誌社論《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文中說“廣大群眾起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說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告破產”。（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同日 全國各地紅衛兵一批一批湧到梧州市，向市文化小組要串連費、要住宿、要吃飯、要冬衣、鋪蓋，稍為不順其意，就要“砸爛當權派的狗頭”。只得耗資在全市增設數十個接待站，免費接待紅衛兵食宿、車船和一切日用品，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六六年十一、十二兩個月車船費、伙食費達四萬一千三百一十五元。據市財政局長帳面可查的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二月，全市的“文革”費用，便開支了六十萬元。（據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十一月中旬，自治區黨委召開三級幹部大會，傳達中央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同志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二十三日 南寧市“革命工人造反委員會總部”在區黨委接待站開成立大會，肖寒出席大會並表示支持。（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二月

二日，南寧市工人“革命造反”組織會同黎塘等地工人“革命造反”組織成立《廣西工人革命造反總部》（簡稱廣西“工總”）後來發展成為全區性的工人“革命造反”組織。“工總”下設組織部、宣傳部、後勤部，總部設在南寧市工人文化宮，“工總”在南寧市下屬有十二個分部。（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四日《廣西日報》刊登新華社電訊《首都舉行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江青在會上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隊這個形式是錯誤的，他們的工作內容尤其是錯誤的。”當天，韋國清代表自治區黨委檢查犯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發書面檢查）”。（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四日至六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簡稱工業十條）。（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九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規定》中說：“工人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工人群眾和工人群眾組織之間，“可以在業餘時間，在本市革命串連”，“學生可以有計劃地到廠礦，在工人業餘時間進行串連，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學校進行革命串連”。這個文件下達，“文化大革命”正式擴及全國工交、財貿各部門的基層單位。（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八日 南寧市革命造反聯絡站等二十七個紅衛兵組織，開會批判區、市黨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到會約十五萬人。因開會時找不見韋國清，後由喬曉光代表區黨委、肖寒代表南寧市檢查所犯方向、路線錯誤，出席大會的有伍晉南、賀希明、安平生、鍾楓、傅雨田、段綏和、王恩厚等區、市領導人。（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由於受“反革命經濟主義”的波及，柳州地區各縣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就開支了一百二十多萬元。大批幹部、職工外出串連，影響了生產和工作。（據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本月九日至一月十六日，桂林地委負責地區所屬各縣紅衛兵串連的接待，共開支經費四十六萬元。其中十二月二十日至元月十二日的二十四天中，支出經費二十三萬元，動用尼龍薄膜三十噸，被子三千六百床，棉布十三萬米，糧食九萬多斤。（據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日 南寧地委辦公室主任榮其光夥同祁連恭（地委辦公室副科幹部）、周誠（地委書記甘懷勳秘書）、鄧紹業（地委副書記田春的秘書）等以及原地委辦公室一些人，以長期在地委領導身邊工作，瞭解情況的知情人的身份，一起拼湊捏造編寫打倒南寧地區頭號走資派甘懷勳的十二大“罪狀”。並以地委辦公室“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名義貼出。與此同時地委常委組織部長武星與農辦主任王文科貼出誣陷甘、田逼死南寧地區農村政治部主任張榮久（張的死因，當時已得出結論是落水死亡）。十二月十日地委副書記孟慶彥、董以法二人向自治區黨委呈報，要求批准給甘懷勳停職反省。當晚孟慶彥召開沒有甘懷勳參加的地委常委會，作出了“打倒地委書記甘懷勳”的決定，並給自治區黨委寫了關於“給予甘懷勳停職反省、並責令他向機關幹部職工進行徹底交待，發動廣大群眾對他們進行徹底揭發、批判的鬥爭”的報告。同時由傅一平執筆寫所謂“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甘懷勳”的大字報。孟慶彥、田春、石更（地委副書記）、董以法、孫朝相（專署專員）、劉耀華（專署副專員）、伏崇禮（專署副專員）、武星等均簽名。十二日晚批判李景包庇甘懷勳害死張榮久的大會。孟慶彥、董以法、伏崇禮、孫朝相、傅一屏等參加大會並作批判發言。十三日晨孟慶彥、董以法、石更等和直屬機關職工數百人去自治區黨委請願，要自治區黨委立即表態罷甘懷勳的“官”。喬曉光即電話請示中南局。十三日中南局批准甘懷勳停職反省，地委工作由孟慶彥主持。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革組長董以法代表地委向地專機關職工大會作《徹底清算甘懷勳的反革命罪行，徹底批判我們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發言。誣陷甘懷勳親自當主帥，我們一小撮結成了一個“反革命聯盟”。此後甘被誣為南寧地區“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假黨員”、“托派”、“甘、田、劉（洪濤）、李（景）反革命聯盟的罪魁禍首”進行揭批。十二月十日至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地委辦公室“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專區辦公室“紅尖兵”司令部等組織又印發所謂“甘懷勳罪狀材料”十二件共六萬六千九百六十份。六七年一月九日抄了甘的家並作為“修貨”展覽，地委文革小組並通知各縣文革小組負責人及幹部前來參觀。不久又通知各縣縣委書記來地區批鬥甘懷勳和田春。（據南寧地區“文革”大事件）

十三日 自治區批准甘懷勳停職反省。甘自停職後，從十二月至七三年十月長期被鬥迫害，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含冤逝世。（據南寧地區“文革”大事件）

十五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領導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是貧下中農文化革命委員會，由貧下中農大會民主選舉產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發展以貧下中農青少年為骨幹的紅衛兵”。“農村文化大革命，也要來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行大民主。在隊與隊之間，社與社

之間，可以利用生產的空閒時間，進行串連。還可以組織一批革命學生下鄉串連”。（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二十五日 桂林市“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教工井岡山總部”、“北航紅旗駐桂聯絡站”、“首都紅衛兵留桂聯合造反團”、“清華井岡山駐桂聯絡站”等群眾組織，聯合封閉了《桂林日報》，並改名為《今日新聞》。（據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七日 廣西民族學院一百多學生和紅衛兵上午九時進入廣西日報社開會。大會開到下午三點多鐘。紅衛兵宣布進駐廣西日報社，並成立了廣西革命造反臨時指揮部，當晚進駐二十多人。孫鴻泉表示：“紅衛兵到報社來造區黨委的反、造《廣西日報》的反、造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鍾林的反，把報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統統揪出來，堅決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一個革命行動，我們堅決支持”。（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一九六七年

元月

一日《廣西日報》刊載《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宣布“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在社論的影響下，廣西繼去年學生紅衛兵大串連之後，大批幹部、職工也紛紛“造反”，積極參加“四大”，脫離工作、生產單位，外出串連。僅桂林地區，各縣來桂林市串連的就有八千多人。資源縣有五百多縣、區幹部到外地串連。很多商店無人賣貨，有的糧食部門人已走光，恭城縣水利工地糧食供應不上，糧庫的幹部把鑰匙交給糧食局長後就走了。桂林市郊區公安局被封，公安幹部串連去了。在南寧，朝陽廣場成為貼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和進行造反集會的場所，“四大”的狂潮愈演愈烈，預示一場全面的大內戰即將到來。（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1卷、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大學外文系學生賀曉晴貼出《偉大的雷鳴》大字報，提出對毛澤東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該文受到批判後，賀又和同學聶健遠寫了《偉大的雷鳴好得很》的大字報。二十三日，賀被扭送公安機關押了一年。二十五日，群眾組織在朝陽廣場開大會，批鬥賀、聶兩人。（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四日 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前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被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誣陷為“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而突然被打倒。這對中南各省（區）震動很大。（據中共黨史辦大事年表）

同日 榮其光等人貼出打倒甘懷勳的“十二大罪狀”大字報後，接著他們又策劃誣陷打倒南寧地區所謂第二號走資派田春的大字報。並鉛印一萬份散發各地。今天，地委副書記、“文革”小組組長董以法在地直機關幹部大會上作所謂《徹底清算甘懷勳的反革命罪行，徹底批判他們所犯的方向路線錯誤》的報告，誣說：“地委已被甘懷勳為首的一小撮混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把持”，“他們結成一個反革命聯盟”，“甘充當主帥，甘、田（春）一唱一和，互相包庇，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資本主義為最終目的”等。董的報告實為聲討甘、田的“檄文”鉛印散發。為後來把甘（懷勳）、田（春）、劉（洪濤）、李（景）打成“反革命聯盟”定下調子。七日董以法先後簽發地委給區黨委《關於給田春撤銷一切職務的意見報告》和《關於給李景停職反省的意見報告》。在兩份報告中誣陷“田春是一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甘懷勳狼狽為奸、做盡壞事”，誣陷“李景一九六〇年以後就參加甘、田的反革命聯盟”並誣李景為這個聯盟的“參謀長”。同年五月五日地區政治聯合戰鬥團寫的《關於李景三反材料》誣陷李景參加反革命聯盟，把甘、田、劉、李打成反革命聯盟。使這些同志長期受到批鬥、迫害。一九八三年在“處遺”中，所謂“甘、田、劉、李反革命聯盟”一案，才得到徹底平反。（據南寧地區“文革”大事件）

六日 晚，廣西民族學院紅衛兵楊向陽等到《廣西日報》社，以“封閉《廣西日報》行動委員會”名義封閉《廣西日報》。報社多數人不知怎麼回事。當晚報社“風雷激戰鬥組”何家松到處遊說。他說：桂林來了一批紅衛兵，那些人很激烈，現在來封報這些人較溫和，我們應該和這幫人一起行動，先下手為強。說服了部分工人，用“廣西日報社革命職工主辦”名義出版《每日電訊》。

七日 報社部分職工提出質問：何以用報社職工名義出版而多數人事前不知道。當天，何家松貼出謝王崗支持封《廣西日報》出《每日電訊》的大字報。孫鴻泉等新編委也出來做工作，召開行政組長會進行說服，要求大家支持出《每日電訊》。新編委多數成員參加辦《每日電訊》。《每日電

訊》全發新華社電稿，但七日的《每日電訊》，刊登了“封閉《廣西日報》行動委員會”的《封閉〈廣西日報〉通告》《通告》說：九年來，以韋國清同志為首的區黨委，把《廣西日報》辦成了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進攻的陣地，為資本主義復辟製造輿論；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廣西日報》繼續忠實地執行了區黨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抗，罪惡累累。《公告》宣稱：“決定從元月七日起，改出《每日電訊》，由《廣西日報》社革命職工主辦”，全部發表新華電稿。（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八日 《每日電訊》轉載《文匯報》一月六日題為《革命造反有理萬歲》社論。（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十二日 廣西民族學院紅衛兵楊向陽、和《廣西日報》社“風雷激”何家松等同進駐《廣西日報》社的紅衛兵及《廣西日報》社職工到南寧朝陽廣場開了一個不到千人的大會，批判自治區黨委所謂“抗拒毛主席關於辦好黨報罪行”，把霍泛和傅兩田拉到大會主席台上鬥爭。開到半途，另一派別紅衛兵沖了會場，攻對方是“保”字號搞假批判。（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以後這一條又在實際上擴展到凡是對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稍有不滿的，也被以現行反革命治罪，這個規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廣西，據查“文革”中因對林彪、江青等一夥稍有不滿或說了劉少奇、鄧小平好話的，而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批鬥或判刑的就有四百多人。

十五日 “區直機關造反總部”成立，並與“廣西工總”、“廣西建築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廣西建司”）“廣西汽車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廣西汽司”）、“廣西紅總”、“紅衛兵南寧八三一部隊”（簡稱“南寧八三一”）、“區直機關造反聯絡站”等組織聯合組成“廣西革命造反大軍”（下稱“廣西革命造反大軍”）

以“工總”為主的二十五個群眾組織成立“廣西革命造反大軍封管《廣西日報》行動委員會”，併發表《封閉《廣西日報》聲明》說：一月七日“封閉《廣西日報》行動委員會”盜用造反旗號，繼續以新的形式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敢觸動區黨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搞折衷主義、改良主義、溫情主義。因此，“廣西革命造反大軍”決定從一月十五日起，重新封閉並立即接管《廣西日報》。在新的《廣西日報》誕生前，出版《新聞報道》。

在封閉《廣西日報》的同時，“工總”派楊遠宏、胡冠瑩進駐報社工作。

十六日 《新聞報道》出版由“造反大軍”封閉《廣西日報》行動委員會主辦。（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每日電訊》、《新聞報道》刊登了《紅旗》雜誌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文內提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這是全國報刊第一次提出的口號。

十八日 《新聞報道》報道區直二百二十個單位組織參加的“區直革命造反總部”成立。（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十九日 桂林市“造反大軍”在廣西師範學院學生劉振林、黃沃南指揮下，連續三天，在桂林市體育場召開幾萬人的大會，批判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桂林市委書記黃雲等一批區、市領導幹部。被鬥鬥的有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賀希明、桂林市委副書記劉竹溪、徐為楨，桂林地委書記王祝光、副書記李雲亭和區黨委派到桂林市的“文革”顧問林中等一批領導幹部。在批鬥中，他們被掛黑牌，戴高帽；有些人被強迫下跪。

批斗大會由“老多”黃沃南主持。在會上批鬥發言的有師院師生周兆祥、劉振林、甘恒彩、潘國球、李寶雄、謝榮傑等人。批鬥後，數十輛汽車進行大遊鬥。“造反派”用所謂保皇組織“工人赤衛隊”和“紅旗紅衛兵”的袖章縫製衣服，要韋國清披著，站在第一輛汽車上遊街示眾。被遊鬥者沿途被人擲石子、吐唾沫，受盡凌辱。（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記）

本月中旬，在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策劃下，鬥陶（鑄）聲浪甚囂塵上。“廣西革大（即廣西師範學院）紅衛兵總部”和北京、中南地區的三十個單位聯合發起，成立“鬥爭大會籌備處”（後改為鬥爭陶鑄籌備處）。（據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廿一日晚上十二時，區黨委書記安平生在南寧主持召開“西南會議”，傳達區黨委第一書記喬曉光的指示：區、市黨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造反大軍”方面，一要支持“造反大軍”封官《廣西日報》的行動，二要支持“造反大軍”奪權。傅雨田、江平秋、黃榮、肖寒、韋純束等區、市一些領導幹部參加這次會議。（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區文化局所屬八個單位的十個群眾組織，成立“接管文化局臨時行動委員會”（簡稱監委）宣布對區文化局奪權，這是最早奪權的區直單位，但文化系統未參加奪權的部分群眾，以侯育中為首，又成立了“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委）”，於廿三日進行反奪權，宣布元月廿一日奪權不合法，並於卅一日進駐文化局。從此，“監委”、“聯委”天天對吵，最後“監委”解散。（據區文聯、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日報》社部分群眾組織聯合組成的以何家松、李海強等為首的“革命造反戰鬥團”，在《新聞報道》上發表《為《廣西日報》早日新生而努力》的文章，祝賀《新聞報道》誕生。同天，報社部分群眾組織聯合成立“紅色革命造反兵團”，頭頭是梁宗棠、薛克成、梁志文、黃忠安等人。這個兵團在《成立宣言》中表示：“堅決站在革命大軍一邊”，“大道劉、鄧、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大道韋國清為首的區黨委一小撮黨內走資派的反，大道以鍾林為首的前《廣西日報》修正主義編委會的反，大道以孫鴻泉為首的新編委會的反，大道以劉福生為首的“文革”工作隊和以覃振鳳為首的“文革”黨委會的反”。

廿二日《新聞報道》刊登《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當晚，首都“三司”駐嶺聯絡站召集南寧各群眾組織頭頭開會，策劃奪權。會議決定並成立了以“工總”為主體的二十六個群眾組織參加的“廣西革命造反派奪權行動委員會”。（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廣西工總”、“廣西紅總”、“廣西八三一”和“廣西藝總”等二十多個群眾組織，組織南寧市首次大遊鬥。被遊鬥的領導幹部有：伍晉南、鍾楓（自治區工委副主席）、尚持（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長）、陸地（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吳青光（區工委教育廳副廳長）、呂集義（交通廳副廳長）、郭銘（區文化局副局長）以及文藝界知名人士陽太陽等二十三人。他們被戴高帽，掛黑牌，分別裝在十幾輛大卡車上，在全市進行遊鬥。（區文化廳、區文聯、廣西日報社等單位的“文革”大事記）

廿三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支左”只能是執行“文化大革命”總的錯誤方針，帶來許多消極後果。（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廣西工總”陳朝春、梁柏松，“廣西紅總”曾春生、譚乃福，“廣西八三一”何作然、石懷宇，“廣西八八紅衛兵總部”雷激，首都“三司”駐嶺聯絡站李翠英等，率領二十六個造反組織的奪權隊伍，於凌晨三時進自治區黨委，奪了各部委的一切大權。相繼被奪權的單位還有自治區工委、區公安廳、高級法院、區廣播電台、區教育廳、區勞動局和南寧市委、市人委、市廣播

站、《南寧晚報》等。當天，柳州鐵路局也被奪權。

接著，桂林地、市、梧州地、市、柳州地、市，玉林、河池、百色等地區黨政領導機關，也分別於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先後被奪權。至二月上旬左右，全區上下，層層奪權，有的街道居民委員會和農村生產隊的領導權，也被奪了。從此，各級黨政組織陷於癱瘓，全區處於無政府的混亂局面。

以上各地“奪權”的消息《新聞報道》均給予報道。

很多單位被奪權後，被另一派群眾組織指著為假奪權，從而進行反奪權，有的單位反覆奪權兩三次。不同觀點的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廣西大學、各地、市、柳鐵、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造反大軍”奪了自治區黨委和公安廳的權後，廖煒雄（區黨委組織部副科級組織員）和肖岳安等人成立了區黨委接待站“革命造反兵團”，對外宣布奪了接待站的權，實際上仍由接待站主任段純和、副主任閻光彩領導。（據“處遺”材料70卷、廖煒雄的檢查）

同日 南寧地區地專政法戰線“革命造反派奪權行動委員會”奪了地區政法黨組的權後，南寧軍分區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群眾的決定》，立即派出黃科精等八名“支左”人員對地區公、檢、法三家實行軍管。（據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廿四日 廣西軍區遵照毛主席關於“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擔任“三支”、“兩軍”工作（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各地區分區、市、縣人武部和當地駐軍，也分別在本月下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表態支持所謂“革命左派”。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實行“三支兩軍”，對穩定當時因被奪權，黨政機關處於癱瘓的混亂局面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軍隊“支左”只能是執行“文化大革命”的總的錯誤方針，在嚴重派性的支配下，解放軍在“三支兩軍”中只能是支一派壓一派，所謂“支左”實為“支派”，從而帶來許多消極後果。

這天晚上，廣西軍區代表朱敬之和少量解放軍參加了“造反大軍奪權行動委員會”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的“奪權祝捷再戰誓師大會”。參加大會的有一百四十六個單位四萬多人。

朱敬之代表廣西軍區在大會上講話，“表示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鬥爭，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我們就堅決還擊。”（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區水電測設計院“火種”兵團龍智銘、紀烈等，奪了該院黨政大權後，宣布“院黨委所屬各支部要在‘火種’兵團監督下工作”。該兵團還聯合電業局、電業公司的群眾組織，抄黨、團員積極分子的家，對所謂執行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十四名幹部、群眾，分別予以撤職、降職、開除黨籍、國籍，取消預備黨員資格等處分。（據區水電設計院“文革”大事記）

廿五日《新聞報道》發表社論：《只准革命造反奪權》。

晚上，“造反大軍”圍抄南寧“赤衛隊”和“盾牌”紅衛兵總部（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南寧地委代書記孟慶彥和組織部長陸武星，就一九六六年八月田春、董以法、李景三人授意隆安縣委書記杜易派人到屏山公社動員南寧專區水電局幹部將其轉抄貼在那裏的毛主席的第一張大字報收回燒毀問題，給中央、中央文革和陳伯達寫報告。報告說這種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主要責任是田春、董以法兩人，應給予嚴肅處理等的錯誤報告。（南寧地區大事記）

廿六日 桂林地、市委造反大軍二百五十多個組織約三萬多人，在廣西師範學院大操場召開奪權勝利大會，駐桂六九五部隊、桂林軍分區、步校等二十五個代表發言表示，支持奪權的“革命行動”，誓作“造反派”後盾，把“文革”進行到底。會後遊行。（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1卷）

本月在一次，玉林地委書記韋樹輝、專員熊福芝的批鬥會上，地委副書記魏益年、蔣昌永出於個人目的，進行“反戈一擊”，帶頭揮手呼喊“打倒韋樹輝！打倒熊福芝！”（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本月下旬，地辦等單位八個造反組織派出代表陳育詩、李壽仁、江基等人帶著一份《堅決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鄒林打倒！鬥垮！鬥臭！》材料上報自治區黨委。強烈要求自治區黨委撤鄒林和周秀英（鄒林妻子，專區婦聯主任）的職務。在造反派的壓力下，自治區黨委於一月二十六日作出《關於撤銷鄒林玉林地委秘書長職務》和《關於撤銷周秀英的玉林專區婦聯辦事處主任的職務》的決定。此後，鄒林、周秀英受到長期的殘酷的批判鬥爭。（據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廿六日 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醫學院造反兵團”、首都“三司”駐邕聯絡站等組織的主要頭頭在醫學院開會，交換對廣西“造反大軍”奪權以來的看法。廣西軍區應邀派宋長髮出席，“南寧八·三一”代表認為，“造反大軍”奪權後幹了不少壞事，已成運動的絆腳石，主張退出“造反大軍”，重新組合；“紅總”代表說：“我們曾醞釀退出造反大軍”，但意見尚不一致”。醫學院“造反兵團”代表說，目前砸爛時機不成熟；首都“三司”代表說，在當前情況下退出“造反大軍”對革命不利。最後一致意見：①由“工總”內部拉出一部分隊伍，進行“革命造反”；②由參加會議的四個組織共抽調一百九十六人，分別到橡膠廠、罐頭廠、反帝醫院等單位，幫助“工總”整風。（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六日~廿八日 應“造反大軍”要求，廣西軍區先後派出六個班、一個排、兩個連，分別到區交通廳、區黨委、區公安廳、南寧市委、汽車修配廠、罐頭廠和“工總”財貿分部等單位支援“造反大軍”。（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八日 中央軍委命令八條頒布。（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九日 “工總”及其所屬各分部，在南寧市組織大遊鬥。被戴高帽、掛黑牌遊鬥的，有伍晉南、霍泛、鍾佩、賈亦然、謝王尚、陸地、肖寒等區、市和各廳、局、部委辦領導幹部近百人。（區檔案局“文革”大事33卷）

同日 韋國清在區黨委大院內貼出第二張“造反”大字報。《揭發劉少奇、鄧小平的幾個問題》，說劉少奇、鄧小平是“潛藏在黨內的危險人物，是兩顆定時炸彈，過去背著毛主席和黨中央幹了很多壞事”等等（全文見附件）（據“廣西工交幹校革命造反兵團翻印的區黨委辦公廳“天翻地覆”戰鬥兵團整理的材料）

卅日 區水電設計院“火種兵團”和文化局“捍衛隊”遊鬥水電廳、文化局領導幹部蔡勇為、張樹本、何子健、朱守剛等。（區文聯、區水電設計院“文革”大事記）

同日 《新聞報道》發表社論：《革命派就是能掌好權》。（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卅一日 廣西軍區舉行駐邕機關、部隊“接受軍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誓師大會”。（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下旬，各“造反派”奪權後，各級領導均靠邊站，今天這個“造反派”來拉當權派鬥爭遊街，明天又一個“造反派”拉當權派鬥爭遊街，有時他們又聯合起來鬥爭當權派遊街。一個比一個更“左”以示其革命，而他們各派內部又互相勾心鬥角又聯合又鬥爭。在他們比賽“革命”一個比一個更左的混亂情況下，有的地方出現被迫致死人的現象，在城市、在農村、在機關幹部、工廠工人、農村生產隊幹部中都出現有死人的現象。

奪權後，生產領導機構癱瘓，工農業生產基本停頓。桂林市六十五個工廠，有四十二個完不成計劃。桂林電表廠、電機廠只完成計劃的30~40%。桂林郊區農業生產和很多縣的水利工程陷入停頓；有的縣缺乏種子無法調撥；耕牛護理不好死亡；缺糧地區的群眾生活無人安排；龍勝縣平等區農民因缺糧發生浮腫；臨桂縣會稽區三人因無糧吃買酒糟充饑病死（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二月

一日 《新聞報道》等三版轉載《紅衛戰報》十九期答讀者問的文章。文章為近日來的武鬥、遊街現象叫好，說：“這個街游得好！游得對！我們堅決支持”。（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韋國清貼出第三張大字報——《揭發兩面派陶鑄》。說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代表人物，頑固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黨內外耍兩面派，搞陰謀詭計，是個危險人物。（全文見附件），（據“廣西工交幹校革命造反兵團”翻印的區黨委辦公廳“天翻地覆”戰鬥兵團整理的材料）

二日 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王荔到達南寧。當晚，受韋國清接見。

王荔來邕後，以中央文革記者身份，直接插手地方的活動，特別是參與搞亂廣西區黨委，製造兩派對立情緒，支持武鬥，支持衝擊京西賓館，對搞亂廣西起了很壞的作用。（王荔專案材料）

三日 駐柳州的各部隊舉行誓師大會。會上，軍分區政委郭鵬宣讀《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持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彭清華講話，表示部隊“堅決執行偉大統帥毛主席的命令，堅決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奪權鬥爭”，會後，部隊進行了遊行。（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原“赤衛隊”和“盾牌”紅衛兵組成“廣西無產階級紅色造反者聯合司令部”，自稱三萬人，在朝陽廣場召開成立大會，併發表聯合宣言。（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四日 王荔到首都“三司”駐邕“聯絡站”和區黨委宣傳部“倒海翻江”等組織瞭解奪權情況後，對“首都三司”負責人李翠英和“倒海翻江”頭頭劉德勝、秦朝泰等說，廣西一月奪權沒有成功，關鍵是沒有結合領導幹部，還需組織第二次奪權。王要劉等組織一些人做領導幹部的工作。於是，劉德勝、秦朝泰、李璧、農烈、陳經智、游建安等人成立了一個串連領導幹部和整章、喬材料的“尖刀班”。十四日後又擴大為“尖刀隊”，增添了桂林“老多”張欣然和黃幹才、劉義光、黃濟豐、餘濟凡、韋玉卿、王傑華、曾紀均等人。（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 “首都三司”等十多個外地群眾組織駐邕聯絡站座談南寧形勢。晚上，“首都三司”駐邕聯絡站散發《南寧文化大革命到了關鍵時刻》的傳單，指出：“‘工總’必須開門整風”；“造反大軍”不理解奪權的意義，奪權不爭權，讓當權派統統靠邊站”；“不相信‘赤衛隊’、‘盾牌’紅衛兵的絕大多數是要革命的”，“不堅持文鬥，搞武鬥”；“總部頭頭高高在上，高度運動群眾”等等。引起南寧市內強烈輿論。（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五日 韋國清在自治區黨委院內，貼出第四張大字報《揭發王任重的幾個問題》（全文見附件）（據廣西工交幹校革命造反兵團翻印的區黨委辦公廳“天翻地覆”戰鬥兵團整理的材料）

同日 桂林市“革命造反大軍臨時服務委員會”成立。六九五五部隊政委張驥、桂林軍分區政委張耀青和“造反派”周兆祥、楊福庭、黃東紅、劉天儀、申儒成、鄧瑞華等十三人為常委。（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同日 下午，桂林召開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六九五五部隊和駐桂部隊一千多人參加。會後併舉行武裝示威遊行，表示支持“桂林老多”和“造反大軍”。（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記）

六日“廣西工總”決定：①開門整風；②撤出區、市機關的進駐小組；③要求軍隊接管區人委、公安廳（局）、廣西日報社、廣播站；④要求安平生出來抓革命，促生產。（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劉德勝等人向王磊彙報成立“尖刀班”和揭批章、喬的情況後，王磊說：在自治區黨委書記中，揭批賀希明的大字報比較少，應當鼓勵買出來造反。段遠鍾、謝王尚、霍泛也不錯，可以做他們的工作。為此，王磊同秦朝泰於九日親自去找賀談話，鼓勵他出來“造反”，但賀起初表示自己已有歷史問題，有顧慮。十日晚，劉德勝、李璧、秦朝泰等人串連了伍晉南之後，又串連賀希明等幾個領導幹部。賀表示：喬曉光“三反”言行多，可以打倒，對韋國清是否打倒拿不准。秦朝泰說，光是頑固推行反動路線這一條，就可以打倒。並給了賀希明一些關於揭發章、喬的大字報和傳單。（王磊專案檔案）

是日南寧市內出現大字報和傳單，揭發“廣西工總”和“造反大軍”的問題，並出現“砸爛工總”、“造反大軍必須大亂”等內容的大幅標語。（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北京科技大學學生黃資陽到廣西軍區貼大字報，聲言要揪出所謂廣西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歐致富。（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上旬，區農政、農辦、貧協聯合兵團出動二十輛汽車，拉農口的廳、局幹部謝東來、徐麟村、馮壽天、陳任生、朱渭川、吳啟增、陽雄飛、王斌吾等在南寧市遊鬥。（農業廳“文革”大事記）

十日區文聯辦公室主任攝影學會主席陳惠被迫害身亡。

十一日根據廣州軍區的指示，廣西軍區民兵辦公室改為支持革命左派辦公室。

同日“造反大軍”幾個負責人走訪廣西軍區首長，宣布“造反大軍”進駐區直機關所屬單位的代表全部撤出。（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無聯”在南寧朝陽廣場開大會批判區、市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勒令韋國清、喬曉光、肖寒、韋純東到會。韋、喬於十一日半夜出走，大會對肖寒、韋純東批判一通結束。（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桂林市公安局拘捕了中共桂林市委書記黃雲。強加給他的罪名是：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環湖會議室召開的機電系統書記、技術員會議上，所謂公開辱罵毛主席。同月十七日釋放。（一九八二年六月，桂林市委對黃雲同志被拘留問題進行了復查，認為拘留是完全錯誤的，應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據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自治區黨委群眾接待站“革命造反兵團”發起，“天翻地覆”、“倒海翻江”、區公安廳“紅衛”、廣西“紅總”、廣西“八三一”等十多個組織參加，從二月十三日起，先後八次聯合召開批鬥韋國清、喬曉光大會，參加人數達五、六萬人次，區直機關廳、局以上領導幹部全部參加。在會上揭發章、喬的廳、局幹部有五十六人，主持會議的主要是廖煒雄。“廣西紅總”李耀增也主持一兩次。（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廖煒雄專案材料）

十四日上午，廣西軍區副政委韓世福根據“支左”領導小組十三日會議精神，向機關處以上幹部和全體“支左”人員，進一步分析南寧文化大革命形勢，認為“造反大軍”奪權後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下午，在醫學院召集“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醫學院造反兵團”、“首都三司”駐邕聯絡站頭頭開會，表示承認這四個群眾組織是“革命左派”，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五日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派“支左”辦公室董坤去區黨委群眾接待站散發他一月二十八日

“給國清、區黨委常委並報廣州軍區黨委”的信和揭發章、喬、伍問題的材料。

歐致富在信中表示“軍區部隊必須支持和援助‘廣西革命造反大軍’，儘管他們遇到種種困難，甚至有多次反覆，也毫不動搖地支持援助他們”。還說“區黨委主要負責人表示同意把權交給‘革命造反大軍’，但下面不願意交權，下面的權看來是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信件散發後，“工總”等組織大肆宣傳，說軍區歐司令支持他們；“無聯”等組織則強烈不滿，說軍區和“造反大軍”同流合污，是想幫助“造反大軍”鎮壓其它“革命組織”。（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韓世福在“支左”辦公室各組組長和部分幹部會上，分析南寧“文化大革命”形勢說，南寧目前正處於奪權、退權、反奪權的醞釀準備時期，各群眾組織正在大分化、大改組；“左派”和中間勢力正在經受大考驗，“右派”正在大暴露。“造反大軍”首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進行奪權鬥爭，大方向是正確的，軍區作了原則上的支持，也是對的，但奪權準備不足，奪權後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六日上午，“無聯”兩萬多人在朝陽廣場開大會，批判區黨委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韋國清、喬曉光被拉到會。而“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廣西八八紅衛兵”等組織認為，“無聯”是“保守派”，他們開會是假批判，真保皇，為了撈“稻草”。他們組織二百多人，衝擊會場。章、喬被“無聯”挾持並轉移他處，至十七日六時放回。（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王磊再次和秦朝泰找賀希明，反覆勸說和鼓勵他站出來“造反”，說騎牆是不行的，中間道路是沒有的。還說，區黨委接待站召開的揭批章、喬大會開得好，揭開了區黨委內部階級鬥爭的蓋子。讚賞賀希明在會上揭發章、喬，造區黨委的反的“革命行動”，王磊幾次對賀的鼓勵和支持，使賀下決心發表聲明。（王磊專案材料）

十七日柳州軍分區發表“堅決支持柳州地專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戰鬥兵團‘一二五’奪權”的《聲明》。聲明號召批深批透、鬥倒鬥臭地專一小撮走資派。到同年四月止共揭發公布了六十七個當權派材料，揪出了王祀桓、張聲震、朱渭川、金寬生等“走資派”批斗大會共開十次，戰線批鬥會共開三十八次，戰鬥隊批鬥會共開一百七十八次。（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中央民族學院章崇武、馬振民等人在柳州專區電影公司召集柳州專區文工團“二六”戰團況既的等人開會，針對柳州軍分區十七日的表態，研究對策，決定組織力量反擊軍分區，炮轟分區政委郭驥，向郭驥發公開信，刷大標語：“捨得一身，敢把郭驥拉下馬”，“打倒地地道道的兩面派郭驥！”（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九日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自治區人委副主席賀希明、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人委副主席李殿丹，自治區黨委常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段遠鍾，自治區黨委委員、自治區人委副秘書長閻光彩，自治區黨委委員、財貿政治部主任段純和，自治區黨委候補委員、宣傳部副部長謝王尚，自治區黨委候補委員，公安廳廳長管世新，自治區黨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劉泮江，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洪寧，自治區黨委辦公廳副主任孫立海、黃季權，自治區宣傳副秘書長高信等十二名領導幹部，發表《革命造反聲明》（後稱《二一九聲明》），提出“砸爛區黨委！打倒韋國清！打倒喬曉光！”此聲明原稿經王磊和“尖刀隊”審閱同意，王磊還提了修改意見。（《聲明》全文見附件）“二一九”聲明發表後，伍晉南、霍泛發表聲明支持“二一九”聲明。“二一九”聲明公布後，逐漸結束了廣西“文革”全面開展後半年來各派組織群起造反，各據一方，爭奪共產黨的黨、政、財、文大權的局面，演變為以人劃線的全區分為兩大派造反組織。兩大派造反組織都企圖爭奪派天下的領導權，建立一派的政權而展開激烈鬥爭。解放軍在“支左”中也公開亮相支持一派的造反組織，形成了兩派群眾造反組織在奪取共產黨的黨政財文大權中尖銳矛盾和鬥爭，以至武鬥殺人搞亂廣西局勢。（王磊專案材料、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六九五五部隊派出團長張體成為首的十九名幹部到原廣西師範學院搞軍訓。軍訓期間，六九五五部隊副部長郝忠雲、政委張驥先後到該校做形勢報告，軍訓於四月十二日結束。張體成等留校支左。（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同日 經區黨委批准給河池地委副書記張延年以停職反省和撤銷“文革”領導小組長職務的處分。（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 區公安工作臨時委員會成立，主任郝良才，副主任胡慶輝（廣西軍管、軍區於六八年六月公布的“反圍”公布一文由胡組織人員書寫的）。（區公安廳“文革”大事記）

同日 王荔要劉德勝等人整理關於中共廣西區黨委書記處成員的材料，（包括他們的情況，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和“造反派”對他們的意見，支持哪些人，打倒什麼人等）。劉德勝根據王荔的意見，整了一份材料給他，繼續提出打倒韋國清。（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 《新聞報道》第三版發表該報評論員文章：《堅決支持革命的領導幹部起來造反》。（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廿一日 “倒海翻江”在區黨委宣傳部二樓小會議室，召集發表“二一九”聲明的賀希明等十二名領導幹部開會。主持人秦朝泰。研究成立區抓革命促生產領導班子問題。強調各單位要由“造反派”掌權，以“造反派為主”，吸收領導幹部參加抓革命，促生產。推選賀希明為區“抓促”負責人。（王荔專案材料）

廿二日 《廣西日報》社“紅色革命造反兵團”的傳餘記和《光明日報》駐廣西記者桂挺宮找“廣西紅總”頭頭曾春生和“倒海翻江”某頭頭聯繫，拉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書記喬曉光到報社批鬥。會上，要區黨委候補書記霍泛、宣傳部副部長謝王尚和《廣西日報》副總編輯孫鴻泉等揭發韋、喬的問題。批鬥會由紅色革命造反兵團薛克誠主持。會後，該組織散發了《徹底清算韋國清、喬曉光利用黨報復闢資本主義，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滔天罪行——《廣西日報》社紅色革命造反兵團組織鬥爭韋國清、喬曉光紀實》。（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 《新聞報道》第三版發表桂林“萬里紅革命造反縱隊”的《南寧大亂的時候到了》和“醫學院造反兵團”“紅方紅的《革命大亂好得很》，極力鼓吹極左思潮。

同日 凌晨四十五分，廣西“無聯”出動五十多部汽車，數千人突然襲擊廣西“工總”總部及其所屬幾個分部，打傷廣西“工總”總指揮陳朝春，抓走熊一軍等九人，有的不是廣西“工總”成員也被誤抓。並拉五汽車人埋伏於南寧市看守所周圍防範“工總”襲擊市看守所。天亮以後，熊一軍被“造反大軍”搶回，對被誤抓的群眾賠禮道歉後釋放。

同日 廣西“工總”在朝陽廣場開大會，控訴“無聯”抄家、打人、非法抓人，熊一軍主持會場。“廣西紅衛兵總部”、“南寧八三一部隊”、“醫學院造反兵團”、“首都三司”駐邕聯絡站參加了大會。軍區對這個會既不表示支持也不反對。會後，廣西“工總”給軍區支左辦公室電話，感謝軍區不反對他們召開的控訴大會。（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四日 廣西軍區歐致富、韓世福、政治部主任孫磊、空七軍副政委焦紅光、政治部副主任張虎忱等接見“首都三司”代表，就當前南寧“文化大革命”形勢交換意見。“三司”代表認為，“廣西工總”是個大包袱，一定要把它踢開，南寧“文化大革命”才有出路。（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三日至廿五日 廣西軍區“支左”辦公室派駐各工廠、學校、機關的聯絡員進行整訓。整訓期間，學習了中央有關文件和各兄弟部隊“支左”的經驗，聽取了軍區首長對當前南寧“文化大革命”形勢的啟發報告，進行討論並一致認為：應該支持廣西“工總”內部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砸爛廣西“工總”，消除壞人。（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六日 桂林地委在《關於如何處理“四清”地區在整頓小學教師隊伍中問題的請示報告》中記述：我地區第一批“四清”的臨桂、靈川、興安三縣在整頓小學教師隊伍時，開除了一百四十三人，安排退職二百一十五人，辭退民辦教師九十三人。（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廿七日 遵照周總理關於“當前春耕生產，由各大軍區，省軍區負責領導”的指示，廣西軍區召開“抓革命，促生產”三級幹部會議，並成立抓革命，生產指揮部。會期三天，參加會議的有各軍分區、市、縣武裝部領導同志、群眾組織代表以及各級領導幹部等四百多人。軍區副政委何紀雲作了“抓革命，促生產，掀起春耕生產高潮”的報告。賀希明參加了會議。（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 廣西師範學校學生潘國球、秦鍾林等人來南寧，與西大學生秦朝泰、區黨委宣傳幹部劉德勝等人聯合發起，組成“韋國清、喬曉光罪行調查團”，向全國各地散發了《調查韋、喬罪行呼嘯書》四月中旬，潘國球將收集整理的韋國清“罪行”材料，帶回廣西師範學院文政系教師楊為橋、丘國仁帶去北京，交中央文革小組王荔（廣西師範“文革”大事記）

本月初，一些領導幹部被當作資產階級典型，將他們的生活用品和住處進行展覽。自治區副主席盧紹武、交通廳副廳長、民主人士呂集義，南寧地委書記甘懷勳、桂林地委書記王祝光、副書記任李新、李雲亭、柳州市市長孫芸生等住處，均被展覽。（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1卷）

本月下旬，駐桂部隊召開全市部、局長以上會議，由桂林“造反大軍”服務委員會常委、141師政委張驥作市內形勢報告，肯定市委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要求幹部到群眾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到會幹部揭發了桂林市委所謂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行。市長馮邦瑞大喊：“市委常委必須大亂！徹底打倒奴隸主義”物資局長王桂說：“頭可斷，血可流，造反定了。一定要揭開市委階級鬥爭的蓋子”。（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二月以來，南寧的“廣西工總”、“八·三一”、“火種兵團”“倒海翻江”和“桂林工人紅衛兵”等群眾組織進行整風。桂林的駐軍派出部隊和一些學生紅衛兵，幫助“工人紅衛兵”整風。（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1、33卷）

廣西軍區和廣西駐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後，向十一個廳、局三個部委和十九個重點企業，派出支左人員一百九十八人。（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二月底，廣西軍區“支左”辦公室派出馬文明、楊仲緒、江文華等到《廣西日報》社調查群眾組織情況，為對《廣西日報》實行《廣西日報》實行軍事管製作準備。（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三月間 自治區黨委統戰部長李隆、副部長莫矜、梁華新、區政協副主席陸秀軒、黃惠良分別在統戰部、政協大院被批判、李隆被批鬥時，出現腦神經跡象。在紅星電影院召開的統戰戰線批鬥會上，區黨委常委、區人委副主席李殷丹宣布區黨委決定撤銷莫矜黨內外一切職務。（據統戰部“文革”大事記）

三月

一日 晚上，在廣西軍區支持下，“廣西工總”所屬外貿、北郊、西鄉塘分部和“首都三司聯絡站”、“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等學生組織約六萬餘人，在朝陽廣場集會，控訴“廣西工總”罪行。指責“廣西工總”自一月奪權以來，執行了沒有工作隊的“劉鄧路線”，重新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因而宣布“造反”。封閉“廣西工總”總部，並將“廣西工總”主要負責人熊一軍扭送

公安機關拘留。(關於同年八月獲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 徐其海召集“廣西工總”各分部負責人開會。會上分析了形勢，闡明了軍區觀點，建議組織聯絡站，為成立新“工總”做籌備工作。(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造反大軍”退出廣西日報社。《新聞報道》改名《紅色新聞》，由廣西日報社職工主辦。

同日 “廣西汽車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汽司”)宣布退出“無聯”。(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老多”、“八八戰鬥兵團”、華東工學院駐邕聯絡站。上海同濟大學“東方紅”、“廣西一司”等散發傳單，不同意砸爛“廣西工總”。(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六日 區直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工人革命造反聯絡站”“廣西建築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建司”)、“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醫學院“造反兵團”等二十一個組織，聯合成立“聯絡總站”。(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六日 中共廣西軍區委員會發出《關於成立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的通知》決定在軍區黨委領導下，成立廣西軍區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主任：歐致富(廣西軍區司令員)，副主任：陳開路(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徐其海(廣西軍區副司令員)、何紀雲(廣西軍區副政委)、範迪波(空七軍副軍長)、魏德安(二〇分部副部長)、賀希明(區黨委書記處書記)、李殿丹(區工委副主席)。還有委員：張海波(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等十三人(包括軍區各部門、自治區有關戰線領導幹部和造反派代表等十三人)

通知發出後，各地、市縣也相繼成立了以解放軍為主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

七日 毛主席發出復課鬧革命的指示。

八日 賀希明等十二名領導幹部在劉泮江家開會。賀希明主持。提出要壯大力量，建立領導幹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各人回各戰線負責組織擴大串連。有人提出，請示軍區一下為好，後決定段純和向軍區稟報請示。(王荔專案材料)

九日 以柳州地區文工團“二六”戰區況既白、甘樹仁為首組織地辦工農隊、桂林歌舞團“五敢”、“衛東彪”等部分紅衛兵，把地委王紀桓等三位正副書記和趙增然等五位位部長，抓到地區文工團分別進行審訊、鬥爭。(據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柳州市、柳州地區、柳鐵以及駐柳部隊共六萬多人，在人民廣場集會，舉行“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會上柳州軍分區司令員王憲致開辭詞，政委郭聯講話，市武裝部政委宣讀《中共中央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農和各級幹部的信》。會後遊行。(據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十日 段純和、劉泮江、孫立海等到廣西軍區找副政委王希永和政治部主任孫磊，請示成立領導幹部造反聯絡站問題。答復是：①領導幹部應到群眾中去，與本單位的群眾一起鬧革命，有錯誤就猛檢討；②你們應把幾個書記好好瞭解一下，排排隊，按照“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的六條標準，看看哪個算“走資派”，哪個不算。

此後，段純和、劉泮江、聞光彩感到十二人活動有問題，不再參加十二人活動。(王荔專案材料)

本月 桂林地委常委、組織部長張牧田、副部長全順在地委龍珠路大院，貼出所謂《地委修正主義幹部路線》的大字報，點了李裕平、孫榮徽、李雲亭、蔣毅等十多名縣以上領導幹部的名，並加之“叛徒”、“國民黨員”、“階級異己分子”、“三反分子”、“欺偽人員”等罪名，使這些同

志在“文革”中深受迫害。(據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本月上旬 劉德勝將認陪韋國清“搞地方民族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的項峰”等問題的材料交給王荔轉報中央。(王荔專案材料)

十一、十二日 “廣西一司”、“南寧八·三一”、西大“狂瀾”頭頭和“八·八”戰鬥兵團、區體委“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上海同濟大學“東方紅”等組織代表，分別走訪廣西軍區或空七軍，表示不同意砸爛工總。(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廣西軍區派出軍管小組，對柳州鐵路局實行軍管。(柳鐵“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區黨委“接待站造反兵團”、“紅色監察”和“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等十一個組織發起，一百多個群眾組織近四萬餘人，在區體育場召開批判韋國清、喬曉光大會。廖煒雄主持。賀希明、霍泛等在會上發言，揭發韋、喬的“問題”。(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 周總理打電話給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指示：廣西地處援越抗美前線，要實行全面軍管，你站出來當軍管主任，黃永勝搞廣東，你搞廣西。韋國清講：“現在搞得不像個樣子，‘站不出’來了。”總理說：“我們做工作。”還指示軍區給韋國清拿一套軍裝穿，並要空七軍派專機把韋國清送到廣州。(王荔專案材料)

十四日 廣西保衛無階級文化大革命臨時委員會封閉“工總”辦公處。使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韋國清乘飛機由南寧赴廣州軍區。十七日，韋國清按周總理指示，從廣州乘飛機去北京。

十五日 南寧市一中師生一千七百餘人舉行軍政訓練大會，廣西軍區司令部鍾生棟副參謀長到會作了動員報告。廣西軍區還派出“三支兩軍”人員到廣西醫學院、南寧四中等院校，對紅衛兵進行軍事訓練。

同日 南下串聯首部“三司”駐邕聯絡站共三十六人全部離開南寧返北京。(南寧市“文革”大事記、區黨委“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廣西工總”所屬二十三個分部的一百多名頭頭在南寧市文化宮開會，準備成立“新工總”，並散發“工總砸不爛，越砸越堅強”的傳單。會議決定：①不撤銷聯絡站②籌備成立“新工總”；③準備材料上京告狀。(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廣西工總”所屬二十三個分部的一百多名頭頭在南寧市文化宮開會，準備成立“新工總”，並散發“工總砸不爛，越砸越堅強”的傳單。會議決定：①不撤銷聯絡站；②籌備成立“新工總”；③準備材料上京告狀。(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廣西軍區和駐邕部隊六十多名幹部組成軍訓團，到南寧市一中搞軍訓。孔竹任團長，李玉昌任政委。該校一派組織“指點江山”認為目前不是時機，不願參加軍訓，因而離校活動。(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寧市“文革”大事件材料)

同日 廣西“工總”各分部頭頭繼續開會，選舉了核心領導小組。

十八日 按中央指示，廣州軍區副政委陳發洪率領工作組到廣西軍區籌備成立廣西軍管會，並做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九日 桂林市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紅衛兵》編輯部就南寧“文化大革命”局勢發表嚴正聲明，提出“打倒韋國清，解放全廣西”的口號。(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 廣西軍區支左辦公室設機關、學校、工廠、各地軍分區負責接待五個小組。王希永、孫

羈負責機關，韓世福負責學校，徐其海分管工廠，副司令員吳華分管分區。二十三日又增設秘書組。（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上旬，在梧州市“大鑿委”召開的市委、市人委當權派互相揭發大會，會上，曾提到還寄萍已下結論的歷史問題。後又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市委書記梁成業揭發還寄萍，又將其歷史問題拋出，會後，街上貼出“打倒叛徒還寄萍”的大標語和大字報。二十日凌晨，梧州市委副書記還寄萍含冤死亡（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本月中旬，秦朝泰、劉德勝等人向王荔冀報說：“軍區支左辦公室支‘保’不支‘左’，我們要打倒韋、喬，他們要保等等”。還說，現在揭發了不少的材料，如“三反”言行，獨立師等問題。韋、喬是要打倒的，但伍晉南要站出來，賀希明、謝王尚也可以站出來。王荔說：“最近我要回京冀報，你們認為是對的就做，對軍區、對當權派的情況，你們怎麼看就怎麼寫，寫好給我”。隨後由游建安執筆把“韋國清是‘走資派’、‘三反’分子，要打倒”的材料，於當天下午交給王荔。

二十日 劉德勝又整理一份廣西軍區支“保”不支“左”，“造反派”受壓的材料給王荔。（王荔專案材料）

二十一日 廣西軍區召開區直機關代表座談會，座談區黨委領導幹部誰能站出來的問題。參加座談會的有區直機關“天翻地覆”和區雜技團“愚公移山”、話劇團“一反到底”等組織的代表17人。廣州軍區副政委陳發洪傳達了中央對韋國清的看法，說韋支援越南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來。代表們一致認為：韋國清不夠“三反”分子，可以站出來亮相。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主持會議，政委李仕才、魏佑緒也參加座談。會後“愚公移山”、“一反到底”等組織連夜討論，於二十二日凌晨貼出了第一張“堅決支持韋國清同志勇敢的站出來和革命群眾一道鬧革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的大幅標語。接著，不久群眾組織也陸續貼出同類內容的大幅標語。（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三日 經廣州軍區批准，廣西軍區宣告派出五十名幹部，對區公安廳、銀行、郵電局、廣西日報社、外事辦公室交際處）、廣播電台和市公安局等九個單位實行軍事管制。（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廣西日報》軍管後，任命石勇為軍管小組組長，馬文明、楊仲緒、王笠夫為副組長。當天石勇在職工大會上講話，提到廣西的一月奪權是“右派勢力奪權”。當天的《廣西日報》以“廣西日報社全體革命職工革命幹部”名義發表告讀者的表態文章，說“《廣西日報》在相當長時間內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了領導權，使報紙變成了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陣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為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御用工具。”又說“今年以來報社雖然經過兩次奪取，報紙三次易名，但是，報社革命的‘三結合’尚未形成，領導癱瘓，使報社無力但負責報應負的戰鬥任務。”還表示要使“新生的《廣西日報》真正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喉舌，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

廣西軍區支左辦公室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後，錯誤地把群眾組織分為左、中、右。當天的《廣西日報》還發表幾個被軍區支左辦和軍管小組內定為“左派”的群眾組織，如鄧文光為頭頭的“廣西建築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廖煒雄為頭頭的“廣西區黨委群眾接待站革命造反團”，顏景堂為頭頭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南寧八一三一部隊”的文章。（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當天繼續發表廣西軍區支左辦公室內定的所謂左派組織歡呼報紙新生的文章。如：廣西“聯指”派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總部”，“柳州地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司令部”等。

在此前後，軍管小組在報社放林彪的一次錄音講話，職工第一次聽到“拿槍的劉鄧路線比不拿

槍的劉鄧路線‘更危險’”這一說法。（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 陳發洪召集廣西大學、廣西醫學院、廣西農學院、廣西民族學院、廣西教育學院、南寧醫專等六個學校的紅衛兵代表，座談區黨委領導幹部誰能站出來的問題。大多數人認為伍晉南、賀希明二人可以站出來，只一人認為韋國清可以站出來。

同日“南寧市委造反團”（簡稱“市委造反團”）發表“取締反動組織‘廣西工總’，堅決鎮壓一小撮反革命頭目”的大幅傳單，對南寧各派組織震動很大。（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四日 柳州軍分區發布《關於取締反革命組織“全國鐵路革命造反兵團紅織軍柳織合同工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將廖志剛等十四人依法逮捕。這是支一派壓一派的突出表現。同年八月廿四日，柳州軍分區予以平反，釋放了被捕人員。（柳織“文革”大事記）

廿五日 王荔回京後的第二天，到釣魚台向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冀報。說：“韋國清是公安部副司令羅瑞卿的人”，廣西有個林業大隊，全是復員軍人，是韋的“御林軍”，準備和羅一起搞政變，還說“韋國清過去是跟陶鑄跑的，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走資派、造反派主張打倒和批判。但廣西軍區保韋國清，壓製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繼續執行舊區黨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等。王、關、戚表揚和鼓勵王荔說：“你們前段工作是有成績的”，“廣州軍區、廣西軍區支持‘保守派’，壓制‘造反派’，你們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站在‘革命造反派’一邊，是對的，方向是正確的，應該堅持”，“不能盲目跟著（軍區）跑”等等。最後，王荔表示：“一定遵照首長（指王、關、戚）指示，不怕壓力，堅定地站在革命左派一邊，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廣西日報》恢復出版。第一版刊登毛主席全身照片和毛主席有關辦好報紙的語錄。併發表社論《沿著毛主席的辦報路線闊步前進》。報社全體職工、幹部發表了告讀者：《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辦好新生的廣西日報而奮鬥》。（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晚上，“廣西工總”、“廣西一司”、“廣西八一三一”等八個群眾組織約四百餘人，在南寧市桂劇院門前聯合召開《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革命復辟逆流誓師大會》。會後遊行高呼：“打倒韋國清”、“反對砸爛工總！”“堅決砸爛‘保皇’‘無聯’、‘老赤’（即赤衛隊）‘破盾’”口號。

廿六日 陳發洪、魏佑緒召集區黨委組織部“東方紅”、統戰部“革命鋒火”、辦公廳“四海翻騰”、糧食廳“五州震蕩”、外貿局“反修”、物價局“紅色”、財貿辦公室“捍衛毛澤東思想”、供銷社“延安”、農機局“紅色”等十二個組織的十三名代表座談。大家一致認為：韋國清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犯有錯誤，但按照毛主席的幹部政策衡量，不屬“三反”問題。從他的全部歷史和一貫表現看，他是跟毛主席的，其本質是好的，是個好同志。他站出來是革命的需要，戰備的需要。

一些學生組織說砸爛“工總”，壓制“造反派”，扶植“保守勢力”，出現“反革命復辟逆流”等，都是來自軍區。（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九日《廣西日報》發表廣西軍區三月廿三日《關於堅決執行和勇敢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告全體民兵書》。（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廣西軍區黨委召開常委會議，由第三書記李仕才主持，會議分析了當前廣西“文化大革命”形勢，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廣州軍區副政委陳發洪參加了會議並作了重要發言。（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陳發洪召集“南寧市委造反兵團”六名機關幹部座談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勢，會上一致表示支持韋國清站出來。認為“廣西工總”對當前南寧市“文化大革命”阻礙很大，應採取相應措

施。

當晚，“廣西工總”下屬六個分部和西大“狂瀾”、“廣西八·三一”、“廣西一司”、“南寧八·三一”、桂林“老多”等組織五千餘人，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所謂“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會後遊行，口號是：“打倒劉、鄧、陶！”“打倒韋國清！打倒喬曉光！”“堅決反對砸爛‘工總’！”

會間，廣西軍區宣傳車曾在廣場宣傳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一些學生組織對此提出意見，說是干擾了他們的會場。（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十日《廣西日報》第一版發表了廣西大學數理系實現大聯合的報道和評論員文章《團結大多數，實現大聯合》，引起強烈反響，很多群眾和群眾組織貼大字報，說這篇文章“抹殺路線鬥爭”，“提倡大湊合”。（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同日凌晨二時，區直機關“紅色監察”、區黨校“遵義兵團”等組織三千餘人舉行示威遊行。口號是：“堅決砸爛反革命組織‘工總’！”“給反革命組織‘工總’翻案沒有好下場！”“歡迎韋國清站出來和革命群眾一起鬧革命！”

同日晚上，“汽司”、“鐵司”、“建司”工人組織在朝陽廣場集會。內容是：歡迎韋國清同志站出來，堅決砸爛“工總”，會後遊行。（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發表《我對韋國清同志站出來的態度》，全文如下：“韋國清同志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頑固地執行了劉、鄧路線，其錯誤是極為嚴重的，他在廣西工作近十年來也犯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前段時間，革命群眾對他的錯誤特別是對他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給予揭發、批判和鬥爭，是完全必要的。”“經過革命群眾幫助，韋國清同志曾經表示要堅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根據毛主席指示，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攔不阻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同時，從韋國清同志的整個鬥爭歷史來看，他參加革命三十多年來基本上是跟著毛主席走的。他的錯誤，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按照毛主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政策，我希望韋國清同志站出來認真地檢查和改正自己的錯誤，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與廣大革命群眾一起，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自治區“文革”大事件材料）

卅一日下旬以來，一批群眾組織和一些中上層領導幹部，紛紛表態支持韋國清站出來，至本日止，共有區直“天翻地覆”、“尖刀”、“五湖四海”、“紅海濤”，“東方紅”等一百五十個群眾組織和五十一名中上層領導幹部，支持韋國清站出來。其中有候補書記霍泛、區黨委辦公廳副主任張俊桐、孫立海、黃季權、工交部主任段遠鍾、副主任劉泮江、許鴻翼、宣傳部秘書長高信、區政協副主席陳秀軒、水電廳長蔡勇為、副廳長杜竟明、外貿局副局長張純明等。

反對韋國清站出來的有區直“倒海翻江”、桂林“老多”、“廣西一司”、“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部隊”、西大“狂瀾”等四十五個群眾組織。

晚上，“廣西一司”、“廣西八·三一”、西大“狂瀾”、二中“井南山”、“東方紅”等十六個組織和“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部隊”等約四百人，舉行所謂粉碎資產主義革命復闢逆流遊行。遊行隊伍兩次到區黨委大院示威，曾與“紅色監察”、“天翻地覆”等組織的成員發生衝突。當晚，街上出現“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的大幟標語。（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月間桂林軍分區政委張耀青到廣西軍區開會期間，曾找王荔徵求他對支持“老多”組織的意見。王荔說：“桂林的形勢比南寧的好，廣西師範學院‘老多’組織是個好造反派，造反精神強，你們支持對了，要堅定不移地支持下去。甘恒彩、楊福庭、李日明、劉振林這些人都不錯，你們要好好幫助他們。”張耀青回桂林後，在思想行動上完全倒向“老多”一邊，並積極宣傳上述觀點。

（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二、三月間南寧市委副書記袁家柯、區黨委統戰部長李隆、區黨委監委幹部王俊峰等在桂林回南寧前，曾先後兩次找桂林軍分區政委張耀青，對他說：“桂林形勢很好，‘老多’是個好造反派；南寧形勢不行，象一潭死水，還沒搞起來。希望桂林駐軍派四百名‘老多’去南寧作骨幹，打開局面。南寧的革命搞好了，對全區有很大推動作用。”張耀青贊成這一建議，表示和一二一師政委張驥研究一下。不久，桂林“造反大軍”熱烈歡送大批“老多”外出串連。到南寧的“老多”約七、八百人。（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四月

一日《廣西日報》轉載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不點名地點了劉少奇，誣稱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這天起到四月二十六日，軍管《廣西日報》共集中發表批判劉少奇及其《修養》的文章一百三十五篇，其中自行組織區內文章六十六篇，除用三十九個整版批判外還另發其他批判文章，並破例發了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中國赫魯曉夫猛烈開炮》。與此同時還錯誤地組織批判周揚、陸定一、胡喬木和區教育廳吳青光、區文化局岳平。（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軍區發表《致南寧市工人、師生、幹部的一封信》，號召復課、歸口鬧革命，實現“大聯合”，建立“結合”和堅持抓革命促生產，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等。（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三日浦北縣革委會向全縣發出《關於浦北縣當前工作的意見》（草案），要求全縣繼續全面開展奪權鬥爭，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竊取的黨、政、財、文大權奪回來。四月六日，浦北縣革委會在小江菜市場召開批鬥謝金榜（縣委副書記）大會，陳光（奪權前的縣委書記、群眾組織的“革委”副主任）首先上台批鬥，誣陷謝是“走資派”，聲言要打倒謝。由此，謝被批鬥長達四年之久，批鬥二百四十多場次。在批鬥中謝被踢打、跪沙子、戴高帽、站高台示眾、掛牌遊街並勒令違人耍念牌子上寫的“罪名”，沿街下跪請罪等；他愛人也受株連，掛牌、罰跪、陪鬥蒙受冤屈。一九八三年“處遺”時才給予謝金榜及其愛人徹底平反，而批鬥者陳光卻當上了廣西農學院的黨委書記。（浦北縣“文革”大事記）

四日伍晉南去“廣西紅衛兵總部”活動。（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五日兩派群眾組織分別召開堅決打倒“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誓師大會。（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五日南寧市紅衛兵聯絡站、“工總”等一百三十四個群眾組織共三千餘人召開“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誓師大會”。大會口號是：“堅決粉碎資產主義復闢逆流！”“‘工總’是革命組織！”“打倒韋（國清）、喬（曉光）、支持伍晉南”。（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區黨委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廣西軍區副政委韓世福召集“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醫學院“造反兵團”三組織二十名頭頭座談南寧形勢及對軍區支左工作的意見。他們認為軍區屁股坐歪了，支持保皇派打擊左派，要把“工總”打成反革命，對“三結合”、“大聯合”理解片面，不要原則，搞調和，搞折衷等。（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大批判旗幟》。把鬥爭矛頭指向國家主席劉少奇，錯誤地提出要“把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倒、批深、批

臭”，“徹底肅清十七年來以他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特別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談的《修養》”（《修養》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簡稱）。

九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中國赫魯曉夫猛烈開炮》。（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支章派”各群眾組織約三萬人，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所謂“打倒黨內頭號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批判毒草《修養》大會”。

十一日廣西軍區軍管《廣西日報》後，一些“造反派”組織說：“廣西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性的錯誤”。南寧市內開始出現關於廣西軍區支左問題的大標語。“廣西紅衛兵總部”向廣西日報發出一號“勒令”要求撤換領導班子，並在報上刊載批判《廣西日報》的文章。（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廣西工總”及其同一觀點的紅衛兵、機關幹部等組織在南寧朝陽廣場開大會，宣布新工總臨時指揮部成立。（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日報》發表“南寧八三一”、桂林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批判《修養》和所謂叛徒哲學的文章。（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四日伍晉南對一些紅衛兵談到所謂南寧市資本主義反革命復闢逆流的表現時，舉例說：“如《廣西日報》三月三十日的評論員文章是有錯誤的”。（見區黨委“處遺”卷宗115卷）

同日 上午，霍泛騎自行車到西大活動。

同日 下午，“紅衛兵聯絡站”在廣西日報社門口貼了一張“勒令”（並向報社軍管小組交一份），說軍管的《廣西日報》“堅持反動立場”，“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為資產階級服務”，“成為資本主義反革命復闢的輿論工具”。並提出四條要求，要軍管的廣西日報社“請罪”，限在四十八小時內答復，否則採取“革命行動”等。軍管小組拒絕了這個“勒令”。（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處遺”材料115卷）

十六日 下午二時三十分，“新工總”所屬成員自行啟封被公安臨委會封閉的原工總辦公室及物資，掛上“新工總”旗幟開始辦公。（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紅衛兵總部”又向廣西日報社軍管小組遞交了第二號“勒令”書，要求解散“廣西日報社領導小組”，“將報社大權交給報社內部造反派”等。遭到報社內不同觀點群眾拒絕及報社內部高音喇叭對抗，雙方發生衝突，經軍管小組做工作，紅衛兵離去。（見廣西日報社、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七日 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到廣西大學五棟學生宿舍。（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南寧“紅衛兵聯絡站”等組織到廣西日報社門前遊行示威，抗議軍管《廣西日報》的所謂方向路線錯誤。（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支章派”三百多個群眾組織六萬餘人，在朝陽廣場召開所謂“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叛徒哲學及揪出叛徒集團分子傅雨田大會”。傅雨田被“勒令”到會。（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後來形成“聯指”的一派，拉隊進入報社，表示要和軍管小組、“五八——二”派團結、戰鬥在一起。軍管小組成員對他們的聲援表示歡迎和感謝。（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九日 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在廣西大學聯合發表《我們的聲明》（後稱《四一九聲

明》）。全文如下：

三月下旬以來，不少機關幹部，根據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待犯錯誤幹部的政策，貼出了大字報，希望韋國清同志站出來，徹底檢查錯誤，改正錯誤，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限，真正回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對此，我們也表示了同樣的態度。現在時間已經過了將近一個月了，韋國清不僅沒有悔改表現，而且避不見面，至今杳無音訊。最近在南寧由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炮製的一股資本主義復闖的反革命逆流。如圍攻革命小將，以各種方式取消、壓製革命組織，扶植保皇勢力等，使我區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險，必須引起我們十分警惕。出現這樣的局面，不管怎樣，韋國清應負主要責任。根據這些情況，我們認為：在韋國清的錯誤沒有揭露批透，他本人沒有認真悔改，以及這股逆流的策劃真相沒有澄清以前，提出堅決支持韋國清出來搞“三結合”是錯誤的。我們堅決反對，我們堅決支持廣西紅衛兵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南寧“八三一”部隊、桂林“老多”、區黨委機關“倒海勸江”兵團等真正革命造反組織，堅決擊退這股資本主義復闖的反革命逆流的革命行動，並和他們在一起肩負戰鬥，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口號略）（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2卷）

二十日“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紅衛兵聯絡站”、“工總”等組織約一千五百多人在火車站廣場集會，表示堅決支持伍、賀、霍等三人的《聲明》，堅決砸爛《廣西日報》。會後遊行。遊行到廣西日報社門前，提出三點要求：①撤銷廣西日報社領導班子；②撤銷軍管小組；③砸爛廣西日報社群眾組織“五八——二”，限令三十六小時內答復，否則靜坐示威。（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支章派”四百二十七個組織約四萬人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徹底批判‘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反動路線大會”。南寧市委副書記王恩厚參加會議併發了言。（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二日晚，“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廣西八八”、“廣西工總”等數十個組織，不同意《廣西日報》報導有關廣西大學數理系革命大聯合的消息。集隊到廣西日報社同軍管小組交涉、辯論、抗議、靜坐，並成立“四·二二”指揮部。後改為“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廣西四·二二”），該校學生何作然、譚乃禮、石懷宇、曾東峰，先後充當了該指揮部的副總指揮和常委。（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同日 晚，“廣西紅總”、“南寧八八”、“廣西紅聯”、“新工總”等組織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慶祝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和支持伍晉南等領導幹部站出來鬧革命的大會。外地來邕學生組織參加大會併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支持“四一六”衝擊軍管廣西日報社，支持伍、賀、霍三人聲明等。伍、賀、霍三人參加了大會，伍晉南講了話表示“堅決與群眾鬥爭在一起……”等。會後遊行。（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寧市“文革”材料72卷）

同日 晚上，“南寧紅衛兵聯絡站”頭頭張俊秋、李朝傑等，拉隊到廣西日報社門口靜坐。並通知在朝陽廣場開會的“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等組織拉隊伍來廣西日報社門前靜坐，抗議軍管廣西日報社，並提出六點要求：交出策劃反革命逆流後台；軍管廣西日報社必須向毛主席請罪，公開檢討，承認錯誤；必須在報上刊登所謂真正革命造反派文章，不准刊登所謂“保”字號組織的文章，報社軍管小組必須改組，辦報必須依靠報社內部所謂革命造反派等等。軍管小組認為這些要求不合理，不予答復。遂於四月二十三日凌晨一時宣布靜坐示威，並宣布成立靜坐示威“南寧‘四·二二’火線指揮部”（後來發展為廣西“四·二二”指揮部）

二十三日“支章派”四百四十九個組織約四萬人在朝陽廣場集會，批判伍晉南等人的“四一九”聲明。區黨委書記安平生、組織部副部長任國璋、公安廳廳長管世新、區黨委財貿政治部主任段純和等分別代表組織部、區黨委辦公廳、政法戰線等九個單位的五十四名廳、處級幹部和參加“二一九”聲明的七名廳級幹部，揭露“四一九”聲明，說伍晉南等人搞個人野心，要奪韋國清

的權，挑動群眾鬥群眾，把矛頭指向解放軍等。（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四日 在北京，王力到中央文軍記者站對外地回京學習的記者講話。王荔為試探中央對韋國清的態度，和記者高世忠研究，寫了一張條子問王力：對韋國清應該怎樣看？王力在講話中表示：韋國清沒有什麼問題，是中央保的。

王力在講話中，攻擊各地軍區。因而王荔認為自己反對廣西軍區是對的，並散布這些流毒，挑撥廣西駐軍和廣西軍區的關係。他對五十五軍副軍長孫鳳章說，廣西軍區不支持桂林成立革籌小組，野戰軍好，軍區、軍分區不好，等等。（見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四·二二”派出彙報團赴北京。廣西大學雷激為團長，張振劍、秦尚群為副團長，陳鎮西、馬秀英、楊福庭、陳壽宣為委員。雷激、張振劍回廣西後，於六月十日改組。改組後的彙報團成員如下：團長：曹東峰；副團長：朱仁、陳鎮西、秦尚群；各縣代表：陳壽宣、唐忠、馬秀英、李仕強、雷鳴等共十三人。彙報團長設四個勤務組：政宣組組長：朱仁；材料組組長：陳鎮西；動態組組長：曹東峰；行政組組長：秦尚群。李淑英負責聯絡。清華大學團派和北京大學天、地派，都派有駐“四·二二”的聯絡員。（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五日 伍晉南、賀希明、霍泛、謝王尚、袁家柯、黃其明、高仕克、梁寧、龍廷駒以及北京學生趙鬱民和廣西師範學院學生蘇慶科等人，開會研究堅決靜坐和逐步昇級問題。會上，高仕克提出打持久戰，引軍區跳出來一整套辦法，伍晉南表示完全同意。（見區黨委“處遺”材料115卷）

同日“廣西大學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成立。成員近二千人。正副總指揮：甘祖強、於成武、華超傑、林闊；常委：石懷宇、曹東峰、沈明軒、黃德寬、徐佳斯（以上為學生）、梁應權、劉義光、李振祥（以上為教師）。九月改組後，學生黃壽建和於成武、華超傑為正副總指揮，教師梁應權、肖仁山、黎之煥為常委。（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 下午，廣西軍區黨委決定撤銷賀希明擔任的廣西軍區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副主任職務，並向群眾公布。引起“四·二二”群眾組織的極大不滿。

晚上，廣西大學、廣西醫學院和勞動大學學生千餘人集隊到廣西軍區大院門前示威、靜坐，抗議廣西軍區撤銷賀希明生產指揮部副主任的職務。（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二十七日 上午，廣西大學黨委副書記高仕克召開“四·二二”骨幹會議，布置“目前火線工作”。伍晉南親作指示：①鬥爭有困難，但必定完全勝利，這是一場決戰。②採取持久戰。鬥久了，他們就跳出來，我們就抓住。目前衝擊還不到時機，如果時機成熟了，就速戰速決。③要宣傳靜坐的意義，調動社會力量，這是總的戰略中的一個布置。（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處遺”材料115卷）

同時 靜坐在報社大門外的“四一二”群眾，靜坐幾天後，沖進報社院子，強佔辦公大樓並在院子內召開聲援“五洲震蕩”、“好八連”的大會。何家松在會上講話。當天報社內到處是辯論的人群。（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廣西日報》軍管小組發表第一號“嚴正聲明”指出：“衝擊軍管廣西日報事件，嚴重違反軍委八條命令，破壞了軍事管制的規定”，“違反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破壞了廣西日報的正常秩序”……“衝擊者以所謂‘兵管委員會’名義發出《通知》和《公告》，要對廣西日報實行兵管……”等都是錯誤的。進入報社群眾組織必須立即撤離報社。（見“處遺”材料115卷）

同日 晚上，“支革派”五百四十個組織九萬餘人在朝陽廣場召開“聲討印尼反華排華大會”。原“紅衛兵南寧八·三一部隊”副總指揮張峰和從“南寧八·三一部隊”分化出來的“南寧八·三一獨立兵團”頭頭顏景堂嚴然以正確者的面目在會上發言，說什麼：“‘南寧八·三一部隊’當前迷失了

大方向，在一系列問題上犯了錯誤，希望他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等等。（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九日 下午四時，南寧郊區百餘人以貧下中農名義去廣西大學揪伍晉南，要其參加三十日鬥爭喬曉光大會。廣西大學“革聯”將伍晉南搶走，並宣布“兵管單位，不許衝擊”。“汽司”、“鐵司”、“小八”等“支革派”一千多人前往聲援，於三十日凌晨四時到達，五時半離開。（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廣西“四·二二”彙報團在北京第一次向中央文革代表彙報，並送材料八十八份。其中誣告韋國清的材料二十四份，誣告軍區的材料十三份。他們從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逐月彙報了四個小時，彙報問題有：韋國清問題、軍區問題、所謂二月逆流、三月黑風、砸“工總”問題等。（見王荔專案材料）

三十日 上午，廣西軍區收到中央二十九日發出的“關於兩派代表到京彙報廣西文化大革命問題的電報”。至五月三日，兩派均選出代表組成代表團赴京。到京後，兩派代表發生小衝突。“支伍”派撕了“支革”派寫“揪伍”標語並搶去“廣西八·三一”顏景堂的袖章。（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區黨委“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下旬，某天下午，經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同意，韋國清在京西賓館找王荔談話。韋告訴王荔：總理指示，廣西地處邊疆不能亂，要實行軍管，並要他當“軍管”會主任。（見王荔專案材料）

本月下旬以來，經桂林軍分區政委張耀青和一四一師政委張驥批准，廣西師範學院文革領導小組派出四百多名“老多”成員，到各地、市、縣進行打章宣傳活動，經費由本校包幹，約十二萬元。（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1卷）

本月底，在“鬥陶營備處”的串連影響下，廣西師範學院“老多”成立了“鬥陶聯絡站”，創辦了《鬥陶戰報》，由中文系學生陳國園、生物系學生孫玉玲等人負責編輯。共出版十期，發表了《打倒南霸天陶鑄》、《陶鑄在桂林的“三反”言行》、《陶鑄與黃雲》、《鬥陶必須打章》、《章、喬、賀與劉、鄧、陶的黑線關係》等三十七篇文章誹毀、攻擊陶鑄和中央、區、市的領導。“鬥陶聯絡站”於一九六七年底解散。（見廣西師範學院“文革”大事記）

三十日、五月五日 王荔到北京西交民巷中央農業銀行接待站廣西“四·二二”彙報團住處，章英、劉德勝、梁環、張欣然、王玉道、劉少平、史妙甫、李起林、陸成勳、都惠忠、謝家棟、沈明軒、秦大寧等人向他們彙報廣西情況。

當桂林“老多”張欣然彙報說，同廣西日報軍管小組辯論，“軍管”小組不夠他們辯論時，王荔說：“廣西‘文化大革命’形勢比起其他省差半年，廣西紅衛兵沒有造反精神，文質彬彬的。人家說你們廣西是文鬥的模範，我看有點像”。“造反派搗點打砸搶算不了什麼，造反派哪有不搞打砸搶的？”還多次對他們說：“武漢鋼‘二司’敢鬥，開汽車到體育館，沖上‘三司’鬥爭王任重大會的主席台上，搶了王任重就走，體育館的門也搞壞了，汽車也開翻了，王任重摔成重傷，很有造反精神”，“這種精神值得學習”。還說：“這次會場打起來了，打傷了不少人，軍區拿他們沒辦法，很怕‘二司’，表示要把王任重交給‘二司’鬥爭”。王荔這些話後來在“四·二二”內部廣為流傳。起到了挑動武力和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極壞作用。

王荔還煽動他們揪軍區內帶槍的劉、鄧和趙永夫式的人物，要他們整軍區負責人一級的材料和調查軍內兩派鬥爭情況。章英等整了一份《廣西軍區負責人言論摘錄》給王荔，王荔趕通宵修改報中央。

劉德勝、李日明等還問王荔：“我們要堅決打倒韋國清，中央是不是要支持韋國清？此時，王

荔已明確知道中央保章的意圖，仍煽動他們打章：“中央支持章國清，也要看造反派的態度，你們是群眾組織，要打倒他是可以的，打不倒也可整他的材料……”。（見王荔專案材料）

本月下旬，廣西“四·二二”所屬“廣西紅總”、“八·八”三個紅衛兵組織成立“廣西三紅總部”（簡稱“三紅”）。廣西大學學生譚乃禧、華超傑、何作然、石懷宇、雷激和教師梁琨先後充當頭頭。

“西大革聯”所屬紅衛兵成立“廣西大學紅衛兵總部”，頭頭是學生林閻、曹東峰。（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本月份，玉林專區機關造反派主辦鉛印的《風雷激》小報。主編有賴宗全等人。此報後來成為“聯指”派的主要宣傳喉舌。該報在批判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以及伍晉南、賀希明、誣陷地委、專署領導幹部、宣傳派性等方面推波助瀾，影響惡劣。（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五月

一日至十五日 廣西軍區支左辦經調查，進一步將區直、南寧市的群眾組織劃分為所謂“左派”組織或“右派”組織，“四·二二”所屬組織多數被劃為“右派”組織。（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一日 下午三時，廣西軍區收到中央文革小組四月三十日來電，全文如下：

廣西軍區並請轉抄發給進駐廣西日報、在報社門前靜坐的“南寧八·三一”、“紅衛兵總部”及北京赴南寧各革命組織的同學們：

進駐廣西日報社的同學們，應當立即退出報社；在報社門前靜坐的同學們，應當立即撤離。

一、必須保證《廣西日報》正常出版，否則，對當前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利。

二、要維護報社軍管。革命造反派要支持解放軍對報社的軍管工作。報社軍管小組成員可以作必要的調整，組織版面小組，吸收革命組織代表參加，協助軍管小組搞好報紙。

三、有意見可向軍管會提出，商量解決，不要採取靜坐、強拉軍管小組辯論的方法。應保證軍管小組的正常工作。

四、對某篇文章有意見，可以進行批評，也可以在報上討論、批判。（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支章派”赴京代表十四人及區黨委書記高曉光、安平生乘六次特快火車赴京。（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 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及“四·二二”代表十二人乘火車去北京。“四·二二”派成員多去了一、兩百人。十七時二十分，廣州軍區轉達周總理指示，責成賀希明說服多餘人員全部返回。但未解決問題，經部隊做工作部分人下車；但到達北京時，仍比中央指定名額多去七人，改乘其它車次到京的尚有數十人。（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老多”赴崑“懲腐惡”兵團發表所謂關於四月黑風的聲明，指責“以廣西軍區徐其海一小撮走資派為首的支左辦公室成為我區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要“打倒章國清，揪出徐其海，解放全廣西！”（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廣西日報社軍管小組發表第二號聲明，說“軍管廣西日報大方向是正確的”。“四·一六”、“四·二二”、“四·二七”一系列的勒令、抗議、靜坐、進駐使報社革命秩序受到了干擾和破壞。並且調整了軍管小組成員，關於組織版面小組和批評報紙上文章，將與“無產階級革命派”及“紅衛兵小將”交換意見。（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南寧一中、廣西農學院“三七聯絡站”、“八·三一獨立兵團”、“小八”等組織發起，成立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站。聯絡站由二十五人組成，並由廣西大學、廣西藝術學院、廣西農學院、廣西教育學院、廣西中醫學院、南寧一中、南寧四中、“八·三一獨立兵團”、“小八”各派一人組成核心小組。該聯絡站包括四十三所大、中學校，約一萬五千至二萬人。（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五日 支持伍晉南、賀希明、霍泛的五十九名廳、處級幹部成立了區、市直機關革命領導幹部造反聯絡站（簡稱幹聯站），並在區文聯樓上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為“工總”平反。參加者共五十九人。領導小組由謝王崗、袁家柯、黃其明、康興、程曙天等五人組成。（見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六日 王荔和一聯絡員到北京西苑旅社伍晉南等住處，徵求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伍晉南代表二人發言，重申“二·一九”、“四·一九”聲明中反章、反軍區的觀點，並提出要求中央負責同志接見。王荔表示，意見可以反映，現中央負責同志很忙，可用書面，他負責轉達。王要了一份“四·一九”聲明印稿。

伍等在北京期間，王荔多次到他們房間。對他們講：“廣西問題一時解決不了，當前主要是軍區支左問題，你們可著重反映這方面的情況”。賀等將攻擊章國清的材料《十幾年來章國清在廣西執行了一系什麼路線》和要求中央調離章國清，另派人主持廣西工作的報告，交給王荔轉給中央。（見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支章派”組織“紅色監察”、“區接待站造反兵團”、“南寧市革命造反兵團”、“紅色公安”等二十一個組織成立“區、市直屬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聯絡站”，成員約二千一百人。並成立了一個七人組成的服務組。主要負責人是：廖煒雄、潘玉臣、梁明芝。（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 下午四時至八日凌晨三時，桂林“老多”、“廣西紅衛兵總部”、“新工總”、“卷巨瀾”等組織三千餘人，包圍、襲擊廣西教育學院，打傷一百三十五人，其中重傷十三人（住院九人）抓走五十六人，砸爛、搶走物資一部分。稱為“五·七”事件。（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廣西“四·二二”代表團在北京西苑旅社石懷宇住處，討論如何向中央彙報的問題，王荔參加了會議。確定激烈整軍區的材料：①軍區支左後，造反派整風受壓情況；②軍區首長一級材料；③軍區支“保”壓“造反派”材料；④收集軍區以小見大的問題的材料；⑤五次接見後“廣西軍區執行‘反動路線’材料”；⑥總理單獨接見“四·二二”代表團時口頭彙報整理的軍區材料。（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 廣西大學“革聯”為抵制廣西軍區在學生中搞軍訓的決定，自行組織所謂“兵管”、“兵訓”。（詳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同日 新華社轉發《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對劉少奇及其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作了錯誤的批判。

九日 五一節章國清上天安門城樓觀禮一事，使“四·二二”派大為震動，“四·二二”代表團內部思想有些混亂。劉德勝向王荔彙報了這個情況，並說：“章國清雖然上了天安門，我們還要繼續

打”。王荔要劉德勝把大家的思想動態寫一份材料。劉寫好後交給王，王荔表示將材料轉中央文革。（見王荔專案材料）

十日“廣西紅總”、“南寧小八”聯合在“四·二二”火線指揮部搞“兵訓”。有四十三所大、中學校的學生一千八百七十六人參加，編為三十六個連隊開展軍政訓練。認為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大學“支左派”“能鬧萬重關野戰軍”（簡稱西大“能鬧”）成立。軍長是學生張鋒，後為賓祖媛，政委是何武（政治輔導員），常委：學生龍飛、黃一鳴、幹部唐備連、程秉星。（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十一日“支左派”工人、學生、機關幹部主要組織的頭頭舉行會議，決定成立“南寧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常委十五人，總指揮是“汽司”呂斌，副總指揮是廣西大學“能鬧萬重關”的張鋒。（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十三日“支左派”學生和幹部一千多人在區工委禮堂召開所謂“揭發批判伍晉南大會”。李殷丹、趙茂勳、尚持、段遠鍾、羅立斌、江平秋、何忌、申本田、梁華新、黃季權等廳局幹部分別在會上發了言。（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八·八紅衛兵總部”、“南寧二日‘紅革會’”等三十四個學生組織宣布成立大、中學校紅衛兵籌委會。

同日 伍晉南、賀希明、霍泛自北京拍回《關於“工總”問題的聲明》的電報，說“工總”是一支工人階級的革命隊伍，“他們和革命小將并肩作戰，取得偉大勝利”，“大方向 始終是正確的”，“砸爛‘工總’是他們惡毒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歡呼‘新工總’的誕生”等。（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 二十時，“新工總”、“紅衛兵聯絡站”、“南寧八·三一”、“廣西紅總”等組織約七千人在朝陽廣場集會，控訴所謂劉、鄧路線和鎮壓“工總”。一些代表在發言中說：“砸爛‘工總’是黨政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幹的”，“砸‘工總’的‘罪魁禍首’是徐其海，‘劊子手’是李樹珍”，“‘工總’是響噹噹的革命造反派”等。二十一時，“南寧市直機關聯絡站”、“新工總”、南寧二中“井崗山”等近千人，到南寧市委暨援“兵管”，高喊“打倒韋純束”“揪出王恩厚！”“砸爛市委造反兵團！”“兵管好得很！”等口號，與市委“造反兵團”和前來支援人員發生摩擦後離去。（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軍政訓練好》。

十七日 章英、劉德勝在北京西苑旅社向王荔彙報廣西日報社的問題，並提出要奪《廣西日報》的權，請王荔指示。王說：“不要奪權背包袱，你讓他軍管會掌權，出了問題，當活靶子打，他們可以組織隊伍送版面小組，七、八天沖一次，也可組織人寫文章批判，這多主動”。六月二日，章英向王荔彙報“四·二二”指揮部張俊等人不接受意見奪了軍管《廣西日報》的權後，王荔說：“奪了權也好，軍區發了五·二五聲明，就更暴露了”。（見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 柳州鐵路局“工機聯”總部的陶煦、王反修、張啟文等人策劃，由“聯合戰隊”砸抄了柳州鐵路局軍管會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見柳鐵“文革”大事記）

十七、十八日“四·二二”“全無敵加強團”集中精壯人員到話劇團“支左派”“萬里長征”挑釁，文化大院“支左派”被迫撤離。（見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十九日 由謝王尚主持，在廣西藝術學院召開會議，介紹廣州等地“造反派”衝擊報社的情況，分析報紙“白紙黑字，好抓辮子”，研究了奪軍管廣西日報的權的問題。參加會議的有高信、史乃

展、吳卓凡、譚流。（見“處遺”材料115卷）

本月中旬 王荔對劉德勝說：“中央原來以為韋國清問題簡單，準備保韋國清的，看了你們的材料後，感到他有蠻多問題，不一定保了，主要看造反派的態度了”。劉德勝將王荔的意思告訴代表團後，大家認為要給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寫信，把韋國清問題的嚴重講清楚，並表示堅決打韋的態度，信寫好後由劉德勝交給王荔送上去。王荔對韋國清的這些看法，劉德勝向下對一部分人作了傳達。（見王荔專案材料）

二十日，“四·二二”群眾組織五千餘人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鬥爭肖寒大會，把肖寒扭來會場。鬥爭過程中，肖寒曾喊“打倒伍晉南”等口號。（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本月中旬，“四·二二”赴京代表團、彙報團先後在北京西苑旅社開了四次會，分別由章英、朱仁等主持，研究奪廣西日報大權問題和動員“四·二二”部分骨幹返邕，加強“南寧戰場”等問題，提出“打倒韋國清，解放全廣西”口號，迅速掀起打韋高潮，抵制中央對廣西實行軍管的部署等。

會後，章英向伍、賀、霍作了彙報。隨後，派張俊秋、高洪、梁棟芳、林開智等回南寧。對廣西日報採取行動。二十日左右，章英、玉呈道等人亦返南寧。（見區黨委“處遺”材料115卷）

二十一日“四·二二”“廣西藝總”組織約二千餘人召開“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週年，揭發韋國清在廣西文藝界犯下滔天罪行大會”。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從北京拍來賀電。說“韋國清忠實地執行了劉少奇的路線，把我區文藝路線引向歧路上去”。（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區黨委“處遺”材料76卷）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日學生組織醫學院“鬧”、西大“革聯”、一中“指點江山”、三中“血戰到底”、七中“狂瀾”等三批學生共約一千二百多人連續兩晚強行沖入廣西軍區院內貼大字報和標語，主要內容是：“打倒韋國清”、“揪出徐其海”、“與拿槍的劉、鄧路線決一死戰”、“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等。（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三日 晚飯後，王荔到北京西苑旅社二號樓對劉德勝說：“去軍管的東西賓館揪韋國清，你們現在鬧的沒事幹了，要找點事幹，不要太規矩，你們不可以去京西賓館找韋國清嗎？韋國清對南寧西苑旅社每條標語都知道，他並不閉著，不要讓他太舒服了”。又說：“武漢鋼‘二司’在四月間到京西賓館把陳再道揪出來了。當然，最好是找到賓館內部的人配合，就容易揪到了”。

晚上，劉德勝在代表團會上講了王荔的精神：“韋國清對我們每條標語都懂，還在管廣西，應當去找他，我們可以組織上訪人員到京西賓館去靜坐，要求韋國清出來接見，擴大影響，促使中央知道廣西問題嚴重，早日接見，聽取我們的彙報”。代表團採納了這一意見。曾春生還說，我們已派人去偵察韋國清的住處了。（見王荔專案材料）

二十四日 早上，袁家柯、黃其明等去“四·二二”火線指揮部召開會議，策劃對軍管廣西日報採取行動問題。下午“紅衛兵聯絡站”百餘人以送大字報為名，強行沖入廣西日報社內，到處塗寫“石勇滾蛋”等標語，並對印刷廠、電台、辦公大樓等進行偵察。（見區黨委“處遺”材料115卷、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凌晨四時，“四·二二”派學生組織“聯野”，“廣西一司”、三中“血戰到底”、“廣西八·三一”等約二百人，採取突然襲擊手段，接連抄了“小八”、“八·三一”獨立兵團、“一〇·一八紅衛兵”、“共青團紅衛兵”、“廣西一司”、“井崗山紅衛兵野戰軍”等“支左派”學生組織和民生路棉布店黨支部辦公室，搶去白紙、單車、喇叭、擴音器、衣物等公私物資和職工檔案。（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五日“四·二二”指揮部在廣西日報社門口開大會，又一次沖進報社，要求徹底改組軍管小組（因軍管小組只調換一個一般成員）。軍管小組發表第三號聲明，遣責衝擊軍管單位的行動。

當天“四·二二”指揮部組織大隊人馬強行沖上報社大樓，以要求不摺不扣貫徹執行中央文革“四·三〇”來電為由，送所謂版面小組。中午，“四·二二”派代表十一人與軍管小組談判。要求：“撤換軍管小組負責人石勇、馬文明、楊仲緒”；“版面小組吸收造反派”；“在《廣西日報》上公開批判三月三十日評論員文章，不登保字號文章”。軍管小組馬文明、江文華與“四·二二”代表談判，雙方激烈辯論。當天傍晚，“五·二五”指揮大隊人馬沖開鐵門進入報社，兩派激烈衝突，不少人受傷，第一天上午十時許，“廣西建司”等組織帶棍棒又從後門進入報社，沖上辦公大樓二樓。“四·二二”派人增援，“廣西建司”等組織撤退。這天武斗升級；更多的人受傷。（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 後，“廣西聯指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成立，廣西大學學生黃立禧充當了總指揮，“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南寧八·三一獨立隊”成立（簡稱“獨八”），顏景堂、張鋒、鄭獻盈、李如文先後充當了負責人。（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支章派”在區人委大樓成立了“五·二五”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五·二五指揮部），主要負責人：潘玉臣、廖煒雄、高炎、黃明發、覃樹林、任樹人、張峰、鄧文光、劉國華等。

同日 在北京，“四·二二”代表團、黨報團人員衝擊京西賓館。

中午，在北京西苑旅社二號樓前，王荔催促劉德勝，“去揪章的事怎樣了？”劉德勝說，上午，勤務組開了會，下午要開代表團會議。王荔說：“抓緊點，戚本禹講過，廣西造反派打章國清不要受什麼約束”。王荔還告訴劉德勝，章國清住在京西賓館五樓。

下午，曾春生主持召開代表團會議成員會議，劉德勝、龍智銘、何作然、盛國福、白璧平等均參加。討論決定晚上行動。成立了陣地勤務組，盛國福總負責，李日明、何作然、盛國福、白璧平、李朝傑五人為勤務組成員。

會議決定後，劉德勝到王荔房間向王翼報，王荔做了如下指示：“①你們先去，我馬上向中央反映，說你們去揪章國清了，看看中央的態度怎樣；②你們去後，等一會我也去現場看看；③你們可在會議室接待站靜坐，不要堵大門，在外面搞宣傳，造聲勢，把鑼鼓打響點，這樣時間可搞得長，比較主動，章國清如不出來，中央就好說話了；④應當取得北京紅代會的支持。

劉德勝向曾春生傳達了王荔的精神後，晚飯後行動。

同日 上午，朱仁、曹東風動員廣西赴京黨報團成員說：這次衝擊京西賓館揪鬥章國清，是關係到“四·二二”命運的問題，關係到第五個回合勝負的大問題，我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後決定秦尚群為衝擊京西賓館的隊長，陳鎮西、李儂儂為副隊長。下分四個衝擊連：第一連為紅衛兵，由他們打先鋒，連長為李儂儂；第二連由“工總”、“南寧市直革聯”組成，連長李廣；三、四連由各專、縣人員組成。

晚上二十時左右，“四·二二”代表團、黨報團人員統一行動。秦尚群、陳鎮西、李儂儂、李廣等帶頭衝擊京西賓館，秦尚群用廣播和口哨進行指揮。在京西賓館，秦尚群不斷接到朱仁藏在送來的東西中的指示，要他們“堅持到底，堅決抵制分化瓦解陰謀，無論如何都要頂住，絕不上當，絕不離開火線”等。王荔同另一記者羅安民到京西看了靜坐情況，用手指章國清住的房間，叫靜坐隊伍到章國清房間的窗口下去鬧。二十六日凌晨一、二點鐘，兩個解放軍到京西賓館向何作然、盛國福傳達中央文革兩點指示：①章國清同志是中央請來商量工作的，不能揪，你們有什麼問題可找中央解決；②京西賓館是軍管單位，不能衝擊，你們應當守紀律，把隊伍撤回去。何作然、盛國福說這二點指示是假的，頂了回去；劉德勝也趕回旅社問王荔，是否中央文革指示？王荔說可能是京西賓館搞的，如是中央文革的指示，他為什麼不知道等。這樣，他們又繼續靜坐，直到五月三十日晚上，中央文革兩個解放軍來同何作然、盛國福接洽說：中央文革、中央首長馬上要接見他們，並派汽車把靜坐人員接回西苑旅社，他們才撤回。共靜坐四天五夜，影響極壞。（見王荔專案材料、區

檔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七日 上午十時，“四·二二”大批人馬沖進報社，除已佔領報社大樓又包圍進入工廠和電台，當天報紙被迫停印。下午動員職工支持辦報。“四·二二”指揮部又從民印廠找一些人修機器。當晚伍晉南、黃希明、霍泛從北京發來支持“五·二五”行動的電報，謝王崗到報社看了機器設備情況。報社分工何家松任總管，負責全面工作，劉士均、陳廣旭任副總管。另外龍廷駒、張俊秋、張靖邦三人組成報社管理小組（龍到報社二次、張來到過報社，實際是張靖邦一人辦事）

報社軍管小組當天發出第四號聲明說“非法宣布奪軍管廣西日報社權力的嚴重事件，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勾結社會上牛鬼蛇神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衝擊和奪權的操縱者負完全的責任”。（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新工總”鐵路分部、鐵中、廣西大學“革聯”二百餘人沖進“鐵司”，搶走電話機等，並打死“鐵司”成員、退休老工人、赴京談判代表封丁之父封佐庭。當晚和次日，“鐵司”和“支章派”組織分別於火車站廣場、朝陽廣場召開控訴、抗議大會。（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八日 清晨，重重包圍廣西日報社工廠的“四·二二”人馬沖入車間，用暴力把被圍困在壓版車間的報社職工、幹部和軍管小組成員，趕出車間，隨後將軍管的報社出版的二十七日《廣西日報》作廢，另出該日報紙。

零時，廣西日報軍管小組發表第五號《聲明》，宣布“四·二二”火線指揮部出版的報紙是非法的。（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廣西軍區派車將文化大院的“聯指”派“愚公移山”、“萬里長征”（該組織被“四·二二”派“全無敵”趕出文化大院）接來軍區招待後送往南寧市望火樓消防隊和區人委禮堂、區黨委群眾接待站。從此文化大院成為“全無敵”的據點，區人委禮堂成為“愚公移山”等的據點；各直屬劇團“聯指”人員紛紛集中於區人委禮堂、軍區駐文化大院聯絡人員亦來到區人委禮堂支左。接著正式建立了“紅色文化戰鬥兵團”。從此“全無敵”、“紅色文化”都在構築工事為武鬥作準備。（見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同日“四·二二”火線指揮部開始發行奪權後出版的《廣西日報》。當天刊登了奪權的《嚴正聲明》（黃幹才寫）、《給毛主席致敬電》（西大學生唐寶泰寫）、《告全區人民書》（陸穎星寫），還轉載《新桂林報》評論員文章，《這是推行什麼路線——評《廣西日報》三·三〇日寫《評論員文章》和廣西大學數理系“文革”臨時籌委會寫的《為什麼要搞假報導》，攻擊三·三〇日關於大聯合的評論和消息是“抹殺兩條路線鬥爭，提倡‘合二而一’的大雜燴”。

此外，還刊登署名“向東”的文章：《徹底粉碎資本主義反革命逆流》，錯誤地把當時南寧出現的一些現象，說成是反革命逆流。（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九日 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給“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組織來電：指出：1、不能衝擊、不能奪軍管廣西日報的權，應退出報社；2、版面小組應吸收報社的“造反派”參加；3、報紙不能成為一個組織攻擊另一個組織的工具。（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三十日 南寧市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後簡稱警司）發出《致“新工總”、“倒海翻江”負責人的忠告、警告書》、《致“四·二二”的通告書》公開把鬥爭矛頭指向一派群眾組織。（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當天以廣西日報社“五八——二”總部名義辦的《炮聲隆》報出版（根據二十九日王笠夫傳達軍區領導意見：不出《廣西日報》了可以用“五八——二”名義辦報，辦小報好，要怎麼寫都可以，在場人員決定戰報取名“炮聲隆”。第一期的報上登了《軍管的廣西日報好得很》一文中說

“軍管的廣西日報支持革命造反派，壓制保守派”。這裏說的“造反派”是指“廣西‘聯指’”各個組織，保守派是“四·二二”所屬組織。（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三十日 南寧郊區貧下中農九千餘人在朝陽廣場召開“堅決粉碎奪廣西日報大權的反革命行動誓師大會”，會後遊行示威。上午數千農民包圍報社，經過辯論，沒有發生大衝突，後農民散去。（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四·二二”奪權後出版的《廣西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工總”是南寧文化大革命的中堅》。（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三十一日“四·二二”奪權後出版的《廣西日報》轉載《新桂林報》的文章：《六九五部隊在“革大”是怎樣支持“左派”搞好軍訓的》，並加編者按，讚揚這支部隊“毫不含糊地支持從兩條路線鬥爭中殺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桂林‘老多’”，“這表明了解放軍最堅決地支持革命‘左派’”。同天還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堅決制止武鬥》把近日來南寧不斷發生的武鬥說成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操縱御用保守組織幹的”。（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六月

一日 晚上十時至二日凌晨二時，周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廣西兩派赴京談判代表，陪同接見的有陳伯達、康生、肖華、王力、汪東興等。被接見的還有韋國清、陳發洪、李仕才、王希永、徐其海、喬曉光、伍晉南、賀希明、安平生、霍泛。

這次接見主要聽取兩派的意見。柳州造反大軍代表表明在談在發言中，要求澄清關於“毛主席講過韋國清是好同志，好黨員”的說法，康生承認這話是他講的。（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桂林“老多”、南寧市二中“井岡山”、廣西大學“狂飆”等組織二百多人，抬著寫有“致南寧警備司令部、政治部一小撮混蛋”的大信封，沖進廣西軍區大院貼大字報，說“警備區的警告書是鎮壓革命群眾的白色信號彈”，“是反革命大屠殺的緊急動員令”，“倒海翻江”和“新工總”發表聯合聲明，指責南寧警備司令部、政治部的決策者“執行了拿槍的劉、鄧路線”；“廣西紅總”、“南寧八·三一”、廣西大學“革聯”等也對《忠告、警告書》提出強烈抗議。（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日 南寧警備司令部、政治部發出《致四·二二火線指揮部通知書》，指責“在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叛徒操縱下”，“非法奪取軍管廣西日報的權”。要求他們撤出廣西日報社，停止武鬥，併掌握鬥爭大方向。“四·二二”譚某念完《通告書》後當即對送信的解放軍說：“我代表火線指揮部拒絕接受”（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南寧警備司令部、政治部撤銷了《通告書》，並向“四·二二”道歉）。（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8、33卷）

同日 袁家柯在區展覽館召開的“四·二二”常委會上說：“我們下一步的作法是痛打廣西軍區”，“我們在廣西日報上打了他們一下，他跳了上來，如果我們狠狠地打，他必然跳得更高，這樣我們就越打越主動了。”（見“處遺”材料76卷）

同日“四·二二”奪權後出版的《廣西日報》刊載“桂林‘老多’懲腐惡兵團”寫的文章：《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硬說當時廣西存在所謂反革命逆流。同天還發表“南寧紅衛兵聯絡站”文章：《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而戰》，錯誤地說“廣西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混進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並攻擊當時的一些做法是“大刮資本主義復辟妖風”。（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四·二二”派兩千餘人召開“聲討南寧警備司令部、政治部鎮壓革命造反派罪行大會”，高呼“給我人身自由”，“還我言論自由”，“還我四大民主”，“四·二二”火線指揮部是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廣西工總’和‘倒海翻江’是響噹噹的革命造反組織”，“堅決砸爛反動的五·二五指揮部”等口號。（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聯指”派約八萬人開大會擁護南寧警備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總”、“倒海翻江”負責人的忠告、警告書》和《致“四·二二”的通告書》，“聲討‘四·二二’的滔天罪行”；慶祝毛主席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一週年等。（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章英、秦朝泰、胡隆謀、玉呈道等人在區黨校理論研究室會議室開會，王荔參加（五月下旬，王荔二次來甯）。章英、玉呈道等彙報沖廣西日報後，軍區發表《五·二五聲明》等問題後，王荔說，現中央正在解放廣西問題，軍區這個時候來這一手是很笨的，他要搞反動路線，必須組織和扶植保守勢力，來壓造反派。他要章英等儘快整出以下材料彙報中央：①南寧保守勢力是怎樣扶植起來的；②革命領導幹部是怎樣受迫害的；③農民是怎樣進城的；④武鬥是怎樣發展起來的；⑤收集誣陷“四·二二”的政治謠言。章英按照王荔的旨意，組織胡隆謀、玉呈道、蔣錦真等人分專題寫，都要與軍區掛上勾，點出軍區是後台。他們寫好後文章英修改定稿，於六月八日交新華社廣西分社龔成華轉王荔。（見王荔專案材料）

本月初，上林縣人武部“抓促生產指揮部”與軍管會共同布置一次所謂反擊“牛鬼蛇神”破壞“文革”的運動；二十五日前後，白墟、三里、大豐等區把五類分子戴高帽、掛黑牌遊街鬥爭。二十八日“聯指”派召開一次全縣性聲討“四·二二”罪行大會。當晚，南寧軍分區參謀長邱金山在大豐中心校召開全縣區委書記以上幹部和“聯指”派的縣、區頭頭會議（白墟區“聯指”觀點的鄉支書也參加），邱在會議上作“就是群眾搞武鬥，問題也不大的”等煽動性演說。到六月底各區“聯指”派組織把“五類分子”和不同觀點的群眾等一千五百四十五人戴高帽遊街批鬥。其中地、富、反、壞右分子七百零七人，“五類分子”子女二百一十七人，“土匪”勞改釋放犯、原國民黨的黨政軍警人員和慣偷分子共二百九十八人，不同觀點群眾、幹部、師生二百七十六人。“聯指”把此行動稱為“六月紅風暴”，“四·二二”派則稱為“六月黑風暴”，由此引起了“六月紅風暴”和“六月黑風暴”的論戰，兩派強迫各級領導表態，互相揪鬥雙方觀點的領導、幹部、職工、加深了對立，局勢進一步混亂。

（原編者按：以上數字是“聯指”派統計。“四·二二”派統計在六月風暴中全月受害二千三百二十九人，其中貧下中農群眾一千七百九十七人）（見上林縣“文革”大事記）

自本月份開始，玉林軍分區和各縣（鎮）人民武裝部公開表態支持“聯指”。由於“聯指”得到軍隊的支持，組織得到擴大。全專區持“聯指”觀點的人數約佔持派性觀點人數的百分之七十，持“四·二二”觀點的約佔百分之三十。（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本月上旬，平南縣區鄉都普遍召開批判會（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大批判），參加批准會的有四十多萬人。批判會上聯繫當時文化大革命實際，鼓勵大家“支持韋國清站出來鬧革命”。

四月 柳州市“聯指”五百七十多個組織約七萬人集會，表示堅決打倒伍晉南，支持韋國清站出來鬧革命，並慶祝柳州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成立。駐柳部隊亦參加了大會，會後遊行。（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二十四時三十分，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對廣西軍區指示：要穩住陣腳，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開槍，要文鬥。（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聯指”頭頭廖煒雄從北京給南寧的潘玉臣打電話，以“北京來電”的形式，把誣陷霍泛是叛徒的材料傳到南寧。“聯指”組織連夜翻印、散發，造成嚴重後果。（見廖煒雄專案材料）

同日北流縣武裝部代表北流駐軍表態“支章”，並動員全縣“支章”，六月三十日，武裝部政委雷鋒又在縣城幹部群眾大會上再次表態支章，說：“支章與打章是兩條路線鬥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線”。七月九日又以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名義，召開全縣電話會議，申明全縣要支章，對打章派要辯論、圍攻、驅逐出境。七月十四日以縣委會、縣人委科局長以上領導幹部四十三人，發表《堅決支持章國清同志站出來和群眾一道鬧革命，堅決打倒伍、賀、霍，徹底粉碎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聲明，“亮相”支持“北流‘聯指’”。（見北流縣“文革”大事記）

八日南寧“四·二二”派的班濟民等八人到北海市推銷奪權後出版的《廣西日報》，被“聯指”觀點群眾圍攻，“四·二二”數千人到北海市武裝部門前靜坐，並建立“六八”指揮部。靜坐人數增至兩、三千人。歷時三十四天，最後因武鬥氣氛緊張而撤退。（見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日上午九時，“聯指”派一百二十多個紅衛兵組織八千餘人在朝陽廣場開會，慶祝“南寧大中學校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成立。廣西大學學生黃立禧為總指揮，顏景堂、張鋒、鄭獻盈、李如文先後充當頭頭。

十一日，從憑祥到北京的六次特快列車振民機班帶奪權後出版的《廣西日報》在伶俐站被“聯指”群眾攔截。發生爭吵，致使列車在伶俐、黎塘停留十八小時，十二日，列車到柳州站後，柳州“四·二二”況既白等又攔截列車造成六次特快在柳州站停留八十二十九小時的事故。在總理直接干預下，十五日九時三十分，列車才從柳州站開出。（詳見柳鐵“文革”大事記）

一日至十二日“四·二二”派組織大批人馬，第六次衝擊廣西軍區，強行進入軍區院內貼大字報，塗寫反軍區標語，提出改組廣西日報軍管小組，撤銷致“新工總”、“倒海翻江”忠告、警告書，“工總”平反等七點要求；並進駐軍區，四次封閉軍區支左辦公室群眾接待站；打傷警衛戰士，並在軍區大門口和院內，集會和示威遊行，控訴所謂“黨政軍內一小撮的罪行”，表演污蔑解放軍和章國清的節目等。

同一期間，“聯指”派組織約六萬人次，先後六次到軍區院外周圍示威遊行，抗議“四·二二”衝擊、進駐軍區和衝擊軍管廣西日報。雙方發生襲擊、綁架事件。（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南寧一中發生“六一三”武鬥事件，這次武鬥是由一中“紅衛兵團”與一中“指點江山”兩派不同觀點的紅衛兵組織的矛盾衝突爆發起來的，開始是在校內打石鬥仗，後來發展到校外，並擴大到社會上。參加這次武鬥的還有工人、農民和幹部等。

南寧一中的“紅衛兵團”與“指點江山”的派性鬥爭，隨後迅速擴展到“保章派”和“支伍派”兩大派的大規模武鬥。當天，“五·二五”指揮部李家海、呂斌負責總指揮，鉛廠、化工廠、橡膠廠、“建司”、“財司”和“區直兵團”等組織均派人參加。在校內設防，至晚上九時許，“四·二二”指揮部亦派出所屬“航運工總”的工人約三百人到達一中校門前擺開陣勢，雙方打石頭仗。

這次武鬥，使一中校門街道兩旁的居民房天蓋全部毀壞，一中數學儀器房等被毀壞，教室的階梯大部分被攔爛，折合經濟損失約五萬多元，雙方受傷者難計其數，武鬥一直持續到十五日結束。“六一三”武鬥事件，是南寧兩派武鬥的開端，為後來的武鬥升級“揭開了序幕”，導致了兩派矛盾進一步激化，仇恨進一步加深。（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文革”大事件）

十四日周總理第二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章國清、王希永、徐其海、喬曉光、伍晉南、賀希明、安平生、霍泛等參加接見。

這次接見主要解決：柳州國際列車停運問題。總理批評“四·二二”不開車是不對的；還把車開到道叉上，使別的車不能開，是破壞行為。批評“聯指”上火車搶報紙，並檢查國際列車郵件也是

不對的。

報紙問題。周總理批評了“四·二二”說：“沖軍管是不對的”。“辦的《廣西日報》是派別報紙”；同時也指出：“如果軍管了，只登一派聲音也是錯誤的”。還指出，“在問題沒有解決前，不要辦成派別報紙，不登本地消息，只登中央電訊”。“為了傳達毛主席及黨中央的聲音，先登北京消息”。周總理這個指示，十五日傳到南寧（總理關於報紙問題的講話摘自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五·二五”聯合行動指揮部在自治區人委禮堂樓上召開群眾組織頭頭會議。參加會議的領導幹部有自治區的段純和、劉泮江、閻光彩、安倫、楊亞陸等，南寧市的有范清濤、王恩厚。區、市在南寧市的各大群眾組織都有人參加：橡膠廠李家海，“汽司”呂斌、“建司”黃××、“獨八紅衛兵”覃拔玲、“小八紅衛兵”×××、區直機關王文新、市委機關梁明芝等。潘玉臣主持會議。會議分析研究了“南寧的武鬥形勢，確定了方針和具體布置。……十五日中午，南寧市郊區造反組織在明秀派出所召開各公社書記、武裝部長會議，范清濤（市委副書記）、潘樹斌坐吉普車到會部署了全市統一拔“四·二二”據點的行動計劃。會議決定調動農民進城，由“郊區貧下中農‘四三〇’指揮部”派人到各公社協助動員和負責組織工作，同日下午，郊區八個公社動員組織了上千農民，由汽車總站、汽運公司將他們先接到汽車總站、望火樓和市委大院集結待命。王恩厚（市委副書記）在“汽司”與有關人員在一起“研究攻打‘航運工總’問題”，“地上還劃有一個北大港附近街道地形草圖”。（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至十六日柳州造反大軍“一州戰團”、桂林“老多”等數十人，認為“部隊支派不支左”。“要求部隊不偏不倚，公道正派”為由，於是，衝擊柳州警備區司令部，並砸爛司令部、政治部木製牌子。不久，柳鐵“聯指”群眾組織，做了兩塊鋼制的牌子送給柳警局。（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十五日周總理第三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陳伯達、戚本禹陪同接見。同時被接見的還有：章國清、陳發洪、王希永、徐其海、喬曉光、伍晉南、賀希明、安平生、霍泛等。

接見中，“聯指”代表廖煒雄拋出了誣罵霍泛是叛徒的材料，並說：“伍、賀、霍組成反革命聯盟”；“‘走資派’、‘牛鬼蛇神’、紛紛投靠”等。當說到謝王尚時，康生說：“他三九年在合浦縣委，組織被破壞，是個特務破壞的，謝與特務楊福有關係”。於是，霍泛、謝王尚被誣為“叛徒”、“特務”而遭到迫害。

同日發生了南寧市公安局永寧公安分局事件。當日，隨著一中武鬥升級，“四·二二”武鬥人員退向永寧街一帶，武鬥在永寧分局門前一帶展開。“支章派”一武鬥人員退入永寧分局，“四·二二”人員沖入分局，永寧分局人員沖出包圍。結果，永寧分局幹警餘雄在大同水排附近被打死，分局副局長李義平在民生碼頭被打致重傷，後來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永寧分局事件”發生後，南寧市公安局軍管小組於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發表“嚴正聲明”。稱“永寧分局事件”為“反革命慘案”。該事件於一九八四年七月四日作了處理，認為將該事件定為“反革命慘案”是不正確的，“應予否定”。（詳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軍區轉發中央軍委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發出的《關於民兵武器管理的規定》及《總參關於貫徹軍委六月二日指示的通知》。《規定》中規定：“城市院校、廠礦、企業和機關等單位的民兵武器，由各該單位的武裝部集中保管。爆炸物品，由市或區人民武裝部統一保管”。“農村（包括城市郊區）的民兵武器，由原民兵分散保管的，仍應由民兵自行保管；原是集中保管的，槍彈一定要分開保存，並派政治上可靠的民兵專門看守”。“所有民兵武器，未經縣、市以上軍事機關批准，不得動用。任何群眾組織和個人都不准查封，不准接管，更不准動用”。“民兵不得攜帶武器參與文化大革命運動”等。（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6卷）

十六日 上午五點多鐘，郊區進城的農民二千多人分別圍攻“航運”和“文藝幹校”。一路由蘇聯基率部分農民隊伍配合郊區“支章派”機關幹部攻打文藝幹校（“四·二二”據點之一）。抓了所謂四十多名俘虜送至沙井公社西津大隊隱藏。在俘虜中陳紀文（農學院學生）因被打破頭而死。另一路由“支章派”的“紅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組織在石埭、九龍、堯頭、沙井等公社農民約六百多人從北大路包圍北大碼頭倉庫大門，後增至二千多人與“支章派”的“航運工總”組織一起，上午七時開始進攻，晚上十時用汽車撞門。第二天十一時攻進倉庫。當時傷亡約二百多人。“航運工總”工人繆雲珊當場被打死（後平反）。倉庫物資損失四百萬元，“工總”人員及其家屬撤離航運局到船上生活。南寧水運中斷癱瘓。

這次武鬥，動用了大量物資和數十輛汽車。在日雜經理部調用了一批鋤頭柄、安全帽，在百貨站調用了大量水壺、毛巾、背心和布膠鞋等。區市接待站僅八月二十九日和九月十四日就支付給日雜經理部中心店貨款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一元（事後“聯指”內部總結，大約一共開支了二十五萬元）。武鬥使“工廠停產，商店停業，航運停航”，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據清查“五一六”辦公室資料，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四·二二”出版的《廣西日報》全部改登新華社電訊稿。（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件）

同日 廣西大學“革聯”數十人用石頭、彈弓攻打西大“能聞”軍部，沖上辦公樓，打傷十多人。隨後，西大“能聞”撤離西大，住進區黨委大院。（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 廣州軍區決定在柳州鐵路局及各分局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任命葛沖等為局軍管會負責人。（見柳鐵“文革”大事記）

同日 水電設計院“四·二二”派“火種”、“青先軍”搶佔院辦公大樓後，積極修築武鬥工事。“青先軍”還抓了水電廳長蔡勇為和院黨委書記李景亭做人質。二十一日，蔡勇為被“聯指”派“紅旗團”和“天翻地覆”、“紅革聯”救出。（見區水電設計院“文革”大事記）

十八、二十一日 “聯指”召開常委和各兵團負責人會議，作了反擊“四·二二”的武鬥動員和布置，準備攻打文化大院。（見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十八至二十四日 柳州地委召開部分縣委書記會議，揭發王杞桓、張聲震等地委常委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併用專欄和傳單公布所謂“張聲震的八條罪行”。參加會議的有：縣委書記於子明、何長壽、孫廷國、韋日榮、莫國祥、莫崇賢等。（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本月中旬，顏景堂、潘玉臣主持召開地、市、縣“聯指”常委及系統司令部兵團負責人座談會，研究如何加強團結，迎接區革委會的誕生。南寧地區參加會議的縣“聯指”負責人傳達貫徹，講了全區形勢，號召加強團結，堅定“支章”信念。（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本月中旬，廣西“聯指”再次集隊到廣西日報社反奪權。廣西大學“獨八”負責人鄭獻盈、李如文派出一千多人參與這一活動，持續數天，未攻下便撤回。（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

二十四日 橫縣抓促指揮部召開四級幹部會，到會八千多人，貫徹軍區抓促會議精神。下鄉幹部要表態“支章”、“打倒伍晉南”，會議中舉行“支章”、“打伍”遊行示威，會後向全縣發出“支章打伍”宣言書。（見橫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五·二五指揮部”調動工人及郊區農民包圍“火種”大樓，“火種”常委侯立民帶領二十餘名工人“投降”。設計院材料員被用鋼叉打死。二十六日清晨，大樓被攻下，“四·二二”骨幹紀烈、於賢富、馬秀英、羅福灌、朱錫根等六人被關押挨打，大樓上被洗劫一空。（見區水電設計院“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 平南縣召開抓促三級幹部活學活用毛著講用大會，有一千四百四十八人參加。人武部副政委葛立志在大會上作報告。他在報告中說韋國清是老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指責譚毅伍晉南，說他是劉、鄧伸向廣西的黑手，是大右派，說“支伍”的都是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對現實不滿的人……。（見平南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 “四·二二”組織上千人進攻林業廳，蜂擁而入，把該廳公私財物洗劫一空。當日下午“聯指”對“全無敵”開展宣傳攻勢，到林業廳院內搶奪物資，指責“全無敵”搶奪國家財產，挑動武鬥。五時許，“聯指”派上千人三麵包圍文化大院，併用推土機推倒部分圍牆，攻進了京劇、桂劇、木偶三團住地。王相龍和住在該團的二十多名紅衛兵負傷，“全無敵”退守新禮堂及文聯大樓。（見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同日 “聯指”發表所謂“自衛還擊”的嚴正聲明，下午三時包圍廣西日報社，沖入報社大院，攻打報社工廠區和報社大樓。雙方均有人受傷。（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至二十九日 合浦縣人武部召開“抓促”三級幹部會第三次會議。主要是傳達貫徹自治區“抓促”會議精神，人武部部長作《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方針，奪取革命、生產雙勝利》的報告。人武部副政委陸卓環作會議總結，強調更廣泛、深入、全面地把批判最大的“走資派”同本單位的鬥、批、改結合起來，要把矛頭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和本報的代理人，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向他們發動總攻擊。（見合浦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 中央要求制止武鬥的“六·二四”通知傳來，“聯指”指揮部下令圍攻廣西日報社的人員撤走。（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六時許，“聯指”從糧食廳方向攻入文聯大樓。“四·二二”派六百餘人全部被俘，並被押解至區物資局院內。部分人被捆綁、蒙眼、審訊，有些還遭毒打。除“全無敵”骨幹人員被押送區人委禮堂和市糧食局“聯指”據點外，大部分人獲釋。

“聯指”進攻文化大院，有的乘機報復，有的借機劫掠，許多門窗被砸打，財物被盜，不少人被打。（見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本月，荔浦縣兩派在鬥爭中，出現查封“紅影”（群眾組織）、“五州”攔截汽車、砸城西生產隊等事件。“造反大軍”組織中有人多次發表聲明要求縣人武部執行中央“六·六通令”，制止武鬥，懲辦打人凶手和幕後指揮者，未達目的，於八月十日下午有人到區人武部內靜坐絕食。（見荔浦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 周總理第四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陪同接見的有康生、戚本禹。周總理對廣西出現的越來越嚴重的武鬥流血事件極為關切，對制止兩派武鬥作了重要指示。廣西兩派對周總理指示表示堅決擁護，堅決照辦。經兩派協商，雙方就如何保證中央關於制止武鬥的“六·二四”通知中的六條在廣西各地實現，達成十條協議；並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在北京簽字。（詳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桂林市，原“工人紅衛兵”主要負責人高桂英，以及市直屬機關幹部楊德廣（市公安局）、李建華（市經委）、柴儉（市貧協）、湯秋生（市郊區）等人發起“支持韋國清站出來鬧革命”活動；組織“六·二九”聯委。於二十九日在市體育場召開有七萬人參加的成立大會，由高桂英主持，黃沃南（“老老”學生）、駐軍負責人及六九五部隊副政委趙保立等講了話。這個組織一成立就遭到“造反大軍”和“聯指”的極力反對。部隊也無能為力，不到一個星期就垮了。（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三十日 欽州軍分區支左辦公室發表聲明，堅決支持韋國清站出來鬧革命，但錯誤地寫到“伍晉

南、賀希明和霍泛等，他們是什麼人？大家都很清楚，他們的問題很大，很嚴重。這三個人搞了一個‘四一九’聲明，犯下了滔天罪行。所謂兩派鬥爭就是這個聲明形成的。廣大革命群眾對這些人，進行了徹底的揭露，堅決地鬥爭，揭得對，鬥得好”。後來軍分區曾俊德司令員在少數派一次幹部會議上檢查支一派壓一派的問題時說：欽州分成支章、支伍兩派，我是傾向支章的，認為“四·二二”打章是大方向立場問題，特別是打南寧永寧派出所，我不支持他們；結果就同意支左辦“六·三〇”聲明。

同日 晚，欽州縣犀牛角隊武術教師黃鴻飛因參加造反派被縣糧食局副局長王斌等人以教“四·二二”群眾學武術為由，把黃拉到田螺鎮水利溝邊由王斌親自指揮並參與用棍打死。（見欽州市“文革”大事記）

本月底，王荔回北京前，對章英說不宜撤出展覽館，“隊伍可以集中，指揮部就不一定撤到新華路去。展覽館是‘四·二二’起家的地方，是‘四·二二’一面旗幟，撤出去旗一倒，隊伍就散了”。七月初，王荔回到北京後，又向“四·二二”代表團煽動堅守展覽館，因而，“四·二二”指揮部始終未撤離展覽館據點。（見王荔專案材料）

七月

一日 南寧兩派分別集會，除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六週年外，各有自己派的内容：“四·二二”慶祝“四·二二”為“造反派”的“偉大勝利”，喊“打倒章國清、打倒徐其海、支持伍晉南”的口號外，還呼“打倒賀希明、打倒霍泛”的口號；“聯指”則慶祝“無產階級革命派”在京談判的“勝利”，說賀希明、霍泛被打倒，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在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百色“聯指”主辦的《右江怒濤》創刊。共出版四十三期，於六八年三月九日停刊。該報鼓吹大造“黨內走資派”的反，大造資產階級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僅刊登陪楊烈、鄭少東等老幹部的文章就達六十篇。在全地區起了很壞的影響。（據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本月初，根據周總理第四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時的指示意見，成立“中央文革廣西聯絡站”，王荔任聯絡組組長。

本月上旬，一天，王荔叫廣西聯絡組副組長周楓拿著聯絡組寫給戚本禹並經戚本禹批示的《關於增加備保組織柳州“聯指”代表的報告給王希永看，報告肯定“四·二二”是造反派，“聯指”是備保組織。戚本禹厲：不必增加代表了，將來正式談判時，做為列席代表聽聽就行了。（據王荔專案材料）

二日 廣西軍區召開支左辦公室全體人員、各戰線、工廠、學校、軍管單位聯絡員組長會議，副政委周紹明傳達中央首長接見雙方代表有關情況，要大家正確對待周恩來總理指出的“四·二二”是“造反派”的問題。（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在北京王荔找廣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劉德勝、農烈談話，說六月三十日下午中央首長接見兩派代表時，不批評章國清，但戚本禹批得很厲害。戚說章國清如果不改，他也要打倒章國清。劉德勝將王荔的意思告訴游建安，游分析當前打章最主要的是抓住章在廣西樹自己權威的材料，劉支持寫這個材料，後來寫成了《廣西大樹特樹土皇帝章國清權威的反動逆流》一文，由劉德勝交給王荔。（據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 上午，廣西軍區收到中央文革《關於節約鬧革命，防止鋪張浪費的通知》的電報，魏佑禱指示由廣西軍區黨委印發全區。

三、四日 廣西軍區領導歐致富、魏佑禱、周紹明、韓世福分別先後召集“聯指”上、中層頭頭、一些紅衛兵組織頭頭和王恩厚等數名領導幹部開會，座談對“四·二二”是“造反派”的認識和研究如何貫徹執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和制止武鬥等問題。

同日 周紹明、孫霖召集“聯指”、“四·二二”雙方代表進行第六次談判，繼續討論如何貫徹中央《六·二四通知》，制止武鬥等問題。（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廣西赴京兩派在京達成《十條協議》，周恩來總理指示：“立即發給廣西來京全體代表並請兩派和軍區以明電和電話打回轉告全區照辦”。《十條協議》主要内容是：

- 1、堅決貫徹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 2、不准抓人，不准私設公堂、毒打、逼供對方人員；
- 3、堅決響應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工人、農民、幹部必須堅定生產（工作）崗位；
- 4、不准以任何藉口動員農民進城，攔路、攔車，參加武鬥；
- 5、堅決維護交通運輸秩序，保證鐵路、公路、輪船運輸暢通無阻；
- 6、所有在外單位的人員在一星期內撤回原處；
- 7、堅決文鬥，不要武鬥；
- 8、不准奪槍、開槍，各單位現有槍支，由軍區派員監督收回或封存；
- 9、由當地駐軍派員召集雙方派出對等代表共同組成監督小組，監督執行；
- 10、本協議自七月四日起生效。

在協議上簽名的：廣西“四·二二”代表：曾春生、龍智銘、黃傑華；廣西“聯指”代表：廖煒雄、黃明發、顏泉堂；廣西軍區：王希永。（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16卷）

七日 上午，周紹明召集西大“能聞”、醫學院“星火燎原”、“南寧八·三一獨立兵團”等學生組織的頭頭座談。學生們在座談中提出：①武鬥不是我們挑起的，我們是自衛反擊；②從團結的願望出發，說“四·二二”是“造反派”還可以理解，但根據中央歷次指示是不可理解的；③“四·二二”受“走資派”操縱，勾結“牛鬼蛇神”，矛頭指向解放軍，大搞打、砸、搶，我們認為“四·二二”是反動的；④“聯指”單方面撤離據點，是右傾情緒。

同日 廣西軍區派黃文棟同“四·二二”、“聯指”協商組成監督小組問題。（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梧州市“紅三司”貼出“炮轟軍分區支左辦公室”、“揪出軍分區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巨幅標語。（據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紅色公安”和“南寧八·三一獨立兵團”在衛生廳大禮堂舉辦“永寧分局和永寧派出所慘案”展覽。（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一日 凌晨一時多，“四·二二”談判代表五人乘車從廣西軍區返“四·二二”據點，在工人文化宮前，被“聯指”二、三十人攔截，並將他們蒙上眼睛，開車在南寧市內兜數圈後放回。十二日廣西軍區召開“四·二二”、“聯指”監督小組預備會時，“四·二二”代表就此事提出抗議，發表第三號聲明。“聯指”代表當場承認錯誤，表示道歉。（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四·二二”三十餘人乘車，手持凶器到文化大院護送文化局副局長岳平和文聯創作員譚流到火車站搭車。“聯指”人員則到火車站將岳、譚抓到話劇團審訊、毒打。（據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同於廣西日報社“五八——二”組織（“聯指派”）致電中央文革、周恩來總理，要求“四·二二”執行廣西兩派達成的十條協議，撤離報社。（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軍區黨委向各分區（市武裝部）、師、各邊境工作總站轉發“關於開展對中南地區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陶鑄大批判、大門爭計劃”的電報。（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北海市發生武鬥。社員民兵圍攻前去支援“雙夏”的“六八”派學生（屬於“四·二二”派），於是學生在市内開大會控訴北海市走資派“破壞支援雙夏的罪行”。“聯指”派出面反對，造成雙方嚴重對立發生武鬥。“聯指”派調動民兵和其所屬成員共三千多人，於十三日圍攻“六八”指揮部和北海中學“紅司總部”。雙方用木棍、石頭等對打，共有一百多人受傷，其中重傷三十六人。十八日中午，軍分區司令員蘇桐卿到“六八”據點視察。二十六日晚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滕世舜、北海駐軍七六分隊有關人員，還有軍醫等到“六八”指揮部對“六八”兩個傷員驗傷。二十七日下午軍分區一副科長、市人武部一科長和駐軍人員等同往“六八”指揮部視察。二十七日晚，廣西軍區副政委周禮成、欽州軍分區政委王曉峰、副司令員蘇桐卿、政治部主任滕世舜和駐軍、市人武部等領導人在北海市召開市“聯指”領導成員和作戰指揮員會議。會上週禮成說“聯指大方向是對的，‘六八’專搞那些壞事；他們沖，我們就自衛還擊。”（據北海市“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廣西軍區副政委周紹明主持召開“聯指”大中學校組織頭頭座談會，討論如何開展批判陶鑄問題。（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四、十五日南寧地專“聯指”搶了南寧軍分區槍支九百零六支，子彈八十萬發。在劃策搶槍的會議上有人說：軍分區暗示，軍分區的槍地專“聯指”不去搶，外面的人何能來搶。（據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五日 上午，廣西軍區領導魏佑禱、周紹明召集“聯指”部分頭頭開會，座談南寧當前形勢和執行兩派達成的《十條協議》等問題。

同日 下午，廣西軍區召開常委會議，由黨委第二書記歐致富主持，研究成立廣西地區領導小組和貫徹中央制止農民進城參加武鬥問題。

同日 晚八時，廣西軍區召開電話會議（各分區、縣武裝部參加）、由副政委周紹明傳達中央關於禁止農民進城參加武鬥的通知，及軍區貫徹這一通知的意見。（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六日 在北京，廣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團開會，討論處理韋國清問題的三個方案。晚上，代表團便通過了給戚本禹的信。（據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 上午，廣西軍區副政委韓世福召集“四·二二”常委開會，“南寧八·三一”、“八·八紅衛兵”、“倒海翻江”三個組織的代表到會，對兩派聯合批陶問題進行了座談。

同日 下午，魏佑禱、周紹明接見區黨委部、辦負責人閻光彩、段純和、劉泮江、任國璋等，就南寧文化大革命形勢和如防止武鬥問題進行了座談。

同日 下午，韓世福召開桂林“老多”骨幹座談會，就歸口鬧革命問題進行座談，動員他們儘快回本單位搞好本地區、本校的鬥、批、改。

同日 下午，“四·二二”近千人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所謂“痛打落水狗——劉少奇大會”，廣

西軍區支左辦公室蘇大倫等四人參加並講了話。

同日 廣西軍區成立了“批陶”領導小組。由廣州軍區副政委陳發洪、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政委李仕才、魏佑禱、副司令員焦玉山、副政委周紹明、政治部主任孫磊、空七軍政治部副主任張虎忱、二〇分部部長王斌等組成。陳發洪任組長。下設辦公室，辦公室下設部隊組、革命群眾組、寫批判文章組。

十七日 王荔看了廣西軍區給周恩來總理的關於支左中所犯錯誤的檢討報告後，用原“中央文革”記者站派駐廣西記者的名義，給戚本禹寫信，對軍區的檢查逐條反駁，為戚本禹反黨亂軍提供炮彈。由中央文革記者站負責人徐學增轉交戚本禹。王荔說：“要爭取把信早一點送上去，爭取在戚本禹看到報告不久看到信”。此信王荔故意叫“四·二二”頭頭劉德勝來抄，以示自己在為廣西“造反派”出力。這封信《對軍區支左檢查的一點看法》，經戚本禹批示，登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的中央文革辦事組的《每日動態》上。（據王荔專案材料）

十八日 平樂縣“聯指”武裝追捕不同觀點的群眾。“聯指”常委全政（工人）帶四十多名武裝人員，到棺汀村，把村莊包圍，開槍射擊，抓獲平樂搬運社“工總”工人桂炳生，當場打死，無人追究責任。平樂縣從此開了殺戒。（據平樂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四·二二”奪權後出版的《廣西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新華社南寧十六日電稿《六九五五部隊幫助廣西師院軍政訓練好得很，堅決支持熱情幫助革命左派桂林“老多”》的消息，二版又刊登了新華社南寧十六日電署名新華社記者、新華社通訊員的通訊《我們的團長——記軍訓團長張體成幫助廣西師範學院革命師生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跡》。“聯指”認為此稿失實，於凌晨三時許，西大“罷鬧”、區黨校“遵義”和廣西日報“五八——二”組織二百多人沖進新華社內，對總社播發此稿提出抗議，並強行進入電話室與總社通話三小時左右，還推、拉、打了新華分社的人。新華分社認為，這是對分社的嚴重政治迫害，要求廣西軍區採取有效措施，保障正常工作條件和人身安全。

同日，新華總社給廣西分社電報，要分社轉告南寧各革命群眾組織。桂林革大軍訓經驗是六九五五部隊供稿。由新華總社處理的，有問題由總社負責。

同日 上午，“聯指”約十萬人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所謂“痛打落水狗——劉少奇誓師大會”。廣西軍區宋長髮、空七軍馬處長等十二人代表南寧駐軍參加了大會。馬處長講了話。

同日 下午，歐致富主持召開廣西軍區黨委常委會議，討論研究做好“聯指”工作，要區廣播電台轉播新華社發來的六九五五部隊的軍訓經驗，還研究了毛澤東主席偉大革命實踐圖片展覽問題。（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八日 在北京，王荔以廣西聯絡組的名義，給戚本禹寫信，要求戚本禹單獨接見廣西“四·二二”代表團，聽取對韋國清問題的彙報。並附有告韋國清的所謂八份材料：《反對毛主席、中央文革》、《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都站在劉、鄧路線一邊》、《韋國清是五七年漏網大右派》、《大搞獨立王國，搞黑軍隊》、《是搞反滿產、慘殺三十幾萬農民的劊子手》、《是鎮壓廣西文化大革命、屠殺造反派的罪魁禍首》、《是殺害韋拔群的主謀》、《同劉、鄧、陶、羅、海關係不正常》等問題的材料。

其中誣陷韋國清謀害韋拔群的材料，是“桂林老多”頭頭之一的潘國球、謝榮傑等指使王祥俊等人到百色搜集整理後，派“老多”成員廣西師範學院學生覃騰禮、曾德光將材料專程送到北京交給廣西“四·二二”代表團團長楊福庭。楊福庭和石懷宇等將這些材料整理為韋國清的八大疑案之一、之二交給王荔轉中央。（據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聯指”近十萬人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所謂“批陶誓師大會”，廣西軍區政治部主任孫磊

等參加並講了話。

同日“四·二二”約二千餘人在“造反樓”門前，召開“熱烈歡呼六九五五部隊幫助廣西師院軍事訓練大會”。發言者指責廣西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指責“聯指”衝擊新華社和向總社提意見等，高呼“打倒章、喬、賀、霍”、“打倒歐致富、徐其海”等口號。

同日 晚，南寧駐軍四千餘人在廣西軍區大院召開所謂“聲討中南地區黨內最大走資派陶鑄罪行大會”，魏佑鏞作了所謂“批陶問題”的動員報告，各部隊代表紛紛發言，聲討陶鑄的“罪行”。

十九日 晚十一時，廣州軍區支左辦公室給廣西軍區來電話，就北海武鬥問題指示如下：①已通知南海艦隊，派海軍出面協同武裝部處理；②廣西軍區、欽州軍分區各派一名領導幹部到北海共同處理。實際上，北海武鬥無人去處理，打死一些人，財產損失嚴重併殺了大批俘虜，地方黨、政、軍人員也卷進了。

同日 上午，廣西軍區召集“聯指”、“四·二二”代表就成立監督小組問題舉行第七次談判，雙方爭吵，未達成協議。

鑒於上述原因，雙方要求廣西軍區提出意見。廣西軍區胡慶輝（按：該員是根據當時布置組織人員寫作“反圍”公告者）提出：建立監督小組的籌備小組，其任務是：①繼續就“老多”參加監督小組問題進行討論、協商；②解放、處理一些急需解散的問題。雙方同意回去研究。晚上九時至二十日凌晨，廣西軍區召集雙方代表，對以上兩點建議進行討論。（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日 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

同日“四·二二”辦的《廣西日報》刊登新華社電稿《解放軍領導機關和駐京三軍指戰員決心完成毛主席交給的偉大歷史任務》，第一次提出，人民解放軍“始終把全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軍內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作是頭等重要的偉大歷史任務”。二十五日，該報又刊登新華社關於武漢“七·二〇”事件報導，消息提出“把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全部揪出來”的口號。從這時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廣西日報》刊載的中央兩報一刊社論，連續不斷地提出“揪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左右 中央文革廣西聯絡組長王荔，到廣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團住處（西苑飯店323號房），對劉德勝等說：“不要以為中央講了話，軍區就會支持你們了”。主要劉等搜集廣西軍區一些以小見大的材料報中央。併舉例說：“如《人民畫報》有航運工總的畫面，但軍管後的郵電局扣壓這一期不發，《人民日報》報道六九五五部隊的文章，軍區接待員說這是毒草。這些材料很說明軍區的問題”。後來，由雷激搜集整理這些材料，交給了王荔。（據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 柳州鐵路局“革命造反聯合戰隊《痞子戰報》編輯部”發表文章。提出所謂“打倒拿槍的劉、鄧路線，揪軍內一小撮”等口號。

二十八日，由鐵一中學生龍炳宏、黃玉梅主持，開奪軍權大會。局軍管會副主任張志臣被揪到會上批鬥。會後，張志臣被揪到鐵一中關押批鬥一個多月。八月一日，又將公安處副處長張珍揪到鐵一中批鬥。（據柳鐵“文革”大事記）

二十一日 周恩來總理派遣首都醫療隊來南寧。（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三日 南寧舉行所謂“聲討武漢七·二〇反革命事件大會”。廣西軍區、南寧駐軍代表蘇大倫、趙維學在會上發言。說“反革命分子陳再道、鍾漢華及其操縱的‘百萬雄獅’一小撮壞蛋，在武漢圍攻打謝副總理和王力，製造反革命事件，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就是反對黨中

央，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表示“要把反革命分子陳再道、鍾漢華堅決、徹底打倒，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二十四日 根據兩派達成的《十條協議》，雙方在京代表就組織南寧地區監督小組問題達成協議。雙方同意各派代表十九名，由廣西軍區召集組成監督小組。（據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二十六日 由軍代表和兩派組成的監督小組成立（一九六八年三月撤銷）。監督小組由軍代表領導。負責人是解放軍胡慶輝、蘇定永、張忠等，“聯指”代表是：覃樹林、王彤、楊祿、鄧朝興、王前進、黃矩、陳鋼、周群等20多人。“四·二二”代表是：孫紹鵬、莫文（女）、黃幹才、肖仁華、何家松、宣肇惠、高廣華等。

此後，在監督小組安排下，兩派在原南寧市委門前，交換了前段武鬥中被俘人員。（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三十日 晚上，桂林地、市造反大軍六萬餘人，在桂林市體育場聯合召開“打倒章國清誓師大會”。（據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八月

本月 全區各地兩派開始搶槍武斗升級。僅宜山縣造反大軍（“四·二二”派）就搶了縣武裝部全部武器彈藥計：重機槍十枝、輕機槍六枝、長槍一百八十三枝、手槍二十六枝，子彈五萬二千六百零二發，手榴彈三千三百三十五枚；宜山縣“聯指”同時奪縣公、檢、法和九巖駐軍的所有槍枝彈藥，又到梧州、欽州、南寧搶回山炮、迫擊炮各一門，高機槍二挺及大批槍彈。於二十八日拉開宜山縣城歷時兩月之久的一次大規模武鬥。雙方武鬥中死數十人（不包括殺俘虜）。居民房屋被燒，造成四百四十多人無家可居。這場武鬥策劃指揮者是宜山“聯指”謝煥臣（物資局幹部“聯指”總指揮、黃強（縣農行幹部“聯指”副總指揮）；宜縣“四·二二”陳光明（宜高學生“造反大軍”司令）、蘇佩華（工人“造反大軍”副司令）。（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一日 在中央文革康生宣布賀希明是“歷史反革命”，霍泛是“叛徒”後，廣西“聯指”赴京代表團鄧文光、顏泉堂、肖岳安和部分紅衛兵策劃把架，霍押回南寧批鬥。在賀、霍乘坐的飛機起飛後，他們才用電報向總理報告。鄧文光和西大學生李國清、王筠英等三人負責押送。到廣州時，周總理電告賀、霍送回北京，他們不聽，仍把賀、霍押回南寧批鬥。二日，“聯指”派七十部汽車武裝遊行，遊鬥賀、霍。在總理一再追問下，令“聯指”限期將賀、霍安全送京，“聯指”才於八月十一日把他們送回北京。（見“處遺”材料76卷，廣西大學、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二日 北海市發生大規模武鬥（即“八·二”武鬥事件）。經北海市“聯指”頭頭石維雄（北海市公安局治保股長，“聯指”總指揮）、溫世雄（北海市公安局幹部，“聯指”總指揮部總參謀長）、陳清熙（北海市公安局局長，“聯指”指揮部參謀，前線總指揮）和徐坤（北海市市長、市抓促指揮部副指揮）等的策劃、部署，調動武裝農民一千多人，進攻北海市“六·八”（“四·二二”派）指揮部據點。在石維雄等人的帶領指揮下，於早上七點三十分，向電影院“六·八”據點等發射催淚彈，併用土坦克、推土機摧毀圍牆，用消防車噴氨水、氯化鈉，隨後用機、步槍向“六·八”據點掃射。“六·八”指揮部看形勢危急，便先後派人和打電話向市武裝部、北海駐軍和海軍四四〇五部隊聯繫，要求制止“聯指”武裝進攻，但均遭拒絕。於是，“六·八”據點：電影院、手工業大、海珠樓等先後於二日、五日被“聯指”攻佔，“六·八”人員被俘。

這次武鬥，在武鬥中打死三十六人，“六·八”人員被俘後，在陳錦銜（市公安局臨委副主任、政法戰國團長、公安獨立營營長）、石維雄、溫世雄、徐坤等人策劃下，先後被槍殺六十七人，其中一次是十五人被集體槍殺。（詳見北海市“文革”大事件）

本月，扶綏縣人武部在縣委東樓會議室召開五十多名“聯指”頭頭的會議。縣人武部葛實珍，科長賈榮等到會，並說：“現在南寧‘四·二二’就要來搶槍了，你們怎麼辦？我們解放軍有三不准（即不准還手、不准還口、不准還槍），你們去搶好了”。又說“東門林場形勢也很緊張，‘四·二二’揚言要搶槍，還有金雞火車站抗美援朝炮彈也被‘四·二二’搶奪了”。“聯指”頭頭怕搶來槍難以保管，出了事難以負責，表示不想搶。會後葛實珍又通過有關人員鼓動“聯指”搶槍。十七日晚，“聯指”組織民兵沖入軍武庫“搶槍”，搶槍時賈榮假惺惺地攔阻。在此之前人武部還愛意縣水電局“革命派”拿上一批武器：輕機一挺、衝鋒槍七枝、步槍五枝、手榴彈五箱。十八日晚，“聯指”共搶得重機二挺、步槍二百多枝、駁殼槍五枝、手榴彈五箱。“四·二二”即出大字報評擊“聯指”搶槍，譴責武裝部“假搶槍，真送槍”。從此派鬥爭日益加劇。（見扶綏縣“文革”大事記）

二日 廣西大學“革聯”指揮部派人闖進西大武裝部、保衛科，強行奪取武裝部各種步槍、衝鋒槍一百六十五枝、輕機槍六挺、火箭炮十三門，封閉了保衛科的檔案，武裝押送武裝部，保衛科幹部出校門。西大武裝部、保衛科發表聲明，指責西大“革聯”指揮部這樣做是非法的。（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四日“聯指”指揮部調動上萬武裝隊伍，到廣西日報社進行反奪權，並圍攻區文化大院和展覽館等“四·二二”據點。鄧文光、廖煒雄、李家海、顏景堂等親臨指揮。先頭部隊從民主路小學破圍牆沖進報社工廠區，佔領工廠，接著圍攻辦公大樓。“四·二二”駐報社人員堅決還擊。這次武鬥，使用鋼叉、長矛、石頭、高壓水龍、硫酸、土裝甲車、推土機等，雙方有傷亡。顏景堂後來承認當時恨不得把對方全部消滅。（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本月上旬左右，周總理要伍晉南轉變態度，與韋國清合作，搞好關係，以便解決廣西問題，王荔便和伍晉南去京西賓館找韋國清。伍晉南和韋國清談話回來後，對廣西“四·二二”代表團成員說：對韋國清不要抱希望了，壞不好了；並向代表團表示：他就是丟了官也要堅決打倒韋國清。並叫“四·二二”代表再去找韋國清辯論廣西問題。（見王荔專案材料）

六日至八日 北海市“聯指”在打走北海市“六·八”派後又在海濱飯店舉辦屍體展覽。展出“六·八”派成員屍體九具和有關實物、照片等供人參觀。同時也為上京告狀作準備（八月八日由石紹雄帶隊赴京告狀）；並就地舉行各縣聯防代表會議，商討“文攻武衛”的聯防措施。（見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七日“聯指”派發出“通輯令”，“通輯”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謝王崗，認贖他是“國民黨大特務”。（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八日 在北京，王荔到廣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團住處（北京西苑旅社三二四號房），對劉德勝、楊福庭、李日明等說，戚本禹講了王力在外交口講話精神，就是中央放手讓“造反派”搞鬥爭。廣西“造反派”應當去揪韋國清，走在中央解決廣西問題的前面。（見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 柳州“聯指”用長矛、大刀、彈弓、石頭等攻打柳州“造反大軍”據點柳江旅社、互相抓走對方數人。堅持一天一夜，揭開了柳州武鬥的序幕。（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九日 柳州“聯指”工交兵團一分團前來支援柳江旅社武鬥，路經柳州貯木場，遭到柳州“造反大軍‘柳北戰團’”阻擊，雙方用鳥槍、長矛、大刀和石塊對打。工交一兵團用改裝的推土機作坦克，推倒貯木場禮堂和幾間房屋，燒毀一些建築物。廖斯祥被打死，打傷十多人。（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桂林市、市“造反大軍”頭頭集中在廣西師範學院辦公樓開會，策劃在全市範圍內“搶槍”。會議由周兆祥、劉天債主持。會上，地專“造反大軍”一頭頭說：地專“聯指”準備把地專公安處的槍支轉移到縣裏去，地專“造反大軍”派人把公安處包圍起來了，請求地、市“造反大軍”趕緊採取行動。與會人員覺得形勢迫人，不能再拖，決定第二天（八月十日）搶槍。（見桂林

地、市“文革”大事記）

本月初，廣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團長、桂林市“造反大軍”代表楊福庭和“老多”代表李日明，多次從北京打電話給桂林“造反大軍”頭頭謝榮傑等人，談及“文攻武衛”問題和外省反軍、搶槍等情況，並傳達王荔叫桂林“造反派”搶槍的“指示”。桂林市“造反大軍”頭頭周兆祥、劉振林、劉天債、謝榮傑等人，幾次召開會議，策劃搶槍事宜。（見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記）

九、十日 在北京，廣西“四·二二”赴京代表糾集廣西“四·二二”冀報團和北京紅代會人員二百多人，再次衝擊京西賓館，打傷韋國清。上午，曾春生、石懷宇、李躍增、雷激、何作然等人去京西賓館找王希永，以攻擊“聯指”圍攻廣西日報社為藉口，要王希永把韋國清找出來解決廣西武鬥問題。王希永同意了。下午二時，廣西“四·二二”代表團團長楊福庭在三二四號房主持代表團全體會議，討論去京西揪韋國清問題。會上決定：一、由曾春生帶五個學生去找王希永，由王希永將韋國清請出來；二、其他成員第二批去，紅代會、冀報團第三批去（紅代會由龍智銘同北京地質學院聯繫來人來車）；三、把韋國清揪到地質學院或西苑旅社扣押起來，要挾中央同意打倒韋國清。做法是：先向韋提出四點要求，要韋簽字，韋如果不同意簽字，就以此為藉口把他揪走（四點要求是：①承認廣西報社武鬥是軍區支持“聯指”搞起來的；②立即停止武鬥；③給傷病員治療；④給“四·二二”各據點送糧食）。上述決定通過後，劉德勝在三二四號房打電話請示王荔，王問了討論情況和做法，說了二點：1、你們決定、研究了就快去吧！2、等一會我也去京西賓館看看。劉德勝向代表團傳達了王的“指示”，統一了認識，決定晚上行動。晚飯後，曾春生、何作然、石懷宇、李躍增、雷激第一批到京西賓館。不久，李躍增、何作然先後打電話給劉德勝，說韋國清出來了，催他們快去。十時左右，楊福庭便率領第二批人趕到（其中有劉德勝、李日明）。接見地點在東門接待室，門外停放兩台準備揪走韋國清的汽車。接見人除韋國清外，還有王希永、徐其海、陳發洪和四一師政委張驥等人。楊福庭等趕到後，便拿出四點要求，要韋國清簽字，韋不簽，但王希永馬上簽了，大家對韋更不滿。這時，北京紅代會的人已經來了，有人在門外打手勢，示意要揪走韋，韋見勢不對，說要出去小便，想從小門離開。北京紅代會黃賽陽和廣西“四·二二”冀報團一夥人乘機要搶韋上汽車，京西賓館的警衛戰士、工作人員和廚師等聞訊趕來保護韋，並把他們隔開，但黃賽陽等一夥人沖進去，扯掉韋國清的領章，卡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地上踢打，韋的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傷，流血不止，昏迷過去（後警衛戰士將他送回房間）。保護韋的警衛戰士，有的門牙被打落，有的被打得腦震蕩，有的肝損傷（傷勢重的留下後遺症，退伍後生活有困難，還不斷到京找韋國清解決問題）。當時在會議室的“工總”成員，也圍攻、辱罵、推打了徐其海副司令員，並撕了他的領章和帽徽，搶走了他的軍帽。

零時左右，在京的廣西軍區支左辦保衛幹事董坤等，分別打電話給總理辦公室和廣西聯絡組。王荔假惺惺地和副組長周楓、組員羅安民趕到京西。當時事已平息，周楓向廣西軍區同志瞭解情況後向總理值班室周家鼎報告。周家鼎傳達總理指示：要“四·二二”馬上離開京西，如果再這樣做，中央就要考慮你們是不是造反派了。周楓向“四·二二”幾個主要頭頭口頭傳達，勸說他們回去，才散了。

王荔到京西後，則叫楊福庭把四點要求寫給他，他拿進大樓對韋國清、陳發洪、徐其海、王希永說：“‘四·二二’提出這四點要求是合理的”，要他們四人簽字。韋國清一直未在要求上簽字。但王荔出來時對龍智銘等說：“韋國清同意用四人的名義把四點要求發回南寧。他們即印成傳單，說韋國清等四人簽了字，造成南寧更大混亂。天亮前，王荔還到西苑旅社劉德勝房間，對劉德勝、楊福庭、曾春生等煽動性地說：“韋國清這人也怪，不簽不簽，打了他就簽字了。”（見王荔專案材料）

十日 桂林市“造反大軍”頭頭周兆祥在廣西師範學院辦公樓會議室，召集地、市“造反大軍”各總部頭頭會議，決定當天下午在全市範圍內“搶槍”。參加者：劉振林、劉天債、謝榮傑、林祥藝、鄧開發、諸葛軍、路達先、張學山等五、六十人，搶槍地點是：陳公祠、市人武部、臨桂縣人武部、公安局、游泳池、新桂林報社、專署公安處、專署交通局、郊區人武部等。

會議決定成立桂林地、市造反大軍“八一〇”革命行動指揮部，統一指揮搶槍行動。周兆祥任總指揮，劉天儀、謝榮傑、林祥藝、鄧開發等任副總指揮。下設作戰部、政工組（劉振林負責）、後勤組（甘恒彩負責）、軍械組等。搶槍的前線指揮：劉振林、諸葛軍；後線指揮：周兆祥、路達先等。指揮部設在師院辦公樓，並確定聯絡電話為六一——三和四七二三。會後又對搶槍作了具體分工：市公安局由謝榮傑、梁連珍、楊李培、趙永祥、黃仁儀負責；臨桂縣人武部由劉天儀負責；市人武部由洪善春負責；陳公祠由劉振林、林祥藝負責；專署公安處由鄧開發、諸葛軍、黃東紅、陳東來負責；專署交通局由張學山負責；郊區人武部由湯秋生負責；新桂林報社和游泳池由潘文源負責。從十至十九日，先後搶奪了桂林軍分區倉庫、靈川縣、臨桂縣、桂林市、市郊區人武部、桂林地區公檢法軍管會、市公檢法、市體委、獨立二師一營一連等單位各種槍支四千三百三十七支，各種彈藥二百九十二萬二千八百一十七發，各種炮二十門，炮彈一千一百九十發，小口徑步槍二百三十支，子彈二十二萬發，手榴彈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五枚，其他軍用物資八件和大批炸藥。“造反大軍”奪槍後，“聯指”頭面人物被迫撤離桂林市。（見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四·二二”攻打南寧工農兵飯店。廣西大學土木系教師楊朝海參加策劃和指揮。（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同日 署名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主辦的《廣西日報》第一期發表了“廣西聯指紅衛兵南寧大中學校指揮部”《給毛主席的致敬電》、《致革命讀者》，文內說：“廣西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煽動和蒙騙不明真相的群眾，於五月二十七日奪了軍管《廣西日報》的權，並盜用《廣西日報》名義非法出版報紙，為維護軍管尊嚴把奪去的報紙大權‘奪回來’”“在正式恢復軍管之前，《廣西日報》暫由‘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主辦。還發表了報社批陶小組寫的所謂《陶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總司令》。（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本月上旬，駐桂林一四一師政委張驥也做王希永的工作，要他支持“四·二二”和“老多”。中旬的一天，王荔又積極做王希永的工作。後來，王希永談了“四·二二”是“左派”，“聯指”是“保守”組織，以“四·二二”為主，聯合“聯指”的觀點，並說“‘四·二二’是‘造反派’沒有問題了。但陳（發洪）政委是帶隊的，他通不過不行。軍區黨委不說話不行”。王荔進一步煽動他反對軍區黨委，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要打破常規。過去我們認為對的，現在就不一定對，有些事黨委通過的，也不一定對；沒有通過的也不一定不對。山西劉格平奪權，軍區黨委研究不支持，所有的委員都不同意，就是張日清一人支持，結果張日清是對的”。王荔還挑撥說：“有的黨委裏邊，是不是都是好人，那也不一定，也得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檢驗。有些事不一定經過黨委的名義，有看法以個人名義也可以表態”。

王希永回京西賓館不久，王荔即用保密電話對王希永說：“蘭州軍區洗政委用寫信的方法向中央文革報告，請示問題很快，你是否把你的意見，用寫信的辦法，請參考”。之後，王荔又對王希永講：“那天當面沒好意思說，你走後從保密電話上告訴你，用寫信的辦法很快，可直接送到中央首長那裏。如你寫信，保證送到”。

在王荔的煽動下，王希永草擬了一封表態信。內容主要說：“四·二二”是“造反派”。過去覺悟低，認識遲，今後要堅決支持他們；“聯指”是保守組織，今後要做他們的轉化工作，要以“四·二二”為主，聯合“聯指”等。此信王荔看後，叫王希永“帶回去研究一下，能以軍區名義更好，否則以個人名義也可以”。還挑撥張日清、冼恒漢就是以個人名義向中央報告的。後來，此信由王荔交給戚本禹的秘書，因而在周總理五次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時，戚本禹表揚說：“王希永的態度比較好”。（見王荔專案材料）

十一日凌晨，周總理來電，要求圍攻廣西日報社大樓的“聯指”人員撤離。當天中午，“聯指”總部通知其在報社工廠辦報人員撤離工廠區。同時從工廠搬走部分機器、銅模、紙張、鉛字。包圍大樓的“聯指”武裝人員也後撤一段距離。下午五時，“四·二二”數百人沖入報社大樓增援，並運進糧食和副食品。（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 梧州市“造反大軍”舉行“向梧州軍分區‘走資派’猛烈開火誓師大會”。（見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十一至十九日“百色高中兵變”、“百色醫專紅衛兵”集隊遊行到軍分區門口靜坐，要求軍分區調查靖西縣“八九事件”。揪出凶手和幕後操縱者；說“靖西縣城八月九日‘四·二二’造反派的人被抓被打，是軍分區有人幕後操縱”。（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二日 原南寧市委副書記袁家柯到“四·二二”航運“工總”桂宏號船上，與航運“工總”頭頭趙壽民、邱振胎、蘇慶科、梁宅翠等人策劃搶軍用武器裝備。袁家柯說：“奪軍火列車的武器這條門路很好，這是奪取大量武器的一條重要門路。一車皮就解決了問題。”會後，袁叫邱振胎上岸聯繫，要爭取時間，趕快下手。邱當天即到新華街向“廣西工總”總部的楊朝海、蔡玉華、陸軍等人傳達袁的“指示”，要求馬上想辦法去搶一次軍用列車。楊等人立即表態，要同展覽館的“四·二二”指揮部頭頭章英等人商量。

十三日凌晨，章英從展覽館來到新華街，楊朝海、蔡玉華等把袁要搞軍用火車的想法告訴章英，章立即表示贊同，隨後糾集楊朝海、農烈、周志明、黃卓正、謝雲璋等人多次開會，統一思想，統一布置。最後確定：在金雞村附近搶劫援越抗美的軍火列車。章英負責全面指揮；“南鐵工總”謝雲璋等人負責提供軍用列車運行情報和組織攔車；楊朝海負責組織隊伍。會後，章英派張權到南寧航運“工總”通知梁宅翠備船待命。（據南寧市“文革”大事件材料）

十三日 鹿寨、臨桂、柳州和在桂林市外的“聯指”人員一千多人突然包圍封鎖了二塘火車站和炸藥庫，打傷“造反大軍”十三人，攔斷鐵路五十多米。（見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聯指”組織紅衛兵到廣西軍區警衛營搶槍，搶走步槍、衝鋒槍三百餘支、輕機槍三挺、六〇鋼炮一門和一批彈藥。同日還到區黨校分隊搶六九八四部隊的槍。（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五日“聯指”又到南寧軍分區、武鳴縣武裝部等處又搶得大批槍支和彈藥。（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六日晚，南寧“聯指”所屬“汽司”和“小八”等組織共三百多人，乘七輛汽車到武鳴縣人武部奪槍，驚動全城。搶得槍彈搬上車後未得開走，人武部向南寧聯繫，並同槍搶者協商後，把所搶得的槍彈交給武鳴縣“聯指”保管。當晚，武鳴縣“聯指”僅得武裝部的槍支未奪完，立即派人到人武部把未奪走的槍彈全部搬到縣人委。過後把所奪得的槍彈分發到縣委、人委等有關單位的“聯指”組織使用。（見武鳴縣“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晚上八時，“四·二二”頭頭章英接到鐵路謝雲璋派廖榮光送來的九〇二三次軍用列車運行情報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布置行動。當晚十一時左右，以章英為總指揮，楊朝海、黃卓正、農烈為副總指揮，糾集了三百餘人急速登船出發。十九日凌晨三時五十分到達金雞村。在八〇八點五公里處搶劫軍用列車。首先封鎖斷絕列車和車站的聯繫，隨即把鐵路旁的水泥標杆拔起，橫放在鐵軌上設置障礙，同時由一個叫凌衛文的人打紅色停車訊號，強迫司機停車。車停下後，把機車上的全部工作人員扣押，並看管隨車實習的越南司機黎紅香。接著，劉家仁、黃仲民等人用大斧頭、撬棍劈開車廂門。押運的解放軍再三說明，車上是抗美援越的炮彈，不能搶。但黃卓正、農烈等人不聽，當即搶去各種高炮、高機彈共四千三百二十三發。

這次搶劫軍火列車，中斷了鐵路交通，影響了其他車次的正常運行。更為嚴重的是使兩趟滿載軍用物資的列車也無法按時到達，嚴重損害了我國在國際上的聲譽。

八月二十日，中央文革來電責令“四·二二”如數交還搶去的炮彈，廣西軍區也做了工作，他們交回了四千三百零三發炮彈，尚有二十發一直未交。（見南寧市“文革”大事件）

同日 下午，廣西師範學院“老多”紅衛兵將桂林地、市領導幹部黃雲、徐為楨、陳秉德、李雲亭等戴高帽、掛黑牌押上汽車繞桂林主要街道遊鬥。爾後，多次開會批判市抓促指揮部主任陳秉德，陳被迫檢討，表示支持“造反大軍”。但“造反大軍”奪權後，為進一步掌握財政大權，於九月二十日改組桂林市抓促指揮部，由張永信（軍代表）、馮邦瑞、王同連、潘文源（總工會幹部），組成新的領導小組。（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十九日 王希永當著王荔的面，按照自己的觀點（即“四·二二”是“造反派”，“聯指”是保守組織的觀點），私自篡改了廣西軍區黨委起草準備上報中央的對兩派派態報告的主要內容，而後由王荔轉送中央。（見王荔專案材料）

同日 鄧開發、諸葛軍等人帶領桂林地專“造反大軍”，參加靈川縣“八一九”奪槍，奪走靈川縣人武部的各種槍支和炮一百二十六支（門），子彈、炮彈五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發。奪槍後返回桂林途中，打死前往阻攔奪槍的靈川“聯指”人員、商業局通訊員石瑞榮。（見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 為了壓垮對方，採取嫁禍栽贓的方法，富川縣“聯指”派的“水電紅司”頭頭馮德臻等用“四·二二”的名義，寫了兩張內容十分反動的大字報在凌晨貼到大街。當天是墟日，農民一見大字報是號召四類分子向貧下中農反攻倒算，要回土地房屋，就紛紛去“四·二二”總部，要“四·二二”總部的幕後指揮者黃秀出來辯論。何展興（“四·二二”主要成員）等當場挨了打。縣公檢法臨時專政委員會當即立案作反革命宣傳煽動偵查。“四·二二”一些頭目因此而逃出富川。二十三日，縣聯合總部（“聯指”）發出通輯令，通輯所謂書寫反動大字報的階級敵人——“四·二二”黃秀等人。使兩派矛盾進一步激化。對製造這一事件的馮德臻，在案情公佈後拘留一個多月無罪釋放。（見富川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凌晨一時，“四·二二”所屬南寧三中、二中、五中、九中等幾百名紅衛兵乘南寧“航運工總”三條駁船，去邕寧縣武裝部搶槍。船到八尺江口時，由邕寧蒲廟初中學生曹樹華、何顯光接應，帶領紅衛兵直衝武裝部，搶走各種槍支四百多支，各種子彈十三萬餘發。邕寧縣“聯指”組織力量在農慶江面攔截，在青山塔至柳沙河段又被“聯指”炮艇襲擊（據當時“聯指”戰報報導，“工總”船上被打死十三人、傷四十多人）。（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四·二二”“南疆烈火”劇組從桂林到北京參加“全國‘造反派’文藝會演”。（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初稿）

二十一日 凌晨起，“聯指”調集三、四百人攻打“四·二二”據點中華電影院、民族電影院、東方紅醫院等。廣西“聯指”頭頭李家海為總指揮。區農墾局葛禮帶領“聯指”紅星片隊伍攻打東方紅醫院；楊定勳指揮區農業廳“聯指”人員在附近理髮店樓上用機槍圍攻；區黨委組織部“東方紅”王文新等，也把民兵武器高射機槍拉去參戰。

下午二時，東方紅醫院、中華電影院、民族電影院被“聯指”佔領。

攻佔東方紅醫院武鬥中，醫院被嚴重破壞，打死十人（“聯指”死一人，“四·二二”死九人）。還有些“四·二二”人員，被當作俘虜押走後，在別處慘遭殺害。如區百貨公司李永亮因胃出血住東方紅醫院治療，被押走後毒打，二十日上午在區人委禮堂旁邊發現李的屍體。武鬥結束後，“聯指”把這十具屍屍和原醫院屍屍一具，共十一具，當作本派被“四·二二”殺害的罪狀，現場陳屍展覽。大造輿論。（見區農墾局、農業廳、商業廳、區黨委組織部、南寧地區等單位的“文革”大事記）

同日 下午，南寧駐軍和廣西軍區派出部隊在“四·二二”所佔領的解放路一帶警戒。同日起，“聯指”在中山路、南環路荷槍實彈挨家挨戶搜捕“四·二二”人員，抓走一千多人，關在區人委禮堂。（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二日 玉林專區“聯指”實施搶槍計劃，晚上十二時開始行動。由張平、李雄帶領三百多人進入獨立營。“四·二二”發現“聯指”搶槍後，即鳴鑼集中人員沖入獨立營。並與“聯指”警戒人員發生毆鬥。由於得到軍分區的默許，專區“聯指”僅用了二個小時就完成了搶槍計劃，運走獨立營三百多支槍和一批彈藥。與此同時，玉林縣“聯指”也搶走縣武裝部倉庫的武器彈藥。（據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三日 下午七時三十分，中國人民解放軍六九八四部隊進駐“四·二二”據點“造反樓”、“反修樓”和展覽館。（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聯指報》開刊，總負責人黃英勤，創刊詞宣稱：《廣西聯指派》系：掌握鬥爭大方向，把鬥爭矛頭始終對準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對準中南最大的走資派陶鑄，對準他們在廣西的代理人“伍、賀、霍、傅、謝、袁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同日社論《堅決打倒劉賊在軍內代理人》，提出在軍隊內部也有一小撮混進軍內代表人物，並表示：“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要把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到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終刊共出版七十三期對開版，散發全區各地，它大造派性輿論，宣揚極左思潮，特別是宣揚追查所謂“反共救國團”，起了更惡劣的作用。廣西大學教師李文光一直充當該報編輯。一九六八年四月以後，還負責該報編輯出版工作。（見廣西大學、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 北流縣麻洞地區發生黃、李兩姓宗派械鬥。（詳見北流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四·二二”辦的《廣西日報》因“八·九”武鬥設備被破壞，無法使用，停刊十五天後，開始出油印版。

同日 北流縣發生大武鬥。該縣“聯指”頭目黃乃豐、寧培琳、許武林、李雁、曹建綱等策劃，調動工人、農民約三千人向“四·二二”據點進攻，把“四·二二”據點全部掃光，把其據點人員俘去。當日全城戒嚴、進行搜捕。“四·二二”被殺九人（其中殺俘三人，搜捕殺六人）。回城的縣直下鄉工作隊“聯指”派，被突圍出去的“四·二二”刺死一人，工作隊人員鍾積鴻等十多人被押到義義村白鬚嶺烤煙爐監禁（“處這”時，黃乃豐等有關人員受到處分）。（見北流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四日 周恩來總理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陪同接見的有戚本禹、黃永勝。被接見的有廣州軍區陳發洪、廣西軍區徐其海、王希永，區黨委書記喬曉光、伍晉南、賀希明、安平生、霍泛（韋國清因病未出席）。

這次接見，總理指示幾點：停止武鬥；封存武器；歡迎出去的人回原單位；不強佔地方；不動員農民進城。

接見中，總理批評“聯指”代表說：“‘聯指’越搞越不像話了，老進攻人家，越走越遠了”。又說：“你們批判資產階級路線是不能抹煞的，支筆是可以的，打倒賀、霍是對的，但不能壓人家，壓人家就不對”。並對“四·二二”代表說：“‘聯指’過去壓你們不對；你們搶擄越物資不對；你們到京西賓館去，韋國清接見你們，把他打傷了，這就不對了”。“過去你們受壓，現在不能再反過來壓別人”。“中心問題是搞好與解放軍的合作。軍區過去支一派壓一派，現在軍區要支持你們，你們是造反派，軍區要端正態度，積極支持你們，也幫助他們（指“聯指”）”。並說：“軍區錯了，能改，就要擁護。提出一小撮口號，主要是指黨內，對軍隊不能用這個口號。……如果不是這樣，就要犯錯誤。你們對韋過火了，對賀、霍上當了”。“你們要把矛頭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派’，通過大批判，實現大聯合”。

接見中，總理還指示：恢復“工總”；馬上釋放罷一軍，丁友儀；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准攻佔鐵路；一派佔優勢的地方，對另一派不要壓；“四·二二”佔的展覽館，造反大樓，醫學院，廣西大學沒有糧，軍區給送去，但你們（指“四·二二”）不能搶；“聯指”扣醫療隊的人，要立即送

文軍區，保證他們的活動自由和人身安全；廣西軍區要教育各分區改正錯誤；對公檢法要一分为二。政法部門必須深入地方進行鬥批改，等等。

最後，“聯指”紅衛兵張小秀問：“我們是什麼組織？”總理答：“是群眾組織。繼續革命還是革命組織”。“聯指”代表團因此對周總理大為不滿，不辭而去。總理五次接見兩派代表後，“四·二二”派以響噓的“造反派”自居，乘機加強政治宣傳攻勢，壓“聯指”；“聯指”派則亂了陣腳，有的“倒戈”，有的發表聲明退出“聯指”組織；一些原表態“支左”的領導幹部有的也改變觀點，發表支持“四·二二”的聲明。“聯指”部分人對廣西軍區某些領導人當時的態度不滿，衝擊了軍區。（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南寧市、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八·二四”總理五次接見兩派後，總理把廣西聯絡組長王磊、副組長周楓找去（黃永勝、戚本禹在場），要他們做“四·二二”的工作。說：好幾個省的經驗證明，一宣布他們為“造反派”。也就是他們犯錯誤的開始。要他們不要去壓“聯指”，不要驕傲。黃永勝說：“‘四·二二’對軍區還有懷疑”。戚本禹說：“你們把軍區那個檢討報告給他們念一念”。戚還對王磊說：“我知道，你在‘四·二二’說話算數，你要多作他們的工作”。（見王磊專案材料）

同日 駐柳五十五軍等部隊發表聲明，支持柳州“造反大軍”。（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柳州軍分區決定：為“紅鐵軍”徹底平反，被捕人員一律釋放，恢復名譽（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柳州軍分區發布《關於取締反革命組織全國鐵路革命造反兵團紅鐵軍柳鐵合同工造反司令部的公告》，決定將廖志剛等十四人依法逮捕）。（見柳鐵“文革”大事記）

同日至二十八日 桂林軍分區開了兩次電話會議（二十四晚一次，二十八日晚一次），要各縣武裝部支持“造反大軍”派組織，“對‘聯指’一律不支持”。說“南寧‘四·二二’、‘桂林老多’組織，是中央認定了的革命造反派，凡是站在他們對立面的，象南寧‘聯指’這類組織，就不是革命造反派”。“桂林‘聯指’是個保守組織”。要“各縣必須和桂林‘聯指’劃清界限”，“並責令他們限期離開各縣返回桂林抓革命促生產”。

同日 柳江縣武裝部政委宋吉月在“聯戰”（屬“四·二二”派）駐地縣完中表態支持“聯戰”。二十五日“百萬雄師”（屬“聯指”派）把原來縣人武部授給他們的隊旗退還武裝部。二十六日“聯指”遊行。呼喊“打倒宋吉月”的口號。（見柳江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 張耀青選用桂林軍分區黨委的名義，給荔浦縣武裝部黨委寫信，要荔浦縣武裝部支持“造反大軍”組織，不支持原來所支持的“工農兵司令部”。同日，在經“老多”修改定稿編印的《學習》文件前言中，說“桂林‘老多’是最堅定的革命左派，他們的鬥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桂林‘聯指’是一個保守組織”。

為了使各縣武裝部倒向“四·二二”一邊，張耀青除親自代替資源、靈川縣表態支持“五一五”和“八一”造反大軍組織外，還調“老多”指名的八個縣的武裝部領導幹部，來分區解決所謂“調屁股”問題。這些領導幹部一下車，兩人被“漓江風暴”成員抓去掛牌遊鬥，五人被拔掉領章、帽徽，三人被送到“老多”組織接受所謂“教育”，軟硬兼施，從而達到支持“老多”組織，不支持“聯指”的目的。結果，七個縣的武裝部領導被迫公開表態支持“老多”，壓制“聯指”，引進嚴重後果。

五次接見後，桂林軍分區景伯承司令員傳來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三條指示：“聯指”組織“革與保”都對了，他們是擁軍的，抓革命，促生產好……。政委張耀青不傳達也不執行。

廣州軍區副政委陳發洪曾指示過張耀青：“‘老多’組織打倒韋國清的觀點不能支持，‘聯指’組織支持韋國清出來鬧革命這一點應該支持。”張耀青也不照辦。他在實際工作中，誰打誰也

支持，誰支誰他反對。（見“文革”材料10、21卷）

同日 梧州市工人醫院兩派發生衝突，互斥對方製造武鬥工具準備武鬥，居於少數地位的“大軍”人員在衝突中受傷。“大軍”一派人手持刀、矛、棍沖進工人醫院抓“打人凶手”，抓走了“大籌委”派幾個人，掛上打人凶手的牌遊街示眾，留醫病人被逼趕走，“大軍”乘勢佔了該院做據點。（見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兩派達成《立即停止武鬥協議》，並成立監督小組。

總理五次接見後，“聯指”成立揪叛徒聯絡站。聯絡站負責人王傳舜、於知本、周錫權等到北京搞霍泛的材料，又從解放前的舊報紙上查出“一一五事件的七十七人叛徒集團”。這些材料刊登於十一月十八日《廣西聯指報》。（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 容縣黎村“支多陣線”利用該日圩日沖入稅所打死幹部一人。當日下午又抓去赴黎村調查事件的武裝部人員。二十七日該組織又沖進黎村區公所搶去武裝部槍枝二支，機槍一挺，衝鋒槍三支和一部分子彈、手榴彈。（見容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 平樂縣的“造反大軍”、“聯指”兩派發生武鬥。在武鬥中雙方死傷三十五人，其中死十三人，傷二十二人（“造反大軍”死十一人，傷十八人），造成了嚴重後果。（見平樂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 富川人武部發出《最最嚴正聲明》，表明支持富川聯合總部，指責“四·二二”。少數派更加反對革委會和人武部。（見富川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兩派在北京達成《關於立即停止武鬥的協議》。在《協議》上籤名的是：廣西“聯指”赴京代表團：任樹人（南寧八一八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封金丁（廣西鐵路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潘立英（區黨委群眾接待站革命造反團）；廣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團：石懷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南寧八一三一部隊）、駱偉洋（廣西“工總”）、劉德勝（區黨委機關“倒海翻江”）；廣西軍區王希永。（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柳州地專“聯司”的唐彪、胡文治、劉小洛等，到柳州軍分區批了政委郭鵬，拉到柳州專區禮堂批鬥。（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三十日 桂林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畢可周到北京參加學習，到京次日即邀廣西軍區支左辦公室保衛幹事、韋國清的警衛董坤到王磊處，請示稟報桂林軍分區“調屁股”三點意見：①“調屁股”支持“四·二二”；②對造反派進行武裝保護；③要進行調查研究，摸摸情況。王磊當時表示要分區自己研究，實際上同意了分區的意見。畢可周還將“老多”整理的桂林軍分區第二次電話會議記錄材料給王磊看，王表示滿意，認為很好，還說要把此稿給中央首長看一看。（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0卷）

同日 桂林駐軍六九五部隊與桂林地、市造反大軍舉行所謂“擁軍愛民”武裝遊行。六九五部隊出動六十門大炮、一百四十輛汽車，滿載全副武裝人員參加遊行。這次遊行加深了桂林兩派的對立和支左部隊之間的分歧。（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四·二二”南寧地專“革聯”給南寧軍分區廣大指戰員公開信，指責南寧軍分區某些負責人秉承廣西軍區的意圖，打著支左旗號，推行一條所謂“拿槍的劉、鄧路線”，扶持“保守勢力”，瓦解“革命造反派”組織，借抬韋國清之名。幹鎮壓“革命造反派”之事，等等。（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三十一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發布[67]第二號命令：任命孫鳳章為柳州鐵路局軍管會主任，王國端、張豐昌為副主任。全文秀為南寧分局軍管會主任，黃世卿、翟元勳為副主任，曹銀忠

為柳州分局軍管會主任，王洪均為副主任，華慶國為都勻分局軍管會主任，程振堂、李觀明為副主任。（見柳鐵“文革”大事記）

本月 欽州縣“抓促指揮部”部署開展對國務院副總理陶鑄的大批判、大揭發、大鬥爭。（見欽州市“文革”大事記）

本月下旬，王荔去找“四·二二”頭頭劉德勝和廣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團團長楊福庭，告訴他們，中央不久將解決廣西問題，你們對韋國清要有幾手打算，現在只有一種打倒韋國清的打算，到時候被動，要早一點把自己的幾種打算寫給中央，供參考。根據王荔的意見，召開了代表團成員會議，由劉德勝和楊福執筆，寫了一個給中央的報告，對韋國清的問題提了幾種打算：一是堅決打倒；二是調出廣西；三是靠邊站；四是不能當廣西第一把手。劉德勝將此材料拿到王荔住處，交王荔轉中央。

在他們給中央的報告中，以及楊德華通過李剛所寫並轉中央首長的聲明中，要求王荔到廣西當革籌第二組長、副組長和革委會副主任。劉德勝、楊福庭還分別向王荔提出，要他到廣西工作。王厚顏無恥地說：“廣西情況已熟悉，認識不少人，我是願意到廣西工作的”。（見王荔專案材料）

本月，區農墾局“革命造反兵團”和“革命造反縱隊”在廣西“聯指”總指揮部的組織下，由葛禮帶隊，到長高嶺民兵倉庫和六九六六部隊搶槍。（見區農墾局“文革”大事記）

本月，廣西“聯指”召開“反對武鬥，制止武斗大會”，廣西軍區南寧駐軍代表在會上講話，說召開這個大會“是革命行動，好得很”，說“武鬥歪風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煽動起來的，是他們在背後操縱策劃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要堅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堅決捍衛執行十六條和毛主席‘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的指示。切實貫徹執行中央六六通令和廣西兩派達成的‘十點協議’，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把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一小撮走資派鬥垮、鬥臭。（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6卷）

本月下旬，北流縣成立“糾察隊”，負責執行人武部和“聯指”分配的執勤、站崗放哨、巡邏和抓人、禁閉人的任務。隊長王有志（地區水泥廠副廠長）。（見北流縣“文革”大事記）

本月，梧州地、市兩派群眾組織均進行了搶槍、武鬥。雙方人員均有傷亡。（詳見梧州地、市“文革”大事記）

九月

二日 南寧地區“政法兵團”召開政法口各戰鬥隊頭頭開會，研究決定砸爛公檢法，把地區公安處、地區人民檢察院、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三家牌子劈爛，宣布砸爛公檢法。（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三日 樂業縣黃鋼突然死亡。雙方都懷疑是對立派殺的，都以黃鋼死亡事件為藉口攻擊對方。“支黃派”舉行追悼會。抬著遺體示威遊行。“支黃派”抓了“打黃派”七名幹部所謂“殺人凶手”關押了七天。“打黃派”祝傳傑（縣革委常委）、姚勝學（公社武裝部長，已逮捕）派民兵強迫“支黃派”挖開黃鋼墳墓，把黃鋼屍體吹斷焚燒，影響極壞。一九六九年樂業縣委決定黃鋼本應劃為歷史反革命分子，鑒於黃已死不割不戴。一九八五年三月重新調查核實，認定黃純屬急病突然逝世；對在“文革”期間強加給黃鋼“叛徒”、“歷史反革命分子”、“走資派”等罪名均予徹底推倒，公開平反。（見樂業縣“文革”大事記）

四日 融安縣“造反大軍”常委、“紅革聯”紅衛兵頭頭賴培新、羅振元等帶領一夥人，到融安

縣武裝部搶槍。（詳見融安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梧州市“造反大軍”“兵管”了五坊路、南環路、大南路、河堤路、小南路，並在撫河口浮橋加高設哨，限制來往行人自由出入，梧州市大籌委於八月二十八日集結於梧州地專機關大院、外貿大院之後與梧州地專“大籌處”配合。專區公安處長、外貿政治部副主任、茶葉公司副經理、市副檢察長、衛生局副局長等活動於其中，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科長出出進進。市人委大樓成為市“大籌委”核心據點。市物價局副局長劉寶興參與了武鬥的指揮活動。王漁舟、張昕之在市“抓促”，支一派，壓一派，利用工作之便在經費上支持武鬥。市經委主任孫波去公路總段“避難”幫助總段“大籌委”配備武器彈藥，還幫助據點搞聯絡工作。（見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六日 灌陽縣到十月六日止有七個區五十四個鄉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殺害了一百五十八人。其中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灌陽縣武部召開了全縣政法、武裝幹部會議和抓促領導班子會議。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在會上說：“群眾自覺起來鎮壓五類分子是好事，是革命行動，幹部不要潑冷水”。“公安幹部不要出點子，不要插手”等話。會後共殺了一百零二人。這段時間是全縣殺人最多時期。十月二十六日縣公、檢、法軍管會在上報題為《我縣貧下中農處決五類分子的情況報告》中，說殺人的原因是：①已被打倒了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他們為挽救最後命運的掙扎，千方百計勾結社會上地、富、反、壞、右和一切牛、鬼、蛇、神，趁機進行各種陰謀破壞活動；②貧下中農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先發制人；③政法公安部門過去片面地強調了寬大政策，在某些地方放縱了敵人。引起群眾不滿；④湖南道江縣、永縣成批處決五類分子的影響。報告把亂殺人罪行錯誤地說成是什麼“就地處決、先發制敵革命行動……”。

在此期間，縣一群眾組織先後發表了“十評”，大造殺人輿論，說“貧下中農處決五類分子是革命行動”，“是群眾專政”，“是好事”、“群眾拍手稱快”，“為四類分子翻案的人決沒有好下場”等。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七日在灌陽縣人武部支持下，該群眾組織有各區及部分代表四十二人參加的灌陽縣貧下中農代表團，由該群眾組織負責人王化貢等帶隊，上訪了軍分區、廣西軍區和廣西革籌小組，為亂殺人辯護。回縣後繼續為亂殺人辯護。

在亂殺人中，灌陽縣一些領導幹部、群眾作了堅決抵制，但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原縣委副書記彭川，將殺人情況報告了廣西軍區，結果被關押五十多天，後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宣布為現行“反革命”；縣供銷社幹部陳玉良，將殺人情況反映到中央，又被當地將陳玉良投入監獄；一些殺人主謀、策劃者、凶手，卻因抓“階級鬥爭”有功，有的入黨陞官，有的被提為縣、區、社領導幹部。（見灌陽縣“文革”大事記）

五日 柳州“造反大軍”的“二七風暴”，“柳江紅總”乘四部汽車約一百二十多人，與來賓縣“革聯”一百多人匯合到來賓縣武裝部搶槍，武裝部宣講“九·五”命令，搶槍人員不理，搶走高機六挺、重機十五挺、輕機十挺、衝鋒槍十八支、步槍一百五十支、小口徑步槍十五支。六日柳州冷凍廠來二輛汽車（屬“造反大軍”第二次搶槍，不聽勸阻，不聽“九·五”命令，搶走一部分零星槍支零件、彈藥，搶走個人保管的手槍零件。柳州“造反大軍”二十多人搶走一些擦槍布、槍架及高槍子彈。（見來賓縣“文革”大事記）

六日 柳鐵“工機聯”、“柳江風雷”六十多人乘四部汽車至來賓武裝部，龍德源宣傳“九·五”命令不聽，沖入大門。一副科長被反剪雙手，搞噴氣式，鳴槍警告不聽反而向解放軍開槍，打死二人。解放軍被迫還擊，打死十四人（自炸死一人），傷三人，八人被俘，在逃跑途中爭車坐互打，打死群眾一人，一人小孩負傷。（見來賓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聯指”和駐邕解放軍在朝陽廣場舉行集會，歡呼中央“九·五”命令的頒布，表示堅決貫徹、執行“九·五”命令。會後，“聯指”繼八月二十六日、三十日上交第一、二批槍支彈藥後，又一次把一批槍支彈藥上交給廣西軍區。（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橫縣“四·二二”、蓮塘“革聯”、西津“工總”、橫州鎮“聯總”、橫縣“工總”、拉

浪“工總”和南寧“雄鷹”等三百多人，武裝沖進橫縣蓮塘區公所及區屬各機關單位，對蓮塘地區實行“兵管”、“兵訓”。綁架機關幹部、區武裝部幹事韋森等三十多人，搶去區武裝部各種槍支四十二支，子彈三千多發。從此“四·二二”在蓮塘區實行“兵管”，在區公所周圍拉上電線，製造武器，挑起武鬥。冒充“聯指”人員槍殺甘世成、石昌寬（“聯指”觀點），直至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橫縣“聯指”打散時止，除搶槍、打死人外，搶走糧食八十二萬多斤，以及其他公私財物價值三十四萬五千五百多元。（見橫縣“文革”大事記）

八日 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發表。文章對陶鑄同志進行了攻擊和誣陷。

同日 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發布《關於貫徹執行中央“九五”命令的命令》。（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同日 三江縣“造反大軍”、當地紅衛兵組織、龍城“湘江風暴”研究以紅衛兵為主，於當日晚包圍公、檢、法大院，進院後砸門、撬鎖，得六十五支壞手槍和一些子彈（武器已轉移埋藏，人員也無撤離），這就是三江第一次搶槍事件。（見三江縣“文革”大事記）

九日 三江“造反大軍”舉行武裝遊行，並將武裝部領導全部押去遊街。當晚，“聯指”人員基本撤離縣城，到三角渡的流送站集中。（見三江縣“文革”大事記）

十日 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發表關於撤銷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總”、“倒海翻江”等組織負責人的忠告、警告書》的公告。承認“這個《忠告、警告書》是錯誤的”，“抓住革命造反派的某些缺點錯誤，隨便上綱，壓制打擊革命造反派，加深了軍隊和群眾之間的矛盾”，決定將《忠告、警告書》撤銷。（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 至十三日 貴縣附近區舉辦農村學毛著輔導員學習班。在此期間，桂平縣“支韋派”二十多人在貴縣街上貼大字報，被貴縣“打韋派”圍攻，勸阻者被打傷，發展到用木棍、長矛武鬥，造成死亡三人，重傷三十二人，輕傷六十多人的第一次流血事件。（見貴縣“文革”大事記）

十二日 容縣黎村區“聯指”在頭頭章紹柏等的策劃下，調集四個排民兵，向“支多陣線”據點四維、溫泉等地進攻。“聯指”吃了敗仗，被打死兩人。（見容縣“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 以賴新為首的融中“紅革聯”紅衛兵，在融安的車渡碼頭拉劫由柳州開往十號信箱的三輛汽車炸藥雷管。一輛開往大寨給“大軍”；另一輛開往大巷給大巷“農總”；剩下一車由“紅革聯”紅衛兵處理。後來“造反大軍”將這批炸藥雷管做了手榴彈、地雷和所謂“二〇二炮炮彈”。（見融安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周總理第六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按軍區記錄：“四·二二”提出廣西日報社印刷機器有些零件被“聯指”拿走（“聯指”代表說，“是被民族印刷廠‘工總’拿走”），總理說這個問題“由軍區負責調查研究解決”。另據“四·二二”記錄：“周總理在所‘四·二二’彙報後說，油印的《廣西日報》是不可想像的，從來沒見過一張油印的報，這樣再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們委託省軍區把機器搞起來……”。九月十五日“四·二二”代表開始和軍區就恢復軍管《廣西日報》出版問題進行談判，並要求軍區按總理指示負責把報社機器搞起來。此後連續多次談判。（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公布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十五日 凌晨，桂林“聯指”武鬥人員與駐守在雁山的“造反大軍”的下屬組織發生了衝突，當場打死“大軍”和當地小孩各一人，打傷數人，並佔領了植物研究所、勞動大學、糧店、食品公司、商店、戰備物資倉庫及郵電局等。凌晨七時五分，支持“大軍”的六九五五部隊聞訊趕來，

“聯指”撤至白沙糧所，部隊繼續追擊，武裝衝突開始後，六九五五部隊拉來四門炮、二輛坦克，增加三個連的武裝力量前後共出動汽車四十八輛和十多輛摩托車。下午六時，“聯指”在當地“聯指”支援下撤出了白沙。“大軍”和六九五五部隊也相繼撤出，衝突結束。此次“聯指”死七人、傷十三人，解放軍死一人，“大軍”死一人，群眾死一人。（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十五日 南寧“聯指”延安片總指揮、農墾兵團頭頭葛禮同金光農場“聯指”頭頭策劃，搶奪金光農場民兵武器。由南寧“紅色公安”甘世棟按葛禮交給的奪槍聯絡圖，帶領八十多名武鬥骨幹，乘坐兩輛汽車前往。共搶得各種槍支一百三十五支（挺），各種子彈五千三百九十四發。（見區農墾局“文革”大事記）

同日 柳州“造反大軍”頭頭白璧平率領“工總”百餘人，“兵管”柳州市公安局一科，搶走香港年卷三本，公安部發的敵特資料三本，業務卡片五十至六十張，海外掛鉤案件資料二件。（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0卷）

十六日 廣西兩派達成《關於全上交槍支彈藥的七條協議》：

一、雙方保證九月二十五日零點以前，將武器全上交給軍區（分區、武裝部）、駐軍聯合收槍小組；

二、上交武器的範圍：①已奪解放軍的槍支彈藥和其它裝備；②城市民兵用的槍支、彈藥；③地方機關、廠礦、企業的原自衛武器；④體育運動用的槍支、彈藥、炮艇；⑤自制的武器；

三、任何組織與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由私藏、轉移或拒交武器。如有違者，由本組織同軍區（軍分區、武裝部）、駐軍一律強行沒收。如有違抗者，以違犯國法論處；

四、在武器上交過程中和上交後（九月二十五日零點後），如發現仍有使用武器行凶殺人者，即以現行反革命論處，由本組織協助軍區（軍分區、武裝部）、駐軍對其壞頭頭及肇事者堅決鎮壓；

五、除了廣西兩大派以外的各種和個人，外來廣西人員按本協議辦理；

六、上述協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

七、本協議由“安全監督小組”協助軍區、駐軍監督執行。

在協議上簽字的有：廣西“聯指”赴京代表團：任樹人、黎度光、潘玉臣、鄭國仰（柳州）。廣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團：農烈、陸軍、雷激、明在勝（柳州）。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協議》簽訂後，兩派陸續繳槍，但沒有繳完；有些地方還繼續搶槍。

十八日 上午十時，廣西軍區黃文棟從北京來電話，傳達歐致富司令員指示：總理六次接見，指示“桂林老多”協助部隊搞好鐵路運輸，請轉告在家首長，通知鐵路沿線武裝部和駐軍，搞好鐵路工作。（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1卷）

十九日 廣西師院“老多”六百餘人，分赴全州、柳州、都勻等地維護鐵路交通秩序。十一月五日回校，歷時四十餘天。（見廣西師範學院“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 桂林地、市“造反大軍”發出通知，改組桂林市抓促指揮部，由馮永信（軍代表）、馮邦瑞、王同連、潘文源（市總工會幹部）等人組成新的抓促指揮部。（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柳州“造反大軍”、柳鐵“工機聯”、柳州“地專總部”等群眾組織和駐柳六九七五、六九八四、一〇四八等部隊共一萬多人在鵝山體育場集會，進行軍民聯歡。五十五軍孫鳳章在大會講

話，他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保護你們……我們誓作為你們的後盾，用武裝保衛你們，與你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三十一日 柳州“造反大軍”、柳織、柳州地區一些群眾組織及駐柳部隊空軍教導團、支左辦公室、柳州軍分區、武裝部等軍民五萬多人，在柳州人民廣場集會，聲討、揭批劉、鄧、陶的所謂“罪行”。與會部隊領導講了話。（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二日 周總理第七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按軍區記錄：（“四·二二”代表提出解決廣西日報問題三條建議：第一、軍區檢討在廣西日報上的錯誤；第二、改組軍管小組，撤換石勇；第三、軍區負責把零件找回來，爭取十月一日出版新華電訊。‘聯指’代表提出外部駐報社人員應該撤出。‘四·二二’代表即說以上三條做到，我們可以撤出”。（周總理聽後說：“是啊！報社內部要聯合起來。軍管小組不稱心可以換一個嘛。缺少鉛字可以互助和調劑嘛”。（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二十三日 梧州軍分區宣傳車上街宣傳、散發“九·五”命令、“九·一三”通知和軍分區呼呀書，在梧州市大東酒家門前，被梧州“造反大軍”圍攻，汽車被毀壞，車上宣傳品全部被燒毀。中午，在街上值勤的解放軍巡邏隊，也被“造反大軍”圍攻。（見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柳織“工機聯”代表楚樹庭、陳曉明，“鋼聯指”代表王永紅、石寶偉，南寧“紅色鐵路”代表曾永敢，南織“工總”代表李世德，廣西師院“老多”代表李日明、廣西軍區副政委王希永，六九五五部隊政委張驥，六九七七部隊參謀劉翔甘，在北京簽訂了“關於保證廣西境內鐵路運輸暢通的協議”（共八條）。（見柳州“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 由於容縣黎村兩派武鬥逐步升級，容縣人武部組織兩派談判，解決封存武器彈藥問題。但“支多陣線”不僅拒絕出席談判，而且派武鬥人員韋成東、韋世先、韋世安、韋德讓、江文芳等人埋伏在同和公社橫塘坳處，襲擊“聯指”赴縣談判代表，併當場把帶隊去談判的區武裝部幹部馬耀炎，“聯指”談判代表梁英棋以及同行的六振鄉幹部植慶業、植竹業等四人打死，另一談判代表林理華被打傷。

當晚，黎村“聯指”頭頭孔令熾等策劃報復，由軍紹柏、朱家永等人把抓到的“支多陣線”成員江文初等六人殺害。（見容縣“文革”大事記、大事件材料）

同日 橫縣陶墟區“四·二二”黃揚參、劉增全帶領三百多人到蘆村區石塘墟，和石塘墟“四·二二”共四百多人舉行“兵訓”大會後，攻打稅所、供銷社和郵電所。蘆村區武裝部長韋鳳甘等帶領武裝民兵班將“四·二二”包圍，晚上，又增調武裝民兵六百多人，在石塘公社周圍繼續搜捕。黃揚參、劉增全被打傷，陶墟一百多“四·二二”群眾被抓，逐一審訊後釋放。（見橫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七日 廣西軍區政治部發出《關於協助“桂林老多”執行任務的通知》。（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二十八日 廣西軍區召開“為工總恢復名譽大會”。廣西軍區黨委在會上作檢查，說“砸原‘工總’是軍區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突出表現，是軍區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個嚴重錯誤”，“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表示對“廣西工總”廣大群眾公開道歉，再一次宣布恢復“工總”名譽，堅決支持“工總”和“四·二二”的一切革命行動。（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6卷）

本月，住區黨委大院的廣西大學“能鬧”組織的一些學生，抄了伍晉南、賀希明的家，抄去一批衣物、照相機、手錶等貴重物品。（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三十日 玉林“聯指”派紅衛兵操練被“四·二二”派“個佩戰鬥隊”毆打，打傷一百多人，重傷十人。（見容縣“文革”大事記）

十月

一日 南寧市十五萬軍民在朝陽廣場隆重集會慶祝國慶。廣西兩大派組織聯合歡度國慶，這是兩大派實現“革命大聯合”的良好開端。邁出了可貴的一步。（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至四日 全州縣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大隊會計黃天愛和“聯指”組織負責人劉性林、黃有生等人策劃殺地、富問題。黃介紹了湖南道縣殺地富情況，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鏟草除根一掃光”，還宣布“不准通風報信，誰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樣”。最後決定採取坑殺的辦法，即將人推下黃瓜沖山洞，並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務，各村自報名單，由楊隆義登記。會後，黃天輝連夜帶民兵去抓人，抓到後立即押送黃瓜沖洞，強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願跳，被黃用棍打後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劉貴元在坑口向黃求情，請求留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愛人，說“天輝，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個，我老婆也有一個，我抱一個跳下去，留一個給我老婆”。黃說：“不行”。結果劉被迫抱著兩個小孩（大的三歲，小的一歲）跳下坑去。

從十月三日凌晨三時至下午三時，被黃天輝帶隊坑殺的地、富及其子女蔣佐卿、將其能等共七十四人。四日又坑殺二人，共七十六人。被坑殺的七十六人中，最大的六十五歲，最小的不足一歲，七歲以下的十人，最多一戶被殺九人（一九八三年“處遺”時，黃天輝被依法處決）。（見全州縣“文革”大事記）

三日 都安縣城發生轟動全縣的武鬥流血事件。在支左人員支持下，“聯指”調動民兵進攻打“四·二二”據點。此次武鬥死五人（其中二人在武鬥時被打死，二人被俘後槍殺，均系“四·二二”派），民房炸燬九間。攻下據點後抓了一些少數派的人。“處遺”時對策劃人員進行了處理。（詳見都安縣“文革”大事件）

同日 全州縣石塘“造反大軍”遊行，理由是：大軍搶的石塘區武裝部的槍又被“聯指”搶去，並捉了他們的幾個人。遊行隊伍與對立派發生衝突，“聯指”下令用槍打，於是當地打死遊行者和群眾八人，傷十七人。指揮打擊者“處遺”中已被判刑。（見全州縣“文革”大事記）

四日 廣西“聯指”召開“堅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掀起鬥私批修高潮誓師大會”，並歡送廣西大學“能鬧”和勞動大學“星火燎原”、“小八”、民族“三七”等組織的師生回校復課鬧革命。廣西軍區、南寧駐軍代表在會上講話。（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6卷）

六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鬥私，批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針》。社論公布了毛主席最新指示：“要鬥私，批修”。十二日，又發表社論《全國都來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提出要“以‘鬥私、批修’為綱，普遍地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當天，南寧市委“革命造反兵團”首先辦起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駐靖西縣支左人員伍祥勝、曾克昭，盜用“四·二二”靖西“造反大軍”名義，由曾克昭執筆寫了一封信寄給黃小林（靖西縣委書記），要黃站到“四·二二”一邊支持靖西“造反大軍”。此後，“聯指”派便以此信為藉口，誣陷黃小林參加派性活動，大造輿論，說什麼黃小林是靖西“造反大軍”的總後台、總指揮。從而激發了對黃小林的憤恨，以致將黃活活打死。（見靖西縣“文革”大事記、黃小林被殺調查報告）

七日 從本日起，被迫逃離在外的桂林“聯指”人員陸續回桂林。（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八日 梧州市的“聯委”（實際是同一派的“大鑿委”與“無產兵”聯合組成，得到軍分區支持）當日上午遊行，隊伍到大東酒家門前被“大軍”阻擋，雙方摩擦。中午“聯委”二百多人用二輛汽車開路，以抗議“大軍”打傷戰友為名，在汽車上向“大軍”據點擲磚頭、酒瓶，“大軍”還

以石頭、瓦片，發展到開槍造成傷損，解放軍前來制止，繳了“聯委”六支手槍還有手榴彈、匕首、子彈。晚上“大軍”代表七人至軍分區要求處理開槍殺人事件。答復深夜不辦公，不予接見。（見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九日 廣西“四·二二”召開“歡送一中‘指點江山’紅衛兵回校復課鬧革命大會”。廣西軍區、南寧駐軍代表和六九八四部隊一排長在會上發了言。（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6卷）

八日 融安“造反大軍”包圍河勒，奪民兵的槍（河勒民兵排當時是柳州軍分區的重點，配備武器精良，有四十支新式步槍，四支衝鋒槍、三挺輕機槍），河勒民兵進行了還擊。武鬥從八日晚打到九日早上六時。河勒民兵排退到小洲駐紮防守。（詳見融安縣“文革”大事件）

十一日 凌晨三時，以李劍光“四·二二”大軍“農總”為主，夥同大將、板櫬、雅瑤、長安“四·二二”大軍武裝約一個連沿河勒、鳳凰村公路沿線向小洲逼圍，在小洲地界受到了阻擊。戰鬥到四時停止。雙方各死二人。“四·二二”大軍在撤退中被俘六人。“聯指”民兵把被俘人員交武裝部。由融安“四·二二”大軍“農總”代表領回。（詳見融安縣“文革”大事件）

十二日 柳州軍分區高副參謀長帶四人到融安處理這一事件。到後，融安造反大軍“圍攻”縣武裝部，要求：制止武鬥；給死者安葬費；並提出“大軍”不能交槍。十三日，“大軍”還要武裝部參加追悼會，並打傷縣長和會計，逼要埋葬費五百元（後人委會計批了）。

柳州軍分區為此請示廣西軍區，是否可抽調五十五軍負責制止武鬥的一個連或兩個班，去融安制止武鬥，協助收繳“大軍”武器。

十四日 廣西軍區吳副司令員對融安問題，指示柳州軍分區：

1、告訴大軍，去農村奪民兵武器，首先進攻人家，是違反“九·五”命令和“六·六”通令的，武鬥的責任應由挑起者負責。他們要求軍分區和武裝部制止武鬥，自己首先應停止武鬥，交出武器，堅決執行“九·五”命令和“六·六”通令。

2、回縣城搞革命，不要去農村干涉，要遵守農村十條，死者安葬者自己負責。

3、召集兩派談判，做好思想工作，解決問題，不要輕易動用部隊；如果確實需要部隊，請分區和五十五軍商量解決。（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9卷）

十六日 融水等五個縣的“造反大軍”在柳州專區文工團建立“柳州地區造反大軍聯絡站”，後又把聯絡站改為“廣西‘四·二二’柳州專區各縣革命群眾組織革命大聯合籌備處”。有融安、武宣、柳城、忻城、環江、羅城、三江等縣的人參加。

“聯委”中的核心成員有：融安塗世華、武宣譚詠證、忻城胡鎮興、環江譚駒，以及柳州地、市“造反大軍”的黃加尤、王家齊、高壽儀和白璧平。（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十月七日《關於按國務院規定實現革命大聯合的通知》，桂林各學校，企業單位紛紛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鬥私批修”，按系統、按行業、按班級搞大聯合、“三結合”，成立“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基本上由“造反大軍”一派組成），並著手籌備成立革委會。“三代會”於一九六八年“八·二〇”行動後又進行改組（基本上由“聯指”一派組成）。（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十六、十七日 崇左縣召開全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會。會上是“聯指”曾多次組織批鬥了縣委方芝棟的所謂“假黨員”問題，並強迫其承認和寫出交待。十九日，發現方芝棟死在左江河邊。

（方芝棟是否“假黨員”問題。在方死後，縣人武部、地區組織部及有關部門組成調查組進行核實。結果證實方芝棟不是假黨員。崇左縣革委會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作出了為方芝棟徹底平反昭

雪，恢復正式黨員的名譽，並召開了追悼會，表彰了他的生平事跡。）（見崇左縣“文革”大事件、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 柳州“聯指”組織和駐柳部隊、柳警備司令部、市武裝部等近萬人在人民廣場開會，表示響應中央號召，按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十九日 百色“聯指”羅揚梓、劉托聰、盧偉等人研究，派梁向前等三人到南寧，把原百色地委書記、區黨委農村政治部副主任楊烈揪回百色批鬥。十九日中午，楊烈被帶到百色，住在地委院內。“四·二二”派認為“聯指”對楊是明批暗保，即把楊烈搶走，拉到百色高中批鬥。批鬥中拳打腳踢，晚上睡在教室蓋麻袋過夜。“聯指”抗議“四·二二”搶走楊烈。後雙方達成協議，輪流批鬥。二十四日，“聯指”在燈光球場召開萬人大會批鬥楊烈。區黨委農村政治部、區農辦和區貧協籌備聯合兵團也派人到會參加批鬥。二十九日，“四·二二”派在百高批鬥楊烈。（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造反大軍”的“五敢”、“鐵拳”六百多人沖進警司責問警司支派不支左等問題並打傷數名戰士，抓走政治部副主任劉英山，搶走手槍二支，子彈四十發。（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二日 柳州“造反大軍”的“紅總”、“政治聯總”等五千多人在地區禮堂開會，提出“堅決砸爛舊公檢法”。（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過了兩天，柳州“聯指”群眾約六萬人在人民廣場集會，提出“堅決打倒伍晉南，徹底砸爛舊市委、舊公檢法”。（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三日 恭城縣“聯指”總部，總結所謂“成績”，印發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罪行”材料共九集七千七百份；印發了縣委“走資派”的“罪行”材料十集五千餘份；批鬥縣直黨權派五十六人。（見恭城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鍾山縣人武部支左人員周善立、“大籌委”（六月二十九日鍾山革命大聯合籌備委員會成立，簡稱“大籌委”，名為大聯合實質是一派的群眾組織）劉星波等人到石龍主辦的《經農戰報》，以石龍區《衛東彪》“野戰軍兵團”的名義（經“處遺”查實），發表了題為《石龍造反大軍是土匪大軍》的給貧下中農的一封信。挑撥說“鍾山石龍造反大軍受反革命組織——‘五一六’、‘反共救國軍’的操縱，正在這槍、磨刀、組織暗殺團，準備奪槍，挑起大規模武鬥，對貧下中農、土改老根子、革命幹部下毒手”。煽動要行動起來，堅決和土匪大軍決一死戰。為石龍、董家洞及鍾山各地的兩派相爭推波助瀾，製造緊張氣氛，結下惡劣後果。（見鍾山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四日 桂林“聯指”和“革聯”成立了“桂林市無產階級革命大聯合委員會”（簡稱“聯委”），主要負責人：曹鐵軍、李年生、柴儉、孫寶山，於十一月十八日佔領市委機關院子為據點。（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靖西縣委機關《一月革命》兵團組織對黃小林批鬥大會（共二次），鬥爭黃小林十多年來一貫“反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月革命》兵團又編發所謂《黃小林反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罪狀》。影響極壞。（見靖西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中、小學都要復課鬧革命》。

二十六日 柳州兩派群眾組織代表和駐柳部隊代表，在北京達成《實現革命大聯合八條協議》。在協議上籤字的有：駐柳部隊支左領導小組孫鳳章、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才世傑、柳州支左辦公室副主任劉祥、柳州“造反大軍”代表白璧平、明在勝；柳州“聯指”代表王克明、紀剛。（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 北京來電話傳達總理指示：參加護路的桂林“老多”要回校復課鬧革命，不參加護路。

三十一日 廣西“聯指”發出《關於堅決打倒假黨員、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伍晉南緊急動員令》。（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本月底，桂林市“聯指”由李年生、盧向平發起成立民兵師，約五千人，均系部隊復員、轉業軍人組成。民兵師下設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五個團和一個獨立營。師長孫志祿（市一建工人）、政委袁國湘（綜合電機廠工人）、參謀長盧向平。

民兵師成立至一九六八年“八·二〇”後解散，歷時九個多月。（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本月下旬，“廣西工農兵業餘文藝造反總部”接受“天津業總”、“上海工總司”、“湘江風雷”等組織的邀請，指派梁寬光（南寧船廠工人）、雷群策（市郊社員）、趙永茂（南化工人）去天津參加“全國工農兵業餘文藝戰士座談會”。後因會議未準備好，只參加一個預備會即返邕（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等人把這個未開成的會，定為“黑會”，《新時代的狂人》定為“黑戲”，廣西又把《南疆烈火》打成“黑戲”，“國際共畫廊”列為“黑畫”）。後來魏佑鏞在南寧三代會委員會上說“黑會”、“黑戲”是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梁寬光等三人被關入監牢。（見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本月，桂林地區的全州、灌陽、平樂縣和玉林地區的容縣、平南、博白等縣，出現了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和“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等非法組織，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手段殘忍，後果嚴重。僅桂林地區的全州、灌陽等縣，從九至十二月，共殺死地、富及其子女四百四十人，其中殺人最多的灌陽縣殺了一百七十四人，次為全州縣，殺了一百二十七人（詳見全州縣、灌陽縣“文革”大事記）

本月間，平樂縣源頭區源頭鄉首先成立“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在成立大會上殺五人。接著同安等區的鄉成立“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亂抓、亂殺人之風四起。一群眾組織寫出：“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就是好”的大幅標語，以示支持。（見平樂縣“文革”大事記）

十一月

十月至本月，富川一些左思潮嚴重的人和個別不純分子煽動殺人。其中古城區殺七人，自殺一人；福利區在鬥爭中打死十八人，丟入巖洞淹死十人，失蹤二人，自殺十八人；竊領區殺十九人；朝東區殺掉六人，自殺五人；富陽區打死一人，自殺二人。全縣合法殺死、打死、丟巖洞淹死共六十一人、失蹤二人、自殺二十六人，總共八十九人。對有關人員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個別受人受刑事處分。麥領區把死者家中雞鴨捉殺全村吃“太平酒”，麥領區壩塘村紅衛兵政委唐吉學召開人民法庭大會，將五戶地、富十三人判處死刑殺掉。十三歲的唐吉全沒有被砍死，半夜爬到縣公檢法軍管會，唐吉學又從軍管會要回殺死（“處遺”時判刑）。（詳見富川縣“文革”大事記）

一日 欽州縣“聯指”根據廣西“聯指”的布置，成立了“欽州縣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簡稱“貧聯”）。縣“貧聯”成立後，全縣各公社也相繼成立“貧聯”。縣、社“貧聯”的成立，為欽州的武鬥，為全縣亂殺人風的泛濫，起到了組織和力量的準備作用。（見欽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柳鐵兩派聯合召開了慶祝“大聯籌”成立大會。大會給毛主席發了致敬電，通過籌委會通告，氣氛很好。（見柳鐵“文革”大事記）

本月初，柳州“造反大軍”地專總部在地區電影公司召開了一次常委會。黃萬星在會上說：“戴春濤建議我們‘地總’常委研究吸收一些地專領導幹部參加‘地總’各組當參謀”。會上討論

通過任命了劉興民為參謀組組長，李一峰為副組長，林海、夏玉清、沙君濤、梁仲彬、崔志軍、李彬等為參謀組成員。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給“地總”五人核心小組（即核心常委高壽儀、戴世鶴、黃萬星、陳能榮、陶顯）當參謀。（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月初，中央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歷時三個月，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結束回桂。參加學習班的有廣西兩派代表、“三支”“兩軍”解放軍和各級地方領導幹部。（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日 欽州“四·二二”搶走副專員閻慶身，不給他上北京學習。（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9卷）

三、四日 玉林“四·二二”的“紅工總”到容縣黎村和聯糧站，強行把和聯糧站的十六萬斤糧食運到黎村（倉庫）。由黎村“支多陣線”陳錦綿、梁福可指揮，帶領“支多陣線”民兵分三路進入和聯，武裝保護運糧。黎村“聯指”發覺後，派周連昭帶民兵攔截，截住兩輛汽車，並把司機扣留。（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容縣黎村武鬥事件）

五日 黎村“聯指”頭頭孔令熾帶領一個民兵排，攻打黎村，被“支多陣線”擊潰，孔本人被殺害。

六日 黎村“聯指”全面進攻花果山，死二十五人，被俘五十一人。七日晚，“支多陣線”把被俘的天堂林場工人勞卓南殺死，並活埋學生關立華、黃志成（黃未死，後逃脫）。其餘人員遊鬥後釋放。

當天，黎村“支多陣線”又誣黎村鄉山根二隊隊員、共產黨員、勞動模範區振才“窩匪”（指“聯指”）和“收藏槍枝”，把他抓去關押、審訊、批鬥。十三日，被楊奕芳、程桂庭、姚達彩等用大刀、長矛、木棍活活打死。（見容縣“文革”大事記、容縣黎村武鬥事件）

同日 區直召開批判“劉三姐”大會。“聯指”文藝批判聯絡站主持。（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七日 容縣“聯指”召開全縣各區武裝部長及“聯指”頭頭會議，重新布置武力解決黎村“支多陣線”問題。羣眾主持會議，彭昭南在會上講話。會議決定從石寨等六個區抽調五百多民兵進城，以防黎村“支多陣線”來犯。（見容縣黎村武鬥事件）

八日 廣西軍區作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檢查報告》。《檢查報告》說：“我們的錯誤對反對韋國清的‘四·二二’接近少、支持少，實際沒有給予支持”，“對他們一些錯誤看得過重，且在政治上壓制了他們。突出地表現在五月二十九日南寧警備司令部、政治部發出《致新“工總”、“倒海翻江”某些負責人的忠告、警告書》和六月二日發出的《致“四·二二”火線指揮部的通告書》”，“我們已正式聲明《忠告書、警告書》、《通告書》是錯誤的，應予作廢”。《檢查報告》又說，“在執行軍管任務中，我們對群眾態度有錯誤”，“例如軍管的《廣西日報》有的文章有缺點錯誤”，“小將們對此和軍管《廣西日報》的工作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和抗議，我們沒有虛心聽取他們的善意的批評，認真地、及時地檢查錯誤，承認錯誤，相反對小將們卻採取了一些指責、誣責等錯誤做法，同小將們對立”。“在對待群眾態度上，我們犯了嚴重錯誤，以致使《廣西日報》的問題長期未得到解決，我們負有嚴重責任”。“由於我們在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做法，激化了兩派之間的矛盾，使南寧市和廣西各地的鬥、批、改受到了影響”。

當天“四·二二”派上千人到廣西日報社，用三天時間，突擊修復武鬥破壞的圍牆、廠房及機器。

在此前後，“聯指”及“四·二二”均先後到報社工廠、倉庫拿紙和其他物資。（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兩派在北京達成關於《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的十條協議》。(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毛澤東親自批發了《中央關於處理廣西問題的決定》、《廣西兩派大聯合協議》、《成立廣西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三個文件(簡稱“三個照辦”)。十一月十九日,周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安徽廳第八次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的負責同志。周總理代表中央向代表們對《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逐段地進行說明。中央認為:“一是韋國清、伍晉南、安平生同志《在廣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聯名檢查是好的,中央同意他們的檢查;二是廣西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三是中央決定建立由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鏞、孫鳳章、焦紅光、郝忠雲、王斌、伍晉南、安平生同志以及有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九日 二十三時至十日凌晨一時,周總理接見柳州鐵路局兩派代表及鐵道部軍管會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全體同志。陪同接見的還有李富春、李先念副總理和鐵道部軍管會主任蘇靜、副主任楊傑等。(見柳鐵“文革”大事記)

同日“聯指”十萬多人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徹底批臭“劉三姐”堅決打倒伍晉南大會。(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十二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對《關於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十條協議》加了批語。毛主席指示:照辦。(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轉批韋國清在廣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檢討。毛主席批示:照辦。(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十三日 全州縣“聯指”的負責人蔡輝龍在全州縣城開大會,槍殺了工人蔣偉雄。在全州縣造成嚴重後果。蔡輝龍是全州縣派往桂林市武鬥的民兵團團長、桂林民兵師師長;在桂林武鬥中全州民兵團死十八人、傷二十一人。蔡是自治區革委委員、全州縣“聯總”的司令。“處遺”時蔡被判處徒刑。(見全州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四·二二”廣西工人革命造反總部、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紅色工人革命聯合總部,達成《關於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促進和實現兩派工人組織革命聯合的協議》。在《協議》上籤名的有:“四·二二”廣西工人革命造反總部:秦裕堅、葛元祚、周康、馮焜燭、石兆斌;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紅色工人革命聯合總部:韋世經、徐德明、鄧池禮、周月明、謝泉星;廣西軍工和駐軍代表:宋長髮。(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晚,玉林縣福綿公社“四·二二”“兵管”了福綿街,並繳去福綿“聯指”民兵槍六支,子彈四十發,縣武裝部政委王振鋒連夜調南江、仁東、新橋、樟木、成均等公社和六萬林場民兵千多人,配合福綿“聯指”民兵,對“四·二二”派的福綿、福東、福西三大隊據點進行包圍。縣武裝部派王吉增督戰。總指揮蘇明槐,副總指揮鍾耀光,主要策劃者周垂堂。十六日攻佔全部據點。這次事件共死二十一,搜查抓去群眾一百多人,其中搜查時抓到就地槍殺的十一人。抓到關押審訊後槍殺的六人。事件主要策劃、參與者蘇明槐、鍾耀光、周垂堂等,在一九八四年“處遺”時均受到法律制裁。(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 容縣梅梅區召開抓促會議,傳達縣“聯指”會議石寨區介紹的破獲“反共救國團”和實行“群眾專政”經驗。該區於十四日召開群眾專政大會,當場打死十六人。該區民兵營長李超文將周恒志押送回家至周家後姦污其妹周惠英。事後又借“群眾專政”之機將周惠英之兄和父殺死。十一月二十日晚李超文又姦強了周惠英。以後周家又多次被抄家劫走財物、拆去房屋;周惠英的母親被迫投河自殺。一九八五年區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李超文死刑。(見容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下午七時半,毛主席、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

了正在北京學習的軍隊幹部和在北京開會的一些省、區的軍隊幹部和一些省、區赴京彙報文化革命的兩派代表團。廣西兩派赴京代表團全體代表、軍區、軍分區來京的同志也參加了接見。(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初稿、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6卷)

本月中旬容縣自良區召開抓促會議,介紹“專政”經驗。於十六日召開批斗大會打死三人。該區二十日前後又採用類似方法打死十人,二十二日,容城鎮東鄉召開群眾大會打死十人,彭昭南、韋浩芝策劃在容中大操場開萬人大會殺死五人。(見容縣“文革”大事記)

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平南縣大安區武裝部長楊明,“聯指”頭頭譚潮東,用召開“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堅決擁護中央表態支持韋國清同志站出來鬧革命誓師大會”的名義,組織武裝民兵和社員一千多人在大安鎮集會示威遊行,沿途拆除“四·二二”的武鬥工事——街道柵欄等,“四·二二”派的人丟兩個自制手榴彈,楊明開了槍,幸未傷人。二十二日下午,人武部就調動丹竹、鎮隆等區的一百多武裝民兵到大安。二十三日早,由杜玉傑(縣人武部負責人)、楊明帶領各區武裝幹事和民兵視察大安圩地形,部署兵力。下午五時,由杜玉傑等指揮“爆破造反大軍總部”大門,進入“大軍總部”後逐家搜捕,捉到“四·二二”頭頭拉出門外就殺,其餘的關到舊區委會的監牢去。二十五日晚,搜捕到大軍頭頭賓仲生,把賓打死。後來在區公所開會決定槍殺李大東、莫雨濤等八個俘虜。這場武鬥共打死和槍殺二十二人,傷約二十多人,吃去國家大米四萬五千斤,豬肉一萬四千斤,損失總值達三萬元以上。(詳見平南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二日 桂林“造反大軍”三萬多人在市體育場召開“強烈抗議桂林‘聯指’破壞《十條協議》的大會”。會後舉行示威遊行,途經市委大院“聯指”據點南面圍牆邊時,遊行隊伍中有數人被“聯指”從牆內扔出的磚塊打傷,頓時隊伍起鬨。一些人湧進了九九分隊駐地,想通過九九分隊圍牆沖進市委機關內,被九九分隊武裝人員阻攔。

遊行隊伍進入警戒線後,九九分隊有的戰士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機床廠工人王佔金、工運公司趙巧荀、毛巾廠劉錫光三人,打傷數人,遊行隊伍迅速散離現場。

事件發生後,六九五部隊很快趕到現場,將九九分隊人員撤到奇峰鎮六九五駐地辦學習班。避免了事態的發展。(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資源縣中峰鄉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地主子弟二人以“亂搞男女關係,污蔑毛主席等罪行”判死刑,實行槍殺。從此資源農村開始亂殺人。十二月底至一九六八年初,在梅溪區、裏公區殺了二十多名地富及其子女。(見資源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三日 一時三十分至二時三十分,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廣西革籌小組和廣西兩派代表團核心小組成員(陪同接見的有戚本禹、餘立金)。談八個問題:(1)關於兩派問題;(2)關於貫徹《十條協議》搞大聯合問題;(3)關於《廣西日報》問題;(4)關於軍區的檢查報告問題;(5)關於幹部問題;(6)關於桂林市武裝部九九分隊開槍問題;(7)關於柳州造反大軍搶奪修築國防公路的炸藥問題;(8)關於外地人員來南寧問題。(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巴馬羅皮公社支書藍昌才布置民兵將黃彩良殺害並告訴民兵“回到公社彙報就說他在路上搶民兵的槍才把他殺掉的就成了。”這是巴馬殺人的第一槍。(見巴馬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四日 柳州市“造反大軍”“捍武”“衛東”等為營救戰友,近百人到警司、分區要求釋放原手工業局“捍武衛東”頭頭(胡登星)進行靜坐堅持到二十八日下午離去。(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 合浦縣廉州中學等校“四·二二”學生到縣人武部門口靜坐(多時達二千多人,少時有數百人)。要求縣人武部採取措施:全面封存槍枝,為“四·二二”派的韓馮初平反(當時韓被公安局拘留),實現兩派在北京簽訂的協議,撤銷原公安局長李登復於六月二十八日簽發的《當前

“支伍”派活動的一些情況和意見》（《意見》中說：合浦地區“支伍”派勾結社會上牛鬼蛇神，煽動群眾不交公糧，進行反革命活動等）。（見合浦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十九時三十分，革籌小組開會研究當前工作安排問題。（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六日 凌晨，革籌小組成員郝忠雲被來南寧的桂林“聯指”和廣西“聯指”的部分群眾拉到“建司”。後經軍區派人前去勸說，約二時後送回。二十七日中午，郝忠雲返回桂林。（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十五時，革籌小組章國清等七人在軍區禮堂接見南寧“三支兩軍”全體人員和軍區機關幹部，魏佑鏞宣讀了中央《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

同日 “工農兵業餘文藝造反總部”接受“天津業總”、“上海工總司”、“湘江風雷”等組織的邀請，指派梁寬光、雷群策、趙永茂（南寧）等三人去天津參加方紀、孫振、白樺召開的“全國工農兵業餘文藝戰士座談會”。他們在天津十天左右，參加了一個準備會便返邕。（見區直文化系統“文革”大事記）

二十七日 下午和晚上，革籌小組章國清等六人開會，研究當前工作安排。出席會議的有：章國清、歐致富、魏佑鏞、焦紅光、孫鳳章、王斌。晚上並有孫磊、陳開路、趙維學、焦玉山列席會議。

會議商定：堅決貫徹《十條》、《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和《七條》，不搞派性宣傳；各縣、市沒有成立監督小組的迅速成立；兩派到各縣去的人回來，農民來城的回去；主張武鬥的由本組自己抓；廣西日報仍要軍管；不承認犯方向路線錯誤。石勇可以換，但不是撤職；要誠心誠意支持伍晉南站出來等。（見區革籌材料6-1卷）

同日 革籌小組、廣西軍區發出賀電，祝賀柳州市兩派紅衛兵實現大聯合。（見廣西革籌材料2卷）

同日 梧州市“大軍”舉行抗議“廣西‘聯指’非法綁架廣西革籌成員郝忠雲”大會。隊伍行經市委大樓門前時，遭到槍擊。大軍的傅貽球（外貿幹部）被擊斃，其內弟陳慶恒上前搶救時被打傷。（見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荔浦縣“工農兵司令部”所屬修仁總部頭頭沈石光等人帶領福旺、大榕、木山、三浩、橫水、四育和武陵等七個公社的部分農民及少數武裝民兵，以抓打人凶手管國強（當時是現管四類分子）等人為名，包圍修仁“農總”（“造反大軍”觀點），雙方發生衝突，福旺公社民兵被“農總”繳去步槍九支、子彈數十發。（見荔浦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 桂林地區十二個縣“聯指”觀點的農民代表，分乘四十七輛卡車，裝著大肥豬、雞、酒等，攜帶幾支七九步槍及少量子彈，敲鑼打鼓“慰問”桂林“聯指”，繞市區一圈後開進“聯指”佔據的市委院內。桂林“老多”針鋒相對，調動了幾十輛載著高音喇叭的宣傳車，繞市委大院進行廣播，譴責“聯指”煽動農民進城，企圖挑動武鬥。經部隊分別做工作後，次日晚十時前，農民代表全部撤離桂林市。（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歐司令員、魏政委指示，今晚立即給桂林地區的荔浦、陽朔、恭城、全州等縣武裝部打電話：武裝部要堅決說服、勸阻各縣的人不要到桂林，要在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桂林市的問題由桂林駐軍與兩派協商解決。（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6卷）

同日 “聯指”保衛處正式成立。劉盛華、梁連興、周延傑、黃文龍、蘆德志、高祖賢等人為負責人。（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柳州“造反大軍”多次到軍分區搶槍。進住市武裝部七晝夜。二十九日下午七時多至晚上十一時多，三百多人四次衝擊市武裝部，佔領辦公樓，打傷武裝部二人，搶去手槍二十一支，半自動步槍一支、手榴彈一枚、五六式子彈二千六百發、七六二子彈五百發。保密室已被打開，見人就打，電話全部被切斷。（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9卷）

二十三至二十九日 平南縣南河、武林、新儒、寺面公社的所謂“農民法庭”，亂抓人殺人，僅十多天，殺害二十四人。（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 容縣抓促指揮部發出不准亂捕、亂殺人的電話通知。（見容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容縣人委“虎穴追蹤”兵團頭頭韋芝浩策劃打死技術幹部周吳旦，靈山區打死三人，十一月三十日石頭區打死五人，十一月下旬楊村區打死十一人，十二月八日松山中學副校長、黨支部書記蘇尚湘被該校學生用刀活活殺死……。抓促指揮部通知不准亂殺人的電話發出後，殺人的事繼續發生，不見採取任何措施，到了十二月份縣武裝部、抓促指揮部、縣“聯指”等組織負責人召開會議調動民兵進行大規模武鬥，使殺人事件規模更大，組織和指揮更統一。

同日 歐致富、焦紅光、王斌、魏佑鏞、孫鳳章，分別接見“聯指”、“四·二二”部分常委，做關於伍晉南、安平生回南寧的工作。（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十日 晚上，革籌小組章國清、歐致富、魏佑鏞、焦紅光、孫鳳章、王斌等六人開會（列席：孫磊、趙維學）。首先由孫鳳章彙報“四·二二”的一些反映和意見，爾後聽得柳州軍分區副參謀長劉祥關於柳州市武鬥問題的彙報。對柳州市武鬥問題，經研究採取了以下措施：

- (1) 駐軍、軍分區、市武裝部召開會議，統一認識，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堅決制止武鬥。
- (2) 找兩派負責人個別談話。說服其所屬人員離開軍事機關。
- (3) 軍隊不准開槍，市人武部不能離開駐地。
- (4) 四支隊不介入當地兩派鬥爭。（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梧州“造反大軍”“兵管”醫藥站，搶醫藥品製造爆炸品，還搶劇毒藥品和戰備劇毒麻醉藥品等。抓了醫藥站四人，職工不能上班，十二月三十日，該站外逃八十多人，每科室只有一、二人。全市一百三十多個單位無法工作。（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5卷）

同日 欽州縣“聯指”人委前衛兵團頭頭陳紹炎等策劃，派江志瑞等人把“四·二二”派“敢闖”戰鬥隊頭頭張振超（縣委幹部）抓往人委大樓，拳打腳踢，刑訊逼供，致重傷，當天死去。（見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本月下旬，在廣西軍區作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檢查報告”後，廣西“聯指”集隊沖進軍區大院，要揪“出賣原則”的軍區負責人。“西大能闖”參與這一行動。（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十二月

一日 上午和下午，區革籌小組在邕全體成員，分別接見廣西兩派常委，做伍晉南回來的工作。並聽取對當前工作的意見。

被接見的“聯指”常委：有顏景堂、廖煒雄、任樹人。同時被接見的、還有柳織“鋼聯指”的

兩名代表；被接見的“四·二二”常委：林福文、曾春生、章英、李朝傑等十三人。同時接見的還有柳織“工機聯”的兩名代表。（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日 區革籌小組發出《關於制止武鬥的五點意見》。內容如下：

一、大力宣傳中央“六六”通令、“七一三”通知、“九五”命令和廣西兩派達成的《十條》、《七條》協議，抓緊上交武器、彈藥工作，做好勸止農民進城的工作。

二、各革命群眾組織和革命群眾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強敵情觀念，嚴防黑手，克服派勝。

三、地方領導幹部要堅決執行中央《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和兩派達成的“十條”協議，不能支一派，壓一派，不准參與支持和挑動武鬥；

四、各革命群眾組織要掌握鬥爭大方向，搞好本單位鬥、批、改，實現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

五、軍隊必須高舉“擁軍愛民”旗幟，做愛民模範不能支一派壓一派。（見廣西革籌材料12卷）

本月初，桂林地區“聯指”在荔浦召開會議，並組織與會的代表到修仁區參觀“聯指”用武力攻剋“造反大軍”派觀點的“農總”據點後，成批殺害“俘虜”的“造反大軍”人員的現場會。恭城縣“聯指總部”吳樹珍、蘭來（公安幹部）參加了會議，回縣後在文廟召開了戰鬥隊隊長以上人員會議，進行傳達介紹。激起了派性仇恨，加劇了派性鬥爭。（見恭城縣“文革”大事記）

一至八日 桂平縣發生流血事件。

本月一日“四·二二”派人到樟村縣物資局炸藥倉庫，搶走黃色、白色、黑色炸藥共四千五百一十公斤。烏槍黑粉四百六十九公斤，雷管六千六百零二隻，導火索三千三百一十四米，步槍二支。“聯指”稱之為“一二一”反革命事件。

二日，縣人武部召開科長以上幹部會，縣“抓促”副主任馮祖茂（縣委副書記）也參加了會議。（1）會議決定調民兵進城，封鎖沿江兩岸；（2）人武部組織雙方談判，限期交回炸藥；

（3）談判不成即用武力解決。向“四·二二”要求交出炸藥。談判無結果，“聯指”總部、“抓促”指揮部，即通過電話和派人下去聯繫，調動了十二個公社（鎮）的民兵二千一百一十五名進入桂平縣城。

四日，十二時“聯指”以“財貿兵團”、“工交兵團”進攻，炸毀工商聯大門，“四·二二”一槍不發撤出。七日下午七時“聯指”召開會議，馮祖茂也參加。會議認為既然談判無用必須用武力解決，提出作戰方案，研究幹掉那些“走資派”和“壞頭頭”；在殺人方法上採用令其去挖地雷時中途殺害。人武部一領導提出：“張朝光、趙國璋是自治區管原幹部，應將兩人交縣人武部”。

八日早六時“聯指”攻入工農高中“四·二二”人員大部已於七日晚逃走餘下百多人，赤手空拳走出來成了俘虜。這些“俘虜”被槍殺二十一人（其中有農林局副局長王寶璧、農業局局長李卓才等）

武鬥結果雙方共死三十人（包括殺“俘虜”二十一人在內）。其中“四·二二”派二十五人，“聯指”一人，沒有參加群眾組織的三人，兩派都不認識不知姓名的一人。殺後屍拋黔江，說是“免費去廣州”，雙方共傷二十二人。“四·二二”派傷十人，“聯指”派傷十二人。

事件結束後兩派繼續論戰。“聯指”發出《一二一搶劫國家炸藥現行反革命的真相》，又用三代會名義發表《一二一·反革命事件的調查綜合材料》，把事件的罪責推給對方。“四·二二”發表《桂平反革命大屠殺彙報材料》，公布“聯指”對“四·二二”採取血腥鎮壓的手段。

X

“一二一——二·八”事件結束，新木、江口等公社成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出布告，宣布他們有權力鎮壓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及社會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壞活動。（見桂產縣“文革”大事記、大事件）

二日 藤縣象棋區貧下中農對敵專政委員會召開大會，把譚鏡為參加“反共救國造反大軍”的九人打死。爾後河柳等鄉也以“反共救國軍”的罪名在不同地點分別召開“群眾專政”大會，殺死二十八人。十二日嶺景區“抓促”主任等人策劃召開“貧下中農對敵專政”大會，打死五人。爾後皇村等鄉皆召開“專政”大會，以“反共造反大軍”罪名殺死二十二人（在“處遺”中對受害者平反、撫恤）。

三至七日 荔浦縣工農兵司令部常委尹瑞雲、兩江區武裝部長葉光林帶領四十多人，到修仁貼大字報，被“農總”圍攻。當晚，“工農兵司令部”常委董茂軒召開各總部頭頭、各區武裝部幹部及公安局部分幹部參加的會議，成立所謂“平息修仁反革命奪槍暴亂指揮部”（簡稱前線指揮部），董茂軒為總指揮，葉光林、莫高林（青山區武裝部長）、羅傳英（社莫區武裝幹部）為副總指揮。決定組織各區民兵連夜開赴修仁。四日凌晨，民兵與“農總”發生武鬥，至七日凌晨結束。“前線指揮部”死四人，傷七人；“農總”死二人，百餘人被抓，被抓人員除被施行吊打，灌屎尿、割腳肚放土等刑外，後在“前線指揮部”的董茂軒、尹瑞雲、李時賓的授意下，黃代明、邱天球、黎明吉、陸永和、李祥英、周高龍、郭榮天等人將被抓的劉元清等二十四人殺死。

七日，又召開所謂“荔浦縣修仁鎮壓反革命奪槍勝利大會”。將吳宣業等十四人殺死，大會群眾在混亂中走開。

武鬥期間，桂林地區十二縣和鹿寨、鍾山、蒙山，以及南寧市共十七個縣、市的“聯指”在荔浦召開會議。七日，與會人員並參加了所謂“荔浦縣修仁鎮壓反革命奪槍勝利大會”。（見荔浦縣“文革”大事記）

三日 欽州縣“聯指”用電話向全縣各公社發布《緊急動員起來，堅決制止反革命暴亂》的動員令。（見欽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四·二二”十萬多人在朝陽廣場集會，慶祝“廣西工總”成立一週年。（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同日 柳州“造反大軍”“聯總”、“二·七風暴”等群眾組織六十多人，到黃村軍分區軍械庫奪槍，解放軍戰士宣傳“九五”命令勸阻無效，打死“造反大軍”四人，打傷二人。激起“造反大軍”群眾不滿，把屍體抬到軍分區禮堂，要求解決問題，陳屍半月之久。最後經軍分區做工作，才處理清楚。（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四日 十八時，伍晉南、安平生從北京乘飛機回到南寧。革籌小組成員魏佑驥、王斌及駐軍、兩派代表百餘人到機場歡迎。（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聯指”頭頭李連生等十一人，上訪區革籌小組，反映六九五部隊支一派，壓一派和桂林“造反大軍”包圍“聯指”據點等情況，提出六點要求：（1）給桂林“聯指”解決經費問題，發放工資；（2）立即釋放桂林“聯指”被抓人員（約四十人左右）；（3）保證四大民主；（4）責令六九五部隊繳“造反大軍”武器；（5）懲辦打人凶手；（6）保證通訊自由。革籌成員、廣西軍區歐致富司令員接見了他們，並作答復：八次接見周總理已講清楚，就按周總理指示辦；同桂林地區支左部隊研究解決，同革籌小組成員郝忠雲商量；工資應發，參加武鬥的不發；扣押的人員要釋放；四大自由要保證；“老多”應當交槍；懲辦凶手以後再說，由各革命群眾組織自己抓人，現在不好辦；對六九五部隊有意見，可以寫出來，我們可以轉中央，但不能抓人、衝擊軍事機關；“聯指”要掌握大方向，爭取合法地位，緊跟部警，搞好聯合；我們反對武鬥，反對“老多”搞武鬥，也反對你們搞武鬥。（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5卷）

五日 桂平縣江口人武部召集“聯指”頭頭開會，對攻打“九·七”作了具體部署（“九·七”是江口鎮的屬於“四·二二”派的一個組織）。七日上午順利地佔領了“九·七”指揮部，沒有搜出任何武器和炸藥。“聯指”武裝人員挨戶抓了“四·二二”派的八人；釋放二人，其餘六名處決。當晚十二時把六人拉至海江河邊槍殺，因天黑跑了三人，一人跑回江蘇老家，一人在一九六八年刮“十二級颱風”時被打死屍拋海江，一人逃往瑤族山鄉於十二月八日被江口“聯指”民兵押回槍殺在馬河。（見桂平縣“文革”大事記）

七日 永福縣“聯指”常委於錫連帶一些人參加荔浦修仁所謂“群眾專政鎮壓反革命暴亂”殺人現場會。回縣後開常委擴大會、戰鬥隊幹部會、“聯指”全體成員大會。傳達修仁殺人現場會議精神，大講“造反大軍已走向反面，準備搞反革命暴亂”。提出“只能一派得勝，不能兩派共存”的口號，為徹底搞垮對方大造輿論。接著“造反大軍”成員被“聯指”民兵打傷，有的機構被砸，據點被圍攻。（見永福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四·二二”指揮部發表聲明，就全面貫徹周總理的指示提出六條要求：（1）軍區必須承認在《廣西日報》犯方向路線錯誤；（2）撤銷廣西日報社軍管小組的五點聲明；（3）全面調整軍管小組；（4）革黨加強領導，促進報社兩派早日達成協議；（5）實現上述要求，立即撤出外單位人員；（6）在達成協議前，則暫由“四·二二”出報。（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八日 魏佑鏞代表革黨小組召集廣西日報社兩派談判，提出解決《廣西日報》問題的三點意見：（1）廣西日報社兩派聯合起來，在軍管小組的領導下共同出版，可先出電訊，也可以考慮發表兩派同意的文章和革黨小組指定的文章；（2）進駐廣西日報社的外單位人員要撤出，廣西日報社內部人員要回來；（3）軍管小組成員，可作必要調整；（4）《廣西日報》軍管期間有錯誤，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呢？我們認為不是方向路線的錯誤。主要是對群眾態度，可以按軍區向中央檢查調子檢查，但分歧意見很大未達到協議。（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九日 欽州小董駐軍撤走時將駐地應德婁交小董“四·二二”接管。當晚小董“聯指”派馬紹良（公社武裝部副部長）、沈昇權（小董公社副社長）等頭頭在公社召開有十六個大隊支部書記和機關、學校、街道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決定調動各大隊民兵以武力解決駐軍住地。十日八時，馬維良組織民兵一千多人，包圍小董鎮，用刀槍、石灰、禾叉等為武器攻打據點（“四·二二”從駐軍接管的）應德婁等處。“四·二二”派人少，不敢抵抗，大部分人間風而逃。武鬥中打死“四·二二”九人（被俘後打死的六人），捉拿群眾七百多人；放火燒房屋二間，炸毀房屋一間，損失公私財物約計十多萬元。（見欽州市“文革”大事記）

十日 廣西革黨小組第二次召集廣西日報社兩派代表談判恢復軍管辦報問題。

同日 上午，區革黨小組開會，研究桂林“五四雄鷹”搶師院“造反大軍”的槍問題。決定給一四一師打電話：（1）不准開槍，不准抓人；（2）派幹部進行勸阻；（3）槍支接管、轉移。

下午繼續開會，研究東羅煤礦事件等問題。該煤礦去年處理四百多臨時工，今年要求復工，最近有幾十人靜坐絕食。兩派都支持，“四·二二”五百多人陪坐。二十多人前來反映情況，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徐其海接見，作五點指示：（1）靜坐絕食不對；（2）處理的工人中央已有規定；（3）陪靜坐不上班，不生產是不對的；（4）病員醫院沒有條件搶救，已告知衛生廳去人搶救；（5）要求立即停止絕食。（見區革黨材料6卷）

十二日 晚上，區革黨成員歐致富、安平生接見“聯指”常委顏景堂、潘玉臣。柳州“聯指”李立光也參加會議，聽取他們對柳州出現反動標語的處理意見。

隨後又接見了“紅色鐵路”的代表，聽取他們對桂林“老多”阻礙鐵路交通的反映。（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兩派達成《關於聯合開辦第二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協議》。學習班從十二月八日至三十日。協議規定：對方按照系統、單位，本著對口、對等的原則，各選派六十名學員參加學習。（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廣西“聯指”發表關於《廣西日報》問題的嚴正聲明，重申“四·二二”必須立即撤出進駐報社的外單位人員；支持革黨四點意見；“四·二二”奪軍管大權犯方向路線錯誤；伍晉南勾結賀、謝、袁指使“四·二二”壞頭頭家敵群眾進行奪權，必須低頭認罪。（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聯指”在區工委禮堂召開“堅決貫徹毛主席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徹底砸爛廣西‘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大會”。“紅色文化”代表在會上攻擊誣蔑所謂“文藝黑線”的總後台，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大搞所謂封、資、修、大、洋、古、高、精、尖等。（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 區革黨小組以明碼電報轉發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對監獄和勞改單位的三點指示》：1、任何群眾組織，不准以任何藉口衝擊監獄和勞改單位，不和在押犯人、勞改犯人聯繫；2、監獄和勞改單位目前堅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3、在押犯人和勞改犯人，只能規規矩矩地服從監管、改造，不許亂說亂動，違者嚴厲制裁。（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5卷）

十五日 廣西兩派赴京學習代表黃冬、張念祖、熊紹輝、劉國富、楊慶才等給廣西革黨小組轉南寧市兩派革命群眾組織喜信，報告在毛主席身邊學習的廣西兩派全體代表，實現了大聯合。（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零點四十五分，柳州“聯指”工交兵團在解放南路的工交兵團聯絡站，被用烈性炸藥炸毀，幾間房屋倒塌，當場炸死朱其輝，重傷八人，輕傷二十九人。

相隔四、五小時，“聯指”派為了報復，便在附近的“造反大軍”的“城中戰團”據點內抓走市委副部長卓克明、工交政治部主任喬仁卿、法院院長、檔案局長等七人。檔案局長陳君承被弄死，其他人員被打或被打傷，以後放出被劫人員。（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十六日 上午，南寧兩派和駐軍在朝陽廣場召開“緊急行動起來，立即制止武鬥和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誓師大會”。革黨小組韋國清等六人參加了大會，魏佑鏞在大會上講了話。（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廣西革黨小組、廣西軍區發出《緊急動員起來，立即制止武鬥，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十項命令：一、軍分區、人武部、駐軍、三支兩軍人員和各革命群眾組織、廣大革命群眾，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堅決執行中央“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七·一三”和“九·一三”通知，牢牢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二、立即停止武鬥，消除一切武鬥因素；三、不准搶奪武器，堅決收繳槍枝、彈藥；四、群眾組織不准隨便抓人、打人、殺人，已抓的人一律釋放；五、農民不准進城武鬥，城市和城鎮的人也不要到農村串連；六、民兵不准參加武鬥，更不准動用民兵武器進行武鬥；七、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政治壞人；八、軍分區、人武部、駐軍要支左不支派，做愛民的模範等。（見區革黨“文革”材料2卷）

同日 柳州兩派達成《關於柳州兩派就立即制止武鬥歪風的緊急措施》。簽字的有：王本明、王偉民、張麥生、孟憲昇、金喜珍、楊家駒、趙從江、韋才山。駐軍代表孫鳳章、王憲、田圃。（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十九日 凌晨，梧州、荔浦、賀縣、桂平、鹿寨、容縣、羅城、玉林、欽州、博白等市、縣“造反大軍”赴邕“反屠殺控訴團”二百餘人，到軍區靜坐遊行，強烈要求革黨小組和軍區制止武鬥，

嚴懲殺人凶手。（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四·二二”各縣“反屠殺委員會”向革籌小組、軍區發出公開信，提出五點要求：（1）立即制止農民進城參加武鬥，解除各地武裝民兵和“聯指”對“四·二二”的圍攻；（2）立即派野戰軍到上述地區制止武鬥，收繳武器；（3）立即下令取締“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等反動組織；（4）立即解決各地受迫害來邕去桂的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的生活問題；（5）韋國清、廣西軍區要立即到群眾中公開檢查改正錯誤。（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南寧市北岸磚瓦廠實現革命大聯合，召開大會慶祝。韋國清、王斌、伍晉南、安平生、王璞等參加大會。韋國清代表區革籌、軍區、駐軍講了話。（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魏佑鏞和歐致富接見外地來的十五人。他們提出五點要求：（1）立即召開分區、人武部電話會議，解除民兵“聯指”武裝；（2）玉林、平南等縣要立即派作戰部隊去；按總理指示，立即取消貧下中農最高法院；（3）解決外地受迫害人員的吃住問題；（4）大量印發中共批示的三個“照辦”，並到群眾中公開檢查。

二十一日南寧召開歡迎在京學習同志派回黨報團大會。韋國清在大會上講了話。接黨報團成員分赴各地區、市，向兩派群眾組織黨報。對促進各地兩派大聯合，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見廣西革籌材料3卷）

二十二日在毛主席“鬥私，批修”的號召下，和廣西兩派在京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推動下，廣西兩派達成協議，成立革命大聯合籌備委員會。下午，南寧兩大派和解放軍指戰員十五萬多人在朝陽廣場集會熱烈慶祝。南寧市首批實現革命大聯合的七十五個單位向大會報喜。

此後，南寧兩派工人組織、財貿系統組織、手工業實現組織和大中小學紅衛兵組織、區、市機關兩派組織等，也紛紛達成協議，成立了大聯籌，促進了各系統、各單位的革命大聯合。使當時混亂局面暫時緩和。（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凌晨，南寧地專機關兩派成立“南寧地專機關革命大聯合籌備委員會”，雙方各派七名代表組成，籌委主任由軍分區派人擔任。十二月×日召開兩派大聯合大會。但兩派對立情緒未真正解決，至一九六八年四月間，兩派鬥爭繼續，而且愈演愈烈。（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二十三時，歐致富接見“聯指”常委顏景堂、李家海商談制止交通廳、水電廳武鬥問題。（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三日晚上，革籌小組舉行會議，研究如何鞏固和發展革命大聯合問題，對水電廳、交通廳武鬥問題的處理，確定了五條原則：（1）外單位人員一律撤出；（2）武器由軍區負責收繳；（3）不准打架，不准動武，不准進行人身侮辱；（4）保障四大正常開展，保障人身安全；（5）被抓的人立即釋放。（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南寧地區兩派聯合召開慶祝大會。南寧地區十四個縣市的兩派代表（各派十五人，共五百八十人）今天全部到達。賓陽、崇左、武鳴、馬山、憑祥等縣（市）兩派代表，實現了大聯合。下午，區革籌小組接見了南寧地區全部代表。（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7卷）

同日駐柳部隊、柳州軍分區、柳州市人武部孫鳳章等，在柳警司院內召開有兩派代表參加的“促進革命大聯合座談會”，討論通過關於實行大聯合的六條，會後公布了六條。（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四日經中央批准同意，革籌小組和軍區聯合發布了《取消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等組織的緊急通知》。指出“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和“貧下中農肅反委員會”等組織是非法的，必須立即取消，停止活動，今後不得再成立類似組織，更不得以任何名義、

任何藉口私設法庭，隨意殺人、捕人，如有違抗者，嚴加追查，依法懲辦。（見廣西革籌材料2卷）

同日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電告欽州兩派革命群眾組織，命令立即停火，雙方抓的人立即釋放，參與武鬥的農民立即撤回。（見廣西革籌材料2卷）

同日下午，革籌小組成員韋國清、魏佑鏞、王斌、伍晉南、安平生到南寧專區參加機關所屬的十三個縣成立“大聯籌”慶祝大會。魏佑鏞、伍晉南分別在大會上講了話。（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中旬，容縣“聯指”再次開會策劃用武力解決黎村“支多陣線”問題。彭昭南主持。縣人武部部長王惠卿、政委郭世松及縣抓促指揮部、縣“聯指”頭頭潘建中、韋聚賢等十多人參加。會議決定財物由縣負責，組織楊村、楊梅、靈山、石寨等區民兵攻打黎村“支多陣線”（“四·二二”據點），由張洪順、彭永義任正副總指揮。

二十四日，縣武裝部調來靈山等區（鎮）民兵四百多人，在張洪順、彭永義的率領下，武裝部肖文斌親臨督戰下，開始攻打黎村“支多陣線”（玉林軍分區一個武裝排駐楊村區公所監視。車隊從縣武裝部運彈藥作武鬥使用）。激戰三天，於二十七日攻下黎村。“支多陣線”被打死三人，其餘千多人外逃廣東信宜和梧州等地。武鬥中經濟損失計吃去糧食三萬六千多斤，財政開支一萬八千多元。

武鬥結束後，為了擴大對“支多陣線”在黎村的罪惡。彭昭南、韋聚賢、韋芝浩等人舉辦“支多陣線”搞武鬥的戰壕、工事、蔣介石像、偽幣、封建迷信等罪行大型展覽。經過這一系列宣傳，到一九六八年清隊時該區被打致死一百四十五人的惡果。（見容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南寧兩派紅衛兵“大聯籌”成立，韋國清等出席了成立大會，歐致富在會上講話。

晚上，廣西“大聯籌”召開會議，革籌小組魏佑鏞、王斌、伍晉南、安平生參加會議。研究：（1）成立“大聯籌”辦公室；（2）派聯工作組到欽州地區制止武鬥等問題。（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柳州地專“總部”和“聯司”兩派代表，就兩派大聯合進行座談，達成六條協議。協議中說“要堅決擁護和貫徹執行柳州兩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表的‘促進革命大聯合公報’”，“決定在當月二十六日成立‘柳州地專革命聯合籌備委員會’”。兩派參加座談的代表共二十九人，柳州軍分區代表三人共三十二人。（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柳州兩派群眾、駐軍六萬餘人慶祝柳州兩派群眾成立“大聯籌”，實現革命大聯合。兩派代表表了態，駐軍代表孫鳳章講了話。會後，公布了實現大聯合的九條措施。（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十三時二十分，“四·二二”各縣“反屠殺委員會”組織兩千人到廣西軍區禮堂門前開大會，強烈要求革籌小組和軍區制止各地大屠殺。伍晉南接見並講了話。（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二二”還成立了“一二·二六指揮部”約有七百人進駐軍區禮堂和群眾接待站，安裝了高音喇叭，發布了“一二·二六”聲明，重申“反屠殺指揮部”提出的五點要求。（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十九時三十分，革籌小組舉行會議，研究如何做好對進駐軍區的群眾的工作問題。（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七日凌晨，梧州“聯委”攻打“造反大軍”紅三司六一七公社據點一幼，“造反大軍”陸

永雄等三人被打死，十七人被打傷，赴京代表郭堅左臂中彈受傷。次日，梧州軍分區劉文舉副政委和周樹忠副參謀長等人到“造反大軍”軍部做工作，被圍攻和毆打，周被扣留，第二天才放回。（見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 桂林市“聯委”（即“聯指”、“革聯”聯合組織）成員孫寶山想奪“聯委”的領導權，加上孫寶山打、砸、搶行為嚴重，支左部隊認為，孫寶山是桂林兩派武鬥的重要因素，經軍管會與“聯指”負責人李年生、曹鐵軍、柴儉等人商定，由軍管會出動一個連兵力，抓捕孫寶山。本月三十日凌晨五點，孫被解放軍戰士用衝鋒槍擊中頭部身亡。（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南寧市北岸磚瓦廠兩派群眾組織，第一個按車間、班組實現大聯合。雙方簽訂了關於制止武鬥的《六條協議》和實現大聯合的《十條協議》。二十九日下午三時半，區革籌小組成員韋國清、王斌、伍晉南、安平生以及駐軍負責人王璞等到該廠參加全廠職工大會，韋國清和廣西軍區和駐軍代表在會上講了話，以該廠實現革命大聯合表示堅決支持和祝賀。（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 九時至十六時五十分，“四·二二”在軍區院內召開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殺的萬人大會，還有近二百人提出要求解決工資問題，進入軍區作罷辦公樓靜坐長達十四小時。直至一九六八年元旦才全部撤出。（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時，王斌、安平生參加大聯籌會，研究兩派合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等問題。（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孫鳳章主持召開柳州市第一次“大聯籌”成員會議，強調兩派群眾務必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按照九條措施去辦。並最後提出三點要求：“1、號召兩派群眾組織，拆除所有武鬥工事；2、上交武器，停止武鬥；3、整頓市容，乾乾淨淨迎新年。”（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區革籌、就廣西軍區就玉林、梧州、欽州地區發生武鬥的問題發出制止武鬥的三條命令：1、雙方立即停火，不准進攻對方；2、雙方所抓人員立即無條件釋放，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傷害；3、凡因武鬥而進城的農民及其他人員，要立即返回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否則由挑起者負責。（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廣西大學“能鬧”向區黨委書記、區革籌小組成員伍晉南發出“勒令”文告，限令他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五日十二時前交出所謂“認罪書”，否則斯針採取最強硬的措施。（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三十一日 十八時三十分至二十一時，韋國清、魏佑鏞、王斌、伍晉南等接見“四·二二”進駐軍區的一千多名群眾。韋國清、魏佑鏞根據他們的要求，分別在會上講的話。（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駐柳四支隊七十輛汽車去湖南運糧，被以程靖球為首的融安縣“青年近衛軍”攔截。在長安鎮河東八天，不准他們過河。扣留十五台車和解放軍。搶走押運部隊衝鋒槍十五支，子彈九百發，炸傷押車戰士三人。車隊返程時，又被搶去茶油二十六桶共九千斤。（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20卷）

本月間，老幹部張進煒強加給莫須有罪名，遭受迫害。張於一九三八年初受中共廣東省委派遣回合浦重建地下黨組織，是合浦縣第一縣委書記，是合浦黨組織者之一，一九五八年被錯定為“反黨分子”、“地方主義分子”受處分。一九六一年重新安排工作。在“文革”中又被本單位“文革”組織強加給“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黨分子”和“反黨、反人民”等莫須有罪名，進行政治上的迫害。於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在合浦醫院含冤逝世。（見合浦縣“文革”大事記）

本月底，廣西日報社“五八——二”編印出版派性小冊子：《還我長城——徹底清算伍家村修

正主義集團竊奪軍報〈廣西日報〉大權的滔天罪行》。其中《軍管〈廣西日報〉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一文明確指出：“軍管《廣西日報》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組織革命派（按：指“聯指”組織）和革命的工農兵辦報，大量刊登革命派的文章……。在軍管《廣西日報》上從不刊登為黨內走資派所操縱的保守派（按：指“四·二二”組織）的活動和文章”。編發了《在軍管〈廣西日報〉問題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本月底，柳州“造反大軍”“鋼青近”抓了“聯指”鬥批改組織一女同志到小南路日雜經理部彭大陸住處，審訊、用電刑後，由劉和明、彭大陸等人進行輪姦。（見區檔案局“文革”材料10卷）

一九六八年

（凡註有“△”符號的條目，材料來源見區檔案存的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文革”材料卷《廣西革籌大事記》。）

一月

四日 欽州縣“聯指”攻打“四·二二”三十六曲林場據點。對方未防衛，結果“四·二二”一工區隊長、四工區副隊長、醫生等五人被捉去殺害。（見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福綿事件”後，玉林“四·二二”數百人到玉林軍分區門口召開“反圍剿、反迫害、反屠殺”大會，並靜坐六天六夜。（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五日 靈山縣“聯指”調集民兵五百多人用六〇炮三門、重機槍六挺、輕機槍十五挺攻打縣“革聯”（四·二二派）。“革聯”沒有抵抗力，在逃出據點過程中被打死五人，縣委副書記鄭振才被民兵用叉叉死，“革聯”被俘二百多人。（見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韋國清在廣西“聯指”和廣西“四·二二”兩派骨幹會上作關於學習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元旦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的報告。韋國清強調，要很好地學習社論，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見《廣西聯指報》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

同日 廣西“聯指”大中學校紅衛兵一千多人來到廣西軍區大院遊行示威，聲稱區革籌小組成員伍晉南與賀希明、霍泛發表“四·一九”聲明，支持“四·二二”犯下了“嚴重罪行”，“勒令”伍晉南交出“認罪書”。廣西大學“能聞”紅衛兵頭頭賓祖媛等把伍晉南拉到軍區球場圍攻毆鬥，侮辱折磨達兩個多小時。（見區檔案館存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文革”材料卷《廣西革籌大事記》）。

是日 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來電指示，對“聯指”廣西大學“能聞萬重關”和大專院校紅衛兵揪鬥伍晉南要承認錯誤，並交出動手打人的人，否則通報全國。（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是晚 廣西“四·二二”指揮部在南寧市“造反樓”前召開萬人大會。強烈抗議“聯指”組織紅衛兵揪鬥、圍攻、折磨伍晉南。會後遊行到廣西軍區，要求歐致富司令員嚴肅

處理這一嚴重事件。歐致富出面做工作，示威群眾於翌日三時離開了軍區。（“△”）

六日 《廣西聯指報》二版刊登“紅色觀察員”的評論文章《絕不允許小資產階級派冒充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再論南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不容許顛倒》。評論文章指責對立派是“非無產階級革命者”並揭露伍、賀、霍、謝、袁（家柯）支持“四·二二”篡黨奪權，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章稱“聯指”是堅持兩條路線鬥爭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同日 梧州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聯指”觀點）和“井岡山紅衛兵”直屬部隊在河西文欄路口召開“公判大會”，以“兵事法庭”名義，判處第二飲食公司職工張培松死刑，立即執行；判處四中教師郭沃滔死刑，緩期執行。這一殺人事件是經過“聯委會”（“聯指”派）主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頭頭黃鋒傑等策劃的。張培松當時是被公開監督的“四類分子”，殺他的理由是說他在大東酒家門前公開煽動武鬥，因而遭到殺害。（見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七日 廣西“四·二二”南寧“紅色鐵路”五百多人到廣西軍區請願，抗議南鐵軍管會在“文左”工作中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魏佑鑄政委做了說服工作，“紅色鐵路”離

開了軍區。（“△”）

八日 下午，區革籌小組成員王斌召見“聯指”廣西大學“能聞”頭頭賓祖媛等二十多人談話，指出他們拉伍晉南到廣西軍區圍攻是錯誤的。（“△”）

十八日 由於靈山縣“聯指”的“飛虎隊”在五個公社成批屠殺靈山“革聯”（四·二二）群眾，縣“革聯”蘇志偉、謝有德率控訴團二百多人再次來到廣西軍區控訴靈山“聯指”亂殺人的罪行，要求軍區制止靈山“聯指”的罪惡行徑。魏佑鑄接見了蘇志偉、謝有德，但沒有採取措施制止殺人。控訴團在軍區靜坐。（見靈山縣“文革”大事記）

是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文革、中央軍委、廣州軍區發出《關於容縣黎村問題的初步調查報告》說：“黎村兩派革命群眾組織因觀點不同，分裂成為互相對立的兩派，由於‘走資派’的挑動和革命組織內部的不純，混進了少數壞人，兩派不斷發生武鬥，一些幹部群眾被殺害，後果比較嚴重。雖然武鬥已停止下來了，但兩派之間的對立情緒還比較嚴重，我們擬把調查組繼續留在那裏，發動群眾，剷住武鬥歪風，動員外來民兵回去，歡迎‘支多陣線’（‘四·二二’）外出的群眾回來，收繳兩派所有的武器，組織兩派協商，儘快達成制止武鬥協議。”（注：根據一九八三年“處遺”調查，黎村武鬥的真實情況是這樣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黎村“四·二二”搶奪“聯指”同心區據點二十六支步槍。九月十三日，黎村“聯指”在四維四面山頭設崗哨、架機槍，向“四·二二”據點射擊。“四·二二”還擊並攻下“聯指”據點，把“聯指”的周恒彬等六人打死。九月二十六日，“四·二二”在途中伏擊“聯指”，把馬耀光等六人打死。“聯指”於當晚抓“四·二二”的江文蘇等六人集體槍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容縣“聯指”調集民兵四百多人全副武裝攻打黎村“四·二二”。打死“四·二二”十二人，傷二十一人。“四·二二”被打散後，一千多人外逃梧州和廣東信宜等地。“聯指”攻打黎村先後吃去國庫糧三萬六千多斤，開支一萬八千多元。）（見容縣“文革”大事記、廣州軍區、廣西革籌小組、廣西軍區一九六八年間給中央的部分報告和向下發的一些指示（檔案資料之一、二、三、四）

二十日 廣西“工總”和河池專區部分群眾四百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聲援靈山控訴團，在軍區政治部大樓前請願，揭露各地“聯指”危害無辜群眾的罪行，批評廣西軍區支一派壓一派的嚴重錯誤。副司令員徐其海答應派人到靈山制止亂殺人。（“△”）

二十三日 《廣西聯指報》用四個版的篇幅宣傳報道上海“一月奪權的偉大勝利”。一版社論《偉大的“一月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同時發表《歡呼奪權勝利一週年》的文章。二版刊登《廣西聯指指揮部關於堅決批臭“歷史反革命分子”、大“叛徒”賀希明。掀起革命大批叛新高潮總動員令大會》等文章。四版用整版篇幅發表讚揚、歌頌“一月奪權”的短文。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靖西縣發生大規模殺人事件。二十日縣武裝部長李季召開公社武裝部長緊急會議，研究調民兵進城。二十四日下午一千五百九十名民兵進城，二十四晚發槍支彈藥給“聯指”組織。“造反大軍”見勢不敵，逃散。二十七日，民兵搜捕幹部、群眾三百二十人，殺死幹部、群眾、學生二十八人，縣委書記黃小林（已提為百色專區副專員）被誣為“四·二二”後台，被打死。二十七日軍分區政委蘇毅毅來靖西“視察”，在人武部“支左”人員幹部會上說：“靖西打得好，解決問題快，損失少。”（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 欽州縣發生大規模武鬥。縣“聯指”調民兵一千多人進城武鬥，雙方共打死八人，“四·二二”被俘三百多人，其中有八十七人被殺害。其中被打死有縣委書記王劍東、縣總工會主席馮懷志、副縣長周中權、縣農業局長張萬榮、前欽州副書記將斌、女廣播員等。當“聯指”進攻到最後一個據點時，歐致富下令說不准再打了。這時，軍分區、縣武裝部才出面制止。（見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剛從北京學習班歸來的自治區副主席、區“抓促”指揮部副組長李殿丹，一下火車即遭區計委“聯指”頭頭何勇富等人綁架，關押在“聯指”指揮部私設的牢房達兩個月之久。三月下旬，區計委“聯指”頭頭又把李殿丹轉移至“瀝血紅衛兵”指揮部私設的牢房關禁至六月底。七月一日，由廣東軍區幹部、“三辦”工作人員王生江押送至茅橋“監護所”關押，至一九七一年八月被轉移到武鳴學習班，一九七三年八月始得宣布解放。（據李殿丹口述）

二月

二日 上午，區革籌韋國清、魏佑鏞、王斌、伍晉南召見廣西“四·二二”龍智銘等九名常委。韋國清要求他們狠抓階級鬥爭，搞好“革命大聯合”、“三結合”。（“△”）

是日 下午，韋國清、魏佑鏞接見廣西“聯指”顏景堂、廖煒雄、李家海等六名常委。韋國清要求他們繼續抓好階級鬥爭，開展“革命大批判”，搞好“革命大聯合”、“三結合”。（“△”）

同日 區革籌給鳳山縣發出制止武鬥的五條命令：（1）兩派都是群眾組織，有分歧須通過協商解決。（2）“造反大軍”進攻“聯指”據點是錯誤的，要立即回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停止進攻，撤除包圍。（3）農民進城搞武鬥是錯誤的，立即回原單位。（4）要維護中央“九·五”命令，不許搶奪武器設備。（5）“造反大軍”綁架縣人武部長是十分錯誤的，要立即送回。（“△”）

四日 上午，區革籌開會。討論如何克服派性和抓好對敵鬥爭問題。出席人員：韋國清、魏佑鏞、王斌、郝忠雲、安平生、孫鳳章。

魏佑鏞說：“要解決部隊的派性問題創造條件，進而解決群眾的派性問題。廣西的問題是敵人還沒有揭露出來，派性還沒有克服，首先是部隊的派性沒有克服”。“廣西走資派究竟是誰呢？中央怎樣考慮的，我不清楚，究竟有沒有走資派？我想可以把賀（希明）、霍（泛）“拿出來”。（韋國清插話：中央是知道的。問題是要我們自己去發現，把他們都揭露出來。）“賀、霍一是歷史反革命，一是叛徒，無疑是我們的敵人”。我傾向把這兩個靶子樹起來。當然，把賀、霍拿出來，對“四·二二”可能思想準備不充分。“四·二二”有部分人對賀、霍恨不起來。把賀、霍拿出來，可能給“四·二二”增加壓力。賀、霍拿出來後，伍（晉南）一定要與之劃清界線。

韋國清說：“廣西有幾條黑線。一是歷史反革命，他們當過高級軍官，在紅軍時代，殺害過紅軍和群眾。二是地下黨被破壞兩次，有叛徒。三是有托派，過去有一批留蘇學生，有的參加了托派。四是有走資派，也就是劉（少奇）、鄧（小平）黑線伸向廣西。走資派是黑線上的人物，他們不搞壞事是不可能的。當前群眾派性比較嚴重，這些人不利用群眾的派性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去年底大聯合的形勢很好，很快又出現了反覆呢？就是有黑手在活動。透過南寧和一些地、縣的一些現象，我們要看到逆流是從哪裏出來的。“捍聯站”和有關挽留六九八四部隊的聯絡站等等，就是表演嘛，就是有黑手嘛！要把黑手統統抓出來！”

孫鳳章說：圍剿派性的意見很好，我同意，駐柳州地區五十五軍要克服派性，其中主要由我負責。當前敢不敢承認和克服派性，就是忠不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問題。派性大敵當前，必須打倒。對“四·二二”反映“三個照辦”不落實和遭到大屠殺的問題，我們應該注意。柳州各部隊之間的关系要很好解決，只能通過反對派性，通過自我批評來解決。

王斌說：“孫鳳章的發言，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統一認識、一是當前有些群眾組織的矛頭還是指向省軍區。省軍區和各分區過去一邊倒。（支持“聯指”）是不對的了。但他們早已開始轉變了，當然轉變並不容易的。我們應該向“四·二二”做工作，使之相信軍區系統。‘四·二二’講‘三個照辦’沒有落實，我們要具體分析。‘四·二二’當前提出的什麼大屠殺，武裝部指揮武鬥等等，我們不能承認。我們革籌小組還是沿著‘三個照辦’去處理問題的。當前是不是同

意‘四·二二’說我們搞反動路線，而把屁股坐到他們一邊去？肯定地說不能！絕對不能！總之，我們要嚴格要求自己，維護部隊的團結統一”。

孫鳳章說：“從我個人看，沒有也不敢把矛頭指向省軍區，也沒有把問題推到區革籌小組身上。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希望能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是很有必要的，是有益處的。省軍區、各軍分區和各縣武裝部對過去的問題還是作公開檢查一下為好”。

韋國清說：“講大屠殺是錯誤的。大屠殺就是敵我矛盾了，應該給‘四·二二’說清楚”。（見區檔案館1967-1968年“文革”材料卷革籌小組會議記錄本）

同日 晚上，韋國清、魏佑鏞召見廣西“聯指”常委顏景堂等人和專案組人員。聽取他們彙報查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托派”、“反革命”專案情況。（“△”）

五日 凌晨，金城江“聯指”兵分三路包圍“四·二二”據點舊鐘樓等據點，當場打死八人，打傷四人，俘虜數十人。“四·二二”據點被毀。從此“金三軍”（“四·二二”派）在金城江銷聲匿跡。（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六日 玉林專區“聯指”組織兩千多人，配備步槍八百多支，輕重機槍二十六挺，衝鋒槍四百零七支，各種炮八門，手槍一百六十四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輛，攻打“四·二二”州佩據點。包圍兩天後，攻下據點，抓獲“四·二二”十三人，全部槍殺。在圍攻時，“聯指”死八人，“四·二二”死五人。在這事件中，明代建築物——萬花樓被炸毀。炸毀民房七十二間，吃去國家糧食一萬四千斤，肉類八千八百斤，耗費國家資金二萬多元。（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七日至十七日 上思縣貫徹中央《關於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據不完全统计，從二月七日至五月二十七日全縣被鬥一千一百二十五人，被殺三百九十七人。（見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七日 區文化大院“全無敵”總部（“四·二二”派）工作人員胡雲峰在大院被另一派群眾薛鴻凱開槍打死。“全無敵”發表聲明並到廣西軍區大院請願指責對立派殺人，軍隊支左人員（支持對立派）召開大會宣布胡雲峰為反革命分子。此事至“處遺”時得到平反。（見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十日 廣西“四·二二”柳豐革命造反紅衛兵聯合戰鬥隊主辦的《紅衛兵戰報》發表該報編輯部文章：《今日的“哥達綱領”——評“倒旗協議”》。文章指責當時柳豐兩派達成的所謂“倒旗協議”，是“當年《哥達綱領》的翻版。說這個協議脫離柳州和廣西的實際情況，在紙上空談收繳槍支，助紂為虐，鼓勵和縱容“聯指”一小撮壞頭頭破壞三個“照辦”。文章還指責柳豐工機聯總部的頭頭，提出的“剷平山頭，砍掉派旗，交出武器”，實質是“交出柳豐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一年來浴血奮戰的成果，以換取一些人大到聯委，甚至到將來的革委會去作官”。（見《紅衛兵戰報》、《廣西聯指報》）

十二日 廣西“四·二二”五千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舉行挽留六九八四部隊大會，併發表聲明：

（1）韋國清必須到群眾中去，調查研究，瞭解真實情況，否則後果由韋國清負責。（2）區革籌、廣西軍區必須同意我們挽留六九八四部隊的請求。對此，韋國清指出：“挽留六九八四部隊是有黑手挑動‘四·二二’搞起來的”。（“△”）

十三日 柳江縣拉堡發生武鬥，“柳州聯指常委”決定：由“工交兵團”和“財貿兵團”組織人員出擊。由常委韋正均、劉目忠等帶領數百人前往“助戰”，武鬥達一週之久，劉若章、鄭國忠、凌廣友等二十多人被打死。其中帶隊去武鬥的“柳州聯指工交兵團二分團”頭頭之一金成貴也被打死。（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六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周恩來總理、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鳳山縣、柳江縣發生武鬥

的情況》報告說：“自一月中旬以來鳳山縣多次發生武鬥。二月初，雙方又調農民千餘人進城武鬥。區革籌小組河池軍分區司令員孫長鎖去處理該縣武鬥，但效果不大。該縣武鬥的發生和擴大、除壞人挑動外，當權派副縣長覃家修和離休老幹部廖熙英插手是重要原因，他們支持“造反大軍”，利用自己在群眾中的威望和影響，調動農民進城。此外是縣人武部在支左工作中親一派疏一派，“造反大軍”失去信任。柳江縣“造反大軍”四百多人突然襲擊柳江縣“聯指”三個據點，死傷了一些人，又衝擊縣人武部。柳州軍分區派到該縣制止武鬥的同志無法開展工作，武鬥未能制止平息”。

同日 融安縣“聯指”攻打銅鼓橋。二月九日，融安“造反大軍”強渡融江，攻佔融安“聯指”駐地的東墟、銅鼓橋和直屬糧庫後，融安“聯指”派人向柳州地區的“聯指”派“地專聯司”告急求援。柳州“聯指”決定由“工交兵團”出兵支援，由“地專聯司”負責組織各縣民兵配合行動。十二日“地專聯司”召開常委會，決定由蘇一民、胡文治代表“地專聯司”隨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團”行動。十四日“工交兵團”和“地專聯司”及象州“聯指”武鬥人員三百多人由蒙志恒、張麥生、蘇一民、胡文治等帶領，分乘十三輛汽車赴融，配合融安“聯指”於十六日凌晨一時攻打東墟、銅鼓橋，武鬥持續到當天下午五時才停火。“聯指”抓獲“俘虜”三十六人，押解途中殺害十五人，雙方對打中死五人。（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七日《廣西聯指報》刊登《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區人民提供一份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材料》一文，公布所謂玉林專區“聯指”戰士和貧下中農揭發容縣一批“反共救國團”組織。這批“反團”有容縣“‘四·二二’革總”等二十五個群眾組織是所謂“反共救國團”、“反共救國軍”等“反革命”組織。（見容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聯合發布對自治區公、檢、法機關實行軍管的布告。軍區副司令員宋治平任軍管會主任。

十八日 下午，韋國清、魏佑鏞召見廣西“四·二二”挽留六九八四部隊的代表，對他們要求挽留六九八四部隊的錯誤行動進行了十分嚴厲的批評。（“△”）

十九日 南寧市新華街出現“四·二二”化工學校“幹到底”兵團給韋國清的《忠告書》。要求不要把六九八四部隊調離南寧。並警告韋國清不要重犯去年“三月黑風”。（指廣西軍區發動砸“工總”）的錯誤。

二十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發出《積極促進各專、市、縣革委會成立的通知》。（“△”）

同日 區革籌小組批准田陽七〇二礦革委會成立，這是廣西建立第一個縣級革委會。革委會主任由支左的六九一二部隊科長王新如擔任。（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中旬，廣西革籌召開“抓革命、促生產”三級幹部會議。韋國清、魏佑鏞、安平生均講了話，會後，發出14號文件。說：“混入我們內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務、黨內走資派、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以及美帝、蘇修和他們的走狗相勾結，猖狂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社會主義，破壞社會治安，對於這些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必須採取果斷措施，堅決打擊和鎮壓”。此後，各縣、市相繼召開了“抓革命、促生產”三級幹部會議，傳達貫徹會議精神和14號文件。（詳見上林、大新、靈山等縣和南寧地區、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中旬，靈山縣召開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代表暨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又稱四級幹部會）。一萬零六十人參加。武裝部政委華英德主持開會，副部長鍾沛洪作報告，軍分區司令員魯俊德作報告說：“對於膽敢進行破壞的地、富、反、壞、右，堅決鎮壓”。十九日召開武裝部長會議，縣武裝部長徐廣傑說：“殺幾個壞分子問題不大，我們不插手”。大會倡議書號召“要充分發動群眾徹底清查，及時處理，堅決鎮壓敵人”。會議期間，靈城公社勒死三人陳屍示眾。與會人員紛紛去現場“參觀”。至八月一日，全縣鬥打、亂殺、逼死共達三千二百二十人。全家遭殺絕的全縣共五百二

十九戶。

在這次殺人中有十四個公社（全縣共十九個公社）武裝部幹部參與殺人或與殺人有牽連。（詳見靈山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一日 廣西“四·二二”一部分人到駐解放路的六九一二部隊槍，搶得步槍四十多支，輕機槍四挺，六〇炮一門，被區革籌和廣西軍區指為“反革命行為”，並勒令“四·二二”如數交回槍支彈藥。（“△”）

是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發布《關於堅決維護軍管軍訓和立即取消“兵管兵訓”、“民管民訓”、“工管工訓”、“農管農訓”》的通知。（“△”）

是日 區革籌在區體育館召開兩派骨幹和部隊幹部大會。韋國清在會上講話，他說當前某些地區發生武鬥，有人說是軍分區、人武部挑動的，這種說法是極端錯誤的。現在有的幹部支持這派那派，這筆帳是要算的。中國有句老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刻未到，時候一到，通通都報”。（“△”）

二十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毛主席、林彪、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當前南寧市“文革”的幾個突出問題和我們的措施》的報告。（一）運用各種宣傳工具，對革籌小組和軍區進行攻擊，主要是“四·二二”的某些組織還提出打倒李仕才、吳華，攻擊韋國清、歐致富不按“三個照辦”辦事。（二）進駐軍區機關，干擾革籌小組和軍區的工作。（三）抗拒中央命令，阻撓部隊調防。六九八四部隊調離南寧，命令下一個月了未能執行。（四）搶奪部隊武器。（五）進行綁架、搶劫、行凶活動，破壞革命秩序。

初步措施：充分發動群眾，開展政治攻勢，揭露敵人的陰謀活動；教育群眾同壞人劃清界線；由韋國清向兩派群眾作形勢和任務報告，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辦好毛澤東思想

學習班，加強調查研究，對證據確鑿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依法懲辦。（“△”）

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周恩來總理、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廣西“工總”建工分部等組織武裝衝擊我執勤分隊的情況的報告》和《兩個連的武裝裝備被搶的情況》的電報，並報廣州軍區。

二十四日 廣西“聯指”下屬“建司兵團”到廣西軍區倉庫搶了一批槍支彈藥。

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大新縣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召開縣、區村抓促領導以及廠礦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會議是武裝部長周永山、政委韓奇主持。農智（抓促指揮部辦公室負責人）傳達區革籌領導人的講話，研究布置做好成立縣革委會的準備工作。周永山在閉幕會上講，“為迎接縣革委會的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仁慈手軟”。此次會議後即在全縣實行所謂群眾專政，從三月一日至十五日到革委會成立的十七天內，全縣被殺害二百三十九人。（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四日 天等縣武裝部主要負責人馬政華在二月下旬召開的縣三級幹部會上說：“敵人現在已經跳出來了，要殺革命幹部，要殺土改根子……等”製造殺人輿論。三月八日，縣武裝部副政委於區武裝部長會議上講形勢講準備成立縣革委會；說南寧地區十四個縣有十二個縣正準備成立革委會工作，南寧現在已抓壞人，天等縣已判刑八人、殺二人；小山民兵五粒子彈殺一個敵人……等。三月十日開始殺人至三月十三日止全縣已殺近百人。

十四日馬政華在縣雙代會預備會上又說：“階級敵人氣焰張要殺貧下中農保地、富、工資三十元以上的幹部要殺掉的話來欺騙煽動殺人；要求各區以實際行動向革委會成立獻禮，完成生豬上調任務（即殺人任務）。在馬的號召下各區武裝部長紛紛動員代表完成任務。到十八日止，全縣被

殺死四百二十七人。三月十八日天等縣慶祝縣革委會成立。當天有天等區等六個區發生殺人事件三十一起，殺死一百零二人；慶祝成立革委會的前一天，批准成立革委會後一天向都區武裝部長組織一千多民兵包圍中和街抓壞人並打死九人。這次祥元卿於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兩晚殺死四十六人，造成十六戶無男人、七戶死絕。殺人凶手輪姦死者妻女後強迫他們嫁給凶手為妻。這個縣從三月九日至三月底共殺死九百七十多人。（詳見天等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 廣西“工總”得知“聯指”把搶來的槍支彈藥藏在部隊的油車運往欽州。因此，“工總”所屬組織在南寧市友愛路劫油車一輛，沒有發現有槍支彈藥。對此，區革籌和廣西軍區指為：廣西“四·二二”攔截軍車嚴重事件。（“△”）

二十七日 歐致富召見鳳山縣“聯指”代表，聽取他們彙報鳳山縣“造反大軍”的問題。歐致富向他們表示要揪出插手鳳山的“黑手”來。（“△”）

同日 區革籌發出《關於建立專區、市、縣革委會的通知》。在矛盾如此尖銳的情況下，一連發出兩次督促地、市、縣成立革委會的通知，這也是造成大批殺人的重要原因，在南寧地區表現最為明顯，迫使有的武裝部負責人竟然提出“槍杆子出政權”的口號。

二十八日 廣西“四·二二”常委黃達昇、高興學等在南寧市新聞電影院召開大會，宣布成立廣西“四·二二”野戰軍。黃達昇說：“區革籌、廣西軍區對大屠殺制止不力，我們成立‘野戰軍’的主要任務是：（1）支援各地‘四·二二’抗擊‘聯指’的大屠殺。（2）鎮壓社會上的階級敵人的現行活動。（3）打擊清理混進‘四·二二’的壞人。（“△”）

同日 東蘭縣“聯指”向“四·二二”派據點糧食局發動起進攻，“四·二二”派排成三隊出來“投降”。“聯指”派王金拿手榴彈擊一“四·二二”派人時手榴彈落地爆炸，炸傷十多人；“聯指”派少數人趁機大喊：他們搞假“投降”！當場打死“四·二二”派十多人，傷十人。（詳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 合浦縣武裝部召開“抓促”碰頭會議，貫徹區革籌“抓促”會議精神：“刮十二級颱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促生產。二十四日下午，大會通知到會人員集合乘車前往總江船閘。觀看了兩場公社兩個民兵槍殺兩個所謂“壞人”，為到會者作了殺人示範。第二天開會，欽州軍分區黃新平副參謀長在會上介紹了欽州、防城等地群眾起來殺“壞人”的“大好形勢”，並說：“對罪惡累累，民情極大的四類分子，群眾起來了，收他幾個看來問題不大，一定要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打下去，不然的話，我們就沒有世界做了”。縣人武部副政委陳卓球作總結說：“當前主要是抓階級鬥爭，西場、沙崗兩個公社把階級鬥爭抓了，一切工作都順利開展，大家回去要很好貫徹”。後會，全縣普遍出現成批亂殺人。……僅“抓促”碰頭會掀起的這股殺人風，三月份就造成一千多人無辜死亡。（詳見合浦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關於融安縣問題的處理意見的報告》，並報廣州軍區。（1）調派一定數量的武裝部隊進駐融安，在武裝包圍（“造反大軍”）後，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通過充分揭露（“造反大軍”）的錯誤行為，對其實行分化瓦解。（2）區別壞頭頭和群眾，孤立少數，爭取多數，教育受蒙騙群眾與壞人劃清界線，反戈一擊，揪出壞頭頭，交出所搶去的武器和國家財物。（3）對“造反大軍”提出嚴肅批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掌握鬥爭大方向。

三月

本月初，大新縣實境墟統生產隊長農立茂借“群眾專政”的邪風，為報復文革小組長旭清揭發他多吃多佔集體財物的私憤，指使同派的農紹明、黃立光半夜拿炸彈到農國勝的門前去爆炸。事

後，農立茂召集社員開會，說：“‘四·二二’膽子真大，竟用炸彈炸共產黨員農國勝的家”。即派民兵把農旭清、農德光等七人抓起來殺死。“處遺”時受害者已平反昭雪，農立茂被判十年徒刑。“文革”中，在派性和“群眾專政”的掩護下，挾嫌報復的事，各地都有發生，使成千上萬的人死於無辜。（見大新縣“文革”大事記）

一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廣州軍區發出《關於專職武裝幹部退出群眾組織的請示報告》。

二日 橫縣“聯指”攻打蓮花塘、周村等“四·二二”據點。整個事件共殺死一百四十四人。三月七日至三月中旬，蓮塘區、橫州區、校椅區等地又共殺一百零七人。（詳見橫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聯指報》二、三版刊登廣西“聯指”區直機關司令部、區黨委機關司令部寫的所謂《大叛徒霍泛的反革命罪行》的文章。

五日 廣西“四·二二”在南寧“造反樓”前召開萬人大會，強烈要求六九八四部隊回黨支左。大會通過了《再致韋國清同志的公開信》。（“△”）

六日 廣西“四·二二”的“草上飛”第二挺進隊又在南寧市張貼大字報，說韋國清調離六九八四部隊是為了孤立壓制“四·二二”。區革籌、廣西軍區領導說，這張大字報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毒草”。（“△”）

七日 晚上，區革籌小組開會，研究幾個重大問題決策。出席人：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鏞、伍晉南、安平生。列席人：徐其海、孫磊、吳華。韋國清說，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縣和鳳山縣的問題要處理，可以給中央寫報告，提出處理方案。博白縣已去了部分部隊，可以解決問題了。

歐致富說，融安問題應派部隊包圍起來解決。

韋國清說：對融安可採取解決裏高墟的辦法解決。看看需要多少部隊，對歐致富具體組織。鳳山縣是否也採取同樣辦法解決？（按：解決裏高墟的辦法是：區革籌、廣西軍區於二月二十九日命令六九八四部隊派二十四輛卡車的全副武裝人員去包圍裏高墟“造反大軍”，收回武器，並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

歐致富說，融安“造反大軍”有六百多條槍，一千多人，部隊少了是不行的。

魏佑鏞說，建議廣州軍區給廣西調部隊？

韋國清說，可以向廣州軍區提出意見，派部隊解決柳州地區的問題。對鳳山縣，建議由二二〇師派部隊解決。柳江縣的問題是否解決了？南寧的問題如何解決呢？（見區檔案館1967-1968年“文革”材料33卷區革籌會議記錄）

八日 廣西“四·二二”撤出進駐廣西日報社人員。（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本月上旬，宜山縣發生大規模武鬥。“聯指”聯合羅城、都安等縣“聯指”數千人圍攻“造反大軍”據點。八日，“造反大軍”從最後據點——四方樓走出投降。在武鬥中，宜山“聯指”使用了八二炮、十六·七毫米高射機關槍等重型武器，武鬥結束時，當“造反大軍”的群眾近萬人從城裏走出時，在東片、西片被殺害多人。（詳見宜山縣“文革”大事記）

十一日 廣西“四·二二”下屬“飛將軍”宣傳隊在南寧市張貼《今日戰鬥口號》。“不怕犧牲，收復據點”、“堅決粉碎韋（國清）老爺出錢，廣西軍區出槍，廣西‘聯指’出人屠殺‘四·二二’群眾”。

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給河池軍分區、鳳山武裝部發出《同意鳳山縣部隊進駐“聯指”據點，

保護群眾》的電報。

十二日《廣西聯指報》開始批判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傅雨田。二版整版篇幅刊登區人委辦公廳“革命戰鬥圖”寫的所謂《打倒大叛徒傅雨田》的文章。

十四日軍管《廣西日報》恢復出版。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為奪取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而奮鬥！》。

同日區人委“倒海翻江”撰寫了《劉少奇、陶鑄伸向廣西的黑手——歷史反革命、三反分子賀希明的罪行》。（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十五日區革籌、廣西軍區給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報告《關於寧明縣上石“農總”的問題》。報告誣說上石“農總”是一個“壞人”當權和聚集的組織。二十名領導成員中，所謂有地主分子一名、壞分子二名、勞管分子一名、投機倒把分子三名、“四清”下台幹部一名、有政治歷史問題被清洗回家三名、殺父之仇一名。“農總”的所謂“罪行”是：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公開誣毀“四清”運動，大搞資本主義，猖狂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農總”後台陸崇勳指著毛主席像說，“他下台我們就好過了，可以吃飽飯了”。（2）把四清運動誣為“強迫插隊青年清”、“口糧全家清”、“無理壓人清”、“貧下中農被打擊清”。（3）大搞資本主義復闢，頭目劉深海在社員大會上公開說：“誰想多開荒，吃得飽就來開會”。（4）搶奪民兵機槍一挺、衝鋒槍四支、步槍五十一支。（5）制定反革命綱領，要在今冬明春實現“四大自由”、“八項任務”；公開叫喊“賀龍元帥萬歲！”誣稱支援越南和守邊部隊是賀龍的部隊。

根據上述情況，我們（區革籌、廣西軍區）的意見是：（1）派部隊武裝包圍，強行收繳武器彈藥。（2）取締組織，嚴辦首惡分子。

同日《廣西聯指報》二、三版整版篇幅刊登魏佑鐘三月九日在廣西大學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橫掃派性，斬斷黑手，聯合起來，共同對敵》。講話指出聯合不起來，主要原因是有“黑手”破壞，他們挑動派性。因此，一定要斬斷“黑手”，才能鞏固聯合。講話暗示“黑手”就是所謂“賀、霍、傅、謝、袁”之流。

十六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廣西“四·二二野戰軍”情況和我們採取的措施的請示報告》說：“野戰軍”的組成及其發表的聲明、公告是錯誤的，把鬥爭矛頭指向區革籌和廣西軍區。他們組織挽留六九八四部隊“聯絡站”，阻止部隊調離，準備搞大規模武鬥，搞打、砸、搶、奸，辦地下工廠、商店等。“野戰軍”是由黑手、壞人和極左分子操縱的組織。我們要向“野戰軍”開展政治攻勢，分化瓦解，對“野戰軍”這樣少數壞組織的據點要以部隊武裝包圍，開展政治攻勢，全部收繳武器，交出壞頭頭。

十八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管會給軍分區的情況反映（三月五日至十二日）全專區共殺人二千左右，其中靈山縣殺了一千多人。（見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二日崇左縣武裝部科長黃玉輝召集到天等縣參加天等縣革委成立會的本縣代表開會。縣人武部長張洪恩對代表說：“天等縣紅色政權是用槍杆子打出來的，我們要向天等學習，也要用槍杆子來建立和保衛紅色政權”。結果，籌備成立革委會前就殺了九十四人。（見崇左縣“文革”大事記）

對天等、崇左縣殺人問題，在七月五日的專區革委常委會上，軍分區司令員兼專區革委副主任熊光武說：“天等縣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布置，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這次會議的報告中特別表揚天等縣已實現“一片紅”，號召各縣向天等學習，迅速實現“一片紅”。由於專區革委肯定天等以“殺人來建立和保衛紅色政權”的做法，致使全專區殺人更為嚴重。（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至十九日廣西“四·二二”航運“工總”召開形勢座談會。組織廣西赴京“控訴團”。有四百多人於六月中旬到京西賓館靜坐，要韋國清出來答復廣西武鬥問題。六月二十五日動員沖進京西賓館。控訴團靜坐到七月一日被解放軍押迴和平裏辦“學習班”。（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馬山“聯指”在縣人武部默許和縣委部分人支持下，調動一千多武裝民兵和三千多群眾包圍馬山“四·二二”佔領的馬山縣城。二十日總攻發射“飛雷”（炸藥包），二十五日命令“四·二二”投降。晚間“四·二二”逃走。“聯指”總指揮潘立成組織追擊圍剿，抓到俘虜大部分殺害。這次攻城用高射機槍一挺、重機槍三挺、輕機槍二十四挺、步槍……動用財物經費三萬五千多元，大米六萬二千多斤，毀房一百二十七間，公私財物損失達二十萬元以上。死亡一百九十九人。（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百色專區革委會成立。革委會主任由蘇毅堅（百色軍分區政委）擔任，覃展（地委副書記、專員）任第一副主任，張吉亭（百色軍分區司令員）、馬扶增（六九〇八部隊政委）、張平（百色地委副書記）為副主任。（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三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融安情況續報》認說，廣西“四·二二”融安“造反大軍”連日來召開大會小會，大道輿論要消滅“聯指”。為了解決融安問題，要求中央儘快批准調用部隊（兩個營和一個團）駐長安鎮（縣城）收繳武器，發動群眾揪壞頭頭。關於融安武鬥的情況根據“處遺”調查是這樣的。一九六八年元月七日，融安“四·二二”的“青年近衛軍”在長安河西車渡碼頭闖劫六八八六部隊軍車，搶得衝鋒槍九支和一部分糧食。二月九日下午，“造反大軍”由河西碼頭強渡過江，佔領東墟“聯指”據點。武鬥中“造反大軍”死人四，傷九人，“聯指”死四人，傷一人，其他群眾死二人。二十四日，融安“聯指”要求柳州“聯指”支援，攻打融安“造反大軍”。柳州地專“聯司”派出“工交兵團”支援融安“聯指”，二十六日圍攻融安“造反大軍”直屬庫據點，抓獲大軍三十六人，押解途中殺害十五人。在武鬥場上“聯指”死三人，“造反大軍”死五人。總共死二十三人。（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聯指報》突出刊登批判《今日的哥達綱領》。（《今日的哥達綱領——評“倒旗協議”》是柳州鐵路局“四·二二”《紅衛兵戰報》編輯部的文章）。同時刊登批判南寧市委副書記袁家柯的文章。

二十四日區革籌、廣西軍區給柳州支左領導小組發出《對四三一團率一、三營進駐融安的要求》的電報。並報廣州軍區、五十五軍、電報提出以下的幾點要求：（1）部隊行動必須秘密、迅速，對融安縣城形成包圍圈。（2）開展強大政治攻勢，收繳武器，交出壞頭頭。（3）清理外來人員。（4）部隊行動及執行任務過程中，由四三一團指揮，縣人武部做好群眾工作。部隊進駐融安縣城後，“造反大軍”從縣城撤到農村，建立據點，企圖保持力量。四三一團和縣人武部支持“聯指”，繼續圍剿“造反大軍”，結果，在融安境內，大抓大殺“造反大軍”和不同觀點的群眾。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縣人武部政委劉彬、副部長張子義和縣委副書記楊仲林、曹寬軍在長隆召開全縣貧下中農代表會議，貫徹上級有關抓階級鬥爭精神，劉彬、張子義等在會上布置刮“十二級颱風”，狠狠打擊“階級敵人”，在會上肯定譴頭公社新寨大隊大搞遊鬥，隨意打死被遊鬥者的錯誤做法。會後，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亂抓亂殺不同觀點的群眾的惡浪。七月上旬，板橋公社在“颶颶風”殺害七十五人。七月二十四日，劉彬和原縣長韋宗芬決定，由潘繼祥、劉新安、黃友明、陽青、蘇玉福等公社武裝部長和“聯指”負責人帶領融安“聯指”和三江侗族自治縣“聯指”武裝人員和縣人武部九九分隊，包圍雅瑤東平大隊平山頂大軍據點（駐軍據點只有四個人），打死造反大軍二人，燒死二人，“聯指”死亡一人。八月十日，縣革委會布置繼續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長安鎮在大刮“十二級颱風”中二次遊鬥。共打死九十二人。八月二十一日，縣革委會召開第一次各公社（鎮）革委會主任會議，肯定長安鎮的做法和經驗好。還組織前來參加會議的革委會委員到街上目睹殺人慘狀。這樣，全縣共殺害無辜幹部群眾七百二十三人。“文革”中全縣共死亡一千三百九十二人。其中國家幹部一百三十一人，工人四十六人，居民七十九人，農民一千一百三十

一人，學生八人。（詳見融安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 隆安縣革委會成立。杜易任革委會主任，連治國、蘇義、張久吉任副主任。同日，發布第一號文件強調：“對現行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要堅決鎮壓”。會後，小林區即召開群眾批斗大會，在會上打死七人。三月下旬至五月，隆安縣布泉區發生了十三起殺人取肝膽的慘禍，被取肝膽者二十四人，為首策劃和參與分要肝膽的是區武裝部長黃以奎（已故），和區武裝部幹事韋玉清、周朝珠、隆秀任等人。七月七日成立了以杜易為首的落實“七三”布告五人領導小組，印發“七三”布告十七萬份，舉辦落實“七三”布告學習班，參加人數十二萬多人，開現場會，推廣亂抓亂鬥打死人的經驗，全縣打死一百二十人，逼死（自殺）八十三人。各社、隊結合揪“反共救國團”，又打死一百六十三人，逼死三十六人。八月中旬，杜易主持召開全縣廣播大會，再次強調要解決“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和“怕字當頭”的障礙，大戰八、九月，向“階級敵人”猛烈進攻。到九月底，全縣鬥打死四百五十五人，逼死（自殺）二百六十九人，佔“文革”期間全縣非正常死亡人數百分之五十三點一二。十月六日至十二日，縣革委會召開第三次全委（擴大）會議，貫徹自治區關於制止亂抓人亂殺人的“四·二三”通知，仍強調“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把那些極端陰險狡猾的、隱藏得很深的敵人統統挖出來”、到十二月底，全縣仍亂鬥打死、逼死四十一人，隆安縣“文革”十年中被迫害死一千三百六十三人，佔當時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四，縣革委會成立前，死亡五十八人，縣革委會成立後，打死逼死一千三百零五人，佔“文革”期間總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九十五點七。（詳見隆安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七日 南寧地區革委會成立，主任許長庚（軍分區政委）、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南寧地委副書記）、副主任賴光武（軍分區司令員）、李文軒（分區副司令員）、伏崇禮（南寧專區副專員）、（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 貴縣石龍公社松英大隊覃錫明（鄉長）組織亂殺人，用槍、棍、鋤打死無辜群眾四十人（其中有未成年的十二人，雙目失明老婦一人，未滿七個月嬰兒一個）。有十三戶男性被殺光（覃錫明“處遺”時被判死刑）。（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田東縣印茶地區“貧下中農革命老人揪鬥壞人行動指揮部”策劃殺人及偽造三起“反圍”案件。三月二十七日殺十四人，關押三十人。殺人前後偽造“中蘇美反共救國軍”案涉及數縣共五百七十七人。僅印茶片打死二十二，鬥打一百三十三人，傷二十八人，關押四十六人。（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 下午，南寧駐軍和各界群眾八萬多人在朝陽廣場舉行“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的誓師大會。誓討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反革命集團”。韋國清、魏佑鏞、焦紅光出席。韋國清在大會上作長篇講話。

是日 區革黨、廣西軍區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堅決擁護撤銷楊、餘、傅的職務和堅決擁護對黃永勝、溫玉成任命的命令》的電報。

二十九日 廣西“四·二二”指揮部因對“大聯合”和全區各地“四·二二”群眾慘遭殺害意見分歧，指揮部在“航運工總”船上召開會議，進行改選，撤銷龍智銘、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的常委職務，補選新的常委，由高興學任總指揮、黃達昇、蔣志恭為副總指揮。當時，區革黨、廣西軍區立即把龍智銘、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等四人接到軍區保護，讓他們參加區革黨工作，代表“四·二二”參加區革命委員會。從此，區革黨、廣西軍區把廣西“四·二二”分成老“四·二二”和新“四·二二”兩個組織，承認龍智銘等四人是代表老“四·二二”的，不承認改選後的“四·二二”。到清查“五一六”時龍被逼自殺；曾春生也被清出領導班子。

同日 廣西“四·二二”野戰軍“甞江風雷”發表《關於當前廣西時局的幾點緊急聲明》。表示堅決抵制即將成立的自治區革委會。宣稱這個革委會是“偽委會”、“派委會”。聲明還說“它的成立將會帶來象蔣介石一九二九年‘四一二’那樣的一場大屠殺”。被區革黨、廣西軍區定為“大

毒草”。（見《廣西聯指報》）

三月下旬，貴縣人武部、“聯指”調民兵一千多人攻擊大農村，打死“四·二二”派四十七人，傷十七人，炸民房二十六間，抓“四·二二”派十六人全被打死，共死六十三人；同一時間松英文革組長分十二次打死群眾四十人，以上共計一百零三人。（詳見貴縣“文革”大事記）

本月下旬，陸川縣“聯指”在武裝部支持下，策劃對“四·二二”圍剿。“四·二二”派被殺一百一十人。受牽連審查一萬多人，縣委副書記周履光等八人被集體槍殺後用炸藥毀屍。後稱“三·二四”事件（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三十日 區革黨、廣西軍區向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我區當前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勢的報告》，並報廣州軍區。

二十九日 撰寫《今日的哥達綱領》的肖雲（紅衛兵、柳鐵一中學生）在柳州市被逮捕。一九七二年七月被釋放，一九七九年一月給予平反（據柳鐵核查組材料）

四月

三日 區革黨、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廣西“四·二二”野戰軍的問題的請示報告》，並報廣州軍區。《報告》說，“南寧出現了干擾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較突出地表現在廣西‘四·二二’所屬的‘野戰軍’身上，他們排斥主張大聯合、三結合的人，還公開集會、遊行，直接把矛頭指向區革黨和軍區，通過大字報大造武鬥輿論。為了迅速排除干擾，爭取大多數，孤立和打擊壞人，打算公開表態，發動群眾對‘甞江風雷’所發表的聲明公開進行批判。對‘野戰軍’內的壞人、黑手和該組織的行動，要進一步查明”。

四日 廣西“‘四·二二’野戰軍”在南寧市朝陽廣場舉行“反右傾、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師大會”。參加大會有八萬多人。熊一軍、黃達昇主持大會。會上通過決議：（1）關於廣西“四·二二”指揮部參加自治區革委會成員和赴京代表人選問題的決定。（2）《關於成立南寧市革命委員會的聲明》。《聲明》說區革黨、廣西軍區批准成立的南寧市革委會是“派委會”（“△”）

是日 南寧地區革委召開常委擴大會。會議強調“革命大批判要持久地開展下去，要始終地把矛頭指向中國赫魯曉夫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及其在中南、廣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賀希明、霍泛、傅雨田之流。還要深入揭發和批判楊（成武）、譚（震林）、餘（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反革命兩面派、陰謀家的罪行”。（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是日 韋國清乘飛機赴廣州，向廣州軍區彙報廣西“四·二二”當前動向問題。（“△”）

是日 《廣西日報》頭版突出報導南寧北岸磚瓦廠革命委員會《以毛主席最新指示為武器，堅決粉碎敵人破壞陰謀》的消息，消息說該廠革委會的誕生，是經過嚴重的“階級鬥爭”，粉碎了“階級敵人”把矛頭指向革委會。現在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公開向革委會挑戰，又被廣大群眾粉碎他們的“陰謀”。（見《廣西日報》）

五日 區革黨、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南寧出現“打倒伍晉南”等標語的情況報告》。

是日 《廣西日報》頭版頭條報導《南寧市文化大革命形勢越來越好》。報導說在解放軍“三支”、“兩軍”人員的幫助下，革命大聯合、三結合洪流滾滾向前，革命大批判烈火越燒越旺，“工農業生產欣欣向榮”。報導要求以實際行動迎接自治區、南寧市革命委員會的誕生。頭版下半版轉載上海《文匯報》社論《徹底粉碎右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見《廣西日報》）

是日欽州專區革委會成立，主任王曉峰（欽州軍分區政委），副主任曹俊德（欽州軍分區司令員）、蘇桐卿（欽州軍分區副司令員）、騰世舜（欽州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林中（欽州地委副書記、專員）、閻慶身（欽州專區副專員）。（見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六日《廣西日報》開展對《今日的哥達綱領——評倒旗協議》的批判。一版整版篇幅刊登毛主席語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共二十一條。二版上半版發社論《今日的哥達綱領必須徹底批判》。二版下半版刊登柳鐵沿線軍民狠批大毒草《今日的哥達綱領》的特大消息。三版以整版篇幅刊登衛東思寫的《今日的哥達綱領的要害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等批判文章。

七日廣西“四·二二”紅衛兵五百多人集會並遊行到廣西軍區請願，強烈反對成立南寧市革命委員會。併發表聲明，說即將成立的南寧市革委會就是“派委會”。他們就這個問題呈送了《給區革籌和韋國清同志的公開信》。（“△”）

是日《廣西日報》二版在《舉起毛澤東思想千鈞棒，批臭大毒草〈今日的哥達綱領〉》通欄標題下，刊登《射向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發黑炮彈》等四篇批判文章。

八日廣西“聯指”三萬多人集會，“敦促南寧市革委會成立”，會後遊行到廣西軍區。口號是：“堅決擁護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的正確領導！”“堅決支持南寧市革委會成立！”、“堅決打倒袁家柯！”（“△”）

同日廣西“四·二二”的“飛將軍”發表《緊急聲明》：（1）在廣西的“龐大人物”及其一小撮“黑手”操縱下，原定四月八日成立所謂南寧市革委會是抹殺三個“照辦”，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官辦的派委會”。（2）堅決支持廣西革命造反派抵制和砸爛這個“官辦的派委會”。（3）廣西“四·二二”的紅衛兵“四·七”革命行動好得很！好極了。（4）不擊退右傾老保的翻案妖風，誓不收兵。（“△”）

九日南寧舉行幹部群眾大會。韋國清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永遠忠於毛主席、誓死保衛毛主席，全面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標，痛擊右傾翻案分裂主義，反對右傾保守主義！》。講話第一部分是關於當前形勢大好問題。第二部分是堅決痛擊右傾翻案、右傾分裂主義的逆流，反對右傾保守主義問題。韋國清說，江青強調指出，現在我們提出在革命的進程中，要防止敵人從右的方面來動搖、瓦解我們同他們的鬥爭。當然也要防止“左”傾冒險主義，右“左”這兩“極”是一脈相承的。江青這個指示非常重要，非常深刻，非常正確，非常深刻地指出了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分裂主義。現在有人喬裝打扮，蒙騙群眾，詭稱自己是革命群眾幹部，企圖混進革委會。如南寧“甞江風雷”三月二十九日《關於當前廣西時局的幾點緊急聲明》中，公然揚言要“堅決抵制南寧市這個‘偽委會’、‘派委會’”，還誣說什麼革委會的成立，就是要搞象蔣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那樣的一場大屠殺。北海市的“狂人”戰鬥隊四月五日拋出一個“反動”的《論時局鬥爭的任務》。我們廣西有人參加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工農兵文藝座談會”的黑會，我們廣西文藝界演了黑戲《新時代的狂人》，他們興風作浪，要想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要警惕反革命兩面派進行反革命活動。請看劉、鄧、陶以及他們的黑爪牙彭德懷、賀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王任重、譚震林、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等，就是反革命兩面派，要識破他們的反革命真面目，把他們揪出來。……”。講話第三部分是今後的任務問題。會後，全區各市、縣都根據大會提出的口號，強調反對“三右”，並組織“保紅部”，糾察隊，刮十二級颱風，結果五、六月份全區被殺害幹部、群眾在二萬人以上。（見十一日《廣西日報》）

同日《廣西聯指報》一版發表社論《向階級敵人刮起十二級颱風》。社論與韋國清上午的講話精神是一致的，矛頭指向對立派。說什麼“黨內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特務、叛徒、地富反壞右分子互相勾結，興風作浪，刮起了一股右傾翻案、右傾分裂的反革命逆流”。賀、霍、傅、謝、袁的黑幹將狂叫什麼“韋老爺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屠殺‘四·二二’群眾啦，什麼軍事鎮壓啦”等等。他們把當前我區大好形勢描繪成漆黑一團。社論號召“聯指”戰士要立即行動起

來，堅決反對右傾保守，向階級敵人主動地不停頓地發起猛烈的攻擊，向階級敵人刮起十二級颱風，徹底粉碎階級敵人的右傾翻案、右傾分裂反革命逆流，為奪取我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再立新功。

同日《廣西日報》三版又以整版篇幅刊登四篇文章，批判《今日的哥達綱領》。四版整版刊登“革命委員會好”的六張巨幅照片。

十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廣西參加天津黑會和演黑戲情況的報告》並報廣州軍區。報告指出，現已查明廣西參加天津文藝黑會的有：廣西工農兵業餘文藝革命造反總部梁寅光（南寧造船廠工人），南寧化工廠趙永茂，柳州鐵路“四·二二”黃光佑等六人。這些人開會回來後，於十二月二日在區文聯傳達了黑會精神，調整了組織，健全了文藝組、美術組、編輯組，決定出版刊物，大喊大叫。廣西話劇團“四·二二”所屬的“東方紅”排演了黑戲《新時代的狂人》，導演是一個有殺父之仇的吳桐華。我們對黑會、黑戲採取的措施是：一、查清了廣西參加天津黑會的組織和人員。二、貫徹了江青的指示精神。三、發動群眾揭批圍剿的罪行。

同日《廣西日報》一版在《打倒賀希明、霍泛、傅雨田》通欄標題下，發表圍樞社論《打倒中國赫魯曉夫在廣西的代理人》。同時刊登區衛東寫的批判文章，題目是《把賀希明、霍泛、傅雨田徹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是月上旬，巴馬瑤族自治縣“四·二二”部分人從縣城撤至羌墟公社下乙屯。縣武裝部、縣“聯指”獲訊後，於四月八日至十一日，以縣武裝部副部長李彥智、羌墟公社武裝部長盧金珊、副部長黃正義、乙墟大隊革委會主任覃德強等人為首，組織民兵和“聯指”數百人，武裝圍剿少數派，共殺害三十戶（全屯四十六戶）五十六人（這些人中有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八人，十歲和八歲兒童二人，不足三歲的嬰兒三人），燒毀民房四十四戶，一百三十三間（全屯一百四十間），估計財產損失約七萬多元。圍攻後，幸存者流散他鄉，整個下乙荒無人煙，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陸續搬回重建家園。（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一日南寧舉行群眾大會。“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堅決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撲’！”韋國清、歐致富、魏佑謙、焦紅光等出席了大會。魏佑謙、焦紅光分別就“堅決粉碎右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問題，發表了長篇講話。他們號召軍民要投入運動中去，反對所謂“右傾翻案風”。（見十二日《廣西日報》）

是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和廣州軍區發《駐梧州部隊武器被搶情況報告》說：（1）本月十日中午，梧州“聯指”召開批判大毒草《今日的哥達綱領》，保衛毛主席誓師大會，會後遊行時，被梧州“四·二二”造反大軍“衝擊”而引起了武鬥，互相開槍開炮。部隊五十多人前去制止未成，被打傷七人。（2）同日十六日許，梧州“聯指”分別“衝擊”軍分區、市人武部、分區獨立營、監獄、看守所，“搶奪”武器和軍用物資如下：軍分區被“搶奪”手槍一支、步槍二百四十五支、衝鋒槍四支、機槍二十支、重機槍五挺、高機二挺、六〇炮一門、八二炮一門、手榴彈一百多枚、子彈四千多發、電台一部、市人武部被“搶奪”各種槍支八十二支，子彈三萬三千二百多發。六六〇團三營被“搶奪”衝鋒槍十四支，手槍五支，輕機槍六挺、軍裝六十套，存款九千二百多元，糧票八十五斤。分區獨立營被“搶奪”步槍十六支，輕機槍一支，六六〇團有五名戰士被打傷。

同日《廣西日報》二版以整版篇幅報道連日來南寧群眾集會《堅決徹底粉碎右傾翻案反革命逆流》消息。三版發表社論《堅決粉碎右傾翻案、右傾分裂主義的反革命逆流》。四版在《堅決打倒賀希明》特大通欄標題下，發表紅衛東寫的《徹底批倒賀希明在財貿政治工作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文章。

是晚魏佑謙等召見廣西“四·二二”部分常委，指出有“黑手”操縱他們。

十二日 下午，廣西“四·二二”一萬多人在南寧市朝陽廣場集會，反對南寧市革委會成立。大會的口號是：“要革委會，不要派委會！”“南寧市革委會是派委會！”（“△”）

是晚 區革黨、廣西軍區領導魏佑鏞等接見南寧市革委會領導成員，勉勵他們把革命委員會辦成革命化、戰鬥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把南寧市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是日 區革黨、廣西軍區向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發出《關於成立區革委會籌備工作中遇到的問題情況報告》，說有少數人破壞，尤其是“四·二二”部分組織和少數壞頭頭表現突出。他們在區革委會人選問題上設置障礙，我們提名，他們不同意，協商無法進行，說“‘四·二二’野戰軍所屬的組織混進壞人”，挑起派性。“聯指”抓他們參加天津黑會的幾個“壞人”送警局，他們反抓“聯指”的人不放，糾纏不休，掌握的武器拒不上交，要搞大武鬥。《報告》還羅織罪名說“在他們控制區據點附近，壞人橫行，開辦地下工廠、商店、野戰軍所屬‘雄鷹’、‘崑江風雷’等組織，大搞打砸搶，強姦婦女十多人，打傷解放軍七人。他們挑撥群眾與解放軍的關係。誣毀解放軍鎮壓造反派。上述情況表明，我們越接近勝利，他們越掙扎。我們要繼續宣傳最高指示，儘快要‘四·二二’提出參加革委會的名單來，要狠抓階級鬥爭，增派部隊進駐‘四·二二’野戰軍控制區，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要他們上交武器，對拒不交出武器者，採取強行收繳”。

十三日 南寧市革委會成立。主任：韓世福（廣西軍區副政委），副主任：張正安（獨立二師政委）、肖專（市委書記）、王恩厚（市委副書記）、梁中一（市武裝部長）、李瑞祥（市武裝部政委）。上午，在區體育場舉行慶祝大會。韓世福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說：“南寧地處援越抗美前線，國民黨反動桂系軍閥的巢穴，這是有帝、修、反的暗藏特務、間諜、殘存桂系班底，有派派殘渣餘孽，安插有中國赫魯曉夫的徒子徒孫。……”歐致富也在大會上講話。韋國清、魏佑鏞、焦紅光、安平生等出席大會。會後舉行盛大遊行。

與此同時，廣西“四·二二”兩萬多人在南寧市朝陽廣場集會，反對南寧市革委會成立。會後遊行示威，隊伍開到市革委會門前阻擋懸掛“南寧市革命委員會”牌匾時，發生了對抗性的衝突。（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貴縣舉行慶祝縣革委會成立大會。在革委會名單中，由於把“聯指”頭頭誤作“四·二二”代表參加革委會，引起“四·二二”不滿，說革委會是縣人武部包辦代替的“派委會”、“假委會”，並衝擊慶祝大會。“聯指”開槍打死了一個小孩劉小圓，“四·二二”抬劉小圓屍體衝擊大會主席台，撕毀大會橫額，砸爛縣革委會牌子，這就是貴縣“四·一三”事件。四月十四日，貴縣“聯指”以“四·二二”破壞紅色政權為由，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簡稱“保紅部”），調千餘武裝民兵進城，對“四·二二”群眾刮“十二級颱風”。一是圍攻炸毀“四·二二”據點，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殺人。在十天時間裏，捕了數百人，除當場打死外，其餘分別關押。從“四·一三”後的一個月裏，在貴縣城區殺害和迫害死二百三十多人。各公社做法縣城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貧下中農指揮部”、“貧下中農法庭”，大肆殺人。四月下旬，東津公社“貧下中農法庭”召開大會，搞示範殺人，公開殺害群眾三十八人，鬥死九十多人。五月上旬，縣革委層層貫徹玉林地區政工會議精神，強調反“三右”（右傾翻案、右傾保守、右傾分裂），繼續刮“十二級颱風”，五、六月份，全縣又有二千一百二十九人被鬥、打、殺死。在此期間，大嶺鄉柳江大隊民兵營長徐善富趁大批殺人混亂之機，任意奸人妻、媳，然後又把受害者的丈夫、家公殺掉，前後共殺了八人，民憤極大。一九八三年“處遺”時被判死刑。在揪“反圍”和貫徹“七三”布告中，七、八、九三個月，全縣又有八百五十多人被打死、殺死和逼死。整個“文革”中，貴縣共打死、逼死（自殺）三千一百七十一人，是死人較多的縣之一。（見貴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曾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戰士楊世昌（離休幹部），在坡騰公社同步橋頭被該公社黨支書黃仲芳策劃布置“聯指”派黃英權、黃大彬、謝安祥開槍殺害，是河池地區最早被害老紅軍之一。同日下午其妻陳仁枝在練鄉公社六王屯被“聯指”人員殺害。（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至十五日 浦北縣北通公社旱田大隊革委主任策劃殺害二十二人，殺人前，搜刮死者的家產，殺人後，規定地、富寡婦及其女兒出嫁需經過“雙打”委員會批准（“雙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打擊投機倒把）。張玉使、符冠英、何運蘭、盧秀珍等四人改嫁時被交改嫁證費和兩女出嫁費八百九十四元。旱田大隊殺人前後共索取受害者錢物三千零六十六元四角一分。（見浦北縣“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 浦北縣北通公社十專學大隊在四月十三日聽了地區革委主任王曉峰電話會議的講話後，召開大隊及“革委”領導成員會議，研究決定於第二天（四月十五日）殺“反革命”二十四人，四月十六日又殺五十二人。從四月五日至五月六日殺五十六戶九十二人（其中十五戶被殺絕，一戶十七人被殺十三人），大隊治保主任黃芝珍是這次殺人的主謀並共刮死者財物二千七百零一元二角七分。（詳見浦北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上午，韋國清、魏佑鏞召見廣西“聯指”常委顏景堂等人，告訴他們有關成立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事宜。（“△”）

是日 下午，區革黨開會，討論研究三個問題：（1）關於區革委會的人選問題。（2）在報紙上公開批判廣西“四·二二”“崑江風雷”“三·二九”聲明大毒草的問題。（3）公開揭露參加天津“黑會”的人的問題。（“△”）

是日 《廣西日報》一版報道《南寧市革命委員會在階級鬥爭風暴中勝利誕生》。併發表社論《革命委員會要成為領導階級鬥爭的司令部——歡呼南寧市革委會成立》。二版刊登南寧市革委會成立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四版在《打倒賀希明、霍泛、傅雨田》特大通欄標題下，又刊登了整版共六篇“批判”文章。

是日 桂林市革委會成立。革委委員六十五人，常委十九人。主任王斌（廣州軍區後勤部二〇分部部長），副主任郝忠雲（一一四師副師長）、陳秉德（市人武部政委）、劉竹溪（市委副書記）、李興華（桂林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馮邦瑞（桂林市長）、蘇玉山（桂林副市長（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是日 區革黨、廣西軍區給中央《關於南寧市革委會成立遭到“四·二二”反對情況報告》，並報廣州軍區。

十六日 區革黨、廣西軍區向毛主席、林彪、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寧明縣上石“農總”分部調查報告》。《報告》羅織“農總”之罪名是所謂：①組織人員非常複雜，其中“五類分子”二十六人，“反革命分子”九人，“壞分子”六人，有政治歷史問題四人，殺父之仇二人，“投機倒把分子”二人。成員共一百二十四人。②一些骨幹分子極端仇視革命委員會，反對解放軍，攻擊毛主席。③公開提出在農村中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八大綱領”。④誣毀攻擊偉大的四清運動。⑤該組織的頭頭企圖逃越南。⑥敵詐勒索、強姦婦女。《報告》提出處理意見是：用二〇〇師直屬營一個連、獨立一師一團二營五、六連、憑祥總站勤務連共四個連的兵力和直屬營全部，以迅速、突然的動作殲滅這股反革命土匪武裝。爾後留下少量部隊抓革命促生產，恢復秩序。四月三十日晚，廣西軍區調崇左駐軍六五〇部隊、寧明駐軍六八八一部隊、憑祥總站勤務連和寧明機場部隊共八個連，以及“聯指”武裝人員一千多人，包圍“上石農總”。由南寧軍分區副司令員黃漢雨和廣西軍區施鴻相處長親自指揮督戰。許鵬（縣人武裝部政委、縣革委主任）為總指揮。閻風奎（縣人武部副部長、縣革委常委）、鄭旭春（上石公社革委主任）為副總指揮。（詳見寧明上石農總大事件）

十七日 《廣西日報》三版刊登三篇文章批判賀希明、霍泛、傅雨田。這三篇文章是：區監委、區人委辦公廳革命領導小組寫的《剝開大叛徒傅雨田的偽裝》。解放軍某部鄭文寫的《霍泛反對農民學習毛主席著作罪該萬死》。紅衛軍寫的《從賀希明吹財賄政治工作機構看賀希明的反革命猙獰面目》。

十九日 廣西“聯指”指揮部在南寧市朝陽廣場舉行集會，聲言要堅決擊退“二月逆流”和“左傾翻案風”，徹底批判“四·一九”“反革命”聲明。（《廣西聯指報》）

是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文革、新華總社發出《關於新“四·二二”十八日集會情況簡報》。《簡報》說十八日有三萬多軍民在朝陽廣場開會（廣西“四·二二”），新華社廣西分社未經革籌小組同意，私自發出了這個會議的稿件，新華總社根據分社報道，將稿件插入十八日的綜合報道中。據此，我們認為：一、十八日的集會是新“四·二二”指揮部單獨舉行的。他們拒不參加十七日革籌小組召開的軍民大會，是分裂行為，我們不支持。二、新華分社的報道失實。十八日只有四千多人開會，無解放軍參加。報道加劇了兩派矛盾，建議新華社更正這一報道。新華總社未予更正。

二十一日 桂林地區革委會成立。主任張耀青（桂林軍分區政委），第一副主任景伯承（桂林軍分區司令員）、副主任吳新中（桂林專區副專員）、張東之（軍分區副司令員）、康凝（二〇分部副政委）、梁運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見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是日 龍州縣“聯指”和人武部、公檢法軍管會的幹部武裝包圍“四·二二”工總”工商聯據點，抓了九十多人，將十二人作為“壞頭頭”槍殺。事件開始發生時，南寧軍分區副司令員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縣革委會主任常玉善（縣武裝部長）堅持要打。攻打之後，殺了一批人，地區不作處理。結果，從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殺死一百七十七人，佔全縣在“文革”中死亡人數的百分之四十多。（詳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二日 廣西“四·二二”三萬多人在南寧市朝陽廣場集會，“慶祝‘四·二二’成立一週年”。會後舉行遊行示威，反對廣西軍區支一派、壓一派，反對大屠殺。

二十三日 韋國清、焦紅光召見廣西“聯指”常委顏景堂等人，向他們通報當前廣西“形勢”和促進革命“三結合”問題。（“-”）

同日 上午，區革籌魏佑鏞在區體育館開的大會上作形勢報告說：“當前主要危險是右傾翻案、右傾分裂、右傾保守、右傾投降”，“甞江風雷”的《三·二九聲明》是毒草，要開展批判和“對毒草不批判，對壞人不抓，是右傾保守”、“對壞人要充分揭露，堅決打擊”。（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柳州聯指”、“地專聯司”和“柳江聯指”負責人在柳州市委會議室開會，軍分區獨立營有人著便服參加，會上決定動用各縣武裝力量，把“造反大軍”武裝力量趕出柳州。會後，沈善澤到融安，楊光到融水，趙海廷到柳城，凡冠華到忻城，巫麗雲到來賓、合山、八一礦，韋鍾賢到象州活動，陳正基電話通知各縣。二十四日，融安由李太祥帶一百五十名武裝民兵，柳城劉德興帶一百人，忻城馬玉春帶四十人，柳江王文彬帶八十多人，象州肖成忠帶四十三人，八一礦四十多人陸續進入柳州市參加武鬥。（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新“四·二二”召開慶祝大會情況報告》。《報告》指責新“四·二二”指揮部昨天舉行大會，“隆重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八週年及慶祝廣西‘四·二二’成立一週年大會”。

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發給梧州軍分區黨委和梧州市“支左”領導小組電報：《立即制止放火、制止武鬥》。要求查清“造反大軍”連續放火燒房的原因，是哪些組織放火的，查清“造反大軍”內部哪些組織最壞，其頭目是哪些人。同時嚴禁“聯指”進攻“造反大軍”據點，不准調農民進城參加武鬥。梧州市“聯指”認為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又肯定了“火是‘造反大軍’放的”，“放火就是反革命”，於是，聯合梧州市“聯委”和地專“大籌處”共同圍剿“四·二二”造反大軍”各據點。由於“聯指”人多，武備好，兵力佔絕對優勢，“造反大軍”節節敗退，到五月四日，只剩下市人民銀行最後一個據點。當晚，地專政法兵團也來參加圍攻，“造反大軍”無力抵抗，於五

日晨被迫投降。這場大武鬥，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武鬥中打死二十餘人，傷三十多人。五日下午，“聯指”槍殺俘虜十九人，燒毀價值二千八百萬元的房屋一千零二十九幢（包括三個主要市場一百八十一間商店），建築面積三十八萬七千三百平方米，三千八百多戶共一萬九千二百多居民無家可歸，還燒毀了價值一千五百九十多萬元的國家和集體物資設備。武鬥結束後，“聯指”又四出搜捕所謂“有問題”的人，把抓到的人關押在錢鑾監獄，先後關押了五百九十多人，刑訊逼供，還非法殺害了四十三人。在此期間，梧州市“聯指”副總指揮、梧州市武鬥前線總指揮、市革委委員張炳坤（原是梧州市拖輪副駕駛長），先後分四批殺害幹部、群眾三十七人，其中拋入西江活活溺死二十五人，公開槍殺十二人。一九八三年“處遺”中被處以極刑，立即槍決。（見梧州地區“文革”大事件）

二十四日 昨天，魏佑鏞作“形勢報告”時，強調反對“右傾分裂、右傾翻案、右傾保守”，並傳達了康生關於謝王尚不能參加革命委員會的指示。今天，廣西“四·二二”的“倒海翻江”發表聲明，要求區革籌組織兩派調查謝王尚的問題。並聲明“四·二二”一方準備派人到天津調查謝王尚是否參加“天津黑會”等有關問題。（“-”）

是日 南寧專區革委會召開直屬機關幹部大會，由許長庚傳達區革籌魏佑鏞二十三日作的形勢報告。此後，南寧地區以及全區各地掀起了所謂“反右傾”的高潮，成千上萬人被揪鬥迫害以至喪命。（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區統戰部部長李隆被指為“現行反革命”，押送南寧警備司令部關押。遭殘酷批鬥、毒打、抄家和遊鬥，株連家屬。李隆由於在政治上遭迫害，精神和肉體上被摧殘折磨長達十三年之久，於一九八一年元月九日含冤逝世。一九八四年三月，區革委為李隆同志徹底平反。（詳見區黨委給李隆平反決定文件）

同日 至二十九日止，玉林專區革委會召開全專區政工會議。革委會主任、軍分區政委甘照寰、副主任、軍分區副政委孫泉芳、副主任蔣昌永分別在會上講話。會議中心內容是反擊“右傾翻案風”、擊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級颱風”。這次會議是亂抄亂殺人的風源，大批殺的先兆。會後，各縣貫徹會議精神，相繼出現亂抓亂殺。陸川縣革委會是在“三·二四”流血事件後成立的，一些人在殺人後進了縣革委會領導班子。在地區政工會議號召下，在殺人有功的影響下，四月下旬全縣出現了十一個公社一百五十五個大隊，有一百五十四個大隊布置殺人。從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全縣共殺害幹部、群眾六百七十四人。從縣北到縣南的公路兩旁到處是屍體。從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僅二十天，陸川縣就殺了一千二百二十九人。桂平縣批鬥了二千多人，打死五百零八人，逼死一百零三人，共六百一十一人。全專區“文革”中死亡一萬零一百五十六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反“三右”刮“十二級颱風”中被殺害的。（見玉林專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日報》一版發表社論《誓死捍衛革命委員會——徹底批判“甞江風雷”三月二十九日〈關於當前廣西時局的幾點緊急聲明〉》。三版整版刊登兩篇批判文章。一篇是衛東思寫的《痛擊反革命逆流，保衛革命委員會——批判“甞江風雷”三月二十九日的〈關於廣西時局的幾點聲明〉》。一篇是區民政廳宣傳組寫的《垂死掙扎，絕望的哀鳴——批判“甞江風雷”三月二十九日〈關於廣西時局的幾點聲明〉》。

是日 《廣西日報》二版發表社論《建設革命化的領導班子》。四版刊登三篇文章，繼續批判“甞江風雷”的“三·二九”聲明。這三篇文章題目是：《據山易，撼革命委員會難》、《絕不允許牛鬼蛇神翻天》和區黨委組織部寫的《徹底粉碎階級敵人的反革命陰謀》。

二十五日 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二十四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全社被殺害一百八十人，凶手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政堅打死後對其未滿十七歲女兒進行輪姦，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陰部。策劃者和凶手還對剩下的寡婦、女兒勒令改嫁，並徵收改嫁費。（見浦北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七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情況報告》的電報。提出的常委名單是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鏞、焦紅光、霍成忠、安平生、伍晉南、陳開路、吳華、徐其海、韓世福、王斌、郝忠雲、趙茂勛、肖寒、顏景堂、曾春生、廖煒雄、龍智銘、潘玉臣、章英、林福文、韋世經、毛鳳鸞等三十人。

同日《廣西日報》三版刊登七篇文章批判“邕江風雷”的《“三·二九”聲明》。南寧工代會寫的《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打斷反革命的脊骨》，南寧農代會寫的《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宣衛東寫的《把反革命暴亂的動員會批透批臭》等。

是日 南寧市革委會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開展革命大批判的計劃通知》，提出常委要集中開展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袁家柯之流的批判，並結合我市階級鬥爭的實際，批判《今日的哥達綱領》、《邕江風雷》的《“三·二九”聲明》、《狂人》等大毒草。（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 上午，廣西“四·二二”中學紅衛兵三百多人，在“四·二二”常委石妙甫帶領下到區革籌辦公室抗議有關區革委會人選問題，被定為衝擊區革籌辦公室，張貼“反動”標語事件。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發出《“四·二二”中學紅衛兵衝擊區革籌辦公室的情況報告》並報廣州軍區。

同日《廣西日報》一版頭條報道《到階級鬥爭第一線去領導階級鬥爭——浦北縣革命委員會積極領導人民主動向階級敵人開展進攻》。三版在《堅決打倒霍泛》通欄標題下，刊登所謂《痛斥霍泛“錢糧掛帥”的反動謬論》等五篇 批判文章。

同日 崇左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林興，常委祝元洪來 南寧新華街看大字報時，被該縣江洲區流氓來當的陳龍生、劉忠發現後，便糾集“四·二二”所屬組織“雄鷹”、“新工群”中的幾個壞人，把林、祝綁架到邕江照相館毒打致死。（詳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件）

四月 自治區“三辦”成立，至一九七六年七、八月撤銷。“三辦”前身是廣西軍區司令部第三分隊，一九六八年四月改為廣西軍區“三辦”，一九六八年八月改為區革委“第三辦公室”。並在地、市、縣建立“三辦”。“文革”初期，“三辦”由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親自抓，後由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劉重桂主管。正式改名為“廣西區革委第三辦公室”後，成立“三辦”。領導小組成員有：劉重桂、趙茂勛、宋治平、張治理、盧繼昌。全區立案審查的案件共有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三件。另雖未立案實際審查批鬥的幹部還有二萬一千六百四十名。區三辦本身審查的區直機關案件四百多件，其中區廳局級以上幹部一百一十九人，佔當時廳局級幹部二百二十三人的百分之五十三點三（“文革”初期審查的是一百七十人，佔百分之七十六點二）。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據一九八一年統計，在立案審查的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三人中定敵我矛盾性質的三千五百九十一人，其中給予雙開除的一百五十人，開除公職的一千四百二十五人，開除黨籍的五百三十五人，另給其他處分的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其中有因劉少奇冤假錯案株連受到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五人。這些同志直到一九八四年至八六年“文革”、“處遺”中才得了徹底平反糾正。

清理“五一六”實際上是派割線，執行“文革”中有一條以某人為代表的所謂正確路線，打擊另一派組織和不同觀點的幹部。所謂“五一六”集團的“罪行”“三指向”全是無限上綱或捏造強加於人的根本不存在的問題……。（詳見區黨委組織部“文革”大事件）

四月中旬，寧明、崇左、扶綏三縣公檢法軍管會抽調人員組成專案組，偵破所謂“中國青年黨”反革命集團案，造成了冤殺四人，錯殺三人，錯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四人的嚴重事件。一九八一年四月，經廣西區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復核，對上述案件中被判人員作了實事求是的糾正和平反處理。（詳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件）

四月下旬，欽州地區革委會成立第三辦公室（簡稱“三辦”），由軍分區副政委李金堂（專區革委政工組長）主管，獨立大隊政委常玉林、大隊長李東臨負責。各縣、市也相繼成立了這類機構，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據該地區四個縣、市的不完全統計，在審查地下黨中，受揪鬥迫害的地下黨員、老幹部和革命群眾達九千零八十七人。其中被誣為“叛徒”的二千五百九十二人，被誣為“特務”五百三十五人，被誣為“歷史反革命”的三千五百七十四人，其他一千三百八十一人。一九八三年“處遺”時，經各縣逐一核實，全部是冤假錯案。至一九八四年已全部給受害者平反。（詳見欽州地區“文革”大事件）

五月

一日《“四·二二”戰報》一、二版刊登《“四·二二”指揮部關於建立區革命委員會的緊急聲明》和“觀察家”寫的《狗急跳牆，孤注一擲》的文章，被區革籌、廣西軍區定為“大毒草”，二版還以《老壞翻天，老右奪權的大騙局》為題，說區革籌、廣西軍區上報一批指揮武鬥，殺害無辜群眾的所謂革命領導幹部參加自治區革委會。

是日 上午，魏佑鏞召見“聯指”常委顏景堂等人。向他們通報當前廣西形勢和對南寧市“階級鬥爭”採取的強硬措施問題。晚上，歐致富、安平生召見“聯指”常委顏景堂，談解決武鬥和制止搶槍問題。（“△”）

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柳州武鬥情況簡報》、並報廣州軍區。報告說，從四月三十日起，柳州兩派大武鬥已開始，“聯指”在河北向“造反大軍”進攻，用“三二〇”爆破法向“造反大軍”佔領區域拋送炸藥包。“造反大軍”用六〇炮和八二炮向“聯指”據點轟擊，打了一整天。同日，“聯指”在河南進攻，《簡報》說，在三十日，“聯指”佔領了“造反大軍”航運工總水廠、染織廠、郊區辦公室和河南鑄造廠等據點，“造反大軍”進攻“聯指”指揮部，死亡十五人（“聯指”六人，“造反大軍”三人，群眾六人），傷多人，柳江縣武裝民兵進城後與柳州“聯指”一起進攻“造反大軍”據點。目前，“聯指”可能繼續進攻，“造反大軍”可能放棄河北，固守河南、柳州支左領導小組正全力做兩派工作，促進雙方談判。

是日 南寧市革委會召開常委會議，會期兩天，學習毛主席關於“一個實質，兩個繼續”的最新指示、廣西軍區副政委、市革委會主任韓世福，副主任張正安、肖寒、王恩厚等出席了會議，韓世福、張正安、肖寒、王恩厚在會上發言，誣陷廣西“四·二二”“是走資派、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以及反共救國團和國民黨殘渣餘孽操縱、混入的反動組織”。為用武力徹底消滅“四·二二”大道輿論。（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南寧專區革委保衛組布置建立治安小組（或委員會），並組織專區糾察隊。其任務是協助公、檢、法捕捉壞人，維護社會治安，重以法在會上說“糾察隊一定要組織，打人民戰爭。一線的要發武器”。現在我們（是）和敵人鬥爭”、“專區直屬機關要成立五十多人的糾察隊，這支糾察隊是為“階級鬥爭”效勞的隊伍。（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三日 廣西“聯指”常委顏景堂在總指揮部（長征樓，後改為友誼商店）主持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決定去“搶奪”廣西軍區軍械庫武器彈藥。會上並由九人組成“搶奪”領導小組，顏景堂任總指揮。（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是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面對靈山、合浦、東興、上思、馬山、橫縣、博白、陸川等縣“聯指”下屬的一些組織亂殺不同觀點的群眾和“五類分子”情況十分慘重，向各專區（市）革委會和軍分區發出《關於制止亂殺人的歪風的指示》。

是日 十八點三十分，廣西“四·二二”所屬的一些組織去搶駐區體育場的六九三六部隊二營的

武器。在“四·二二”去搶槍時，六九三六部隊一營奉命乘車前往制止搶槍。廣西“聯指”總指揮部得知“四·二二”搶槍的消息後，立即組織沿途所屬組織攔截“四·二二”的汽車，抓“俘虜”。二十三時許，當六九三六部隊一營的軍車從二營住地返回，途經中華路、朝陽路村，被“聯指”、“汽司”、“紅色工人總部”、“後備軍”、“治安委員會”武裝掃射，軍車上被打傷三十一人，打死五人。次日，廣西“聯指”總部嫁禍於人，廣播說什麼“四·二二”搶槍部隊武器，攔截六九三六部隊軍車，打死打傷解放軍戰士多人。（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四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寧明“農總分部”問題的進展情況報告》說，一日四時前方對各點達成包圍圈，爾後逐步壓縮，控制高地，封鎖要道，進行了搜索，當地民兵在大部隊到來之前，已與他們發生了幾次衝突，雙方都有傷亡。這次部隊和民兵武裝包圍後，先後捕了六十二人，瓦解自首五十六人，打死九人，總共一百二十七人。繳獲輕機二挺，步槍二十七支，手槍二支。該組織主要頭頭都已逮捕。

同日 上午，南寧市直機關二千多人舉行“向階級敵人發動持久地、猛烈地進攻誓師大會”。韓世福、肖寒、王恩厚等出席大會。大會表示：“緊握槍杆子、筆杆子，堅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徹底粉碎右傾翻案妖風，把混入革命隊伍的一小撮走資派及隱藏的叛徒、特務、一切反革命分子統統挖出來，把他們打倒在地，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南寧市革委會召開幹部大會。韓世福、肖寒、王恩厚出席。張正安在會上作報告。他號召：“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階級敵人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日報》一版發表社論《黑會、黑戲必須徹底批判、追查》。社論說：“由中國赫魯曉夫黑幹將陸定一、周揚死黨之流，在天津導演的反革命黑會（全國工農兵文藝戰士代表座談會）和反革命黑戲《新時代的狂人》，是一小撮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向無產階級奪權的一次瘋狂反撲”。四版整版刊登左兵寫的《一個典型的“反革”復間陰謀》，揭露“天津黑會”、“黑戲”，株連、誣陷了廣西“四·二二”一大批人。

五日 從零時至十六時，廣西“聯指”總指揮部組織三千八百多人，出動汽車四十五輛、火車（客車）一列，到南寧市長崗嶺軍庫城庫“搶奪”武器裝備。共“搶走”各種槍支七千零四十四支，其中輕機槍四百七十九挺、高機四十八挺、六〇炮四門、炮彈六十發、子彈一百二十萬發、望遠鏡五十個。這是“文革”以來廣西發生“搶槍”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嚴重事件。“搶槍”總指揮是顏景堂，領導小組成員任樹人、張鋒等都到現場指揮。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和廣州軍區報告軍庫庫被廣西“聯指”“搶奪”的事件，並說：“我們現在正召集兩派頭頭開會，動員他們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交回武器”。（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南寧專區革委會發出《關於深入、持久地開展革命大批判的幾點意見》中強調要抓典型、打活靶子，不停頓地向“階級敵人”進攻再進攻。六日召開革委常委會議，主要討論區革籌、廣西軍區“關於制止亂殺人的歪風”的指示。但對前段亂殺人的處理問題上意見分歧。一種意見認為對以前亂殺人的要調查處理；武皇認為亂殺亂抓人之所以出現是“走資派”和壞人挑動；董以法則肯定“亂殺、亂抓人的原因是地富反壞右破壞文化大革命，引起群眾氣憤才殺的”。對如何髮指示董以法說“發《指示》後要起到鎮壓敵人和保護群眾積極性的作用，今後有壞人、走資派、叛徒、特務、四類分子進行破壞，群眾還要抓”。這樣的《指示》，怎能制止亂殺人之風呢？五月十七日，崇左縣湫湫龍山角集體殺害十四人；五月二十八日，大新縣民兵槍殺三人，剖腹取肝、陳屍郊外。全地區在五、六月份共打死、迫害死三千一百五十二人。（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六日 廣西“聯指”搶奪軍區軍庫武器裝備後，周恩來總理命令：搶走的武器彈藥限二十四小時內交回。（“△”）

七日 周總理又來電指示，對“聯指”五日搶槍事件，一定要嚴肅處理，並全部交回搶走的武器裝備。（“△”）

同日 在河池軍分區陳秉義副司令員親臨指導下，以巴馬縣武裝部部長李彥智為指揮長，組織有部隊、民兵和一些縣、社幹部共一千多人，開始了對羌墟、那桃兩公社的所謂“剿匪”工作。五月初，廣西軍區司令員趙欣然、參謀長馬慶功專程到巴馬布置巴馬、鳳山兩縣“剿匪”工作，並傳達了韋國清的指示：“這些人拿著武器，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政治土匪，兩縣要組織部隊、民兵進行圍剿”而採取的行動。在圍剿中共打死十九人（其中一人是關押後死的）。判刑關押四人，株連家屬四十九人，這場歷時四年多的“剿匪”於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結束，共耗資三萬六千餘元。一九八三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弄清了這起大冤案。河池地委發出[1984]10號文件《關於對巴馬瑤族自治縣“文革”期間發生的“剿匪”事件的平反決定》，對凡被列為“政治土匪”，遭到圍剿的人員及其受株連的親屬，一律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詳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件）

八日 周總理又來電指示，五日“聯指”搶走的武器要限期交回。

十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我們對“聯指”搶槍問題處理的錯誤的初步檢討》說道照總理五月六日、七日、八日指示，我們對廣西“聯指”五日大規模搶槍問題在處理上的錯誤進行了檢查。對“聯指”大規模搶槍錯誤的嚴重性和引起的後果認識不足，制止不力，措施一般化。“聯指”第一次奪軍區倉庫的武器是四月二十九日，我們以警司名義發出了不准搶槍，上交武器的《通告》，但由於我們思想麻痹，五月三日晚發生了“四·二二”搶奪歸國部隊高炮六四二團的武器，五月五日又發生“聯指”大規模搶槍的錯誤。五月六日總理親自下達了限期收繳武器的命令，我們對總理的命令理解膚淺，工作簡單，接到總理命令後，覺得一切好辦了，所以口就張得大了些，想借總理命令這個“東風”，提出收繳所有槍支，並適用於全區的意見，其實這樣要求是不對的，它既不符合總理的命令精神，也不切合實際。因為問題總要一個一個地解決，總要突出重點，一下子是不能解決全部問題的（總理六日、七日、八日命令，限“聯指”五日搶走的武器在二十四小時內全部交回，而區革籌、廣西軍區歪曲了總理的命令，說兩派搶走的槍支要在二十四小時內交回）。……

十日 柳州六九八五和五一九部隊又被柳州“聯指”（主要是柳鐵“鋼聯指”）再次“搶奪”武器設備。共搶去各種槍三百一十六支，子彈一萬一千零五十六發，六〇炮、迫擊炮二門，四〇火箭筒二具，並打傷幹部戰士四十七人，其中重傷二人。對此，區革籌、廣西軍區於今天下午報告了中央、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

十二日 廣西“聯指”總指揮部通過所屬的“瀝血兵”搞“禽獸展覽”（活人展覽）。“瀝血兵”將關禁在“聯指”總指揮部的不同觀點的林執真（區水電廳副處長）、張祖貴（區地質局處長）、黃海泉（欽州地區手工業經濟部副經理）、謝卓夫（“四·二二”“雄鷹”成員），以及孔祥興、黃強、張飛、方少華、黎之竟等十人，拉到南寧市北大路建築研究所，關進木籠，強行組織群眾前來觀看“禽獸”，展覽三天時間，使這十個人受盡折磨和侮辱，爾後，廣西“聯指”搞“禽獸展覽”遍及全區，受害者達一萬多人。（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在中央的催促下，歐致富召見廣西“聯指”總部和各“兵團”頭頭，再次傳達周總理“五六”命令，動員他們交回搶走的武器彈藥。（“△”）

同日 桂林地、市“聯指”頭頭伊景春、韓鳳歌、唐廷國、廖祖孫、孫忠祿、張燕生等，在荔浦縣召開桂林地區十二縣（缺資源縣）及桂林市“聯指”頭頭會議，會上編造了“桂林有十多個國民黨將級軍官參加了‘造反大軍’。國民黨連長以上參加‘造反大軍’的已組成一個團，集中在桂林市文化宮”的謊言。因此，會議呼吁各縣行動起來，保衛紅色政權——地、市革委會。會議還決定，每縣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駐軍和地、市革委會“反映情況”，爭取他們承認各縣派人進城

“保衛紅色政權”是革命行動。十七日，十二縣“聯指”共八十六人先到桂林市。地、市“聯指”頭頭李年生、曹鐵軍、伊景春、唐廷國等到東方紅飯店看望了他們。十九日晚，地、市革委會及駐軍負責人景伯承、吳新中、陳秉德、馮邦瑞等，在榕湖飯店小禮堂接見十二縣八十六位代表。在接見中，馮邦瑞表示不同意農民進城“保衛紅色政權”的意見，立即受到圍攻；桂林人武部政委陳秉德說：“感謝十二縣的貧下中農關心桂林形勢，提出了很好的寶貴的意見，對桂林形勢有很大促進”。（見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 武宣縣“聯指”攻打“造反大軍”，雙方死亡九十七人。原因是五月四日，武宣“紅七兵團”抓獲桐嶺公社“聯指”梁達堅，並搜去了一百二十多元錢和一些衣物。數日後，“紅七兵團”放人不退錢物。“聯指”總部遷怒於“造反大軍”，以“武宣縣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之名，調集六百多民兵，包圍“造反大軍”的北樓、北街、武宣小學一帶據點。十一日發起總攻，十二日，貴縣武裝部副部長廖秀峰率領三百多人驅車支援。“造反大軍”寡不敵眾，十三日突圍時大部被打死。共打死九十七人，毀掉房屋六十七間，價值三萬七千九百元。事後，非法抄家三十七戶，抄去財物約價值二萬六千六百多元，吃掉國家糧食二萬八千多斤。（見武宣縣“文革”大事記）

十六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韋國清、魏佑鏞、焦紅光請求赴京向中央彙報工作（當前廣西階級鬥爭問題）》的電報。

同日 還向中央文革報告《軍管的南寧市銀行解放路辦事處被廣西“工總”接管的情況》並報廣州軍區。

同日 《廣西日報》一版刊登昨日南寧軍民集會紀念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開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發表兩週年的消息。韋國清在紀念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他強調一定要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奪取“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

同日 玉林專區革委會政治部向自治區作《階級鬥爭情況綜合彙報》。彙報中列舉了一些階級鬥爭事例：

- 1、玉林縣六旺大隊在四月份的一個晚上，把全隊毛主席像燒掉，在文化室掛上劉少奇的像。
- 2、玉林縣五泉大隊盧善普說：“搞錯了劉少奇。×××的政策不好，限制我們的自由，劉、鄧最好，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 3、玉林縣小平山公社東方紅大隊發現“保衛劉少奇”標語。幾乎各縣都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七日 廣西“四·二二”指揮部在南寧市新華街等街道張貼大字報，刷大標語，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翻案，說他們不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大字報還指出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玉尚、袁家柯不是叛徒、特務、走資派，而是革命的領導幹部。

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所謂、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一案報告。說“我區破獲一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已捕獲團長一人，副團長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經濟部長一人，支隊長四人，聯絡站負責人共六十三人。繳獲反動組織綱領、反革命刊物、入團登記表、印鑒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繫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槍支彈藥等罪證”。電報還說“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於今年二月二日正式合併定名為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分團下設大隊、中隊，全區已發展匪徒二千多人”。電報還說“發展組織和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中的派性，易地活動，鑽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街（廣西“四·二二”控制區），利用“四·二二”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繫”。

根據“處遺”調查結論，所謂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一案，是廣西軍區、

區革籌利用“老反團”追查“新反團”，目的是要打擊鎮壓“四·二二”群眾組織，是一起特大冤假錯案。這宗假案是廣西軍區“支左”幹部王生江一手策劃授意由廣西“四·二二”分化出來的羅振龍、曾學文編造出來的。廣西軍區、區革籌向中央報告後，部署全區追捕槍殺大批無辜幹部群眾，後果十分嚴重。這宗假案到一九八四年才平反。（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河池專區革委會成立。主任張習理（軍分區政委）、副主任李均（地委書記）、孫長鎮（軍分區司令員）、華英（軍分區副司令員）、章瑞林（地委副書記）、毛鳳鸞（鳳山縣謀屯大隊基幹民兵、學“毛著”典型）。（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上思縣革委會常委、人武部長、公、檢、法軍管會主任段振邦製造了“枯那事件”冤案。這一事件共殺害了群眾和幹部九百七十三人。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左”後，標榜上思“聯指”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四·二二”是“反動組織”。是日，段振邦召開各公社領導、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以民兵“槍換肩”為名，布置收繳“四·二二”中民兵的槍支，裝備“聯指”。“枯那大隊聯指”民兵營長梁國雄奉段振邦之命，策劃收繳“四·二二”派民兵的槍支。大隊治保主任寧協利拒不交槍給“聯指”，並開槍打死民兵李巨才。事件發生後，段振邦向欽州軍分區誦報說，十七日發現枯那大隊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裝伏擊我民兵，瘋狂向我民兵開槍射擊……”（見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管[1968]軍管第10號《五月份主要敵社情況》及自治區公檢法軍管會保衛組《情況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誦報“匪情”的同時，派縣武裝部副部長韓剛生率“聯指”武裝民兵三百多人開赴枯那“剿匪”。經過幾天“圍剿”，一無所獲。七月九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管會弄清了事件真相，向自治區報告了實情：“枯那大隊並未發現土匪”。自治區公、檢、法軍管會保衛組相應於七月二十五日《情況反映》第十期中，明確更正：“經查實，上思沒有土匪活動……”，澄清了事件。但縣人武部和段振邦為了實現派性殺人的目的，於八月十六日又向欽州軍分區誦報：“枯那確有土匪，如今逃散在鳳凰山、唐金山一帶”欽州軍分區報告請示廣西軍區。軍區命令：“要搞掉他！”於是，縣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揮部。段振邦和駐軍營長苗承義負責指揮“剿匪”。欽州軍分區副司令員楊伊銘前來坐鎮“剿匪”，調動本縣“聯指”民兵和欽州、東興縣“聯指”民兵及部隊共一千多人包圍上思“匪區”，設卡搜山，沿戶清查，伏擊聚殲。結果，依然沒有發現一個土匪。八月二十三日，段振邦又生一計，由縣革委會張貼剿匪《布告》。《布告》說：“凡窩匪、通匪、濟匪者，與匪同罪”。“要在全縣範圍內進行挖黑窩、拔釘子的清匪運動”。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幹部大會上宣布：“誰跟山上土匪有聯繫，一律槍斃！”對“四·二二”派和持有不同觀點的幹部群眾強加“通匪、濟匪、窩匪”之罪名，“與枯那反革命事件”有關者，統統與匪同罪，大抓大捕一千六百七十一人，殺害九百七十三人，其中國家幹部一百四十九人。特別嚴重的是枯那大隊，冤殺了六十一名無辜的平民百姓。（見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決定派歐致富率十人工作組去柳州市解決武鬥問題。部隊各支一派，駐柳五十五軍支持柳州“造反大軍”，廣西軍區和柳州軍分區支持柳州“聯指”。（“△”）

十九日 晚上，韋國清召集魏佑鏞、焦紅光、安平生等開會。會議主要內容是：為了順利成立自治區革委會，要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狠抓“階級鬥爭”，開展革命“大批判”，揭開“階級鬥爭”蓋子，鞏固和發展革命大聯合、“三結合”問題。會議還研究南寧市解放路銀行辦事處被“四·二二”廣西“工總”接管問題的處理辦法。（見區檔案館1967-1968年“文革”材料33卷）

二十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各軍分區和革委會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偵破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問題的指示》。《指示》說，“我區破獲的‘反團’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僅涉及面廣，而且敵人鑽進群眾組織（‘四·二二’），利用派性發展串連。已捕的六十九名罪犯，偽、軍、政、警、憲和‘牛鬼蛇神’、地富子弟佔百分之七十五。主要罪犯已捕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各級革委會和軍分區黨委，還要進一步引起重視，把這一案當作一個戰役來抓，指定專人，組織專門辦公室，充分發動群眾，力求迅速徹底偵破，並儘快結案懲處。當前該案工作重點是集中罪證、集中主犯，追組織、追聯繫。”……

同日 上午九點多，廣西“四·二二”所屬的“青年近衛軍”（簡稱“青近”）幾個人背槍在南寧市華強糧店附近巡邏，被糧店旁邊市測量隊宿舍的“聯指”據點駐守人員開槍射擊。“青近”進行還擊，被“聯指”打死兩人。接著，“青近”以為華強糧店駐有“聯指”武裝人員，便攻佔華強糧店。在攻佔中，青近“炸毀糧店三樓一間房，糧店一職工及其妻、女三人被炸死。攻打人在見樓上並無“聯指”武裝人員，遂於當天下午六時撤離糧店。這一事件轟動了南寧市。（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是晚 韋國清召集魏佑鏞、焦紅光、安平生、伍晉南開會，對兩派爭奪，攻佔南寧市華強糧店歸罪於“四·二二”一方，譴責“四·二二”的“青近”、“雄鷹”等組織開槍射擊，爆炸糧店樓房，“搶劫糧食”，打死群眾等一系列嚴重政治事件。（“△”）

二十一日 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根據韋國清等指示精神，發布了《關於華強糧店被“四·二二”搶劫、大樓被炸毀的嚴重政治事件的通告》。《通告》說，“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黨內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社會上牛鬼蛇神蒙蔽部分群眾，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為”。（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拂曉，柳州市“造反大軍”頭頭白璧平、廖偉然和“柳鐵工機聯”的頭頭王反修、李振穎等人，為了對付柳州“聯指”的武裝圍剿，竟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搶援越子彈八個車廂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箱，共計一千七百萬發。王反修、李振穎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下了收條。事情發生後，區革籌、廣西軍區立即電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見柳州地區、市“文革”大事記）

是日 十時二十分，黃永勝給歐致富、霍成忠來電：“請歐、霍二人負責處理柳州搶援越物資的問題”。“給群眾組織做工作，把子彈追回。要向他們指出，他們這樣做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是違背國際主義原則的，這種行為是錯誤的”。

二十二日 廣西軍區政治部印發所謂《關於鳳山縣武鬥情況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說該縣武鬥嚴重的原因是：第一、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黑線”串到鳳山，“叛徒變節分子”廖熙英、黃德昌，“右派分子”陳緩章，“下台幹部”莫以同和“走資派”覃家修（副縣長）等挑起來的。第二、“國民黨反動派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歷史反革命、暗藏特務及社會上牛鬼蛇神”混進群眾組織，進行“階級報復”。第三、“黑線”從外地伸向鳳山。南寧“工總”有人來，德保縣長、“走資派”林維龍、東蘭縣副縣長、“走資派”劉王義來過鳳山“活動”。此外，還有“香港特務”也插手鳳山。

調查報告還指出：“鳳山是廣西軍區和廣州軍區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先進單位，是中南地區的一面旗幟，卻遭到‘南霸天’——陶鑄和廣西黨內‘走資派’賀、霍、傅之流的極端仇視。那裏一小撮‘階級敵人’以革命老人的面目出現，狂叫什麼：‘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同志，我們一千個不同意！一萬個不同意！’他們還狂叫‘劉少奇萬歲！’”“有的甚至經常寫信給鄧小平，要求翻案”。

調查報告要求對鳳山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文革”。“挑起武鬥”要採取“強硬措施”。（區檔案館1967-1968年“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四日 地處鍾山縣的平桂礦務局“四·二二”被圍剿。賀縣、鍾山、富川、昭平四個縣和梧州地、市“聯指”，在軍分區、人武部和革委會的策動下，先後組織了一萬多人到平桂礦圍剿只有八百多人的“四·二二”派群眾。這場圍剿持續五十多天時間，雙方共死亡四百多人，平桂礦務局有二百二十三人是被“聯指”抓到後打死的。這次圍剿，使平桂礦所屬各廠、礦幾乎停產半年，經濟虧損九百多萬元，西灣銀行損失十六萬多，西灣糧所損失糧食八十多萬斤。這是平桂礦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慘禍。（見梧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 歐致富、霍成忠不按黃永勝指示，動員柳州“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交回搶走的援越物資——子彈，而是命令駐柳州隊高炮七〇師所屬兩個團、一四四師兩個營的兵力，對柳州“造反大軍”和“工機聯”一方面的武器彈藥。在部隊把幾個“據點”包圍後，柳州有數萬群眾對前來包圍“據點”的解放軍實行了反包圍。群眾高呼，“反對廣西軍區支一派，壓一派，把槍強暗送給‘聯指’，屠殺‘四·二二’！”“廣西軍區為何不收繳‘聯指’搶走的槍彈？”“‘造反大軍’不能空手等死！”……解放軍被群眾包圍後，在互相交手中，部隊二十多人受傷，二人重傷後身亡。群眾反包圍又奪解放軍七百多支槍。從此，柳州局勢進一步惡化。（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七日 六九八四部隊被調走後，廣西“四·二二”（即南寧）已失去部隊支持。於是，廣西“聯指”大舉向“四·二二”進攻，雙方據點互相開槍開炮。當天，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發出《南寧情況簡報》說，“四·二二”新指揮部所屬的一些組織，繼續向“聯指”開槍開炮，封鎖交通，搶佔據點。由二十一時四十五分開始，從“造反樓”向“聯指”據點桂劇院和“軍管”單位消防樓，連續發射三七高炮彈數十發，傷亡情況待查。“航運工總”又一次用機槍掃射西園招待所（住有老過外賓）未傷人。去上石執行任務（圍剿上石“農總”的部隊乘車歸來，在峯江大橋上遭“四·二二”開槍射擊，未傷人。由於“四·二二”晝夜用火力封鎖交通，使市內運輸中斷，糧食供應非常困難。他們四處開槍打死打傷人，廣大群眾義憤填膺，如事態繼續惡化，大武鬥有可能發生。

同日 圍剿上石“農總”的部隊於今天開始撤離。區革籌、廣西軍區給中央、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的報告說，根據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指示，我們即組織部隊分批歸建。各參戰部隊回原單位駐地，指揮所於二十九日返回南寧。留下獨立一師一團二營六連率二個排駐上石、練江、三壩，繼續追捕外逃的三個壞頭頭，由縣人武部政委許鵬指揮。

二十八日至六月四日 柳州軍分區召開縣區革委主任會議。公、檢、法軍管會主任王仲偉傳達自治區公、檢、法會議精神，軍分區副參謀長何文普傳達自治區“抓促”會議精神，軍分區政委郭鵬在會議總結中反覆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克服兩怕（怕打擊敵人，怕群眾運動過了頭）、一鬆（鬆懈情緒）的右傾保守思想，這是狠抓階級鬥爭的關鍵，“要向階級敵人發動主動持久的猛烈進攻”。並作具體布置（一）要刮十二級颱風，要專壞人的政，大小會鬥，搞展覽，遊街示眾等。（二）要建立人民糾察隊，設哨卡，清查壞人，對壞人專政。會後，各縣分別召開各種會議傳達貫徹，全專區大刮十二級颱風，造成了亂鬥、亂殺人的極其嚴重的後果。（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 中央文革來電，同意韋國清、魏佑鏞、焦紅光的請求，今天上京向中央文革彙報工作——“當前廣西階級鬥爭問題”。

三十日 廣西“四·二二”區展覽館據點為解除“聯指”林業廳大樓據點對自己的威脅，於今天中午由關家穩帶領十一人，化裝解放軍，進入林業廳，沖上大樓，搗毀“聯指”據點，打死堅守據點的“聯指”成員十二人，打傷一人，搶奪據點裏的兩挺機槍，十多支步槍，炸壞辦公大樓和宿舍大樓各一幢，開炮引起火燒和炸壞林業設計隊辦公大樓一幢，搶走大米和公私財物一批。“聯指”總指揮部發現後，組織反攻，一直打到晚上。“四·二二”撤退時，被“聯指”打死了二人。這就是“文革”中影響較大、後果嚴重的“五·三〇”事件。

是晚 焦玉山、安平生召集廣西軍區、南寧駐軍負責人開會，討論區林業廳事件。他們一致認為，林業廳事件是一起“有組織、有計劃的嚴重政治事件”。會議決定除立即向中央報告外，併發出通告，公開表態。

是晚 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立即發布《公告》，把這一派性殺人的“五·三〇”事件定為“極端嚴重的反革命犯罪行為”。區革籌、廣西軍區於當晚電報中共中央、中央軍

委、中央文革，並報廣州軍區。同年八月，解放軍打下展覽館後，關家福等人被關押判刑。（見桂林黨廳“文革”大事記）

三十一日 桂林專區革委會、軍分區在興安召開“抓革命、促生產”會議。會議由專區革委會副主任、軍分區副司令員張東芝和聶道友、尹忠信主持。會上提出：“當前革委會主要任務是抓階級鬥爭”，對“階級敵人”該關、管、殺的就關、管、殺。各縣回去後，都製訂了對“階級敵人”關、管、殺的具體措施。全地區從六月到八月的三個月裏，亂殺了八千五百零三人。（見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聯指報》發表了《誰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劉、鄧、陶之流翻案就堅決打倒誰》、《批臭廣西“二黑”，砸爛文藝黑網》等文章，文中點了四十多人的名字，說他們“是一個隱藏在革命營壘裏的反革命地下獨立王國”。（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聯指”為了配合“大部分”進攻柳州“造反大軍”，“聯指”的“保衛部”梁國開、周繼才、覃紹昌等骨幹研究決定，提前處理關押在柳州市禮堂不同觀點的“審查對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邊殺害，共殺害有名單的四十二人。有的被鐵絲網綁手腳推下大河淹死；有的拉到河邊集體槍殺。楊蘭生、楊巖生兩兄弟被推下河後，漂流到不遠處上岸。而楊巖生上岸後不幾天，又被重新抓獲，拉到河邊再次殺害，屍體推下河裏。“聯指”的“保衛部”在梁國開、覃紹昌等人控制下，殺人手段比法西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們最後難逃法網，“處遺”時凶手們均受到了罪該應得的懲罰。（見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六月

一日 柳州市兩派武鬥加劇。柳纖“鋼聯指”總部頭頭張堅、劉俊之、範群等命令本派“戰士”一萬多人，離開工作崗位，從柳南轉移到柳北去（以柳江河為界，河北為柳州“聯指”控制區和據點。河南為“造反大軍”控制區和據點）。由於柳纖“鋼聯指”離開工作崗位，致使柳州鐵路運輸中斷達兩個月之久，直到八月一日，鐵路才陸續恢復通車。（見柳州鐵路局“文革”大事記）

是日 上午十時許，由區紀委賈鋒，區計委李克夷、南寧二中“小八”紅衛兵陳炎芳，廣西大學“能聞”岑衛東、梁漢隆等沖進原區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民革中央常委）家，把當過年過八旬、體弱多病的李任仁及其老伴何諾真和三個孩子趕出家門後，賈鋒等人便動手抄家、抄走李家的一批貴重文物、古董、古畫、瓷器等。不久區人委辦公廳“革命領導小組”張同益、黃文楷、韓清元組織批鬥遊鬥李任仁、覃志。蘇冠南拉李任仁同四十五個“牛鬼蛇神”在街頭示眾，李任仁遭到毒打。李被趕出原住處後，和老伴搬至區人委第三宿舍原司機班住房居住。八月十七日，洪水泛濫，李被水淹死在家裏。李任仁冤案，遲到一九八六年方得到平反昭雪。（“處遺”辦案卷文書處理號97）

二日 在亂打、亂殺成風的情況下，永福縣堡裏大隊革委會召開的群眾批斗大會上，發生鬥打死黃廣榮後，又逼其子黃明新用菜刀將其父的頭割下祭墓，然後又將黃明新打死的慘劇。（見永福縣“文革”大事記）

三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給廣西革黨、廣西軍區、柳州鐵路軍管會，並轉柳州“造反大軍”、柳州“聯指”，《關於柳州問題的五點指示》的特急電報。電報要求“鐵路兩派群眾組織立即停止武鬥，外單位人員必須撤出鐵路系統各單位，不得介入鐵路系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見柳州鐵路局“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區革黨給中共中央《關於全區五月下旬情況簡報》中說，桂林市武鬥情況越來越嚴重。桂林“造反大軍”於五月十七日攻打“聯指”據點百貨大樓倉庫辦公室。其指導思想的口號是：“丟

掉幻想，準備打仗”。他們把鬥爭矛頭指向市革委會和軍隊，提出：“打倒王斌政府（王斌任革委會主任），“徹底改組桂林市革委會”、“景伯承（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挑動農民進城，要揪出來示眾”等口號，由於武鬥嚴重，兩派連續奪槍。計“聯指”“奪槍”九起，奪得各種槍支二百零三支。“造反大軍”奪槍七起，奪去各種槍支一百五十七支。在奪槍過程中，“造反大軍”打傷部隊人員五十多人，“聯指”打傷部隊人員四十二人（其中受傷後死亡三人）。簡報還說，武宣縣兩派“武鬥”也很嚴重，“聯指”調武裝民兵進城，攻打“四·二二”。“四·二二”被打死四十二人，“聯指”死三人。上林縣“武鬥”也相當嚴重，“四·二二”被打死二十四人，“聯指”無傷亡。

同日 區革黨、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解決上石“農總”分部問題的情況報告》說，我們用八個連的兵力，於五月一日凌晨對廣西“四·二二”寧明縣上石“農總”實行武裝封鎖包圍，經一個月的工作，部隊除留下一個連外，其餘七個連已撤回。

四日 廣西“聯指”所屬的水電學校、南師、電業公司、林業廳、“後備軍”、“瀝血兵”、“小八”等十三個組織，約三千五百人，第二次到廣西軍區軍械庫“搶奪”武器，共“搶”去各種槍支一千八百五十九支，六〇炮八門，子彈一百多萬發，區革黨、廣西軍區給中央文革的電報說，這次“聯指”奪軍械庫的武器是事出有因的。宣稱：廣西“四·二二”襲擊林業廳“聯指”據點，慘殺革命群眾後，又傳來桂林、柳州“造反大軍”要來南寧支援“四·二二”，“群眾”惶惶不安，所以“聯指”基層組織才“搶槍”的。事前革黨、軍區對廣西“聯指”指揮部做了工作，“聯指”指揮部也對基層組織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控制不住。

是日 區革黨、廣西軍區向各專、市、縣革委會發出《堅決制止農民進城武鬥問題的指示》。

五日 至十一日 蒙山縣革委會治保部和縣公檢法、軍管會聯合召開全縣各區公安員和各公社治保主任、調解員會議，和縣人武部召開的全縣人武裝幹部會議（各區人武部幹部和各公社民兵營長參加），布置狠抓階級鬥爭，繼續刮“十二級颱風”。縣革委會主任、縣人武部政委萬夢章在大會上作報告揚揚已出現亂殺人的新聯、金洞、蒙山鎮（公社）階級鬥爭抓得狠，公開批評尚未出現殺人的新墟區革委會和沙壩公社抓階級鬥爭不力。於是各公社在會中、會後紛紛布置狠抓階級鬥爭策劃突擊殺人，從六月十日至十六日一週內全區就殺害八十五人。從當晚至九日晚，蒙山鎮文平公社十二小時內共殺害無辜群眾五十人。從六月六日至十六日，全縣被強加上參加“平民黨”、“暗殺隊”、“反共救國軍”和“黑五類”等莫須有的罪名慘遭殺害的共四百五十七人，佔該縣“文革”期間被打死、逼死人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三。六月二十八日，蒙山縣公檢法軍管會寫的、經萬夢章、王健民、甘瑞球審查修改定稿給梧州地區革委會《殺人情況彙報》中說：“至六月十八日止共打死‘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家屬子女五百八十一人，……畏罪或恐懼自殺的共九十三人”（按：蒙山縣“文革”中慘遭殺害和被迫致死的共八百五十七人，殺絕一百三十七戶）。一九八三年“處遺”中，經調查和檢察院批准，將文平公社首犯譚劍奇處以極刑，立即槍決；莫達新判處死緩；黃勝判無期徒刑。萬夢章於一九八三年病死。（詳見蒙山縣“文革”大事記）

八日 在廣西勞動大學革委會主任白金友鼓動和指使下，該校附屬的明陽農場召開“貧協”成立大會。會後，以“右派翻天”的罪名，槍殺了汪說漢、黃榮、劉宗開、劉江萍（均系錯劃右派）和工人董瑞泰，開了殺戒。隨後，在白金友主謀策計下，兩個月內共殺害幹部職工三十一人。一九八三年“處遺”時，死者才得平反昭雪，白金友被判刑。（見《白金友處分材料》52-55頁）

九日 廣西“四·二二”指揮部發表《就廣西革黨、廣西軍區關於下令各專、市、縣召開所謂聲討“四·二二”的“反革命罪行”大會給廣西革黨、廣西軍區的緊急照會》。（“△”）

是日 平樂縣“聯指”在平樂桂劇院私設“看守所”（監獄），從各區抽來武裝人員看守被抓來的人。據不完全統計，從六月中旬至九月底，先後抓了三百多人關押在這所“監獄”裏。凡被抓來關押的人都蒙上眼睛慘遭毒打，有的被推下桂江淹死，有的被槍殺和棍棒打死。（見平樂縣“文

革”大事記)

是日 原區糧食廳廳長黃克勤被迫害致死。黃的歷史問題，組織早已作歷史結論。“文革”中，糧食廳“聯指”群眾組織把黃作為“叛徒”加以追逼、毒打迫害，該廳“聯指”頭頭曾發先後參與研究、派人外調、撰寫印發《黃克勤企圖東山再起的信號彈》、《假冒首的活標本》、《關於黃克勤叛變問題的調查報告》，黃被迫害死後，曾發在主辦“階級鬥爭”展覽會上，把黃克勤作為“雙料叛徒”繪成連環畫展出。曾發因此有“功”，由“文革”前的科長而躍昇為“文革”中的糧食廳革命領導小組成員，一年後又成了區黨委宣傳部副處長，之後，又被任命為防城縣縣委書記。一九八三年“處遺”時，黃克勤獲得平反昭雪。曾發被撤職，按副縣級分配工作。（見曾發犯錯誤事實案卷）

是日 巴馬縣那桃公社巴累小隊隊長黃福安召開群眾大會，批鬥本隊不同觀點的社員黃建安、黃紹佳父子倆。黃建安因年老久病不能行走，被抬到會場，黃福安對黃紹佳說：“你能不能殺你的父親，否則你也過不了關！黃建安對兒子道：“我老了，你還年輕，你就下手吧”。黃紹佳只得忍心一棒將生父打死。類似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在天等、合浦、蒙山、浦北、上林縣均有發生。（詳見巴馬等縣“文革”大事記）

十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各專、市、縣革委會發出所謂《關於制止“農民”進城武鬥的通知》。《通知》中說：“桂林市有臨桂、陽朔、永福等縣‘聯指’農民幾千人（陽朔人武部科長一名，臨桂縣人武部助理員三人帶領農民）進城武鬥”。《通知》“強調”說，“對帶領農民進城的武裝幹部應嚴肅處理”。

本月上旬，桂林“造反大軍”鄧井髮帶領地、專“造反大軍”，與市“造反大軍”組織搶奪桂林軍分區倉庫武器彈藥。在搶奪中打傷解放軍五人，“造反大軍”被打死二人，搶走各種槍支三千三百支，子彈二百五十發，手榴彈三千枚，七五炮彈七千五百發。事後，軍分區“支左”辦公室副主任郝群和張志良等人，先後分別打電話給陽朔、灌陽、全州、龍勝等縣人武部說：桂林軍分區倉庫的“花生米”（子彈、槍支）被“老鼠”（四·二二）吃光了，形勢非常緊張，要求支援等暗語。陽朔縣“聯指”武裝人員在縣人武部幹部帶領下，首先來到桂林，接著十二個縣“聯指”組織八千人全副武裝進入桂林市。其中有各縣人武部人員一百二十多人。（見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一日 玉林地區召開組織工作會議，要求大力搞好專案、清理階級隊伍。會議總結指出：前階段由於大力搞專案和清理階級隊伍，已查出自首分子一千四百八十二人。（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二日 桂林市“聯指”“桂保總”在桂林南站對面建立一個“看守所”（監獄），先後關押了二百五十八人，其中被迫害致死三十五人，致傷致殘七十五人。七月十四日中午，前來參加桂林圍剿“造反大軍”的平樂縣武鬥人員伍學強、林海、廖昌輝、侯永成、唐橋生等二十四人，沖進“看守所”，將被關押的桂林針織廠織工唐躍武、侯羣、李江、白先德、馬震龍、秦恩深等十二人拉到桂林市十一中對面的樹林裏集體槍殺。（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來《柳州鐵路地區恢復交通的五點指示》特急電報。（見柳州鐵路局“文革”大事記）

十五日 武宣縣發生了吃人肉的野蠻事件。五星大隊“聯指”李坤森、李振華等，將李贊龍、李錦良、李金期、李贊聰四人拉到三里街遊鬥。被關的鉛鋅礦職工劉業龍、五福大隊的陳天掌也被拉來遊鬥，除李金期、李贊聰二人外，其餘四人都被凶手打死。劉業龍、陳天掌被剖腹取肝，凶手李坤森等拿回大隊去會餐，從是日起至八月底止，該縣“造反大軍”及不同觀點的幹部、群眾，有七十六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後被野蠻者吃掉。吃人心肝的有工人、農民，還有國家幹部和所謂的中共黨員共約四百人。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早年參加革命，曾任游擊隊桂支十八大隊長。解放後，曾任蒼梧縣副縣長。“文革”開始，黃家憑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軍”，於七月一日晚

上被學校革籌副主任謝東主持批鬥殺死。翌日晨，凶手黃佩農、張繼鋒等一幫人挖他的肝，割他的肉，在學校宿舍檐下，用瓦片烘烤來吃。七月十七日，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廖金福、鍾振權、鍾少廷等四人。一幫凶手把廖天龍等四人殺死後，拉屍體到平昭碼頭，由李燦熙、徐達財、樊榮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隊煎炒，猜碼會餐，參加這人吃人肉宴會的有陳運財等二、三十人。廣西發生吃人肉、挖人肝等野蠻事件的還有上思、靈山、天等、貴縣、橫縣、武鳴、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縣、欽州等縣，真是慘無人道。（見武宣等縣“文革”大事記）

十五日 羅城縣革委會召開“向階級敵人發動全面總進攻誓師大會”，亦稱萬人對敵鬥爭大會，一萬多人參加，縣革委會主要領導幹部參加了會議。各區押送的一百五十名批鬥對象跪在會場一角。會中宣判三名罪犯後，縣革委正、副主任講話，號召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主動地不停頓地向階級敵人發起總攻擊。接著展開鬥爭，當場敲死、砸死、槍殺死五十九人。（見羅城縣“文革”大事記）

是日 廣西軍區副政委、南寧市革委會主任韓世福在市各級革委會負責人大會上說為，廣西已被獲一個“反革命集團”——“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總部設在南寧市。他要求各單位要發動群眾徹底破案，開展“三查”運動。一查“走資派”幕後活動，二查“叛徒”、“特務”活動，三查地、富、反、壞、右的活動。他最後強調，要抓緊“三查”，為成立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掃清障礙。（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六日 鹿寨縣革委會、人武部決定成立“鹿寨縣貧下中農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革委會副主任黎景琪任總指揮、廖茂乾、張義信、何文高、溫有信任副總指揮。“指揮部”組織“聯指”武裝兩千多人，於當天下午進攻柳州市“造反大軍”。使用六〇炮、機關槍、步槍、手槍、手榴彈等武器，攻佔了柳州印染廠、標準件廠、磚瓦廠、排灌站和三門江林場。攻打柳州農機廠、鑄造廠、燈泡廠等單位。鹿寨武鬥人員殺死和打死柳州“造反大軍”和無辜群眾九人，輪姦強姦青年一人。柳州印染廠丟失八萬多米布疋，標準件廠損失兩萬多元。在圍攻期間動用國家資金、物資折款十三萬多元。七月中旬，武鬥人員陸續從柳州撤回縣境。八月二十五日後才分批回家。（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是日 廣西“聯指”從南寧市桂劇院據點，第一次用高射機槍攻打廣西“四·二二”百貨大樓據點，二樓起火燃燒。（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是日 桂林兩派武鬥激化，桂林監獄周圍的老人山、寶積山、馬鞍山、觀音山等制高點均被兩派武鬥組織所佔領。“造反大軍”的部分人員利用監獄生產車間機械設備修理槍支武器，並成立了桂林監獄接管委員會，對監獄的辦公樓及生產車間實行了控制。接管組長封紹輝、副組長李祖佑（均系監獄幹部）。“八·二〇”前後對這一派性活動被定為“反革命事件”，該單位吳愛賢、梁振才、封紹輝、李祖佑等七十八名幹部、工人均以“沖監”的罪名被關押，其中有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七人被遊鬥，六十八人被抄家。技術員梁振才被批鬥迫害致死，不少人被打傷致殘，直至一九八三年五月“處遺”中，經桂林市委批准，才從政治上給予公開平反。（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

十七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全區發布《關於被獲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為後來武裝消滅“四·二二”大造了輿論。《公告》稱：這個反革命集團的一些骨幹分子，混入了某些群眾組織（指混入“四·二二”）中，有的還當了群眾組織的頭頭，……現在，這個反革命集團並沒有完全摧毀，必須徹底追查。《公告》號召“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主動地、不停頓地向階級敵人發動全面的、猛烈的進攻，把隱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挖出來”。《公告》發布後，各級革委會、人武部和“聯指”組織群眾，掀起了聲討“反共救國團”（簡稱“反團”）的熱潮，有的地方還召開“聲討大會”、“誓師大會”，公開地、集中地對另一派群眾組織——“四·二二”進行鎮壓，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南寧警備區、市公檢法軍管會於六月二十九日聯合發布了《關於追捕在逃的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主要罪犯的通緝

令》指明在逃的陳阜東、覃雄、覃飛系“該國的主要骨幹”，號召群眾協同專政機關“把這三名‘匪首’緝拿歸案”。“四·二二”為擺脫“聯指”的揭發和攻擊，於八月二日擅自槍斃了陳阜東、覃雄。覃飛在四川省新都縣被公安機關捕獲。據南寧市三百八十三個單位不完全統計，已被列為參加所謂“反共救國團”的有三千五百四十七人（全部是參加“四·二二”的），其中已被鬥爭的一千七百七十七人，關押九百五十七人，大搞逼、供、訊，被打死三十七人，被逼自殺身亡二十九人，打成殘廢二人，下落不明四人（該市當年清理“反圍”專案領導小組於一九六九年已否定“反圍”這一假案，並作了初步處理）。《公告》發布後，北流縣成立了“揪反圍指揮部”。六月二十六日李國偉主持召開三萬人參加的徹底摧毀“反共救國團”誓師大會。動員布置全縣追查“反共救國團”，亂揪、亂鬥、亂殺人十分嚴重。玉林專區革委會把北流縣的做法印發簡報推廣。玉林、桂平、貴縣、容縣等縣很快掀起追查“反共救國團”高潮，大搞逼供訊，造成大批冤假錯案。全專區被當作“反圍”立案審查、關押、殘酷批鬥的有五千二百一十三人，其中廳級幹部一人，縣級幹部二十三人，許多人遭受折磨，被迫害致死、致殘致傷。柳州市於六月十九日由市軍管會、柳鐵公安處、柳州警司聯合發出公告，追查“反圍”，僅據十四個單位受審查的達四百三十八人，其中被關押的四十五人，迫害致死十六人。這一冤案到一九八三年“處遺”時，才得平反昭雪。

同日 天峨縣全縣批鬥“反圍”分子或嫌疑分子二百二十一，致傷致殘一百三十二人，迫害致死六十七人。都安縣貫徹《公告》共揪鬥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一人，其中四百四十一人致死，親屬受株連連八萬人之多。把原縣長認為都安縣“反圍”的總指揮，副縣長被認為“反圍”的領導，縣委副書記、糧食副局長、農業局長等“走資派”被認為“反圍”的支持者，縣公安局長、糧食局長、縣常委、法院院長被認為與“反圍”頭目勾結，而被迫害致死。這成都安縣最大的冤案。宜山縣在貫徹《公告》的十一天裏共打死三百二十八人。（詳見各該縣“文革”大事記）

十七日 貴縣“保紅指揮部”和專區“聯指”林堅等人研究決定調集玉林、貴縣共十二個公社民兵圍攻嶺塘、新聯“四·二二”據點，在木格公社實行大抓大殺，被打死、槍殺、迫害致死的共四百九十多人。這就是木格“六一七”事件。（見貴縣“文革”大事記）

十一日至十七日 資源縣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強調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抓“階級鬥爭”。會後，在桂林武鬥和破獲“反共救國團”的影響下，中峰區大莊田公社革委會某些人酷刑逼供出“大莊田反共暴動隊”，批鬥了三百零三人，其中一百一十九人被槍殺，二十五人被迫自殺。瓜裏公社革委會一些人刑訊逼供出了“中國中央人民反攻司令部”，審查批鬥了一百一十五人，其中五十五人被打死。車田區革委會主任莫志廉、副主任、武裝部長鄧英等人用刑訊逼供辦法，製造了所謂“六六反革命暴動事件”，使二百七十四人遭受審查批鬥，其中打死逼死六十四人，還向受害者家屬和單位徵收“專政費”五千六百一十七元，“看守費”三千四百二十七元五角，抓人“手續費”七十八元，“醫藥費”一千四百二十七元，“槍殺費”一百零三元，其他費用九千零三元。總共徵收了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五元五角（按：“文革”中資源縣共收“看守費”、“關押費”、“專政費”等罰款八萬三千元，其中向死者家屬徵收的達三萬五千元）。這些罰款都被凶手及其參與者大吃大喝花費掉了。一九八三年“處遺”時，中共資源縣委對兩案作了復查，作出了平反決定，對炮制冤案的王承林等人依法判刑，對其他參與人員分別給予了黨紀、政紀處分。（見資源縣“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各專區、各市革委會、各軍分區、人武部發出通知，要求他們要統一認識，結合本地區情況，進行部署，以便更好地推動對“敵”鬥爭的深入開展。要通過印發傳單、有線廣播，向群眾宣讀等形式，進行廣泛深入宣傳《公告》。要召集群眾組織負責人座談討論，檢舉揭發叛徒、特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百色地區成立清查“反圍”領導小組和專案辦公室後，清查活動半年多，全地區共追查所謂“反共救國團”嫌疑案一百零四起，批鬥九千二百七十四人，其中打死逼死一千零七十三人，打傷致殘二千一百三十五人。（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那坡縣革委副主任孫祥雲向常委傳達廣西革籌、廣西軍區電話公告，布置在全縣範圍內進行追查“反圍”，城隍區逼出“反圍”十五個軍，四十名團長。德隆區逼出“反圍”一個師。

百都、下華、龍合三個區各逼出“反圍”一個團。百合區逼出“反圍”——“南疆反共暴動組”。平孟區逼出一批人參加“反共救國軍”。縣直機關逼出“反圍”師長黃莊，“副師長”張增奎，“師政委”鍾耀飄，“副政委”梅其武和一批“反共救國軍”的“團、營、連、排、班骨幹”。全縣追捕“反圍”五百五十一人，其中被活活打死和殺死八人，打傷致殘四十三人，四十七人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判刑。（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 武鳴縣革委會接到區革籌、廣西軍區發出的《關於破獲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公告》後，立即布置各公社各單位進行追查，並層層成立專案組，專搞追查“反圍”工作。在縣革委會的布置和催促下，全縣十二個公社就有十一個公社於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五日召開了萬人聲討“反圍”大會，在聲討大會內外共打死六百九十八人。其中兩江公社於六月二十九日一天打死一百五十九人。在追查“反圍”中，全縣共逼供出所謂反動組織九十九個，被認為參加“反圍”的有二千七百七十一人，還有六百九十人被掛上“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務”、“翻案”、“謀殺”等等罪名。在整個追查“反圍”事件中，被害致死達一千五百四十六人，佔全縣“文革”中被害死總人數二千四百零五人的百分之六十四。（詳見武鳴縣“文革”大事件）

十九日 廣西“聯指”武裝包圍水電廳設計院“火種”據點大樓，屠殺六十二人，並滅屍於峇江。為了儘快組織力量拿下“火種”這個據點，從上旬到中旬，“聯指”總指揮顏景堂在指揮部召開幾次常委會和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部署攻打“火種”大樓。參加會議的人有廖煒雄、潘玉臣、李家海、鄧文光、劉國華、覃樹林、何唯欽、任樹人、賓恩錦、張鋒、黃明發等，會上作了分工，由廖煒雄、潘玉臣、任樹人、劉國華等負責造輿論，通過“聯指”喉舌——《廣西聯指報》、廣播站和大字報，詆稱“火種”據點是“反圍”盤踞之地，“國民黨殘餘孽”、“叛徒”、“特務”、“走資派”、“地、富、反、壞、右”的黑窩。“不繳械投降，就叫他們滅亡！”李家海任前線總指揮，其他常委負責“軍事作戰”。

“火種”頭頭紀烈、蔡玉華等組織據點六十多人修築工事，堅守大樓。在構築工事期間，楊慧心被設計院“聯指”蘭勝線開槍打死。十九日上午八點，李家海派何唯欽、甘世棟等到文化大院京劇團二樓會議室召開“參戰”領隊人員會議，宣布“作戰”方案。參加攻打的單位有廣西“聯指”保衛處、警衛排、冶金局“聯指”武裝連、“瀝血兵”、“後備軍”、“獨立八三一”、“汽司”、“紅水院”、“紅全球”、水電學校“聯指”和崇左縣“聯指”民兵連等。李家海負責指揮，何唯欽、高廷、董佔德也參加指揮。廖煒雄、顏景堂、潘玉臣、任樹人等都親臨現場。下午一點開始攻打，久攻未下，晚上十點，李家海、何唯欽等人決定用爆破法炸毀大樓。二十日凌晨何唯欽組織“瀝血兵”用炸藥爆破，下午兩點多，又逼出“四·二二”的兩個“俘虜”劉仲華和譚振尚接連送了幾次炸藥包，最後一次用了五十公斤炸藥，將大樓的山牆全部炸毀。下午四時，大樓上打出白旗，表示投降。而劉、譚兩個“俘虜”被“瀝血兵”打死於二樓。至此，火種大樓口被打死七人。下午五時許，“聯指”保衛處和“瀝血兵”等組成敢死隊，衝上大樓，抓獲“俘虜”六十一人，立即拉到水電院內槍殺了五十五人，死者是設計院的紀烈、蔡玉華、黃克蘭、周勇等十九人，電業公司的歐學廉、彭柏生，其餘是南寧市的紅衛和陸川縣逃難來的青年。在“俘虜”中，有六人幸免殺害。慘殺“俘虜”後，由任樹人、何唯欽等帶領十六人把死者的屍體裝上汽車，拉到凌鐵水廠後面，一一拋下峇江。“火種”慘案發生後，區革籌、廣西軍區既不及時向中共報告，也不定性處理。對策劃、組織和指揮攻打者視為“文革”“功臣”，提拔重用，陞官晉級。（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凌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禧等十一名幹部、教師和學生。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王德堂親自策劃，奪了趙永禧的領導權，成立所謂凌雲縣“紅革會”，王任“紅革會”主任。同年五月二十五日，王德堂在原縣委、人委各部辦領導幹部會上，公開誣陷趙永禧“出賣組織原則”、“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想站出來造無階級的反”等。與會幹部中，有的支持王德堂整趙永禧，有的反對和抵制，說趙永禧出任縣委書記一年

多，工作有成績，不應該打倒。王德堂把反對他整趙永禧的人打成“反軍派”、“牛鬼蛇神”並誣陷趙永禧是“牛鬼蛇神總後台”。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成立縣革委會，王德堂任革委會主任後，又多次在各種大小會上誣陷趙永禧和反對他的幹部群眾是“反革命”、“組織暗殺隊”、“趙永禧是反革命組織的總後台”。同年六月中旬，王德堂在全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期間，誣陷趙永禧及反對王德堂的群眾組織——“四·二二”搞“武裝暴亂”。十八日，王德堂布置“積代會”批鬥和毒打趙永禧等十二名幹部、教師和學生。十九日下午，王德堂在“積代會”上作總結報告說，“昨天批斗大會打人是革命行動，火力還不夠，誰不老實，就讓他嘗嘗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王報告結束，又布置道：“今晚縣直機關把‘牛鬼蛇神’拉到街上批鬥，讓代表們看了以後，回去好照樣做”。晚飯後，由出席“積代會”代表、縣工代會主任韋德帶領一夥凶手拉趙永禧等三十多個幹部、教師和學生上街遊鬥，趙永禧等十一人當場被打死，二十多人被打致傷殘。二十日上午，王德堂向“積代會”布置殺人，說：“昨天晚上的‘革命行動’好得很，大長無產階級志氣”。“趙永禧這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被徹底打倒了！”“這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各公社回去後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決不能心慈手軟”。於是，“積代會”後，全縣殺人全面展開。王德堂在“文革”期間，不僅主謀策劃危害趙永禧和幹部群眾，而且利用職權，先後多次強姦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鬥的女學生共六人。如此最大惡極的王德堂，曾被封為“支左”的好幹部。一九八三年開始“處遺”後，依法逮捕了王德堂，於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在百色處決。（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 柳州軍分區授意在柳江縣穿山召開“聯防”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柳江縣革委會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以及忻城、來賓、武宣、象州等縣和八一礦委會、人武部領導人參加了會議。會議通過成立“前線聯防總指揮部”，宋吉月任總指揮。會議決定調集各縣“聯指”萬名武裝人員包圍柳州“造反大軍”，迫使“造反大軍”投降。會後，調集各縣、廠礦“聯指”一萬多人，包圍大軍，逼而不進。（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二日 遲至今日，區革黨、廣西軍區才向中央、中央文革發出《“聯指”攻打水電廳設計院“火種”據點情況報告》。

二十三日《廣西聯指報》頭版頭條全文刊登區革黨、廣西軍區發布所謂《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公告》。頭版下半版刊登廣西“聯指”指揮部所謂《關於徹底摧毀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總攻擊令》。《總攻擊令》說“反‘反共救國團’深藏於‘四·二二’組織之中，‘四·二二’的頭頭就是‘反共救國團’”。《總攻擊令》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行動起來。清查“反團”，對“抗拒緝捕者，可以就地處決”。要從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把他們打個人仰馬翻，殺個片甲不留”。二版刊登社論《徹底摧毀蔣匪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

同日 廣西“四·二二”指揮部發表《就廣西革黨、廣西軍區“六一七”〈公告〉告全區人民書》。《告全區人民書》指出，《公告》發布後，將為更大規模的血腥大屠殺，消滅廣西“四·二二”一派群眾組織大造輿論。（“△”）

同日 廣西“聯指”所屬的航運“紅聯”攻打“航運工總”控制下的南寧北大路碼頭，打了幾個小時攻不下，即要求廣西“聯指”指揮部通知河南片“聯指”給予炮火支援，南寧糖紙廠炮連當即把一門三七炮拉到西園飯店後面河邊，向“桂宏”號船開炮，接著南寧化工廠“聯指”也拉來一門炮參加轟擊，打到第二天下午三點多，打中“桂宏”、“東風”號船，停泊在河邊的四十多艘船隻全部起火焚毀。（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四日 區革黨、廣西軍區公布所謂《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後，全區各地“聯指”武裝人員亂殺人十分嚴重，對此，區革黨、廣西軍區再次向各專區革委會、各軍分區發出《關於禁止亂殺人、亂抓人的指示》。

二十六日 柳江、忻城、象州、武宣和合山礦“聯指”兩千多武裝人員包圍柳江縣進德“造反大軍”棧山加工廠據點。前線總指揮是柳江縣革委會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他在戰前動員說：棧山盤踞著“一股武裝土匪”，還有“反共救國團”，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殲滅。而駐守在棧山加工廠的只有十二人（大部分是紅衛兵），七支槍。三縣一礦兩千多武裝人員圍剿時，當場打死四人，“俘虜”八人。俘虜槍殺了四人。熊國芬、潘洪連死後，被割下頭顱，貼上“反共救國團”的標記，分別掛在進德墟和拉堡墟（縣城）示眾。六月二十九日，柳江縣委會印發了《給在圍剿武裝土匪戰鬥英勇負傷的同志的慰問信》和《給全體指戰員的慰問信》中說：“‘六·二六’棧山圍剿戰鬥的勝利，大長了人民的志氣，大滅了敵人的威風”。（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七日 桂北“聯指”民兵“司令部”曾明軒、李年生與桂林地區“聯指”頭頭唐廷國、廖祖迪、唐貴才等人，以及桂北五縣“聯指”武門隊負責人在靈川縣委會議室開會，研究決定，組織全地區和桂林市“聯指”“戰士”到興安縣“四五三”國防倉庫（總後勤部管）“搶奪”武器問題，並成立“搶奪”指揮部。曾明軒任總指揮，成員有伊景春、唐廷國、廖祖迪、李年生、唐貴才等。同在一個時候，桂林市“聯指”主要頭目曹鐵軍等，在桂林市“五一”飯店召開郊區和桂南各縣“聯指”武門隊負責人會議，動員布置到興安“四五三”軍械庫“搶奪”武器。（見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廣西聯指報》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火種”的所謂“罪行”——《六月天兵懲腐惡——盤踞在水電設計院大樓的一小撮蔣匪“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匪徒和美蔣特務分子反革命罪行概述。同時發表評論《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此外，還偽造“反共救國團”六幅照片公之於眾。這家派報第四版刊登“聯指”東風戰鬥寫的《反共救國團的新花招——“四·二二”指揮部“六一六”黑通知的畫皮》。

同日 區革黨、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公布“上石農總”的反動組織的情況》報告。宣稱：經過對其進行了武裝包圍，逮捕了首惡分子若干名，整個組織已經解體。我們擬於適當時機在全區範圍內公布“上石農總”和“反動組織”。

三十日 武鳴華僑農場“四·二二”群眾組織一千三百多人集體赴京上訪，要求中央解決歸僑的人身安全問題。武鳴縣革委會和縣武裝部領導何景學等人，組織幹部、群眾數百人和調動武裝民兵荷槍實彈進行攔截。在雙橋嶺武公路當場抓了所謂“壞頭頭”共七十四人，分別在平陸、平福、平穩、孔鎮關押，進行刑訊逼供，殘酷鬥爭。歸僑崔光榮當天被民兵槍殺，最後逼出一個“中華民國反共救國軍武僑支隊”假案。武鳴華僑農場革委會宣布這次上訪是一起反革命事件。從“六·三〇”到後來的“呂朋慘案”和紅泥村“階級報復血案”，前後被審查的歸僑和國內職工達一千三百三十七人（其中學生五百零八人，歸僑職工八百一十七人），被抓捕二百二十一人（其中歸僑二百零八人，國內職工十三人），被關押二百零二人，被吊打一百六十二人，被打死和含冤致死一百零七人，被抄家三百四十一戶，許多人家的財物被洗劫一空。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武鳴縣委作出了“關於為一九六八年‘六·三〇’歸僑上訪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平反的決定”。受害者得到平反昭雪，對參與迫害的人，分別給予了黨紀政紀和刑事處分。（詳見武鳴“文革”大事記、區僑辦黨紀檢組調查彙報材料）

同日 從上午九時五十分起，至七月四日止，先後有桂林地區十二個縣“聯指”、桂林市“聯指”、桂林鋼鐵廠“聯指”武門隊，連續五天對興安“四五三”國防軍械庫發起十一次“衝擊”。“衝擊”人數最多時達一萬多人，汽車四百多輛，少時也有五、六百人。“搶奪”各種槍五千六百三十六支，各種子彈三百二十五萬零七百發，各種手榴彈十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八枚，爆破筒一百零一十四根，各種軍需物品七百八十三件。連續五天這樣大規模地搶奪武器，區革黨、廣西軍區未作任何表示。（見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六月至八月，河池地區各縣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刮十二級颱風，關押毒打、揪鬥、殺害所謂“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全地區打死

逼死七千八百六十四人，其中鳳山、宜山、巴馬、羅城、都安五個縣被害死千人以上，鳳山縣死一千三百人，佔當時全縣人口總數百分之二，為全區、地之冠。（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五月至六月，全州縣革委按地區“三辦”布置審查地下黨，把全州縣地下黨員和游擊隊員作為叛徒上報，把一九四七年入黨的地下黨員三十二人捏造情況誣為自首分子，大批人員遭到關押、抄家、罰款而被殺。據不完全统计，被審查人數達九百零八人，其中五百二十七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一百五十二人被判刑、五十人致死，家屬十四人被殺，被罰款的一百三十四戶共一萬二千元。（見全州縣“文革”大事記）。

七月

一日 南寧警備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軍區副司令員、公、檢、法軍管會主任、警備區司令員宋治平、軍區副政委、南寧警司政委韓世福、警備區副司令員印豐、副政委蔡石超出席了會議。會議根據廣西軍區的部署，討論研究了關於執行武裝包圍廣西“四·二二”解放路、區展覽館、百貨大樓等據點，強行收繳武器問題。廣西軍區擬從獨立一、二師、警衛團、南寧軍分區、警備區調六個連的兵力和廣西“聯指”武鬥隊，以及武鳴、橫縣、邕寧、馬山、崇左、上林、玉林、陸川、貴縣等縣“聯指”武裝人員參加圍剿廣西“四·二二”。於是，從今天起，自治區首府——南寧，開始向“階級敵人”刮起“十二級颱風”了。（見區檔案館1967-1968“文革”材料33卷）

是日 玉林軍分區、專區革委會決定成立玉林軍分區第三辦公室（簡稱“三辦”），各縣（鎮）也相繼成立由人武部領導的第三辦公室。玉林專區“三辦”總負責人是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李壽山，設秘書、定案、審幹、個人、集團、清查六個組。“文革”期間，“六〇六”專案組審查地下黨專案中，全專區被審查的地下黨員、地下革命幹部達一千三百零八人，其中廳局級幹部三人，處級九人，縣級七十三人。僅博白縣在審查地下黨中就逼瘋一人，被打致傷殘二十七人，被迫自殺三人，被打死十二人。玉林專區“三辦”還搞了一個以原玉林地委書記韋樹輝為首的所謂“黑班子”假案，專案組代號一〇一，被當作“黑班子”成員進行審查的共三百六十人，因“黑班子”、“走資派”被牽連的達九千二百二十一人，其中廳局級幹部一人，處級九人，縣級二百三十人。在審查中大搞逼供訊，瘋狂迫害幹部。這些冤假錯案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陸續平反，韋樹輝的錯案於一九八一年才得到徹底平反。（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日 《廣西日報》三版刊登中共廣西軍區委員會作出決定：《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親切關懷化為巨大的動力，在部隊民兵中深入開展“三忠於”運動》。

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鳳山縣“支左”小組發出《關於穩住部隊陣腳，加強社會調查的指示》。自從軍區命令六五九團一營去鳳山“支左”。（實為支持“聯指”）致使兩派矛盾加劇，武斗升級。“七·二九”兵團搶槍武裝自己，準備對付“聯指”和部隊的包圍。指示說，部隊要排除萬難，深入宣傳最新指示，依靠群眾揭露“階級敵人”挑撥軍民關係，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罪行。要穩住陣腳，堅守崗位，駐軍和人武部領導機關不得撤出縣城。

同日 原南丹縣委副書記黃品忠被南丹縣革委和南寧市“治安委員會”聯合派人抓捕後被打死。（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三日 六點二十分，魏佑鑄從北京打來電話說，根據當前情況，在京的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幾位領導同志經過討論研究，提出以下幾個問題，請家裏的同志抓一抓。

一、狠抓階級鬥爭。主要是抓好輿論，向“階級敵人”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

(1) 繼續對賀、霍、傅進行深入批判，要批深批透。對謝王尚、袁家柯可以公開點名批判。

對“反共救國團”等“反革命”案件要繼續抓下去。

(2) 專案工作要抓緊，主要是抓“走資派”、抓“黑手”，對“壞頭頭”（指“四·二二”）可通過審查接班人的方式來搞。人力不夠要加強，要告訴各軍分區抓緊此項工作。

(3) 抓緊清理敵偽檔案的工作，查“叛徒”、“特務”。

(4) 狠抓報社、廣播電台的工作，要很好地組織稿件，充分運用這些工具，批判謝、袁。報社、電台可能受到衝擊，要採取措施，加以保護。

二、狠抓兩派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別是做好反對我們那一派的群眾的思想工作。

三、毛主席接見廣州、蘭州、濟南軍區赴京學習的全體幹部的偉大意義，要廣泛深入地宣傳。

四、狠抓革命促生產。

五、區革委會成立和慶祝大會的籌備工作，要繼續抓緊進行。

六、中央首長六月十七日晚接見的全文記錄，對軍區領導可以全文傳達，對團、師級幹部有部分（主要是點領導同志的名的地方）不要傳達。

七、興安縣國防倉庫武器彈藥被“搶”的問題嚴重，請歐司令員很好抓一抓。（見區檔案館1967年——1968年“文革”材料33卷“革籌記錄本”）

是日 柳州專區“前線聯防總指揮部”總指揮長宋吉月於今天又在象州縣石龍鎮召開第二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柳江縣宋吉月、韋日榮、韋炳修；忻城縣王健民、韋長仁；武宣縣高凌雲、譚柏現、嚴玉林；來賓縣龍德源、朱金生；鹿寨縣張儀信；象州縣何長壽、鄭錫成；柳州“聯指”頭頭沈善澤、王二貴（據沈的交待，是柳州軍分區一位科長電話通知他們去參加的）；柳州市郊區鄭帝旺、羅天琦；地專“聯指司令部”唐彪、蘇一民、樊冠華等。柳州地委、專署領導幹部童肇初、馬忠英也到石龍參加活動。會議決定：一、發表強硬聲明，強迫柳州“造反大軍”投降，交出武器。二、做好進攻柳州“造反大軍”的準備工作。柳江、來賓縣“聯指”武裝從柳鐵“五三八”處進攻“造反大軍”；武宣、象州從柳石進攻“造反大軍”；鹿寨、金秀從柳桂路進攻“造反大軍”。（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是日 原天峨縣委代理書記張運儒被迫害致死。（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四日 廣西軍區召集南寧全體“支左”幹部大會。韓世福作“南寧當前形勢”報告。強調要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堅決打倒謝王尚、袁家柯。（“△”）

五日 上午，廣西軍區政治部主任孫羈向廣西“聯指”和廣西“四·二二”常委傳達區革籌、廣西軍區關於堅決打倒謝王尚、袁家柯的決定。（“△”）

是晚 歐致富、安平生等召見廣西“聯指”和廣西“四·二二”常委，傳達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布告。（下稱“七·三”布告）《布告》說：“最近兩個月來，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蒙蔽和欺騙一部分群眾，連續編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壞鐵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復通車；

第二、膽敢搶劫援越物資，拒不送還；

第三、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設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

員；

第四、在中央發出“六一三”特急電報後，拒不執行，繼續頑抗。

為迅速制止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號召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在廣西革籌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駐廣西部隊的支持下，努力實現以下各點：

- 1、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點。
- 2、無條件地迅速恢復柳州鐵路局全線的鐵路交通運輸，停止一切干擾和串連，保證運輸暢通。
- 3、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擄越物資。
- 4、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裝備。
- 5、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下鄉上山青年，應立即返回本地區、本單位。
- 6、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衝擊監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台等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

七日《廣西日報》三版在特大通欄標題《徹底粉碎右傾翻案妖風》下，刊登區衛東批判著名作家秦兆陽的文章：《徹底粉碎右派秦兆陽反革命翻案復闢陰謀》。同時配發評論《不准老右翻天》。對秦兆陽的批判完全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而進行的，是強加於人的棍棒式的批判。（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 晚，原區石油公司幹部、廣西“聯指”總部保衛處人員歐飛海與一紅衛兵李子書在原區石油公司辦公室附近擺弄一枚土製手榴彈，不慎引起爆炸，李子書當場死亡，歐飛海受重傷，後送三〇三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當晚，區商業廳“紅色商業”兵團負責人謝順豐和管宣傳工作的戴端鈞商定，將歐被炸死的責任轉嫁給“四·二二”派，由戴起草“抗議聲明”，經謝順豐修改後，在大院內廣播。兵團主要負責人趙英虎明知廣播與事實不符，也不加以糾正。後來，“紅色商業”在區商業廳禮堂為歐飛海開“追悼會”，由趙英虎主持，還拉了石油公司對立派的倪豹、李龍寬、夏宗發三人進會場跪蓋，結果三人被參加會的人用皮帶抽打，拳打腳踢，被打得頭破血流，慘不忍睹。後來主持會場的趙英虎等出面把三人拉走，才沒有讓事態繼續發展。“文革”期間，一些人派性惡性發作，為打倒另一派，不擇手段，製造假案，其手段之惡劣，由此可見一斑。（見區商業廳“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南寧專區革委在禮堂召開慶祝“七·三”布告大會。十三日發出《關於堅決擁護、堅決貫徹執行“七·三”布告的決定》。印發《宣傳貫徹“七·三”布告講話參考提綱》和《關於落實“七·三”布告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通知》要求各級革委會以“七·三”布告為武器，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對一小撮階級敵人要徹底揭露、狠狠打擊，堅決鎮壓”。地區革委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帶工作隊於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到橫縣蹲點宣傳說：“‘七·三’布告是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的動員令，是開展鎮壓運動”。佟國華（軍分區科長）說：“‘七·三’布告是一場鎮壓反革命的動員令，是一場全職中國赫魯曉夫運動，動作要快，進攻要猛”。邕寧縣於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分五片召開千人至萬人大會，刮十二級颱風，結果在全縣九個區同時調民兵攻打“四·二二”派據點，全縣亂抓人，到八月二十二日止抓了四千七百六十二人，七至九月亂打死九百四十七人，佔該縣“文革”期間死人數百分之八十八。（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在南寧地區，自“七·三”布告下達至十月止，共揪出“壞人”六萬零六十一人（布告公布前揪鬥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五人）。七月打死、逼死二千七百三十八人，大戰八、九月的結果，兩個月打死、逼死七千一百九十九人。佔當年死亡人數百分之四十點六。（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桂林地區，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區死亡一千八百五十九人，《布告》之後死亡九千零八十七人（共計一萬零九百四十六人），佔死亡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桂林、南寧兩個地區在“七·三”布告後共打死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六人。（見桂林、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八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南寧市革委會舉行一千多人的大會。“熱烈歡呼‘七·三’布告”。安平生宣讀《布告》，歐致富講了話。他說“七·三”布告是解放廣西問題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是對一小撮“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的進軍號，我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群眾進一步團結起來，為迎接區革委會早日成立，為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而奮鬥！肖寒也在會上講話。他說對“七·三”布告抱什麼態度，這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問題，是對毛主席忠不忠的問題，也是對每個同志的嚴峻考驗。要條條落實，堅決緊跟，把矛頭始終對準“階級敵人”，堅決粉碎右傾翻案妖風。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起猛烈的進攻，認真搞好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把一小撮“階級敵人”從各個陰暗角落裏統統拉出來，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見九日《廣西日報》）

是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貫徹“七·三”布告的措施》和《貫徹“七·三”布告的情況簡報之一》。《簡報》說，接到布告後，革籌、軍區、駐軍負責同志立即研究貫徹執行。軍區機關、部隊、駐軍、三支兩軍人員都召開“慶祝大會”，並召開了兩派常委（“新‘四·二二’”拒不參加）座談會。南寧駐軍派出宣傳車，抽調三百多名幹部、戰士組成了四十三個宣傳隊，深入街道、機關、工廠、學校宣傳《布告》。還說老“四·二二”和“聯指”常委在座談會上各自作了自我批評，表示要堅決團結一致，共同對“敵”。還說，在《布告》的鼓舞下，又掀起了對“敵”鬥爭新高潮。有些單位“三查”運動進一步深化，又揪出一批“壞人”和“反共救國團”成員。

是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出動兩架飛機，從憑祥至南寧一帶散發“七·三”布告九萬多份。南寧、柳州共組織五十一個所謂“宣傳隊”深入工廠、學校、生產隊宣傳《“七·三”布告》。（“△”）

是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發出《貫徹“七·三”布告簡報之二》，《簡報》宣稱，出動兩架飛機從憑祥到南寧散發《布告》九萬多份。當日柳州、南寧組織五十一個“宣傳隊”，到基層宣傳《布告》，一小撮階級敵人仍然繼續蒙蔽群眾，抵制和破壞《布告》的貫徹。“新‘四·二二’說《布告》是“變色龍”搞出來的，是鎮壓“四·二二”的。

是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各地發出《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指示》發出後，為各軍分區、人武部和“聯指”，以清理“流竄犯”為名，追捕、屠殺“四·二二”一大批人。

八日至十日 臨桂縣武裝部長龍鳳山在公社主任、武裝部長的會議上，針對有些人對殺人太多有思想顧慮，把“七清”集中為“三查”，刮更大的十二級颱風。“三查”即查走資派的幕後活動；二查叛徒、特務；三查階級敵人。具體辦法是利用一切宣傳工具宣傳“七·三”布告，批評行動慢的公社，限期打開局面，否則要犯政治錯誤。會後，各公社開大會殺人。縣武裝部和縣“聯指”派人到各公社參加殺人大會。在殺人會上，各公社均先宣讀“七·三”布告然後殺人。至十六日共殺去三十六人。十六日至十八日，縣“聯指”“三保衛”指揮部出面開會。指出“我們這次行動就是搞‘四·二二’骨幹分子和把各公社大隊的四類分子和其他危險分子，刮他一次十二級颱風”。縣“聯指”頭頭明也說具體對象是對立面的主要頭頭、對立面骨幹分子還有未改造好的四類分子等。從此次會後到七月二十四日共殺一百人。七月二十四日，縣民兵團開全面落实“七·三”布告誓師大會，縣武裝部副部長大講“七清”、“三查”、刮十二級颱風成績，要求穩、准、狠打擊“階級敵人”。還派人到各地傳達會議精神。七月二十五日縣“保革”指揮部（保衛革委指揮部）公布“堅決貫徹誓死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七一八’指示，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總動員令”，同時還翻印發出與他們“總動員令”內容相同的桂林專區革委會七月二十一日的公告。從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日共殺了九十六人。“八·二〇”時，臨桂縣被關押在軍管會的四十餘人，除一人在

殺場中死裏逃生外，其餘全被殺害，就地槍殺或未經過關押殺的無法計算。八月二十三日押在麻袋廠的其中九人拉出殺害。八月二十八日，革委副主任唐申元，常委韋英豪分別向駐桂的公社民兵團說，要抓緊清理關押人員，要搞（殺）的對象快搞，下一步“清理階級隊伍”。從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八日又殺去八十九人。這樣，臨桂縣從六月至十月共被殺一千七百九十三人。（見臨桂縣“文革”大事記）

全州縣於七月八日召開執行“七·三”布告誓師大會，會後立即組織一千五百人宣傳隊，印發布告四萬四千五百五十五份。全縣共召開大小慶祝會一千七百零九次，二萬九千九百七十二人參加；開辦“學習班”二百二十七期，有六萬三千三百九十九人參加。七月份共開批鬥會一千一百零七次，被批鬥者二千一百七十九人。人們說“七·三”布告成為“聯指”鎮壓“四·二二”的上方寶劍。七月十三日，縣革委主任說現在農村殺人比較多，要看得慣，領導要站在運動前頭。全州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殺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佔全縣死人數的百分之五十七點四。（見全州縣“文革”大事記）

德保縣貫徹“七·三”布告，把各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的辦法向下貫徹。七月七日，那甲公社召開萬人批鬥會，傳達“七·三”布告和縣三級幹部會議精神。公社武裝部長（革委副主任）作大會報告，宣布大隊為單位，擺開戰場，把所謂“四類分子”和“反圍”一百八十七人進行批鬥，當場打死打傷十九人（各佔一半）。燕洞公社七月十八日開萬人大會，對被批鬥者宣傳罪狀後，二百零六人個個過鬼門關（即被糾察隊、民兵、群眾用木棍、槍等凶器毒打）。到七月二十日宣布全縣已抓了“壞人”一千二百多人。八月五日，縣革委主任王君太主持召開縣常委會，決定召開控訴揭發“反革命分子羅仕彥罪狀會”，在講壇前跪的“反革命”共七百多人，王君太一面號召刮十二級颱風，向“敵人”猛烈進攻。糾察隊、民兵等動手打罵，台下面哭聲震耳。至八月七日，縣貫徹“七·三”布告辦公室宣布：“七·三”布告傳達後，德保縣抓緊清理階級隊伍和“三查”工作，向“階級敵人”發動更猛烈的進攻。到八月五日止，農村共揪鬥幹部、群眾二千一百二十人，縣直機關共揪鬥幹部職工一百二十一人。學習“七·三”布告後，自首投案者二百人。全縣死人三百一十二人，其中貫徹“七·三”布告前死九十八人、之後死二百一十四人。（見德保縣“文革”大事記）

上思縣革委會和武裝部負責人說：“貫徹‘七·三’布告策動全縣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過去沒有‘七·三’布告，不能解決問題，現在有了‘七·三’布告，就能解決上思的問題了，我們必須再次掀起群眾專政的新高潮。”“刮十級颱風不行，就要刮十二級。對敵人專政，這次會中搞，會外也搞，會內會外結合”。於是會議期間殺了兩批共二十三人（第一批殺十一人均為國家幹部）會外殺七十五人，共九十八人（會外零星殺人未記）。在貫徹“七·三”布告的同時，貫徹區革黨“清理階級隊伍”指示，全縣共清出“叛徒”五十一人，“特務”四人，“走資派”五十一人，“反革命分子”四十一人，“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二百二十人，其他“壞分子”八百三十五人，在清理中鬥死一百二十一人，逼死十八。（見上思縣“文革”大事記）

都安縣在向專區革委會報告中說：從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這一階段鬥爭特點，主要是清掃階級敵人顛覆革委會的現行破壞活動為主，這一階段全縣共揪鬥七千三百六十七人。……便更深入更艱苦的鬥爭還是在“七·三”布告公布後，在“七·三”布告威脅下，一個“三查一清”運動迅速在全縣範圍開展起來，到九月上旬共揪鬥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五人，挖出六十一個“反動組織”，特別是“反圍”和“中國青年黨”。（見都安縣“文革”大事記）

北流縣七月八日舉行七萬人參加的貫徹“七·三”布告大會。提出更猛烈地向階級敵人進攻。七月九日革委武裝部作出貫徹“七·三”布告威力揪“黑班子”等案。接著成立四個專案組：一〇一、二〇二、三〇三、六〇六專案組，共清理二百五十三個案件（全系錯案、假案）。七月十八日，北流“聯指”和各公社為貫徹“七·三”布告成立“七·一八”指揮部。此後在全縣範圍內亂揪亂鬥。全縣被誣為“黑班子”的八百二十人，被鬥爭七百四十八人，打鬥致傷四百七十九人，致殘六十二人，致死三十一人；打成“反圍”八百零四人，鬥打致傷的四百一十四人，致殘的二百二十五人（其中新豐區書記顧德榮因未得三結合，誣陷副書記搞“反圍”，該區

受害五百多人，致殘二百零五人，致死一百一十二人。“處道”時，顧被判刑十三年又翻案加判三年共十六年）。（見北流縣“文革”大事記）

九日平南縣發出貫徹“七·三”布告決定，說是解決廣西問題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猛烈進攻的進軍號，提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開展“三查一清”。提出要深入邊遠山區和未揭開蓋子的地方開展工作。出動了四萬八千多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縣、區、鄉領導帶頭深入基層辦班九千七百二十一期，學習者達二十五萬人。翻印了“七·三”布告七十二萬份，隨之是在全縣範圍內出現空前的亂殺人恐怖現象（見平南縣“文革”大事記）

九日區革黨、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文革發出《貫徹“七·三”布告情況簡報之三》說，“中央‘七·三’”布告公布三天來，已在全區掀起了宣傳學習高潮。特別是行動快，聲勢大，宣傳面廣。駐軍各黨委對貫徹《布告》決心大，抓得緊。各專、市、縣革委會宣傳《布告》得力深入。

同日廣西民族學院革委召開了歡呼並堅決執行“七·三”布告的大會。

同日民院“聯指”“三·七司令部”宣布民院領導和教師韋章平等五十七人為“國民黨殘渣餘孽”的“政治死刑”。

同日橫縣召開二萬八千多人的宣傳“七·三”布告誓師大會。組織二萬五千多人的“宣傳隊”員，發出清理外地人的通知，在一箇月中共揪鬥二千零七十五人，打死一百零二人，八月份打死二百二十六人，九月份打一百二十七人，三個月共打死五百四十三人。（見橫縣“文革”大事記）

十日區革黨、廣西軍區派出飛機散發《布告》後，又布置各地組織聲勢浩大的宣傳隊伍，宣傳《布告》。強調“七·三”布告是鎮壓階級敵人的銳利武器，要求幹部人人要學，人手一冊。於是，全區共翻印散發“七·三”《布告》約一千萬份。（“△”）

是日《廣西聯指報》一版全文刊登中央“七·三”布告，二版上半版刊登“聯指”指揮部《關於堅決打倒假黨員、國民黨大特務、頑固不化走資派、反革命分子袁家柯的總攻擊令》。下半版刊登“聯指”航運“紅聯”調查報告《天兵怒氣衝霄漢——盤踞在南寧航運局北大港口反共救國團匪徒和美蔣特務的滔天罪行》。

本月上旬，永福縣以貫徹“七·三”布告為名，發生集體殺人事件八十一起，死亡一百八十四人。七月二十五日，為在桂林打仗死亡“烈士”開追悼會，殺死五位區級幹部，之後又發生七起殺人祭屍的事件，殺死二十一人。以上八次追悼會（均為追悼團剿桂林“四·二二”死亡的十二人）共殺二十六人。另外，在桂林武門期間抓到對立派四人槍殺，為死去的十二人報仇。（見永福縣“文革”大事記）

十一日《廣西日報》一版報導區革黨、廣西軍區、南寧市革委會於十日上午聯合召開群眾大會消息《熱烈歡呼毛主席親批指示“照辦”的中央“七·三”布告，堅決貫徹執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偉大戰鬥號令》。消息摘錄了安平生、歐致富、肖寒在大會上的講話。他們的講話都強調，“七·三”布告是解決廣西問題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對“一小撮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的進軍號，要狠狠地打擊、打倒賀希明、翟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和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分子”，“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及所謂“地、富、反、壞、右”。

是日各地、市、縣所在地都召開幹部群眾大會，“熱烈歡呼中央‘七·三’布告”，全區約有三百萬人參加大會。（“△”）

是日區革黨、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文革發出《貫徹“七·三”布告情況簡報之四》。報告近幾天來，對“七·三”布告的宣傳，從城市到農村，已全面形成高潮。群眾組織揪出了一批“壞人”，其中有“叛徒”、“特務”、“托派分子”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

是日 廣西“聯指”在南寧火車站召開大會，歡呼《“七三”布告》。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吳華在大會上講話，動員圍殲“階級敵人”（“△”）

是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偉大的戰略決策——熱烈歡呼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頒發》。從今天起，該報軍管小組根據廣西軍區和區革籌主要負責人的指示，就貫徹“七三”布告問題，發表了九篇社論。

十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文革發出《貫徹“七三”布告情況簡報之五》。

是日 平樂縣“聯指”為赴桂林攻打桂林“四·二二”死亡十二人報仇，從在桂林關押的人中拉出十二人槍殺；回到平樂後又在平樂分三處開追悼會，共殺死對立派二十人祭死者。四次共殺三十五人（見平樂縣“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 南寧市委、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發布《關於恢復甯江大橋、朝陽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這是因為廣西“四·二二”控制的解放路一帶已被廣西“聯指”和解放軍武裝包圍後，“四·二二”在控制區外邊的朝陽路和甯江橋附近布防。因此，警司發布了交通問題的通告，揭露“四·二二”火力封鎖朝陽路至甯江橋，為殲滅“四·二二”大造輿論。（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文革發出《貫徹“七三”布告情況簡報之六。報告掩蓋了廣西“聯指”、解放軍重兵包圍廣西“四·二二”控制區解放路一帶而引起“四·二二”還擊的真相，而是說“自七月十日以來，南寧百貨大樓、造反樓“四·二二”據點多次開槍，打死群眾二人，傷多人。十二日上午他們從解放路、華西路向北大路打催淚彈（實際是“聯指”向“四·二二”進攻打的）有二、三百人中毒。

十四日 廣西“四·二二”指揮部發表、堅決貫徹“七三”布告的嚴正聲明。《聲明》指出區革籌、廣西軍區以貫徹“七三”布告為名，對“四·二二”執行全面武裝包圍和鎮壓。（“△”）

同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文革發出《貫徹“七三”布告情況簡報之七》。

十五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在區體育場召開“誓死捍衛‘七三’”布告大會。安平生在會上宣讀“七三”布告，歐致富、肖寒分別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他們的講話都強調“要結合‘三章’，‘清理階級隊伍’，向‘階級敵人’發動全面的、不停頓的、猛烈的進攻，刮一場十二級颱風”，“把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賀、傅、謝、袁之流，批深、批透，鬥倒鬥臭，把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叛徒、特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統統挖出來”……前來參加大會的河南片“聯指”通過甯江大橋時，遭到“四·二二”某組織據點開槍射擊，打死群眾二人，傷二人。大會宣布“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對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壞‘七·一五’大會的反革命事件”。（見《廣西日報》、《廣西聯指報》、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是日 下午，解放軍和廣西“聯指”武裝及數縣“聯指”武鬥隊向廣西“四·二二”的據點和控制區（解放路、百貨大樓、區展覽館等）推進了包圍圈。市委、南寧警備區、廣西“聯指”廣播說，上午八點鐘，廣西“四·二二”從區展覽館據點向區體育場誓死捍衛“七三”布告群眾大會開槍，打死打傷前來參加開會的群眾，是“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於是，事先布防在甯江橋兩頭的炮兵部隊和“聯指”武裝，向“四·二二”據點解放路一帶開槍炮擊。（見區檔案館1967年——1968年“文革”材料31卷）

是日 下午，廣西“聯指”總指揮部在南寧飯店據點召開常委、各片武裝負責人和各據點頭頭會議，研究布置總攻問題。會後，“聯指”副總指揮龔佔德等到廣西軍區彙報。司令員歐致富問道：“你們準備好了沒有？”暗示同意大打了。（見區“處遺”檔案55卷）

是晚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貫徹“七三”布告情況簡報之

八》。《簡報》說，十七點五十五分到十九點三十分，解放路的廣西“四·二二”向軍區機關開炮，軍區院內中彈五發，打傷戰士二人（其實，是軍區調動部隊和“聯指”武裝圍攻解放路一帶，炮兵部隊在軍區後院向解放路“四·二二”據點開炮時，駐守解放路的“四·二二”進行還擊，炮彈落到軍區院裏）。

十六日 晚，“支左”人員董坤從北京打來電報說，經在京幾位領導研究，有幾個問題答復如下：

- 1、清理敵偽檔案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績，應繼續抓緊進行。已查出的“叛徒”、“特務”，應抓緊核實，如有屬局級以上的應先搞清幾個報來。
- 2、擬再公布一批“反共救國團”成員及其罪惡，上石“農總”問題也可以公布。
- 3、廣播電台目前在廣播中不要提到“七三”布告及賀、傅、謝、袁問題。
- 4、鳳山縣副縣長覃家修的材料要繼續核實。核實後的材料如夠點名批判的，即由家裏領導討論決定。（見區檔案館1967——1968年“文革”材料卷革籌記錄本）

同日《廣西日報》用三個整版的篇幅報導“誓死捍衛‘七三’布告”的大會。一版報導十五日南寧十三萬人集會“誓死捍衛‘七三’布告”的活動。二版刊登大會《向毛主席的表忠書》和社論：《堅決執行，誓死捍衛——二論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央“七三”布告》。三版在《誓死捍衛‘七三’布告》通欄標題下，刊登記者採寫的“誓死捍衛”大會側記長篇通訊，大造聲勢，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聯指”）和人民解放軍起來殲滅“階級敵人”。

同日 從中午十二時至晚上，廣西“四·二二”控制區——解放路、民生路、上國街、博愛街等，被解放軍和“聯指”炮擊起火。南寧市委、南寧警備區司令部和廣西“聯指”卻宣傳廣播說是“廣西‘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燒街道民房”（“△”）

下午四時許，歐致富召見廣西“聯指”常委，要求他們“排斥群眾救火”，並交代了注意事項。（“△”）

是日 南寧市委、廣西“聯指”遵照區革籌、廣西軍區八月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以“治安委員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二百八十多人，殺害三十三人。還有的人被抓後，至今生死不明。

十七日 韋國清在赴京學習班的“誓師的大會”上說，“七三布告”是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更猛烈進攻的總動員令，“階級敵人”可能要挑起更大規模“武鬥”，要向“階級敵人”展開更猛烈的進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證《布告》的全面落實。

同日 解放軍、廣西“聯指”和十縣“聯指”武鬥人員全麵包圍廣西“四·二二”控制區——解放路一帶。開槍炮擊，雙方互相投汽油彈，使永明街、漢樂街、上國街、自強街、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燒，廣西“聯指”桂劇院據點向“四·二二”百貨大樓據點開炮，大樓的第三層樓裏起火燃燒。

同日 部隊和“聯指”圍攻解放路一帶時，“四·二二”航運“工總”所據守的停泊在甯江河邊的船隻第三次遭到“聯指”炮擊，“興無”號和“反修”號等一批船舶中彈燒毀。廣西“聯指”第一次炮擊船隻六月二十三日，打中了“桂宏”、“東風”號船；連接在一起的四十多艘船隻起火燃燒。第二次炮擊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下午七時，廣西“聯指”武鬥團從甯江兩岸據點向航運“工總”據守的船隻開槍射擊，一四三一號和一四〇四號兩艘船內裝汽油一千四百二十五桶共二百零三點六噸，另有航空機油二十四桶。因中彈全部燃燒。“聯指”前後三次炮擊甯江河邊船舶，共燒毀船隻一百六十六艘，一萬一千三百八十載貨噸位，一千零三十載客位，五千二百三十八匹馬

力，其中鋼質船六十四艘。木質船一百零二艘。當時船舶裝載的物資三千六百多噸，全部燒毀，被燒船舶和物資總共損失約一千多萬元。當時，廣西“聯指”、南寧市革委會和南寧警司卻把燒毀船隻的責任強加給廣西“四·二二”。宣傳廣播說：“‘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燒停泊在邕江邊的船舶，船上載有援越物資，破壞抗美援朝鬥爭，犯下滔天罪行”。（見南寧市和區交通廳“文革”大事記）

同日 解放軍六九七七部隊武裝殲滅融安縣“四·二二”農總，俘虜一百二十多人，打死多人，繳獲槍一百四十多支。爾後，又抓捕八十多人。（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是日 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發布《關於一小撮階級敵人對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壞“七一五”大會反革命事件公告》。（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是日《廣西日報》在頭版發表社論《徹底把謝王尚、袁家柯批倒批臭，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是晚 廣西軍區召開聯席會議，在南寧的區革籌成員和軍區黨委委員都到會。會議研究了所謂制止“四·二二”中的一小撮壞人縱火的措施。會上，伍晉南說：“現在抓了不少‘縱火犯’，對這些人不要打死了，要繼續查明縱火原因，以免你說是他，他說是你。要最後作結論”。（“△”）

十八日 遵照區革籌、廣西軍區的指示，各地、市、縣革委會，各軍分區、人武部及“聯指”又召開“誓死捍衛“七·三”布告”群眾大會，全區域鄉有七百萬人次參加了“誓死捍衛”大會。通過“誓死捍衛”大會，大造輿論，殲滅“階級敵人”。（“△”）

是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調動部隊以及廣西“聯指”數千武裝圍攻廣西“四·二二”控制區——解放路一帶。“四·二二”駐守的幾條街道被“聯指”和部隊炮擊起火，另有幾條街道是雙方交戰時互相投汽油瓶而燃燒了民房商店。但區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文革、廣州軍區發出歪曲事實的所謂《嚴防階級敵人製造更大規模縱火事件的措施的報告》。《報告》說，“階級敵人”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縱火破壞，燒毀大量民房、商店和船隻，人民生命財產遭到巨大損失。並說，“消防隊”組織“救火”時，遭到“新‘四·二二’”據點開槍射擊，僅十八日中午就打傷三人。

同日 南丹縣革委會根據軍分區布置，調動民兵千餘人，動用輕重機槍、六〇炮、高射機槍、火箭炮……等武器，對住在拉麼礦內的“四·二二”派群眾進行武裝圍剿。幾次以縣革委會名義發布通告，要礦內幹部、群眾投降，保證生命安全等。經過談判，礦內幹部、群眾走出來“投降”，走至礦口後被礦黨總支書記匡宗玲指揮武裝人員殺害四十七人，接著又將逃走的六人殺死，共殺死五十三人。（詳見南丹縣“文革”大事記）

十九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又調二〇師六六〇團四個連和廣西“聯指”數千武裝包圍炮擊“四·二二”解放路一帶據點，幾條街道硝煙瀰漫，一片火海。但南寧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卻發布《立即行動起來，撲滅反革命分子製造的火災——給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群眾的一封信》。

同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又向中央、中央文革發出所謂《執行武裝掩護部隊、群眾救火指示情況報告》說，由於著火地區都在“新‘四·二二’”控制區域，情況複雜，暗堡、火力點很多，需要作周密準備，我們採取的措施是：（1）組織了指揮所，由軍區副司令員焦玉山負責。（2）抽調四個連執行武裝“掩護救火”任務。（3）已發出了堅決迅速制止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縱火事件的呼聲，在全市反覆廣播，開展政治攻勢，追捕緝拿反革命縱火犯及幕後策劃者。

同日《廣西日報》頭版頭條位置發表社論《徹底粉碎“階級敵人”的瘋狂反撲——三論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央“七·三”布告》。

同日 區革籌河池地專區革委會、鳳山縣“支左”領導小組的通知。通知說：“鳳山縣原副縣長覃家修，在‘文革’中，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挑動群眾，指揮武鬥，破壞革命秩序，破

壞抓革命促生產，做了不少壞事，起了很壞的作用，至今仍不回單位，是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應該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通知下達後，縣人武部和“聯指”在全縣範圍內組織整討覃家修的“罪行”。

覃家修被羅織的“罪行”甚多，是因為縣人武部奉命支持“聯指”，壓“七·二九”（“四·二二”組點），覃家修和離休老幹部、當年韋拔群部一營營長廖熙英對抗了“軍方”，支持“七·二九”所致，廖、覃二人在鳳山老革命根據地頗有威望，因此，廣大農民和民兵都跟著他們，區革籌、廣西軍區為了扭轉鳳山局勢，便首先將覃家修和廖熙英當“階級敵人”打下去。覃家修被抓到後，被多次批鬥、毒打，最後被判刑十五年。一九八三年“處遺”時平反。（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一日 上午九點到十二點，廣西“聯指”又從南寧桂劇院據點炮擊百貨大樓廣西“四·二二”據點，東北面山牆被炮擊崩塌，二、三樓起火燃燒。（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二日《廣西日報》發社論《分清敵我，聯合對敵——四論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央“七·三”布告》。二版刊登廣西教育學院所謂穩、准、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經驗：《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其實，這所學院把不同觀點的一批教師、幹部打成了“階級敵人”，進行鎮壓。韋國清“視察”該院時，肯定他們打擊“階級敵人”的“經驗”很好，要總結推廣。

二十三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南寧專區、南寧市革委會分片召開“堅決貫徹‘七一八’批示（對湖南省革委會、省軍區貫徹“七·三”布告的批示），全面落實‘七·三’布告誓師大會”。南寧市革委會副主任肖寒等分別到各片群眾大會上動員“無產階級革命派”緊急行動起來，殲滅“階級敵人”。（見南寧市、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日報》頭版用特大號黑體字製作通欄社論標題《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五論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中央“七·三”布告》。

二十四日凌晨四點，忻城、來賓、武宣、柳城、宜山、環江、象州、柳江等八縣和合山礦、八一礦、柳州鋼鐵廠、柳州郊區“聯指”三千多人，攻打柳江縣福塘區“造反大軍”。這是柳州軍分區請示廣州軍區同意攻打的，並同意調動八縣、兩礦、一郊、一廠“聯指”武裝聯合攻打，由柳江縣革委會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總指揮。然而，當時從柳州逃到福塘避難的柳州“造反大軍”僅四五十人（大部分是柳鋼的，不少人的家在福塘），並在二十三日已逃離福塘了。只有當地“四·二二”觀點的農民五、六十人，在“重兵”包圍後，分別逃上單華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聯指”三千多人搜山圍村，抓獲七十多人，立即槍殺二十五人。在清剿中，又槍殺死一百二十多個農民。柳江縣“保衛隊”韋德金在良上村見一婦人背著一個小孩從外面回來，說這婦人是“四·二二”的“情報員”，開槍把婦人打翻在地。婦人未斷氣，韋德金又補了一槍，婦人含冤死了。年僅兩歲的小孩見媽媽被打死後，放聲大哭嚎叫。韋德金又用石頭把小孩砸死。“聯指”聯合攻打福塘，共打死群眾一百四十六人，開支現金十萬四千多元，糧食五萬三千五百八十三斤。（見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日報》頭版發表社論《一定要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戶曉——六論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央“七·三”布告》。頭版還刊登消息《南寧八萬軍民集會熱烈歡呼毛主席“七一八”指示，決心掀起更大規模宣傳貫徹“七·三”布告的群眾運動》。區革籌、廣西軍區、南寧駐軍、南寧市革委會、南寧專區革委會負責人分別在大會上作長篇講話。他們的講話都強調以“七·三”布告為武器，執行“群眾專政”，狠狠打擊“階級敵人”。此後，從城鎮到農村成批殺人。

同日 賓陽縣根據區革籌、廣西軍區和南寧專區革委會關於以“七·三”布告為武器，鎮壓“階級敵人”的指示精神，成立落實“七·三”布告領導小組，由王建勳（駐軍六九四九部隊副師長、縣

革委主任)、王貴增(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副主任)、黃智源(六九四九部隊管教導員)、凌文華(六九四九部隊炮管政委)為正副組長。王建勛二十六日在縣公檢法軍管會召開的三區(蘆墟、新賓、鄒墟)兩鎮(蘆墟鎮、新賓鎮)領導、公安員、派出所長會議上說：“對壞人要處理，殺個把不要緊，殺人犯要幹掉，民憤大的可以幹掉”。當晚，新賓鎮革委根據王建勛的指示精神，組織東風街群眾鬥爭羅貴昌、黃德三，當晚把羅、黃打死。第二天，新賓鎮革委主任何其清、武裝部長李發新組織落實“七三”布告大遊鬥，當場在新賓街上打死十四人。二十八日，新賓、大橋、蘆墟三區(鎮)分別押了一百多個“二十三種人”來蘆墟鎮掛牌遊鬥，當場用木棒打死八、九十人，其中有縣人民醫院院長李貴生，副院長兼內科主任鄧啟俊，外科主任劉大德，婦產科主任劉青桐，藥劑科主任劉長祥等高級知識分子。二十九日上午，王建勛在縣軍管召開的政法幹部會上具體布置鎮壓“階級敵人”，對殺人對象、時間、手段、指標都作了具體安排。王建勛說：“我們這一仗，時間從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為一段落，鬥爭的鋒芒主要是對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次要的是投機倒把分子、賄賂、開分隊的首要分子等”。縣的重點在蘆墟、新賓鎮，現在新賓也拉開序幕(新賓二十六日開始殺人)不要看不慣，氣可鼓不可泄。這個任務要執行，但又不能開大會，大張旗鼓地去發動群眾。只要群眾認為是“壞人”要專政的，你們就不能束縛群眾的手腳。二十九日下午又召開各區武裝部長和民兵營長緊急會議，王建勛、王貴增在會上批評一些單位“左看右看，拖拖拉拉，行動遲緩，回去後要統一行動，該打死的交給群眾處理”。這兩個會議後，全縣一百七十二個大隊，每個大隊都成批殺了人。八月三日黎塘區補塘公社槍殺三十七人。黎塘區革委主任兼武裝部長韋善強趁貫徹“七三”布告之機，挾嫌報復，直接指使殺害黃世濟(原宜陽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因病退職回家養病)等五名地下黨老游擊隊員。殺人手段十分殘忍，有槍殺、刀刺、繩勒、叉戮、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活燒、挖眼、剖腹、碎屍和用牛拖死等。從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二天裏，全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國家幹部五十一人，教師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體工七十五人，農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全家被殺絕的達一百七十六戶。在一九八三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因韋善強挾嫌報復殺人，民憤極大，於一九八四年冬被依法逮捕，一九八五年被執行槍決。其他為首謀劃殺人的罪犯和參與者，也受到了判刑或黨紀、政紀處分。所有無辜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昭雪。(見宜陽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聯指”和部隊繼續進攻廣西“四二二”控制區域，不斷地向解放路一帶“四二二”據點開槍炮擊，多起火燃燒。但區革委、廣西軍區又倒打一耙，向中央、中央文革和廣州軍區發出《南寧市情況報告》卻說：“階級敵人”繼續縱火破壞，向部隊技術偵察兵開槍，展覽館向駐總工會幹校高炮六四二團打炮十一發。

是日《廣西日報》用頭版整版篇幅宣傳毛主席“七一八”批示。繼續報導各地“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捍衛‘七三’布告”的活動。這個版的通欄標題是《我區廣大革命群眾在毛主席“七一八”重要批示指引下，掀起了更廣泛更深入貫徹執行中央“七三”布告的新高潮》。

同日自治區政協委員劉介及其兒子劉忠漢、媳婦黃劍珍、孫子劉頌平和鄰居李雄坤被桂林市馬車社社員蔡振華“聯指”成員)殺害。原因是蔡振華養的一條小狗從二樓掉下摔死了，蔡認為狗是黃劍珍丟下去的，兩人發生爭吵，鄰居李雄坤說：“一條小狗有什麼了不起”。蔡說：“打狗就是欺主”。於是懷恨在心。二十三日，蔡便以抓所謂“國民黨殘渣餘孽”為名，指使申松華等人將劉介等五人抓走殺害。(詳見桂林市“文革”大事記、大事件、區“處遺”檔案108號)。

二十五日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兩個連二百多人進駐廣西大學，宣傳、落實“七三”布告，領導“鬥、批、改”。“宣傳隊”負責人是陳田、蒙蔭昭。在“鬥、批、改”中，審查批鬥造成冤假錯案一百五十六人(起)，其中廳級幹部二人，處級幹部五人，科(縣)級六人，正副教授十九人，講師十七人，助教五十七人，一般幹部十人，工人七人，學生三十一人，家屬二人，校黨委書記高仕克於八月一日被當作“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揪鬥後，押送南寧警司關押了七年。這一百五十六位受害者，後來都已平反，恢復名譽。在“鬥、批、改”中共耗外調旅差費六萬二千九百

多元。(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至八月十八日靈山縣以公社為單位集訓中小學校老師，“清理階級隊伍”全縣共揪出“叛徒、特務”……“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等教師共五百一十八人，對這些人進行殘酷的批鬥，致死十人、致殘八十六人。(見靈山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七日《廣西聯指報》三版公布所謂《橫掃國民黨的渣滓——玉林“聯指”戰士、貧下中農揭發獲匪“中華民國救國團廣西桂南邊一〇三師等三股反革命組織”糾合案簡介》。報導後，大批“四二二”成員和無辜群眾遭到逮捕、關押和槍殺，這宗冤案遲到一九八三年“處遺”才平反昭雪。

同日全州縣清查“反圍”七十起，共死亡一千六百三十八人(其中槍殺一千一百二十五人，自殺一百九十八人，鬥打死三百一十五人)。“文革”十年，全州縣共死二千一百五十六人。(見全州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上林縣革委研究落實“七三”布告措施，提出八月要大戰一個月。到八月二十一日止全縣組織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六個宣傳隊，召開大小型會議二千六百多次，翻印布告五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一份。據當時縣革委統計，“七三”布告前全縣打死二百二十一，被迫自殺八十一人；“七三”布告後，打死一千一百五十一人，逼死四百二十七人。(見上林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巨大的鼓舞，有力的支持——七論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七三”布告》。

二十八日至九月二十二日 蒙山縣集全縣中小學教師四百七十四人辦學習班。共追害教師一百二十八人，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七，其中致死三人，致殘六人，重傷七十二人，開除五十六人，拘留十一人，判刑二人。學習班人員中有九十六人被“三辦”定為專政對象。縣革委主任在全體教師動員報告說，主要任務是貫徹“七三”、“七二四”布告，進行“三查一清”。在學習班期間共開了一千一百多次鬥爭會；分別施以刑罰，慘不忍睹，令人髮指。一九八三年“處遺”時，受害者給予平反昭雪，傷殘者給予經濟補助，死者遺屬撫恤，子女安排工作；對迫害教師的有關人員給予黨紀、政紀處分。(詳見蒙山縣“文革”大事件)

二十九日《廣西日報》頭版突出報導廣西軍區和駐軍組織所謂浩浩蕩蕩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赴礦區、鐵路、機關、學校、農村，廣泛深入宣傳貫徹“七三”布告，狠狠打掃“階級敵人”。

三十日 上林縣“聯指”總指揮調動大豐、巷賢、白墟、高賢區原“聯指”上林中學“瀝血兵”共四百多人，到南寧參加廣西“聯指”圍剿廣西“四二二”。在圍剿中，白啟魯、梁可明、潘運標中彈死亡。上林“聯指”決定為他們報仇，並分別為他們舉行“追悼會”。在潘運標“追悼會”上，藍宏記代表高賢區革委會講話，他說：“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繼承他們的遺志，戰鬥到底！有冤報冤，有仇報仇，還我戰友血，報我戰友仇，堅決鎮壓一切‘階級敵人’”。在藍的講話煽動下，以韋成祖為首的凶手離開了會場，將參加抗美援朝的共產黨員(“四二二”觀點)覃紹輝等三人打死。當天晚上，一批凶手又打死“四二二”觀點的三十人。在高賢區，年僅十六歲的中學生覃恒河被拉到潘運標墓地槍殺陪祭。蒙光忠被打死後被凶手剖腹挖肝煮吃。潘展才(黨員)、潘展光(團員)、潘海青(團員)、潘棉波(地下黨游擊隊員)被打死後，不准家屬收屍埋葬，強迫死者親屬拿出柴火和煤油，焚燒死者的屍體，親屬邊燒邊哭，泣不成聲。三個“追悼會”後，上林“聯指”為三個“戰友”報仇，共打死“四二二”和“四類分子”共一百零三人。這宗嚴重的派性報復殺人事件的主要凶手，遲到一九八四年“處遺”才受到懲處。(見上林縣“文革”大事記)

三十一日 區革委、廣西軍區背著中央和廣州軍區，調動解放軍六九一二部隊兩個連，廣西軍區警衛營兩個連，南寧軍分區獨立營一個連和炮兵六四二團高機炮一連、二連，以及玉林、陸川、貴縣、邕寧、武鳴、馬山、橫縣、上林、崇左和南寧郊區“聯指”武鬥隊，攻打廣西“四二二”區

展覽館。指揮攻打的是南寧警備區司令部副司令員印豐，副政委慕石起、參謀長陳德華等。指揮所設在明園飯店。十五時開始包圍炮擊。據“處遺”檔案109號記載，打展覽館整個計劃是經韋國清、歐致富批准的，主攻方向選擇由越南領事館突破，也是經韋、歐批准的。

是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負責人李仕才、安平生、韓世福召見廣西“聯指”總指揮顏景堂，布置“聯指”對廣西“四·二二”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迫使上交武器，反戈一擊。（“△”）

是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紀念“八一”建軍節四十週年》。社論強調以中央“七三”布告為武器，圍殲“階級敵人”。

七一九月，百色地區貫徹“七三”布告。成立貫徹“七三”布告領導小組，二十一日發出《關於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央（七三布告）的決定。八月十五日，地區革委、軍分區發出《關於進一步落實“七三”、“七·二四”布告，迎接全國布告頒發的幾點指示》。七、八月召開四次電話會議。強調開展鬥爭。全地區共揪鬥了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人，其中“叛徒”九十三人、“特務”五十八人，“走資派”三百三十人，“國民黨殘渣餘孽”九百三十九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一萬零二十九人，其他七千四百多人，打死和迫害致死二千四百八十一人。（詳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八月

一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調動部隊和“聯指”圍殲廣西“四·二二”區展覽館據點於上午八點結束。打死駐守據點二十三人，傷五人，“俘虜”四百七十多人。據解放軍炮兵第六四二團給軍區和廣州軍區的報告中得到，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命令，炮兵第六四二團高炮一連、二連協同兄弟部隊擔任“強行收繳展覽館武器”，主要負責火力壓制和牽制“敵人”正面火力，防止“敵人”從正面突圍、掩護兄弟部隊進館的任務。從七月三十一日十五時開始，到八月一日八時結束。共耗沖（步）槍子彈一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發，輕機槍子彈一千八百一十四發，四聯高射炮槍彈六百九十發，信號彈二十二發，損壞輕機槍二挺，四聯高機槍一個管機匣。（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是日 由凌雲、樂業、巴馬縣人武部幹部帶領的三縣“聯指”武門隊和六九——部隊進入鳳山縣，會同該縣“聯指”和人武部中隊共一千多武裝，圍剿對立派“七·二九”兵團。“七三”布告下達後，“七·二九”被縣人武部和“聯指”當作“土匪”圍剿，人馬逃散到“南山”——江州一帶和“北山”——久隆一帶躲藏。今天，解放軍和凌雲縣“聯指”武門隊包圍了江洲洞。洞裏有男女老少一百多人。解放軍和凌雲“聯指”圍攻三天三夜後，洞裏彈盡糧絕（有七支步槍），老人和小孩呼救救命。於是洞裏提出，保證他們人身安全，即可繳械投降。解放軍和“聯指”“同意”。三日上午，洞內派出代表黃顯應、陸祖業、陸倫貴出來“談判”。指揮圍攻山洞的凌雲縣人武部科長盧元俊主持“和談”會議。雙方“談判”結果，達成協議：“洞內‘七·二九’交槍投降，保證全部人身安全”。經雙方簽字後，“七·二九”先交槍，後出洞。解放軍和“聯指”收繳槍支後，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隊倉庫裏關起來。三個小時後，槍殺了七人。爾後，又殺害十多人。這就是震驚河池、百色兩地區的“江洲慘案”。但在十年浩劫裏，卻被稱之為“江洲剿匪大捷”，盧元俊等人“立功受獎”。繼“江洲慘案”後，解放軍和“聯指”又圍剿“北山”。（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日 韋國清、歐致富、魏佑謙、焦紅光因為背著中央，調動部隊和“聯指”摧毀廣西“四·二二”展覽館據點後，今天，他們向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和廣州軍區發出電報，檢討錯誤。電報說“我們對新‘四·二二’展覽館據點實行強行‘進駐’和‘收繳武器’事先沒有向中央請示報告，是嚴重錯誤，特向中央檢討，請中央給予批評”。（見區檔案局1967年——1968年“文革”材料3卷）

是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主要負責人命令六九一二、六九六六、六九三六等部隊，以及廣西“聯指”武門隊和武鳴、邕寧、橫縣、崇左、上林、馬山、玉林、貴縣、陸川等縣“聯指”武門隊，大舉包圍廣西“四·二二”解放路據點。總指揮是廣西軍區副司令員焦玉山。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張海波、景伯承、仲生棟，南寧警備區副司令員印豐和陳德華等也分別到各片指揮。廣西“四·二二”原先控制解放路附近的民生路、新華街、上國街等十二條街道，於昨天已被部隊和“聯指”打成廢墟。（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三日 解放軍和“聯指”徵兵包圍解放路，開槍炮擊，一片火海，區革籌、廣西軍區今天給中央的報告卻說：“階級敵人”仍然縱火破壞。解放路的“壞人”不斷向“掩護”部隊和“救火”的“群眾”開槍射擊，“破壞救火”。（見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一九六八年間給中央的報告和向下發的一些指示檔案資料）

是日《廣西日報》報導南寧市革委會於昨天召開“軍民大會”，全面落實毛主席批示“七·二四”布告和“七三”布告。消息標題是《堅決鎮壓一切“階級敵人”，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消息摘要發表肖寒、王恩厚在大會上的講話都強調：貫徹“七·二四”布告要象“七三”布告那樣，繼續、猛烈地進攻，堅決鎮壓“階級敵人”。現在他們已陷入四面楚歌，孤立待擒的困境了。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要立即行動起來，大打一場“人民戰爭”，對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最最猛烈的進攻。

是日《廣西日報》頭版還發表社論《對階級敵人就是要鎮壓——八論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央“七三”布告》。社論動員各地、市、縣革委會，各軍分區、人武部和“聯指”殲滅“四·二二”中的“階級敵人”。

是日 廣西“聯指”和部隊，三麵包圍廣西“四·二二”南寧百貨大樓據點。先用重機、高射機槍，無後座力炮轟擊，後用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藥包，將大樓山牆摧毀。據一九八三年區、市“處遺”聯合工作組調查，大樓被摧毀後，國家財產損失一百一十多萬元。（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四日 解放軍和廣西“聯指”圍攻解放路，數發炮彈落在解放路銀行辦事處左右兩側的民房中著火。此刻，銀行幹部高鏡鳳、黃長安、劉強、雷祖佑、陳永富、鍾甲等正人決定向“四·二二”解放路中心片指揮所報告，研究如何處理金庫的鈔票問題。指揮所的黃希立帶“四·二二”保衛處的黃耀明、鄭峰等人來到銀行，用十字鉤砸開鐵門，並打開金庫。黃希立找銀行幹部高鏡鳳、黃長安、劉強、李明軍、雷祖佑等人清點鈔票，共現金五十一萬零四百三十元六角。當時，“四·二二”頭頭能一軍也來到現場，他當面給銀行幹部打了收條，然後將鈔票抬至解放路土產門市部後面球場焚燒。對這一事件，當時被定為反革命搶劫銀行罪，“搶走解放路銀行七十一萬二千二百零一十五元，並且放火焚燒銀行和民房”。與事件有關的人員被關押十多年。一九八三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調查弄清事件真相，對原來被定為“反革命搶劫銀行罪”的人，免於刑事處分，釋放了在押的有關人員。（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藤縣落實“七三”布告，於八月中旬集中小學教師二千七百人辦學習班，三百九十九人被批鬥，二百二十五人被打傷，六十三人被打致殘，二人被炸死。至八月十日全縣被批鬥幹部、群眾四千三百七十九人。（見藤縣“文革”大事記）

五日 部隊和“聯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统计，廣西“四·二二”被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人（拉到二塘煤礦廢坑丟的屍體六百八十具；在解放路及附近街道就地“火化”六百九十四具；在朝陽溝邊槍殺活埋七十五具；分散“火化”、丟下邕江四十四具）。抓獲“俘虜”——廣西“四·二二”成員六千四百四十五人，另外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點左右，解放軍和“聯指”、“工糾”從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虜”出來，走到廣州照相館門前，槍殺打死二十三人。死者中有南寧市公安局幹警黃祖霖、鍾敬仁、胡躍明、李國和、謝赤德、黃初庚；南寧市磨香公司唐光環



(女)、廖洪基；南寧市糧食局章質彬；南寧市樹林園五人。(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是日解放軍和“聯指”打下解放路。下午，廣西“聯指”和南寧市“聯指”下屬各組織普遍召開慶祝勝利大會。晚上舉行宴會。大吃大喝後，又去屠殺“俘虜”。南寧市“聯指”“財司”兵團分兩處會餐，炮連在朝陽路小學，其餘在區工商聯。在朝陽小學會餐的王利(市飲食公司保衛幹事)等人吃喝後，提出要“教訓教訓”康興。呂繼才、楊愛群表示同意。於是他們把康興從開押的教室裏拉到球場上，王利、呂繼才和楊愛群用木棍輪流毒打，當康興被打倒在地上不能動彈時，王利、呂繼才和楊愛群把康興拖上汽車，令司機蒙日光開車到望洲嶺(現在的皮具廠)把康興地下紅苕地裏，王利、楊愛群先後開槍殺害。康興“文革”前是中共南寧市委第三屆候補委員，歷屆人大代表、市財辦副主任，一九四三年入伍的老幹部。(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是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紀念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兩週年》。社論強調以“七三”布告為武器，殲滅“階級敵人”。第三版報導各地工農兵歡呼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發表兩週年的消息，呼吁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群眾要團結在無產階級司令部周圍，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

六日根據區革籌、廣西軍區指示精神，南寧市革委會和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發出所謂《關於堅決肅清一小撮壞分子的階級敵人的緊急通知》，《通知》號召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緊急行動起來，大打一場圍殲一小撮“階級敵人”的人民戰爭，個個動手清查“壞人”，揭發“壞人”，捕捉“壞人”，為“人民除害”，為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再立新功。

是日凌晨五點多，“聯指”南寧民運社兵團頭頭兼攻打解放路武裝混合連連長李錦慶，在鎮北橋頭被冷槍擊中死亡。消息傳開後“民運後團”武裝班長黃立勝便帶領部分武裝人員到華西大樓，從開押的“俘虜”中拉出八人到華東路口槍殺。(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八日部隊和“聯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圍殲解放路和展覽館打死一千四百七十多人，抓獲“俘虜”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展覽館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等地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含“四·二二”赴京控訴團四百二十七人，外地流入南寧的五百人)]先後分別關押在區文化大院、區電業局、南寧二中、九中、天桃小學、當陽小學、五里亭小學、南寧幼師、區交通學校、區、市看守所等處。關押在區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區交通學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寧幼師四百四十一人，都被當作“殺人放火”、“四類分子”、“壞頭頭”、“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圍”等“要犯”、“首犯”處理。被“俘”人員交各縣拉回去七千零十三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當作“要犯”長期關押二百四十六人。據一九八三年“處遺”調查，解放軍和“聯指”攻打解放路一帶，共燒毀三十三條街(巷)，其中燒毀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間)，建築面積四十六萬平方米，使街道的五個公社，一萬多戶，五萬多居民無家可歸，僅國家財產損失價值六千萬元以上，燒毀重工、輕工、手工業的廠房、門市部八十多間、中小學校十五間、醫院門診部八間、百貨、醫藥、煙酒、水產、蔬菜、服務公司的商店和門市部共六十一間。(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是晚區革籌、廣西軍區召開全區電話會議，要求各地、市、縣革委會、軍分區、人武部認真貫徹“七三”布告，組織“階級隊伍”，向“中國赫魯曉夫在廣西的代表人物和一小撮階級敵人發起最猛烈的進攻，實現全區一片紅”。尚未成立革委會的縣，一定要在二十六日革委會成立前成立。(見區革籌、廣西軍區一九六八年間給中央的部分報告和向下發的一些指示檔案資料)

同日南寧市召開大會，動員群眾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全面落實“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市革委會負責人張正安、肖寒、梁中一、王恩厚參加了大會。張正安、梁中一分別在會上講話。他們說，目前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及其廣西的“代理人”賀、霍、傅、謝、袁之流，以及“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分子等一小撮“階

級敵人”，已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徹底滅亡的日子已經來到了。(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九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公布《關於廣西“四·二二”農總寧明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報》。號召開展“三查一清”認真清理“階級隊伍”，迎接自治區革委會早日誕生。(見區革籌、廣西軍區一九六八年間給中央的部分報告和向下發的一些指示)

十日廣西“聯指”總指揮部在南寧市朝陽廣場召開所謂捍衛“七三”布告“勝利大會”。會後舉行萬名武裝遊行。有十萬人參加；貴縣、容縣、橫縣、北流、崇左、桂產、田陽、博白、玉林、欽州、上林、邕寧等縣和東羅煤礦還派來“赴邕慰問團”參加大會。(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是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發處《處理南寧市解放路一帶問題的情況報告》。《報告》對調動部隊和“聯指”武裝攻打、炮擊、爆破對方據點，以及雙方對打時互相扔汽油瓶，企圖燃燒對方前沿陣地而引起的火災，燒掉解放路一帶三十三條街(巷)和河邊的船舶的罪行強加於廣西“四·二二”一方。(見區革籌、廣西軍區一九六八年間給中央的部分報告和向下發的一些指示檔案資料)

是日南寧市革委會和南寧警備區在展覽舉辦所謂“反革命罪證”展覽。安平生、韓世福等前去“參觀”。隨後，組織全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前來“參觀”。(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是日河池軍分區司令員孫長鎖、副參謀長李義川，奉廣西軍區之命，在東蘭縣人武部主持召開“關於用武力解決鳳山另一派群眾組織“七·二九”問題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天峨、巴馬、南丹、東蘭、鳳山等縣人武部領導人。以及鳳山縣“聯指”頭目覃傑，六九——部隊政委李寬永等。會議決定調直山、河池、巴馬、天峨、南丹、東蘭、凌雲、樂業、羅城“聯指”武裝和三廠(人民、龍江、東江三個兵工廠)的“聯指”武裝，會同六九——部隊、鳳山人武部中隊共三千多人“進駐”鳳山，“強行收繳”“七·二九”的武器。孫長鎖在會上還說，根據上級首長指示，鳳山縣革委會一定在二十六日自治區革委會成立前成立起來，實現廣西大地“一片紅”。會議宣布解決鳳山問題指揮小組名單。組長孫長鎖、副組長李寬永。成員有李義川、張春林、陳金柱、覃傑等。指揮小組決定，進駐鳳山武裝人員和部隊於十六日凌晨三點到達各自指定的地點，上午九點為全面總攻時間。四千四百多人進攻鳳山後，對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全麵包圍，抓捕了一萬多人。這一次圍剿，全縣槍殺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佔“文革”中殺死、害死總人數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被殺害的人中，有國家幹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參加過紅軍的二十人，參加過赤衛隊的十二人，參加過游擊隊的一百一十七人。經過武裝圍剿後，鳳山縣革命委員會於二十五日宣告成立。一批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凶手成了“功臣”，參加了各級革命委員會。“聯指”武裝和部隊圍剿“七·二九”時，喬官公社的韋明樂、韋明成、韋明立三兄弟帶著武裝逃上高山，長期不歸。(見河池地區、鳳山縣“文革”大事記)

十一日廣西“聯指”總指揮部在朝陽廣場召開所謂“全面落實‘七三’布告，上繳武裝誓師大會”。宋治平代表廣西軍區、區革籌、南寧警備區在大會上講話。他肯定和表揚廣西“聯指”參加所謂“掩護群眾救火”，打擊殲滅“階級敵人”後，召開上繳武裝誓師大會，“徹底”上繳武器的革命精神好得很！好極了！

十二日由南寧市革委會和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在展覽館聯合舉辦的“反革命罪行”展覽，正式開展。展覽時間五十二天。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組織全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四十八萬九千三百六十五人來參觀。展覽共分三個館，第三館是“活人展覽”，將在攻打圍殲展覽館和解放路一帶抓獲的熊一軍等二十六個“戰犯”，“叛徒”，“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五花大綁，關在鐵籠，當作禽獸讓“無產階級革命派”觀賞了五十二天後，將他們送進警司，長期關押。(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 廣西革籌向中央發出《關於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報告》建議韋國清（區黨委第一書記）任革委會主任。歐致富（廣西軍區司令員）、魏佑燾（廣西軍區政委）、焦紅光（空七軍政委）、霍成忠（五十五軍副軍長）、伍晉南（區黨委書記）、安平生（區黨委書記）、韋世經（南寧橡膠廠工人）、林福文（南寧航運局工人）、毛鳳鸞（鳳山縣農村女民兵、“活學活用”標兵）、廖煒雄（區黨委組織部副科級幹事）、龍智銘（區水電設計院幹部）、顏景堂（廣西大學學生）、曾春生（廣西醫學院學生）任副主任。（見區革籌、廣西軍區一九六八年間給中央的部分報告和向下發的一些指示檔案資料）

是晚 歐致富在北京代表區革籌、廣西軍區主持召開廣西“聯指”常委電話會議。向顏景堂等頭目談三個問題。一要上繳武器（因為十一日“聯指”召開所謂“上交武器誓師大會”後，並沒有把武器上交）。二要節約鬧革命（因為圍殲解放路後，廣西“聯指”從總部到基層組織都召開“慶祝大會”，大擺宴席，大吃大喝）。三要對“俘虜”執行政策（因為九千八百四十五人被抓獲後，關押期間被凶手动用十五種“刑法”毆打，成批殺害，不少女紅衛兵被強姦、輪姦）。

十四日 區革籌、廣西軍區向各地發出“關於自治區革委會成立的慶祝大會有關問題的通知”的電報。（見區革籌、廣西軍區一九六八年間給中央的部分報告和向下發的一些指示檔案資料）

十六日 南寧專區革委會保衛組在地區行署飯堂搞“活人展覽”，有七個幹部被當作“階級敵人”展出。給他們帶上手銬，由解放軍看守，參觀者達數千人。（見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是日晚，上林縣三里區發生爆炸事件。三里區革委會認為是“敵人”破壞，經會議研究決定把“四類”分子和“二十三種”人等二百餘人，抓來批鬥，當天把原區委書記、區長、區婦聯主任等一百六十七人殺害（後查明爆炸事件系該區共青團書記因未得參加區革委會不滿所為）。（見上林縣“文革”大事記）

十七日 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開桂林地區各縣“聯指”武鬥團負責人及各縣人武部負責人會議。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吳華在會上講了話。他說：“桂林問題是要解決的。一小撮‘階級敵人’一定要搞乾淨。貫徹‘七三’布告要抓兩個關鍵：一是收繳武器。二是清理外地人員。對抗拒不交武器的要採取軍事行動，強行收繳”。桂林軍分區政委慕石起也在會上說：“你們來桂林已取得了很大成績，有很大貢獻。‘壞人’、‘壞頭頭’、‘走資派’、‘叛徒’、‘特務’一個也跑不了”。會議布置用武力解決“四·二二”桂林“造反大軍”的問題。（見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 南寧舉行“盛大”軍民大會。韓世福代表區革籌、廣西軍區、南寧市革委會在會上作《進一步落實“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以“戰鬥姿態”迎接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誕生的動員報告》。

是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在階級鬥爭的凱歌聲中迎接我區革委會勝利誕生——九論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的中央“七三”布告》。社論說，貫徹“七三”布告，消滅“階級敵人”取得了“偉大勝利”，要在階級鬥爭的凱歌聲中，以新的戰鬥姿態迎接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誕生。

十九日 景伯承、慕石起在桂林一〇四部隊駐地召開平樂、興安等十二縣“聯指”武鬥團頭頭會議（當時調進桂林市的各縣“聯指”武裝人員已達七千多人）。景伯承在會上說：“‘造反大軍’的槍一定要繳，一槍一彈不能少，他們不交，我們就採取強硬措施了”。“我們已成立三千多人的糾察隊，‘聯指’的槍比以前多了好幾倍，今天還要發”。“還有一股人（指‘造反大軍’）要上山。他們上山，‘民兵’同志看到不用請示，打掉了”。會上，景伯承對“八·二〇”行動作了具體部署。成立“軍民聯合指揮部”，由張東芝（桂林軍分區副司令）任總指揮，全州縣人武部長龐人軍任十二縣“民兵”指揮部。會議確定由軍隊主攻，“民兵”負責攔截外圍逃散人員。（見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是日 前去北京參加中央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廣西“四·二二”的九個頭頭，章英、農烈、白璧平、廖偉業、王反修、李振林、錢之俊、劉振林、劉天價被在京一起學習的廣西“聯指”頭頭當作“反革命”拘捕送進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關押，隨後送回廣西各地關押。白璧平被柳州市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同日 百色地區革委舉辦地區追查“黑班子”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共九十二人；對支持、同情“四·二二”的領導幹部和“四·二二”的骨幹進行審查，其中有覃展、田永春、陶愛英等被誣為“黑班底”，黃克剛等十餘人被誣為主要成員。（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 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備區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全面落實“七三”布告的公告》。《公告》以解除武鬥據點、收繳武器、清理外來人員為由，對“四·二二”桂林“造反大軍”進行全面圍殲。其實，在“八·二〇”前，他們已收繳了“造反大軍”的武器，搗毀所有的據點，湮不成軍的“造反大軍”，已毫無抵抗能力了。但為了徹底圍殲對立派，市革委會和軍分區將桂林地、市“聯指”兩千多武裝人員編成“糾察隊”，由市武裝部科長王永清和市工交部武裝科長鄧國安指揮，會同十二個縣“聯指”武鬥隊團共一萬多人，於凌晨三點包圍桂林市，搜捕“造反大軍”，接連四天四夜，對“造反大軍”及持“四·二二”觀點的幹部、職工、居民和學生共一萬多人實行逮捕關押，五千多戶被抄家，劫走財物。二十九日，市革委會召開幹部群眾大會。桂林市革委副主任陳秉德在大會上作動員報告“全市人民行動起來，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刮一場十二級颱風”。會議結束後，連續幾天遊鬥批鬥了近萬人。殺害、打死和迫害致死的共三百四十五人。原來兩派群眾組織對等參加革命委員會成員中，“造反大軍”的二十二個委員，在“八·二〇”事件中，被逮捕關進監獄的有十九人。而“聯指”的二十二個委員，不管是策劃武鬥，指揮武鬥，參加武鬥，指揮亂殺人，親自殺人，策劃搶奪武器的，不僅不予追究責任，卻成為執行“正確路線”的“精英”，保衛“紅色政權”的“功臣”，不斷陞官晉級。例如“聯指”的主要頭目，組織、策劃武鬥犯了罪的曾明軒、曹鐵軍等人都昇了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廣西軍區、原區黨委和桂林地、市委、軍分區，一直堅持桂林“八·二〇”事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誰反對“八·二〇”行動，誰就是“反革命”。原市長馮翊瑞因反對“八·二〇”行動，從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底，以“反革命罪”，被批鬥、審查了十年。市委曾多次報告要求原區黨委把馮翊瑞作為敵我矛盾處理。開除黨籍，每月只發生活費。馮翊瑞不服，向中央申訴。一九八三年“處遺”後，新區黨委下文給馮翊瑞平反。一九七四年初，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張雄飛等一批人貼大字報揭露“八·二〇”行動是韋國清等人鎮壓人民群眾。結果，張雄飛、李新、劉玉生、賴東榮、潘文源、彭富森、許瑞林、龔志明、黃錦祥、李和平、周述耀、陳體雲、牛建農、楊炎玲、楊德華、魯鶴松、劉重喜、張樹枝、唐兆宣、莫汝、陽文生、湯焚新、孔憲才等二十三人被當作“現行反革命”逮捕。張雄飛、龔志明、許瑞林、黃錦祥等八人分別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印發《張雄飛等一批反革命分子》、《桂林那幾個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散發全區，廣泛宣傳。一九七六年底，又把張雄飛定為“林彪和‘四人幫’復闢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和依靠力量”。一九七七年又定為“‘四人幫’反黨集團的組成部分”，“是‘四人幫’在桂林的別動隊。”一九七七年原區黨委發出的三號文件中說，“在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發生的桂林那幾個‘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幫’插手廣西的嚴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原區黨委還決定在《廣西日報》刊登一系列批判“桂林那幾個反革命分子”的文章和評論，以鞏固“八·一〇”行動成果。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原區黨委和桂林市委，每年要在桂林市進行一次“八·二〇”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的“教育”，強制幹部人人表態。誰反對“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誰就是“反革命”。於是，轟動全區十三年“八·二〇”事件和“桂林那幾個反革命分子”案件，遲到一九八四年三月，新區黨委才給予平反昭雪。（見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記）

（按：此案是區高級法院副院長張佐民辦的，是喬曉光親自抓的，親自修改判決書。喬授意桂林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龔志明死緩，張雄飛、許瑞林無期徒刑，黃錦祥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後，張雄飛等人不服，多次申訴，法院也多次復查，只要改變刑期，而不給予平反。一九八二年二

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聽了該案的復查彙報後指出，屬於錯案，應予平反。但喬曉光以湖南省唐忠富一案為例，要法院關了多少年就改判多少年。區高級法院副院長孫曹威也拖著不予平反，至一九八二年底，孫到最高法院請示工作時，又向王戰平副院長提出要維持原判。經最高法院來電話答復：仍按江華院長在南寧的意見辦。之後，才於一九八四年元月徹底平反。）（見“處遺”檔案材料）

二十一日 廣西革籌第二次向中央發出《關於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這次報告取消了上次報告中建議伍晉南為副主任的意見。（見區革籌、廣西軍區一九六八年間給中央的部分報告和向下發的一些指示檔案資料）

是日 為了迎接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誕生，《廣西日報》頭版發表《紅日照南疆，形勢無限好——本報記者述評我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勢》。述評廣西形勢大好的主要標誌是，區革籌、廣西軍區和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執行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堅決貫徹、誓死捍衛中央“七三”布告，堅決鎮壓“階級敵人”，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刮起了“十二級颱風”，從而實現了全區大地“一片紅”——各專、市、縣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然而，在“文革”中，特別是以“七三”布告為武器，鎮壓“階級敵人”以後，全區共殺害和迫害致死八萬五千多人。

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首長接見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廣西班同志，宣讀了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二十四日 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鏞、焦紅光等從北京回到南寧。（“△”）

同日 河池地專“聯指”、河池縣革委會等組織聯合行動，對“走資派”、“反革命分子”、“四·二二”派“壞頭頭”等進行一次大門爭、大清理。將地委副書記張延年、副專員崔樹芝等三百餘人進行遊鬥，最後集中在工人球場，李豐生（“聯指”總指揮、地區局幹部）手持木棍——敲打他們。經過遊鬥和李豐生等的敲打，有百餘人被打傷，在地專幹部群眾中造成極壞影響。（見河池地、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區供銷社革命領導小組成立。組長張堅，副組長左鳳才、王玉林，成員：阮世具、王福奎、莫畏、羅勇。這天，持“四·二二”觀點的該社幹部顧隆和從桂林回來，即被王玉林、阮世具等人打死，屍體被丟到麻村附近原水溝裏。從九月開始，區供銷社開始了較大範圍的審查。共三十九人被重新審查。由張堅任指導員，王玉林、阮世具管專案工作。九月二日，廣州軍區外調組向阮慶瞭解部隊的一位幹部的政治歷史問題。區供銷社即成立審查阮慶專案組，對阮慶實行隔離審查。連續用罰跪、毆打等辦法逼供，十多天無結果，廣州軍區外調組撤走。但阮慶仍繼續受審查。並兩次派阮世具、覃繼喜到廣州軍區索取有關阮慶的材料，仍無結果。其後，把阮慶、宋友寬、莊東月、王新等十人作為敵我矛盾對象送到武鳴學習班繼續審查。（見區供銷社“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 《廣西日報》頭版頭條刊登綜合消息，《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親切關懷下，廣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空前大好》。消息副題特別指出：經過深入持久地開展“革命大批判”，粉碎了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中南和廣西的代理人等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惡陰謀”，極其沈重的打擊了“階級敵人”，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全區自上而下地逐級建立了革委會，四個市、八個專區和八十二個縣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村人民公社也成立了革委會。

二十六日 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併舉行了慶祝大會，革委會主任韋國清，副主任歐致富、魏佑鏞、焦紅光、霍成忠、安平生、韋世經、林福文、毛鳳鸞、廖煒雄、龍智銘、顏景堂、曾春生。常委：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鏞、焦紅光、霍成忠、安平生、陳開路、餘其海、劉重柱、韓世福、伍晉南、趙茂勳、肖寒、韋世經、鄧成漢、鄧文光、林福文、陳啟品、蔣運英、毛鳳鸞、肖桂榮、農其新、曾春生、顏景堂、何作然、廖煒雄、龍智銘、潘玉臣、李家海。革委委員一百三十三人。在慶祝大會上，韋國清、江覺元（廣州軍區副政委）、歐致富、安平生、韓世福等作了

“重要”講話。韋國清在講話中強調，“要穩準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把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壞、右分子批倒批臭”，“要肅清國民黨殘渣餘孽……”。（見二十七日《廣西日報》）

是日 環江縣石棉廠革委會副主任韋水鄧接到縣糾察隊長張兵電話通知，要該廠殺“豬”（即殺人）向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獻禮。當天該廠糾察隊長指揮槍殺了“四·二二”派的工人莫萬朝。（見環江縣“文革”大事記）

是日 臨桂縣革委副主任唐中元、韋英豪提出清理在押人員，“要殺的快殺，快要‘停車’”了。至九月十八日共殺一百五十二人。（見臨桂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 《廣西日報》刊登新華社播發電訊稿《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誕生》，並公布了主任、副主任和常委名單。二版刊登《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前進——熱烈歡呼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

二十九日 自治區革委會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韋國清在會上講話，說“當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大刮右傾翻案風，製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時候，‘七·三’布告給廣西二千四百萬人以及大支持和鼓舞，我們以《布告》為銳利思想武器，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了猛烈的進攻，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七·三’布告和‘七·二四’指示劃清了廣西的革命與反革命界限”。還說“解放時國民黨有意留下一批軍、警、憲、特、美帝、蘇修又派來一批特務。質、霍、傅、謝、袁是代表帝國主義、國民黨、富、反、壞利益的反動分子”。我們“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要牢牢掌握階級鬥爭的主動權，向一小撮地‘階級敵人’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狠狠打擊他們的‘反革命’破壞活動，徹底粉碎他們翻案復闢的罪惡陰謀”。（見《廣西日報》）

三十日 平樂縣月城區為龍巖反革命事件（是一件編造的假案）開大會殺十三人。與龍巖事件同時，各區均進行追查“反圍”，全縣因受反圍案受牽連者達一千七百二十九人，死亡一千二百九十人。（見平樂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臨桂縣“聯指”頭頭胥明德率“工糾隊”將周福英（縣民政科長、縣委副書記李瑾科之妻）等二十人殺害。三十一日，胥明德又帶領“工糾隊”將周克仁（副縣長）、王振廷（縣人委辦公室主任）等二十三人打死。胥明德在“處遺”時被判死刑，立即槍決。被害者得到平反昭雪。

本月，大新月桃城區大嶺公社造反派負責人、公社革委副主任周均定（因“文革”初期被揭發貪污公款和亂搞男女關係）為首的專案組，為達到報私仇目的，製造了一個“廣西反共救國大嶺分圍”的冤案，受害者共五十六人，其中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三十二人。還有二十三戶被抄家，罰款共二千八百九十七元六角。（見大新縣“文革”大事記）

九月

一日 《廣西日報》一版頭條刊登《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報告的指示》二版刊登《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韋國清同志八月下旬對廣西兩派在京學習班學員講話》。該報還突出報導廣西勞大“星火燎原”兵團寫的所謂《借問瘟君欲何在——堅決鎮壓勞大“四·二二”的蔣匪反共救國匪徒》。

四日 《廣西日報》、廣西人民廣播電台軍管小組舉行批斗大會，將已揪出來的“叛徒”、“特務”、“走資派”、“三反分子”、“黑筆杆子”七十多人進行批判和鬥爭。譴譏這些同志在新聞單位把報紙和電台變為他們復闢資本主義的工具的罪行。（見五日《廣西日報》）

五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認真搞好鬥、批、改》。

同日平樂縣革委會錯誤地根據縣“聯指”的意見，把逃往農村的“造反大軍”成員當作土匪來追剿，併發布“剿匪”緊急動員令，成立指揮部，調動民兵追剿。在追剿中打死二十一人，槍殺七十七人，共死亡九十八人。（見平樂縣“文革”大事記）

六日至九日區革委會召開全體委員（擴大）會議，連續批鬥所謂“中國赫魯曉夫在廣西的代理人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玉尚、袁家柯”。參加批鬥大會的有區革委會委員、廣西軍區、南寧駐軍領導和“三支”、“兩軍”人員，還有區直機關幹部。焦紅光在批鬥結束時，在大會上發表了講話。（見《廣西日報》）

同日區革委會、廣西軍區批准同意河池專區革委會、河池軍分區又組織四百八十人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鳳山縣，宣傳動員“敢匪”下山“投城”。這是因為八月十二日部隊和十二個縣（廠）“聯指”武裝四千多人圍剿“七·二九”後，尚有一批人帶槍逃進深山老林。“宣傳隊”和縣人武部、縣革委會，強迫“敢匪”家屬上山動員親人“下山交槍，一個不殺”。韋明樂、韋明立、韋明成三兄弟和堂弟韋明景帶槍逃上了高流山。韋明樂父親上山動員，韋明景先下山“投城”。但，韋明景回歸第二天就被拉去殺害了，當時年僅十七歲。從此，逃上高流山的韋明樂、韋明成、韋明立三兄弟，長期不敢下山。爾後，區革委會和廣西軍區，下令派兵圍剿三兄弟長達十四年。（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七日南寧化工廠“支左”人員和革委會貫徹區革委會號召，狠狠打擊“階級敵人”，開辦了第八期“學習班”，將本廠五十多名所謂“反共救國團”嫌疑的人，集中住在舊水泥廠，由“支左”解放軍李元春負責指導專案組審查。在“支左”小組長武偉召開的一次被審查對象會上，武說：“南化”反圍”成員不是一個兩個，八個十個的問題，而是幾個火車皮也裝不完”。並說：“《台北日報》都有你們這些王八蛋的姓名”。李元春說：“市新風街八十九號房是‘反圍’的老窩”。在這個會上被點為“反圍”的有二十多人。對審查對象施以“金雞獨立”刑罰逼供。李元春說：“我這樣幹，就是我的‘磨菇戰術’”。六〇三車間主任郭信被逼供後，自殺身亡。被逼供神經失常的有陸恒嘉、周俊希、邱明銘。此外還有三人被逼自殺未遂。（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日報》刊登《人民日報》、《解放軍日報》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熱烈歡呼全國（除台灣省外）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全部成立》。

八日《廣西日報》頭版發表新華社稿《共慶我國七億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熱烈歡呼整個運動已進入鬥、批、改的新階段》。還報導南寧十萬多軍民集會，縱情歌唱全國山河“一片紅”。廣大軍民決心堅持工人階級領導，深入持久地開展革命大批判，認真清理階級隊伍，穩、准、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同日《廣西日報》發表全區軍民《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掀起鬥、批、改新高潮——我區軍民歡呼全國山河“一片紅”》消息。宣傳區革委會、廣西軍區布置開展鬥、批、改的精神和決心。

九日區革委會、廣西軍區公布所謂《關於廣西“四·二二”農總寧明地區部分的反革命罪行公告》。《公告》說：“破獲了反動組織廣西‘四·二二’農總寧明縣上石分部，農總上石分部設作戰部、組織部、宣傳部、後勤部，下屬十七個分團，一個武裝連，農總分部共二百四十人，經常活動有一百四十三人，是一個‘反革命組織’”。（見區革委會、廣西軍區一九六八年間給中央的部分報告和向下發的一些指示檔案資料）

十日下午，歐致富召集“三辦”（整地下黨、“叛徒”、“特務”專案辦公室）、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司和區公檢法軍管會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稟報攻打解放路後，《關於寧市“俘虜”、“收容”人員審查工作情況及下步打算》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七月二十三日及八月二十六日，

攻打區展覽館，解放路廣西“四·二二”據點後，共“俘虜”、“收容”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含廣西“四·二二”赴京控訴團）。歐致富聽稟報後，說：“對這批九千多個‘俘虜’，要根據不同情況，交由自治區公檢法軍管會作具體處理。……”九月六日，還成立了審查處理“俘虜”領導小組，組長由廣西軍區政治部主任孫磊兼任，下設辦公室，由南寧市革委會副主任李瑞祥負責。（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一日《廣西日報》頭版整版篇幅報導《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堅決執行毛主席發出的認真搞好鬥、批、改的偉大戰鬥號召，同仇敵愾，憤怒批判鬥爭賀、霍、傅、謝、袁等一小撮“階級敵人”》。還發表社論《把革命大批判烈火燒得更旺》。

十二日至十五日橫縣壘城區召開開代會，會中及會後的十二天裏，打死六十三人，逼死十二人，共死七十五人，橫縣全縣七、八、九三個月共打死、逼死五百四十三人。（見橫縣“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都安縣革委會召開二萬多人大會，宣讀縣革委會、縣人武部《關於查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廣西分團”在我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公告》。全縣共揪鬥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一人，受嚴重迫害三千三百四十一人，致死四百四十一人，受株連達八萬人之多。原縣長蘭芳琬被誣為“反圍”總指揮（關押八個月）、副縣長覃向琦被誣為“反圍”的上級領導，縣委副書記黃保堯、糧食局副局長李振田、農業局長蘭芝才被誣為“走資派”是“支持反圍的”；公安局長韋立金、糧食局長韋志英、法院院長（縣常委）蘇盛文等三人被誣為“反圍”頭目。蘭芳琬被毒打致死。成為都安縣“文革”期間特大冤案。（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同日區物資領導小組召開慶祝革命領導小組成立大會（原材料、機電、儲運三公司也同時成立革命領導小組）。柳州、桂林、貴縣二級站和區直機關單位也派代表參加。集中全局的“走資派”、“牛鬼蛇神”掛黑牌亮相批鬥，黃國楠、李雲、李興武、明韜等三十多人遭毒打。會後，各二級站代表回去也照此辦理，召開慶祝會和亮相批鬥會。十月以後轉入“鬥、批、改”，在革命領導小組領導下，物資局機關和局直屬單位遭到嚴重摧殘迫害的老幹部有黃國楠、朱維松、張超、李雲、李興武、明韜、劉長安、李鐵雄等。分別於十月五日和十一月三日被批鬥。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張超、機電公司經理李雲、局辦公室幹部李鐵雄遭受多次殘酷批鬥毒打折磨後，被迫害身亡。“文革”期間，區物資局（包括二級站）被迫害、槍殺、打死的有二十二名，武鬥中死亡九人，下落不明二人，總共三十三人。是區直機關“文革”中死人較多的單位之一。（見區物資局“文革”大事記）

十五日《廣西日報》出八個版，發表韋國清在區革委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的總結報告，刊登了擴大會議通過的《關於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群眾運動推向更新階段的決議》、《關於加強領導班子革命化的決定》等文件，報社為此配發了社論《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立即掀起鬥、批、改的新高潮》。

十九日廣西軍區收槍小組給區革委會、廣西軍區黨委《關於貫徹“七三”布告，動員群眾組織上交武器裝備的情況報告》。《報告》說，自八月十一日開始至九月十七日止，廣西“聯指”（指南寧“聯指”）上交各種武器七千八百九十件，佔槍走數的百分之九十，各種彈藥二百九十四萬發，軍用手榴彈九千五百二十五枚，收繳廣西“四·二二”（指南寧“四·二二”）各種武器一百二十三件，佔槍走數百分之四十五點二，各種彈藥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六發，軍用手榴彈二百五十四枚。（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廣西日報》一版突出報導南寧專區召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推向更新階段，在鬥爭中學，在鬥爭中用，立即掀起鬥、批、改的新高潮》。大會傳達貫徹自治區革委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的決議、決定。

同日《廣西日報》還突出報導柳州鐵路局車輛段革命工人深入開展對“敵”鬥爭的消息。其標

題是：《充分發揮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狠狠打擊“階級敵人”》，強調要主動把“階級鬥爭”這件事管起來，不管一個單位的“階級鬥爭”多麼複雜，只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和主力軍作用，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就能把那些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揪出來。各地傳達貫徹區革委擴大決議、決定和韋國清的總結報告後，從自治區機關到基層組織，從工廠到農村，各條戰線，各行各業，立即掀起了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新高潮。自治區各部門、各地、市、縣、各大、中學校，幾乎每個單位都揪出幾個、十個、二十個、三十個、五十個、七十個、一百多個的幹部、教師、教授、工人當作“叛徒”、“特務”、“國民黨殘渣餘孽”、“壞頭頭”、“反革命”、“反軍幹將”、“牛鬼蛇神”、“右派”等關進“牛棚”和私設牢房，以及監獄。全區有十五萬多幹部職工受到殘酷批鬥和勞役。南寧地區開展“三查一清”揪鬥了七萬多人；區農業系統被揪鬥一千二百多人；都安縣揪出門鬥了六千多人；區直機關將批鬥對象分為三等，一等送南寧茅橋監禁，有的被送進警司長期關押，二等被送進武鳴“學習班”隔離審查，三等送進“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這批幹部被殘酷批鬥，關押、毒打。到一九七二年才陸續“解放”。有的關押到一九七九年。

是日博白縣文地中學黨支部書記劉振武同志慘遭迫害，在監中逝世。劉振武反對資產階級派性，反對“文化大革命”，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用“中國人民保黨反派委員會”的名義，寫了《宣言》和《對當前全國各地兩派爭論的意見》投寄玉林軍分區。《宣言》斥責林彪：“他通過喬裝，披著畫皮，偷偷地躲在我們敬愛領袖身邊……推翻了正確的黨的八屆中央的正確領導，全部篡奪了它的職權……打擊許多領導幹部。已經把我們黨的領導隊伍和幹部隊伍糟蹋得不成樣子了”。《意見》說：“兩派都是錯誤的，……兩派都站在錯誤立場上，幫助派性中央，推翻了全國人民所衷心擁護的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推翻了無產階級政黨最根本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從而導致了全國性的大分裂、大流血、大內戰”。劉振武同志為了黨的國家的前途、命運，敢於坦率陳述自己的見解，揭露林彪反革命陰謀，反對資產階級派性，卻被玉林地區公檢法軍管會一些負責人錯誤地認為是“特大反革命匿名信”。於同年九月十二日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劉振武在獄中病逝後，縣軍管會決定對他“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是一宗顛倒是非的大冤案，一九八三年“處遺”時才得到徹底平反昭雪，自治區人民政府於一九八四年元月三日批准追認劉振武為革命烈士。（見博白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二日自治區革委會在區體育館召開“歡送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新聞、醫院、科研等十六個單位大會”。會上，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韋國清、副主任歐致富等代表區革委會向十六個“工宣隊”授旗和贈送毛主席像章。區革委會副主任焦紅光在大會上講話。這批“工宣隊”以產業工人為主，有解放軍參加，共二千四百八十多人，分別進駐廣西大學、廣西醫學院、廣西中醫學院、廣西民族學院、廣西農學院、廣西勞動大學、廣西教育學院、廣西藝術學院、南寧醫專、南寧一中、二中、廣西日報社、新華社廣西分社、區人民廣播電台、南寧市東方紅醫院，以及區水電廳等十六個單位，領導那裏的“鬥、批、改”。此後，各地、市、縣革委也派出“工宣隊”進駐當地的學校、科研和新聞單位。（見《廣西日報》及上述各院校“文革”大事記）

二十三日區革委會、廣西軍區給各軍分區、柳州、柳鐵“支左”聯合辦公室、各駐軍、各邊防站發出《堅決制止亂殺人、亂抓人的通知》的電報。這是因為區革委會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後，各級革委會和人武部堅決貫徹執行“擴大”會的部署，對不同觀點的幹部、群眾，冠以種種罪名，進行鎮壓，大抓亂殺，問題十分嚴重。

同日原區財辦黨組書記、代主任馬鴻祥被批鬥、毒打、迫害致死。“文革”開始，馬鴻祥就被批鬥、抄家、隔離審查和強制勞役。區財辦機關“聯指”頭頭吳盛光兩次派人外調馬鴻祥的政治歷史問題，最後定馬是“走資派”、“歷史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對馬的批鬥逐步昇級。九月二十日下午和晚上，吳盛光參與批鬥會，鬥得更凶，馬兩次被毒打得慘叫倒下，反覆折磨至深夜十一點多鐘，到九月二十四日清晨，發現馬鴻祥已被迫害死亡。領導小組長任耕卿、吳盛光等當場商議定馬是“畏罪自殺”的“階級異己分子”、“走資派”。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八日，吳盛光被

開除黨籍。（見《吳盛光案材料》）

二十八日天等縣上映中學教師許繼善和連加公社農民許紹吉、韋加慶三人被懷疑參加了“四·二二”，在批鬥會上被非法施行文面烙刑，額頭上被刺刻上“反革命分子”五字，塗進藍墨水，永留在額。直到一九八四年“處遺”中，組織上才把他們送到上海醫院整容。額上的字跡才全部消除，抹去了這奇恥大辱。（見天等縣“文革”大事記）

三十日平樂縣“聯指”召開常委會提出以朱秋麟（壞頭頭，“處遺”判死緩）、張仕旺為副主任的九名縣革委常委名單，補充原縣革委中已被殺去的“四·二二”派成員李恒連、楊永喜（“處遺”時判十五年徒刑）、林義文（“處遺”時判十二年徒刑）等十八名委員名單。同時發出《九·三〇公報》。內容是：一、改組革委會；二、打倒李媚山（平樂人民武裝部政委、縣革委主任），打不倒就撤，撤不了就排擠，調出平樂（李媚山前期不支持“聯指”出兵桂林，不支持亂打亂殺）；不把李媚山打倒、擠走將是“聯指”的後患（李媚山於一九六九年年上級調出平樂）；三、追認“聯指”死亡人員為烈士。並從縣直機關二百多人下鄉宣傳隊《九·三〇公報》，組織討論改組革委成員名單。（見平樂縣“文革”大事記）

本月，靈山縣“三辦”清理敵偽檔案，審查地下黨組織。地下黨員受迫害達二百八十二人。靈山縣第一任副縣長、合浦副專員梁中光、副縣長梁可勝，中學校長等人被迫害致死。（見靈山縣“文革”大事記）

本月，陸川中小學校教師貫徹“七·三”布告，搞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一大批中小學教師受審查挨批鬥。陸川中學八十多名教師、職工被殺八人，批鬥五十六人，米廠中學二十二名教職工被殺七人。陸川中學校長前後被批鬥一百二十多次後去世。（見陸川縣“文革”大事記）

十月

四日至九日區革委會在區體育館召開為期五天半的批鬥“伍修集團”大會。參加大會的有區直機關幹部，各地、市、縣代表共一萬多人。韋國清、安平生、焦紅光、徐其海主持批鬥大會。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李殿丹、高仕克等被拉到大會批鬥，六十六名處以上幹部被拉到大會陪鬥。大會還勒令全區六十名副廳以上幹部交待與“伍修集團”的“黑關係”。在批鬥大會上，伍晉南多次反駁說：“廣西沒有伍修集團，他自己既不是‘伍修集團’總頭目，更不是總後台”。

十日區革委作出幹部下放的決定。魏佑鑄作了五點指示：一、重點做好下放幹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二、下放幹部由區革委統一安排；三、各級革委會大膽提建議和意見；四、各專區已下放，我們區直機關也馬上放；五、鬥批改與下放的關係，有些單位鬥批改沒有搞好的可以到下面搞，主要把隱藏深的階級敵人挖出來。關於幹部去留問題，當時區革委會決定四個去向。（1）是留革委會工作；（2）參加宣傳隊下鄉搞三分之一；（3）去“五·七”幹校勞動鍛煉；（4）去武鳴技校辦學習班，搞專案審查。後來執行的結果是：屬“聯指”觀點的幹部基本都留在機關工作；“問題較複雜”，未搞清楚的，去武鳴學習班；“問題”已搞清，但領導上認為不適合在革委會機關工作的，或原屬“四·二二”觀點的絕大部分幹部，被下放到各縣“五·七”幹校勞動。當時，下放幹部實際是一種政治懲罰，也是一種排擠、更換。原來的幹部下放後，各單位立即吸收了大批“文革”中的積極分子進入機關，結果是機構未精簡，人事已變遷。

同日《廣西日報》頭版刊登兩篇“典型”報導。一篇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狠抓階級鬥爭——廣西醫學院革命形勢越來越好》。一篇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狠捕“馬蜂窩”——廣西師院炸開階級鬥爭蓋子，面貌改變》。這兩篇“典型”報導都說“工宣隊”進駐院校後，認真貫徹落實“七·三”、“七·二四”布告，狠抓“階級鬥爭”，打擊“階級敵人”，開展“革命大批判”，

院校面貌大改觀。典型報導還號召所有的機關單位和大專院校，要象他們那樣，狠抓“階級鬥爭”，狠鬥“階級敵人”。

十九日 徐其海代表區革委作關於下放幹部的報告，報告內容：一、開辦學習班，深入鬥批改；二、繼續清隊，把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敵人”挖出來；對伍晉南的問題，中央未表態，群眾要求打倒是可以理解的，各級革委會要做工作，統一政策，並不反對打倒伍晉南；四、大破大立，精簡機構、合併機構。各單位逐級上報下放幹部名單。留下的人員、組織編隊，離開單位按連排制過軍隊生活。區直機關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下面戰線，係統分成大隊，黨群戰線為第一大隊，工交系統為第二大隊；財貿系統為第三大隊；農林系統為第四大隊；計劃系統為第五大隊；統戰為第六大隊；宣教、科委為第七大隊；文化為第八大隊；衛生為第九大隊；公、檢、法為一個大隊；大專院校為第十四大隊，進行鬥、批、改和落實寬嚴政策。（據區直各機關“文革”大事記綜合）

同日 從九月中旬以來，繼區革委會組織批鬥賀、霍、傅、謝、袁之後，又召開了幾次批鬥大會。區、市建設系統、區宣傳系統、廣西大學、廣西醫學院等也分別拉賀、霍、傅、謝、袁去遊鬥和批鬥。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區直新聞出版戰線七個單位聯合舉行批鬥伍、賀、霍、傅、謝、袁大會。這次大會是由區革委宣傳小組的王冠德定的。批判材料中，一篇是《徹底清算伍、賀、謝十七年在廣西日報犯下的滔天罪行》（後印成傳單散發），這份材料把賀為廣西日報撰寫稿件的區內外領導、民主人士、學者名流以及報社老同志，打成殘渣餘孽、叛徒、特務、反動文人、托派、地富反壞右、封建遺老等。其中全國知名人士有鄧拓、夏衍、田漢、歐陽予倩、趙樹理、趙丹、翦伯贊等十六人，區內點名的有林克武、呂集義、莫乃群、李任仁、石兆棠、張華、秦泰、周民震、陽太陽等二十九人，報社被點名的有十六人。（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二十三日 自治區、南寧市黨外人士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開學。參加“學習班”的有區、市民主黨派、工商聯、政協參事室、文史館和宗教界人士等共一百三十人。梁華新主持開學典禮並講了話，官濤（區統戰部統戰處處長）宣布：“學習班”由區革委群工組直接領導，群工組組長趙品卿（空七軍後勤部副部長），副組長是梁華新，學習班工作人員有：官濤、韋如（區統戰部幹部）、陸繼烈、江文（區工商聯專幹）、何榕珍（區統戰部幹部）和解放軍支左人員。強調“學習班”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以“鬥批改”為中心，徹底揭開階級鬥爭蓋子，深入揭發“文革”中的壞人壞事，集中力量穩、准、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對照六條政治標準檢查自己的立場，劃清革命與反革命的界線，認真改造。這個“學習班”歷時十一月零五天，至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結束。學習期間被批鬥的人有：張景寧（區民主委）、莫樹傑（區政協副主席）、愛國人士唐現之、陳可夫、岑建英、馬萬里（著名畫家、區文史館館長）、馬明龍（區農工民主黨辦公室主任）、馬清和（九三學社專幹）、盧燕南（區工商聯主委）、呂集義（區民主委、區交通廳副廳長）、張先辰（民主副主委）、陳國材（區民盟專幹）、陳漢流（區民主幹部）、陳如平（區農工民主黨派副秘書長）、黃啟漢（區民主副主委）、秦振武（區民主副主任）、黃夢醒（南寧市民主委）、王大南（區工商聯秘書）、徐善環、粟一、韓炳樞、何標、揚春等，其中有些人還被列為重點批鬥對象。在批鬥中，張景寧、莫樹傑、徐善環等被多次毆打。學習班結束後，這些愛國人士一律被送到西鄉塘參加繁重的勞動。（見區政協“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乘勝前進，勇追窮寇》。社論說在貫徹“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後，特別是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築各個領域鬥批改的政治舞台，炸開了一些“老大難”單位的“階級鬥爭”蓋子，一小撮埋藏得很深的“叛徒”、“特務”、“內奸”、“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以及“反革命分子”一個個從陰暗的角落裏被揪了出來，對“敵”鬥爭取得了新的勝利。社論要求進一步落實“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把“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賀、霍、傅、謝、袁之流”安插在各單位的“黑爪牙”和一切“階級敵人”，統統挖出來，鬥倒鬥臭。該報還配合社論刊登“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狠抓階級鬥爭新動向、新特點、新問題，東方紅醫院（南寧市工人醫院）對“敵”鬥爭深入發展的“典型”報導”。

本月，全區各地、市、縣遵照區革委會指示，相繼開辦“五·七”幹校或鬥、批、改大隊，對幹部進行審查，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百色地區“五·七”幹校立案審查二百三十二人，其中定敵我矛盾的六十九人，“現行反革命”一人，其他一百五十二人。副專員田永春被定為“破壞革委會的走資派”，公安處處長郭鳳林被定為“兩面派的走資派”，科委副主任蔣悅被定為“‘四·二二’黑軍師”，檢察院院長被定為“三假”分子。開除黨籍六人，留黨察看六人，其他處分六人。大新縣革委把直屬機關“有問題”的四百五十多名幹部編為“鬥、批、改”連，立案審查二百一十五人，定“叛徒”四十二人，“特務”十三人，“歷史反革命”十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二人，“五類分子”二十人，“現行反革命”十五人，“階級異己分子”二人、“假黨員”二人、“漏網右派”七人。（見百色地區、大新縣“文革”大事記）

十月區革委會決定將賀、霍、傅、謝、袁等進行巡回遊鬥。

十月二十五日開始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結束。批判工作由區革委會政工組負責。區革委副主任徐其海、魏佐鏞到政工組開會研究組建批鬥小組，具體由區革委政工組秘書小組副組長王生江負責召開會議研究批鬥小組人選問題。批鬥小組工作人員由二十一組人組成。軍代表李榮、李永翔負責帶隊，領隊蔡高懷（南寧航運局工人），副領隊黃冠德（區黨委宣傳幹部）、潘榮才（區文聯幹部）。

選組織材料組：韋雄（監委副處長）、黃宗保（趙茂勳秘書）、黃可殿（區黨委辦公廳幹部）、李實靜（《廣西文藝》編輯）系列整理賀等材料，名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伍修集團”的滔天罪行》，共售出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八份，贈送六千五百五十份。

十一月四日出發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先後被拉到柳州、河池、南寧、桂林、百色、欽州、玉林、梧州、宜山、巴馬、賓陽、荔浦、全州、靖西、北海、靈山、玉林、岑溪等八個地區、四十三個市縣，批鬥四十九場，約三百三十萬人參加批鬥大會。每場批鬥都有當地所謂“走資派”陪鬥，在各地批鬥時，黃冠德是主要發言人。（見區黨委辦公廳“文革”大事件）

區革委會成立後設置了“茅橋監護所”，由區革委政工組直接抓，由南寧警司負責看管，主要對象是“文革”中的“危險分子”，是“文革”中迫害幹部最機密的場所。手段最殘暴、關押對象共有三十六人；其中省級幹部四人，廳級幹部十六人，處級幹部二人，科級幹部二人。（詳見區黨委組織部“文革”大事件）

十一月

二日《廣西日報》刊登《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會公報》。《公報》說，“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國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一次政治大革命”。全會批准所謂《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一致通過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同日 自治區革委會發出《關於深入宣傳、深入學習，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公報的通知》。

六日 區革委按照鬥批改的步伐提出整黨建黨工作，徐其海代表區革委作報告說：清理階級隊伍結合整黨建黨，吐故納新。在整黨、建黨中發展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和其他積極分子入黨。從此各單位通過整黨建黨，“吐故納新”把大批老幹部，老黨員，當作“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等開除出黨，對在“文革”中的一批有功之臣突擊入黨。據“處遺”統計，全區在“文革”中就有二萬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殺人後被吸收入黨

的。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達一萬七千九百七十人。（見“處遺”核查組統計資料）

十一日 鍾林病重。鍾的愛人向報社軍管組長提出看病，組長答曰：“我有病都無法看，他看什麼病”？又說“批鬥了再說”。看管人員看鍾實在不行了，押著鍾去區醫院二門診看病。十九日鍾林休克，其愛人雇三輪車送去留醫，接著拉鍾的愛人去鬥爭。二十一日，在無人在場的情況下，鍾林含冤逝世。（按：“文革”中批判鍾林完全是個大冤案。一九六六年七月區黨委作出撤銷鍾林的黨內外職務決定。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區黨委作出關於鍾林平反決定。《決定》說，鍾林同志“是經受長期考驗的好黨員好幹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折磨致死”。“現決定給鍾林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推倒強加給鍾林同志一切罪名和誣陷不實之詞”。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廣西日報》發表編輯黃耿寫的《悼鍾林》的七律二首和報社記者寫的悼念文章。九月十七日又在《廣西日報》發表區黨委常委、區政協主席應機寫的文章《憶鍾林》和《人民日報》原總編輯胡跡傅等五位《人民日報》老同志寫的文章《悼念鍾林》。（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二日 新華社發出《廣西鬥、批、改的前進步伐大大加快》電訊稿。《廣西日報》突出刊登這條消息。同時配發社論《掀起學習宣傳落實公報的新高潮》。

十八日 廣西大學“階級鬥爭展覽”對外開放，歷時兩個月，到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旬閉館。前來參觀的有全國二十五個省區（區內有七十七個縣、市，十六萬多人次）。展覽內容：“教育革命”、“伍修集團罪行”。還有一批教師被當作禽獸展覽。受盡侮辱和摧殘。（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廣西日報》頭版刊登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同時刊登《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認真學習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

本月下旬，玉林召開地縣黨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把韋樹輝、熊福芝押至會場錯誤地宣布韋樹輝是“叛徒”，熊福芝是“歷史反革命”，決定撤銷他們的黨內外職務，永遠開除出黨。

同一時期，貴縣開黨員代表大會，會議錯誤決定把原縣委書記周可正、副書記胡玉山、黃醒環等七位同志永遠開除黨籍。（見玉林地區“文章”大事記）

本月，原紅七軍二十一師六十三團團長（原天峨縣副縣長）韋國英因受“三辦”審查和長期殘酷批鬥、毒打，含冤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見天峨縣“文革”大事記）

十二月

一日 玉林縣黨員代表大會決定，錯誤地以“假黨員”、“黑縣委書記”、“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等罪名將林廷柱（縣委書記）、曾風舉（縣長）、李聯璞、龐真、韋子佳等永遠開除黨籍。（見玉林市“文革”大事記）

四日《廣西日報》上午版套紅標題報導積代會。《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永遠忠於毛主席，把兩條路線鬥爭覺悟提高到新的高度》。報導說，有數千名（實際三千五百多人）代表參加的這次大會是“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獻‘忠’、頌‘忠’、煉‘忠’的大會”，是“高舉‘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央《關於“七三”、“七二四”布告》”，經過反覆較量、激烈搏鬥，粉碎了“劉少奇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賀、霍、傅、謝、袁之流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陰謀，奪得了廣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報導突出韋國清、歐致富、焦紅光、安平生、韋世經、林福文、毛鳳鸞、廖煒雄、龍智銘、顏景

堂、曾春生、徐其海、何紀元、範迪波、韓世福、張正安、肖寒、李端祥、王恩厚出席了大會開幕式。

六日 自治區活學活用積極分子代表會舉行“三忠於”報告會。韋國清、歐致富、焦紅光、安平生等出席大會，聽取講用。

七日“積代會”分組討論“三忠於”報告。廣西日報軍管小組遵照韋國清、歐致富的指示，報導討論會。報導的主題是《大贊大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大贊大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無比英明正確》。副題是《代表們決心以林彪副主席為光輝榜樣，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深入學習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把路線鬥爭覺悟提得高高的，在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鬥爭中為人民再立新功》。

八日和九日 區積代會接連兩天在區體育館批鬥“劉少奇在廣西的代理人賀、霍、傅、謝、袁和伍晉南”。區直機關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伍修集團成員”的領導幹部也被揪去會場陪鬥。每天參加大會的有一萬多人。韋國清、歐致富、焦紅光、安平生等出席批鬥大會，並具體主持和指導批鬥。（以上均見《廣西日報》）

十九日《廣西日報》在第一版發表社論《徹底肅清“二月逆流”在我區的流毒》，突出批判譚震林，結合批判伍晉南，同天二、三版發了批判譚震林和所謂“伍修集團”的文章。以後，又用兩個版連續批判所謂“二月逆流”。

二十一日 區“積代會”代表開展對“二月逆流”和為“二月逆流”翻案者的批判、聲討。《廣西日報》發批判“二月逆流”，批判譚震林專版的文章。

二十六日 歷時十四天的區“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今天閉幕。大會通過了給“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表忠電”。（見《廣西日報》）

一九六九年

一月

七日 繼中央兩報一刊傳達毛主席“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的社論發表之後，廣西區革委辦事組印發《區革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紀要》。該會議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區革委委員八十四人，專、市、縣 革委、軍分區、武裝部九十八人，共一百八十二人，討論今冬明春工作安排。會議認為今冬明春工作，要堅決貫徹八屆十二中全會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要以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為綱，抓緊清理階級隊伍，為搞好六九年工作做好準備。提出：

第一、要抓根本，進一步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活動。圍繞鬥、批、改各階段任務，繼續大力辦好各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好兩報一刊社論。在工廠、農村、部隊，普遍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第二、繼續開展兩條路線鬥爭史的學習；第三、認真搞好鬥、批、改，說“鬥、批、改”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功”，是防“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百年大計。要“鬥、批、改結合清理階級隊伍，把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一切革命分子清除出去”，使階級隊伍分明。提出繼續鬥“賀、霍、傅、謝、袁”，整要“吐故納新”，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繼續搞好教育革命及要掀起一個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高潮。要下放勞動，農村鬥批改要解決印把子、槍杆子問題。在各級領導幹部及民兵中，要認真“清理階級隊伍”。第四、要求執行“穩、准、狠”打擊敵人的政策，區別矛盾，分化瓦解等。

本月初，按中央兩報一刊社論傳達的最新指示及去年年底召開的區革委二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的布置，繼去年的鬥批改在全區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繼續組織在全區範圍內遊鬥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廣西的“代理人”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玉尚、袁家柯，用“打活靶”的方法把“清隊”運動推向高潮，擺開了深廣的以派劃線的階級戰線的“清理階級隊伍”的場面。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區革委鬥批改辦公室在六月十三日《清理階級隊伍，落實政策的基本情況》的文件中說：“採用了打活靶的做法，把賀、霍、傅、謝、袁之流拉到各專、市、縣去讓廣大群眾進行面對面的鬥爭，推動了清理階級隊伍工作的深入發展。全區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深挖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偉大群眾運動”。並“通過這次廣泛深入的全面清理，在全區公社以上的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各級領導幹部中，為群眾揪鬥了二萬四千七百多人”。（見區檔案館“文革”檔案）

在遊鬥開始的同時，全區各專、市、縣普遍召開了“寬嚴大會”，拿出具體的“寬嚴”樣板，使與不同層次舉辦的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配合，包括各級被揪鬥的領導都不例外。一月五日，南寧市直機關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召開的“寬嚴”會上，把南寧市物資局副局長黃炎隆、崑劇團陸金蓮、南寧晚報副總編委祖蔭及勞動局幹部董文龍四人作為樣板。將黃炎隆定為“反革命分子”判三年徒刑，秦祖蔭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金蓮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辦，各判七年徒刑（經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市人民法院復查無罪，撤銷原判）。各單位同時組織批鬥對象的家屬及其子女辦學習班，在寬嚴大會的五天內，就有一百三十八人分別坦白交待了所謂“新反共救國團”、“特務組織”及“隱瞞歷史”等一些重大問題。二月上中旬，南寧市直機關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大隊部組織專案組和專門批鬥小組，負責包幹對市一級批鬥對象進行批鬥。小組人員由“三辦”統一管理。在總結“寬嚴”大會的基礎上，大隊部即開展狼揚猛批所謂劉少奇及其在南寧市的“代理人”袁家柯、市領導幹部陳楓、韋純東等人。並召開了對“叛徒”韋純東等人的鬥爭大會，把他們放到“專政班”審查。通過批鬥大會，掀起了坦白檢舉，“解放”幹

部的兩個高潮。（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大事件）

全區各專、縣、市以至農村，也象南寧市一樣，處處設戰場，殘酷批鬥、審訊逼供，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大案件就有“新反共救國團”和“地下黨案”等。如“新反團”一案。廣西大聯營中，廣西軍區支左辦聯絡組組長王國生等一些“支左”人員，一月六日在南寧橡膠廠召開了抓“新反團”為目的的所謂“階級鬥爭情況交流會”。參加會議的有駐市的八十多個單位，共一百多人。會議抓“新反團”的派性活動就在這些單位搞開。同時把這一活動深入到都安、隆安、天等、百色、東蘭、鳳山、武鳴等區內專縣和貴陽、長沙、漢口、天津等區外省市。後來市革委會在禮堂召開了有關單位領導幹部參加的千人大會，由公檢法軍管會副主任王國典介紹破獲“反共救國團”（即“舊反團”）確證案情，強調指出這個“反團”的組織成員已查明，其全部骨幹分子已全部緝拿歸案，而要求大家不要相信“新反團”的材料，因為是假的。但在大抓“新反團”中，全市就清出了二千多“新反團”的成員。六月四日，南寧市清理“反團”專案領導小組向區黨委的核心小組和軍區領導同志寫的一份《關於清查“反團”新線索的情況報告》中“提出經過三個月的調查，肯定大搞這個“新反團”是一個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假案，這條線牽涉及區、市廠企、機關、學校、街道、郊區公社的三百八十三個單位，據不完全統計，已列為所謂反團的就有三千五百四十七人（全部是原屬“四·二二”組織的成員）。其中單因這一問題而被指名揪鬥者達一千七百二十二 人，被隔離關押九百九十七人。屬基層群眾的二千三百五十人。在一千七百二十二人中，就有九百九十七人受到點供和施行各種不同的刑訊逼供。其中被打死的三十七人，自殺三十四人（已死二十九人，未遂五人，其中南寧園藝場風頭分場職工黃翰孟一家三口，其妻已有身孕，被誣為反團受逼供後，全家上吊自殺），打殘二人，下落不明四人。（據南寧市“文革”大事件）

在欽州地區“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三查一清”（查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的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專地保衛組寫給專區革委的《關於非正常死亡情況的報告》說：在查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清理階級隊伍的“三查一清”運動中，八、九月份，全專區發生自殺三百九十一起，其中：上思一百三十六起，欽州六十二起，浦北五十一起，東興三十四起，北海三十起，地直機關一起。其實全欽州地區，整個“三查一清”運動中，死人不止這個數，如地直機關就不止一人，而是七人。

欽州地區為了抓好“清理階級隊伍”工作，設立了大批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第三辦公室（簡稱二辦、三辦），專門負責組織對有問題的幹部、職工的揭發、批判和立案、審查、處理工作，學習了外地經驗，層層舉辦了“鬥私批修”等形式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和向毛主席表忠活動，把已經鼓起來的群眾注意力集中到共同對敵的“清隊”工作上來，各戰線單位都對本系統本單位的幹部職工進行摸底排隊，確定清查對象和鬥爭對象，以如財貿戰線當時共有幹部職工一百二十九人，被排上隊的就有五十六人，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三，地委九個常委，有七個被列為審查批鬥對象，財貿政治部共五個幹部，被揪鬥的就有四人，建設銀行十二個幹部中，有九人被揪鬥、審查。軍分區副參謀長專區革委辦事組長李延茂、軍分區團級幹部專區革委直屬政工組長劉錫恩等三人一次談話中就說：“地方幹部有幾個好人？”商業局楊××也說：“我們商業局二十多人，只有三個好人”。各單位除內查外，還陸續派人帶著框框到全國各地外調，千方百計搜集、拼湊證據，利用這些拼湊來的材料對被清查對象大小會批鬥，刑訊逼供，甚至吊打、捆綁、跪石子、假槍斃、活埋半身等手段，使被批鬥者受盡精神上和肉體上折磨，以致有的尋死自殺。（據欽州地區大事件）

六月二十一日玉林地區桂平縣在縣人委鬥爭謝兆平（副縣長）時，縣人委幹部吳金育、李遠才、麥養元、黃漢光等人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用殘酷鬥爭逼供訊的辦法，搞出一個以地委書記韋樹輝為首的黑班子。還捏造了部分黑班子成員，有張朝光（桂平縣副書記）、趙國璋（桂平縣副書記）、甘煥傑（博白縣書記），專員公署專員張祖貴（地質局處長），副專員周桂森（北流縣委副書記）、江慶東（博白縣副縣長）、謝兆平（桂平縣副縣長），地委秘書長韋子佳（玉林縣名山公社書記）。一九六八年七月，玉林軍分區“三辦室”成立“一〇一”專案組，具體負責追查所

謂韋樹輝“黑班子”工作，統一部署立即開展對所謂韋樹輝的“黑班子”的大揭發、大批判、大門爭，於是一場揪韋樹輝為首的黑班子的群眾運動在全地區展開。如北流縣革委主任李國偉在會上作報告說：要以“七三”、“七·二四”布告為武器，掀起對階級敵人大揭發、大批判、大門爭的新高潮，以周桂森為首的“黑班子”上通韋樹輝，下伸基層單位，全縣十個區，五十六個公社（大隊），二十六個生產隊，二十個機關單位都有黑班子，要主動地、全面地向階級敵人猛烈進攻。在李國偉的鼓動下，追查鬥爭面越來越廣，被列為縣黑班子成員審查的有周桂森（縣委副書記）、黎濟武（縣委副書記）、鍾禮厚、梁兆貝等人，全縣幹部被誣為“黑班子”成員的達八百二十八人。其中縣級幹部九人，區級幹部四十三人，一般幹部群眾二百八十七人，大小隊幹部四百八十二人，被鬥爭的七百四十八人，鬥打致傷的四百七十九人，致殘的六十二人，致死的三十一人。玉林縣（鎮）被劃為黑班子審查的有林挺住（縣委書記）、曹鳳舉（縣長）、李聯璞（組織部長）等，縣（鎮）受審人數九百三十七人，受株連的二千四百多人。貴縣被列為縣“黑班子”審查的有周可正（縣委書記）、黃醒懷（縣委副書記）、胡玉山（縣委副書記）、韋正輝（副縣長）、楊業榮（縣委副書記）、莫光德（公安局長）、梁興波（副檢察長）等一十六人，被列區黑班子人數達一百六十八人，大塘區區委書記曾偉才因黑班子問題被迫害致死。博白縣被列為黑班子審查的有甘煥傑（縣委書記）、黎海波等人，全縣有一百九十八名幹部和職工受到審查。桂平縣被列為“黑班子”成員審查的有縣委副書記張朝光、趙國璋、副縣長謝兆平等三十二人。容縣被列為縣“黑班子”成員審查的有丁紹鳳（縣委書記）、劉榮光（副書記）、覃銳（公安局長）、曹振華（法院院長）等二十多人。陸川縣被列為縣黑班子成員審查的有楊志慶（縣委書記）、周履光（監委副書記）、巫德椿（縣長）、陳健（副書記）等人。全縣被列為“黑班子”幾箇月中，被殺害的達五十六人，被勞改四人，被關禁二十一人，被鬥打三十九人。

在追查“黑班子”過程中，很多受審查者被關押隔離審查，被關押的有韋樹輝、熊福芝、張達明、鄧允萃、鄧林等人，他們經常受到專案人員毒打，還對他們抄家，搶奪財物，扣工資，在審問中有的被刑訊逼供、捆綁、吊打、體罰，有的致傷、致死，如容縣縣委書記丁紹鳳被鬥打致重傷，肋骨被打斷。北流縣民樂公社副書記呂奠潘被誣為“黑書記”刺十字頭，塗漆油，殘酷鬥爭致死。在此案中，許多同志政治上受到迫害，身上受到嚴重摧殘，造成嚴重後果。

在追查中，玉林軍分區“三辦室”101專案組編印了《101專案簡報》五十一期，大量刊登所謂“黑班子”成員交待，並給“黑班子”定性，十三期簡報編者按說：這個“黑班子”究竟是什麼貨色？他們有的是“特務”、“叛徒”、“歷史反革命”，有的是頑固不化的“走資派”，有的是一貫堅持反動立場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牛鬼蛇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群眾高舉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旗，造他們的反，奪他們的權，專他們的攻，他們人還在心不死，時刻妄圖復闢，他們知道公開幹不行了，於是在陰溝裏互相勾結，相依為命，以便建立他們的反革命政權，這就是他組織“黑班子”的實質。無中生有地給一批領導幹部和群眾扣上莫須有的罪名，橫加迫害。

“文革”期間，玉林地區根本不存在所謂以韋樹輝為首的“黑班子”，這個“黑班子”完全是一大冤案，原來的所謂證據胡說：自治區文化局岳平、機械局李丹、地質局張祖貴等人在一九六七年冬到玉林鎮後與韋樹輝一起組閣玉林地區“黑班子”，這根本不是事實，這是在殘酷的逼供訊的情況下編造的，完全是假的。（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中，玉林地委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作出決定，對“黑班子”案的受害者已進行平反和昭雪。

經歷學習班、寬嚴大會的大揭、大批、大門，到各種“專案組”的審查、刑訊逼供等，清理階級隊伍就進入了“吐故”的高潮。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區革委鬥批改辦公室在《清理階級隊伍和落實政策的基本情況》中說：“通過廣泛深入的清理，全區公社以上的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各級領導幹部，被揪鬥共二萬四千多人”。韋國清在《一九六九年的形勢和一九七〇年的任務》報告中說：“精兵簡政工作，改造了舊機關。自治區原六十八個部、委、廳（局）精簡為四組、一

室、一校和十四個服務公司、站、局。人員精簡了百分之八十，各專、市、縣也精簡百分之七十。據不完全统计，有七千三百名幹部下放基層，三萬多幹部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十月中南寧市革委舉辦“幹部去向學習班”共一千七百五十一人。十一月公布去向名單，其中去“五·七”幹校五百七十七人。加強基層六百五十一人，市革委會四組一百九十人，在審七十六人，老死三十四人，敵我矛盾作內部矛盾處理未定去向的四十三人。三月一日，岑溪縣革委精簡，僅留下二十五人（原二百六十六人）。縣直合併，將原一百一十個單位改設為十一服務站。精簡五百五十人，下放五十二人到基層，三百多人到“五·七”幹校。（據區檔案館“文革”檔案、南寧市、岑溪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一日 荔浦縣革委專案組以全體人員名義，組廣西軍區黨委、廣西區革委保衛組寫了《荔浦縣深挖反革命組織情況彙報》，彙報肯定“反革命組織”存在，但目前還遇到了來自領導班子內部的阻力（注），要求上級派員前來調查瞭解。接著，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為了瞭解荔浦縣這一重大案情，和支農部隊一起到荔浦縣，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一月二十九日，荔浦革委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歐致富親臨到會，並作了重要講話，這次會上作出“反共救國團”，“中國青年黨”為假案，及將製造假案的主要人員農兵司令部頭頭董茂軒施行拘留的決定。當天在縣革委召開的全縣幹部、職工大會上，歐致富又作了講話，指出了“農兵司令部”少數負責人的錯誤和罪行，宣布“反共救國團”、“中國青年黨”是假案，應平反。歐致富和支農部隊在荔浦期間，撤銷了兩個假案專案組，釋放了“文革”中被錯關押的人員，補發了幹部、職工被剝扣的工資和取消了在桂林及修仁武鬥中死亡的十八人為烈士的決定；對在“文革”中犯嚴重錯誤和違法亂紀的幹部、職工三百二十四人（其中荔浦縣直屬機關八十五人，各區二百三十九人），分別給予拘留、開除、撤職、免職等制裁和處分。儘管這一處理在當時還不夠徹底，而且他們離開後又出現反覆，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做出這一撥亂反正之舉，不僅阻止了假案的惡性發展，震懾了“文革”中的違法亂紀分子，在廣大幹部、職工和群眾中，起了極為良好的影響。（據桂林地區和荔浦縣“文革”大事記）

（注）：荔浦縣“反共救國團”假案，全縣有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受迫害，六百四十六人被逼承認參加這一反革命組織，一百二十五人在鬥爭中被打死，五十一人被鬥後自殺，五百四十一人被打，他們慘遭各種刑罰和人格侮辱，有二百五十人被打致殘，當時荔浦縣深挖反黨組織定案領導小組的副組長縣公安局長齊殿發和領導小組成員武裝部副政委陳准良等人已覺察此案有假，與領導小組中的製造這一冤案的造反派頭頭莫國龍、馮志方等人發生激烈的爭論。（見荔浦縣“文革”大事記和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月

三日 區革委把廣西地下黨作為“大案”、“要案”列入所謂鬥批改的“主要任務”布置全面審查。建國以來由於“左”的思想影響，有的地方領導人把廣西地下黨的一些組織和其領導的游擊武裝隊伍，誣為“地主黨”、“土匪黨”和“土匪隊伍”，把革命游擊區和根據地誣為“叛徒村”、“土匪村”，錯處了一批地下黨員和游擊隊員。“文革”期間，首先是玉林軍分區“三辦”於一九六八年七月間即審查原玉林地區專員熊福芝，說“不到兩個月即突破熊的自首叛變問題……挖出了隱藏在博白和桂南地下黨的，以熊福芝、鄧優寧、張祖貴、林執真、梁山為首的代表“國民黨利益的黑幫”。玉林軍分區第六辦公室《關於進一步清查桂東南地下黨問題的幾點意見》提出要搞“六〇六”專案，以弄清桂東南地下黨，清除隱蔽在該黨組織的叛徒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並說：“桂東南地下黨問題比較複雜，據初步掌握的材料，桂東南地下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那裏起作用，叛徒在那裏起作用。一些機關可能受特務機關利用控制”。認為清理桂東南地下黨是個“吐故納新”、“清除廢料”的重大問題。六九年三月至七月，自治區分管政工工作的劉重桂，先後三次在全區定案和落實政策工作會議上講話，布置清查廣西地下黨，說：“廣西地下黨問題很大”，

“要組織專案徹底查清”。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他在自治區專案定案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說：“要抓緊廣西地下黨的專案調查。廣西地下黨，情況錯綜複雜，牽涉面廣，涉及的人員多，凡是有地下黨活動的地區，所在地區的革委會都要組織專門力量，開展工作，儘快弄清其性質，跟上對敵鬥爭的需要”。六九年三月十九日，他又在區革委會定案工作座談會上講話，除重申二月會議關於清查廣西地下黨的布置之外，指出要突出重點，抓住大案和要案。並說：“所謂大案，是指廣西地下黨和其他集團案”，要求：“凡是有地下黨活動的地方，所在市縣革委會都要組織專案組，你那個單位原來有領導有嚴重問題，也要組織專案徹底清理。說這是關係到全局的問題，望這些單位，儘快組織專案，爭取在短時間作出成效。”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他再次在區革委會落實黨的政策會議上說：“這次會議的第二個任務，就是廣西地下黨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幾十個縣，時間久，面很廣，任務複雜艱鉅，問題突出”。認為：“開展清查敵人破壞廣西地下黨的專案工作，是鬥、批、改階段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清理階級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廣西地下黨受敵人的破壞是很大的，據初步掌握的部分資料，先後發生過三十五起重大事件，破壞面達八個專區五十八個縣（市），其中重點縣市二十八個。”“共產黨員大批被捕，.....有的動搖變節，成了可恥的叛徒，有的被派回充當敵人的特務、內奸”。他以玉林、合浦兩地區的“調查”為根據說：“一九三六年的新省工委九個成員中，就有二個是敵人派進來的特務。一九三七年博白地下黨三屆特支四屆工委十八名領導成員，調查了其中十五人，發現特務四名，假黨員二名，叛徒九名。合浦縣委特支一級幹部二十六名，現查出特務五，歷反一，叛徒五，叛徒可疑分子七名，佔百分之六十九點二三，玉林地區革委會‘六〇六’專案組通過調查博白地下黨‘一一三’事件，已挖出了一個以熊福芝為首的近百人的叛徒集團。其中竊聽廳級重要職務三名，處級一名，縣級十名，區級十六名。從上面幾個簡單數字：已經可以說明廣西地下黨內部是有問題的，在局部還有嚴重問題。”（經“文革”處遺查實劉重桂講話中鑿的例子，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純係誣譏編造出來的謊言。他會上的三次講話，也予以撤銷）

在上述錯誤的部署指揮下，區革委政工組領導的區直鬥批改學習班，對該班上的廣西地下黨幹部進行迫害審查。直至六九年十二月，該班的審查對象中，尚有近百名廣西地下黨幹部被認為有重大問題未弄清而被集中到武鳴繼續審查。另有一批被認為問題更嚴重的，在勞務監護審查。又在全區解放前有地下黨活動的七十四個縣市，都組織了地下黨問題專案組，共有七百多人，區革委組織了“清查廣西地下黨小組”，組長：齊金山，組員：蘇志桔，冰稍，農友良，艾祖華，李玉華，對廣西地下黨組織全面審查，埋單長達三年多。廣西地下黨遭受全面審查迫害期間，原地下黨員，特別是特支組織以上的領導成員，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殘；有的造成精神病患，家破人亡，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在專案審查中，桂林地區地下黨游擊隊五千多人，被審查的有三千九百一十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遭迫害的達二千零八十七人，佔受審人數百分之五十三。被迫害致死的二百零一人。桂北地工委委員吳騰芳，全昭毅被迫害致死，陽雄飛致殘，諸葛鑫被關押。六八年二月，合浦縣、北海市組織一百零六人的工作隊，調查清理地下黨——南路黨的問題。合浦縣武裝部政委，縣革委主任孫相臣，縣“三辦”專案組副組長，縣革委常委李樹餘等人對解放前後組織已查清下了結論的一些地下黨案件，重新立案進行審查清理。北海市地下黨案與合浦地下黨關係密切，亦派出十一人前來合浦共同清理。廣州軍區、廣西軍分區，專區“三辦”都派人到縣指導。工作隊連續辦了十三期學習班，強迫一千六百多人參加學習，大搞逼供訊。在審查所謂“南路黨”事件中，全縣被審查的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國家幹部一百四十八人），被打死逼死七人，致傷致殘二十六人，被打成“叛徒”三十六人，“特務”四人，“土匪”一百零九人。七月下旬南寧地區及所屬各縣先後成立了審查原地下黨專案組，對原地下黨及其領導的武裝隊伍，作為“大案”、“要案”全面審查。對一些人進行刑訊逼供，肆意摧殘。這是地下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最殘酷最廣的一次迫害。僅上林縣，就組織了六十人的專案隊伍，給一百九十人定了案，其中被定為“叛徒”的有四十二人，“特務”三人，假黨員四人，“走資派”十人，：“歷史反革命”十六人，其他罪名的一百一十五人。在審查批鬥中，刑訊拷打迫害致死的三十九人，被打傷致殘三十一人。當時還以東蘭縣作為審查的重點，以致該縣的老紅軍，老幹部二百四十九人被打成“叛徒”、“變節分子”以及有嚴重問題的人。右江地區很多老幹部，老赤衛隊員及其家屬，被誣為“鄧小平的徒弟

徒孫”，“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更為嚴重的是把當年紅七軍參謀長黃大權（土地革命時已犧牲），當作叛徒，並將其東蘭革命烈士陵園刻下的英名抹掉，嚴重地損害了東蘭地下黨光輝形象。（據東蘭縣“文革”大事記）

近在區首府南寧咫尺的區屬武鳴華僑農場中，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四日發生的紅泥隊階級報復血案。紅泥隊九十多戶人家，解放前以偽保安團長鄧文興等偽軍政人員和一批慣匪武裝為一般“實力派”和以貧下中農及一些進步人士為“非實力派”，解放戰爭時期，貧下中農和進步人士支持擁護我黨，參加地下游擊隊，提供情報，籌糧助款。解放後，在我黨領導下，先後鎮壓了反動勢力偽保安團長鄧文興，匪首鄧玉成等人。在“文革”中這些被鎮壓的家屬，卻充當了“造反派”，以誣告他人和借抓“反共救國團”為名，大搞階級報復，他們設牢房，逮捕、關押鬥打無辜二十六人，其中被活活剖腹割頭，打死的七人，過去為我地下黨游擊隊截斷敵人通路，提供敵人活動情報的職工鄧元亮同志，被匪屬（被鎮壓的匪屬）鄧斯環、鄧金泉等人，用鋼釘活活打死，職工鄧金庭也被鄧斯環、鄧金泉責令“四類分子”鄧金秀等人拉到過去被鎮壓的偽保安團長鄧文興的墳墓前，用菜刀活活剖腹取肝，在被活活剖腹時，被害者鄧金庭還怒斥凶手說：“你們不要這樣，事不要做得太絕”。大凶手鄧斯環還說什麼“你們游擊隊能殺人，我們不能嗎？”就這樣把人活活剖腹取肝，人肝取出，血淋淋地，心還在跳，人還有掙扎，又割頭，並將頭部放到偽保安團長的墓頂，以示他們復仇的勝利。更奇怪的是在偽辦紀檢組對此案提出上訴時，原區黨委書記竟說，如果這案處理了引起連鎖反映怎辦，將上訴材料退回。一九八三年“處遺”時偽辦紀檢組又提出此案的处理問題，韋純束在材料上批向趙茂勳瞭解情況，趙說“不瞭解”。經調查確有此事。（據區偽辦紀檢組關於武鳴華僑農場幹部政策和“三案”的落實情況檢查真報。“處遺”檔案73號）

全州縣審查“會灌地下黨、游擊隊集團案”。對九百零八人進行了審查，其中五百二十八人遭到各種迫害，致死的五十人，致殘的五人，家屬株連被殺的十四人，地下黨、游擊隊員其親屬被罰、沒、抄的共一百三十多戶，罰款一萬二千元，造成了全州最大的地下黨集團冤案。（據全州縣“文革”大事記）

又如玉林地區直屬機關“造反派”，把他們關在地委黨校進行審查批鬥的熊福芝（專員，博白地下黨領導人之一）認為“大叛徒”、“特務”等罪名，於一九六七年秋，遭到造反派的廖剛、蘇禮光等人的罰跪、踢打、鞭抽、勒刺、假槍斃等刑訊逼供，精神上、肉體上受到嚴重摧殘，造成精神失常，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地委黨校召開的地、縣黨員代表大會上，由羅賢操宣布熊福芝的所謂“叛徒”罪狀後，被大會決議撤銷熊福芝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期間，他又被以翻案，“復關”為罪名，再次遭到攻擊和迫害，致使他思想再度受到創傷，精神再度失常，至今未愈。（據玉林地區“文革”大事件）

歷時三年多批鬥、專案刑訊逼供，造成五千零八十三人的冤、假、錯案的嚴重後果。（據區檔案館檔案一九六九年永久二卷）

廣西地下黨假案，由於打倒“四人幫”以後，廣西仍堅持“文革”期間有一條“正確的路線”，冤假錯案沒有得到徹底平反昭雪。直至一九八三年廣西“文革”處遺工作的全面開展，才進行徹底的查證落實，予以平反。在“文革”處遺查證中，玉林地區就錯定為叛徒一百四十多人；浦北縣平馬一個大隊，就錯定“叛徒”一百零八人；該縣挖出“叛徒”四百七十七人，最後全部平反。經查證，博白地下黨特支以上領導成員是好的。合浦地下黨特支領導成員中，也只有二人有自首錯誤，在解放前已作了處理。一九三六年廣西地下黨省工委成員是六人，不是九人，更沒有所謂“敵人派進來的特務”。博白地下黨也沒有所謂“熊福芝為首的叛徒集團”。原廣西農委、桂、柳城工委（後改廣西城工委）十個地委（地工委）桂、柳、南三個市的工委（臨工委）以及梧州市黨組織負責人總共八十人當中，沒有所謂“叛徒、特務、土匪”。這些情況說明當時區革委會對廣西地下黨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立專案作為“大案”、“要案”審查，是完全錯誤的。（據區黨委地下黨處遺問題領導小組向區黨委報告和欽州、玉林、桂林三地區，博白縣、全州縣“文革”大事記）

二月三日至十日，自治區革委政工組召開自治區中、小學教育革命座談會，參加會議九十三人。以“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要繼續下去了”的“語錄”為指導，討論自去年十一月農村小學掀起下放的熱潮以來的情况和今後教育革命的任務。會上區革委副主任歐致富講了話；區革委常委、軍區副司令員徐其海作了報告和總結發言。據《自治區中、小學教育革命座談會紀要》（桂發[69]41號）說，會議暢談了我區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勢。工人和貧下中農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有十三萬多人，在解放軍的配合下進駐了四萬七千多所大、中、小學；各社隊建立了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委員會或領導小組，基本上實行了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去年十一月農村掀起了小學下放的高潮，到今年二月底，全區八十六個縣市，把小學下放的有三十九個，鋪開的三十一個，其餘都在試點。據四十五個縣統計百分之七十六的公辦小學已下放到大隊辦，城市廠礦街道辦學也有很大的發展，改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毛澤東思想佔領了學校的一切陣地。目前學校廣泛開展“三忠於”活動，建立了“早請示”“晚稟報”“天天讀”制度。開展了深入持久的大批判，認真清理了教師隊伍，把一小撮階級“敵人”挖出來批鬥，從工人、貧下中農、復退軍人和回鄉知識青年中，選拔了一批“優秀”分子任教師，組織了工人、貧下中農業餘講課團，改變了教師隊伍的政治面貌。

會議討論了我區今後教育革命的主要任務和當前工作。認為應以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為武器，以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為綱，深入持久地開展教育革命大批判，抓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進一步改革舊的教育制度。當前在抓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同時，要突出抓好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和城市工廠街道辦中小學的工作。具體要求：

一、用毛澤東思想佔領學校一切陣地，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學生的一門主課。對知識分子要圍繞鬥批改，以“鬥私批修”為綱，繼續大辦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二、深入開展教育革命大批判，抓住“學校為誰開門”、“培養什麼樣的接班人”以及“依靠誰辦學”等問題批深批透。

三、抓緊做好清理階級隊伍。遵照毛主席“吐故納新”和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的指示，整頓原有的教師隊伍。把混入教師隊伍的“一小撮階級敵人”清除出去。選一批“優秀”分子任教，組織工人、貧下中農“講課團”。

四、全面開展教育改革。

五、突出抓好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大隊辦和城市工廠、街道辦中小學的工作。

六、加強對教革的領導。

這次會議的貫徹，使我區中、小學的教育質量下降，教師秩序受到破壞教師隊伍再一次備受摧殘。農民的負擔加重。玉林地區六九年五月五日的統計：全地區原有四千九百四十八間小學下放大隊、生產隊辦，對五十八間全日制中學、初中給大隊、高中給公社辦。教師隊伍經大審查、大清理。全區公辦教師一萬五千八百七十四人，安排任教一萬二千零九十九人，不安排三千七百八十四人，定敵我矛盾受審查批鬥的一千四百二十六人。欽州地區小學下放後。教師回原籍安排任教的，每月僅發生活費十五元。地富出身和社會關係複雜的，一般不安排，每月發生活費八元。南寧地區八月份統計，全地區選出了民辦教師共七千三百六十人，還選派一萬一千多名農民組成“赤腳講師團”或兼職教師到學校去講課。凌雲縣於三月十日發通知，所有農村小學下放大隊或聯隊辦，限在當年三月底，最遲不過四月十五日要完成，僅兩天（即三月十二日）即完成下放任務，並向百色專區革委、軍分區黨委報喜。據《凌雲縣“文革”大事記》所載：“公辦小學下放給大隊或聯隊辦，即加重了群眾負擔，又使教師生活不能保障，影響教學工作的正常開展，全縣小學教育，從此處於混亂狀態。”

九日《廣西日報》發表區內城市知青響應毛澤東“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的號召，柳州、桂林、

梧州市二千三百名知識青年到農村落戶。南寧一萬二千名居民職工幹部到農村去。從此區內各專、縣、市開始掀起到農村去落戶的高潮。南寧地區從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一九七〇年七月，全地區先後下放知識青年、城鎮居民、幹部等七萬五千多人。其中知青一萬七千人，一九七〇年到七一年底又安排下放了二萬九千六百四十一人。三年共安排到農村落戶共十萬零六千六百多人，一九七四年安排到農場、林場的有一千七百二十四人，到農村的還有二千五百三十七人。偏僻的天等縣，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共分十批五百五十五名知青到農村插隊，全縣先後發給知青安家、生活費十八萬八千一百八十元。大米十八萬二千六百四十斤，賓陽縣從一九六九年元月二日第一批知青三千四百三十人到農村落戶到一九七七年止，下鄉知青達七千七百四十一人，城鎮居民下鄉落戶九百七十八戶三千七百五十人，接收南寧及各地下放回鄉投親的幹部、農民、知青六百七十九戶二千四百八十八人，共花去安置費一百四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元。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在區革委負責同志碰頭會議上，徐其海說：目前整個下鄉人員二十二萬四千多人，其中插隊的十二萬三千餘人，成戶下放的十三萬人，單身下放的九萬人，老弱殘回收的二千多人，倒流城市的二萬多人。並說：中央已指示今年還要下放幾十萬人。下放之風延續了幾年，遍及全區。知青及城市居民下放，象“流放”一樣，造成了不少悲劇。徐其海在上述發言中也提到“南寧市有些下鄉人員是農村開介紹信回家看看，但卻把人家當倒流（城市）把他們趕走。有的確實失去勞動力，農村介紹回城市，少數工人糾察隊，把人家蚊帳也給拆了，傢具拿走，有的甚至還把兒子從工廠調回來，隨父母一塊下放”。城市知青與居民的下放，實際就是城鎮“清理階級隊伍”的產物，把城市“五類”、“二十一種人”與“清隊”時“站錯隊”的所謂“壞頭頭”與城市知青一起下放，造成很大的政治與思想壓力，從而不論從經濟上、政治上以至思想上，都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四月

一日至十四日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我區出席九大代表有：玉揮（百色通用機械廠工人）、譚秀卿（女，梧州市機械廠工人）、李德成（大廠巴裏礦工人）、郭繼輝（南寧糖紙廠工人）、趙淑琴（女，南寧冶礦廠工人）、楊遠發（桂林市印刷廠工人）、岑國榮（柳州鋼鐵廠工人）、陳國昆（玉林縣新橋公社五金大隊支書）、黃河滔（天等縣龍宮公社小山大隊生產隊隊長）、盤美英（女，賀縣黃石大隊支書）、潘天福（荔浦縣社黃公社三保大隊生產隊長）、黃強（欽州縣那羅公社上寮大隊支書）、何金光（象州縣寺村公社王院大隊支書）、韋秀群（女，南寧市食品公司紅旗肉店售貨員）、朱性威（區醫學院附屬醫院醫生）、廖煒雄（區黨委組織部組織員）、呂錦德（寧明縣委會副書記）、肖寒（南寧市委書記）、韋國清（廣西自治區革委會主任）。

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對“文革”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作全面的肯定。他自己也作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與接班人寫進黨章。副統帥與接班人的地位用法定的形式固定下來。對“九大”的召開我區舉行了盛大的遍及全區的慶祝活動。四月一日晚，南寧市軍民載歌載舞，連夜舉行慶祝大會。全區各地分別舉行了數千人到幾十萬人的慶祝集會和遊行。凌雲縣發出通知，規定要以最快的行動速度，最隆重的儀式，熱烈慶祝。並作了三條規定：一、慶祝活動連續搞幾天，縣城四月二日舉行盛大的慶祝晚會，各公社也要舉行，各單位要張燈結彩慶祝；二、迅速大宣傳、大學習“九大”喜訊。每個單位要把“三忠於”境界提高到一個新高度；三、以“九大”特大喜訊為動力，認真搞好鬥、批、改、抓革命、促生產，作出優異成績向“九大”獻禮，向毛主席表忠。

十四日晚，南寧市二十多萬軍民在“七·三”廣場（即原朝陽廣場）《三·三布告》頒布後改名，以示紀念）隆重集會歡呼“九大”新聞公報的發表，歡呼大會在毛主席的親自主持下，一致通過林彪的政治報告和新黨章，歡呼新黨章明確規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區革委負責人安平生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孫伯威在會上講了話。

本月，區革委“三辦”把區直各單位人員編成十四個大隊，進行鬥、批、改。初期在財政廳，

後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根據區革委的決定，區直機關審查對象和專案人員搬遷到武鳴壯校，就是所謂的“武鳴學習班”（全稱：區革委會門改辦公室武鳴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班始於一九六九年四月，止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歷時四年零七個月。被編入武鳴門、批、改學習班審查、批鬥的廳局長以上的領導幹部有鍾楓、李殷丹（區黨委常委、政府副主席）、尚持（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長）、林克武、農康、李同文、孫善佑、徐麟村、吳榮忠、王順志、李隆、仲倫、田克、張清棟、王昇階、覃寬龍、魯源、郭銘、餘明炎、鄭紹文、鄒優寧、阮洪川、張華、李德勳、江平秋、周華彪、趙洪浩、王漢昭、黃狄、丘偉等六十四人，還有送去茅橋監護審查的賀希明、霍泛、傅雨田、李殷丹（區黨委副書記、區政府副主席、後又去武鳴門改學習班）、張華、陽雄飛、李隆、岳平、謝王崗、楊林、王斌吾、李丹、王同連等廳局以上領導幹部。

“學習班”主任是段純和，副主任李發南、樂玉亭、曹德春，“學習班”下設政工組、專案組、辦事組、第二專案組（專管五一六案）。學習班的性質，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學習班”給中共廣西區革命核心小組《關於接收原區直二級機構專案工作任務的情況報告》稱：“大家比較深刻地認識到：奪取政權不容易，鞏固政權更難，‘人民得到的權利，決不讓它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專案工作是對敵鬥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直接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

“學習班”主要工作是審查案件。共有專案人員六百零一人，審查對象五百三十人，來自區直機關和二層機構一百六十五個單位。據“學習班”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專案審幹工作總結報告》稱，審查對象五百三十人，經上級批准結案五百一十六人，定為敵我矛盾的六十一人，其中：叛徒三十人，歷史反革命二十四人，以及階級異己分子等七人；定為人民內部矛盾的四百一十九人，其中有重大歷史問題和重大錯誤的一百八十一人；審查對象中，受黨內處分的九十二人，其中：開除黨籍三十人，留黨察看二十五人，嚴重警告二十一，警告十六人，受行政處分的一百三十七人（次），其中：開除幹部隊伍或清洗回家十六人，撤銷職務六十四人，降級五十四人，記過三人，逮捕二人。在審定案件過程中，對參加“四·二二”的，凡支持“二·一九”、“四·一九”聲明或進駐過展覽館的，均作為犯了嚴重錯誤進行處理。（見“處遺”檔案103號）

這些案件，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一九八三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以後，絕大部分已得到平反。（詳見“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 桂林廣西師院根據區革委文教組指示，組織師生員工到大榕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要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還要同批資產階級，為此還要師生們同貧下中農交底，把自己的家庭出身，個人歷史，“文革”中參加哪一派組織，有哪些錯誤等，一一告訴貧下中農，接受監督，這是通過貧下中農去批判那些師生員工，使他們在精神上受到更大的壓力。紀念“八·二〇”一週年，又把院黨委副書記陸文中等人拉到大榕江，交由師生與貧下中農批鬥，扣上“反毛主席”破壞文化大革命等帽子，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職工師生返回學校後，又繼續進行鬥、批、改。

也在這段鬥、批、改鬥爭中，廣西大學宣稱專案定性的四十八人中，有“現行反革命”十四人，歷史反革命分子十人，特務分子二人，階級異己分子五人，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六人，其他“反革命”分子十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一人。

五月

八日至二十六日 自治區革委召開黨委代表會議，在代表會中學習了毛澤東、林彪在“九大”的講話。林彪的政治報告及新黨章等“九大”文獻。區革委主任韋國清在會上作了總結髮言。五月十二日，廣西日報發表了“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努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為內容的社論。五月二十日，會議發出《關於貫徹“九大”精神的幾點意見》。

韋國清在他的總結髮言中，把區革委成立以來“左”的一套錯誤做法作為“抓根本”的巨大成

績肯定下來。他說：“自‘革委’成立以來，全區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的人數共達七千多萬人次，組成了有一百四十萬人參加的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辦起了有線廣播，把毛主席的每一條最新指示都傳達到每個角落，深入人心”。並說：“前段時間活學活用取得了巨大成績，從上到下普遍做到語錄隨身帶，最新指示一發表，立即雷厲風行”。報告人還把數萬幹部下放“五·七”幹校、工廠、農村，十六萬知識青年和城市居民下放農村落戶，多數單位深挖了“敵人”，全區大、中、小學已由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管理起來，教育“革命”蓬勃發展及整黨建黨時清除了一批“廢料”，吸收了一批“文革”有功之臣的“新血液”入黨等作為“成績”加以肯定，並說成績越大，抓根本的動頭應該更大。

《總結髮言》對“九大”進一步肯定錯誤的政治路線推崇備至。說：“會議代表一致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燈塔，字字閃金光，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我們堅決照辦，字字照辦。”還說：“林副主席的《政治報告》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綱領，我們堅決擁護，堅決執行……緊緊地團結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的周圍，增強革命團結，堅決完成“九大”提出的多項國，奪取更大的勝利。”

會議對“九大”的傳達作了具體布置，要求以最快速度，把“九大”精神傳達全區各族人民中去，並提出要進一步掀起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運動的新高潮。以林彪在“九大”《政治報告》中指出的“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抓根本，必須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放在工作的首位，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及“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證明了一條真理，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我們黨就受挫折，就失敗；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我們黨的事業就前進，就勝利。”作為我區今後奪取全面勝利的方面。又說：“林副主席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好，用得最活，執行得最堅決。決心要以林彪同志為光輝榜樣，把學習、宣傳、執行、捍衛毛澤東思想在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先於一切、重於一切的位置。”會議要求學習、貫徹“九大”精神，要聯繫我黨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大頌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大贊毛主席的無比英明，並要聯繫本地區本單位原實際，進一步批判賀、傅、謝、袁在廣西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肅清其流毒。要反覆進行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和繼續革命的再教育，回憶對比，憶苦思甜，激發“三恨”從“甜”字上樹“三忠”，把“三忠於”境界提到新的高度。還要繼續辦好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強調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學出新水平，用出新水平。其次要加強領導班子的革命化建設；第三要搞好整黨建黨；第四要準備打仗；第五要抓革命促生產。要批判“生產第一”、“利潤掛帥”、“專家治廠”、“爬行主義”、“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洋奴哲學”及“工分掛帥”等“修正主義黑貨”。以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奪取革命、生產雙勝利。

七月

一日至十四日 區革委召開了第三次全體委員會。到會委員一百三十一人。會議研究討論進一步落實“九大”精神，加強革命大團結，發展大好形勢，爭取更大的勝利。

會議總結了當時我區“文革”的大好形勢；研究討論了清理階級隊伍、落實政策、整黨建黨、中小學教育政策，大、中專門、批、改及城市中、小學教育革命進行的基本情況。七月十四日聽取了區革委主任韋國清的《總結髮言》，並通過了《會議紀要》。

會議對當時我區形勢的看法是：毛澤東思想在全區空前大普及，清理階級隊伍工作取得很大“成績”，挖出了一批暗藏很深的階級“敵人”，全區縣以上幹部已解放百分之八十，四萬多幹部到“五·七”幹校。工廠企業也下放了一大批幹部到生產第一線。全區二萬多所農村小學全部下放到大隊和生產隊接辦。大中院校的大多數師生下鄉下廠勞動，十萬多知識青年到農村安家落戶。農業學大寨深入開展，去冬今春造田五十七萬多畝。

韋國清在總結發言中認為：“廣西文化大革命，大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大造劉少奇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這是對的，是正確的。”並說：“已取得了豐功偉績。”號召“要團結，不要分裂，把過去的帳都掛到敵人身上。”指出這次會議主要是解決團結問題，鞏固發展大好形勢。

會議決定：要加強團結，繼續革命，要搞好鬥、批、改，全面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各項政策；要改進領導作風、工作方法和要準備打仗。“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清理階級隊伍，落實政策的基本情況》在敘述“清隊”時說：“採用了‘打活靶’的做法，把賀、傅、謝、袁之流。拉到各專、市、縣去讓廣大群眾進行面對面的鬥爭，推動了清理隊伍工作的深入發展，全區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深挖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偉大群眾運動。”通過這次廣泛深入的清理，全區公社以上的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各級領導幹部中，共揪鬥了二萬四千七百多人，在揪鬥對象中解放出來一萬五千五百多人。

《關於我區當前中、小學教育情況》中報導了全區農村三萬三千四百五十一所小學，全部下放到大隊、生產隊、工廠、企業和街道辦。但下放後存在一些問題。公辦小學下放後，對原有教師的留用率低。據玉林、陸川、容縣、北流、欽州、合浦等六縣統計，原公辦教師共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八人，被選上繼續任教的有八千八百七十人，佔原有教師的百分之七十，容縣則佔百分之五十七。拒絕收子女較多的教師，同姓者安排，異姓者排斥；同觀點者安排，不同觀點的排斥。尤其是對一些在運動中有“錯誤”的好人或做過一些“壞事”的教師，及認為教師本人出身或社會關係較複雜的人，對他們採取歧視的政策，長期排斥打擊。教師中對工資改記工分想不通，普遍認為“當教師倒黴”，“教書吃虧”。貴縣一復員軍人來信反映：“當地民辦教師下放以來，每月收入折款十二元八角至十五元三角不等，生活困難。今年二月教育革命座談會《紀要》決定：“公辦小學教師下放時發給三個月工資，口糧按規定標準繼續供應到接上新糧為止”。教師們落戶後，三個月工資用光，生活困難。

《大、中專門、批、改及城市中、小學教育革命情況》報導：

1、當前大、中專學校鬥、批、改情況：為了全面落實毛主席的各項政策，加快文教戰線的鬥、批、改步伐；我們遵循毛主席“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的教導，將區直二十五所大、中專學校，集中到廣西大學、廣西農學院和廣西財經學校，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參加學員二千二百零四人，其中革委成員八十一人，專案人員二百二十六人，一般學員一千三百八十七人，批鬥對象（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人）四百七十人。佔學習班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二。在學習班裏對批鬥對象一個一個進行階級的、歷史的、辯證的分析。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堅決執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集中打擊了最頑固的“階級敵人”，加速了鬥、批、改的步伐。

2、大、中專師生接受再教育的情況：我區二十九所大、中專學校五千九百八十七名師生，在三、四月間，徒步行軍，先後奔赴玉林、興安、隆林、崇寧等十一個縣十六個公社，五個工廠一個農場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廣西師院學生王蓮英，住在貧農張大娘家，有一次看到張大娘一邊煮飯，一邊學習毛主席的光輝著作《愚公移山》，學習入了神，把飯煮糊了還不知道。又有一天晚上，已經是十二點鐘了，張大娘拉着王蓮英的手到毛主席像前學習貼在牆上的“最高指示”，張大娘如飢似渴的學習毛著，使王蓮英深受教育。她深感自己對毛主席的階級感情比不上貧下中農深厚，“三忠於”的思想境界不如貧下中農高，決心拜貧下中農為師，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廣西農學院學生陳永羣是學獸醫的，貧下中農請他閹豬，他沒學過，又怕死了毀掉“廣西農學院”這塊牌。工宣隊以最高指示鼓勵他。在他閹豬發生困難時，貧下中農用“語錄”鼓勵他。在工人及貧下中農的支持幫助下，使他學會了閹豬。該文件還報導了在農村接受再教育的師生存在著不少的活思想。廣西大學的學生說：“我是貧下中農，挑擔比貧下中農挑得多，插秧比貧下中農插得快，開會時貧下中農還說要向我們學習哩！我向他們學習什麼呢？有的說：“我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犧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試驗品、社會上的廢品”。在這些所謂活思想中從一側面看到這種“再教育”的失敗和師生們的抵制。

3、城市中小學教育革命情況：現在我區全部城市中小學已由工人階級接管領導，從根本上結束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我區工人階級領導城市中小學，採取了定廠辦校（這種形式佔多數）、廠校掛鉤和工宣隊進駐，參加“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等三種形式。實際上在大、中專院校這場鬥、批、改深挖階級敵人的鬥爭中，又一批大中專教職員和學生受到了進一步的打擊，如在廣西大學召開批所謂二月逆流和二月逆流翻案風，批鬥教授輩寬大會，給他的是所謂地主分子等罪名，並威脅說不交待問題“要腦袋開花”。會後輩寬教授突然失蹤，至今下落不明。同一時期在廣西大學進行整建黨工作，對該校黨委書記黃傅林批判時，說他執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廣西師範學院在召開黨員大會批判楊江（院黨委書記）、陸文中、齊廣才（院黨委副書記）時，扣上“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在學院的代理人、假黨員、叛徒等罪名”。

本月，區直鬥、批、改辦公室所屬第十四大隊負責人蒙陰昭，把廣西大學一位政治教師在一九六六年一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會上提出的，“林彪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頂峰，……今後還要不要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意見”。宣布作為思想反動，屬反革命性質的言論。（從一九六六年《羊城晚報》發表“頂峰論”的社論後，在知識界學生、幹部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亂，不少人受批鬥）（據廣西大學、廣西師範大學“文革”大事記）

三日為紀念在六八年造成廣西殺害數萬人民的“七三”布告發表一週年，《廣西日報》發表社論。社論指出：“中央七三布告頒發，大長了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群眾的志氣，大滅了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威風，廣大軍民團結一致與一小撮階級敵人開展了激烈搏鬥，徹底粉碎了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廣西的代理人賀、傅、謝、袁之流……給他們毀滅性的打擊，充分顯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

八月

八月初以後，根據毛主席“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及區革委的部署，全區各專、市、縣，先後集中力量，派出大量“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基層蹲點開展抓第一批“三分之一”的鬥、批、改”以階級鬥爭為綱，革命大批判開路，抓“兩條道路鬥爭”這個主要矛盾，重點解決“領導班子革命化和一些‘老大難’問題”。八月初百色專區革委即派出抓第一批“三分之一”宣傳隊四千三百人，分別進駐三十八個公社，三百九十九個大隊，五十二個縣直單位和公社直屬單位，結合貫徹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深入進行鬥批改。全區第一批搞“三分之一”的鬥批改工作，在年底基本結束。韋國清在總結一九六九年的形勢時說：“全區組織三萬多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抓三分之一，目前（一九七〇年一月）全區已結束和正在抓的單位五千三百二十二個（公社二百八十五個，佔公社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一，大隊三千八百二十九個，佔大隊總數的百分之三十點八”並在布置一九七〇年的任務時，要求：繼續抓好三分之一，大力加強基層建設。要堅定不移地把機關工作重點轉向基層，把“三分之一”工作做出成績來。第一批要爭取春節前完成，已完成的要抓好第二批，整個抓“三分之一”的戰役，爭取秋收前結束。

實際上，在一九七〇年鋪開的第二、三批抓“三分之一”，也是貫徹“二·五”指示，以“一打三反”為中心內容搞鬥批改。如桂平縣於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開萬人誓師大會，為期七天。內容仍是貫徹“二·五”指示，開展“三反”，擊退資產階級在經濟領域的進攻。提出以“三反”為中心結合搞好鬥批改，實現全面大躍進的口號。第二批工作隊一千四百三十三人於二月二十一日下去，歷時五個月，清出“敵人”共三千九百八十四人，破案一千三百三十五起，揭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四千五百四十人，總金額四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二元作為“成績”。第三批工作隊一萬一千人下去四個月，除數字外作出成果的內容與上一批同。三批“三分之一”的鬥批改在進行的過程中，都堅持了“兩條道路”的鬥爭，對農村經濟造成了不良的後果。批“工分掛帥”，學“大寨記工分”，具體地推行平均主義，打擊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批自留地“商品化”從而引申到限制趕集，從三日一個墟期改為五日或七日一個墟期，派民兵守路口，直至到在自留地上種青苗。農民的

家庭副業受到限制，連上山砍柴賣也作資本主義來批。從搞完三分之一的三批以後，鬥批改仍全面地，一直進行下去。

九月

十一至二十二日，區革委召開了自治區中、小學教育革命工作會議、出席會議二百九十一人。會議繼去年十一月農村中小學掀起下放高潮到今年二月中旬區中、小學教育座談會以後，在“教育要革命”的口號下，對我區的中小學，進行組織更進一步的有計劃的“教育革命”。

會議對過去十一個月來把我區各小學備受摧殘的形勢說成是“形勢一片大好”。說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在解放軍的支持下，浩浩蕩蕩開進了學校，登上了上層建築鬥、批、改的政治舞台，奪回了被資產階級奪去的那一部分權力，打破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開展大批判，猛烈衝擊了“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農村公辦小學全部下放大隊辦，城市學校由工廠管理，教育事業得到了“很大發展”。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挖出了混入教師隊伍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工農兵登上了講壇，打破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獨霸講壇的局面，學校把階級鬥爭作為一門主課。

會議強調：教育戰線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仍然十分激烈。教育革命的任務是長期的、艱鉅的。所以必須抓緊革命大批判，進一步落實政策，搞好教師隊伍的革命化。全面落實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把教育陣地牢牢的佔領下來，徹底改造過來。

會議提出要對教育革命加強領導、要抓緊大批判推動鬥批改、要進一步加強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對學校的領導和管理、要建立一支革命化的教師隊伍和以“五·七指示”為指針走政治建校的的道路。號召要：批判凱洛夫教育體系、批判舊教育制度、批舊小學“四十條”中學“五十條”和大學“六十條”。批“讀書做官論”和“讀書無用論”。要建立好“天天讀”、“評教評學”等的“新”教育制度。決定根據“學制要縮短”的“最高指示”，從今年秋季起實行小學“五年一貫制”及“中學二、二分段制”。肯定農村中、小學下放大隊辦、教師工資實行“民辦公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就是在這個所謂“正確大方向”指引下，在欽州地區就有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學教師被迫進行集訓，搞所謂鬥私批修和清理階級隊伍，其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扣上地、富分子、修正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帽子進行輪番批鬥，有一百零八人被鬥打致殘，有二百六十六人被逼死、打死，有二百三十一人受到黨、政紀處分，有五千六百六十八人被下放回原籍勞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教師的迫害之慘，對人才損折和社會進步的惡劣影響是不可估計的。（據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月

十七日《廣西日報》以顯著大篇幅報導了都安縣“走大寨道路，戰天鬥地，馴江河”的情況，為樹都安縣為大寨縣樣榜的鬧劇，大造輿論。這個縣早在本年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都安縣抓革命促生產三級幹部誓師大會也在六也公社召開時，就宣布要“興起一個波瀾壯闊的學大寨，趕大寨的群眾運動”，號召全縣廣大幹部群眾要“學大寨人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敢於鬥天鬥地，改天換地的偉大氣魄，大搞造田造地，擴大耕地面積，平整土地，使大寨精神迅速在都安瑤山遍地開花”。為開創都安成為全區農業學大寨“先進典型”，拉開序幕。在學大寨創“先進典型”的幌子下，以縣革委主任、武裝部政委田長喜為首的縣委班子，連年大量虛報糧食產量，且浮誇之風越刮越猛，從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累計十年間，全縣共虛報糧食產量二億五千萬斤。長期的虛報增產大量糧食和驅動大批農民，花去大批財力物力去幹違背客觀規律“戰石海”，“造平原”，使這個在一九六八年製造冤、假、錯案和被迫致死二千零三十九人的都安瑤族自治縣人民，弄得生活貧

困萬分，怨聲載道，而田長喜卻為了掩蓋錯誤，不顧河池地區對他的浮誇的批評，更對不滿的人民群众，施以高壓手段，說是“階級敵人造謠生事”，“是個‘五·一六’審查對象講的”，“可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的，我們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單位，階級敵人不可能不搞破壞”。都安這個學大寨“先進典型”，在全區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迅速樹立，全區許多縣造梯田，劈山頭造平原，毀林造田，開小運河，所謂重新安排山河破壞生態平衡的蠢事，大幹起來，又浪費一大批人力、物力、錢財，一平二調更加盛行，嚴重地打擊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社員的工分值更加下降，一個日工分值最低者僅人民幣伍分。（據河池地區、都安縣“文革”大事記及《廣西日報》）

十一月

本月，區組織部“鬥、批、改”告一段落，由王文新宣布幹部的四個去向，對幹部的去向和使用，以支持不支持誰為劃分幹部好壞的標準，和決定對他們的使用，宣布下放（包括去武鳴學習班被審查和宣布去“五·七”幹部學校，去宣傳隊結束被下放的）到基層階級使用的幹部有：黎開模、黃新路、陳致謙、文凡、馬英榮、陳家昌、劉祖志、賴金明、仇之、邱如岳、劉池民、馬琳、梁淑如、石軍、重洪、尚持、呂哲、李炳麟、梁俊、周鳴岐、梁爽、唐奇秋共二十二名，其中除兩人外，全部是參加“四·二二”派和很少參加派性活動的人。原部長尚持被分配到南寧機械學校當一名圖書館管理員。有的人下放登記表中被寫上“文革”表現不好，“站錯隊”等，下放後被剝奪了看文件，聽報告的政治待遇，受到歧視，如賴金明被下放到河池氮肥廠，該廠領導對他說：“你只能分配做倉庫保管員的工作，這是下放登記表中註明了的”。陳家昌在“文革”初期參加群眾組織只有三、四個月，兩派對立後即退出了派性組織，但仍然當作“站錯隊”的人。被下放到梧州地區後，地區把他下放到縣，縣又把他下放到公社，後抽去水電工地八年。有的家屬還受到株連，被強迫跟隨幹部下放到基層。如馬琳是個四十年代參加工作的縣科級幹部，因他是區黨委後補書記霍泛的愛人，本人被隻身下放到鹿寨化肥廠的幼兒園做保姆工作，年紀還幼小的兒女被下放到農村插隊，只留下一個殘廢的兒子獨自在南寧無人照管。（據區黨委組織部“文革”大事記）

十二日中化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因受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在河南省開封市含冤去世。

十二月

三十一日晚，南寧市工農兵和幹部集會歡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兩報一刊社論的發表。自治區領導人韋國清、安平生、廖煒雄、劉重桂、歐致富和肖寒等出席了大會。兩報一刊社論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及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社論還號召要抓階級鬥爭為綱，搞好鬥、批、改，並在清理階級隊伍的基礎上搞好整黨建黨。

二十一日 區革委會文藝組負責人蘇大倫傳達區革委擴大會議精神，文藝界革命大批判的任務是批判《劉三姐》、《朝陽》、《英雄虎膽》等劇。（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一九七〇年

一月

二日 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提出《關於學習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兩報一刊社論的決定》（載《廣西日報》，不另行文）。《決定》提出：1、掀起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新高潮；3、百倍警惕，加強戰備；3、抓革命、促生產，實現農業大躍進，進一步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4、各級革委思想上、作風上進一步革命化，“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把領導工作重點轉向基層。

五日至十七日 自治區革委召開第四次委員（擴大）會議，到會的有區革委全體委員，各專、市、縣、柳鐵、區直廠礦、大專院校主要負責人和工農代表共六百二十二人參加。區革委主任韋國清在會上作了《我區一九六九年的形勢和一九七〇年的任務》的報告。《報告》提出一九七〇年要貫徹執行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方針，落實“九大”各項任務，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要求：1、把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推向新階段，要聯繫實際貫徹林彪“二十九字方針”，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老三篇”為座右銘；2、以階級鬥爭為綱，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認真搞好鬥、批、改。批判劉少奇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賈（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尚）、袁（家柯）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在經濟上開展“三反”，教育上批劉少奇的教育路線、孔孟之道，批判凱洛夫教育學體系和讀書做官論，落實“五·七”指示；文藝上要繼續批判劉少奇在廣西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肅清其流毒，並要求學好、演好、捍衛革命樣板戲；3、抓革命、促生產，掀起工農業大躍進的高潮；4、繼續抓好三分之一，爭取秋收前抓三分之一整個戰役結束；5、加強領導班子革命化建設。

這次會議《紀要》還提到，會議代表一致表示：“偉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搞小躍進不行，搞大躍進也不行，一定要搞全面大躍進，為人類作出較大貢獻”。同時還認為要解放思想，爭取我區工農業生產在最短時間內躍入全國最先進行列。要求今年糧食產量達一百六十八億斤，比去年增長百分之一十六，工業總產值達到二十六至二十九億元，比去年增長百分之三十。決心要擊退“階級敵人”在經濟領域的瘋狂進攻，去促進實現今年工農業的大躍進，這種以搞大躍進為名，在農村開展全面的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做法，在我區做了大量勞民傷財的蠢事，傷害了不少人，製造了一批冤、假、錯案，打擊了生產積極性。

這次會議，以大批判開路，揭開了我區經濟、政治、教育、文藝戰線以至農業生產上進行“左”的殘酷鬥爭的序幕，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一日至四日 東蘭縣革委召開第五次全體委員會議，傳達韋國清在東蘭檢查工作時的指示。（見東蘭縣“文革”大事記）

九日 天津“下放”來廣西醫務人員二千多人全部到達我區，分配到七十個縣，一百七十個公社和醫療單位。

本月中旬，自治區革委在平果縣黎明公社召開全區保衛工作會議。總結推廣黎明公社深挖階級敵人的“人民戰爭”的經驗。一月二十日，出席會議的代表參加了平果縣革委在黎明公社召開的“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公判大會”。此次會議又一次造成各地區在“深挖階級敵人”口號下製造一批冤案。

二月

九日 區革委接到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中發（1970）5號、6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的三個文件）。區革委核心小組當日立即進行學習討論，決定：“要聞風而動”。當即成立以劉重桂、安平生等六人為成員的領導小組，組織辦事機構（即“二·五”辦公室），當晚召開電話會議傳達專、市、縣，同時向區直全體幹部傳達。會後，專、市、縣也立即成立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並立即行動。

十日 至十四日 區革委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把“一打三反”的鬥爭作為當前的中心任務。十三日廣西區革委發出《關於貫徹中央“二·五”指示的通知》（桂發[1970]14號）。《通知》列舉並強調了我區經濟領域階級鬥爭的嚴重，決定要在全區範圍內掀起一個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的群眾運動新高潮，先黨內，後黨外，先幹部、後群眾，層層發動，“幫助”手腳不乾淨的人鬥私批修。《通知》還指出抓“三分之一”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也要以這一鬥爭為中心，通過這場鬥爭，進一步清理階級隊伍。以“四大”為手段，以“一打三反”為內容的“二·五”運動深入開展到我區的每一個角落，直進行到七〇年底。在經濟上、經濟上進行了極“左”的清理，同時也為進一步打擊少數派的派性清理造成了機會，製造了大批冤案。據一九七〇年二月八日自治區革委“二·五運動”辦公室《十個月“一打三反”運動情況小結》統計，全區共挖出所謂“反革命分子”二萬一千一百二十五人。

十二日 河池地區傳達貫徹“二·五”指示，地、縣建立領導機構，有領導人員六十六人，辦事人員八十八人。在全地區開展“四大、七查”。到本年底統計，全地區挖出“階級敵人”二千五百五十五人，挖出反革命集團六個共四十四人，其中判死刑十人，挖出大小貪污分子八千五百九十四人，金額十九萬零六千五百七十二元，糧票五十五萬一千五百零四斤，布票四萬四千三百六十一尺，投機倒把分子二千三百五十一人，四十五萬八千一百五十元，糧一十一萬九千一百三十五斤，布二萬九千二百二十六尺，地下工廠四十六個，地下商店七個，地下包工隊四十二個，地下運輸隊七十六個，地下俱樂部七個，各縣均開萬人宣判大會，鬥爭一千二百四十三人（自殺一百六十九人）。對上述人員分別判徒刑、戴帽、給各種紀律處分。

本月中旬，自治區各專、市、縣分別發出貫徹執行中央“二·五”指示的意見，層層成立領導小組，組織宣傳隊伍，深入開展大宣傳、大動員、大學習。僅梧州專區，就有一百九十四萬人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到三月中統計，全地區共舉辦了四萬五千多期學習班，有一百三十萬人參加學習，印發一百多個案例，發動了一百五十六萬人開展討論。在全區貫徹“二·五”指示的同時，各地、市、縣大多召開了寬嚴大會或公判大會，進行統一性的全地區統一時間，統一行動的大搜查，沒收了不計其數的財物，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有些地區甚至發生死亡數百人的嚴重後果。

十七日 區革委會召開直屬機關幹部大會，動員貫徹執行中央“二·五”運動指示。徐其海作動員報告，報告提出要狠抓經濟領域階級鬥爭。（見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本月，東蘭縣開展“二·五”運動，進行“九查、九掘”，製造一起“中華大皇國反革命集團案”。把李玉亭判處死刑，另判死緩一人，判二十年判刑三人，十年徒刑五人，五年徒刑一人，戴帽管制三人，新定歷史反革命的二百二十一人，現行反革命三百九十一人。還挖出投機倒把、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地下運輸隊、地下包工隊.....等共有一千一百九十六人。

二十七日 欽州專區革委組織大批幹部，當夜在欽州縣統一行動搜查住戶，並在西冷門廣場召開

萬人批斗大會，由於“文革”以來的殺人及這次運動的激烈，欽州專區革委常委開會，主要討論了“殺人問題”的處理。討論後由革委主任孫景芳歸納總結為：一、好人殺壞人，不予追究；二、好人殺好人，要教育，如幕後是壞人要處理；三、壞人殺好人，不管凶手與幕後都要處理；四、壞人殺壞人是破壞國法，要分別情況處理；五、凡屬謀財害命或階級報復，要根據情況輕重處分，作判決徒刑或其他處理。以這種思想去指導正在興起的“二·五”運動。四月八日零時起，欽州全地區（包括各縣、市）組織了一次統一行動城鄉戶口大檢查，共組織了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幹部、紅衛兵二十四萬三千九百人的檢查大軍，對被認為“二·五”運動中有問題的重點戶，進行了抄家搜查，沒收財物以至非法綁人關押，據“二·五”辦公室對這次大檢查的情況報告稱：挖出反革命分子二百零二名，逃犯十六名，查破反標案三百三十六起，反動書信、傳單、變天帳一萬四千多件，偽造印章二百三十枚，黃金五百四十三兩，光洋三萬三千八百多元，銀毫二萬六千八百多枚，銅板七千五百多斤，贓款三十萬七千八百元，糧票五千九百多斤，布票一萬三千尺，布料一萬七千五百尺。

三月

十二日 全梧州專區分二百多個點統一共召開“公判大會”，計有一百三十萬人參加。通過以上活動，掀起了“四大”（大檢查、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高潮。到三月底，按當時的政策界限，計挖出了“階級敵人”一千五百一十七名，“現行反革命分子”四百一十三名，“歷史反革命分子”九十八名，揭出有“三反”罪行的人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人，金額三百二十二萬元。二十七日全專區統一戶口大檢查，查出無證、假證外來人員一千四百零一人，破各種案件一百一十八起，並查出一批“贓物”。

十三日 廣西大學召開師生大會，批判所謂“現行反革命分子教師”趙耐雪，說他攻擊江青、林彪，在他的日記中有罵江青、林彪的話，經區革委批准關押，有十個教師受牽連被批鬥，其中一人自殺。該校六四級學生付東曠（是該校群眾組織東單俱樂部主要成員），他在該部說：“林彪與蘇聯的赫魯曉夫一樣有野心的”；“譚震林是中央高級幹部中唯一工人出身的，戰爭時期有很大功勞，現在也被打倒了，真想不通……”。他被判刑五年。

二十四日 浦北縣成立清查“五一六”小組，對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分配來的大中專院校畢業生、自治區下放來的幹部二百七十九人當作清查對象進行清查。

四月

十七日 河池地區革委派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進駐地區“五七”幹校，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四月二十日該政治部副主任在大會上說：“幹校有個‘三家村’、‘五家店’反革命集團，在這個反革命集團中有‘村長’、‘副村長’。這些人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叛徒’、‘國民黨殘渣餘孽’、‘三青團分子’等，是貨真價實的雙料反革命”。他號召把他們挖出來，鬥倒鬥臭。為此甘苦、江明、高原等領導長期蒙不白之冤。李玉和等二十五位同志受株連。造成地專機關幹部思想極大混亂，身心受到摧殘與折磨，元氣大傷，是為“三家村”、“五家店”事件。（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一日 百色地區一召開公判、坦白、檢舉大會。三十萬人參加，宣判五十六人（其中死刑七人、死緩一人），當場逮捕三十三人（其中現反二十二人）、從寬處理一百五十人。會後就地組織二千三百九十二個會場批鬥重點對象三千五百一十一人。五月十日搜查十種對象：堅持反動立場有現行破壞的五類分子、偽軍政憲警、反動黨團骨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反動會道門頭子、來歷

不明人員、五個地下為首分子（地下工廠、商店、運輸隊、建築隊、包工隊）、隱藏槍彈、下落不明五類分子、吸、種、販煙毒分子。五月二十二日全區組織一萬二千積極分子對城鎮重點戶大清查一千三百五十戶，查出……不少地方借搜查之名拿走貴重物品，使群眾遭受嚴重損失。到十二月底共挖出敵人七百八十四名，破各種案一千五百多起，查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二十萬零三千多人，揭發鋪張浪費四千三百五十多萬元，糧食六百多萬斤。

二十一日至十一月底。《廣西日報》陸續發表批判文章，以通欄標題設專頁批判《劉三姐》、《朝陽》、《英雄虎膽》三個戲。早在一月八日，韋國清在區革委第四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所作《我區一九六九年的形勢和一九七〇年的任務》的報告中，就提出：“在文藝上，要繼續批判劉少奇在廣西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肅清其流毒，並選一些有代表性的毒草例如：《劉三姐》、《朝陽》和《英雄虎膽》進行批判，並要求學好、演好樣板戲”。同日，《廣西日報》發表署名紅辛兵的《大毒草〈劉三姐〉的要害是反對暴力革命》，揭開了公開批判的序幕。四月二十三日，《廣西日報》以“動員起來，打一場批判《劉三姐》的人民戰爭”為通欄標題專頁批判《劉三姐》。（詳見廣西日報社、區文聯“文革”大事記）

三月二十五日和四月二十日，梧州市兩次召開寬嚴大會，共計一千四百七十一人交待問題，清出“叛徒”二人，特務四人，歷史反革命三十二人，現行反革命五十二人，地主一十四人，其他政治問題一百一十八人。在寬嚴大會上，揪鬥民主路小學教師廖碧玉，以“現行反革命”判刑十年，原因是上課時，把“美帝必敗，越南必勝”錯讀成“美帝必勝，越南必敗”（當堂課已糾正）及在批改學生作文中，刪去了“讀毛主席的書，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會上還判了糧食局售貨員陳德仁為“現行反革命”，原因是討論製藥廠某倉庫起火，他帶笑發言（平時總愛這樣的）以“幸災樂禍”為罪名，被揪出批鬥，鬥爭時他也帶笑答話，被認為是“反革命氣焰囂張”判刑十五年，兩人都在一九七七年平反，無辜坐了幾年冤獄。

二十二日 玉林專區革委根據自治區革委四月十八日晚電話會議的精神，總結了前段運動情況說：“前段運動聲勢浩大，效果顯著，到四月中旬，全專區共挖出階級敵人二千九百一十七人，揭露政治案件二千六百一十三起，破案二千三百四十四起，初步落實投機倒把有五萬七千四百九十九人，總金額二百九十五萬元。從二月開展運動以來至四月底，總共有三百二十三人死亡。

二十六日 桂林專區及桂林市都進行了一次統一行動大搜查，桂林專區各縣城鄉統一行動，當天動員組織了三十五萬人，分三千三百多個戰區，就地對四萬一千多個重點對象進行所謂大清理。該專區資源縣在這次大搜查、大抄家的行動中，就組織了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二人參加行動，在十五個戰區，於當晚對三十三個重點大隊，二千二百二十個重點對象進行大清查。挖出“階級敵人”三十七人，破“反革命集團案”一起，搜出來路不明人員一百零七人，罪證二千一百四十三件，並抄獲一批金、銀、物資。桂林市當日組織了三萬一千多人，搜查了八千八百三十九個對象，有八十八人自殺。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桂林師院被立案審查一百零七人，三人死亡，一人判刑十年，一人判刑二十年的嚴重後果。

四月，百色地區組成貫徹落實《三·二七通知》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開展對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調查摸底工作。（見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六日 平樂縣根據地區統一布置大搜查，建立一百九十九個指揮組、二百九十五個戰區、五千一百四十九個戰鬥組、三萬零八百九十六個戰鬥員，搜查一百九十一個重點單位四千二百七十個重點對象。（見平樂縣“文革”大事記）

五月

五日 至十日 廣西軍區對北海港務局、航運局、檢疫所、外貿辦事處等開展“整頓口岸運動”，

清查階級隊伍，整黨建黨，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建立革命化的領導班子。軍區副司令員徐其海掛帥，開展“四清四查”，這些單位共有職工一百二十五人，打成現行反革命四人，被抄家十二人，追死、追瘋、自殺致殘各一人，被關押二人，不進口岸工作下放幹校六十人。（見北海市“文革”大事記）

十二日 欽州專區“二·五”運動領導小組《關於運動情況分析和今後工作意見》寫述：全專區共組織七千二百多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基層辦學習班五萬五千多期二百五十四萬人參加學習。共清出階級敵人（包括重大政、歷問題）七千七百六十四人，整理了一千八百四十一個案例，發動了一百四十三萬多人討論，全地區各縣、市召開了一次以上的寬嚴大會，參加六十三萬人，從寬處理六十八人，從嚴（即逮捕）七十一人，大會布置了二千九百多個戰場，批鬥了五千五百多人，運動以來共發生自殺案二百三十九起，已死亡一百一十八人。南寧專區革委五月底向自治區的報告中，說運動中出現了亂抓人現象。全專區共逃跑七百五十人，自殺四百三十五人。南寧專區五月底統計，揭出“階級敵人”二千七百零五人，破政治案件一千零二十一。 （見欽州、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六日 桂發[1970]1號通知：經中共中央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批准，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由韋國清、劉重桂、趙欣然、魏佑鏞、焦紅光、安平生、趙茂勛等七人組成。由韋國清任組長，劉重桂任副組長。

十六日至八月八日 區革委核心小組舉辦了區革委常委（擴大）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以落實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中央“三·二七”通知（即清查“五·一六”）為中心內容。參加人員是“四·二二”在建立革命委員會時結合進來的主要成員。在辦班過程中，韋國清、劉重桂聽取了情況彙報，劉重桂在結束時作了總結。

三個月的學習班，經大擺大揭及大學大批等兩個階級，把廣西“四·二二”派在北京及區內的派性活動，作為“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來揭批。一九六七年北京公開揪“五·一六”後，……他們有計劃地退卻，活動更加鬼秘，有的打進新生的紅色政權，經過這次學習，“五·一六”在廣西的“反革命”罪行，得到了充分的揭露。提高了貫徹“三·二七”通知的覺悟，並“對有些人的問題作了初步的清理。”

學習班的《彙報》說：“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兩面派肖華、楊、餘、付、王、關、戚黑手就伸向廣西，和廣西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走資派及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勾結在一起，搞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陰謀活動”。從而把“四·二二”在京的一切活動都與“五·一六”聯繫起來。說：“六七年五月‘四·二二’代表團到達北京後，龍智銘與朱仁等就與北京的很多黑線聯繫起來。……龍智銘、劉德勝、李超林、朱仁、李朝傑、楊福庭等人很快就掌握了代表團的實權。……龍號稱為代表團的‘黑總理’，掌握了對外活動，聯絡南（廣西）北（北京）兩個戰場的大權。他很快與各方面搞通關係，參與了一系列陰謀活動，充當急先鋒”。學習班把廣西文革發生的一些事件，都作“五·一六”反革命事件清查。說：“六七年伍（晉南）、賀、霍打起了矛頭指向軍區的黑旗，奪軍管《廣西日報》的權，向軍區開刀的同時，章英、李超林、劉德勝等人神密到北京，……大揭軍區和韋國清的黑材料”。龍智銘打電話到桂林調“全無敵”演出隊去北京參加“全國文藝彙演”演出“南疆烈火”，說這個劇是伍晉南、龍智銘為“武裝奪取政權”，醜化“文革”及鼓吹“揪軍內一小撮”而授意炮制出來的。要揪廣西軍區內的一小撮及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搶劫援越物資等，都是反對解放軍。提出“中央保的人也一樣可以打倒，策劃“六·二五”東西賓館靜坐，六七年八月二日“聯指”鬥賀、霍時，龍智銘（“四·二二”）在“廣西聯絡站”指使下鬥安（平生）、喬（曉光）是破壞革命三結合。說龍智銘布置收聽“解放軍之聲”（說是當時在廣西發現的反動電台）錄音去北京播放，製造反革命謠言。並說破壞革命大聯合和三結合，搞曲線打韋（國清），支持“一·二·六”衝擊廣西軍區，挽留六九八四部隊，抵製革委會等，都作為“五·一六”的罪行來調查。

劉重桂在學習班的總結指出：“回顧廣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歷史，在廣西文化大革命

中出現的問題，就是有階級敵人在那裏搞，就是‘五·一六’在那裏搞”。並說通過學習班，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些叛徒、特務搞的，他們一開始就要打倒韋國清同志”。從而把少數派“四·二二”的一切派性活動，與反革命“五·一六”罪行劃了等號。

劉重桂在總結中最後說：“同志們回去，別人問你們不要亂說這些事。誰的問題不清楚，誰誰怎麼樣，也不能說誰的問題搞清了。還要跟同志們講清楚，不要隨便活動啊！”他宣布：“學習班暫時結束，什麼時候（再）辦，我就不說了”。（據區檔案局：《貫徹“三·二七”》通知情況報告及《劉重桂學習班總結報告》）

六月

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七日 玉林地區革委會舉辦“階級鬥爭教育巡回展覽”，歷時三個多月，觀眾一十一萬零八百八十五人。整個展覽穿著“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及“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的內容。為“一打三反”推波助瀾。（見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七月

六日 桂林師範學院召開會議傳達貫徹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學院根據中央關於高校招生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以及招收“工、農、兵”學員，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等規定”。舉辦教育革命試點班。辦兩個專業學期一年。現代漢語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開展所謂的“革命大批判”，在革命大批判中提高寫作能力，辦成革命大批判寫作組；農基專業班強調面向三大革命運動，重實踐，輕理論和專業知識的培養提高。文化和專業理論知識的學習時間不到整個學時的百分之五十，教育質量明顯下降。（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文革”大事記）

七日 廣西日報社作區下放幹部試點。區革委會到報社進行此項工作的有副主任廖煒雄（革委政工組、宣傳組派人參加），趙茂勛等也親自來過問此事。廣西日報社軍管小組長後來回憶說：當時下放幹部是在受“左”的影響下和“派性”影響下實際是搞大換班（這些下放的幹部實際上是對立派，多是到“五·七”幹校勞動或審查，接著七月二十日報社又要求派五十人“摻沙子”）。所謂下放幹部、清查“五·一六”等，實質都是排除異己，進一步推行政權，把大量的本派的更“左”的人物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要害部門中，給後來的工作帶來嚴重困難。（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八月

八月，在區公安廳召開了一次布置開展清查“五·一六”的會議。當時軍區政委劉重桂出席了會議。會議上點了“文革”中廣西發生的衝擊廣西日報、搶劫援越抗美物資、挽留六九八四部隊、演出《南疆烈火》、兵管兵訓及反對砸“二黑”等六件事。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要查與這些事有關的人和事。

區文化系統在清查“五·一六”中，定為“五·一六”分子被審查的八十六人，立案的三十六人，被迫自殺的一人，精神失常的二人。桂林市配備二百一十多專案人員清查“五·一六”。清查的事件主要是：“造反大軍”一派的“八·一〇”奪槍、“九·六”劫密、奪“抓促指揮部的權”、

“顛覆革命委員會”、“攻打百貨站辦公大樓”、“炸德智橋和新橋”、“炮擊一〇四部隊”、“炮擊越校”、“衝擊監獄”、“火燒百貨倉”、“甲山伏擊戰”等。全市清查對象一百六十五人，主要是“造反大軍”的頭頭和支持“造反大軍”的領導幹部。七十人被重點立案清查，全市開展專案鬥爭的有桂林師院、桂林醫專、“五·七幹校”等二十多個單位、梧州專區清查“五·一六”三年多，共查大小事件三十四起，涉及幹部群眾數百人、被立案審查的七十二人（幹部四十五人，教師七人，群眾六人，學生一十二人）。這些被審查的對象受到非法的對待。在地直被立案審查的三十三人中，有二十三人被秘密逮捕關押，並被抄家。有十人被隔離審查。被關押的人，遭到捆綁鬥打，受盡折磨，致使精神失常一人，自殺未遂的四人。柳州市清查“五·一六”，培養骨幹二千四百五十四人，專案人員二百四十人，重點對象一百四十四人。清查的主要形式：辦學習班。據不完全統計，有五十三個單位辦班，對九十五個重點對象進行審查。如文化系統五個單位辦四百五十五人的班。另一種形式把被清查者當作專政對象。據中百站五個單位被關的有三十人。（見“處遺”檔案卷宗203卷，柳州市清查“五·一六”調查報告）

九月

六日至十四日《廣西日報》連續兩天在頭版頭條登載都安縣農業學大寨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消息，同時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社論和文章。在各級領導和宣傳工具的鼓吹下，都安縣成為自治區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六日 區革委核心小組《關於整黨建黨的情況報告》中統計自一九六八年整黨試點，一九六九年鋪開整黨以來，目前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單位建立了新支部，百分之三十九的公社建立了新黨委、自今年四月平果縣成立了第一個廣西縣一級的新黨委以來，目前已有十二個縣建立了黨的新的委員會。

自“文革”踢開黨委鬧革命以來，各級組織已癱瘓。廣西幾年來是奪權武鬥、派性屠殺、階級站隊、“一打三反”等一系列的運動，派性力量的消長，已成定局，所以上述整黨建黨的成果，很大一部分是派性勝利的產物。新建立起來的黨組織，由於派性而產生的政治、組織及思想的不純，對今後帶來消極的後果。

十一月

六日《廣西日報》發表題為《揭開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大陰謀——批反動話劇〈朝陽〉》。詆譭《朝陽》是“劉少奇所作兩種教育制度講話的翻版，是劉少奇在中南、廣西的代理人陶、賀、霍、傅……之流以及周揚等四條漢子親自授意下炮製出的”。（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自治區黨的核心小組召開了地方黨代表大會問題座談會。會上韋國清講了話，劉重桂作總結。座談會的中心是如何開好自治區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同時要求抓好基層及縣的黨委會的建立，會議要求年底建立百分之七十縣一級的黨委會，要狠抓階級鬥爭。

十五日《光明日報》發表廣西革委大批判組編寫小組寫的詆譭周揚的題為《徹底粉碎反革命文藝黑線總綱領〈批判周揚一夥炮製的文藝十條〉》的文章。（見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二月

八日 區革委《十個月來“一打三反”運動基本情況小結》中，認為在全區範圍掀起的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運動，揪出了“敵人”，沈重地打擊了帝、修、反的“別動隊”，進一步“純潔”了階級隊伍，挖出了“反革命分子”二萬一千一百二十五名，揭發了一批貪污、盜竊案件，初步落實金額三千一百五十六多萬元，糧票六百四十二萬斤，布票二十九萬尺。還破了一批積案，查出了一批反動證件，一批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地下運輸隊、地下俱樂部，揭發出鋪張浪費積壓損失共六點八億元。

一九七一年

一月

一日《廣西日報》轉發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前進》。《社論》指出：今年將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批、改運動更加深入的一年。錯誤地提出：我們要在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戰線、經濟戰線和上層建築各個領域，抓革命大批判，進一步批判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思潮，進一步肅清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餘毒。

當天，自治區革委會發出《關於認真學習、堅決貫徹中央兩報一刊社論的通知》。指出：“社論向全國人民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戰鬥任務，這是我們全年工作的綱領”。要求：以元旦社論為武器，用戰備的觀點分析形勢，檢查工作，提高思想，明確任務，製訂措施，進一步搞好鬥、批、改，落實黨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抓緊“一打三反”運動，認真完成整黨建黨任務，做好整團建團工作，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將元旦社論提出的各項任務落到實處，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據本月一、二日《廣西日報》）

同日，桂林地區撤銷“二五”運動辦公室，有關“一打三反”運動對敵鬥爭，落實政策的具體問題，由專區革委會人民保衛組辦理。（據桂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日自治區革委會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學習中央兩報一刊元旦社論。表示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搞好領導班子革命化，把鬥批改運動進行到底，進一步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習人民解放軍的群眾運動。（見《廣西日報》）

九日梧州市委作出《關於中共梧州地下黨組織調查結案報告》。聲稱：審查梧州地下黨組織的目的是“深挖一小撮階級敵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致使地下黨不少同志為此蒙受不白之冤。（據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五日《廣西日報》轉發《紅旗》雜誌刊登的毛澤東《論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語錄》的三個部分，即：有了正確路線就有了一切；正確路線是從鬥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路線問題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八日南寧十萬軍民隆重紀念毛澤東主席冬泳崑江十三週年，並組成二萬五千多人的游泳隊伍橫渡崑江。

自治區革委會革政字[1971]1號文件發出《關於為〈廣西日報〉選調新生力量的通知》。為加強《廣西日報》工作，充實幹部隊伍，進一步搞好新聞隊伍的“思想革命化”和“組織革命化”，在自治區、軍區“雙代會”期間，挑選了二十九名所謂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好、年輕，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插隊知識青年和回鄉知識青年到報社工作，其中多是以“根正苗紅”、“三忠於”、“四無限”而獲選。在二十九人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佔了十四人。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自治區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擴大會議在南寧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區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區革委常委、軍區、區革委各大組、各專、市、柳鐵、區“五·七”幹校、區直一、二臨時黨委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上屆區黨委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岑國榮、盤美英等。會上劉重桂傳達康生在中央關於召開地方黨代表大會座談會上的兩次講話，並代表區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講了話。他說：“這次會議是遵照中央關於召開地方各級黨代表大會通知的精神，進行開門整風”。“為成立新黨委做好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這次整風重點是領導班

子的思想整頓”。“在整頓過程中，要批判黑《修養》、黑《六論》、資產階級世界觀、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批判各種錯誤思想，進一步肅清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餘毒”。會議期間，聞光彩、賀亦然、喬曉光、趙茂勛、羅立斌、許聖亨、劉毅生、楊烈、韓世福、慕石起、伍晉南等十二人，在會上進行自我檢查（名曰自覺革命）。一月五日，劉重桂作《關於醞釀自治區第三屆黨委委員候補人問題》的講話。七日，經過三次醞釀後造出自治區第三屆黨委委員候選人一百二十六名，其中解放軍代表三十四名，幹部代表四十名，不脫產人員三十名，少數民族代表二十二名。婦女代表為二十一名。（據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檔案”材料）

九日自治區革委會發出的《一九七一年第一季度工作要點》中提出六點要求：一、繼續廣泛深入地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認真學習毛澤東哲學著作。二、積極完成整黨建黨任務，繼續抓好各項領導班子思想建設，開好各級黨代會，建立新黨委。三、繼續搞好鬥、批、改，抓緊思想戰線、文化教育戰線、經濟戰線和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階級鬥爭。集中火力批判“劉修”販賣的“業務掛帥”、“生產第一”、“庸人哲學”、“爬行主義”；繼續把“一打三反”運動抓緊、抓好、抓到底，對階級敵人加強專政，對埋藏很深的階級敵人要繼續深挖，對新冒出來的反革命分子，要露頭即打；進一步抓好教育、文藝、新聞、衛生等部門的鬥、批、改。四、積極組織農業生產大躍進。五、加強戰備工作，進一步落實“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六、努力提高幹部水平，不斷改進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

十一日當晚，南寧市軍民集會，熱烈慶祝毛澤東主席《關於辦好〈廣西日報〉的指示信》發表十三週年。劉重桂、趙茂勛、韋世經、韓世福、廖煒雄、林福文、許聖亨、張智理、盧繼昌等出席大會。劉重桂在講話中說：“十三年來，我們在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辦好〈廣西日報〉指示信》的過程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極其尖銳複雜的。過去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賀（希明）、翟（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之流，利用他們篡奪的一部分權力，頑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新聞路線，大搞資產階級的‘七性’辦報方針，妄圖把《廣西日報》變成復辟資本主義的輿論工具”。他號召新聞工作者在新的一年裏，認真貫徹毛澤東主席關於在全黨“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教育”的重要指示，把新聞戰線兩條路線鬥爭進行到底。（據十二日《廣西日報》）

十八日自治區革委會召開全區電話會議，號召廣大貧下中農緊急行動起來，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為綱，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陳開路在講話中要求各級革委會，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狠抓自身思想革命化，鬥倒“難”字，打掉“怕”字，反掉“驕”字，破掉“滿”字，大破無所作為的庸人哲學，樹雄心、立壯志，學大寨，趕昔陽，艱苦奮戰，力爭儘快實現全區糧食畝產跨《綱要》。這是一次推行極“左”錯誤的動員令。（據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檔案”材料）

十九日自治區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發出《關於認真學習、堅決貫徹毛主席批示‘照發’的中共中央第三號文件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區黨政機關開展的一場反對驕傲自滿、提倡謙虛謹慎的自我教育運動（即“反驕破滿”運動）。學習濟南軍區報告的《三破三立》：破“一貫正確論”立一分為二的世界觀；破“領導高明論”，立群眾是真正英雄觀念，破“驕傲有資本論”，立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據桂發[1971]8號文件）

二十五日《廣西日報》第一版通版發表毛澤東主席《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語錄。（據桂發[1971]8號文件、見《廣西日報》）

當晚，自治區革委會在區革委禮堂舉行“熱烈歡呼革命樣板戲彩色片《紅燈記》在我區隆重上映開幕式”。南寧市一千五百名工農兵群眾和自治區革委會、廣西軍區、南寧駐軍、南寧市革委會的負責同志出席開幕式，並觀看了影片。（見《廣西日報》）

二十七日《廣西日報》發表《把路線教育當作思想建設的根本任務來抓》社論。社論提出，路

線教育必須同三大革命鬥爭緊密配合，把它貫徹到一切工作的全過程，滲透到各項活動中去。要聯繫本地區、本單位、本部門的鬥、批、改的實際，發動群眾進行揭、鬥、批、改。第三版發表《紅旗》雜誌《繼續搞好鬥、批、改》的思想評論。文中指出：“對鬥、批、改怎麼認識，持什麼態度，是關係到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問題”。（見《廣西日報》）

十五日至三十日自治區革委會為了貫徹落實毛主席在全黨“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教育”，於十五日發出《舉辦第二期教育系統幹部、教師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通知》。區革委政工組三十日舉辦了全區各地進駐中學的宣傳隊、管理中學的貧下中農代表、中學黨支部和革委會負責人以及高中教師和行政幹部四百多人參加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學習班中，錯誤地提出“當前我國教育革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種世界觀的鬥爭，集中表現在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爭奪知識分子，爭奪青少年一代的問題上”。這一極“左”錯誤，干擾了教育改革，影響了教學，不少教職工受到錯誤的批判。（據革教字[1971]號文件、見三十日《廣西日報》）

三十日《廣西日報》刊登廣西醫學院七一級工農兵學員賴雲珍的文章《要抓講檯上的和課室上的階級鬥爭》。文章荒謬地指責人體解剖教研室講師湯冠軍講課講到“針刺啞門穴位時要注意延惱的關係，若針刺不當，刺到正腦就有生命危險”是散布“活命哲學”。從而引起全院師生強烈反映，百分之九十五的教師不同意賴的觀點。但學院黨委強行組織全院對湯冠軍老師的批判，湯冠軍憤然還居貴港定居。（據廣西醫學院“文革”大事記）

二月

一日《廣西日報》轉發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的“五·七”幹校會議，總結辦校經驗，要求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把“五·七”幹校辦成培養無產階級幹部隊伍的基地。其實，當時各地普遍開辦的“五·七”幹校，是根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用以對廣大機關幹部進行審查、批鬥、“以勞代懲”的所謂鬥、批、改的基地。（見《廣西日報》）

二日《廣西日報》以《毛主席的建黨路線勝利萬歲》為題，報道了我區各級黨組織從一九六八年五月份起，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群眾性的整黨建黨工作。在“九大”錯誤路線指導下，各級黨組織進行了所謂的“吐故納新”，清除了一些好黨員，吸收一些所謂“文革”的“功臣”，造成了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嚴重不純。（見《廣西日報》）

四日經中央決定：任命韋祖珍為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任命喬曉光、覃應機為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常委。（據區桂發[1971]14號文件）

五日《廣西日報》社論《狠抓路線教育，猛促春耕生產》一文中提出，要防止埋頭抓春耕，放鬆階級鬥爭的錯誤傾向，要繼續抓緊“一打三反”運動，堅決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繼續深入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質刺激”和“黑貨”，對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傾向和各種錯誤思想要經常批、反覆批。當時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萬事不離“綱”和“線”，田頭、地腳都成了開展革命大批判的陣地，廣大群眾深受其害。（見《廣西日報》）

十六日自治區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在南寧召開，歷時八天。參加大會的以壯、漢、瑤、苗、侗等十一個民族的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和紅衛兵黨員代表共八百五十三人。這次大會，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面地貫徹了“九大”的錯誤路線。韋國清在大會作《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乘勝前進》工作報告。他說：“廣西曾經是桂系軍閥的老巢，隱藏了一批叛徒、特務和國民黨殘渣餘孽。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和兩面派陶鑄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賈希明、謝王尚之流，長期以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並聲稱“我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十分尖銳複雜，我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這場鬥爭的必然結果。經過反覆強烈的階級大搏鬥，我們終於取得了偉大勝利。”在總結鬥、批、改運動的所謂“偉大成果”時，他說：通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挖出了一批隱藏很深的階級敵人（據南寧地區統計：一九六八年搞的“反圍”、清理階級隊伍批鬥了七萬八千七百四十六人，一九六九年遭批鬥者達十一萬零六百零六人，其中三千七百七十五人打成“現行反革命”、“叛徒”、“特務”，被打死九百七十六人）。揪出了一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沉重打擊了帝修反的“別動隊”，純潔了隊伍。全區自一九六八年以來，有十三萬名知識青年到農村“安家落戶”，有一萬七千多名幹部“充實”到基層，有一萬一千多名幹部到“五·七”幹校學習鍛煉。基層黨組織通過整頓，清除“混進”黨內的“叛徒”、“特務”和代表剝削階級利益分子，吸收了六萬多名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和考驗的“先進分子”入黨（據區黨委組織部材料：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發展黨員八萬九千八百三十八人，一九七一年黨員數為六十二萬六千一百九十一人。新發展黨員佔總數的百分之十四點三）。在今後工作部署中，他說：要深入開展鬥、批、改運動，“一打三反”運動和要繼續抓緊、抓好、深挖階級敵人。大會選舉產生區黨委委員七十八名、候補委員十六名。常委韋國清、韋祖珍、劉重桂、安平生、趙欣然、陳開路、徐其海、許聖亭、喬曉光、覃應機、宋治平等十二人。韋國清任第一書記；韋祖珍任書記；劉重桂、安平生任副書記。這屆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安插了一些所謂“文革”時的“功臣”派性嚴重和嚴重違法亂紀分子。（在一九八五年“處遺”中，顏景堂：原柳州工程機械廠黨委副書記，開除黨籍，判刑；唐以豪：原區區委副書記，開除黨籍，判刑；盤美英：原賀縣縣委副書記，開除黨籍，降為一般幹部；賈鳳英：原融水縣委副書記、副縣長，留黨察看兩年，降為一般幹部；廖煒雄：原梧州市委副書記，開除黨籍，降為一般幹部；岑國榮：原區總工會主席，開除黨籍，降為一級幹部，另有三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五人定為犯有錯誤免予處分，佔這屆委員、候補委員總數的百分之十四點八）。（據自治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檔案、一九八七年區黨委整黨辦核查查組材料）

十三日《廣西日報》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聲明》重申：七億中國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可靠的後方。十六日，南寧二十萬軍民冒雨示威遊行，堅決擁護我國政府聲明，憤怒聲討美帝及其走狗侵入老撾的滔天罪行。（見《廣西日報》）

二十一日南寧市所在地五所高等院校舉行首屆工農兵學員開學典禮，會上提出的口號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紅代會提出口號：要發揚“五敢”精神；工農兵學員表示：“要用鋤頭挖掉封、資、修的毒根，用扁擔挑起教育革命的重擔”。廣西農學院首屆工農兵學員四百人，初中文化水平居多，甚至還有小學文化程度。他們要求教學內容要做到“看得見，摸得著，聽得懂，記得牢，用得上”，其後果是教師難教，學員難學，教學質量明顯下降。

二十二、二十五日兩天來《廣西日報》報道了我區首批近二千名工農兵學員，跨進了七所新型的社會大學。據自治區高校招生辦公室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材料：全區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六七年，高等院校廢除考試製度，採取“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復審”的招生辦法，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所謂“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幾年來，廣西大學、廣西民族學院、廣西農學院、廣西師範學院、廣西藝術學院、廣西中醫學院、桂林醫專、百色醫專等共招工農兵學員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人。這種教育制度的“改革”，不僅在大學，而且在中、小學都造成了教育秩序紊亂、師生關係緊張、教學質量下降的嚴重後果。（據廣西農學院“文革”大事記、自治區高校招生辦公室材料、二十二、二十五日《廣西日報》）

二十三日韋國清在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上，傳達中央關於“批陳整風”工作會議精神。他著重指出：此次“批陳整風”的重點是批陳，其次才是整風。會上，同時研究了文件傳達的範圍和時間安排的問題。全區分三批進行傳達，第一批從三月一日開始。（據自治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區黨委常委會議記錄”）

二十五日宋亞琛在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上，傳達中央關於“批陳整風”工作會議精神。他著重

指出：此次“批陳整風”的重點是批陳，其次才是整風。會上，同時研究了文件傳達的範圍和時間安排的問題。全區分三批進行傳達，第一批從三月一日開始。（據自治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區黨委常委會議記錄”）

二十五日 宋亞琛在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上，彙報有關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試點情況。他說：“從一九七〇年四月起，全區在一些重點地區和重點單位進行清查“五一六”的試點工作。目前立案審查的四十八人，已初步承認並揭發了一批人的問題。其中，對伍晉南、曾春生、龍智銘等均有揭發材料，我們認為伍晉南有很大野心。王、關、戚這條黑線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就伸進了廣西，與賀、霍、傅、謝、袁黑班子勾結在一起，在廣西進行了一系列有計劃、有組織的罪惡活動。初步查明，在廣西有六個勾子：一是以王荔為首的直接接受王、關、戚的黑指示，操縱和利用一些壞頭頭進行陰謀活動。王荔的“親信”是劉德性和王福庭。王荔有野心，妄圖在廣西任第二把手。二是原中央黨校李廣文和盧文，是關鋒把這條黑線插進廣西來的。盧文與謝王尚、章英、龍廷駒勾結最緊，並與王荔有密切聯繫。一九六七年這個組分成兩個組，北京組以劉德勝為領導，南寧組以章英為領導，與謝王尚“密謀”活動。這個小組成員有章英、劉德勝、農烈、李超林等十餘人。三是全國文藝黑線。四是北京大專院校“五一六”集團。五是武漢線直接插進梧州。六是水電設計院的“火種”。王荔來廣西後，即與劉德勝“共謀”組織奪黑班子，搞了十二人的“尖刀班”，搜羅賀希明等人。從“二一九”聲明到“四一九”聲明，都是有計劃、有組織搞的。最後，宋亞琛說：根據當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形勢，全區轉入廣泛發動群眾清查“五一六”的條件已經成熟。劉重桂表示：“中央指示很明確，清查“五一六”一定要搞，我們已搞出不少線索，要搞徹底，要開會交流情況，研究下步做法”。由於受極左思潮和派性的影響，宋亞琛的彙報，成為以後“跟蹤追擊”、“順藤摸瓜”的依據，對“一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一六”工作的錯誤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據自治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二月“區黨委常委會議記錄”）

十六、十九日 自治區黨委於十六日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指出我區從去年四月份在重點地區（主要是四個市）的一些重點單位，開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專案鬥爭，基本上掌握了“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廣西活動的主要罪行。為發動群眾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做為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據西大《大事記》：區革命政工組直接在西大搞秘密試點。玉林地區《大事記》：一九七〇年九月份區革委向各地、市發出進行清查“五一六”準備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博白、上思、融安、東蘭等縣為重點縣）。區黨委決定從現在起，在全區有領導、有計劃、有重點地分批發動群眾，打一場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人民戰爭。具體要求：一抓緊搞好專案調查；二開辦學習班，培訓骨幹隊伍（交任務、交政策、交材料）；三做好宣傳工作（大講中央文件精神，大講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政策，大講“五一六”的罪行，大講領導決心），號召廣大群眾迅速掀起一個清查“五一六”的大檢查、大揭發、大批判的高潮。同時，通知中宣布了區黨委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領導小組成員名單。組長：劉重桂；副組長：宋治平、韓世福、於斯夫；組員：張智理、盧繼鼎、張乃健、鄭瑪、王錫全、劉玉信等十人組成。《通知》下達後，在三、四月份，全區各地層層相繼建立以軍隊為主體的清查“五一”以“反革命陰謀集團領導機構，配備專案人員，層層舉辦各類人員學習班，確定清理的重點地區、重點單位、重點事件、重點對象。一個錯誤地清查“五一”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在全區有領導、有計劃、有重點地迅速開展起來。（據桂發[1971]15號文件）

清查“五一六”實際上是派劃線，執行“文革”中廣西有一條以某人為代表的所謂正確路線，打擊另一派群眾組織和不同觀點幹部。所謂“五一六”集團的“罪行”、“三指向”全是無限上綱或捏造強加於人的根本不存在的問題。（據區黨委組織部“文革”大事記）

十九日 自治區革委政工組召開的政工系統所屬單位的幹部大會。區革委副主任劉重桂作《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動員報告》。他說：文化大院、廣西大學、藝術學院、醫學院和航運局為區直機關第一批開展清查的單位。張乃健作《專案工作經驗總結》，自治區革委政工組清

查“五一六”辦公室副主任李寧作《文化大院運動情況的分析和估計》。同時，會上還宣布了各單位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成員名單。為了配合運動的全面鋪開，從三月底到四月初，區直政工系統在教育學院舉辦了一期大規模的專案人員學習班，僅自治區文藝工作總局就有一百二十人參加。（據自治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三月，自治區毛澤東著作出版社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領導小組成立後，小組成員到廣西軍區“受訓”一個月，回來後即在本單位確定重點清查事件和清查對象。（據桂發[1971]15號文件、區文化廳大事記）

十八日《廣西日報》轉發《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刊登的《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文中提出：一、巴黎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二、革命人民掌握槍杆子的極端重要性；三、革命是千百萬群眾的事業；四、要有一個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五、現代修正主義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則的叛徒；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爭取更大勝利。（見《廣西日報》）

三月，桂林市，從市領導機關到市直各單位都成立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領導機構，培訓了骨幹，配備了專案人員二百一十多人，並把“造反大軍”群眾組織的“八一〇”奪槍、“九六”劫密、奪“抓促指揮部”的權、“顛覆革命委員會”、“攻打百貨站辦公大樓”、“炸德智橋和新橋”、“炮擊一〇四部隊”、“炮擊越校”、“衝擊監獄”、“火燒百貨倉”、“甲山伏擊戰”等定為清查的重點事件。全市清查的一百六十五名對象，主要是“造反大軍”的頭頭和支持“造反大軍”的領導幹部。其中王同連（桂林市委副書記）、楊德華（自治區高等法院院長）、馮邦瑞（桂林市長）等七十人被立案重點審查。全市在廣西師院、醫專、治專、機專、漓江機械廠、百貨站等二十多個單位開展專案鬥爭。此案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給予徹底平反。

二十三日 柳州鐵路局成立清查“五一六”核心領導小組，由張文芳（師長）、張貴仁（副師長）、孫連捷、龐建勳（師副政委）、李鑾（師參謀長）、施廣聲（師政治部主任）、姚文斌（團副政委）、王大生（團副政委）等八人組成。張文芳為組長，張貴仁、孫連捷、龐建勳為副組長。各分局一級單位也相應成立領導小組和辦公室，組成四百九十三人的專案隊伍。全局把柳州機務段等十二個單位定為清查重點，定為重點清查事件有八起，有八十人定為審查對象（被關押審查的二十一、隔離審查五十七人、背靠背審查二人）。其中除張炎等五人定為“五一六”分子待上級審批外，其餘有三人定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三十人定為嚴重錯誤，二十二人定為一般錯誤，因刑事犯罪交公安部門處理的有六人。此案直到一九八四年四月十日，柳鐵[1984]28號文件，才作出平反決定。

同日《廣西日報》轉發北京大學閻軍“路線鬥爭決不能休戰——評王明、劉少奇、周揚一夥鼓吹‘國防文學’的反動性”的文章。

二十四日 自治區黨委召開常委會議，除區黨委常委外，列席會議的有韓世福、肖寒、王傳舜。會上研究兩個問題：一是撤銷自治區門、批、改運動辦公室；二是研究召開第二批黨員幹部會傳達“批陳”的幾個具體問題。（據自治區檔案局“區黨委常委會議”記錄）

二十五日 自治區黨委轉發自治區革委政工組《第二季度工作要點》。《要點》的中心是繼續貫徹自治區第三次黨代表大會精神，狠抓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深入開展“批修整風”運動，以此來帶動各項工作。《要點》中提出五項任務：一、開展“批修整風”，掀起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群眾運動新高潮，自治區擬於三月底開辦一期中央規定參加學習人員的學習班。二、建立各級新黨委，進一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在建立新黨委中，要抓好開門整風，突出抓好路線教育，調配好領導班子。三、繼續認真搞好文教戰線的鬥、批、改。這條戰線的鬥、批、改要以革命大批判開路，抓住兩條路線、兩種世界鬥爭中的要害問題“大破大立”。文化戰線，繼續批《劉三姐》、《朝陽》、《英雄虎膽》等“毒草”的同時，以《苗家兒女》為靶子，狠批“反革命文藝

黑線”；教育戰線，在繼續狠批凱洛夫教育學、“高教六十條”、“中學五十條”、“小學四十條”的同時，要上掛下聯，狠批“智育第一”、“教師倒幕論”、“讀書無用論”等，肅清“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餘毒”。四、抓好“四好”初評。五、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高各級領導水平。（據桂發[1971]18號文件）

同日《廣西日報》在《關於如何把大寨經驗學到手的討論》專欄中，發表了《提高路線覺悟，做農業學大寨的促進派》的文章。

三月，天峨縣開展清查“五一六”和社會清隊運動。全縣各級開辦“批修批資”學習班二千九百多期，參加人數近五萬。學習班中提出“學中批，批中學”的極“左”口號，製造了一批冤案錯案。全縣有二十三人被列為“五一六”分子進行審查；地下黨有二十三人被錯定為叛徒；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五十三人、現行反革命分子三十人，有五人被迫害致死。（據天峨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七日 上林縣革委會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領導小組後，立案審查的有副組長黃榜超、縣委組織部長韋卓耀、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韋克全等三十一人，審查中牽連一百多人。（據上林縣“文革”大事記）

四月

二日 區革委政工組《關於內部發行放映幾部影片的通知》中指出：根據區黨委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文藝大批的指示精神，《苗家兒女》影片從四月中旬起，實行內部發行，放映前要提出批判要點，放映後要組織批判。“大毒草”《英雄虎膽》、《劉三姐》兩部影片，除文藝、新聞、宣傳等部門有關人員可以根據批判需要，經過專、縣革委會領導批准組織放映外，其它單位不再放映。（據革政字[1971]23號文件）

八日至二十一日 自治區政工系統在區革委禮堂召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動員大會。張乃健作《動員報告》，宋治平、張智理講了話。他們在講話中，都錯誤地闡述和部署了所謂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重大意義和清查工作的具體方法等問題。會後，區直政工系統各單位清查“五一六”的運動相繼開展起來。十二日，自治區文藝工作總團在文化大院召開各領導小組成員和骨幹會議，名曰：“戰前整風”會議。石昆、張乃健、夏翰鴻、王中學都到會講話，要求各單位進一步抓緊階級鬥爭，抓出成效來。十七日，總團部又召開各單位領導小組成員會議，石昆肯定了八日至十七日這段工作的成績，並布置了下一步的具體作法。二十一日，總團部舉行文化系統控訴、揭發、聲討“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大會，歌舞團、話劇團、桂劇團等六個單位的代表發言，區文藝工作總團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石昆作大會總結，張乃健作指示。會後，隨之掀起了大揭發、大檢舉、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區文藝總團在京劇、壯劇、彩調、雜技、話劇、歌舞、桂劇、木偶等九個劇團裏，確定了二十二名審查對象並上報區革委政工組。相繼舉辦各種人員學習班，運用大會、小會、大字報、大標語、廣播等各種形式對重點人物進行點名批判，整個文化系統人心惶惶。（據自治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十日 玉林地委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領導小組，各縣成立清查“五一六”辦公室。全地區審查的一千二百人中有十一人由地委直接立案長期隔離審查。其中受黨紀、政紀處分兩人，被遣送回原籍的一人，開除留用察看兩年的一人，判處六年的一人。此冤案直到一九八四年才給予徹底平反。（據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二日 玉林地委“三辦”在《關於鑽進玉林地區地下黨兩面派人物情況彙報》中，把地下黨老幹部韋樹輝、熊福芝、林克武、黃經柱、王英等二十八人列為偽黨員、兩面派、叛徒進行審查，有的被批鬥、關押，長期遭受迫害，家屬受株連。這一冤案，於一九八一年平反。（據玉林地區“文

革”大事記）

十五日 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主要聽取區革委保衛組王惠民、宋長髮兩人對有關全區開展對敵鬥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情況及今後工作意見的彙報。在彙報中指出：當前階級鬥爭尖銳複雜，列舉了階級鬥爭動向的種種表現，並建議在幹部、群眾中廣泛進行一次階級鬥爭教育，發揮群眾專政的作用，抓緊打擊有破壞行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在清查“五一六”運動方面：全區準備在南寧、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鐵全面開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群眾運動。彙報後，劉重桂表示：這項工作一定要抓緊。十七日，召開在南寧學習的各地、市負責同志會議，劉重桂在會上講話。他說：“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區開展了群眾性的‘一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一六’的專案鬥爭。在自治區第三次黨代表大會期間，清算了‘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罪行”。“針對當前階級鬥爭形勢，要求在全區繼續抓緊‘一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結合開展社會清隊工作”。“‘一打三反’的重點是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清查‘五一六’的重點地區是南寧、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鐵（包括中央、區直和地直駐市的機關、院校、企事業單位）；清查的對象是‘五一六’骨幹分子和幕後操縱者”。“社會清隊主要在全市、縣城的街道和公社一級的墟鎮，清理的重點對象是暗藏的和外逃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的中小道和獨立辦道人員，敵偽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等。可以通過查來歷、查歷史、查成份、查社會關係、查表現、查口音與籍貫是否相符、查年齡與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與生活特徵是否相符，深挖一小撮階級敵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十九日，區黨委批轉了劉重桂四月十七日在各地、市負責同志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繼續抓緊“一打三反”運動和徹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講話》。這一《講話》得到區黨委的批轉後，各地層層進行傳達貫徹，一個深挖“階級敵人”的運動在全區迅速開展起來。（據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檔案”材料）

十四日至十九日 自治區革委會政工組召開了各地、市和柳鐵革委會政工組負責同志，以及路線教育試點的有關人員參加的“路線教育試點經驗交流座談會”。區黨委常委、區革委政工組、廣西軍區有關領導出席會議。張智理在會議總結報告中指出：為解決當前的路線教育中存在的“革命大批判不夠深入”、“批判水平不高”等問題，要求進一步認識路線教育的重大意義，弄通毛澤東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基本觀點，深刻理解黨的基本路線，深入批判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所散布的反動的“先驗論”、“唯生產力論”、“人性論”、“階級鬥爭熄滅論”。各地、市舉辦的領導、骨幹學習班“批修整風”中，要突出批修；報紙要組織好革命大批判的報道；文藝戰線要深入批判反動影片《苗家兒女》和反動小說《美麗的南方》等“毒草”作品。（據自治區檔案一九七一年檔案材料、《廣西日報》）

二十五日 自治區革委政工組在桂林召開桂劇試驗移植革命樣板戲經驗交流會。指出：桂劇是封建社會產物，解放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一直霸佔著舞台。試驗移植革命樣板戲，徹底改造舊桂劇，是一場深刻的革命。要求刻苦學習毛澤東著作，學習“革全”樣板戲的一整套經驗。（見《廣西日報》）

二十七日 東蘭縣革委會召開公社主任緊急會議，傳達自治區《關於繼續抓好“一打三反”運動，徹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縣、社分別成立運動領導小組和專案組織等領導機構，在全縣範圍內又掀起“四大”、“九查”、“九挖”活動。通過查和挖共批鬥六百五十六人，其中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七人，定為“五一六”對象重點審查的（全縣“四·二二”群眾組織成員）十四人。（據東蘭縣“文革”大事記）

同日 羅城侬族自治區革委會成立“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社會清隊運動領導小組，全縣一百零五個大隊，有八十七個大隊開展了“四大”、“四查”活動，佔大隊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二，有五十一個大隊開展了對敵鬥爭活動，共批鬥二百五十二人，發生自殺事件三起，逃跑事件十三起。（據羅城縣“文革”大事記）

五月

二日 自治區革委會政工組發出《關於政工系統全面鋪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意見》。指出：四月下旬，黨的核心小組八個單位在開展運動的領導幹部會議上，決定在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召開各單位領導、骨幹會議，學習毛主席和黨中央有關“五一六”的指示，群眾性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可陸續鋪開。在清查過程中，要結合“一打三反”運動，重點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革政字[1971]33號文件）

三月三十日至五月二日，自治區革委召開全區計劃會議，各地、市、縣、部分廠礦、柳鐵、國防工業系統、軍工生產師以及自治區有關部門一千三百多人參加，會議期間，學習毛澤東主席關於“批陳整風”、“反驕破滿”，毛澤東批發的《一九七一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等文件。到會人員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以革命大批判開路，擬訂了不切實際的《一九七一年我區發展國民經濟計劃》。（見《廣西日報》）

五日 自治區革委會政工組發出《關於慶祝毛主席〈五·七指示〉發表五週年的通知》。指出，毛澤東主席光輝的《五·七》指示，是我們完成鬥、批、改偉大歷史任務的強大思想武器，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闢的根本措施，是建設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宏偉綱領。同日，《廣西日報》發表《深入批判資產階級》社論，指出：當前落實《五·七指示》就是要深入批判“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所販賣的唯心的“先驗論”、反動的“唯生產論”、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階級鬥爭熄滅論”，要肅清他們在各個領域所散布的修正主義餘毒。（《廣西日報》）

同日 自治區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韋國清、韋祖珍、劉重桂、安平生、焦紅光、趙茂勳、陳開路、徐其海、許聖亭、覃應機、宋治平、岑國榮、盤美英、盧繼昌、張智理、董銘海、張乃健、郭興生、趙維學、梁華新、楊仲緒、宋亞琛、柴樹民、黃繼濟、程學林以及新華分社軍代表等人參加了會議。會上主要聽取傳達全國公安保衛工作會議精神，聽取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和“批陳整風”等工作情況的彙報，並研究了有關領導班子建設等問題。會上，韋國清提出：自治區機關在“批陳整風”學習中，對機構設置重迭的現象，要統一研究調整，總的原則是減層次、減人員。廣西軍區對全區五所高等院校以及區廣播電台、柳鐵等單位領導班子成員的安排提出了具體意見：廣西大學陳秉德、中醫學院滕樹凱、廣西民族學院張仁才、廣西農學院朱明德、自治區文藝工作總團盧輔明、廣西藝術學院孫煥章、廣西廣播電台楊仲緒、柳鐵董銘海、楊振宗等人。所選派的人員都是軍隊幹部，而且全被破格提拔使用。宋亞琛在彙報清查“五一六”的工作情況時提出：根據我區當前情況，轉入廣泛發動群眾清查“五一六”的條件已成熟。為弄清我區幾個重點人物的定性問題，建議把王荔、北大錢××、武漢彭偉傑這幾個“關鍵人物”搞來廣西審查；龍智銘（區革委副主任）很多問題與他有關，也調他來南寧審查；撤銷單位的“重點人物”，可放到自治區武鳴學習班去審查。

六日，趙茂勳向黨的核心小組傳達由毛主席親自批示召開並由康生掛帥領導的中央整黨建黨會議精神。參加會議的有韋國清、韋祖珍、劉重桂、安平生、趙茂勳、徐其海、許聖亭、覃應機、宋治平及董銘海、鄭興生、柴樹民、宋長髮、趙維黨、宋亞琛、梁華等人。趙茂勳在彙報到領導班子問題時說：“全區三十三萬三千九百一十四名幹部中，工農幹部佔百分之二十二點三，知識分子幹部佔百分之七十一，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佔百分之十八”。“老病殘幹部七千五百九十四人，佔幹部總的百分之二點三八，這部分幹部不處理好，提拔、培養新幹部受到影響”。“現在，全區在原有地、市委正、副書記和正副專員中，尚未“解放”的佔百分之四十二；在原縣委正、副書記和縣正、副縣長中尚未“解放”的佔百分之二十；在原廳局長幹部中，尚未“解放”的佔百分之三十二”。（據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記錄”）

七日 南寧市廣大幹部群眾隆重集會慶祝毛澤東《五一七指示》發表五週年。區黨委、區革委和南寧市委、市革委以及南寧地區革委會的負責人韋國清、韋祖珍、劉重桂、安平生、趙茂勳、陳開路、徐其海、許聖亭、覃應機、宋治平、廖煒雄、韓世福、肖寒、賈煥雨、董以法等參加。劉重桂在會上講話，他說：“《五·七指示》是毛主席對我國和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總結，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闖的根本措施，是實現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途徑，是無產階級專政下建設軍隊、建設國家的宏偉綱領”。要求更深入、更紮實地搞好鬥、批、改，把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革命進行到底。（見五、六、七日《廣西日報》）

九日 自治區黨委於二月中旬建立後，分別在三、四月份連續舉辦黨員負責幹部學習班、認真讀馬列的書，學習毛澤東主席著作，聯繫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聯繫階級鬥爭實際，開展革命大批判，狠批所謂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所販賣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動的“唯生產力論”、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見《廣西日報》）

十日 區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全面分析我區階級鬥爭新形勢、新動向，研究“批陳整風”以及當前工作問題。韋祖珍、劉重桂、安平生都圍繞我區當前階級鬥爭新形勢、新動向講了話。韋祖珍說：“當前階級鬥爭的無數事實證明，毛澤東主席提出的‘三個存在’是偉大真理”。劉重桂說：“要在領導幹部和群眾中，加強黨的基本路線教育，提高階級鬥爭觀念和繼續革命覺悟，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否則，就是一個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領導者”。安平生說：“要正確估計敵人，現在全區農村有四類分子三十多萬，加上他們的親屬大概在一百萬以上”。韋國清在最後講話時著重分析了階級鬥爭新形勢、新動向和今後的幾項工作。他說：“當前一小撮階級敵人極力煽動資產階級派性，沒有改造好的四類分子頑抗改造，敵特也加強間諜活動。他們書寫反動標語和反動口號，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大刮翻案風，殺人放火、復活‘四害’，腐蝕幹部群眾，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煽動無政府主義，擾亂社會秩序；‘五一六’是反革命陰謀集團，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反革命復闖，是適應帝修反需要的，是有國際背景的，象陳伯達就是有國際背景的，是托派，是五毒俱全的階級敵人”。在此，他再次重申，廣西社會情況複雜，是李、白、黃的老巢，廣西解放晚，全國各地都有一些壞人流竄到這裏來。當談到“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時，他說：廣西兩派嚴重對立，以致武鬥打死人，應記在劉少奇、王、關、戚、楊、餘、傅以及一小撮階級敵人身上，記在“五一六”總後台陳伯達身上。在廣西要把帳記在國民黨、叛徒、特務買（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尚）、袁（家柯）身上。對今後的工作要求：一、向各級領導幹部和黨員群眾講清當前階級鬥爭新形勢、新動向；二、狠抓根本，當前要以“批陳整風”為中心，帶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會清隊；三、開展革命大批判，反對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作風；四、要經常地、有計劃地、有組織地進行兩條路線鬥爭教育；五、認真抓好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由於區黨委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和分析，對工作的錯誤指導，給全區正在開展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會清隊，帶來嚴重後果。（一九七一年“區黨委擴大會議記錄”）

五月間，梧州市革委會把“紅色造反團”群眾組織打成“五一六”反革命組織，主要成員被當作“五一六”分子進行審查。工作隊以辦“學習班”為名，把江文琪等十四人秘密關押或隔離審查。同時，派人到遠寧把彭偉傑押回梧州隔離審查。根據逼供、誘供、指供所得材料，將崔炳榮、關照、梁治光、孫波、唐傑等一批領導幹部也進行隔離審查。清查對象從“四·二二”群眾組織的幹部頭頭，擴大到市直部、局乃至市一級的領導幹部。（據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自治區文藝工作總團，從五月份起，運動由“四大”階段轉入專案鬥爭階段。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專案人員學習班。隨後，把本團所謂的《南疆烈火》、《6984挽聯站》、《兵管、兵訓》、《奪》（廣西日報）大權》、《反砸‘二黑’》、《收聽反動敵台》定為六件大事，並立案審查與上述大事件有關的三十六人。（據自治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南丹縣通過“四大”、“八查”，查出外逃五類分子十八人，有政治問題的二百一十六人，有

經濟問題的二百零八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金額達十二萬八千三百五十三元。全縣共批鬥了有現行破壞活動的五類分子及各種有嚴重問題的三百零二人。（據南丹縣“文革”大事記）

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作為“五一六”對象立案審查的有二百三十八人，其中定案處理了六十四人。（據廣西師院“文革”大事記）

環江縣分別在城管、馴樂兩地召開公判大會。全縣分設的四十七個參加大會原達七萬多人，在會上批鬥四十七人、宣判九人、拘留三人。會後，各地全面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掀起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的群眾運動。全縣百分之八十的生產隊開展對敵鬥爭，共批鬥九百四十五人。（據環江縣“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廣西日報》以通欄標題開闢了“徹底批判反動影片《苗家兒女》的專欄。編者按把這一個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的迫害文藝工作者、扼殺文藝創作的行徑，說成是“本報根據廣大工農兵群眾的要求，從今天起，對反動影片《苗家兒女》進行公開批判”。編者按指責：《苗家兒女》影片貫穿著一條反對階級鬥爭，宣揚階級調和，散布階級鬥爭熄滅論，反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鼓吹“唯生產力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為劉少奇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闢資本主義的罪惡陰謀大造反革命輿論。號召廣大讀者，高舉革命大批判的旗幟，向“反動”影響《苗家兒女》猛烈開火。（見十日的《廣西日報》）

十六日 自治區革委隆重慶祝毛澤東主席“五一〇”聲明發表一週年。（見《廣西日報》）

十七日 自治區革委會政工組舉辦文藝革命大批判學習班，參加學習班的有各地、市、柳鐵以及廣西師範學院、廣西民族學院等地區和單位的寫作小組成員，以《苗家兒女》、《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美麗的南方》等“毒草”為活靶子，狠批劉少奇及其在文藝界的代理人周揚等“四條漢子”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這一學習班之後，對影片《苗家兒女》進行了持續批判。（見《廣西日報》）

同日《廣西日報》第三版，又以通欄標題開闢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專欄，徹底批判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的“唯生產力論”。據五月至十二月連續發表了五十五篇大批判文章。（見五月至十二月《廣西日報》）

二十一日 自治區黨委、自治區革委舉行學習毛澤東主席“五·二〇”莊嚴聲明報告會。熱烈歡呼世界人民反對美帝鬥爭的偉大勝利，決心遵照毛主席教導，堅決支持五國人民鬥爭。（見《廣西日報》）

二十三日 自治區革委會政工組發出《關於深入開展教育戰線革命大批判的通知》。指出：為了進一步推動教育戰線鬥、批、修運動深入發展，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勝利，必須認真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批陳整風”、“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全面教育”的偉大指示，繼續深入持久地進行革命大批准。徹底批判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所散布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動的“唯生產力論”、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同時，要求緊密結合教育戰線的實際，繼續狠批凱洛夫教育學、“高教六十條”、“中學五十條”、“小學四十條”以及“智育第一”、“教師倒毒論”、“讀書無用論”等。這一批判，全面否定了建國十七年來在教育戰線所取得的偉大成績。（據革政字[1971]40號文件）

二十四日《廣西日報》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專欄，發表了署名新文撰寫的《深入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文章。全文分四個部分：一、“階級鬥爭熄滅論”是假，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是真；二、“反修”、“防修”是假，保護“一小撮”是真；三、“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假，妄圖進行反革命奪權是真；四、“無產階級革命”是假，篡黨奪權的野心家是真。對劉少奇進行誣陷和攻擊。（見《廣西日報》）

五月間，自治區黨委舉辦自治區革委會（群眾代表常委）以上人員學習班。學員有廖煒雄、潘玉臣、顏景堂、李家海、任樹人、韋仕珍、鄧元清、曾春生、龍智銘、林福文、覃啟品、何作然、李耀增等十三人，伍晉南也參加了學習班。工作人員十三人（其中軍代表十一人）。學習班中主要擺“文革”中的大事件以及兩派參加大事件的活動情況。這次辦班，實際上是清查“五一六”分子。學習班結束後，龍智銘被專案審查。龍在審查期間自殺死亡。（據瓊文苑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寫給自治區“處遺”辦公室的材料）

六月

一日《廣西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柳州市革委會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撰寫的《鼓吹自由化就是復闢資本主義——批判大毒草（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編者按說：這篇文章是打着反教條主義、探討文藝創作道路的幌子，大肆鼓吹“寫真實”論、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瘋狂反對文藝的階級性和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反對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反對文藝工作者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相結合、徹底改造世界觀。（見《廣西日報》）

三日《廣西日報》發表署名新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論，徹底批判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的文章。文中提出：堅持階級分析，搞無階級革命，還是鼓吹抽象的“人性論”、“搞階級調和”，是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搞階級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鼓吹“和平”、“自由”、搞“大家專政”，是區別真假革命的分水嶺；深入批判“人性論”，堅持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根本觀點分析一切，觀察一切。（見《廣西日報》）

六日 自治區黨委轉發《關於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一九七一年計劃會議紀要》的通知。同日，還批轉了自治區公安保衛工作會議《關於貫徹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精神的意見的通知》。區黨委強調指出：各級黨委會要切實加強對公安保衛工作的領導，狠抓公安保衛機關的革命化建設，加強對敵鬥爭，繼續抓緊“一打三反”運動，徹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搞好社會清隊工作。（據桂發[1971]48號文件）

六月初，梧州地區革委會在八步鎮搞“社會清隊”試點。十三日至十五日，地區革委一號辦公室在八步鎮召開梧州地區社會清隊工作會議，總結第一階段的工作經驗，部署下步工作，要求發動群眾開展“四大”（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八查”（查來歷、查歷史、查成份、查社會關係、查表現、查口音與籍貫是否相符、查年齡與面貌是否相符、查身份與生活特徵是否相符）活動。按區黨委指示，要求社會清隊試點在十月份前結束，而後採取三分之一帶三分之二的辦法逐步鋪開，力爭在一、兩年內搞完。（據賀縣“文革”大事記）

十二日《廣西日報》刊登了上海機床廠黨委會《沿著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輝道路前進》的文章。文中指出：一、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是辦好學校的根本；二、在批判中建立新專業，設置新課程，編寫新教材；三、在教學上堅持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四、造就無產階級技術隊伍的一條重要途徑。這一辦校經驗廣為推開，全區各地“七·二一”大學林立。（見《廣西日報》）

十六日 在“批修整風”和深入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運動中，《廣西日報》第一版刊登了毛主席關於路線鬥爭的指示。（見《廣西日報》）

二十三日 自治區宣傳、出版系統召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動員大會。張乃健作“動員報告”他說：“揪廣西軍內的二十個為什麼”、“四管四訓”、“衝擊《廣西日報》”、“衝擊電台”、“一中軍訓”、“六一三武鬥”、“揪軍內一小撮”、“文攻武衛十五條”、“二一九聲明”、“四一九聲明”、“今日哥達綱領”、“崑江風霜”、“三二九聲明”，屬於“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活動，要深挖。會後，區直文化系統開展大抓“五一六”分子活動。（據區

文聯“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自治區革委會政工組負責人張乃健在區黨委常委會議上彙報舉辦《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展覽》的情況。區黨委常委會議同意彙報意見，並決定二十九日在自治區展覽館門前廣場舉行八百人參加的開幕式。（據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區黨委常委會議記錄”）

同日自治區黨委出《關於認真學習、貫徹中央兩報一刊“七一”重要社論的通知》。在強調“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備戰”的同時，要把“一打三反”運動抓緊，繼續有力地打擊一小撮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分子，要深入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群眾運動。（據桂發[1971]62號文件）

二十九日我區各地、市、縣和柳鐵，到六月二十七日止，已全部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建立了新黨委會。《廣西日報》發表本報評論員《堅持民主集中制，加強黨委革命化建設》的文章，祝賀各級黨委會的建立。其實這次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在“九大”錯誤路線指導下，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嚴重破壞，各級黨委會中，都安排了一些“文革”中的所謂“有功之臣”。據鍾山縣第四次黨代表大會，選舉縣委委員二十六名，候補委員三名，其中有九人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犯有“打砸搶”和主謀殺人錯誤的，在（一九八五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有五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四人判刑），佔新縣委成員的百分之三十一。（據鍾山縣“文革”大事記）

七月

一日《廣西日報》刊登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重要文章《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五十週年》。全文闡述三個問題：一、堅持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繼續革命；三、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文中聲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叫做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自治區黨委、自治區革委會召開常委會，學習中央兩報一刊重要文章。併發出《關於認真學習、貫徹中央兩報一刊〈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五十週年〉重要文章的通知》。（見一、二日《廣西日報》）

三日至十四日自治區黨委召開第二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會上，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學習《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和《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五十週年》重要文章。同時，還通過了《關於上半年形勢的分析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紀要》。最後，韋祖珍作會議總結發言。他要求：一、縣以上黨委在傳達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時，要結合分析上半年工作形勢，對那些驕傲自滿、講假話、鬧不團結和自由主義等傾向，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問題嚴重的單位，領導班子要進行整風，批判不正之風要上掛下聯與黑“四論”結合起來。二、要克服對敵人鬥爭中的右傾情緒和執行政策中形“左”實右的傾向。三、要大鼓幹勁，狠抓工、農生產中的薄弱環節。四、要認真做好外事工作。五、要改進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據自治區檔案局材料、桂發[1971]70號文件）

八日《廣西日報》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專欄，發表了廣西區黨委寫作小組撰寫的《堅持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批判所謂“四條漢子”反對黨的領導，鼓吹“創作自由”的反革命口號》的大批判文章。（見《廣西日報》）

九日《廣西日報》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專欄，又集中地發表了五篇所謂徹底批判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所鼓吹的反動的“唯生產力論”的文章。（見《廣西日報》）

十六日自治區黨委會議，討論有關幹部的定性處理的問題。段純和彙報武鳴學習班審查幹部的情况。他說：武鳴學習班審查的五百多名幹部中，大部分屬人民內部矛盾。在審查中多是採用群眾

“批鬥”的辦法，在問題未弄清之前，不能“解放”，不能恢復組織生活。會上，還討論了二十四名廳局長以上幹部的定性處理問題。其中，錯誤地定為敵我矛盾的有熊和清（叛徒）、王漢昭（歷史反革命）二人；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有周嘉琳、吳永忠、崔毅三人；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有侯春寒、張今雄、陳任生、馮壽天、王昇階、梁唐晉六人；政治思想錯誤的有祖振興、張羽、方中祐、韋章平、鍾楓、袁似瑤、蒙毅、魯源、秋雁、吳英甫等十人；審查無問題的有孫善佑、安倫、盧振華三人。這些被審查的同志多年來在工作上得不到正常的安排，精神上受到摧殘。（據自治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區黨委常委會議記錄”）

二十日自治區革委會發出《關於召開全區政治工作會議的通知》。《通知》指出，經自治區黨委批准，全區政治工作會議定於八月五日召開，會期二十天，一百五十人參加。會議將根據中央工作會議和自治區黨委第二次全會精神，分析全區政治工作形勢，總結交流經驗，研究如何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為綱，以“批修整風”為中心，深入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使各項政治思想工作落實到基層。（據革政字[1971]47號文件）

同日《廣西日報》開闢的“關於如何把大寨經驗學到手的討論”專欄，發表了《推廣大寨經驗，必須狠狠階級鬥爭》的文章。這一“討論”進行為時數月的報道。（見《廣西日報》）

二十日至八月間，自治區黨委書記韋祖珍先後到河池地區的巴馬、鳳山、東蘭、南丹、河池、宜山、都安和羅城等縣檢查工作，每到一處則對有關形勢、山區建設，以及如何抓好基層工作等七個方面作了指導，並提出“住山、愛山、治山”的要求。三年後，這些講話被誣為“右傾翻案風”，橫遭批判。“韋祖珍反黨言行十八例”即由此而來。（據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三日、三十一日這兩天的《廣西日報》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專欄中，發表了九篇批判“大毒草”《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文章。其中河池地委寫作小組撰寫的《“寫真實”的要害，就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見《廣西日報》）

六、七月間，《廣西日報》開闢專欄集中地、連續地批判了陶鑄。六月十九日，《廣西日報》發表了《徹底批判反革命兩面派陶鑄鼓吹的“林業黨”反動謬論》的專欄。七月十八日在編者按中指責陶鑄一九六〇年到欽州地區以檢查生產為名，沿途放毒《西行紀談》一書是他“黑話”的匯集。（見六、七月間《廣西日報》）

八月

三日《廣西日報》發表靈山縣革委會副主任楊登元、林濟梅撰寫的《階級鬥爭，一抓則靈——批判“反革命兩面派”陶鑄鼓吹“有茶則靈”的謬論》，文中指出，一九六〇年秋，陶鑄到靈山曾說：“靈山、靈山，山不在高，有茶則靈”、“茶樹是搖錢樹，採茶是采工資”。作者對此橫加指責，批之為“要我們埋頭生產，不問政治，只抓錢，不抓階級鬥爭，這充分暴露了他復辟資本主義的狼子野心”。類似這樣的文章，在當天同一個版面發表了五篇之多。由此可見，極左思想對人們毒害之深。（見六月十九日至八月三日《廣西日報》）

五日至二十五日自治區黨委召開全區政治工作會議。各地、市、縣、柳鐵黨委、革委會和區直有關部門、各級政工部門負責人，以及大專院校和部分廠礦、企事業分管政治工作人員四百四十多人參加會議。會議要求區各級領導以開展“批修整風”、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為中心，搞好基層革命化和組織革命化建設，為完成黨的“九大”以來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而努力奮鬥。會議期間，韋國清、劉重桂、安平生到會聽取發言：趙茂勳、許聖亭、宋治平、張智理、張乃健、鄭新生等人在大會講話；劉重桂作會議總結。”（見三十日《廣西日報》）

五日自治區文藝工作總團召開“坦白交代和批判‘五一六’罪行大會”。對所謂“罪行”嚴

重的人在會進行了批鬥。會後，文化系統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更猛烈地開展起來。有的單位對審查對象實行“車輪戰”日夜審訊，威嚇逼供；有的對病人不讓休息，逼供、批鬥、強迫勞動。采調團在軍代表劉榮弟指導下，對趙小明連續批鬥達半個月有餘，有時通宵達旦的批鬥，致使其精神極度恐懼，終在二十八日跳樓自殺，博物館一女同志直到臨產前，還遭到輪番審訊，致使其患精神分裂症。據不完全統計，當時文化系統被誣陷為“五一六”分子受審查的有八十六人，立案審查的三十六人。其中被迫自殺一人，神經失常二人，被雙開除五人，受黨紀、政紀處分的六人。（據自治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

九日《廣西日報》發表《把工業學大慶群眾運動推向新高潮》的社論。指出：大慶，是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紅旗，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榜樣。大慶的道路，是中國工人階級按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工業的道路。同時，在《廣西日報》開闢了《如何把大慶經驗學到手》的討論。（見《廣西日報》）

十六日自治區黨委關於安置處理老、弱、病、殘幹部和吸收新幹部問題向中共中央寫出了《請示報告》。《報告》中指出：“自治區革委會成立後，我們進行了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對幹部進行了適當調整，初步統計有七千名‘老弱病殘’幹部不宜分配，需要安置處理”，“關於吸收新幹部問題，全自治區一千零一十六個公社，按每個公社吸收三至四名計算，即應吸收三千零四百八名至四千零六十四名。條件是：工人和貧下中農出身，政治歷史清楚，家庭和社會關係無重大問題，有基層工作經驗和一定組織能力，身體健康有培養前途，年齡在二十八歲以下”。這種做法，實際是在國家機關幹部中進行清隊，把“文革”中的“功臣”、嚴重違法亂紀分子、派性嚴重的人拉進幹部隊伍。（據自治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檔案材料）

三十一日自治區黨委批轉全區政治工作會議三個文件。即：《關於全區各級領導班子“兩化”建設的基本總結和今後意見》，指出：我區各級領導班子是按照“軍、幹、群”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在地、市、縣和柳鐵黨委委員中，解放軍代表佔百分之二十點二，幹部黨員代表佔百分之三十三點四，不脫產委員佔百分之四十六點四；三十五歲以下的委員佔百分之三十七點三，出席縣以上“雙代會”的代表佔百分之五十二點八。《關於全區路線教育的基本情況和今後意見》指出：今年以來，開展了以“批修整風”為中心的群眾性路線教育運動，集中地批判了極左思潮，增強了革命團結，共同對敵；批判了無政府主義，加強了組織紀律性；批判資本主義傾向，鞏固了社會主義陣地；批判“四舊”，增強了抵制腐蝕能力；批判右的和形“左”實右的傾向，使黨的各項政策進一步落實。《關於全區文化工作基本情況和今後意見》指出：全區各地經過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正在進行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群眾運動，深挖了“階級敵人”，揭露和打擊了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批判了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傾向和反動的社會思潮，抵制了各種錯誤思想傾向。（桂發[1971]82號文件）

同日自治區黨委批轉《關於加強基層政治工作建設的意見》。（據桂發[1971]83號文件）

九月

一日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舉辦幹部讀馬、列書學習班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按照毛主席關於“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的指示。通知決定十月在南寧舉辦幹部讀馬列書的學習班。學習《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兩本書和毛澤東有關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以及《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等文章。參加第一期學習班的有各地、市、縣和柳鐵黨委學習中心小組、各地、市、縣革委會宣傳、政工小組的負責人以及相當縣以上廠礦、大專院校、區直屬廳局以上單位共五百一十五人。（據桂發[1971]84號文件）

十二日自治區革委會於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七日在南寧召開農業學大寨會議，各地、市、縣到會代表三百一十多人。會議期間，自治區黨委書記韋祖珍作《關於農業學大寨的報告》；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劉重桂作《形勢報告》；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安平生作《會議總結報告》。會議指出：要學大寨經驗真正學到手，必須抓住毛澤東思想教育人這個根本，抓住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這個綱，抓住領導班子思想革命化這個關鍵。會議要求各級革委會，要以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為綱，總結經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做好規劃，製訂措施，進一步開展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號召廣西革命幹部、貧下中農和社員群眾，要鼓起更大革命幹勁，繼續發揚勇敢戰鬥的革命精神，迅速掀起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群眾運動新高潮。（見《廣西日報》）

十日至二十一日上林縣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貫徹落實自治區農業學大寨農田基本建設會議精神。縣委成立基本建設指揮部，各公社成立指揮所。（據上林縣“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都安縣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貫徹自治區政治工作會議和農業學大寨會議。會後，全縣掀起了一個打秋前農田基本建設“殲滅戰”的新高潮。有的公社百分之四十的勞動力湧上工地。（據都安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自治區黨委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召開工作會議。各地、市、柳鐵、區直四大組，武鳴學習班和自治區“五·七”幹校等單位有關人員參加會議。會議產生了《清查“五一六”工作會議紀要》。《紀要》指出：“在清查過程中，堅決貫徹了中央十三號文件和九條方針。目前已有一百五十一個重點單位開展了‘四大’和專案鬥爭，辦了七百七十四名重點人物學習班”“根據揭露出來的‘五一六’‘罪行’，把收集整理中央‘首長’黑材料的幾個組織，‘二·一九’和‘四·一九’奪權黑班子、揪‘軍內一小撮’、‘北航黑會’、破壞區市革委會成立、搶劫擄越抗美物資、衝擊桂林第三監獄、‘九·六’搶劫桂林步槍機密檔案、南寧梧州反革命縱火案、建立‘反革命基地’”定為我區十大事件。《紀要》提出：要深入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進一步開展革命大批判，認真搞好鬥、批、修，繼續抓緊“一打三反”運動，徹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認真抓好社會清隊工作，繼續落實“專政是群眾的專政”，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任務落實到基層；加強同黨、修、反、特務、間諜的隱藏鬥爭，加強首腦機關、要害部門的保衛和保密工作。自治區黨委於十一月二日批轉了這一會議《紀要》。（據桂發[1971]111號文件）

二十三日自治區黨委發出通知：增補高曉光為自治區革委會政工組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併兼任區革委會政工組副組長；覃應機為自治區常委會生產組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併兼任生產指揮組副組長。（據桂發[1971]92號文件）

九月，百色地區清查“五一六”辦公室在地區農業試驗站舉辦清查“五一六”學習班，集中“四·二二”群眾組織主要骨幹（內有專區革委會委員十人）到學習班審查。地區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組長楊壯存在學習班動員會上說：“不管它的組織是不是叫‘五一六’，不看他填不填表，凡是在‘文革’中有組織的反黨亂軍奪權的就是‘五一六’，就要挖出來。在百色有三種情況，一是有罪行無組織；二是有罪行有組織；三是無罪行有組織。不管哪種，都要清查出來”。學習班採取嚴密封鎖措施，規定學員不准外出，飯後活動要有三人以上，不准會客，不准同被隔離審查人員打招呼，不准搞串連，不准毀滅“罪證”，不准轉移“黑材料”等，每個被審查人員都安排有兩個人監守。審查中搞刑訊逼供，搞“車輪戰”、“轟耳戰”，進行殘酷批鬥。全區各地都有類似情況發生。（據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九月，河池地區革委會“三辦”，以審查幹部歷史為名，在地區“五·七”幹校集中地委副書記張延年、地委常委、秘書長江明等十一人到宜山縣九龍巖辦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長達一年之久，致使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殘。此次“學習班”，事後稱之為“九龍巖事件”。（據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 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討論研究三個問題：一、自治區黨委、自治區革委《關於進一步發揚“愚公移山，改造中國”革命精神，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的指示》草稿；二、召開全區教育工作會議問題；三、舉辦馬、列學習班問題。

同日 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進一步發揚“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革命精神，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指示》。《指示》中明確提出：我們的目標仍然是奮戰三、五年，把我區所有縣辦成大寨“式”的縣。為實現其目標，要求：一、進一步提高農業學大寨原認識；二、狠抓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繼續深入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狠狠打擊一小撮敵人的破壞活動，有針對性地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批判“四舊”；三、狠抓基層建設；四、認真執行黨在農村的經濟政策；五、加速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六、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據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自治區黨委會議記錄、桂發[1971]100號文件）

十月

四日 自治區黨委、自治區革委《關於進一步發揚“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革命精神，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 群眾運動的指示》於今日在《廣西日報》發表。（見《廣西日報》）

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九月十八日通知，林彪於九月十三日倉惶乘機外逃叛國，途徑蒙古溫都爾汗墜落，機毀人亡。林彪餘黨或自殺斃命，或束手就擒。一場反革命武裝政變被徹底粉碎，奪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十一日至二十九日 自治區黨委常委連續召開會議，研究傳達貫徹中共中央有關“林彪叛黨叛國事件”所發出的文件。十一日，區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韋國清在《關於今冬明春工作安排意見》中說，中央要求各級黨委將傳達貫徹中央有關林彪叛黨叛國事件的57、65號文件，當作當前第一位的大事來抓；並把這項工作同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結合起來。二十六日，區黨委常委會議，研究貫徹中共68號文件。為集中力量進行傳達貫徹，要求縣以上單位抽三分之二的幹部下去。先縣級機關，然後再到基層，全區要在十一月中旬傳達完。二十八日，區黨委常委會議，研究貫徹68號文件。決定在農村黨員幹部中分批、分片進行傳達；縣人武部、軍分區同地方黨委一起傳達，區直四大組在南化、邕寧縣搞點，由劉重桂負責；機關要組織幹部下去，下去的幹部由各地、市委統一領導。二十九日，區黨委向各地、市、縣、公社、柳鐵黨委、廣西軍區、軍分區、人武部黨委、區直機關各大組、“五·七”幹校黨委或黨的核心小組發出《關於傳達中央67號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親自批示“照發”的《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通知》，決定將林彪叛黨叛國事件向全國廣大工農兵群眾傳達。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極其重要大事，是一場最深刻最現實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教育，是當前中心任務，是推動各項工作的總綱。要求全區在十一月十五日前後傳達完畢。（據桂發[1971]104號文件）。

中央[1971]67號文件，各地傳達迅速、廣泛。上林縣全縣總人口三十萬零五百二十九人，聽傳達中央“關於林彪事件”文件人數竟達十七萬七千九百五十九人，佔應聽傳達人數的百分之九十八。柳州市有二十四萬一千零五十七人聽了文件傳達，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六以上。（據上林縣“文革”大事記、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宣講中央[1971]68號文件應注意掌握的幾個問題的意見》。要求：揭批罪行，大談危害，激發對林彪的無產階級義憤；剝開畫皮，認清本質，識破林彪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兩面派真面目；大講勝利，激勵鬥志，增強把反帝、反修的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和信心；提高認識，團結對敵，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政策。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為綱、搞好“兩個結合”，爭取更大勝利。（據桂發[1971]105號文件、中發[1971]57號

文件）

三十日 自治區革委會政工組發出《關於基層年終政治工作總結的通知》。根據自治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對今冬明春工作的部署”，在今年基層政治工作總結中，要求認真總結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搞好基層領導班子開門整風，以及做好生產隊幹部的政治工作，鞏固農村社會主義陣地等方面的經驗。（據革政字[1971]63號文件）

同日《廣西日報》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專欄，發表署名區教革《批判唯心論的先驗論，深入開展教育革命》一文，荒謬提出：鼓吹“天才論”就是反對學校向工農兵開門；鼓吹“理論至上”就是反對學生參加三大革命實踐；鼓吹“教授治校”就是反對工人階級領導教育。（見《廣西日報》）

十月，梧州市召開清查“五一六”工作會議，決定把清查工作的重點轉為查事件查罪行。周樹忠在會上提出要清查七個重點事件：揪軍內“一小撮”；一九六八年五月“反革命”縱火事件；“八·二九”搶槍；“八·二六”攻打工人醫院；“八·二九”洗劫公安局；抗拒“軍管”銀行；“武漢黑會”。與此同時，市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辦公室根據自治區清查領導小組《關於做好事件結案和個人定案工作的幾點意見，開始進行定案處理工作。（據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十一月

一日 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討論區黨委向中央所作的關於區黨委在黨支部書記以上幹部中傳達中央[1971]57號等文件和關於龍智銘自殺問題（五月間，清查“五一六”罪行時，龍臥軌身亡）的兩個《情況報告》。韋國清在討論到龍自殺問題時說，去年辦學習班時，龍智銘不交待問題，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中，群眾揭發他大量“罪行”，又辦了學習班，龍智銘感到問題嚴重，而“畏罪”自殺，我們的錯誤是對龍“管理不嚴”。龍智銘是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他自殺應向中央彙報。（據自治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區黨委常委會議記錄”）

二日 自治區黨委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於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召開清查“五一六”工作會議。在會議期間所形成的《關於清查“五一六”工作會議紀要》經自治區黨委同意，並以桂發[1971]111號文件轉發至各地、市和柳鐵。由於“左”的錯誤和派性思潮所形成的會議《紀要》，得到了自治區黨委的肯定。（據桂發[1971]111號文件）

三日《廣西日報》發表毛主席關於階級、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論述。（見《廣西日報》）

七日、十五日 自治區黨委常委兩天來連續開會討論區黨委寫作小組給《紅旗》雜誌撰寫的《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學說——學習〈論人民民主專政〉》和《為不斷地強化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學習〈論人民民主專政〉的一點體會》兩篇文章，經區黨委常委會議討論同意發稿。（據自治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區黨委常委會議記錄”）

十九日至十二月上旬 自治區召開了教育工作會議，傳達貫徹經毛主席同意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並以《紀要》中的“兩個估計”，即：解放後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並以這一精神為指導，總結交流了經驗，部署了會後的工作，製訂了全區貫徹執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措施。韋國清在全區教育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同樣是以“兩個估計”的精神，對我區教育戰線的形勢和任務，作了錯誤的分析和部署。他說《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已在全區二十二級以上黨員幹部中傳達貫徹。今天著重談三個問題；一、認清教育戰線大好形勢，吸取兩條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一九六八年九月，我區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配合解放軍戰士組成近十萬名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了大、中、小學校，打破了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改變了學校長期

“一不批、二不鬥、三不改”的嚴重局面。二、充分認識教育革命的重大意義，提高執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線的自覺性。抓不抓教育革命是關係到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抓不抓教育革命是關係到能不能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對資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抓不抓教育革命，是關係到能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大問題。三、全面落實《紀要》，奪取教育革命的新勝利。”《紀要》貫徹執行的後果，是我區廣大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在政治上、生活上受到歧視；教育革命也被引上邪路。（據自治區檔案局1971年檔案材料）

十九日、二十二日 兩天來，自治區黨委連續召開常委會議，討論有關當前階級鬥爭形勢、路線教育以及今冬明春的工作部署問題。宋治平彙報：林彪事件後，階級敵人蠢蠢欲動，十月份案件比九月份上升百分之五十六。其原因是：我們思想跟不上；公安隊伍“新鮮血液”多，破案率低；在執行政策上，對敵人打擊不力。韋國清在會上講話。他說：要全面搞一個對敵鬥爭的意見。對敵人造謠破壞不打擊不行，對敵人不專政不行，勞改犯囂張，不殺幾個不行，對資本主義泛濫要批判。到會人員一致提出對階級敵人要進行鎮壓。許聖亭說：要鎮壓罪大惡極分子，制服敵人，教育群眾。趙茂勛說：要拿出五月份“西園會議”對敵鬥爭的聲勢，打擊敵人。劉重桂說，當前對敵鬥爭在政策和策略問題的掌握上，出現兩種傾向，一是形“左”實右，二是右。韋應機說，當前要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為綱，打擊敵人，為大躍進掃清障礙。會議研究了《當前工作提示》初稿。（據自治區檔案局一九七一年“區黨委常委會議記錄”）

二十一日 百色專區革委會，在極左思潮影響下，將百色鎮壓五十八名四類分子清理遣送到百色、田林縣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隨遣家屬一百三十人。這批人後來（具體時間不清）全部收回百色鎮。（據百色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三日 自治區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主要是針對當前形勢，研究今後要著重抓的幾項工作問題。韋國清提出：對幹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按毛主席“三要三不要”原則：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會議期間，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當前應著重抓好幾項工作的通知》。一、狠抓階級鬥爭，穩、准、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二、加強政策觀念，認真落實黨的各項經濟政策。三、大力搞好基層建設，力爭十二月以前做好生產隊幹部改選工作。四、認真做好實現明年持續躍進的思想發動和物質準備工作，在農村著重批判“四管”和資本主義傾向。（桂發[1971]126號文件）

十二月

二日 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認真學習〈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總結加強黨的領導的經驗的通知〉》。指出：“這一社論，全面、深刻而又簡明地總結了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來，‘批修整風’運動極其豐富的經驗”。學習社論要和認真看書學習、開展革命大批判結合起來，學習社論要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據桂發[1971]126、127號文件）

同日 《廣西日報》第一版發表毛主席關於農村經濟政策的論述。

十五日 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傳達貫徹中央[1971]77號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批示“照發”的中央[1971]77號文件，轉發了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望即組織傳達和討論。（據桂發[1971]131號文件）

二十一日 自治區黨委批轉《廣西壯族自治區中小學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措施》。《措施》要求進一步加強黨對教育革命的領導，加強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對學校的領導和管理，加強教育隊伍的改造和建設，建立一支無產階級教師隊伍，實行工農兵、革命技術人員和原有教師三結合，工農兵教師是教師隊伍的骨幹力量。（據桂發[1971]131號文件）

三十日 《廣西日報》以《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奪取教育革命新勝利》為題，報道了全區教育工作會議的消息。自治區黨委韋國清、韋祖珍、劉重桂、安平生、趙茂勛、陳開路、徐其海、許聖亭、喬曉光、覃應機、宋治平。另外，中央候補委員岑國榮也出席了會議。各地、市、縣、柳鐵黨委和革委會主管教育工作的負責人、教育部門的幹部、大專院校和中等專業學校黨委、革委以及區直各部門、部分廠礦、宣傳隊、貧管會、學校和教師代表六百多人參加會議。會議分析了我區教育戰線的形勢。特別指出：從今年以來有七所大專院校開始招生，出現了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新局面。（見《廣西日報》）

同日 《廣西日報》發表社論《加強黨對教育革命的領導》。指出：“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在深入開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開始從根本上改變，嶄新的無產階級新人在茁壯成長”。“目前，我區大、中、小學的在校學生佔全區人口的六分之一。建國以來，資產階級利用文化教育陣地向無產階級發動多次進攻，當前，這個陣地上資產階級對青少年腐蝕、爭奪和無產階級反腐蝕、反爭奪的鬥爭仍在十分激烈地進行著”。（見《廣西日報》）

三十一日 我區各地廣泛開展群眾性的路線教育總結活動，自治區黨委要求認真總結經驗，堅定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區黨委派出宣傳隊分別到南寧化工廠、南寧第八中學和崇寧縣良永大隊蹲點，總結推廣年終路線教育總結的經驗。各地、市和柳鐵黨委都及時召開了各級黨的會議和舉辦骨幹學習班，層層進行動員和布置，為加強對路線教育總結工作的領導，各地、市成立“路線教育總結辦公室”。（見《廣西日報》）

同日 《廣西日報》轉載中央北京市委寫作小組撰寫的《記住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重讀〈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的序言和按語》。

欽州地區一九七一年間，檔案員黃蘭先、謝森昌清理六萬六千六百一十五份各種文件資料，經楊玉茂（辦事組副組長）批准，由謝森昌、古榮禮押送到北海紙廠處理（溶解成紙漿）。（據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一九七二年

一月

一日至七日自治區革委會舉行第六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學習和討論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元旦社論《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會議期間，還傳達了中央[1971]77號文件（即中共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鬥爭》材料之一）和82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韋國清在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路線鬥爭問題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則是路線教育的重要內容；還批判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黨理論綱領“天才論”，唯心論的先驗論，唯心史觀，以及“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領導班子就是政權”等反動謬論，並說“民富國強”這個反動口號必須批判。在會上發言的還有韋祖珍、喬曉光、覃應樞、許聖亭、陳開路、宋治平等常委（據自治區革委會檔案第十卷）

二日區黨委發出《關於認真學習、堅決貫徹執行中央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的通知》。《通知》說，元旦社論傳達了毛主席極為重要的指示（按：即“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則），要求全區各地迅速掀起一個學習宣傳、貫徹落實元旦社論的熱潮，繼續深入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開展批修整風。發揚理論聯繫實際的革命學風，把元旦社論精神貫徹到當前各項工作中去，並要求各級黨委切實加強學習宣傳，貫徹落實元旦社論的領導。（見《廣西日報》）

四日《廣西日報》發表通訊《柳綱在沸騰，柳綱在躍進》，吹捧在“文革”中殺人的劉目忠，把他譽為“鋼廠鐵人”。經“處遺”查實，劉目忠被判刑。（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廣西日報》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柳州革委會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寫的文章，題目是《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黑標本》，錯誤地批判我區著名壯族作家陸地寫的長篇小說《美麗的南方》。

十五日喬曉光到桂林師院檢查貫徹全國、全區教育工作會議精神。他強調要充分發動群眾，開展大批判、大辯論、分清路線是非，解決教育革命中的一些問題。接著舉行全院批判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會，點名批判張雲堂（院長）、楊江（書記）等人。（據廣西師範大學“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區黨委常委開會討論貫徹中央[1972]2號文件（是中央通知，將[1971]77號文件擴大發至工廠、企業、學校、農村、部隊班排和街道居委會）4號文件（《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主要內容是林彪一夥制定的反革命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5號文件，決定召開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三屆三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深入揭發、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滔天罪行。中央5號文件是供批判用的，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即毛主席是天才，有人反對，不承認毛是天才），中央要求暫時傳到省軍級。區黨委常委決定，先傳達區黨委常委、區革委會黨員副主任以上和軍區軍級幹部。聽了傳達的人對林彪的反動講話進行了專題批判。（據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十卷七號）

二十三日《廣西日報》發表凌雲縣殘酷批鬥老幹部的壞分子李真雲的文章《千頭萬緒要抓綱》。《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二月

二十五日至二月四日區黨委召開第三屆三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到會的有區黨委委員六十五人，候補委員十四人，列席會議的幹部五百七十六人。這次會議主要內容是傳達貫徹中央[1972]4號文件，並繼續深入學習中央[1971]77號文件，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進一步揭發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滔天罪行。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在全區傳達貫徹中央文件、深入開展揭發批判林彪反黨集團打好基礎。會議期間，韋國清、韋祖珍、劉重桂、岑國榮、盛美英和區黨委常委、軍區負責人，以及各地、市委負責同志共三十大人在大會上對林彪一夥制定的反革命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唯天才論、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等進行了聲討、揭發和批判。會議期間，區黨委常委還和各地、市委負責人就回去後的做法進行了研究和部署。韋國清在二月四日的大會上作了批判發言，並提出了幾點補充意見：（一）認真做好培訓骨幹和向群眾傳達的工作，三級幹部會要在春節前結束，春節後向群眾傳達。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地傳達中央文件，逐條逐段地揭發批判林彪一夥的反革命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二）各級黨委要把深入揭發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當作頭一位的大事來抓，抓緊抓好。（三）把揭發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同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結合起來，推動各項工作，創造優異成績。（四）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對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堅決予以打擊。（五）要嚴格執行過去的保密制度，認真做好保密工作。（據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第十卷七號）

五日至上旬各地、市、縣黨委遵照區黨委的部署，相繼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傳達貫徹中央[1972]4號、[1971]77號文件，和區黨委三屆三次全委擴大會議精神。各地、市、縣領導幹部也都在他們召開的會議上作了批判發言。二月中旬以後，在各級領導的帶領下，全區五萬五千多名宣傳隊員，近百萬骨幹隊伍，向城鎮居民和農村社員傳達貫徹中央文件，並和廣大群眾一起，揮戈上陣，口誅筆伐，掀起了革命大批判高潮。（據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第十卷七號）

十日根據一九七一年試點經驗，區黨委向各地、市、縣、柳鐵黨委會發出《關於在城市、縣城的街道鋪開社會清隊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社會清隊的基本做法：第一步，廣泛開展四個大講（講國內外大好形勢，講階級鬥爭新動向，講社會清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講毛主席無產階級政策），搞好思想發動和組織準備，第二步，開展四大、八查，深挖暗藏的階級敵人（“四大”是：大檢舉、大揭發、大清查、大批判。“八查”是：查來歷、查歷史、查成份、查社會關係、查表現、查口音與籍貫是否相符、查年齡與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民生活特殊是否相符）。清理的重點：一是查清帶修反的潛伏特務，以及特務間諜在街道的社會基礎；二是查清反革命現行破壞活動的各種線索、案件；三是把暗藏的和外逃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等清查出來；四是查清歷年來的積案和各種政治事故。第三步，搞好定案處理，整頓基層組織，落實群眾專政，組織居民走“光輝的‘五·七’道路”（桂發[1972]20號文件）

根據區黨委的這個文件，各地、市、縣委都陸續部署和鋪開了社會清隊工作，有的縣則是結合“一打三反”運動和批判林彪反黨集團一起搞的。在清隊中由於亂懷疑、亂揪鬥，搞得廣大群眾人心惶惶，人心自危，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據梧州、柳州、北海、賀縣、資源、陽朔、鳳山、巴馬、環江、都安、羅城、柳城、融水、懷縣、武鳴、天等、崇左、上思、德保、天峨等二十個市縣的不完全統計，在清隊中就揪鬥了二萬八千五百多人，定為偽軍、警、政、憲、特和地、富、反、壞、右等各類人員八千七百六十九人，逼死三百一十多人，還有一些人不堪批鬥而逃跑了的（見各該縣的文革大事記）。全區在清隊中批鬥了歸僑和僑眷三千多人，真正屬於敵我矛盾的只有三人（區黨委常委會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記錄，許聖亭插話）。在清隊中，各市、縣普遍搞了城鎮居民下放農村，美其名曰：走“光輝的‘五·七’道路”。結果到農村後，許多人的住房成了問題，許多人習慣農業生產勞動，所得工分少，工分值又低，於是許多人在農村生活不下去，又慢慢地倒流回城市，而城市又不允許迂回戶口，成了沒有戶口的“黑人黑戶”。僅據桂林市、南寧市和欽州、南寧兩地區不完全統計，倒流回城的“黑人黑戶”即達一萬六千八百多人。（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15卷10號）

十二日，《廣西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第二期文章：《必須繼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學習《論人民民主專政》的一點體會，作者署名是：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寫作小組。

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區黨委常委會討論給中央的報告：《區黨委對林彪死黨黃永勝插手廣西文化大革命的揭發材料》。在會上，常委們揭發，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廣州軍區黨委來電報指示：“廣西要堅決支持‘四二二’”。當時黃永勝是廣州軍區黨委書記，電報是他指示發的。黃永勝還指示廣西軍區要就此問題作檢討。韋國清認為，“由於黃永勝支一派壓一派，造成兩派嚴重對立，挑起武鬥，破壞廣西文化大革命，使廣西受到巨大損失，死人很多，還燒了許多房子，燒了船，對黃永勝的這些罪行，要以區黨委名義單獨寫報告給毛主席、黨中央，並附上電報原件和其他揭發材料。”（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第10卷10、11號）這個報告歪曲了廣西在文革中死人多的真象，蔽蔽了毛主席和黨中央。怎能把廣西在文革中死人多、燒房子多等巨大損失都推給黃永勝一人呢？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廣西革黨、廣西軍區聯合發的所謂“破獲廣西反共救國團”的公告，以及“七三”布告所造成的對一派群眾實行大屠殺，又該誰負責呢？

同日，《廣西日報》發表《柳鋼各級領導深入學習鐵人精神》的報導，又吹捧“三種人”劉目忠。（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三月

二十日至四月十一日，自治區革委會召開了全區計劃會議。到會同志學習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和毛主席批發的關於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的文件，學習了全國計劃會議精神，聲討、批判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了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揭露了我區經濟領域中無政府主義和破壞國家統一計劃的嚴重現象；有擅自動用計劃內產品，拿統配物資搞投機倒把的；許多工廠企業因要派人去搞工宣隊、工糾隊、支農、挖防空洞，以致出勤率嚴重不足，影響生產和營業任務的完成。全區虧損企業達百分之三十，國營農場虧損也很普遍，柳江縣新興農場職工任意吃農場和產品，種什麼吃什麼，養什麼吃什麼，七一年死牛七百五十頭，失牛一百二十頭，虧損達八十六萬元，七二年又造了一個虧損一百八十八萬元的預算，而該場一年發工資才一百二十萬元。大家認為很有必要反對無政府主義和批判資本主義傾向。（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第10卷24號）

二十四日 區黨委發出《關於認真學習“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認真學習和傳達這個談話紀要。當時我區正值春耕大忙，旱情嚴重，先在縣以上領導成員中學習，而後舉辦公社黨委負責同志、宣傳骨幹和機關幹部學習班傳達貫徹，再由國家幹部下到生產隊和黨支部共同向群眾傳達，至五月中旬告一段落。學習中著重領會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則，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為批林整風打下思想基礎。（桂發[1972]45號文件、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第10卷32、34號）

二十五日 桂林師範學院根據區教育局指示，決定審查葛啟桐整理誣陷、攻擊韋國清的材料問題。經核實葛啟桐於六七年一月與李桂、廖明斌等人收集整理所謂韋國清的錯誤材料，列舉了十三條“罪狀”，指責韋國清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破壞文化大革命，勾結羅瑞卿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等。共印四份，送中央文革、中央軍委各一份。師院核心組認為：材料是在批反動路線時搞的，是向中央反映情況，以後未做反黨的活動，表現“很好”，不了了之。在研究安排葛的工作時，院核心組重要負責人說：從培養新生力量考慮，從“文化大革命”沖殺出來的代表性人物應合理安排。決定安排葛當系領導小組組長、黨總支書記。最後區黨委決定安排葛為黨總支副書記。（據廣西師範大學“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至四月十日 區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會議期間，學習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

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傳達討論了在接見廣州地區三省（區）部分負責同志時的指示。會議期間，韋祖珍對自己在廬山會議期間所犯的錯誤作了檢查，區黨委和廣西軍區黨委常委對過去在宣傳林彪問題上的錯誤作了檢查。

四月

五日《廣西日報》刊登“三種人”盤美英（九大中央候補委員，“處遺”時開除出黨）的照片，說她帶領廣大群眾“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前進”。（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六日 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代表區黨委在這次擴大會議上，對過去宣傳叛徒、賣國賊林彪問題上的錯誤作了如下檢查：“1、過去幾年，因迷信林賊，對他盲目崇拜，經常對他進行吹捧、宣傳，充當了他的義務宣傳員。在一些報告和報紙社論中，經常把林賊和毛主席相提並論，吹捧林賊，抬高他的地位。一九六九年區革委會在傳達‘九大’時，說林賊‘學習毛澤東思想最好最好，用得最活最活，跟毛主席最緊最緊’。一九七〇年，區革委會在第一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開幕詞把林賊說成‘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最高最高，跟毛主席跟得最緊最緊最緊，用毛澤東思想最活最活最活，學毛澤東思想最好最好最好’。在《廣西日報》配發的社論上還寫有‘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林副主席，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2、錯誤地翻印、編印林賊的反動言論和吹捧、宣傳林賊的材料。一九六九年，區革委會印發了編有林賊‘語錄’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五十萬冊。廣西日報社編印了林賊的‘言論集’十萬冊，選編他的報告、講話文章共三十五篇。自治區編印的中小學課本中，也有吹捧宣傳林賊的內容。一九七一年七月，自治區舉辦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的展覽中，有一幅仿製大型油畫《井岡山會師》，把毛主席與朱德總司令在井岡山會師，篡改成毛主席與林彪會師。顛倒了歷史，美化了林彪。有些單位還自行翻印關於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的小道資料。據初步清查，全區共發現五種版本，都有歪曲歷史、吹捧林賊的內容。3、在基層建設中，普遍推行林賊的‘四好運動’，干擾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一九七〇年三月，區革委發出了《關於開展四好運動的指示》，錯誤地提出：‘抓不抓四好，是執行不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是大非問題’。‘四好運動’在全區的開展，使一些單位不能正確處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的辯證關係，助長了錦標主義、形式主義等不正之風，影響了‘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方針的全面落實。4、為貫徹毛主席關於要學好唱好《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革命歌曲的指示，區黨委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發出的關於學好唱好這兩首革命歌曲的通知中，錯誤地引用林賊的話：‘教一個好的歌子，實際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課，又是文化課’。特別是在林賊叛國出逃後，又於九月十日在《廣西日報》上發表了這個通知，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據桂發[1972]47號文件）

七、八日晚上 區黨委常委開會，就韋祖珍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所犯錯誤進行揭發批判。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搞突然襲擊，發表稱讚毛澤東是天才，反對所謂有人否認毛澤東是天才的講話。陳伯達在小組會上吹捧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攻擊張春橋等的發言。韋祖珍在不明林、陳等真實用意和過分崇拜、迷信林賊的情況下，在華東大組會上的發言中也說了‘要設國家主席’、‘憲法中要寫上毛主席是我們國家當然的主席，林副主席是我們國家的當然副主席’的言論，並對上海市委提出了不滿的意見。“九一三”事件發生後，韋祖珍認識到上當受騙了，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給周恩來總理寫了檢討。由於韋祖珍在發言中對上海市委表示了不滿，並不指名地批評了張春橋，這就觸怒了江青一夥，在廣州地區三省（區）負責同志座談會上被江青幾次點名批評。在四月七、八日兩晚的區黨委常委會議上，常委們就以江青的談話為依據，無限上綱上線批判韋祖珍，迫使他在四月九日的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上，違心地作了第二次檢查，承認自己“上了賊船”、“犯了反黨、反毛主席、反‘九大’路線的嚴重方向路線錯誤。”（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第九卷2號、第10卷22、23號）

七日在區黨委常委會議上，韋國清指示：過去吹捧宣傳林賊的地市委要作檢查。區黨委的檢查

要發下去。在四月八日晚的區黨委常委會上，韋國清指示：韋祖珍的這次檢討要送中央；這次檢討，連同在北京的檢討要往下發，傳達至縣團級。（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第10卷22、23號）

十日，韋國清在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要求全區各地進一步開展對林彪反黨集團的革命大批判。在大批判中，一是要認真看書學習結合起來，二是把對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同狠抓本地區本單位的階級鬥爭結合起來。他說：當前階級鬥爭的一個新動向，就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利用林彪叛黨叛國事件進行破壞活動和搗亂，有的書寫吹捧林賊的反革命標語；有的呼喊為林陳死黨招魂的反動口號；有的與港特勾結，遞送情報；有的大肆造謠，煽動戰爭恐怖。三是各級黨委要不斷增強黨內外的革命大團結，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正確處理政治與業務、革命與生產的關係，堅持批判資本主義傾向和無政府主義，進一步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深入持久地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奪取工農業生產的更大勝利。（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第9卷1號）

中下旬，各地、市、縣黨委召開了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傳達和學習中央[1972]12號文件，和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精神，揭批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百色地委和軍分區、柳州市委對過去在宣傳林賊問題上的錯誤都作了檢查（見該地、市、縣文革大事記）。

五月

四日，為徹底清查林彪反黨集團在我區的反革命陰謀活動情況，區黨委成立專案辦公室（對外稱第四辦公室），由區黨委常委劉重桂、宋治平負責抓此工作。（桂發[1972]55號文件）

同日，《廣西日報》發表顏景堂（區革委副主任，“處遺”時被開除出黨）的題為《永遠做工農群眾的小學生》的文章。

八日，區黨委常委會議研究討論中央關於召開批林整風會議通知。我區是韋國清、劉重桂、安平生和岑國榮去參加。（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第10卷31號）

十七日，區黨委將專案辦公室綜合整理的《林彪死黨江騰蛟一夥拉攏、控制廣空桂林航修廠，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的情況》向中央專案組報告。報告說：“自‘九一三’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後，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廣空派出工作組到廣空桂林航修廠，發動群眾，揭發林彪死黨的反革命罪行。經過一段時間的清查，問題基本搞清。林彪死黨江騰蛟、顧同舟，夥同前廣空政治部主任查全倫等人，從一九七一年一月開始。對廣空桂林航修廠多方進行拉攏、控制，妄圖使該廠為林賊父子的反革命武裝政變服務。該廠領導幹部中有幾人被拉攏。他們根據江騰蛟等人的黑指示，採取各種手段，強令幹部戰士抄寫林立果的黑報告，把以林副部長為光輝榜樣，做一個好戰士作為新兵入伍的第一課，舉行發林立果黑報告的‘授書儀式’；在廠房、飯堂、宿舍塗寫吹捧林立果的反動標語。他們還根據林立果關於要搞武器的黑指示，製造匕首，陰謀造槍造炮，並組織機動武裝，加強陸戰訓練，積極為林賊父子的反革命武裝政變作準備。

林彪叛國外逃事件發生後，遵照中央指示，廣西軍區於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派出工作組到廣西民航局，傳達貫徹中央[1971]57號文件，發動群眾揭發林彪死黨在廣西民航局進行的反革命陰謀活動，並對有問題的人專門舉辦學習班，進行審查。同時，對林彪死黨在廣西其它一些單位進行的反革命陰謀活動，也加強了專案鬥爭。從一九七〇年十月以來，廣西民航局的一些領導成員組織幹部群眾大學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報告（全局人手一冊，計十一種版本），極力吹捧林立果，提出“學習不走樣，緊跟不掉隊，執行不含糊，照辦不動搖”對幹部群眾毒害很深。他們還進行反黨的宗派活動，培植親信，排斥異己，積極為林家父子搞反革命政變作組織上的準備。

報告還說：“一九七二年以來，全區發生各類反革命案件一百七十五起，共捕反革命分子一百二十八人。這些人中，有的無恥吹捧林賊，狂叫要向林賊學習，向林賊致敬，做林賊的好學生。”

靈山縣反革命分子梁必強，聲稱要改名為“梁彪”，其未婚妻改名為“朱群”以示效忠林賊。有的和反革命《“五七一”工程紀要》共鳴，惡毒攻擊我黨和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叫嚷“這個綱領寫得好”。有的散布謠言，妄圖製造混亂，有的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有的主動與敵特機關掛鉤，向帝修反遞送林彪一夥叛黨叛國的情報。如反革命分子潘位峰，從廣州竄到梧州，以假名字將中央68號文件的內容寫信報告蔣特機關，並隨即逃離梧州。案件發生後，梧州市委發動群眾，很快就查出了犯罪分子。還有的五類分子不服管制，抗拒改造，乘機翻案，夢想變天。（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第12卷32、34號）

（注：這些問題處遺時如何解決的查不到資料）。

六月

十三日，區革委會發出我區九所高等院校開始秋季招生的通知。強調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要認真選送優秀的工農兵上大學，要認真執行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復審的辦法。（區革委會一九七二年檔案第8卷二、三、四號）由於取消了文化考試，招收入學的學生有高中文化的，也有初中文化的，甚至有初小文化的，學生文化程度參差不齊，給教學帶來了很大困難，也給一些人“走後門”開了方便之門。

十六至十九日 河池地區召開學習韋江歌先進事跡經驗交流大會，進一步搞好思想路線教育，把無產階級專政任務落實到基層。（韋江歌過去在部隊時確實做出了不少成績，為人民立了功。但“文革”期間，一些領導在組織學先進中，卻把他當作推行左傾路線的工具，損害了這位先進人物。）

七月

四日至八月六日 區黨委召開三屆四次全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中央批林整風真報會議精神，進一步深入揭批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罪行，推動我區批林整風運動全面開展。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區黨委委員、候補委員，區革委會委員中的黨員，各地、市、縣、柳鐵黨委和縣、市人武部的負責人，區直機關小組長以上幹部，以及部分離退休老幹部和基層幹部，共九百一十五人。中央候補委員岑國榮、盤美英（此二人“處遺”時均被開除出黨）也參加了會議。區直機關、南寧地、市和南寧駐軍的縣團級（包括十八級）以上黨員幹部共四千零一十五人聽了傳達報告。

韋國清、劉重桂、安平生等傳達了中央會議精神。到會同志用十三天時間，著重學習了《我的一點意見》、《毛主席給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學習了文化大革命前後部分中央文件，閱讀和討論了中央[1972]24、25號文件。接著用十天時間揭發和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罪行。著重批判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四〇年七月在蘇聯發表的反黨文章《論短促突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關於幹部路線問題的講話等反面教材。接著用四天時間進行整風。

三十日上午，韋國清代表區黨委常委作了關於過去在工作中宣傳林彪問題上的錯誤的檢查。他首先檢查自己的錯誤，他說，過去由於自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低，對林彪的反革命兩面派的猙獰面目辨別不清，錯誤地認為他“一貫正確”、“一貫高舉”、“一貫緊跟”，對他盲目迷信崇拜。當他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製造謠言和採取詭辯的手法，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時候，自己毫無警惕。加上林賊死黨葉群、李作鵬在中南組製造謠言，大肆放毒，而我不作階級分析，不經調查研究，便在小組會上跟著起鬨，亂放炮，受了他們的騙，上了他們的當，犯了錯誤。又如林賊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本來是個大毒草，但自己卻

辨別不出來，當時還認為他講得好。

（韋國清代表區黨委常委作的《關於過去宣傳林彪的錯誤的檢查》與四月初在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內容相同，故略）

三十日下午，韋祖珍在大會上檢查了自己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所犯的嚴重方向路線錯誤。

（與四月下旬在區黨委常委擴大會上的檢查相同，故略）

伍晉南、鍾楓、閻光彩、段遠鍾在他們各自所在地、市大組會上作了整風檢查。

三十一日，南寧市委書記肖寒、許世准在南寧市大組會上檢查過去幾年中，對林賊盲目崇拜，經常吹捧，做了他的義務宣傳員的錯誤：大搞“三忠於”活動；把林賊的話與毛澤東思想等同起來，對他的黑指示從不懷疑，並廣為宣傳；濫印“資料”，擴散影響。一九七一年八月，從小道找來一份關於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的材料，如獲至寶，未經請示。就編入《學習資料》，翻印了三萬餘冊。原市輕化公司革委會翻印了《黨史資料》四萬八千多冊。一九七一年在市革委會舉辦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展覽中，仿製了一幅大型油畫《井岡山會師》。這些資料和畫歪曲了歷史，吹捧了林賊，流毒甚廣。南寧市還推行了林賊炮製的“四好”運動。（見區黨委三屆四次全會擴大會議文件）

參加會議的軍隊幹部和三支兩軍的負責人還學習了中央[1972]28號文件，文件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抓軍隊工作，無非是路線學習，糾正不正之風。”軍隊幹部檢查了三支兩軍人員中有人因成了地方某個單位的領導，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產生了優越感，認為自己高人一等，於是生活特殊化，佔用地方房屋，貪大求洋，鋪張浪費、請客送禮、走后門等不正之風也滋長起來。（見區黨委三屆四次全委（擴大）會議簡報）

百色地區大組會上，有位同志說：“在林賊‘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的毒害下，有一段時間，政治工作大搞形式主義，熱衷於早請示晚彙報，背警句，搞講用，雷打不動。災情嚴重，不組織力量抗災；季節大忙，不動員群眾突擊搞生產，耽誤了農時，影響了生產。評工分時，不看勞動態度和質量，不講實效，只看‘警句’背得多少，‘講用’好不好，出現了會說會唱的人吃得開，老實肯幹的人受氣，嚴重地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有些地方曾一度大搞‘大紅洋’、‘語錄牌’、‘展覽會’、大搞‘三忠於’活動，浪費許多人力、物力。”西林縣劉章全同志說：“由於受林賊的毒害，我們曾動用了水利經費四萬多元來搞‘三忠於’活動，影響了水利建設”。靖西縣的同志說：“由於大搞突出政治，不抓生產，靖西縣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糧食產量比一九六六年減產了四千多萬斤”。（見區黨委三屆四次全會擴大會議文件卷二）

貴縣革委會的郭世公在玉林地區大組會上檢查時，把文革中被打死者遺囑到縣革委會門口申訴、控告，提出“還我丈夫”、“還我兒子”的現象，說成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在背後煽動群眾鬧事”。以此來印證“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按：貴縣在文革中被打殺和迫害死三千一百多人，使許多人成了寡母寡婦。郭世公卻還要給這些遺囑扣上“被階級敵人煽動鬧事”的帽子，真是中左傾路線的毒太深，這樣的檢查只能越查越“左”）。凡是反左的東西，在當時都被說成是“階級敵人破壞”，叫做“路線覺悟高”。這是當時的指導思想。

八月

四日，劉重桂在大會發言中強調：“各地根據區黨委的部署，在進行路線教育的同時，認真抓階級鬥爭，打擊利用林彪叛黨叛國事件進行破壞活動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繼續抓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和開展社會清隊工作。”“必須進一步增強階級鬥爭觀

念，密切注視階級鬥爭新動向，繼續以批林整風為綱，狠抓階級鬥爭，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他說：“融安縣最近破獲一個所謂‘中華人民救國軍林彪野戰部隊’反革命集團，就策劃過搶糧、搶錢、搶槍，上山‘打游擊’，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按：這是造謠。“處道”中，融安縣未發現有此案。）因此還要繼續抓好“一打三反”運動，重點仍然是打擊反革命現行破壞活動。同時要認真抓好經濟領域裏的階級鬥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重點是四個市和區直機關單位。現在正在逐步深入。（區黨委三屆四次全委擴大會議主要文件）

六日，韋國清在區黨委三屆四次全委（擴大）會議上作總結發言。對全區進一步開展批林整風運動作了具體安排，要求各級黨組織在今後一個較長時間內，仍然把批林整風運動當作頭等大事來抓。在八月十五日前後，用半個月左右的時間，以市、縣為單位，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吸收車間和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以上幹部參加，培訓骨幹。九月份陸續在群眾中傳達貫徹。（共黨委三屆四次全委擴大會議主要文件）

中、下旬至九月初，全區各市、縣委根據區黨委的部署，都召開了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議，和區黨委三屆四次全委擴大會議精神，開展批林整風，培訓骨幹、組織宣傳隊伍。九月下旬開始深入大隊、生產隊，向廣大群眾傳達，到十月底或十一月上旬，基本告一段落。

在批林整風中，各地根據“要狠抓階級鬥爭”的指示，連續召開公判大會，批鬥“有破壞活動的階級敵人”，實際是批那些對當時現狀不滿的人，整風也是整那些“路線鬥爭覺悟不高”的人。據不完全統計，百色地區就批鬥了“有破壞活動的階級敵人”一千三百多人；鳳山、天峨、欽州、靈山、天等、隆安、岑溪、藤縣等八個縣批鬥了一千六百三十八人，宣判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的一百二十九人；玉林縣則把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多人列為專政對象，交由群眾專政。有五十多人被拉去全縣各公社搞巡回公判。事實證明，這些被批鬥、被專政的、被公判的，都是錯案、假案。

十二日 區黨委常委開會聽取區黨委專案組辦公室彙報清查林彪反黨集團情況，並向中央報告。報告說：“從一九七〇年九屆二中全會後，有林彪死黨江騰蛟等十六人到過廣西，有八人被他們拉上了賊船，接受交底，陷得較深的共有七人，沾邊的有八人。”

空七軍黨委積極傳達布置學習林立果的講用報告。軍黨委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團以上幹部傳達林立果的報告，並要聽報告的幹部很好地把林立果的報告向幹部、戰士傳達。八月四日還專門作了布置。空七軍查出有吹捧林立果、林彪的黑報告有十幾種，共二萬九千八百零九冊，還有周赤萍、王輝球的報告。全軍幹部、戰士、家屬小孩人人都有林立果的報告。這些報告有許多是在廣西翻印的。鹿寨縣印刷廠承接空軍“五·七”幹校印了二萬五千冊；桂林印刷廠印了二千冊，是空五、六團要印的。空七軍還在排以上幹部中傳達了“一切聽林立果指揮，一切服從林立果”，“林立果可以調動空軍的一切，指揮空軍的一切”。空九師印有《胸懷朝陽保安全》，還有林立果所謂的五次指示，以及向林立果學習的五個方面的材料。一九七〇年九月三十日，空高炮九師在傳達時說：“對待林立果問題是對待毛主席態度問題。憑林立果這報告，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毫無遜色。”空四十二師和廣空桂林航修廠，提出對林立果的報告要學、抄、背、講用，說什麼“學、抄、背一次，就增加一次感情”。一九七一年八月，空軍在寧明機場搞了一個“天上能打，地下能戰”的試點，是按林立果的指示去搞的。廣州還發了一百多支槍給他們搞訓練。空七軍黨委作過研究，原定訓練三個月，實際只搞了一個多月，“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不了了之。（據中央“林彪事件”專案組最後審查結果表明，廣西沒有林彪死黨。）

九月

廿一日，《廣西日報》發表《北碚鹽場勤儉辦場》的文章，吹捧“三種人”黃乃賢。（廣西日

報社“文章”大事記)

十六日、二十六日，區黨委常委兩次開會，討論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亂打死人情況給中央的報告。一九七二年以來，我區各地不少在文革中被打死或被迫害致死的遺孀上訪上訴頻繁，有的甚至向中央申訴，迫切要求給死者正確定性平反和懲處殺人凶手。中央責成區黨委處理，並把廣西在文革中死人的情況向中央報告。區黨委常委們對此問題顧慮重重，極力掩蓋亂打死人的現象，歪曲造成亂打死人的原因，縮小死的數字。韋國清說：“處理亂打死人的問題，政策性很強，弄不好會反覆，這是一件大事，處理了一個就聯繫到一派問題，所以必須十分慎重。”安平生也說：“對這個問題，只要人家不告狀，就不要把這件事再搞了，要息事寧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四類分子被打死就算了，不作處理了。”他們把造成亂打死人的原因統統歸咎於“叛徒賣國賊林彪和陳伯達、王、關、戚以及在廣西的爪牙的嚴重破壞和干擾，挑動武鬥”所致。對於廣西革籌、廣西軍區發布揪“反共救國團”通告，和號召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所造成的全區性的大屠殺，隻字不提。對於“七三”布告造成的亂打亂殺，則說成是由於“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革命的大聯合，竭力阻撓自治區革委會的成立”，使“廣大革命群眾極為憤恨，以中央‘七三布告為武器，向他們發起了猛烈進攻。……”還有六八年連續向中央發出幾十封電報，其中不少是要求派部隊圍剿“4-22”派，出現大量殺“俘虜”的事也隻字不提。對於死人的數字，韋國清說：“死人的數字，我的意見還是要保留。我過去給中央講過了四萬多人，其中幹部和群眾一萬二千多人。”因此，十月二十二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仍然寫：“據初步統計，全區被亂打死的約四萬四千多人，其中五類分子兩萬七千多人，五類分子的家屬子女五千多人。”（按，這個報告既蒙蔽了中央，又欺騙了群眾。經過處遺核實查清，“文革”中全區共打死、逼死八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人。）對處理亂打死人的問題，定了四條辦法：一、反覆強調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不能搞派性，必須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二、要把亂打死人這筆帳記在“劉少奇”、林彪、王、關、戚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曾希明、謝王尚之流”和社會上一小撮階級敵人身上。三、對死者家屬子女，不管是哪一派的，堅持一視同仁，政治上不歧視，工作（生產）上作好安排，生活上有困難的，均用社會救濟的辦法解決（這些都是空話，沒有人執行，上訴都受到打擊）。四、通過各項政治活動，加強對幹部群眾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教育，不斷克服資產階級派性，增強無產階級黨性，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逐步解決亂打死人的問題。”（區黨委1972年檔案11卷5號、8號）

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召開的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上，韋國清對到會的同志講話中，又說：“關於六七，六八年期間我區發生亂打死人的問題。給中央作了一個報告，同志們也看了這個文件。這是告訴你們，領導上掌握處理這些問題的四條辦法，讓領導同志心中有數，不是要你們去宣傳這四條辦法，宣傳打人要落實政策，不是這個問題，你去宣傳這個東西，弄不好還會挑起派性。所以只告訴你們心中有數。這個是上報中央的。是讓你們掌握這個政策，遇到找上門來了，你心中有數，有四條辦法可以做好工作，進行個別處理。處理這個問題不能大張旗鼓，現在不是時候，就是以後，也是個別找上門來個別解釋處理，要防止‘壞人’挑撥離間，挑起‘派性’。”（區黨委1972年檔案11卷43號）這段話正好說明當時的區黨委領導根本不打算認真處理文革中亂打死人的問題。在玉林專區就發生過下邊處理打死人的問題。區黨委肖寒等去與下邊作難。因此，上述會議以後，有些市、縣在落實政策中，把一些原來定為“敵我矛盾”的死者，改為“非正常死亡”了事。受害者這層當然不服，多年來，仍頻繁地到上級黨政機關和黨中央申訴，迫切要求平反和處理冤假錯案。直到八三年，開展“處遺”工作，這些問題才得到徹底解決。

十月

四日，巴馬縣最後一名“政治土匪”林大強在立德大隊被抓獲，就地槍殺，至此，為時二年多，耗資數萬元的“巴馬剿匪”宣告結束（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日，區黨委和區革委聯合發出通知，將自治區最近召開的農業學大寨會議討論紀要。即

《目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中提出的一些問題》（草稿），印發給各地、市、縣及柳織黨委和革委會，通知要求組織一定力量以縣為單位，選擇一個公社或若干大隊作為試點，貫徹實行文件所提出的各項意見。試點工作要求在十二月下旬結束。《紀要》（草稿）共有十四條，對當前農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階級鬥爭問題和加快農業發展步伐、勞動管理、財務管理、農田基本建設、體育事業等，提出了較全面的意見。要求以批修整風為綱，總結農業學大寨的經驗，肯定成績，克服缺點、錯誤，解決存在問題、加快農業發展步伐，使“農業學大寨”運動迅速而健康地發展。（桂發[1972]123號文件）。隨後，各縣成立了“農業學大寨”辦公室，開展試點工作。十二月中下旬，各縣召開了“農業學大寨”經驗交流會。十二月二十五日，區黨委、區革委聯合發出《紀要》通知，全面開展貫徹實施《紀要》的工作。

十三日至二十六日，韋祖珍先後到東興、欽州、合浦、上思、北海等縣（市）視察工作。九月欽州地委派人前往北海調查韋祖珍的“三反罪行”，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和三份附件一併送區黨委。（據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月至十一月，桂林師範學院根據《人民日報》“奪取新的勝利”，以及批判極左思想和無政府主義方面的文章，在全院開展了對林彪極左路線的批判，整頓教學秩序，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解放了一批幹部和教師。

十一月

八日至十二月二日，桂林市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在南寧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市委書記於海學、副書記曹傑，常委王汝保、劉竹溪、鍾秀琛、蘇玉山、董鳳林、董正華、鮑德福，委員楊遠發，王鳳枝、吳懷禮、李年生、曾明軒，候補委員曹鐵軍，機關黨員幹部胡松鶴、孟兆德、王義傑等十八人。

區黨委書記韋國清、副書記韋祖珍、劉重桂、安平生以及其他常委都參加了會議。韋國清在會議期間作了多次講話。會議主要是解決桂林市委常委在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和執行黨的政策中存在的問題。會議結束時，寫了一個《中共桂林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紀要》。

韋國清在十二月二日的講話中對桂林市委在執行政策中所犯的錯誤提出了批評。（一）一七九〇年四月，在“一打三反”運動的大清查中，曹傑犯了擴大打擊面，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錯誤，提出對所有的懷疑對象都進行搜查。開始，市革委會部分常委決定清查三千戶，這個面已經過寬了，而桂林市委副書記曹傑又自作主張，提出“翻一番”。在行動過程中，還提出了“乘勝前進，跟蹤追擊，擴大線索，挖地三尺，大殺回馬槍”的錯誤口號，結果搜查了八千多戶，有六百多個同志出去搜查別人，自己的家又被別人搜查。這就傷害了廣大幹部、群眾的感情，影響了革命團結，損害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二）一九七〇年五月，桂林市醫藥站搞的所謂反革命殺人集團案，是一個假案、錯案，輕率地把五位同志隔開審查達兩年零兩個月之久。在審查中又搞逼供信，嚴重違犯了黨的政策，在政治上造成了極其不良的影響。（三）一九七〇年，桂林市辦第三期公檢法學習班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對公檢法存在的問題看得過於嚴重，缺乏一分为二的觀點，在執行政治上出現了偏差：一是擴大了打擊面；二是搞刑訊逼供，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自己的同志，共鬥爭了七十多人，後又把這些幹部當作工人下放到工廠；三是讓判處死緩、後來寬大釋放的反革命分子舒道南到學習班去作所謂學毛普講用報告，還號召學習班的同志們向他學習，走他的路。完全顛倒了敵我關係，這是嚴重的立場錯誤。當時在林彪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毒害下，對公檢法作了錯誤的評價，有其影響。要考慮當時的歷史條件，實事求是，不要過於追究個人責任。”（區黨委1972年檔案9卷4、5號）

但是，這次會議對桂林市一些派性較重的人的派性活動，沒有給予應有的批評和幫助。會後一

些人對軍隊的個別同志在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揪住不放，影響了團結，使一些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見桂林市“文革”事記）

二十七日，區黨委向毛主席、黨中央作了《關於我區傳達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議文件的情況報告》。報告說：“根據中央指示，我區各級黨委都把傳達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議文件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在這次整風學習中，主要抓了以下幾個問題：（一）批判林彪的“階級鬥爭熄滅論”、“路線鬥爭消失論”，進一步認識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對階級鬥爭抓得更緊了。（二）批判林彪污蔑馬列的書“多”、“遠”、“洋”和反動的“三十字”方針，進一步認識“認真看書學習”的重要，改變了多年不讀馬列的狀況。（三）批判林彪唯心論的先驗論，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改進了領導作風。（四）批判林彪“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的反動謬論，堅持政治與實踐的統一，更好地落實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區黨委1972年檔案11卷31號）

十二月

十六日，區黨委批轉了區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關於做好事件結案和個人定案處理工作的幾點意見》。希望各級黨委結合具體情況貫徹執行。（桂發[1972]141號文件）

二十八日，區黨委召開貫徹執行中央[1972]45號文件、進一步落實黨的政策會議。到會同志聯繫本單位的實際，擺了一些政策不落實的情況，如有的在案件定性處理上有偏寬偏嚴現象；有的以勸退為名，隨便開除職工；有的對扣發的工資該補發的沒有補發，抄家抄走的財物該退回的沒有退回，反映較多的是戶口問題，許多下放農村倒流回城的人和部分由農村來的職工家屬，沒有戶口，成了黑人黑戶。（區黨委1972年檔案15卷10號）

一九七三年

一月

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新年賀詞》。傳達毛主席“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的講話。強調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

三日至十四日《廣西日報》在顯著位置連續刊登都安縣農業學大寨事跡和評論員文章。（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六日至十日《廣西日報》在第一版《千山萬嶺盛開大寨花》的通欄標題下連續發表長篇通訊《為世界革命開山造地最幸福》、《與天鬥其樂無窮》、《開出萬代幸福泉》、《萬里長征第一步》報導都安學大寨開石海、開地下河、劈山造地“事跡”。

十三日至三月六日《廣西日報》開設專欄號召全區向都安學習。都安縣委發出“關於全區學都安、都安怎麼辦？”號召以批修整風為綱，全民動員加快學大寨步伐，為實現今年每人有糧八百斤、生豬發展到八十萬頭、山羊發展到五十萬隻奮鬥。再一次提出不切實際的口號採取多報產量的辦法欺騙自己，引起群眾不滿。（據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五日，廣西師院黨的核心小組會議決定，要充分發動群眾；集中力量批判極右。從此不再提批“左”。提出強調批判極右要聯繫學院教育革命實際，批判教育革命中的“右傾思潮”。從而使一些對“兩個估計”（即解放後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和“工、農、兵學員上、管、改”有不同認識和看法的幹部、教師再次受到批判。（據廣西師範大學“文革”大事記）

十日—二十一日自治區宣傳工作會議在南寧舉行。參加會議的有全區各地、市、縣、柳鐵、區直機關、大專院校及部分廠礦政工組、宣傳小組的負責人，共一百七十五人。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劉重桂在會上講了話，自治區黨委常委許聖享、喬曉光分別作了關於本年宣傳工作任務、當前國內外形勢的發言。會上各單位就一年來批林整風、“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以及新聞報道工作等情況作了彙報。這次會議確定一九七三年全區宣傳工作的“主要任務”為：動員全區廣大幹部和群眾把批林整風這個“頭等大事抓緊抓好”。繼續進行以“三項基本原則”為重要內容的“路線教育”。“認真吸收兩條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警惕和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沿著黨的‘九五’路線繼續前進。（據區黨委桂發[1973]5號文件、二十七日《廣西日報》）

二月

十一日自治區召開全區工業學大慶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各地、市、縣和柳州鐵路局的負責人，各地廠礦企業的領導幹部、老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代表，以及區直有關單位人員。自治區黨委、革委會和廣西軍區負責人韋國清、韋祖珍、劉重桂、陳開路、許聖享、喬曉光、覃應機、宋治平等出席會議。陳開路、喬曉光和覃應機分別作了報告和會議總結。北碚鹽場、梧州市鍋爐廠、八一錳礦等單位在會議上介紹了學大慶的“先進經驗”。會議認為，在工業生產、建設中，必須堅持

“以綱為綱”，帶動整個工業的發展，盡一切努力，把鋼鐵生產建設搞上去。（據《廣西日報》、《當代中國的廣西》附錄“廣西壯族自治區大事記”）

四月

二日自治區革委會批復南寧、桂林市革委會關於撤銷工人糾察隊的請示報告，同意撤銷該兩市的工糾隊。（建立工人糾察隊，名為保衛紅色政權，實則做了大量違法亂紀的事，搞了大批冤假錯案。（詳見南寧市、桂林市“文革”大事記）（據區革委桂發[1973]60號文件）

四月，中共百色地委作出決定，要求全地區學習田陽縣田州公社那塘大隊的“先進事跡”，進一步開展“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是月，《廣西日報》第一版以《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為題，從十八日至二十三日，連續報道了那塘大隊學大寨的“事跡”。（見四月十七至二十三日《廣西日報》）

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那塘大隊黨支部副書記盧永興當選為十大代表，出席了這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十大”會議結束後，盧永興根據地委安排，先後到田東等十個縣作傳達報告（注：盧永興系大隊副支部書記兼民兵營長，因貪污腐化於一九七五年逮捕法辦，判有期徒刑七年）。（據田陽縣“文革”大事記）

五月

二至十二日自治區召開全區計劃會議。會議提出一九七三年的主要經濟指標為：糧食一百九十五至二百億斤，花生三百萬擔，甘蔗六千四百萬擔，生豬存欄一千一百萬頭，水產品十四萬噸，鋼十八萬噸，鋼材十萬噸，生鐵三十五萬噸，煤三百八十噸，發電量二十六億五千萬度，木材一百二十七萬立方米，化肥八十萬噸，豐收——37型拖拉機三千二百台，機製糖十九萬噸，鐵路、公路、航運貨運量二千六百四十萬噸，財政收入九億五千五百萬元。關於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方針，會議提出農業要“以糧為綱，力爭一九七四年全區糧食平均畝產跨《綱要》；工業則要“以鋼為綱，帶動整個工業的發展”等。（據區黨委桂發[1973]53號文件）

二十日《廣西日報》三版半版篇幅轉載《紅旗》半月刊登顏景堂的文章《全心全意同工農相結合》。（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二十五至三十一日共青團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五代表大會在南寧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一千二百一十八人，列席代表九十二人。自治區黨委和革委會負責人韋國清、劉重桂、安平生、趙欣然、趙茂勛、陳開路、徐其海、許聖享、喬曉光、覃應機、宋治平等出席了會議或大會的開幕式、閉幕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安平生在會上作報告，報告總結我區青年工作的“成績”說，七年來，全區有十六萬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四千多名工農兵青年進入大學，有四萬三千多名團員加入中國共產黨，四十四萬多青年加入了共青團，一大批“優秀”青年被選進各級領導班子。區黨委常委喬曉光在會上作了“形勢報告”。二十一名代表在大會上發言，總結交流“深入批修整風”、“與工農相結合”及“加強團組織建設”等方面的經驗。大會“選舉”產生了共青團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五屆委員會，委員八十二名，候補委員十二名。並經第一次全體委員會“選舉”、自治區黨委批准產生了常務委員會，常委十八人。梁吉泉（“文革”前為都安縣百旺區妙田大隊小學教師、百旺區共青團專職幹部。“文革”中參加造反，入黨陞官，先後任中共都安縣委常委，團中央“十大”籌備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都安縣委第一書記，自治區民委辦公室副主任。一九八五年定性為“三種人”，清除出黨，撤銷原任職務。）、顏景堂（廣西大學土木工程系六四屆學生，一九六七年九月任群眾組織“廣西聯指”指揮部總指揮，積極組織，策劃武鬥，造成嚴重後果。後任柳州工程機械

廠黨委副書記。一九八四年因其“文革”中犯有嚴重罪行，被撤銷職務，清除出黨，追究刑事責任）、唐以豪（“文革”前梧州市澱粉廠鍋爐工，“文革”中參加造反，為一派群眾組織頭頭，曾參與密謀策劃殺害對立派人員。一九八五年一月由梧州市萬秀區人民法院判劉有期徒刑十五年）等六人任正副書記。（據見三日、二十六日《廣西日報》；區黨委桂發[1973]81號文件）

二十九日 都安縣革委在《都安各族人民團結戰鬥治山治水情況簡介》宣布；七二年糧食達四萬九千萬斤。從六八年——七二年向國家提供一萬二千萬斤，其中七二年提供四千三百萬斤，由缺糧縣變餘糧縣。到本年十一月份查明都安縣虛報糧食產量：七一年虛報四百六十八萬斤，七二年虛報五千六百四十七萬斤，七三年上半年虛報六千零七十五萬斤，七四年虛報三千二百五十六萬斤，七五年虛報四千二百七十四萬斤，七六年虛報二千六百七十九萬斤，七七年虛報一千三百九十八萬斤，七八年虛報三百六十一萬斤，共虛報二萬五千萬斤。（據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三十一日 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發出《關於加速小化肥工業建設的通知》。該《通知》說，為“加速小化肥工業建設的步伐，經與上海市協商，今年他們（上海）幫助我區製造年產三千噸小氮肥設備二十一套；自治區也計劃自制一批小磷礦粉設備和部分小氮肥廠擴建設備。這些項目都準備在今明兩年建成投產”。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區革委會再次發出《關於認真抓好小化肥建設的通知》說：我區委託上海加工的二十年產三千噸和六年產五千噸擴建到一萬噸合成氣設備已陸續到貨。要求各地積極創造條件，儘快施工，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到十月間建成投產。然而以後的實踐卻證明，由於我區小化肥工業在缺乏原料和技術力量的前提下，不顧客觀條件的限制盲目上馬，“遍地開花”，造成後來虧損嚴重和財務上的重大負擔。（據區革委會桂發[1973]82號、171號文件，九月十六日《廣西日報》）

五月，全區地、市、縣黨委根據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精神及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指示，紛紛傳達和動員本地幹部群眾“揭發批判”原區黨委書記韋祖珍的所謂“罪行”。這一“批判”一直延續到次年，並達到了高潮。一九七四年四月中旬到五月底，區黨委在全區範圍內多次批判區黨委書記韋祖珍。四月十七日，自治區機關黨委召開批林批孔大會，深入揭發批判韋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嗣後，南寧、百色、玉林、河池、欽州、梧州等地，市相繼召開深揭狠批韋祖珍大會；區總工會、區婦聯、區團委分別於五月上旬發出號召書，動員發動全區工人階級、婦女、青年堅決把批林批孔鬥爭進行到底。之後，口誅筆伐韋祖珍遍及廣西城鄉。

二十五日，河池地委召開常委擴大會，吸收各部委辦領導參加，議題是：“聯繫實際揭批韋祖珍”。會後，席雲山（地委副秘書長）等聯名寫揭發所謂韋祖珍於一九七一年八月間在南丹主持召開的一次有預謀的反革命會議的大字報，標題是《是巧合？還是陰謀？》，地區公安處韋桂用等貼出與上內容相同的題為《揭露“三國四方會議”內幕》的大字報，在地直機關轟動一時，影響大，致使一些同志受牽連打擊，是為“三國四方”事件始末。五月五日至十二日河池地委擴大會傳達韋國清指示，用三天時間對韋祖珍一九七一年七、八月河池一行發表“反動言論”聯繫實際進行批判所謂《突出問題十八例》。五月中旬，根據區黨委精神，地委三次擴大會議，各縣成立清查小組清查韋祖珍的問題，地委組織三個組進行調查。三月三日地委再次進行批韋祖珍。在此期間河池地區收到揭發韋的材料七十九份，其中地、縣主要領導寫的十四份。歸納為“三大罪狀”：1、污蔑社會主義大好形勢和建設。2、醜化基層幹部、群眾；3、含沙射影攻擊自治區領導。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事件。五月下旬，在區黨委常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上，給區黨委書記韋祖珍戴上“上了林彪反黨集團賊船”、“來廣西進行反革命奪權”、“全盤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績，惡毒咒罵、醜化廣大幹部、群眾”等帽子。韋祖珍到廣西工作後，曾到全區五個地區、二個市、三十七個縣和區直一些單位作調查研究，對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和問題進行了中肯坦率的批評。在批林批孔中，區黨委把他工作中提出的批評和意見，當作是對黨和社會主義的惡毒攻擊，並把他對老革命根據地和山區工作提出的積極意見，以及指出山區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點和落後現象（即所謂十八例等）作為污蔑廣西大好形勢來批判，這是完全錯誤的。它不僅轉移了各地清除林彪極左影響的注意力，同時，又使當時山區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堅持下來，給後來山區工作造成很大困難。十

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過撥亂反正，查明這是一個冤案，區黨委《關於韋祖珍同志在廣西工作期間問題的結論報告》於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報請中共中央審批，為韋祖珍平反，並恢復名譽。（據柳州市、河池、百色地區、東蘭縣等地“文革”大事記綜合，《廣西日報》，“韋國清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在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桂發[1981]46號文件）

六月

二十至二十六日 廣西壯族自治區工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南寧召開。大會開幕式由郭耀卿主持，岑國榮致開幕詞，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在開幕式上講話。大會期間，三十二名代表介紹經驗或作了書面發言。大會通過的《工作報告》和《決議》認為：“我區工人階級在‘文革’中，高舉‘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旗，英勇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並派出自己的優秀代表，開進上層建築各個領域領導門、批、改，使教育事業及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出現了嶄新的面貌”。大會選舉產生了自治區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八十五人，候補委員十三人。經第一次委員會選舉和自治區黨委批准，總工會常委十七名，主任岑國榮（柳州鋼鐵廠工人，“文革”中先後擔任區總工會主席，區黨委常委等職務，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免去其區黨委常委職務，一九八二年九月免去其區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職務，一九八五年五月區黨委下文定其為造反起家、幹了壞事，情節嚴重，決定開除其黨籍，按一般幹部分配工作），副主任郭耀卿（南寧糖紙廠幹部，“文革”中任南寧市總工會主任兼區總工會副主任，區輕工局黨組成員、副局長等職，一九八五年元月二十一日區組織部下文：定郭在“文革”中犯有錯誤，免予處分，免去其區輕工局黨組成員、副局長等職務，按“文革”前職務另行分配工作）、李家海（南寧橡膠廠車間指導員，“文革”中積極參加武鬥，一九六八年六月，廣西“聯指”攻打水電設計院“火種”據點，李為前線指揮部總指揮），陳啟品（南寧鋁廠工人）、韋世經（南寧港務局服務員）、林福文（南寧船舶廠工人，一九六九年二月因男女關係問題被免職）、鄧文光（區建一公司工人，“文革”中任區革委會常委兼區總工會副主任，一九六八年六月故意殺人，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由南寧興寧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羅美念（田陽絹紡廠工人）、何庶民（區總工會副主任）、趙玉馨（梧州火柴廠黨委書記）。（據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廣西日報》，區黨委桂發[1973]80號文件）

七月

八日 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貫徹執行中央[1972]32號文件的指示》，要求各地遵照中央32號文件精神，結合我區的具體情況，分期分批撤出“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人員。從七月份起，全區各地、各單位的“三支兩軍”人員除部分留地方工作外，其餘全部陸續撤回部隊。

九日，自治區革委會、廣西軍區發出《關於撤銷軍事管制的通知》，全區各地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亦陸續撤銷。人民解放軍奉命“支左”，對穩定當時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軍隊“支左”只能是執行“文化大革命”的總的錯誤方針，從而帶來許多消極的後果。廣西的“三支兩軍”領導機構與廣西軍區、各軍分區、市、縣武裝部、警備區支“左”的負責幹部，在“文革”中執行“左”的政策，支一派，壓一派，不少人曾參與策劃、組織、指揮了屠殺群眾迫害幹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對廣西“文革”中發生的許多重大問題是負有責任的。參加“三支兩軍”工作的人員，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多數人執行了上級的錯誤命令，一些人在各地的具體工作中亦是犯有嚴重錯誤的。（據區黨委桂發[1973]84號文件，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二日《廣西日報》，“處遺”檔案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組給中央的彙報材料《廣西“三支兩軍”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欽州地區、桂林地區、百色地區、玉林地區、柳州市、容縣、臨桂縣“文革”大事記）

十六至二十一日 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五次婦女代表大會在南寧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一千二百三十八名。大會聽取和討論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講話，通過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充分發揮各族婦女在三大革命運動中的積極作用》的工作報告和《全區各族婦女團結起來，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前進》的決議。三十四名代表在大會上作經驗介紹和書面發言。大會選舉產生了自治區婦女聯合會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九十七名。經第一次全體委員會選舉和自治區黨委批准，婦聯常委十八名，主任為曾小平，副主任為黃金娥、毛鳳鸞、陸美花、餘愛武、黎慧珍、何美珍、萬瓊英。（據十七日、二十三日《廣西日報》，區黨委桂發[1973]107號文件）

十八日《廣西日報》轉載《紅旗》雜誌刊載盤美英的文章《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 自治區革委會發出《關於選派帶隊幹部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通知》。《通知》說：“根據中央指示和兄弟省的經驗，區革委會決定，從今年開始，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實行選派國家幹部帶隊的辦法。帶隊幹部的主要任務是：在當地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協助做好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工作，及時向有關部門彙報和解決上山下鄉工作中的問題；經常與知識青年的家長取得聯繫，共同做好思想工作，使知識青年紮根農村幹一輩子革命。……幹部來源，可從機關、學校、廠礦、企事業單位的在職幹部中選派。原則上一百名左右知識青年配備一名幹部”。（據區革委會桂發[1973]115號文件）

八月

十四至二十九日 全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南寧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全區各地、市、縣生產建設部隊的負責人及知識青年代表等二百四十七人。自治區黨委、革委會、廣西軍區負責人韋國清、劉重桂、安平生、覃應機、梁吉泉、廖煒雄等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區黨委常委許聖亨，區黨委書記喬曉光先後講了話。喬曉光的講話說：這次會議的任務，是認真學習毛主席給李慶霖的復信，傳達貫徹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精神，以批林整風為綱，聯繫我區的實際情況，分析大好形勢，嚴格檢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中存在的問題，研究“統籌解決”的措施。會議對我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基本評價是“形勢大好”，全區已有二十萬名城鎮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他們中間湧現出大批先進集體和先進人物，已有大批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許多人參加了各級領導班子。會議期間，自治區革委會併發出了貫徹執行《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的措施，提出要“狠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兩條路線鬥爭”，“大力加強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培訓教育”，切實解決知識青年生活方面的實際困難等。（據九月十日《廣西日報》）

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自治區農業大寨經驗交流會議在南寧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全區各地、市、縣、生產師的負責人及先進大隊、農業科研、水利工程等有關部門的代表九百四十五人。都安、橫縣、欽州縣飛躍大隊、田陽縣那塘大隊等一百二十二個“先進”單位的代表在會上介紹了經驗。陳開路在會上作了題為《以批林整風為綱，大鼓革命幹勁，掀起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的新高潮》的報告。《報告》認為，廣西“在批林整風的推動下，農業學大寨運動更加深入”，“全區的旱澇保收農田面積已經超過二千萬畝”，“農業生產連年豐收。去年自然災害嚴重，全區的糧食仍然增產十億斤，有二十三個縣、市跨《綱要》，七個縣每人平均有糧超八百斤，一百一十七個公社產超千斤，三十五個大隊產超一千五百斤，五十四個生產隊產超二千斤”。並提出今後兩年糧食總產量分別達到二百零六億斤和二百一十六億斤的“奮鬥目標”，會議討論並草擬了《關於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的若干問題》的紀要文件，文件說，我區“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正在由建設大寨式的社隊向建設大寨式的縣發展”，決定今冬明春要在全區範圍內“開展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據九月二十三日《廣西日報》，一九七三年區黨委、區革委有關文件）

十三至二十九日 自治區全區衛生工作會議在南寧召開。會議傳達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精神，要求全區農村在一九七四年基本實現合作醫療。（據區黨委桂發[1973]170號文件，九月十四日《廣西日報》）

十五日《廣西日報》第一版整版登載了《在農業機械化的大道上前進——武鳴縣雙橋人民公社十五年來的巨大變化》的長篇文章，宣揚雙橋公社是全區“農業學大寨”，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先進典型。（據八月十五日《廣西日報》）

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中共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出席這次大會的廣西代表有岑國榮、韋忠均、劉富貴、鄧月瓊、沈少卿、蘇慶樸、農瓊、羅耀芳、盤美英、梁雲禧、盧永興、溫玉山、覃其修、萬瓊英、胡運江、林純波、葉觀藻、韋國清、劉重桂、安平生、崔鳳煮、李秉兒等二十二人。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廣西當選為中央委員的有韋國清、安平生、岑國榮，韋國清並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有盤美英（“文革”任大隊黨支部書記、革委會主任期間，曾迫害、關押社員，策劃、指揮打死另一派群眾，昇任自治區黨委委員、賀縣縣委副書記。後被免職、開除黨籍，按一般幹部分配工作）、郭耀卿。廣西“十大”代表的產生，體現了派性的傾向，不少“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堂而皇之地成了“十大代表”。本年先後召開的全區團代會、全區工會代表大會等，亦體現出嚴重的派性傾向，通過所謂的“選舉”，造反派的頭面人物們成為“委員”、“常委”、“書記”，從而得以從組織上將他們的地位固定下來，實現了權力的重新分配。（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38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二十九日《廣西日報》，區黨委組織部的“十大”代表材料）

八月，廣西高等院校一九七一年二月入學的首批工農兵學員畢業。（據八月十三日《廣西日報》）

十七日 自治區報請中共中央批准，劉重桂、安平生、喬曉光、覃應機任自治區黨委書記，梁吉泉、曾小平、杜易、肖寒、廖煒雄任自治區黨委常委，免去韋祖珍自治區黨委委員、常委、書記職務（一九八一年七月中央同意給予韋祖珍平反恢復政治名譽）。（據區組織史）。

二十三日 河池地委就繼續搞好清查工作作了部署（全地區從七〇年開始清查“五一六”）。在全自治區清查的十個反革命事件中，其中河池地區的是“鳳山反革命基地事件”（指廖熙英、覃家修組織鳳山“七·二九”派被圍剿後逃上山被當成匪劃一事），決定在清查結束時結合宣判案件進行宣布。同日地委以河池[1973]129號文件將鳳山縣調查“七·二九”派群眾組織的報告報區黨委。此調查報告是按照區、地黨委布置搞的，即對“鳳山反革命基地”事件的調查。此報告站在極左及派性立場上，對一派群眾組織進行誣蔑、指責、栽贓、認定他在鳳山建立反革命基地。把“文革”鳳山“七·二九”派群眾組織當成反革命組織，這一錯誤認定致使在全國動亂結束之後，鳳山仍被當作“反革命基地”而加以圍剿。直至一九八三年全區“處遺”之前長達十四年之後。在這十四年中，批鬥、傷害、株連不少幹部群眾。

九月

六至十七日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舉行了三屆六次全會擴大會議，傳達貫徹“十大”精神。參加會議的有自治區黨委委員和候補委員、我區出席“十大”的代表、各地、市縣委主要負責人，柳鐵和區直機關各部門負責人，以及廣西軍區和駐軍團以上幹部。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在會上傳達了“十大”的“盛況”和會議“精神”。九月中下旬，自治區黨委又舉辦所謂“學習班”，組織縣以上主要領導幹部學習“十大”文件。並逐漸在全區掀起一陣學習“十大”文件的“熱潮”。（據九月二

二十八日《廣西日報》第一版發表新華社通訊員、新華社記者的長篇通訊報道《爬不了大坡就上不了高山——記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各族人民學大寨六年巨變的事跡》。報道說：幾年來，都安瑤族自治縣積極開展“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發揚“百方石頭一分地，千箕泥土一擔糧”的精神，在亂石窩上“修造梯田十六萬畝。全縣糧食產量五年翻了一番，六年跨過了《綱要》。去年在五十年未遇的嚴重乾旱情況下，糧食總產量仍比一九六六年增長一點六倍，平均畝產也由六年前的三百多斤上昇到八百一十四斤。多種經營逐步發展，達到了一人一豬和兩人一羊。五年來給國家提供商品糧一億二千多萬斤，豬、羊二十一萬頭，成為少數民族大石山區農業學大寨的一面紅旗”。事實上，以上數字均嚴重誇大。同年十一月十九日，都安縣委就曾給河池地委、自治區黨委寫過《關於虛報糧食產量問題的檢查報告》。據這個報告所提供的材料，該縣一九七一年虛報糧食產量四百六十八萬斤，一九七二年虛報五千六百四十七萬斤，一九七三年僅上半年就虛報了六千零七十五萬斤，並製訂了當年計劃賣雙超糧五千萬斤的遠遠超過實際承受能力的浮誇指標，這一數字相當於一九七二年完成徵購數的六倍，縣委為完成這一徵購指標，竟層層分配數字，強迫農民賣過頭糧搞得農民苦不堪言。可是，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當時的自治區黨委儘管瞭解都安縣委虛作假的事實，卻並未對之作出嚴肅處理，反而繼續維護、扶持這一假典型，繼續在報章上連篇累牘地報道都安的“學大寨事跡”。都安縣委的糧食浮誇風也因而越刮越猛。據《都安縣“文革”大事記》的材料，至一九七八年止，都安縣十年間虛報的糧食產量總計高達二億五千萬斤。這一做法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就是使都安縣的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農民群眾也因此陷入日益貧困之中。有民歌一首曰：“四害”橫行逞凶狂，都安縣委吃得香；連續三年跨“綱要”，十戶囤空九無糧。田有舌頭地有腔，常於僻處話“超綱”；喜看各上區紅榜，功績不下小昔陽。（據九月二十八日《廣西日報》，《都安瑤族自治縣“文革”大事記》）

十月

十一日自治區黨委決定成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由喬曉光、許聖亭、周光春、梁吉泉、曾小平、任耕卿、王祝光、張復海、黃雲等組成，喬曉光任組長，許聖亭、周光春任副組長。（據區黨委桂發[1973]241號文件）

十月，自治區黨委從區直機關抽調一批幹部組成宣傳隊，由區黨委常委和各部、委、廳、局的三十七名負責人帶領，赴全區八個地區、四個市的部分社隊和廠礦，“廣泛宣傳”“十大”精神，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以在全區範圍內大張旗鼓地掀起一個“深入學習、認真貫徹十大文件的高潮”。從九月下旬起，梧州市委、柳州市委、玉林地委、武鳴縣委、桂平縣委等亦紛紛召開全委（擴大）會議或幹部會議、分片會議等，由各地區出席“十大”的代表傳達“十大”精神，並從機關抽調幹部組成“宣傳隊”，到工廠、農村、街道“宣傳貫徹”“十大”精神，並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清隊”等。據《廣西日報》十月十三日，梧州市、柳州市、玉林地區、武鳴縣、桂平縣“文革”大事記）

十七日南寧市召開一九七三年全市應屆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動員大會，應屆高中畢業生及家長等共三萬多人參加大會。南寧市委書記肖寒在會上講話，應屆畢業生代表範慧婷在大會上發言。（據十月十八日《廣西日報》）

十月，擔任柳局軍管的廣西獨立一師師長張文芳（局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師副政委龐建勳（局黨委副書記）等全部軍管人員撤回部隊。局黨委常委在南寧召開了整風會議（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三日，統稱五十三天會議，實際開四十九天）。參加會議的有：局黨委常委孫連捷、楊志宏、沈博、王進（只參加擴大會）、薑成福、劉運海、農瓊，柳州分局黨委副書記楊世貴，南寧分局黨委副書記楊興，工程總隊黨委副書記李春興，直屬機關臨時黨委書記張峰，都勻分局黨委副書記盧俊貴，局公安處黨委書記張珍，局辦公室主任韓梓濱，局宣傳處代副處長範艸（“鋼聯指”總部主要頭頭之一），直屬機關臨時黨委副書記陳良祖（“鋼聯指”總部頭頭），局“五·七”學校

黨委副書記李華山，局計劃處處長陳西民，局人事處處長曹新周，局物資處副處長傅長和，局“清查辦”負責人張堅（“鋼聯指”總部主要頭頭之一），局工會副主任溫甲友（“鋼聯指”總部主要頭頭之一），南寧分局工會副主任曾永啟（南寧“紅色鐵路”主要頭頭），都勻分局工會副主任張明德（都勻“聯指”主要頭頭之一），局組織處副處長趙景潤，局運輸處副處長劉永生，局財務處業務科科長李仕道，共二十七人。

整風會議分兩段進行：

第一段，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開常委會。二十六日下午，常委會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區黨委書記安平生，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長趙茂勳，交通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政治部主任黎光（當時鐵路、交通合併）以及核心小組成員、幹部組副組長李新到會，並講了話，對會議的指導思想、方針、原則和如何開好會議作了指示。韋國清說：“你們這次常委會和擴大會，是區黨委徵得交通部的同意召開的，會議解決哪些問題？當然，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就我知道你們局領導在思想認識上存在不一致，團結上有那些問題。怎麼解決，需要擺事實，講道理，交心通氣”。“我知道孫連捷和楊志宏意見不少，有意見可以擺出來”。

三十日，會議進入了交心通氣階段。孫連捷發言中，對團結搞不好的由來和發展，列舉了七個方面：（1）關於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問題處理意見不一致；（2）關於正確對待群眾的問題上有分歧；（3）關於正確對待“三支兩軍”的工作問題；（4）關於正確對待幹部問題上有分歧；（5）關於黨的民主作風問題；（6）關於集體領導問題；（7）黨委內部的分歧怎麼暴露在群眾之中的問題。孫認為張文芳、龐建勳“一來就搬石頭，整了曾永啟、萬健、溫甲友等人，還提出要解放張炎，是在搞派性”。認為張文芳在背後整他，這幾年他是“孤立、受壓、有難言之苦”，“許多事情楊志宏和薑成福與軍管意見一致，是緊跟照辦的”，楊志宏在軍隊與地方幹部中，沒有起到“調解、促進、橋樑作用”。在幹部工作上，認為對“犯有錯誤”的楊緒亮、鄧文、王德芳、陶熙、張啟文等幹部給予了重用，而對“文革”有“貢獻”的張堅、曾永啟、溫甲友、鄧壽生、曹澤中、張明德等人，沒有給予重用，是“搞平衡，照顧兩派”。認為班子“不團結或團結不好，不是個人恩怨和無足輕重的小是非問題，也不止是我與楊志宏個人的隔閡問題，而是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分歧，根本還是路線問題”。他還引用了空軍黨委報告中的一段話：“為什麼有些人對修正主義的東西不抵制，不反對，不向中央報告，反而同流合污，推波助瀾呢？根本原因是他們站錯了立場，走錯了路線，出賣原則，出賣靈魂”。孫引用這段話，引起了楊志宏、沈博、薑成福等人的強烈反感。孫連捷的發言中，闡述了同楊志宏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分歧：（1）對待文化大革命問題的處理；（2）對待“三支兩軍”某些領導的某些缺點錯誤看法有分歧；（3）對待“文革”中一些有“貢獻”的人的看法和使用問題有分歧；（4）對待班子的團結問題有分歧。

楊志宏、薑成福兩人的發言，對孫連捷的發言提出了不同看法，主要是：（1）對許多事情楊志宏與薑成福是一致的，對軍管是“緊跟照辦的”，楊志宏認為是“跟路線跑，不是跟哪個跑”。薑成福認為是“我們是緊跟黨跑，絕不是跟你孫連捷跑”。（2）對引用空軍黨委的一段話問題，楊志宏問孫連捷是誰站錯了立場，走錯了路線？又是誰出賣原則，出賣靈魂？薑成福說：“我認為你企圖用這些站不住腳的東西在黨委內部製造認識混亂，你對下級壓得太甚，我不服氣，不管你用硬的壓，用軟的拉，我都沒有‘出賣原則，出賣靈魂’”。（3）對“文革”的“鬧將”有“貢獻”的人使用和安排問題，楊志宏認為，對範艸、劉俊三、曾永啟、溫甲友等人是重用了，所說“不重用”只“是張堅一人，張堅的問題從未提到過黨委討論過，不能因為張沒有提拔使用，就是對群眾組織頭頭有看法有問題”。薑成福對孫講的使用幹部“搞平衡，照顧兩派”，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應“看到基本傾向，否則我們不會談到一塊，也團結不到一起，我也永遠和你作鬥爭，我絕不會象你引用空軍報告的那兩句話，‘私心重，骨頭軟’的人”。

其他常委，如沈博、劉運海、農瓊，在會上就班子存在不團結問題，發表了個人的看法，承擔了個人應負的責任。沈博認為：孫連捷發言說常委之間的分歧“是路線問題，大是大非問題，沒有擺出具體事實”。對引用空軍黨委的一段話，認為“這個比方是欠妥的，是很不慎重的”，“是有

準備的，不是信口托出，也不是偶爾失言的”，這樣“會容易激化矛盾，把水攪混，是不利於團結的”。

從黨委整風所揭露出來的問題看，歸納起來主要是四大問題：（1）領導班子不團結問題，主要是孫連捷與楊志宏、董成福之間；（2）對軍隊幹部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孫連捷與張文芳、龐建勳之間；（3）對幹部的使用問題，主要是對“文革”中有“貢獻”的“閹將”，如張堅、溫甲友、萬健、曾永啟、張明德、鄧喬生等人，和對“三辦”、“清辦”的幹部定位問題，對所謂犯有錯誤的張炎、張子揚、楊緒亮、馮兆信、鄧文、王德芳等人的解放、使用問題；（4）集體領導和群眾路線問題，如工廠大搬家、宿舍大調整、大辦食堂、都勻分局搬家、蓋黨委十二戶，等等。這些問題，軍管在時已有所暴露，但沒有及時解決，使矛盾加深。十月，軍管人員一走，矛盾就充分暴露出來的，在新的局領導班子未公布之前，召開了這個整風會，是很有必要的。

十一月六日晚，韋國清、劉重桂、安平生、趙茂勳、黎光、李新等聽取了會議前階段的情況彙報，對如何進一步開好會議作了指示。

黨委整風會於十一月十五日結束，共進行十八天。通過揭露矛盾，交心通氣，總結經驗教訓，促進了團結，為召開擴大會打下了思想基礎。

第二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三日，召開常委擴大會。十六日下午，孫連捷代表常委會彙報了前段常委整風情況，對擴大會議的開法，提出了意見和要求。會上，孫連捷、楊志宏兩人作了個人的檢查。會議還傳達了區黨委、交通部領導人的指示。黎光、趙茂勳到會講了話。

從十八日開始，與會同志向常委提意見。意見集中在班子團結、幹部使用、思想和工作作風三個方面。對班子團結方面，認為軍管張文芳、龐建勳兩人要摘掉孫連捷，楊志宏、董成福是支持張、龐二人的。張峰發言說：“張文芳到柳局後就想把孫連捷整下去，張曾對我說過：‘老張呀，你是局裏的老人，你知不知道孫連捷作風惡劣，驕橫跋扈，目中無人’。‘我認為是班子不團結的根本原因’。張堅、範群認為：張文芳、龐建勳等採取各種手段打擊、破壞孫連捷的威信，把矛盾公開化，公開動員群眾整孫連捷，保護張炎。

對使用幹部方面，認為該提拔重用的，沒有提拔重用；不該使用的，使用了。這是否定柳鐵的“文化大革命”。如張峰說：“‘三辦’、‘清辦’的同志都是‘文革’的閹將，為什麼這些同志都要放到現場幹一般工作，而對清查對象如張炎就那樣關心？這是什麼感情？這是對‘文革’的態度，對柳鐵廣大工人階級的態度問題，這些同志在柳鐵有很大的影響，你們否定了這些人，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韓梓演說：“對‘清辦’人員的定位問題，不僅是對幾個人的問題，而是顛倒柳鐵文化大革命歷史在幹部問題上發展的頂點，是由對個別人排斥發展到整批的排斥。‘清辦’人員基本上都是柳鐵文化大革命的閹將，其中有的還是主要的，對他們採取什麼措施，怎樣對待，是關係到按什麼路線、什麼政策對待柳鐵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否定他們，不就是否定柳鐵文化大革命歷史嗎？張堅說：“‘清辦’人員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都是好的，龐建勳的一句話，‘這些人原則上不能留在機關’，下令把絕大部分人員調離機關，對鄧喬生是文化大革命的閹將，工作很好，為什麼不能留在局幹部部門呢？”範群說：“打擊文革的積極分子，可以說上上下下都採取了措施。整張堅、楊志宏、董成福是清楚的……。張在柳州地區比較有影響，為什麼不能用？”張堅說：

“範群頭上戴了個代副處長，也是我的光榮。範也是受排斥歧視的。範原是公安處代副處長，有的人不放心，把他調到宣傳處，據說是龐建勳傳達交通部的指示，群眾組織的頭頭不能當公安處長調走的，這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嗎？是中央規定的？當龐建勳傳達時，你們常委有什麼想法？這是不是變相排斥。群眾組織的頭頭不能當這個，不能當那個，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犯罪了，到底這是什麼路線。……幾年來，你們對我們冷若冰霜，我們有很多心裏話要說也不敢找你們，怕說不清，怕大會點名，怕說我們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只好向黨委彙報。……我感到張、龐就是顛倒柳鐵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如果不是在廣西，不是在區黨委頂得硬，柳鐵文革歷史就會顛倒”。曾永啟、張堅、李華山等人，對使馮兆信、張志恒、王德芳、鄧文、段峰、陶煦、張啟文等幹部，認為他們在“文

革”犯有嚴重錯誤，不應重用。

對思想、工作作風方面，主要是領導班子有的人工作不從實際出發，主觀武斷，強迫命令等，提出了批評意見，特別是對張文芳、龐建勳兩人的作風不民主，個人說了算，如搞工廠大搬家、宿舍大調整、大辦食堂等。對孫連捷、楊志宏兩人因個人之間不團結，鬧意見，影響工作也提出嚴肅的批評。

在擴大會議期間，韋國清在明園小會議室接見張堅、範群、溫甲友、曾永啟、陳良祖、張明德等六名群眾的主要頭頭。在接見時，韋國清說：“怎麼搞的，老孫（指孫連捷）在常委會上問題說不清，老是輸，你們來了情況就變了，問題都搞清楚了，你們和老孫有沒有聯繫？”（眾答：沒有）接見的大部分時間是張堅等人向韋國清訴說對軍管幹部，特別是張文芳、龐建勳的意見。陪同接見的有區黨委辦公廳的董坤。

十二月一日，孫連捷、楊志宏、董成福三人，根據會議中提出的問題，作了補充檢查。

十一日下午，韋國清、安平生、趙茂勳、黎光等領導接見了擴大會的全體人員，並講了話。

十三日，會議結束，孫連捷作了總結，韋國清到會講了話。黎光、趙茂勳和區黨委辦公廳的董坤、黃念先、王肖琴自始至終參加了會議。

在擴大會議即會結束時，宣布了柳州鐵路局黨委、革委會新的領導班子，孫連捷擔任局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其他領導成員除了原有的以外，新增了楊世貴為黨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溫甲友（派頭頭）為黨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

這次會議，已經被歷史證明，從思想上、組織上錯誤的肯定了“文革”中“一派正確”、“造反有功”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它是派性的產物。會議期間，把某些正確的說成是錯誤的，加以批評否定；把某些是錯誤的說是正確的，加以支持肯定，顛倒是非界限。主要反映以下三點：第一、會議中少數人研究確定吸收了一派主要頭頭參加了會議。他們會內會外結合，進行派性活動。他們一方面在會上大擺本派在“文革”中所謂功勞和貢獻。另一方面對幹部使用上，說什麼“打擊‘文革’的積極分子，可以說上上下下都採取了措施”；“由對個別人排斥發展到整批的排斥”；“群眾頭頭不能當這個，不能當那個，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犯罪了，到底這是什麼路線”、“我們有很多心裏話要說，也不敢找你們，……只好向區黨委彙報，……如果不是在廣西，不是在區黨委頂得硬，柳鐵‘文革’歷史就會顛倒”，相反的是，對恢復老幹部工作和解放張炎則加以指責批評。第二，會議期間，區黨第一書記韋國清單獨接見了參加會議的一派主要頭頭，並說：“怎麼說的，老孫（指孫連捷）在常委會上很多問題說不清，老是輸，你們來了（參加擴大會）情況就變了，問題都搞清了，你們和老孫沒有聯繫”。這是支持造反派繼續鬧派性的根子。第三，這次會議使一派正確，造反派主要頭頭得以進入各級領導崗位從組織上合法化。“把選拔經過‘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風中鍛煉和考驗的優秀分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寫入了會議紀要。按照這次會議確定的原則。到一九七六年底，全局提拔副處以上幹部三十一名，其中造反派頭頭和骨幹分子十五名，佔百分之四十八點一；科級幹部一百八十七名，其中造反派頭頭和骨幹分子五十四名，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九。如柳鐵“鋼聯指”總部的主要頭頭溫甲友（“文革”前是工人，提為局黨委常委、局革委會副主任）、張堅（原科長、局革委會委員，提為運輸處處長）、劉俊三（原股級幹部、局革委會常委、辦事組副組長、局黨委候補委員，提為工業處副處長）、範群（原科級幹部、局革委會委員、局黨委委員，提為柳州分局黨委書記）、萬健（原股級幹部，提為柳州分局黨委委員、革委會副主任、政治部主任）、鄧喬生（原一般幹部，提為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施訓志（原科級幹部，提為都勻分局黨委副書記、政治部主任）、曾永啟（原股級幹部，提為南寧分局黨委常委、副書記，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張明德（原工人，提為都勻分局黨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為了怕別人說“一派掌權”，相應的提拔了另一派的主要頭頭陶煦（原副科幹部，提為物資處副處長）、張啟文（原科級幹部，局革委會委員，提為局體委副主任）。總之，這次會議，在思

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在我局幹部群眾思想中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給黨的事業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嚴重危害。

一九八三年五月，根據中央和廣西區黨委有關文件的精神，柳州鐵路局開展了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對他們在“文革”中的錯誤進行了核查，按照政策規定，給予了應得的處理。（據柳鐵“文革”大事件）

十一月十五日 南寧市警備區副政委魏連和在市常委會上彙報了參觀上海民兵工作經驗交流會精神。十二月十二日和十四日市委分別召開辦公會研究南寧市民兵工作，李文軒宣讀《南寧市貫徹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學習上海經驗，加強城市建設的意見》，廣州軍區首先在我市搞試點，限三個月出成績。市委對此作出部署。市民兵指揮部定員七十人左右，警備區出三十七人，下設小分隊，每個小分隊七人。西郊片搞兩個小分隊；百貨大樓對面小樓進駐一個小分隊；延安路、紅星路一片（主要保衛軍區、區黨委）設一個小分隊；南寧橡膠廠、藥廠設一個小分隊；北大片以小分隊為主，各廠聯防，日夜巡邏；南糖、冶礦分別設一個小分隊。其任務是集中教養對象，即屢教不改的青年，以思想教育為主，勞動改造為輔。指揮部在市工會辦公。總指揮是郭權卿和魏連和，副政委是沈如環、呂斌、陳應品。十二月二十六日，市委在橡膠廠召開“結合社教、學習上海民兵工作經驗，整頓民兵組織現場會”，部分局和廠礦、企業的領導及專、兼職武裝幹部，“社教”宣傳隊的領導共兩百多人參加。廣西軍區和市委、警備區領導韓世福、侯超、肖寒、王恩厚、魏連和、沈如環等出席了會議。橡膠廠黨委書記王希有介紹了他們《在“社教”運動中學習上海民兵工作經驗，整頓民兵組織的幾點做法》，韓世福、肖寒分別講了話。沈如環作了整頓武裝基幹民兵的部署。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朝陽廣場召開民兵團成立大會。會上，魏連和講了話，肖寒宣傳區黨委決定，民兵代表發言，空軍及其他單位也派員參加。大會還舉行授旗儀式。（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十二月

三至四日 自治區黨委於三、四兩日上午在南寧舉行報告會，邀請廣東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在會上作“批孔”報告。參加報告會的有自治區黨委、革委會、廣西軍區、南寧駐軍、柳州鐵路局和各地、市的負責人，自治區、南寧的機關幹部、大專院校師生和中小學教師、解放軍戰士等共兩萬人。韋國清、安平生、喬曉光、覃應機、趙欣然、趙茂勛、郭權卿等出席了報告會。楊國榮的“批孔”報告大談“儒法鬥爭史”，認為孔子是沒落奴隸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政治立場和思想都是極端反動的；批孔是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階級鬥爭，是深入批林整風的需要。楊國榮的報告，附和了江青等人搞影射史學的政治需要。自治區黨委書記喬曉光在楊報告後作了講話，要求各級黨委把“批孔”作為批林整風的“重要內容”、“有準備、有步驟地發動群眾”，“積極投入批孔鬥爭”。後來，楊的報告錄音在全區各地層層播放，並被翻印成小冊子，廣為傳播，在全區掀起了一陣“批孔”的狂潮。當時，廣西區黨委組織的此類活動，配合了“四人幫”“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理論攻勢，因而得到“四人幫”的賞識。（見五日《廣西日報》，“處遺”檔案材料）

十二月二十二日據《廣西日報》報道，全區一九七三年又有三萬九千多名城鎮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落戶。（見《廣西日報》）

一九七三年，欽州地區、地區各市、縣以及桂平縣、容縣等地的革命委員會“第三辦公室”先後撤銷。（據欽州地區、桂平縣、容縣“文革”大事記）

一九七四年

一月

一日《人是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重要社論——《元旦獻詞》。

二日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認真學習、堅決落實中央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的通知》。《通知》要求首先要領會社論精神實質，必須要聯繫實際和加強黨的領導，為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

同日南寧市召開常委會，肖寒、王恩厚、郭耀卿等十三人到會。會上宣讀了警備區《關於組織民兵參加社會階級鬥爭的請示報告》決定抽五百工人到民兵指揮部。由軍區撥給一千五百支槍。在市東、西、南、北區搞四個團。每個中心片搞一個營。於元月十五日晚十二時至十八日共用三個晚上兩個早上，進入各街道搞“政治大掃除”（聽聽風）。主要是查戶口。從此後，民兵小分队經常出入街道。（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為紀念毛主席關於辦好《廣西日報》指示信十六週年，區黨委常委召開會議討論改進報紙工作。會議由韋國清主持，就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新聞路線，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和研究。會議肯定了《廣西日報》一年來所取得的成績，進一步發展我區大好形勢。要求報紙要進一步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方針，做好通訊工作，指出要繼續整頓報紙文風，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最後強調，新聞工作人員“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要，培養出一支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新聞隊伍。（據《廣西日報》）

二十日《廣西日報》一版在“要做學習的主人，不做分數的奴隸”的標題下載《柳鐵二中黨支部放手發動群眾改革舊的考試製度》和劉敏等學生寫的文章《舊考試製度要徹底改革》，併發表“編者按”。錯誤地認為考試製度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組成部分，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手段”。認為劉敏等小將——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帶頭揭露和批判考試製度危害，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猛烈開火，生動地反映了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少年的革命風貌。

二十九日區黨委在南寧舉辦批林批孔骨幹學習班，參加學習班的有各地、市、柳鐵的負責同志和區直機關、軍區的領導人，以及地、市、縣宣傳部門的負責人。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作了批林批孔的動員報告。在學習班裏，統一對批林批孔的認識，認為批林批孔是上層建築領域裏，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當前存在的資本主義傾向非常嚴重，農村有，城鎮有。因此，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要廣泛發動群眾，既要清查與林彪反黨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同時要把注意力放在大批判上來。學習班至二月六日結束。學習結束後，全區立即組織四萬多名幹部作為宣傳隊，由各級主要領導帶領，到城市、農村基層、廠礦企業和農村社隊，批判資本主義傾向，開展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迅速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隨後，各地、市、縣相繼成立“批林批孔辦公室”；玉林地直也舉辦批林批孔幹部學習班；梧州市委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城鄉十五個單位搞批林批孔試點；欽州地區各級部門和單位培訓了宣讀隊伍，人數達四十六萬二千一百五十人，其中地區機關六百五十人；南寧地區抽調了地、市、縣、社幹部五千五百八十三人組成批林批孔宣傳隊到農村參加大批判。同日，《廣西日報》在以基本路線為綱，深入批林批孔的通欄標題下，發表解放軍某部《把批林批孔結合起來》一文。從此，《廣西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批林批孔的報導。（據韋國清動員報告、《廣西日報》、各地、市“文革”大事記）

三十日廣西大學中層以上幹部聽韋國清作《關於批林批孔的動員報告》。四月二十二日校革委

副主任何忌召開各單位負責人會議。根據區黨委部署，決定五一節前集中批判區黨委第二書記韋祖珍。五月四日召開批判韋祖珍大會；會後各單位開座談會，聯繫批林批孔批韋，揭露“修正主義”回潮現象。十月四日全校批林批孔總結指出：作儒法鬥爭史報告五至十六次，聽眾二十萬人次，強調今後還要搞下去，要研究所謂“儒法鬥爭”在科學領域的表現。該校編印《儒法鬥爭史講話》小冊子，在全區廣泛出售流毒甚廣。十一月廣西大學以開門辦學為中心，黨報會簡報說：七四年在“批林批孔”運動的推動下開門辦學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新的發展。十二月十六日廣西大學在《關於繼續搞好批林批孔的意見》提出進一步提高批林批孔的認識，要求加強領導批出新水平。（據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一月底，廣西師範學院革委會負責人來南寧參加區黨委擴大會議。會議中心議題是傳達學習中央[1974]1、2、3號文件，學習江青主持編寫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布置進一步開展批林批孔。一月三十日區直機關召開幹部動員大會，韋國清作動員報告。二月一日，該院參加會議的負責人人用電話傳達韋國清、喬曉光的指示說：批林批孔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是復闢與反覆鬥爭；批林必須批孔；要聯繫當前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實際，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傾思潮，批判林彪反黨集團在廣西的代理人韋祖珍。接著該院於二月三日舉辦批林批孔骨幹學習班，學習文件和韋國清的動員報告，研究部署批林批孔運動。二月六日全院停課進行批林批孔，八日召開“批林批孔誓師大會”。會後根據區黨委會議精神，聯繫本院實際，按《林彪與孔孟之道》的八個專題開展批判，著重進行批判“克己復禮”，進行“憶、批”。即進行新舊社會回憶對比，一批“克己復禮”，狠揭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極右實質；進行兩條教育路線回憶對比，二批“克己復禮”，深入揭批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影響和表現”、痛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動思潮；廣泛開展回憶對比，三批“克己復禮”，狠揭狠批林彪反黨集團及其同夥“韋祖珍的反黨罪行”。從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日的五十天中，全院寫批判文章和揭批大字報四千二百四十三條，出版批判專欄一百三十期，《批林批孔簡報》七十二期，院、系處比批判大會一百〇九次，漫畫六百九十八幅。由於強調上掛下聯，這些大字報、大批判文章，批判會等，除批判反黨集團的罪行外，還針對“兩個估計”、“開門辦學”、“八二〇”行動及“八二〇”後開展“清隊”、“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運動持有不同意見和認識的幹部、教師，給他們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搞右傾翻案”等政治帽子，又一次傷害了大批同志。（據廣西師範大學“文革”大事記）

二月初，南寧市成立批林批孔辦公室，主要負責有肖寒、王恩厚、施宗河、王璋甫等。辦公室編印了《批林批孔專刊》；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止，共印發一百〇一期。運動分三個階段進行；年初運用“四史”（家史、村史、廠史、個人成長史）的方法，批判林彪做孔老二“克己復禮”；三月中旬，運動“三對比”的辦法，圍繞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深批“克己復禮”和“林彪的反黨罪行”，並“清查與他們的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七月總結儒法鬥爭和階級鬥爭歷史經驗，批判《三字經》、《增廣賢文》等書。到九月份，已有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五人的儒法鬥爭理論隊伍，業餘理論學習小組發展到二千六百九十八個，七萬四千五百三十七人。編寫儒法鬥爭講稿二千七百六十四篇，批林批孔故事二千二百四十四則，寫詩文一萬九千二百六十八篇。八十二個單位研究了法家人物及其代表著作。向群眾作儒法鬥爭史報告二千多場，聽眾達二十四萬九千七百多人次。連七、八歲的小學生也上台講儒法鬥爭史的故事，一個小學就有七十三人的小故事員。市里還舉辦了批林批孔展覽，參觀人數達二十多萬人。運動之深入、廣泛是空前的，可謂家喻戶曉。（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月

七日區黨委第一期工農幹部學習班舉行開學典禮。區黨委書記劉重桂、常委趙茂勛、組織部副部長童銘海、宣傳部副部長羅立斌等參加了開學典禮。這期學習班主要是學習毛主席和黨中央關於

“要組織專案徹底查清”。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他在自治區專案定案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說：“要抓緊廣西地下黨的專案調查。廣西地下黨，情況錯綜複雜，牽涉面廣，涉及的人員多，凡是有地下黨活動的地區，所在地區的革委會都要組織專門力量，開展工作，儘快弄清其性質，跟上對敵鬥爭的需要”。六九年三月十九日，他又在區革委會定案工作座談會上講話，除重申二月會議關於清查廣西地下黨的布置之外，指出要突出重點，抓住大案和要案。並說：“所謂大案，是指廣西地下黨和其他集團案”，要求：“凡是有地下黨活動的地方，所在市縣革委會都要組織專案組，你那個單位原來有領導有嚴重問題，也要組織專案徹底清理。說這是關係到全局的問題，望這些單位，儘快組織專案，爭取在短時間作出成效。”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他再次在區革委會落實黨的政策會議上說：“這次會議的第二個任務，就是廣西地下黨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幾十個縣，時間久，面很廣，任務複雜艱鉅，問題突出”。認為：“開展清查敵人破壞廣西地下黨的專案工作，是鬥、批、改階段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清理階級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廣西地下黨受敵人的破壞是很大的，據初步掌握的部分資料，先後發生過三十五起重大事件，破壞面達八個專區五十八個縣（市），其中重點縣市二十八個。”“共產黨員大批被捕，……有的動搖變節，成了可恥的叛徒，有的被派回充當敵人的特務、內奸”。他以玉林、合浦兩地區的“調查”為根據說：“一九三六年的新省工委九個成員中，就有二個是敵人派進來的特務。一九三七年博白地下黨三屆特支四屆工委十八名領導成員，調查了其中十五人，發現特務四名，假黨員二名，叛徒九名。合浦縣委特支一級幹部二十六名，現查出特務五，歷反一，叛徒五，叛徒可疑分子七名，佔百分之六十九點二三，玉林地區革委會‘六〇六’專案組通過調查博白地下黨‘一一三’事件，已挖出了一個以熊福芝為首的近百人的叛徒集團。其中竊取廳級重要職務三名，處級一名，縣級十名，區級十六名。從上面幾個簡單數字：已經可以說明廣西地下黨內部是有問題的，在局部還有嚴重問題。”（經“文革”處遺查實劉重桂講話中舉的例子，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純係誣編造出來的謊言。他會上的三次講話，也予以撤銷）

在上述錯誤的部署指揮下，區革委政工組領導的區直鬥批改學習班，對該班上的廣西地下黨幹部進行迫害審查。直至六九年十二月，該班的審查對象中，尚有近百名廣西地下黨幹部被認為有重大問題未弄清而被集中到武鳴繼續審查。另有一批被認為問題更嚴重的，在茅橋監獄審查。又在全區解放前有地下黨活動的七十四個縣市，都組織了地下黨問題專案組，共有七百多人，區革委組織了“清查廣西地下黨小組”，組長：齊金山，組員：蘇志桔，冰鞘，農戈良，艾祖華，李玉華，對廣西地下黨組織全面審查，埋單長達三年多。廣西地下黨遭受全面審查迫害期間，原地下黨員，特別是特支組織以上的領導成員，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殘；有的造成精神病患，家破人亡，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在專案審查中，桂林地區地下黨游擊隊五千多人，被審查的有三千九百一十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遭迫害的達二千零八十七人，佔受審人數百分之五十三。被迫害致死的二百零一人。桂北地工委委員吳騰芳，全昭毅被迫害致死，陽雄飛致殘，諸葛鑫被關押。六八年二月，合浦縣、北海市組織一百零六人的工作隊，調查清理地下黨——南路黨的問題。合浦縣武裝部政委，縣革委主任孫相臣，縣“三辦”專案組副組長，縣革委常委李樹餘等人對解放前後組織已查清下了一些地下黨案件，重新立案進行審查清理。北海市地下黨案與合浦地下黨關係密切，亦派出十一人前來合浦共同清理。廣州軍區、廣西軍分區，專區“三辦”都派人到縣指導。工作隊連續辦了十三期學習班，強迫一千六百多人參加學習，大搞逼供訊。在審查所謂“南路黨”事件中，全縣被審查的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國家幹部一百四十八人），被打死逼死七人，致傷致殘二十六人，被打成“叛徒”三十六人，“特務”四人，“土匪”一百零九人。七月下旬南寧地區及所屬各縣先後成立了審查原地下黨專案組，對原地下黨及其領導的武裝隊伍，作為“大案”、“要案”全面審查。對一些人進行刑訊逼供，肆意摧殘。這是地下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最殘酷面最廣的一次迫害。僅上林縣，就組織了六十人的專案隊伍，給一百九十人定了案，其中被定為“叛徒”的有四十二人，“特務”三人，假黨員四人，“走資派”十人，：“歷史反革命”十六人，其他罪名的一百一十五人。在審查批鬥中，刑訊拷打迫害致死的三十九人，被打傷致殘三十一人。當時還以東蘭縣作為審查的重點，以致該縣的老紅軍，老幹部二百四十九人被打成“叛徒”、“變節分子”以及有嚴重問題的人。右江地區很多老幹部，老赤衛隊員及其家屬，被誣編為“鄧小平的徒弟

徒孫”，“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更為嚴重的是把當年紅七軍參謀長黃大權（土地革命時已犧牲），當作叛徒，並將其東蘭革命烈士陵园圍刻下的英名抹掉，嚴重地損害了東蘭地下黨光輝形象。（據東蘭縣“文革”大事記）

近在區首府南寧咫尺的區屬武鳴華僑農場中，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四日發生的紅泥隊階級報復血案。紅泥隊九十多戶人家，解放前以偽保安團長鄧文興等偽軍政人員和一批慣匪武裝為一般“實力派”和以貧下中農及一些進步人士為“非實力派”，解放戰爭時期，貧下中農和進步人士支持擁護我黨，參加地下游擊隊，提供情報，籌糧助款。解放後，在我黨領導下，先後鎮壓了反動勢力偽保安團長鄧文興，匪首鄧玉成等人。在“文革”中這些被鎮壓的家屬，卻充當了“造反派”，以誣告他人和借抓“反共救國團”為名，大搞階級報復，他們設牢房，逮捕、關押鬥打無辜二十六人，其中被活活剖腹割頭，打死的七人，過去為我地下黨游擊隊截斷敵人通路，提供敵人活動情報的職工鄧元亮同志，被匪屬（被鎮壓的匪屬）鄧斯環、鄧金泉等人，用鋼釘活活打死，職工鄧金庭也被鄧斯環、鄧金泉責令“四類分子”鄧金秀等人拉到過去被鎮壓的偽保團長鄧文興的墳墓前，用菜刀活活剖腹取肝，在被活活剖腹時，被害者鄧金庭還怒斥凶手說：“你們不要這樣，事不要做得太絕”。大凶手鄧斯環還說什麼“你們游擊隊能殺人，我們不能嗎？”就這樣把人活活剖腹取肝，人肝取出，血淋淋地，心還在跳，人還有掙扎，又割頭，並將頭部放到偽保安團長的墓頂，以示他們復仇的勝利。更奇怪的是在偽叛紀檢組對此案提出上訴時，原區黨委書記竟說，如果這案處理了引起連鎖反映怎辦，將上訴材料退回。一九八三年“處遺”時偽叛紀檢組又提出此案的處理問題，韋純東在材料上批向趙茂勳瞭解情況，趙說“不瞭解”。經調查確有此事。（據區偽叛紀檢組關於武鳴華僑農場幹部政策和“三案”的落實情況檢查彙報。“處遺”檔案73號）

全州縣審查“會澤地下黨、游擊隊集團案”。對九百零八人進行了審查，其中五百二十八人遭到各種迫害，致死的五十人，致殘的五人，家屬株連被殺的十四人，地下黨、游擊隊員其親屬被罰、沒、抄的共一百三十多戶，罰款一萬二千元，造成了全州最大的地下黨集團冤案。（據全州縣“文革”大事記）

又如玉林地區直屬機關“造反派”，把他們關在地委黨校進行審查批鬥的熊福芝（專員，博白地下黨領導人之一）誣為“大叛徒”、“特務”等罪名，於一九六七年秋，遭到造反派的廖剛、蘇禮光等人的罰跪、毆打、鞭抽、勒刺。假槍斃等刑訊逼供，精神上、肉體上受到嚴重摧殘，造成精神失常，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地委黨校召開的地、縣黨員代表大會上，由羅賢操宣布熊福芝的所謂“叛徒”罪狀後，被大會決議撤銷熊福芝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期間，他又被以翻案，“復闢”為罪名，再次遭到攻擊和迫害，致使他思想再度受到創傷，精神再度失常，至今未愈。（據玉林地區“文革”大事件）

歷時三年多批鬥、專案刑訊逼供，造成五千零八十三人的冤、假、錯案的嚴重後果。（據區檔案館檔案一九六九年永久二卷）

廣西地下黨假案，由於打倒“四人幫”以後，廣西仍堅持“文革”期間有一條“正確的路線”，冤假錯案沒有得到徹底平反昭雪。直至一九八三年廣西“文革”處遺工作的全面開展，才進行徹底的查證落實，予以平反。在“文革”處遺查證中，玉林地區就錯定為叛徒一百四十多人；浦北縣平馬一個大隊，就錯定“叛徒”一百零八人；該縣挖出“叛徒”四百七十七人，最後全部平反。經查證，博白地下黨特支以上領導成員是好的。合浦地下黨特支領導成員中，也只有二人有自首錯誤，在解放前已作了處理。一九三六年廣西地下黨省工委成員是六人，不是九人，更沒有所謂“敵人派進來的特務”。博白地下黨也沒有所謂“熊福芝為首的叛徒集團”。原廣西農委、桂、柳城工委（後改廣西城工委）十個地委（地工委）桂、柳、南三個市的工委（臨工委）以及梧州市黨組織負責人總共八十人當中，沒有所謂“叛徒、特務、土匪”。這些情況說明當時區革委會對廣西地下黨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立專案作為“大案”、“要案”審查，是完全錯誤的。（據區黨委地下黨處遺問題領導小組向區黨委報告和欽州、玉林、桂林三地區，博白縣、全州縣“文革”大事記）

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學員是來自“文革”以來從基層單位選進區、地、市、柳鐵的黨委、革委的工農幹部共三百六十八人。劉重桂在講話中指出，要辦好工農幹部學習班，是關係到支持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問題，辦好工農幹部學習班，必須以階級路線鬥爭為綱，提高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的自覺性，同時要努力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銳利武器，發揚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據《廣西日報》）

十六日 為把批林批孔鬥爭引向深入，韋國清到南寧手扶拖拉機廠看大字報並參加班組批林批孔會議，區黨委書記安平生，常委、南寧市委書記肖寒，區總工會副主任趙玉馨，區黨委秘書長劉毅生，市委副書記王恩厚，市總工會副主任阮可潭和區駐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鞠國棟等一同與群眾學習、座談。韋國清在廠黨委的有各車間黨支部書記、各車間工人代表參加的批林批孔座談會上講話中分析了全區運動發展形勢，指出批林批孔是我國當前的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是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場徹底革命，把批林批孔鬥爭進行到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據《廣西日報》）

十四日 區文化局組織廣西藝術學院工農兵學員、區直文藝團體的創作人員、演員以及梧州市粵劇團、南寧市曲藝隊代表舉行批判會，以極大義憤批判所謂“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翻案的大毒草——晉劇《三上桃峰》”。到會者表示在深入批林批孔運動中，堅決反擊開倒車，搞復闢的逆流，堅決打退“文藝黑線的回潮”，把無產階級文藝革命進行到底。雖然，“四人幫”製造的《三上桃峰》事件借此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場反“文藝黑線回潮”運動，但也有為《三上桃峰》拍案而起的。之前，柳州市開關廠質檢員孫正新（女，41歲，中共黨員，中專文化），看到評晉劇《三上桃峰》後，三次寫信為《三上桃峰》叫好，市委即以其為劉少奇歌功頌德，為鄧小平翻案，屬“現行反革命”，被判處十五年徒刑，投入勞改。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市委才給孫正新平反。（據《廣西日報》、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日 玉林地直舉辦批林批孔幹部學習班，地委書記魏益年對學習班作了講話，指出：“通過學習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林批孔重要指示：學習區黨委擴大會議精神，分析了地直機關批林批孔的形勢。強調要大造聲勢、大造輿論，發動群眾聯繫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大是大非問題，聯繫某些人對‘文革’的態度問題來批，把運動持久地開展下去”。

二十三日 在黃日南主持下劉碧榮等人共同署名寫了一篇題為《堅持革命、反對復闢》的大字報。大字報把恢復韋樹輝、熊福芝等領導幹部的工作，稱之為復闢回潮，誣毀熊福芝‘企圖翻案’，呼吁幹部群眾議一議。接著又串聯縣（鎮）“聯指”頭頭搞派性活動，玉林地區的大字報出來了。與此同時組織一個寫作班子，把揭發地委領導的所謂罪行材料用《群言》的署名發至各單位，號召揭發批判。《群言》在批林批孔中起到很壞的影響。四、五月間，黃日南、劉碧榮等人到南寧會同黨校學習班的張平（地區“聯指”副總指揮）去找區黨委的黨派人物廖煒雄進行黨派活動，反映玉林地區所謂劉景榮壓制打擊新生力量。五月十五日陳世球寫了題為《條條黑線聯林彪》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地委書記劉景榮（該同志一九七三年調出玉林地委），誣毀劉景榮是“林彪線上的人”。稱“五·二五”文件為黑通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打擊新生力量的文件。六月十二日玉林地委召開批林批孔大會，深揭深批林彪反黨集團罪行，深揭深批所謂“林彪反黨集團重要成果韋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地區革委第九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革委委員黃日南、林堅、陳世球等人聯名寫了《給地區黨委的一封信》說：“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列舉了老幹部出來工作稱之為“回潮”等。指桑罵槐，給地委增加壓力再次向地委要官要權。在批林批孔中，由於劉碧榮等人的黨派活動，受到了魏益年、李國偉的重用。黃日南昇為地委常委、宣傳部長，劉碧榮昇為地區計委副主任、陳世球昇為北流縣革委副主任、副縣長，林堅昇為地委常委、地區總工會主席。達到了陞官要權的目的。（據玉林地區“文革”大事記）

四月

四月，《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廣西恭城縣挖溝大隊小黃埠生產隊知識青年小組文章《走上山下鄉的革命路》。

一日《廣西日報》發表《認真抓好典型，把批林批孔運動引向深入》的社論。社論提出了要把鬥爭不斷引向深入，擺在各級領導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抓好典型的問題。

二日 河池地區根據自治區布置，在批林批孔中認真搞好三個揭批（即揭批林彪反黨集團、揭批韋祖珍反革命罪行、深揭深批同他們有聯繫的人和事）。聯繫實際揭批林彪及其死黨韋祖珍的反革命罪行。把他們與批林批孔掛上勾，在批克己復禮時把林彪要“克己復禮”與韋祖珍相聯繫，揭批韋祖珍的《突出問題十八例》。在河池地區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召開的批林批孔經驗交流會和批韋祖珍反黨罪行大會上，地區、軍分區領導二十三人的發言，把林彪的《五七一》紀要與韋祖珍的《突出問題十八例》相提並論。（據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 區黨委在南寧體育館召開自治區機關和南寧所屬單位批林批孔經驗交流大會，區、市以及各條戰線、農村、街道的六千多名幹部群眾參加了會議。區、市、軍區負責人韋國清、喬曉光、覃應機、趙茂勛、陳開路、徐其海、許聖亨、宋治平、曾小平、肖寒、韋世經等出席了會議。交流會是由肖寒主持的，韋國清在會上講了話。會上，區黨委第一期工農幹部學習班柳鐵學習組、區銀行黨組、市躍進農場黨委、市綢紡廠黨委、市郊上堯公社西明大隊黨支部、廣西大學黨委的同志介紹了他們深入開展批林批孔鬥爭的情況和經驗。大家認為，要把批林批孔運動不斷引向深入，必須：認真看書學習，掌握思想武器；緊密聯繫實際，深批“克己復禮”；認真總結經驗，注意抓好典型；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進一步加強黨對運動的領導，放手發動群眾，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實際上，這次批林批孔經驗交流大會為全區全面開展批判韋祖珍的“反黨罪行”發出了信號。（據《廣西日報》）

十六日 經區黨委研究決定恢復自治區“五·七”幹校，校址設在區黨校內，從四月中旬起開始輪訓區直屬機關在職幹部。是日，區“五·七”幹校第二期幹部輪訓班正式開學，區黨委、區革委負責人喬曉光、趙茂勛、韋世經、林福文、曾春生等出席了開學典禮。參加這期學習班的一百五十名幹部中，有局以上領導幹部十四名，處級幹部二十五名，黨員佔百分之八十。喬曉光在會上講了話，全體學員和教職員工一致表示，決心以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的實際行動，深入批判林彪一夥開歷史倒車的反革命罪行，熱情支持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據桂發[1974]90、94號文件、《廣西日報》）

同日《廣西日報》發表區直屬機關批林批孔經驗交流大會，深批“克己復禮”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的消息，消息說：“大會要求在批判林彪反黨集團時，要聯繫上了林彪賊船的那個區黨委負責人。他直接參與了林彪反黨集團反黨命政變陰謀活動，猖狂地向黨進攻，妄圖篡奪黨權。他來廣西後極力吹捧林彪，大肆販賣林彪的修正主義，全盤否定解放以來廣西的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績，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成果，惡毒咒罵、醜化廣大幹部和群眾，為林彪妄圖改變黨的基本路線，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闢資本主義效勞”。這是不點名的點了當時區黨委書記韋祖珍。錯誤地把他當作林彪死黨來批判。從一九七四年四月至七月《廣西日報》發表批判韋祖珍的文章共七十五篇，其中四十九篇組成十三個專題。加以“緊密聯繫實際徹底揭發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作大標題發表區黨委辦公廳一作者（韋欽）的專文《卑鄙的手法罪惡的用心——批判上了林彪反黨集團賊船的那一個區黨委負責人誣毀我區大好形勢的罪行》及罪名“何迪”寫的《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批判上了林彪賊船的那一個區黨委負責人炮製的突出問題十八例》。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區黨委《關於韋祖珍同志在廣西工作期間的問題的結論》說：“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後，區黨委根據中央指示在大小會議和《廣西日報》上，多次揭發批判韋祖珍同志對廣西形勢的看

法，給他加上……等罪名。經中央、中央軍委批准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關於《對章祖珍同志……（此處有15字不清）》，章祖珍同志‘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參與林彪反黨集團的陰謀活動是不適當的，兩次工作調動本人無責任’。因此，我區過去給章祖珍同志戴上‘上了林彪反黨集團賊船’、‘來廣西進行反革命奪權’和‘全盤否定廣西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績，惡毒咒罵、醜化廣大幹部、群眾’等帽子是錯誤的，應予平反，恢復名譽”。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章祖珍同志逝世。十一月六日，章祖珍同志追悼會在南寧舉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同志送了花圈。悼詞說：“章祖珍同志是我軍的好幹部”，“章祖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據《廣西日報》“文革”大事記）

六日至十七日 安平生到都安、巴馬、東蘭、鳳山等縣检查工作，並對批林批孔作了指示。四月八日、九日到東蘭作關於如何開展批林批孔，依靠貧下中農，建立貧下中農優勢和正確貫徹黨的政策指示。（據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六日 南寧市委、市革委在市禮堂召開深入揭批“上林彪賊船的那個區黨委原負責人的反黨罪行”大會，對章祖珍進行不點名的批判，併列出所謂“五大罪狀”。市直屬機關、南寧警備區以及各基層單位的幹部、群眾和“五·七”幹校學員共一千五百多人參加大會，市委副書記李文軒主持會議，副書記范清濤、王恩厚分別發言。隨之，市總工會、園市委、市婦聯、民兵指揮部及市屬各戰線、各局也紛紛召開各種不同類型的批判會。

二十四日《廣西日報》發表《狠批為林彪“克己復禮”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服務的（302案件）》文章。該文聯繫當前文藝戰線上的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實際認為，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在區內某些地方個別文藝團體移植演出的《302案件》（又名《不靜的海濱》）是一出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大肆鼓吹林彪“克己復禮”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呼喚資本主義復辟的毒草戲。編者按指出，“毒草戲《302案件》的要害是誣毀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大肆鼓吹劉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它出現在社會主義舞台上，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回潮’的一個明顯表現”。“要深入狠批《三上桃峰》《302案件》之類的大毒草，進一步揭露和批判劉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抵制壞書、壞歌、壞戲”。

本月中旬至五月底，自治區黨委在全區範圍內多次批判區黨委書記章祖珍。四月十七日，自治區機關黨委召開批林批孔大會，深入揭發批判章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嗣後，南寧、百色、玉林、桂林、河池、欽州、梧州等地、市以及區高等院校相繼召開深揭狠批章祖珍大會；區總工會、區婦聯、園區委分別於五月上旬發出號召書，動員發動全區工人階級、婦女、青年堅決把批林批孔鬥爭進行到底。之後，口誅筆伐章祖珍遍及廣西城鄉。五月二十五日河池地委召開常委擴大會，吸收各部、委、辦領導參加，議題是聯繫實際批判章祖珍。（據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本月中旬，有人在桂林市大街上貼出了十餘張對“八·二〇”行動不同看法的大字報，說“八·二〇”行動是嚴重錯誤，是一派整一派，是“屠殺事件”，引起了桂市革委會的關注。四月二十日，桂市革委會召開各基層單位負責人緊急會議，分析形勢，認為這是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干擾了批林批孔鬥爭大方向，除設立專案查處外，各單位要組織幹部、群眾重新學習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統一思想認識。在桂市革委會的統一部署下廣西師院黨的核心小組於四月底至五月底多次組織全院師生學習“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強調“八·二〇”行動是根據中央“七·三”布告採取的革命措施，清查“五一六”是按中央的部署進行的，是符合中央政府的。在學習討論中要求人人表明態度，只准說“八·二〇”行動好，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不能說“八·二〇”行動的缺點、錯誤。對一些有不同認識和看法的幹部教師，採取了監視、排斥等錯誤做法。院清查“五一六”辦公室的謝德全、林祥任等人貼出題為《揭深批透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右傾思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徹底批判章祖珍攻擊清查運動罪行》等大字報，指責他們否定“八·二〇”行動，妄圖翻案，要他們老老實實，接受教育改造，使他們精神上受到很大壓抑。

二十一日 在黃永彩等人的組織下廣西師院黨委、院學生會向全院共青團員、青年、“工農兵學員”發出《堅決批判章祖珍反黨罪行的號召書》。二十二日分別在本部和堯山分部舉行共青團員、青年、“工農兵學員”批判章祖珍罪行大會。會後，各系、各單位組織座談，聯繫學院的實際，揭發批判所謂“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八·二〇”行動，“否定清查‘五一六’運動的反動思潮”。（據桂林廣西師範大學“文革”大事記）

三十日 廣西日報社鄭新生傳達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批林批孔批章祖珍的精神說：從當前全國來看，主要解決政治鬥爭問題，是第十次路線鬥爭的繼續。對章祖珍要進一步揭批。機關是重點。（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五月

九日 廣西日報社學習中央[1974]1、2、3號文件和區黨委的補充通知，聯繫本單位實際情況批林批孔批章祖珍，報社負責人鄭新生傳達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揭批章祖珍情況：章祖珍是林彪反黨集團派來的，是林彪安在廣西的釘子，趁著國清同志向中央要幹部的機會，派他來完全是黃永勝等人搞的，章祖珍這家夥親自到貴州“串聯”。他到廣西後到過區直十三個單位進行“反革命活動”，到全區各地散布“反革命言論”，完全是配合《5.71紀要》計劃，是有計劃的進行“反革命”活動。他來廣西時間不長，但他的“流毒和影響”決不能低估。（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十一、十三日 廣西師院黨的核心小組連續舉行會議，研究教育革命，揭露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問題”。會議認為，否定“文革”中教育戰線出現的新生事物，就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我院的主要表現仍然是“智育第一”、“分數掛帥”。會議列舉了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我院回潮的種種表現：（1）外語系等系建立和嚴格考試製度；（2）按“工農兵學員”的原來文化基礎分班分組教學；（3）部分師生要求增加專業教學時間，減少社會工作和勞動時間；（4）部分師生不同意搞學農基地，不願意到外地開門辦學。十三日下午，召開各系各單位黨、政負責人會議，由李德韓向到會人員作傳達貫徹，要求各系認真對待，並要求各系發動群眾，檢查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種種表現，並堅決糾正。（據廣西師大“文革”大事記）

十三日 柳州地區常委會高晉傳達《韋國清在區黨委常委會上講話》精神，指出，以各級領導機關為重點，就是常委為重點，集中一段時間批章祖珍、黃永勝。預計半月時間批章祖珍聯繫實際揭發問題。常委會全天進行揭批，機關半天進行揭批。會上確定批章祖珍的八個專題和揭批人員分工。

十九日《廣西日報》配合全區批判章祖珍的“罪行”，發表署名文章《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批判上了林彪反黨集團賊船的那一個區黨委原負責人炮製的（突出問題十八例）》

二十八日 區黨委宣傳部、區總工會召開自治區駐學校工宣隊代表會議，會議至六月二日結束。韋國清、劉重桂、安平生、喬曉光等出席了會議。喬曉光在會上講了話。會議分析了形勢總結了工作經驗，討論和研究加強黨的領導。指出要進一步發揚工宣隊的政治工作，狠抓教學領域裏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加強工人階級對學校的領導，明確工宣隊基本任務，要為把學校改造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而努力。自一九六八年秋天派出工宣隊開進學校參加鬥批發，實行廠校掛鉤，開展學工，學農，學軍和批判資產階級的活動，在學制、課程、教材、教學方法等方面都進行了不少的“改革”，這些“改革”由於錯誤地認為建國後教育戰線“被一條黑線統治著”，認為學校的教師是“資產階級分子”，在實行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一些學校教師和學生的抵制。在批林批孔時，這些都被當成“修正主義回潮”現象，當成是否定教育戰線新生事物的“反動思潮”來批判，強調要堅持教育革命，繼續搞開門辦學，加強工宣隊，規定工宣隊人數：大學，隊員佔師生總數百分之十左右；中專和城鎮中學，每校三至五人；小學，二至三人；公社以下的學校，由貧下中農管

理。（據《廣西日報》、桂發[1974]169號文件）

本月下旬，在自治區黨委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上，給韋祖珍戴上“上了林彪反革命集團賊船”、“來廣西進行反革命奪權”、“全盤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惡毒咒罵、醜化廣大幹部、群眾”等帽子。（據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韋國清在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

六月

本月，《紅旗》雜誌第六期發表中共廣西武鳴縣委會文章《注意解決路線問題》。

十一日自治區召開全區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積極分子代表會議，出席開幕式的負責人有韋國清、劉重桂、安平生、喬曉光、趙欣然、趙茂勳、陳開路、徐其海、許聖亭、宋治平、梁吉泉、曾小平、杜易、肖寒、廖煒雄、韋世經、林福文、顏景堂、岑國榮等。大會代表共一千一百五十三人，會議以批林批孔為綱，總結交流知青同舊的傳統觀念決裂，堅持鄉村革命的經驗，會議於十七日結束。大會通過了給全區上山下鄉知青的倡議書，號召知青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紮根農村幹一輩子革命。會後，區知青辦就我區知青上山下鄉動員工作提出以下安排意見：一九七四年全區共有四萬五千八百多名應屆畢業生應動員上山下鄉。還有歷屆畢業生和社會青年一萬八千多名要繼續動員到農村去。應屆畢業生安排到農村插隊三萬五千八百多名，安排到國營高峰農場、七坡農場、新光農場、華山農場、洞美農場九千多名。（據《廣西日報》、桂發[1974]146號文件）

十五日南寧市委召開市直機關揭批“林彪反黨集團及其重要成員韋祖珍反黨罪行”大會，對韋祖珍進行公開點名批判。（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七月

本月，《紅旗》雜誌第七期發表廣西梧州市第二輕化工業局黨委文章《注意發展女黨員》。

一日《廣西日報》發表文章，指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風和批林批孔鬥爭的教育和鍛煉，我區各級黨組織，在培養教育“納新”對象中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宣稱全區已吸取三十萬“先進分子”入黨。實際上這些“先進分子”中混進了一批派性思想嚴重（甚至是嚴重違法亂紀分子、“三種人”）忠於廣西“文革”那條所謂正確路線的人，給黨組織造成嚴重不純。（據《廣西日報》）

三日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級黨委要把加強理論隊伍作為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作為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百年大計認真抓起來；要大力加強群眾性的工農兵理論隊伍和專業理論隊伍；要充分發揮理論隊伍在鬥爭中的作用；要抓緊理論隊伍的鞏固和提高工作；要培養理論隊伍，需要全黨動手。為進一步加強理論隊伍，各單位要組織落實。實際上是為了推行“階級鬥爭為綱”那條極左路線服務。（據《廣西日報》）

五至六日自治區黨委召開加強理論隊伍工作座談會，韋國清、喬曉光、覃應機、梁吉泉、肖寒等出席了會議。會議分析了我國理論戰線的大好形勢並對理論工作隊伍提出了要求。在批林批孔鬥爭中，對於那些傳播很廣，流毒很深的《三字經》、《增廣賢文》以及反動諺語、格言等販賣孔孟之道的毒草，要進行批判。實際上，區黨委召開加強理論隊伍工作座談會，助長了極左思想的發展，持續地批判所謂的“壞書”，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據《廣西日報》、各地、市“文革”大事記）

三十一日自治區“五·七”幹校第二期舉行結業典禮。區黨委、區革委負責人劉重桂、趙茂

勳、廖煒雄出席了結業典禮。劉重桂在會上講了話，指出要堅定地去“五·七”道路，堅定地辦好“五·七”幹校；要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就是為了更好的批林批孔。自後，區“五·七”幹校第三期於八月二十七日開學。（據《廣西日報》）

八月

八月，區文化局黨組在區直文化系統發動全體職工深揭韋祖珍同他們有關的人和事的“反革命罪行”。文化大院貼出許多大字報，其中有的揭了許聖亭（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張乃健（廣西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區宣傳部副部長）、江濱（區文化局副局長）反對樣板戲的問題。其中，局社文處謝樹和等人寫的《江濱十罵樣板戲》大字報引人注目。於是，潘其旭（區黨委創作辦公室幹部）、李美珍（文化局幹部）、陳麗梅（《廣西文藝》編輯部幹部）認為江濱的問題嚴重，後來有人便在《十罵樣板戲》的基礎上又補充了一些材料，向區黨委和江青寫了一封長信，係統地揭發許、張、江對樣板戲的所謂問題，信中列舉的問題是：

- 1、誣譏革命樣板戲‘過時’；
- 2、誣譏革命樣板戲‘不十全十美’；
- 3、誣譏革命樣板戲塑造的高大完美的無產階級英雄典型是‘機械的工具’，‘要一分为二’；
- 4、攻擊革命樣板戲的創作經驗是‘框框’，狂叫‘不要踏著別人的路子前進’；
- 5、意圖反對學習移植革命樣板戲；
- 6、狂叫要‘超過’革命樣板戲；
- 7、以封、資、修文藝為標本，大放封存影片，排演傳統戲，帶頭唱黃色歌曲，掀起一股‘文藝黑線回潮’的逆流；
- 8、按照林彪鼓吹的‘方向問題解決了’的反動謬論抓創作，強行推銷一批有嚴重錯誤傾向的作品；
- 9、違抗黨中央的號令，捂蓋子，保自己。

這封信於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寫成，通過新華社記者郭玲春轉送到江青手中。江青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八日寫了如下批語：

“按照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來說，客觀現實是不存在什麼十全十美的事物的，只有相對的十全十美，當然絕對包含在相對之中，我個人從未吹捧革命樣板戲和革命歷史劇是十全十美的，實際上，我對他們要求是很嚴格的，事實上還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點，有待今後努力改進。廣西文化界這幾個小丑表面上誣譏攻擊革命樣板戲，實質上他們仇視工農兵；仇視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國革命；仇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包括文藝路線）；仇視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絕對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我認為他們這樣叫囂‘三忠於’，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建議黨中央重視兩廣的文藝界鬥爭，以點帶面，推動全面。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我認為主席這個教導，對於我們現在說，還是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的。

自治區黨委根據江青所謂“三個小醜”、“四個仇視”的“八一八”批示，有計劃地對許、張、江進行了批判，並規定許聖亭、張乃健由宣傳部負責審查，江濱由區文化局負責審查。經過了各種會上的多次批判鬥爭，最後於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為江濱作出了“在文藝工作方面所犯錯誤是嚴重”的結論，區黨委對許聖亭、張乃健、江濱三位同志所進行的批判是錯誤的，它在客觀上對我區在文藝工作中“左”的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由區直機關黨委召開萬人批判大會，區文化局、團區委、區京劇團、區婦聯、區總工會、區黨委宣傳部、區基本建設委員會、區外事辦公室等單位代表深揭狠批“三個小醜”、“四個仇視”的反動言行。喬曉光在講話中指出：“必須從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高度來認識這場鬥爭的重大意義”，“必須堅決回擊那些對革命樣板戲的攻擊和誣毀，以實際行動宣傳、保衛革命樣板戲，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粉碎“四人幫”後是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在區文化局召開批判“四人幫”罪行大會上，賀亦然說：“許、張、江有許、張、江的錯誤，批‘八一八’黑批示，他們就沒有錯誤了”。而對潘具旭等三人對許、張、江的誣陷未加追究，未給予任何處分，最後將潘調離區壯劇團到區社科院工作。區黨委對許、張、江開展錯誤的批判遲遲未有認識和糾正。直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區黨委才發出《關於根據江青“8-18”批語批判江濱同志的平反決定》：“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區黨委根據江青強加給許聖亭、張乃健、江濱同志“四個仇視”的調子，有計劃地對他們開展了批判運動，區黨委認為，這個批判是錯誤的，決定予徹底平反，推倒批判中強加的一切誣毀不實之詞，恢復江濱同志的政治名譽……”。（據區文化廳“文革”大事記、《廣西日報》）

八月一日 河池地區黨委和軍分區聯合給區黨委、廣西軍區作《關於清剿武裝反革命查明樂等三人的報告》，決定成立“清剿”指揮小組，李義川（分區副參謀長）任組長，李春洋（地區公安局副局長）、李科（天峨縣委副書記）為副組長，統一指揮清剿工作。

在長達十五年的清剿中，因韋氏三人問題受株連而遭迫害的幹部群眾達一百三十二人，其中被殺死和迫害致死八人，地雷炸死一人；被批鬥毒打致殘十三人；被視為現行反革命遭拘留十一人；判刑二人；被開除公職一人；被開除黨籍、留黨察看各一人；被隔離審查九人；被強迫搬遷十五戶；房屋被燒、被砸爛五戶；被抄家五戶，搶走各種財物三千餘件，糧食四千多斤，耕牛一頭。據不完全統計，損失財物價值約三萬餘元。清剿中共耗國家經費達二十萬零五千九百六十元。（詳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九月

十九日 自治區黨委召開南寧軍民十萬人批判大會，深入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會議號召廣大工農兵在批判中充分發揮主力軍的作用，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打一場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人民戰爭。劉重桂、安平生、覃應機、趙茂勛等出席了大會。（據《廣西日報》）

二十九日 根據江青“8-18”指示，《廣西日報》發表社論《學習捍衛革命樣板戲，奪取文化革命新勝利》，同時報導區直一千多文藝戰士集合批判所謂“攻擊樣板戲反動言行”不點名地批判當時宣傳部長許聖亭，副部長張乃健、文化局副局長江濱。把他們說的“樣板戲並不是十全十美，有些地方不合理、不可信”、“聽起來煩死人”、“可以搞出超過樣板戲的作品”等硬說是“仇視、攻擊樣板戲，實質就是仇視工、農、兵，仇視毛主席革命路線，仇視中國革命，仇視無產階級專政”。

十月

二十一日 自治區黨委、廣西軍區在南寧召開民兵工作會議。區黨委、區革委、廣西軍區、廣西駐軍的負責人劉重桂、安平生、趙欣然、宋治平、梁吉泉、曾小平、韓世福、陳運春、宋瀛州、何紀雲、孫伯威、於斯夫、郭質甫、張理智、熊光武、許長庚、蘇桐卿、盧繼昌、侯超、趙興祥、陳琪、石伴樵、盧延慶、張林、魯風等出席了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各地、市、柳鐵黨委和部分縣委的負責人，南寧、柳州、桂林、梧州四個市民兵指揮部的負責人，以及各地、市工會、婦聯、共青團、公安部門和自治區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會議議題主要是學習上海建設“第二武裝”的經驗，明確在新形勢下民兵工作的方向和任務；同時要組織“不穿軍裝的解放軍”參加社會的階級鬥爭，狠狠打擊階級敵人；要積極宣傳上海經驗，大力支持民兵指揮部，把我區民兵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前進。歷時十天的會議於三十日結束。（據《廣西日報》）

三十日 區直機關黨委召開萬人大會，批判攻擊“樣板戲”反動言行大會，在大會上喬曉光說：“那些攻擊、誣毀樣板戲的人，實質上是仇視工、農、兵，仇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仇視中國革命，仇視……”。又說“敵人在政治上搞復闢，就必然在文藝上搞倒退，他們必然把矛頭指向革命樣板戲。我區文化部門中誣毀、攻擊革命樣板戲的人，他們所做、所為正是適應敵人復闖的需要。必須堅決回擊那些向“樣板戲”的攻擊和誣毀”。同日，《廣西日報》發表一個整版所謂批判、攻擊“樣板戲”的文稿。

十一月

五日 《廣西日報》發表了《以上海為榜樣，加強民兵建設》社論，指出上海經驗的基本內容是：以黨的基本路線為綱，貫徹黨的階級路線，依靠和武裝工人階級，建設一支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城市民兵隊伍；積極組織民兵參加社會階級鬥爭；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任務落實到基層；明確提出民兵的任務是對內反覆辟、對外反侵略，平時管理和改造城市，戰時保衛和堅守城市；加強民兵骨幹的建設；建立民兵指揮部，更有利於加強黨對民兵的絕對領導。因此，上海的經驗具有普遍指導意義。（據《廣西日報》）

十五日 《廣西日報》報導，自治區黨委在最近召開全區宣傳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地、市、縣、柳鐵、軍區政治部和區直機關有關單位主管宣傳文化工作者二百多人。會議傳達貫徹部分省、市、自治區文藝調演精神，分析全區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揭發我區文化部門有人瘋狂攻擊革命樣板戲，研究關於加強理論隊伍建設的問題。區黨委書記喬曉光在會上講了話，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徐瑞林、賀亦然就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建設問題和貫徹部分省、市、自治區文藝調演精神的問題在會上發了言。（據《廣西日報》）

二十七日 自治區黨委在南寧舉行第八次全體會議，分析全區政治經濟形勢，總結一年來的工作，討論了繼續搞好批林批孔運動，進一步鞏固發展我區大好形勢的問題。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區黨委委員一百一十四人，區黨委常委參加了會議。區直各戰線和新聞單位的負責人列席了會議。區黨委常委參加了會議。區直各戰線和新聞單位的負責人列席了會議。區革委主任韋國清主持了會議並講了話。區革委副主任安平生作了工作報告。區革委副主任劉重桂作了國際形勢報告和會議總結。會議認為，全區各條戰線革命生產形勢越來越好，工農生產持續躍進，全區早稻糧食總產量是歷史上增產最多的一年，晚稻也有增產，主要經濟作物也都有較大幅度增產，一至十月，全區工農總產值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交通運輸貨運量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七點四三，各級革委會在同級黨委一元化的領導下，普遍發揮了積極作用，三結合的領導班子進一步加強。我區公社革委會常委和正副主任中，青年幹部佔百分之三十七點七九；各縣革委會正副主任中，都配有一至二名青年幹部；地、市革委會常委、正副主任中，也配備了青年幹部。婦女幹部和少數民族幹部的培養和選拔工作也有加強，會議對今後的工作任務指出，繼續把搞好批林批孔運動當作頭等大事，進一步鞏固發展我區大好形勢；要繼續廣泛發動群眾，打一場批判反動沒落階級意識形態的“人民戰爭”，對流毒深廣的《三字經》、《增廣賢文》、《千字文》、《女兒經》等壞書，徹底清除其流毒。要繼

續開展“工業學大慶”的群眾運動，從思想上、組織上、物質上做好準備，迎接明年國民經濟的新躍進，發揮各級革委會作用，奪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勝利。（據《廣西日報》）

十二月

一日 平樂縣批林批孔學大寨改造古端河，鴉吉牙山村民對方案有意見找公社書記提意見被誣為“圍攻公社黨委書記，是有計劃有預謀的”。公社書記在幹部會上說“是反革命事件”。派工作隊辦批林批孔學習班，採取逼供吊打致死一人，判刑二人，大隊革委主任撤職關押十個月。鴉吉山村十六歲以上居民一百多人被罰站，六十七戶被罰款（全村共九十七戶），拾去大豬四十七頭。在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學大寨中在農村共批鬥一千三百四十六人，收“三地”一萬四千八百八十二畝，收回野馬付業人員二千四百七十五人。（據平樂縣“文革”大事記）

五日 至十三日 自治區黨委召開組織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地、市、縣委、柳鐵黨委，部分區直廠礦黨委主管組織工作的同志以及自治區各戰線、廣西軍區政治部、區直各單位和大專院校負責政治工作的同志共三百一十六人。劉重桂、安平生、覃應機、趙茂勛、杜易、肖寒、廖煒雄等出席了會議。區黨委書記劉重桂、覃應機在會上講了話，區黨委常委、組織部副部長廖煒雄向會議作了工作報告，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趙茂勛作了會議總結。會議把廣西組織工作幾年來推行“左”的路線，以派劃線，對“文革”中造反殺人的“功臣”和有嚴重派性思想的人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的錯誤，當作“成績”肯定了下來，給我區造成幹部隊伍的嚴重不純。中央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明確指出：“廣西區黨委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方面還存在一些缺點，特別是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參與過殺人和殘酷打人的幹部至今還在台上，沒有進行必要的處理。廣大群眾對此意見很大，嚴重地影響了區黨委團結全區廣大幹部群眾進行四化建設的積極性”。經過“處遺”定案，全區處分了“文革”中犯錯誤的幹部一萬八千多人，其中開除黨籍五千人。從組織上撥亂反正，否定了“文革”的那條所謂“正確路線”。（據《廣西日報》、桂發[1974]301號文件）

十八日 區第二次貧下中農代表大會在南寧開幕。這次代表大會共有代表三千零六人，其中婦女代表一千一百四十一人，佔百分之三十八，三十五歲以下的代表八百六十七人，佔百分之二十九，此外，還邀請老幹部、老紅軍、駐軍領導幹部和戰鬥英雄、工業戰線和農林場站的工人代表，各個戰線、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中農、農村教師、革命知識分子、紅衛兵小將，表現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各方面代表一百五十多人。區黨委、區革委、廣西軍區和廣西駐軍負責人劉重桂、安平生、喬曉光、趙茂勛、陳開路、徐其海、宋治平、杜易、肖寒、廖煒雄、毛鳳鸞、韋世經、林福文、曾春生、何紀元、毛餘、李廉芳，有關部門負責人韋永甫、黃紅昇、梁雲禧、羅達林、黃玉英等出席了開幕式。岑國榮、盤美英、郭權卿等也參加了大會。喬曉光致開幕詞，安平生就農村工作問題作了報告。

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永貴、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南樞大隊黨支部副書記趙二苟抵南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會見陳永貴，區黨委書記安平生向陳永貴彙報了廣西工作。

二十四日 陳永貴在區第二次貧下中農代表大會上講了話。大會中心會場在廣西體育館，另設三十多個分會場，共十八萬多人集會聽了報告。市區工廠、郊區、學校以及全區的生產隊都普遍組織幹部、群眾收聽，實為罕見。當陳永貴等在劉重桂、安平生等陪同下繞場一週時，會場代表長時間熱烈鼓掌，把整個會場推向了狂熱的頂峰。大會上，郭鳳蓮通過大會向廣西各族人民贈送了大寨大隊的玉米種，之後，郭鳳蓮、趙二苟在會上介紹了經驗。陳永貴也講了話，極力鼓吹“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理論，說什麼：資本主義傾向，不僅農村有，城市有，機關也有，要把這股資本主義勢力打下去，要解決障礙大幹快上問題，用黨的基本路線去抓人的思想，抓大批促大幹。昔陽縣是通過抓點，解決了點面結合的問題，不敢幹的事也敢幹了，不敢想的事也敢想了，這樣就能幹出一個

社會主義大農業的聲勢和氣魄來。最後，陳永貴強調，幹部參加集體勞動，堅持每年縣裏幹部勞動一百天，公社幹部二百天，大隊幹部三百天。安平生最後講話指出，大寨的道路，是我國農村生產資料所有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後，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繼續革命的道路，我們要爭取把我區所有的大隊都建成大寨式的大隊，把所有縣都建成大寨式的昔陽縣。

二十六日 區第二次貧代會閉幕。大會期間共有四十七個單位的代表和個人作了口頭和書面發言。大會選舉產生了區貧協第二屆委員會，通過了《倡議書》，號召全區廣大貧下中農、社員群眾和幹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繼續搞好批林批孔，把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提高到新水平，以大批促大幹，從根本上改變農業生產條件，為奪取明年新豐收，為實現我區第五個農業規劃而鬥爭。實際上，區第二次貧下中農代表大會為一九七五年全區組織各級領導幹部到大寨“取經”，學習大寨批資批修總體戰那套極左的東西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二十九日 在安平生陪同下，陳永貴等抵柳州市。當晚八點三十分，陳永貴在柳州飯店會見柳州市地、市、柳鐵、柳州軍分區領導人，市委書記郭鵬向大家介紹陳永貴、郭鳳蓮、趙二苟。陳永貴在柳州活動期間，會見老鄉、參觀市郊和農場會說，柳州郊區條件很好，山上是銀行，山下是糧倉；號召郊區農民向大寨學習，毀林造田，大種糧食，不搞副業，大割資本主義尾巴。你們廣西就比不上上海那樣把資本主義搞臭。致使不種蔬菜，城鎮居民吃蔬菜非常困難。（據《廣西日報》、柳州市“文革”大事記）

一九七五年

一月

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元旦社論《新年獻詞》。區革委第九次全體會議通過行文通知各級革委要組織廣大幹部、群眾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全面貫徹執行。（據《廣西日報》）

十日《廣西日報》工農兵通訊員代表會代表和區新聞單位幹部、職工舉行集會，紀念毛澤東主席關於辦好《廣西日報》指示信十七週年。劉重桂、趙茂勛、陳開路、杜易和宣傳部徐瑞林、賀亦然參加了大會。劉重桂在會上指出新聞戰線今年的任務。（見《廣西日報》）

二月

七日自治區黨委召開常委會，學習討論《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階級專政的理論》：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要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各級領導幹部立即帶頭學，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每個基層。隨後，各地、市和柳鐵黨委根據區黨委通知精神，先後開了黨委常委會或舉辦學習班進行了學習和討論。（見桂發[1975]24號文件、《廣西日報》）

十日南寧市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郭耀卿傳達區黨委擴大會議《紀要》，學習《人民日報》社論。把學理論、批判資本主義傾向作為全年工作中心。（見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月，廣西大學召開骨幹會議傳達學習“朝陽農學院教育革命經驗”。韋國清在區黨委擴大會總結講話。決定從十二月至三月七日停課，集中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朝農”經驗。使辦學方向越來越向下。後來把學校搬到山區村上去辦。如桂林醫專搬到湖南與廣西瀘陽交界的山區黃關去辦，於是全國學“朝農”廣西學“黃關”。

廣西大學制定的學“理論”學“朝農”的教育革命方案，提出首先要將大學辦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大學，要求學員畢業後成為單位的理論學習輔導員和宣傳員。（詳見廣西大學“文革”大事記）

二月，河池地區各縣相繼開展“批資批修總體戰”運動，又一次掀起亂批亂鬥高潮，截至年底全地區處理擴大自留地九千二百二十六畝，收回私荒地三萬一千零五十三畝，強行評價私有林木入隊四十六萬三千三百八十二株。私有耕牛七千三百四十九頭；還揭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八百九十人，招回搞野馬副業人員六千五百六十八人、全地區批鬥了大批幹部群眾。（見河池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六日自治區黨委第七期幹部讀書班開學，學員共四百一十九名。喬曉光、趙茂勛、廖煒雄及區黨委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負責人參加了開學典禮，喬曉光在會上講了話。（見《廣西日報》）

三月

四日自治區黨委召開區直機關和南寧市各單位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經驗交流大會。參加大會的有各級領導、幹部、工人、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及理論學習小組共二萬多人。自治區黨委、區革委、廣西軍區、南寧地、市委、革委的領導安平生、喬曉光、趙茂勛、陳開路、宋治平、肖寒、廖煒雄、孫伯威、盧延農、李文軒、石更等出席了大會。大會由肖寒主持。喬曉光講了話，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做調查研究，各級黨組織要做出具體部署，訂出計劃，聯繫實際，領導和幫助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學好。（據《廣西日報》）

本月中旬，為爭取用兩年左右時間把基層單位的門批改抓一遍，區黨委決定組成宣傳隊抓“三分之一”。全區從區直機關和各地、市、縣、公社抽調五萬多名幹部組成宣傳隊，到農村、工廠開展所謂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中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全區各高等院校也抽一千八百名師生參加宣傳隊。實際上是推行“左”的路線，不少幹部群眾在“教育”中被整。（據桂發[1975]34號文件、《廣西日報》）

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區總工會、區團委、區婦聯分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號召工、青、婦的各級幹部、廣大工人、共青團員、紅衛兵、青年、婦女迅速行動起來，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深入地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批資批修批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以優異成績迎接工青婦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據《廣西日報》）

四月

一日至八日全區召開工業學大慶經驗交流大會。大會代表共一千九百多人。韋國清、劉重桂、喬曉光、覃應機、陳開路、徐其海、宋治平、梁吉泉、曾小平、肖寒、廖煒雄、毛鳳鸞、韋世經、林福文、顏景堂、曾春生、劉玉堤、韓世福、熊光武等出席了大會。覃應機在會上作了報告，要求把進一步開展批林批孔和工業學大慶緊密結合起來，抓好“三分之一”，把工業學大慶運動提高到新水平。（據《廣西日報》）

二十三日及二十九日自治區黨委召開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經驗交流會。有各地、市、縣的領導幹部、專業和業餘理論輔導員、理論學習小組、讀書小組和基層代表一千二百多人參加。區黨委、區革委、廣西軍區的韋國清、劉重桂、安平生、喬曉光、趙欣然、趙茂勛、徐其海、陳開路、肖寒、廖煒雄等出席了大會。會上，有農村、廠礦、部隊、機關、學校等十六個單位介紹他們的學習經驗和體會。韋國清在會上講了話。會議號召，要進一步提高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學好理論的自覺性；要有計劃有目的地進行調查研究、要理論聯繫實際，搞好鬥、批、改；要進一步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的建設。這次會議，實際上是進一步推行張春橋鼓吹的“全面專政的那套極左的東西，為在即將開展的所謂“批資批修總體戰”大造輿論。（據《廣西日報》）

五月

五月《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中共台山礦務局委員會文章：《團結戰鬥，勝利向前》。

七日廣西日報社負責人傳達韋國清指示，說在學大寨中要批資本主義、對擴大自留地、“野馬副業”要處理。報社黨委書記說，“野馬副業”要寫一下，第一篇題目叫《評野馬副業》。這是九評野馬副業的第一篇。

二十四日《廣西日報》發表區、地、市、縣書記到學大寨、昔陽參觀學習的消息和社論《深入學大寨快步趕昔陽》，消息說：“大寨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光輝樣板”。“學大寨要狠抓根本”、“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批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大批舊的意識形態”，社論

說“要按照昔陽的經驗，打好批資批修總體戰”“要七門、八門不停休、一直鬥到徹底剷除滋生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土壤”。（據《廣西日報》）

本月下旬至六月下旬，自治區黨委組織各地、市、縣委和區直機關部門的領導，在安平生率領下去大寨、昔陽參觀學習。陳永貴陪同到大寨大隊參觀。參觀團先後在昔陽參觀了二十多個學大寨的先進單位。參觀團回到南寧後，區黨委召開了會議，韋國清要求各地學習大寨、昔陽人民徹底革命的精神；學習昔陽、大寨領導班子思想革命化和貫徹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偉大實踐；並明確指出這次會議是學昔陽、大寨的緊急動員會。隨後，在全區範圍內，普遍地批“五種人”，批“資產主義傾向”批自留地“商品化”，抓所謂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割資本主義尾巴，推廣大寨評工記分形式主義的人造平原，等等。南寧地委把邕寧縣劉鳳大隊黨支書劉增相當作所謂“脫化變質”的幹部，是全地區的“一個典型的反黨人物”，逮捕押解在邕寧全縣二十一個公社進行遊鬥；全地區在這場運動中共處理幹部、群眾一千二百三十七人，其中開除黨籍二百二十四人，拘留、逮捕四百六十六人，判刑四百八十一人，作其它處理六十六人，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致使許多農村幹部、群眾被殘酷批鬥，蒙受迫害，農村生產力受到極大的破壞。（據《廣西日報》、南寧地區“文革”大事記）

六月

九日 廣西日報社書記傳達區黨委參觀大寨學習會議精神。安平生說“要解決‘五種人’問題，‘五種人’掌權就不能學大寨”。“要大批促大幹”。“搞集市貿易是不好的，要加強限制”。喬曉光說，大寨昔陽主要經驗是幹社會主義，想共產主義，抓路線教育，批修正主義、批資產階級法權觀念。學大寨要學根本，學習它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十五日 自治區黨委作出《關於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把我區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提高一個新水平的決定》，提出在全區打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總體戰。簡稱批資批修總體戰。規定自留地面積不得超過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點七。超過部分要堅決收歸集體；自留地主要種社員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飼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嚴禁私人開荒，已開荒的堅決收歸集體；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圍園。已圍的要嚴肅處理；嚴禁把集體田地、魚塘私分到戶或包產到戶，不准借地給私人搞冬種；不准私人搞馬馱、馬車、牛車、船隻運輸撈錢；勞動力歸生產隊統一調配，不准搞“自留人”。生產隊要把工副業納入集體經濟計劃的軌道，堅持“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多種經營要以種養為主；不准搞“野馬”副業，已外出搞“野馬”的要堅決地限期收回來；所有企事業、機關、部隊、學校等單位所需各種臨時工，必須經縣以上勞動部門批准，不准在社會上私自招工；商業、森工以及有關部門對木材、茯苓、松脂等林產品。磚瓦灰砂石等建築材料，各種礦產品等的收購，要和集體打交道，不允許向私人購買。社員口糧分配要堅持基本口糧和工分糧相結合的辦法。反對“工分掛帥”，“物質刺激”，積極推行大寨評工記分辦法。有計劃安排建設社員房屋，堅持“先治坡，後治窩”。加強農村集市貿易管理，糧、油、糖、烤煙、黃紅麻、木材等六種農副產品，一律不許進入集市貿易，除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和有證商販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一律不准從事商業活動，取締長途販運。一切機關、團體、部隊和企事業單位一律不准到國營林場和農村、集市採購國家統派購的農副產品，未經當地市場管理部門批准，不許自行採購三類農副產品；全區所有農村集市從七月份起，一律改為每個星期天一墟期。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上足百分之十左右勞動力進行常年施工。《決定》使“左”的政策系統化、條文化。在《決定》的指導下，一個城鄉結合、上下結合、內外結合的“批資批修總體戰”在全區迅猛開展，大批幹部、群眾被當作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倒把分子”、“現行反革命”、“資產階級保護傘”等進行批鬥，遭受迫害。給全區農業生產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僅南寧市，在批資批修總體戰中，擴大了打擊面。不少人蒙受冤屈，城鄉清理“野馬”副業人員達一千八百多人，郊區收回超過規定的自留地、開荒地一千三百多畝；七五年錯判，七九年以後平反的有十

四人（反革命分子十三人）；市包裝公司被打成“土圍子”等等。極大地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德保縣在總體戰中，揭露了從縣委到公社、大隊班子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問題，四名縣常委長期公款九百四十五元；在三級幹部會上一次賠清，在常委帶動下，當天有五百人退欠款一萬零二百五十元，手錶六十七隻，單車十三輛，衣車五台，收音機十五部，交出現金和實物折款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八元，並在會上批判了兩個有貪污和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單位負責人；全縣共揭出投機倒把案一百八十多起，金額一萬六千多元，貪污盜竊一百六十六起，金額十三萬多元，其中千元以上四十四人，糧食一萬一千三百二十七斤，收回超過政策自留地，開荒地，飼料地九千一百二十九畝，收回“野馬”副業人員七千三百多人，歸還超欠款一百一十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七元，同時，批斗大批四類分子，逮捕判處徒刑七十四人，死刑二人。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在學校中則聯繫所謂教育革命實際，批判“文革”前十七年的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錯誤理論指導下“社來社去”學生畢業當農民，回去拿工分。使教育事業又受到一次摧殘。（據桂發[1975]130號文件，南寧市、德保縣“文革”大事記）

十四日 韋純束在南寧市常委會上傳達區黨委有關“在全區繼續大張旗鼓地向資本主義全面進攻，打‘總體戰’特別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的破壞活動”的會議精神。十九日區黨委又召開電話會議傳達中央十三號文件和中央領導講話精神。南寧市委組織五萬人聽。市委要求全市人民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批判“資本主義傾向”。七月六日市委頒布《加強農村集市貿易管理布告》。七月二十一日又頒布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十條”規定。（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二十八日 廣西日報社書記孫鴻泉傳達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精神，韋國清說大寨、昔陽經驗，不僅適用於農業，它的經驗機關、城鎮、學校都適用。批修批資產階級風、機關、城鎮、農村、工廠都要批。《廣西日報》要發社論、發文章。六月三十日孫鴻泉寫的報社黨委《關於農業學大寨宣傳報導意見的請示報告》提到，宣傳報道主要有五個方面：一、報道學大寨趕昔陽，要擴大共產主義思想宣傳，使廣大幹部胸懷革命大目標，幹著社會主義，想著共產主義，不斷提高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覺悟。要大力宣傳不計報酬，工作不講價錢，……二、報道學大寨、趕昔陽，重抓學理論，抓路線，打好批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批判資產階級的總體戰。……大力宣傳黨、政、軍、民、學齊動員，黨內、外，幹部群眾、上邊下邊一齊抓，城市農村、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緊密配合的情況和經驗，有計劃、系統地批資本主義傾向和修正主義路線。在生產資料方面侵犯集體所有制，化公為私，勞動力自由市場（如搞野馬副業）、產品分配交換（如多分實物、以物量物……）、金錢掛帥、物質刺激等表現，狠狠打擊煽動資本主義妖風的階級敵人。（據《廣西日報》）

七月

十日 至八月二十四日《廣西日報》連續發表十評不准搞“野馬”副業的文章，即《評“野馬”副業》、《“野馬”是害馬》、《鋤“野草”》、《靠什麼“上馬”》、《田少人多出路何在》、《斥錢迷》、《從一百戶調查中得到的啟示》、《事關大局、非清不可》、《要把“野馬”變“家馬”》。把我區剛剛興辦起來的一些社隊企業當作“野馬”批判而被迫下馬。這是當時廣西區黨委在推行極左路線的突出表現，使長期貧困落後的廣西農村經濟帶來重大的災難，國家、人民身受其害。

十日《廣西日報》發表署名“利鋒”的評論《評野馬副業》，把生產隊派人外出搞工、副業生產說成是“野馬”副業，說讓社員搞所謂“野馬”副業就會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同天發表了《全州棕村大隊發動群眾剷“野馬”副業妖風》、《大青山林場學理論聯繫實際糾正私招濫雇不正之風》。十日 至九月四日共發表了批判所謂“野馬”副業的評論十篇，一版配發批判所謂“野馬”副業的消息十七篇；二版發批判專題十二個，稿件六十四篇。在三評“野馬”副業的評論《鋤野草》中，又把城鎮企業請農民來做工叫做“長野草”，說這樣做“就是挖社會主義牆腳，為資本主義培土填泥”，提出“要拴住農村的‘野馬’，必須鋤掉城市‘野草’”。關於批判所謂“野馬”

副業，第一、二、三篇評論題目、內容、署名都是由孫鴻泉提出，第四篇評論也是他布置寫的。有關評“野馬”副業的評論文章都是經他審定後發表。他說評“野馬”副業的報道得到區黨委書記安平生的讚揚。（據《廣西日報》）

二十日《廣西日報》第三版發表理論文章《正確認識我國商品制度的兩重性》，按當時的極左思想說什麼“從歷史上看，資產階級是產生於商品生產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只要商品經濟還活著，起著作用，發展著，就不可避免地繼續產生著資產階級，這個情況正是同舊社會差不多的”。還說商品制度的兩重性……後來從九月十六日至十月七日，先後又發表四說商品生產的理論文章，總的是講商品生產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痕跡，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分子的土壤。為當時限制集市貿易，批判所謂“野馬”副業尋找和製造理論根據。（據《廣西日報》）

二十一日在毛澤東《七·二一》指示指引下，我區積極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新辦了七·二一工人大學三十所，截至十一月底止已建一百三十六所，學員五千多人。中小學校辦工廠（車間）一千六百三十六個，農場六十六萬畝，四市和柳鐵八十九所中學有六十八所辦了農村分校。（據《廣西日報》）

八月

十五日經過批修批資總體戰，環江縣洛陽公社調查外來的“野馬”副業人員情況報告中列舉外來“野馬”人員有七百多人，主要活動有：1、偽造證明，搞地下包工；2、以搞副業為名，進行盜竊活動；3、拐買婦女，為非作歹；4、內外勾結，貪污盜竊；5、以各種藉口，進行詐騙活動；6、抬高工價，牟取暴利；7、開搶物價，破壞市場管理。對此，區黨委將此報告批轉全區，指出“各級黨委一定要高度重視，深入調查研究，認真清理。堅決按照黨的有關政策嚴肅處理。對情節嚴重的犯罪分子，要堅決給予打擊。在清理‘野馬’副業的同時，要按照實際需要和改造把集體副業組織起來，把‘野馬’改造成為‘家馬’”。凌雲縣在八個點開展“批資批修總體戰”大剷“野馬”副業，大剷資本主義尾巴，把農民養的母馬、母豬、母雞、雞鴨說成是“五母”發家，當作自發傾向。實際上，批修批資總體戰是極“左”思潮在全區的泛濫，給人民群眾帶來嚴重的災難，凌雲縣廣大人民群眾痛惡地說，批修批資是對人民群眾的專政。（據桂發[1975]116號文件，凌雲縣“文革”大事記）

三十日南寧市召開“學理論，打好批資批修總體戰”萬人大會。在學習理論中，各級領導帶頭上輔導課，機關印出學習資料二十八萬冊，召開經驗交流大會。全市工農兵理論隊伍發展至二萬四千人。上輔導課五千多場，聽課者達九十多萬人次。業餘馬列自學小組發展二千七百多個，七萬多人。專政機關在工人民兵小分隊配合下大搞群眾專政。於三、三月間組織群眾批鬥了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廖歡榮、冷堅等罪犯巡回批鬥一百四十多場。……聲勢浩大的“一學三批”總體戰說“是有力地斃住了資本主義歪風”。在這期間全市先後宣判二百三十四名罪犯。這次“學理論”、打“總體戰”不少人蒙受冤屈。在農村則把社會主義現階段的政策上允許存在的東西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挫傷了幹部群眾的積極性。（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九月

一日桂林師範學院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文科以評《水滸》為“戰鬥任務”組織教學，改革教學，通過評論《水滸》，提高所謂“識辨投降派”，“防修反修”的自覺性。這場評論《水滸》的運動，實際上是影射攻擊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同志，為以後反擊所謂“右傾翻案風”、批判鄧小平作了思想上輿論上的準備。廣西全區都進行了所謂評《水滸》提高“識別投降派”。

七日《廣西日報》發表評《水滸》的文章，《宋江——投降派的典型形象》、《晁蓋之死與宋江篡權》，實際是影射、攻擊鄧小平。此後連續發表十二個專版評《水滸》的文章。十一月下旬還連續三天在一版突出報導區內評《水滸》，批所謂投降派的活動。

十月

二十八日為貫徹落實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精神，區黨委從區直機關和大專院校中抽調一批幹部和師生組成宣傳隊，與地、市、縣宣傳隊一起，到八個地區、四個市的部分縣、社、隊和廠礦企業繼續抓“三分之一”，要求繼續貫徹學理論，防修反修，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線，狠抓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這樣做的結果，是把農民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的積極性當作資本主義批掉了。（據《廣西日報》）

十一月

本月上旬，全區八十六個縣、市普遍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傳達貫徹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精神。五十多萬幹部參加了會議。大家決心象搞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那樣，全力以赴，領導廣大群眾奪取普及大寨縣和一九八〇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勝利。（據《廣西日報》）

十二月

二十七日為在全區迅速普及大寨縣，加速實現農業機械化，區黨委又從區直機關抽調一批幹部組成宣傳隊分赴各地。連上一批在內，區直下基層的宣傳隊員共達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區直機關幹部一千六百多人，大專院校師生一千六百多人，宣傳隊分駐八個地區，四個市的二十四個縣，五個農場，三十六個廠礦企業，繼續抓學大寨的群眾運動。（據《廣西日報》）

實際上以“階級鬥爭為綱”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的開展。進一步發展了在農業生產“左”的東西。嚴重地挫傷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使群眾繼續過著窮社會主義的貧困生活。

同日中共中央同意喬曉光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趙茂勳、杜易任自治區黨委書記，岑國榮、廖生東任自治區黨委常委。（據區黨委桂發[1975]175號文件）

一九七六年

一月

一日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認真學習、宣傳毛主席兩首詞（即〈水調歌頭·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嬌·烏兒問答〉）和中央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和革委會組織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認真學習，深刻領會毛主席兩首詞和元旦社論的精神實質；要採取多種形式進行宣傳，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在新的一年裏，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以階級鬥爭為綱，繼續貫徹執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促進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促進安定團結，促進社會主義農業、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為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據桂發[1976]1號文件）

三日《廣西日報》一版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教育革命的方向》為題，報導了浦北縣“教育革命的成果”。附題提出回擊“左傾翻案風”。這是《廣西日報》第一次在地方稿中提出反擊“右傾翻案風”。強調該縣各學校都認真上好“階級鬥爭這門主課”，把轉變學生的思想放在首位。

此後，該報在整個一月份的本地區新聞報道和文章中，幾乎每篇都貫穿“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中心，有時，一天的版面上就出現五、六個、甚至七、八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標題。

九日《廣西日報》一版刊登了全國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的震驚人心的消息，可是在當天的第三版卻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奪取新的勝利”的通欄大標題下，刊登了小通訊《歡騰的樂裏河畔》——記田林縣樂裏河改河的二千多民兵、幹部學習毛主席兩首詞的情景；還登了四幅表現我區工農兵歡呼、學習毛主席兩首詞的歡樂場面的宣傳畫，畫旁題有詩句：“新春喜讀光輝詞，邁步征途志更堅”；“奪勝利信心百倍，戰逆流豪情滿懷”。這與讀者極其沈痛地哀悼周恩來總理逝世的心情是極其不協調的。全區沒有舉行悼念周恩來總理的群眾活動是很不正常的，廣大群眾、幹部內心是憤憤不平的。

十二日《廣西日報》發表《紀念毛主席關於辦好〈廣西日報〉指示信十八週年，區黨委常委開會討論進一步改進報紙工作》的消息，文內錯誤地說：“我們要以階級鬥爭為綱，搞好報紙各項工作，把階級鬥爭這個綱，貫穿到每個行動，每條消息，每篇文章中去”。

十三日自治區黨委任命造反起家，剛從“四人幫”控制的《紅旗》雜誌社“學習和工作”回來的李文光為廣西日報社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李於二月九日到職後，分管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的宣傳報道。（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七日上午，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召開宣傳口黨員副科級以上幹部大會，廖煒雄在大會上講話中點名批判鄧小平同志。因為宣傳部派駐《紅旗》雜誌社的李文光，早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已給廖煒雄來信，傳達了姚文元的黑指示，廖煒雄等便有恃無恐地在會上說什麼“鄧小平是‘右傾翻案風’的總根子”。當天下午，廣西日報社群工部立即刷出了“打倒右傾翻案風的風源——鄧小平”的巨幅標語，貼在報社編輯部大樓的外牆上，這是南寧第一張公開罵“打倒鄧小平”的大標語，過路的群眾十分驚異，停步圍觀。兩小時後，報社黨委通知把這條大標語撕下。十八日下午，報社召開了全體幹部職工大會，報社領導幹部在大會上帶頭批鄧。（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廣西日報》刊登自治區革委會通知，要求各級領導在大好形勢下，以階級鬥爭為綱，

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認真組織群眾過好革命化的春節，該報並為此配發了社論《抓緊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社論說：“大破‘四舊’，大立‘四新’，是意識形態領域裏嚴重的階級鬥爭。是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件大事，春節前後，往往是階級敵人利用‘四舊’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時機，我們必須針鋒相對，迎頭痛擊階級敵人的一切挑戰。”於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通欄大標題下，連續登了《過春節不忘階級鬥爭》，有的群眾在節日裏穿戴稍講究，去照相的，是《照相機前的階級鬥爭》（通訊）；賓陽縣蘆墟鎮有個老頭用竹蔑紮了一個小龍頭給孫子玩，則成了“階級敵人”，“腐蝕少年兒童，企圖復辟資本主義”而受到錯誤的批鬥。（據《廣西日報》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版）

本月下旬至二月上旬，《廣西日報》還連續報道了我區教育界、科技界開展“大辯論”，回擊“右傾翻案風”的活動，把主張提高教育質量、改善科技人員工作條件錯誤地當作“奇談怪論”加以批判。

一九七六年《紅旗》雜誌第三期為了配合“批鄧”，刊登了廣西區黨委寫作組署名“桂志”的題為《右傾翻案風與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流毒全國（注：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央編譯局編印《關於“四人幫”及其輿論工具歪曲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部分材料》，摘錄了廣西寫作組署名“桂志”的《右傾翻案風與資產階級法權》一文中歪曲引用的幾處行文）。

二月

本月上旬，我區各大、中、小學校陸續開學，各學校根據區黨委宣傳部的部署，和元旦社論提到的：“最近教育戰線那種刮右傾翻案風的奇跡怪論，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突出表現”的精神，在黨委的領導下，開展了教育戰線的大辯論。一些嚴格執行學校紀律、認真抓教學質量的老師被指責為搞“師道尊嚴”、搞“智育第一”；一些在“文革”初期或中期被揪鬥、批判過的老師更是惶惶不可終日。剛剛恢復起來的教學秩序又被打亂了。二月九日，《廣西日報》在一版顯著地位刊登了南寧市二中黨支部的文章《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的一些體會》；幾天後，又報道了浦北縣黨委為深入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培訓骨幹；之後又登了廣西師範學院中文系理論組寫的文章《不許篡改階級鬥爭這門主課》。

十七日《廣西日報》轉載了二月十二日《北京日報》發表的“四人幫”爪牙梁效的文章《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此稿新華社沒有發電稿，《廣西日報》率先轉載，這在當時全國是罕見的）。區黨委常委立即進行學習。文中提到，“當前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在哪裏？就在黨內至今還不肯悔改的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就是右傾翻案風的總代表、總根子”。常委們一看便知道這是批判鄧小平同志。因為當時在圍中央“工作”的區黨委常委梁吉泉已把中央開“打招呼會”的情況傳了回來。於是區黨委立即決定召開常委擴大會（共六十七人）搶先批鄧，分工幾個常委帶頭批，還交代秘書起草一個電報，對這個重大事件向中央表態，建議中央在適當時候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同志。電報草稿經安平生修改，常委討論通過後，在常委擴大會議上宣讀，即於當天發出。（據“處遺”辦卷宗75號88頁、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會後，各大專院校，各地、市、縣黨委也跟著照樣辦理，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各級黨委常委均帶頭在會上點名批判鄧小平，批判“三項指示”（即毛澤東提出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促進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指示）為綱；並就在群眾中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作了部署。報紙上每天也都是批“三項指示為綱”，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報道和文章，從而在全區範圍內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據廣西大學、廣西民族學院、廣西農學院及各地、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南寧市根據中央精神和區黨委的部署，召開有一千三百多人參加的市委的擴大會議，市委領導帶頭批判所謂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三月份起，由黨內到黨外開始批鄧。中央兩項決議公布後，批鄧進一步形成高潮。（據南寧市“文革”大事記）

同日 廣西日報社翻印了一本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小冊子。（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 吳朝陽（漓江機械廠工人，送往成都電訊工程學院讀書）大學畢業後，於一九七五年十月到金秀縣插隊當農民。插隊期間與同隊青年發生爭執被打傷。於是地、縣委調查組進行調查，認為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激烈鬥爭的反映”。撤了帶隊的縣知青辦副主任邱尚付的職務，並以“摧殘新生事物”之罪進行批鬥。為此五月四日《廣西日報》發表了《頂著風浪上，不開順風船——記農村落戶大學生吳朝陽》的文章。後《光明日報》、《成都日報》也作了報導，因此吳朝陽入了黨，被區、地、縣樹為反潮流典型。（據柳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十一日至十八日 自治區烈軍屬、革命殘廢軍人、復員、退伍、轉業軍人代表大會在南寧召開。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共八百一十四名，區黨委、區革委和軍區領導同志出席了大會。會議期間，代表們“大贊大頌‘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以切身的體驗，批駁教育界、科技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談怪論’，決心保持和發揚光榮傳統，‘以階級鬥爭為綱’，保衛和發展‘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回擊‘右傾翻案風’”。（據《廣西日報》二十日報道）

本月，平南縣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上旬集中全縣中小學校教師五千多人進行八天學習批判。三月點名批判鄧小平。四月上旬，中央作出撤銷鄧小平黨內外職務的錯誤決定後，城鄉集會遊行聲討鄧小平的所謂“反動罪行”。縣成立運動辦公室，各公社成立領導小組，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強調各級黨委要認真重視，書記帶頭深入實際，帶領群眾投入運動。至五月底統計，全縣共訓練骨幹十四萬多人，參加集會遊行批判會的共三十九萬多人，出專欄三千一百多個，批判大字報二十八萬多條，還聯繫“實際”批判了二百三十一人。（據平南縣“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 新華社發北大師生員工批判“三項指示為綱”的電稿。當天，《廣西日報》就發了一個版的所謂批右傾翻案風的地方稿件，其中署名南寧鑄造廠理論小組寫的《用馬克思主義佔領科技陣地》，署名甘壩寫的《駁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林培、周國文寫的《不許挑撥知識分子與黨的關係》。由此可見《廣西日報》批鄧之積極。

十九日《廣西日報》二版刊登了自治區黨校寫作小組的文章《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搞修正主義》。還登了西林縣委書記劉章全的文章《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陳碧河寫的《業務脆風析》。

二十一日《廣西日報》繼續發表南寧鑄造廠部分工人、幹部的發言摘要，批所謂唯生產力論，回擊所謂右傾翻案風……等。

二十二日《廣西日報》發表蘇德禎寫的文章《“三項指標為綱”是修正主義綱領》，林雨如寫的《批判“三項指示為綱”的折中主義手法》，併發表《全區烈軍屬、殘廢軍人、復退轉業軍人代表大會回擊右傾翻案風、保衛和發展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的消息。

二十五日《廣西日報》發表署名“黎軒”寫的《批判修正主義的政治綱領——剖析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反動實質》。

二十六日《廣西日報》發表署名“廣西日報印刷廠工人理論小組”寫的《刮右傾翻案風就是“克己復禮”》。

二十八日《廣西日報》發表《白沙大隊黨支部組織批判“三項指示為綱”，強調發展社會主義農業，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消息。

三月

二日《廣西日報》發表南寧機械廠、南寧碾頭廠批唯生產力論的消息。

八日《廣西日報》發表署名“桂志”寫的文章《右傾翻案風與資產階級法權》。

十二日《廣西日報》用一個版發表記者寫的題為《革命風雷激》的長篇通訊，寫南寧七所高等院校批所謂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大字報巡禮。

十八日 廣西日報社黨委常委開會研究理論學習問題。編輯部一些人提出，說共產黨內有資產階級是新提法。“黨內資產階級和過去的資產階級有何不同？”“即要限制又要承認資產階級法權，具體怎麼執行？”“鄧小平的民主革命思想要批，基層幹部有民主革命思想要不要批？”“老幹部有民主革命，青年幹部有沒有？”“李文光說：“黨內資產階級以合法的手段進行剝削，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同樣可以支配生產資料，到了這一步就完全是資產階級了。黨內資產階級與黨外資產階級有什麼區別？要很好研究。毛主席說，一千年一萬年還有階級鬥爭，這是個很大的理論問題，要認真研究。對文化大革命到底怎麼看，程度不同要提高。三七開要看到七，對三也要一分为二，這個三也是林彪修正主義干擾造成的。對運動的做法，要集中批鄧。”該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孫鴻泉說，“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怎樣理解？這是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毛主席提出來的，不是突然的。黨內產生資產階級要聯繫社會基礎，一是有資產階級存在，小生產存在，自己代表資產階級思想就容易右，再一個是民主革命派，不革命了”。

當天下午，廣西日報社召開職工大會，點名批鄧，有十八人發言，李文光帶頭點名批鄧，孫鴻泉最後講話。（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五日 在廣西日報社黨委常委學習會上，李文光說：“當前這場鬥爭，是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把鄧小平揭出來，批右傾翻案風，這是一場階級鬥爭，我決心從思想上、政治上與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劃清界線”。孫鴻泉說：“過去總認為鄧小平敢抓工作是好的，對他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沒有進行分析，沒有識破他的陰謀，現在看清楚了，不批鄧小平，右傾翻案風就刹不住。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時抓住戰機，對我們也是個挽救。看來翻案與反翻案的鬥爭勢在必行，不出鄧小平也會出現其他人翻案。我們老同志要特別警惕，不要受右傾翻案風的影響。一個是主席說的，小資產階級容易右，一個是要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主要講要三七開，我們要經常想到七，不要老是看到三。對老同志批一下是有好處的。文化大革命不足部分是林彪路線干擾造成的。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時期容易‘左’，社會主義時期容易右”。

二十三日《廣西日報》發表《北暮鹽場工人幹部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走資派紀要》，其中一大段是造反起家、當上鹽場黨委書記的“三種人”、壞分子黃乃賢的發言。（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 孫鴻泉傳達喬曉光對“五一六”通知十週年報道意見的指示。喬曉光說，理論宣傳主要是要解決走資派的問題，階級根源，思想根源，經濟基礎，主要是搞清楚這些問題，有了汽車，住了好房子的，不一定是走資派，主要看執行什麼路線。浦北中小學可以，生產建設問題主要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以階級鬥爭為綱。同日，《廣西日報》發表題為《朝氣蓬勃的一班人》為題的通訊，又吹捧“三種人”、壞分子黃乃賢。（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三十一日《光明日報》刊登了廣西區寫作組的題為《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時期一切工作的總綱》的文章。

四月

二日《廣西日報》一版頭條發表梧州市委新聞科寫的長篇通訊《我們不聽他那一套——梧州市光學儀器廠工人理論隊伍及時識破黑網，堅決抵制右傾翻案風》，文內說什麼這個廠的工人理論隊伍，早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就同“三項指示為綱”對着幹，抵制和批判所謂修正主義路線（其實是迎合形勢需要，上下結合，共同捏造的假報道）此後，在全區工人學理論會上，這個廠得到了喬曉光的表揚。（據廣西日報社、梧州市“文革”大事記）

五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了著名的“四五”運動。四月初，北京市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在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詩詞、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被中央錯誤地定為“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日晚，北京市派出人員清理花圈、標語和抓“反革命”。五日，天安門廣場上的廣大群眾，在“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下，採取抗議行動，被錯誤地宣布為“反革命事件”，遭到殘酷鎮壓。這就是被“四人幫”稱為“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運動。這個強大的抗議運動，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

七日 晚，區黨委常委們收聽中央廣播電台播出的《中共中央關於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後。立即進行了討論，並以區黨委名義，於當晚十一時致電毛主席、黨中央，表示堅決擁護兩項決議。電文中說：中央作出的這兩項決議是非常“英明”、“大得人心”的。“決心以階級鬥爭為綱，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用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徹底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行到底”。（據區黨委“處遺”檔案64卷）

同日 廣西日報社門前貼出“揪出中國的鄧納吉”的大標語。（據“處遺”檔案64卷）

同日 經區黨委批准，《廣西日報》在一版刊登《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的徵文啟事》。《啟事》說：“文革十年來，我區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意見風發，鬥志昂揚，革修正主義的命，革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命，蕩滌舊社會的污泥濁水，迎來了到處鶯歌燕舞，舊貌換新顏的光輝勝利”，……“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把文化大革命說得一團漆黑，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這是革命人民絕對不能答應的”。……《啟事》要求徵文歌頌“文革”，繼續批鄧，顛倒是非，顛倒敵我關係。

八日《廣西日報》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的兩個《決議》，和所謂《天安門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三條重大消息。併發表了李文光連夜派出記者到南寧郊區，以工人、農民、解放軍、民兵指揮部、公安部門等名義寫的六篇表態文章，拼成一個專版，還寫了一篇南寧黨政軍民表態的消息，表示擁護中央決議，對製造所謂天安門事件的階級敵人實行專政，要深入批鄧，批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到底。（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 正在來賓縣搞“社教”的廣西醫學院七三級學生吳久華聽到上述三條重大消息的廣播後發表議論說：“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無關，在這之前他已受批判，難道他能指揮？他有那麼蠢？這是壞人利用黨內矛盾，分裂黨中央”。“中央撤銷鄧小平職務的決定是輕率的、可笑的”。“三項指示為綱沒有錯，黨務之急就是要貫徹三項指示為綱，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吳的這些議論被當時駐來賓縣的區黨委宣傳隊認為“反動言論”，辦他的“學習班”。四月十九日，宣傳隊向區黨委運動辦公室上報《關於吳久華反動言論問題的報告》。四月十八日，區教育局轉來廖煒雄指示：“應將吳久華馬上調回來批判，並提出處理意見”。醫學院革委副主任左克顯將吳久華帶回學院後，又辦吳的“學習班”，連續一個多月，後定吳久華有精神分裂症而令退學，並送柳州精神病院治療。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廣西醫學院黨委為吳久華政治平反，但未能恢復學籍。（據廣西醫學院“文革”大事記）

九日 南寧軍民十五萬人舉行盛大集會遊行，熱烈歡呼中央兩個決議，憤怒聲討“鄧小平的罪行”。區黨委第一書記安平生在大會上講話。他說：“製造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這就充分說明，鄧小平是一切新老資產階級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勢力的總代表”，“我們決心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行到底”。同日，桂、柳、梧、百色、玉林、欽州、河池等地各族人民也分別舉行盛大集會遊行，共三十七萬人參加。《廣西日報》在報道這一活動時，號召群眾“把鬥爭鋒芒對準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堅決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見九日、十日《廣西日報》）

本月上旬，自治區貧下中農協會在區黨委直接領導下，召開了第二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區黨委負責人安平生、覃應機、趙茂勳、杜易等出席了會議。會議組織大家學習毛主席有關“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系列指示，集中火力“批鄧”，批判他的“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批判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批判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闢資本主義的罪行’”。會議認為貧協的工作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發動廣大貧下中農，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群眾運動。學習大寨的經驗，始終抓緊階級鬥爭這個綱，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繼續打好“批資批修總體戰”；在安排農業生產中，繼續貫徹“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發揚“天大旱，人大幹”的大無畏精神，奪取農業大豐收。在農村基層組織中，進一步樹立貧下中農的階級優勢。（據區黨委桂發[1976]8號文件）

十五日《廣西日報》又發表署名“廣西日報社印刷廠工人理論小組”的文章《他們是馬列主義的敵人》，支持鎮壓所謂製造天安門事件的“階級敵人”。

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為了鼓動“批鄧”，刊登了廣西寫作組的題為《為什麼走資派還在走》的文章，流毒全國。

二十八日 李文光在傳達上級精神時說：“五月那麼多節日，應該主要是讚頌文革十年。天安門事件是個大翻案，要批鄧，抓天安門事件。五月要集中批鄧”。（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日報》轉載署名“桂志”的長文《為什麼走資派還在走》，文章誣謊說：“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所以要坚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因為黨內走資派是黨內外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是妄圖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還因為他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文章還胡說：“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只要這個階段沒有結束，剝削階級就必須會把復闢希望變為復闢行動，走資派必然還會走”。當天，還在一版頭條以《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罪魁禍首》為題，報道《廣西民族學院中文系以天安門事件為反面教材，把批鄧推向新高潮》的消息。

五月

三日至五日，區黨委召開了有區直機關、廣西軍區直屬機關、南寧市、南寧地區的部分工農兵業餘理論骨幹、專業理論工作者和領導幹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座談會，對正在掀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據見六日《廣西日報》）

四日《廣西日報》開始用《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為刊頭，在一版發表該報記者和通訊員合寫的通訊《頂着風浪上，不開順水船》，報道大學生吳朝陽到金秀瑤族自治縣當農民。此後，該報掛《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的刊頭，發表專版四十九個，內容極為廣泛，有全區工業、農業、商業、教育、科技、文藝、衛生、體育各條戰線的所謂“發展”和“變化”，及所謂先進人物等。（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七日 區黨委發出《關於徹底追查所謂總理遺言等反革命政治謠言的通知》。《通知》說：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是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放手發動群眾，打一場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的人民戰爭。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的重點，是所謂總理遺言。要集中力量，走出計劃，抓緊時間，務必在最短時間內查出結果。在基層單位還要成立追查反革命謠言領導小組。（據區黨委桂發[1976]10號文件）

同日 上午，區黨委召開南寧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號召共產黨員和廣大軍民把批判鄧小平，反擊“在傾翻案風”、追查反革命的破壞活動推向新高潮。大會主會場設在自治區黨委會禮堂，並有十四個分會場同時收聽。安平生、喬曉光等出席了大會，趙茂生主持大會，劉重桂在會上講話。他首先宣讀了公安部[1976]12號文件。接著說：“在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中，要放手發動群眾，徹底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反革命詩詞，反革命傳單，反革命標語，堅決打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號召全黨動員，打一場徹底追查“反革命”的人民戰爭。這是把懷念周恩來總理，痛恨“四人幫”，為鄧小平鳴不平的輿論當作反革命政治謠言追查，是完全錯誤的。

《廣西日報》緊密配合，在《堅決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破壞活動》的通欄大標題下，發表了《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手段》、《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威力大》、《群眾專政就是好》、《用革命輿論粉碎反革命輿論》、《不信謠、不傳謠，堅持鬥爭大方向》等文章。（據見八日《廣西日報》）

在這次追查活動中，製造了不少冤案。所謂南寧麻紡廠的“反革命糾合案”，逮捕了該廠五名幹部職工，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一九八〇年才得到平反。“工農兵飯店事件”的當事人原木森，因說了幾句為鄧小平同志鳴不平的話，被公安局逮捕，說他製造謠言，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判無期徒刑，一九七九年底才得平反。市糖煙公司職工周驥勳，也因為鄧小平同志說了幾句好話，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三月才平反。僅在這半年時間裏，南寧市錯判的反革命分子，後來平反的就十六人。柳江縣進德公社進德街居民鄧家祥從“同姓一家親”的舊觀念出發，對別人講：“你們不要批判鄧小平，他是我的叔公，他沒有什麼錯誤”。也被逮捕法辦，判徒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才得平反。融水縣五金公司修配門市部一幹部曾議論談到：“周總理去世了，要是給選總，我選鄧小平當總理”。結果被追查批鬥十多次。隆安縣在二十天內，揭發謠言一百三十一起，批鬥了二十七個“謠言製造者”，拘留一人，逮捕四人。而這些“謠言”有些竟是毛主席有關調整文藝政策的指示。蒼梧縣在追查謠言中，把從外地回家探親的和“四五”期間外出歸來的人，都作為重點追查對象，搞得政治氣氛十分緊張。梧州市查出“總理遺言”六十六份，傳涉一百七十一人；“政治謠言”九類八十九條，傳涉六十八人。這些“政治謠言”多數是“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各種片斷情況和外國電台對江青、“四人幫”的種種評論。這些“謠言”傳涉到的人均被責令檢查交代，有些人還被公安局拘捕。全州縣在縣直機關和廠礦企業中追查，查出“總理遺言”三份，“反動詩詞”六十八份，其中許多是天安門前悼念總理和咒罵“四人幫”的詩；還把毛主席悼念周總理和陳毅的詩詞，也當作反動詩詞查抄了。還查抄，邊“消毒”，被迫交出詩詞的人還要挨鬥。那坡縣在追查謠言中逮捕了二十七人，判刑二十五人，打倒“四人幫”後，全部平反。靈山縣酒廠出納員譚瓊秀，因說了：“鄧小平被撤職了，但還是黨員，還有選舉權嘛”。結果被打成反革命而被捕，還有三人也是因“政治謠言”而被當作現行反革命被捕的，到年底才釋放，一九八三年徹底平反。欽州縣城南大隊一復退軍人禰德超，也因講了鄧小平的好話，而被當作現行反革命逮捕判刑。陸川縣把從北京遣送回來的上京告狀者劉永福，當作“天安門事件”參加者，在縣單位和公社巡回批鬥。（見各市、縣“文革”大事記）

十日 平南縣發動群眾追查政治謠言。全縣共查出所謂總理遺言四份，其他所謂反革命謠言三十一種，書寫反動詞句，呼喊“反動口號”十八起，破獲一起重大“反革命匿名信”，查獲反革命糾合集團線索一條。造成一批冤案。（據平南縣“文革”大事記）（注：在整個“文革”期間因反對林彪、“四人幫”和為劉少奇、鄧小平鳴不平而被判刑的，全區有四百一十五件，四百五十六人）

七日 在“學朝農，狠批‘右傾翻案風’”的形勢下，廣西農學院籌備遷校，借用廣州軍區“五·七”幹校在全州縣紹水公社的部分房屋和土地為校址，先成立桂北分院，任命黨委副書記陳清源為桂北分院臨時黨委書記，將原籍屬桂北四十個縣的學員分往桂北分院，教學設備也一分为二。四百多師生在陳清源帶領下，自背行李，步行到火車站，再乘車前往全州。說什麼這是“與舊傳統決裂，同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對着幹”。由於無校舍，只好把農學、植保、園藝、牧醫、農機等五個系的師生員工，分別安排在全州縣的城廂、才灣、紹水、咸水四個公社和軍區“五·七”幹校農場等地進行開門辦學。口號是：“以社隊為學校，以農村為課堂”。和貧下中農一起勞動，無法建立正常的教學秩序，師生們意見很多。打倒“四人幫”後又撤回南寧。這樣往返搬遷，用了二百多個車皮，浪費了幾十萬元。（據廣西農學院“文革”大事記）

本月上旬至六月上旬，區黨委組織公社黨委書記以上各級領導幹部共二千七百多人，分批到大寨、昔陽參觀學習。陳永貴接見了參觀團負責同志，大肆鼓吹“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理論，割資本主義尾巴。參觀人員回來後，照搬大寨那套左的做法，用“大批判開路，大割資本主義尾巴”、實行“政治工分”，不准搞家庭副業，不准趕墟，不准走親訪友，用對農民實行“全面專政”的辦法建設大寨縣，盲目大搞農田水利和人造小平原等等，極大地挫傷了幹部、群眾的積極性，嚴重地破壞了我區的農村經濟。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我區糧食連續三年減產，同這種左的錯誤密切相關。當年全區有玉林、象州、武鳴、都安、合浦、田陽、橫縣、賓陽等二十三個縣被宣稱進入了建成大寨縣行列。

十二日 區黨委批轉發出《全區一九七六年計劃會議紀要》。全區計劃會議從四月六日起在南寧召開了二十二天。先開了十四天的預備會議。後開了八天正式會議。會議期間，區黨委第一書記安平生到會作了多次指示，區黨委書記覃應機作了報告和總結發言。整個會議也是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為主要內容，集中火力批鄧。（見桂發[1976]12號文件）

十四日 區黨委召開的全區工農兵理論隊伍經驗交流會在南寧開幕。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各地、市、柳鐵、區直機關、廣西軍區和駐軍的工農兵理論輔導員、理論學習小組、讀書小組和基層單位的代表共一千二百多人。安平生、喬曉光、杜易等出席了開幕式。會上，廖煒雄致開幕詞。梧州市光學儀器廠代表介紹該廠工人理論隊伍，早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就同“三項指標為綱”對着幹，堅決抵制、批判所謂“右傾翻案風”和修正主義路線（注：這實際是一個上下共同編造的假典型的經驗，受到了喬曉光的表揚）。（見十五日《廣西日報》）

這個會，實際是一個培訓批鄧骨幹會。經過這樣的交流培訓，這些代表又回到各地去培訓基層的批鄧骨幹。據百色、欽州、平南、博白、岑溪、天峨、羅城、梧州、富川、武鳴、那坡等十一個市、縣的不完全統計，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中，共培訓骨幹二十一萬五千四百多人。（據各該縣、市“文革”大事記）

十六日 南寧軍民十五萬人舉行盛大集會遊行，隆重紀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週年。“熱烈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自治區黨委、革委會、廣西軍區、南寧駐軍、南寧市黨委、市革委會、南寧地區黨委、地區革委會負責人出席了大會。區黨委第一書記、區革委會主任、廣西軍區第一政委安平生在大會上講了話。大會通過了給毛澤東、黨中央的致敬電。這一天，桂、柳、梧、百色、欽州、河池、玉林各地、市、縣也都舉行了大的集會遊行。（見十七日《廣西日報》）

十七日 區黨委發出《關於認真學習中央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的《電話通知》。《通知》說，這篇重要文章，傳達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闡明了文化大革命偉大的歷史意義。全區各級黨組織一定要把學習放在首位，領導廣大幹部和群眾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學習中央兩報一刊這篇重要文章，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回顧十年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戰鬥歷程，總結“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一步掀起深入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新高

潮，掀起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新高潮。

同日 都安縣召開首屆宣戰戰線先代會，太平大隊二隊理論輔導員韋花榮在會上作了題為“同修正主義路線對着幹，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鬥爭”的發言（此材料內容多數是假的）。先後韋被樹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與修正主義路線對着幹的“標兵”，先後到本縣、地區、自治區、廣州軍區等作三十多次講演，各級報刊電台采用了有關她的爭跡的稿件。在區內外造成極壞影響。（據都安縣“文革”大事記）

十八日 區革委會發出通知，要迅速開展以反擊右傾翻案風，歌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主要內容的群眾歌詠活動，要求各級領導帶頭學唱、教唱。組織專業或業餘作者編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歌曲。迅速在全區學校、機關、工廠、農村、部隊掀起群眾性歌詠活動高潮。（據區革委會[1976]28號文件）

《廣西日報》為配合這一活動，於五月三十一日在第四版刊登了七首歌曲：《黨中央兩個決議威力大》、《翻案不得人心》、《舉起革命的鐵拳頭》、《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歌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貧下中農不信邪》、《誓讓紅旗萬代飄》。許多市、縣的廣播站協同文化部門舉辦了廣播教唱節目，教唱上述歌曲。使“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妖風毒霧彌漫全區每個城鎮和山村，毒害人民。

凌雲縣革委會於五月六日以[1976]24號文件發出通知說：為了配合集中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1776]28號文件指示精神，作如下通知：1、迅速開展以反擊“右傾翻案風”，歌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主要內容的歌詠活動。……2、專業和業餘歌詠文藝隊伍要深入各單位進行演唱輔導……3、各大隊、生活隊要以業餘文藝宣傳隊為骨幹，廣泛發動群眾積極開展歌詠活動；4、各級領導帶頭學，帶頭教唱……”。這個通知錯誤地為“反擊右傾翻案風”製造輿論。但廣大幹部和群眾對此普遍懷疑、不滿，有的幹部學習不發言，不寫“批鄧”的大字報，被扣上“右傾”、……的帽子。由於“批鄧”，凌雲局勢再度陷於動蕩、混亂狀態。（據凌雲縣“文革”大事記）

二十九日《廣西日報》以《毛澤東思想育新人，文化大革命結碩果》作通欄標題，用兩個版的篇幅，報道“文革初期敢沖、敢闖、帶頭造反的紅衛兵，以後當上領導幹部的所謂先進事跡。其中有當時任貴縣奇石公社黨委書記，後定為“三種人”、被開除黨籍的廖剛，和當時任廣西大學黨委常委、革委副主任，後因“文革”問題而受留黨察看兩年處分的何武。（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三十一日 區黨委轉發區工商行政管理局黨組《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集市貿易管理意見的報告》。《報告》說：“在批資批修總體戰中，自去年下半年以來，由於‘把全區墟期統一由五天一次改為七天一次（統一規定星期為墟日）；禁止糧食、糖、油、黃紅麻、烤煙、木材以及中豬上市；建立健全生產隊代購代銷店；取締長途販運，打擊投機倒把；充分發揮依靠貧下中農管理集市的作用，在經濟領域裏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批判了資本主義傾向以來，全區農村集市貿易的活動範圍縮小了，國營商業和供銷社收購農副產品的總額增加，集市農副產品出售總值下降，成交額顯著減少”。（見桂發[1976]16號文件）用限制農村集市貿易的辦法來壯大國營商業，無異於削足適履。各地自實行上述辦法後，許多縣城和墟鎮出現了買不到蔬菜和其他副食品，買不到柴草，造成城鎮居民職工生活上很大困難，紛紛向領導反映意見，而一些領導竟說：“寧吃社會主義的鹽，也不吃資本主義的青菜”。永福縣幾宗大的土特產品，如羅漢果、香菇、冬筍等上市量大大減少，市場冷落蕭條，造成地方財政和人民生活困難。（據各該縣、市“文革”大事記）

本月份，《廣西日報》批鄧達到了高潮，幾乎天天都有批鄧文章，有時甚至一個整版或兩個整版都是批鄧文章，二十一日發表了《“貓論”就是復闢論》，二十四日二版發表了署名區效的批判文章《全面整頓就是全面翻案復闢》，同日的第四版還發表了署名黃河的長詩《第十個春天》，狂

熱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所謂偉大勝利，惡毒攻擊咒罵鄧小平“賴抱雞一樣死抱住資產階級法權，……”，“組織起還鄉團”，……“惡魔遮不住鬼臉，……烏鴉扮不成鳳凰”……“這個復闖狂要起江湖駱騙，……捧出麻痹人民的蒙汗藥，兜售毒殺革命的糖砒霜”。用詩歌形式如此毒惡攻擊鄧小平同志，在全國實屬罕見。

六月

七日 自治區黨委召開全區縣委書記會議。區黨委第一書記安平生在會上作報告。說：“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中，毛主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是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安平生說：“在這一鬥爭中，我區各地緊密聯繫實際，揭露出了一批黨內資產階級的問題。今年一月以來，據不完全统计，全區共揭發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案件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二起，牽涉到大隊黨支部副書記以上的領導幹部四百九十九人，其中有二百六十人是在三月《人民日報》公布毛主席上述指示以後揭出來的。在上述這些人當中，有大隊黨支部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副書記、縣革委會的局長、副局長，縣黨委常委、縣革委會副主任，甚至還有市黨委常委、市委副副主任。大量的事實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黨內確實存在資產階級’，‘走資派還在走’”。他在報告中分析總結出‘走資派’有六個共同的特點。強調在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中，“重點是要搞好同黨內資產階級的鬥爭”，“要充分利用鄧小平這個‘反面教員’，繼續深入批判”。“和黨內走資派鬥爭，必須大搞群眾運動。要堅持城鄉一起搞，黨內外一起搞，上下左右一起搞”。安平生說：“去年，儘管有鄧小平鼓吹‘三項指示為綱’的干擾，但我們始終是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組織縣委書記以上主要幹部到大寨、昔陽參觀，學習大寨的基本經驗，堅決執行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精神，打了批資批修總體戰，這實際上是和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對着幹的”。“今後在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中，要緊密聯繫實際，以抓好同‘黨內資產階級的鬥爭’為重點，繼續打好批資批修總體戰，使我區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群眾運動不斷深入發展”。“根據中央關於‘省、地、縣都要派大批幹部下去，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搞好’。現在我區地、市、縣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幹部在下面，自治區派到下面搞三分之一的宣傳隊佔機關編製的三分之一。全區機關幹部下到基層工作的達六萬人以上”。“對那些問題特別嚴重的社隊，縣委領導要深入基層，發動群眾，揭開‘階級鬥爭’蓋子，解決領導權問題”。會上，還印發了一些“走資派”的典型案例。（據區黨委一九七六年檔案文件）

會後，各市、縣在貫徹這次會議精神中，全面掀起大學、大揭、大批、大鬥、大幹高潮，又使一批城鄉基層領導幹部遭到打擊迫害。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桂林市委召開市、郊區兩級常委擴大會議。會上，市委常委、市委副副主任梁繼光被當作該市“黨內走資派”典型進行了批判，並撤銷其黨內外職務。桂林市大河公社新民大隊李良埜被當作“走資派”批鬥，被迫自殺；市養殖場黨支部書記謝虹被拘留審查，逮捕法辦。臨桂縣硫鐵礦礦長馬本旺、縣氮肥廠副廠長尹輔續，因主張加強和改進廠礦管理，實行按件計酬，被當作搞“修正主義”而受到多次批判。北流縣把積極帶領群眾搞集體工副業的德勝塘生產隊隊長黃松當作搞“資本主義”而加以逮捕判刑。隆安縣那桐公社黨委書記農積活，被誣為“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典型，被押在全縣範圍內巡回批鬥。上林縣錯誤地把縣革委會副主任盧萬山當作“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進行批鬥。平樂縣委組織萬人批斗大會，批鬥了兩次寫信給縣委和縣廣播站，主張“應允許社員在自留地上種菜出賣，以彌補一些油鹽錢”，同樂大隊第五生產隊民兵排長黃桂榮，說他的信是“大毒草”，破壞了農業學大寨運動”。會後還拉黃桂榮到全縣十三個公社的群眾大會上巡回批鬥。據全州、資源、田東、百色、靈山、馬山、鹿寨、天峨、羅城、隆安、大新、富川、藤縣、那坡、北海等十五個縣、市的不完全統計，共批鬥了有“破壞活動的階級敵人”五千四百多人，批鬥“走資派”六百九十多人，揭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案件九百零五起，批判有“嚴重資本主義思想行為”的五千五百七十多人。這樣的亂批亂鬥，極大的挫傷了幹部、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據各該市、縣“文革”大事記）

九日《廣西日報》二版發表該報記者、通訊員合寫的長篇通訊《小將在鬥爭中前進——記合浦縣委副書記賓祖媛》，吹捧造反起家的賓祖媛。說：“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興起的時候，廣西大學有一位紅衛兵女將，高舉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造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權，累立戰功，這位紅衛兵女將的名字叫賓祖媛。十年過去了，小賓現在怎麼樣，她仍在戰鬥，就像當年紅衛兵那樣……勇敢地同修正主義路線鬥，同階級敵人鬥，同錯誤傾向鬥，顯示出無產階級青年一代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革命風貌”。還刊登了賓祖媛在台浦縣三級幹部會上帶頭批判“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鼓吹“三項指標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的照片。（賓祖媛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犯嚴重錯誤，後在整黨中作不予登記處理。）（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十六日《廣西日報》二版發表署名“黎軒”的文章《揭穿鄧小平用折中主義搞復辟陰謀》。這是孫鴻泉在宣傳戰線批鄧的發言稿。文章污蔑鄧小平同志說：“他講專政，不強調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大講反什麼‘派性’，批什麼‘極左’，大談什麼都要整頓，實際是借機想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老幹部打下去”。“他狂叫要敢字當頭，反所謂‘派性’，把文化大革命整黨內走資派污蔑為‘極左’，揚言要堅決地鬥，……要統統進行整頓……，鄧小平的這些謬論，完全是為了攪亂階級陣線，打擊革命新生力量，排擠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老幹部，扶持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重新上台”。更進一步誣毀鄧小平同志的言論“和布哈林、林彪是一路貨色”，“是中國的納吉”。（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七月

二十八日《廣西日報》發表署名“黎軒”的思想評論：《深入批鄧，長期作戰》，文中說：“走資派還在走，是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這一個修正主義頭子垮台了，又會有另一個頭子出來推行修正主義路線”。（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同日《廣西通訊》第十三期發表署名團區委學習中心組的文章《鄧小平是最大的教唆犯》。文章說：“鄧小平是黨內外資產階級的總代表，是掛帥人物，他利用手中掌握的那部分黨政大權，瘋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毒害群眾，唆使青少年走資本主義道路，比社會上的教唆犯有更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據團區委“文革”大事記）

七、八月份，批判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時所製訂的《論總綱》、《黨報提綱》和《工業條例》所謂三株大毒草。

八月

二日 區黨委批轉了《全區“七·二一”工人大學、五·七大學經驗交流會議紀要》。《紀要》說，一年多來，我區各級黨委認真貫徹一九七五年全國“七·二一”工人大學教育革命經驗交流會議期間和朝陽農學院辦學經驗，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員的道路，依靠群眾紮紮實實地興辦了一批“七·二一”工人大學和五·七大學。到現在，全區有“七·二一”工人大學四百三十八所，學員一萬五千九百六十一人，五·七大學十九所，學員五千二百五十一人。這些大學是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辦起來的，培養同工農劃等號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紀要》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南寧召開了全區“七·二一”大學、五·七大

學經驗交流會。基本經驗是：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相信和依靠群眾，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積極實踐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同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着幹，走毛主席已經指出的辦學道路，把轉變學生思想放在首位，實行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同工農劃等號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使學校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紀要》認為：“教育戰線上的主要危險仍然是修正主義”。“學校要上好階級鬥爭主課，要不斷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批判知識私有，智育第一，學而優則仕等剝削階級的舊觀念。要把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作為基礎課。學校要徹底破除“三脫離”（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生產勞動、脫離工農群眾）、“三中心”（課堂中心、書本中心、教師中心），“三段式”（普通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技術課）的舊體系，建立學校、生產單位、科研機關三結合和教學、生產勞動、科學研究三結合的新體制）。招生對象，著重考慮政治思想和實踐經驗，不受文化程度和年齡的限制。（區黨委桂發[1976]24號）《紀要》反映出來的左的指導思想和做法是非常明顯的，辦學校不從提高學員的文化科學知識和專業技術水平出發，而是要把學校辦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這對發展生產、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都是無益的，這樣的學校也是沒有生命力的。“四人幫”以教育革命為藉口，破壞學校教育事業由此可見一斑。

九月

九日 毛澤東主席逝世。區黨委於九月十日發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唁電，表示對毛主席逝世極其沈痛的哀悼。同時也給江青發唁電，向江青這個壞蛋表示親切的慰問。這是與全國各省市有不同的、獨特的做法。電報是經過常委們討論，並由區黨委第一書記安平生簽發的。（據區黨委“處遺”辦永久卷宗75號99頁）

十八日 全區一千七百多萬各族人民懷著極其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分別在南寧和其他各市、縣隆重舉行追悼大會，極其沈痛地悼念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各地人民群眾表示，化悲痛為力量，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項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在悼念毛主席期間，少數幹部和群眾因一時疏忽大意，或說錯了話，或違背了上級規定的有關事項，而受到批鬥或逮捕判刑。靈山縣農科所職工譚之榮等十五人因唱歌、飲酒，而被拘留，以後才陸續釋放，八〇年徹底平反。該縣文化局長廖科，因講了“毛主席的豐功偉績罄竹難書”，便被鬥了一年多，前後共十八場，還被拉到全縣幾千人的大會上批鬥。扶綏縣水電局幹部林文周等人因違禁令，被捕坐牢。隆安縣雁江公社黨委書記阮瑞榮參加加菜、飲酒，被認定是對毛主席沒有感情，幸災樂禍，被批鬥後，受雙開除處分。龍勝縣有兩個職工違禁打魚、飲酒，未配戴黑紗而受批判、逮捕判刑。

十月

六日 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採取斷然措施，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實行隔離審查。“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結束了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全國人民衷心擁護。

十九日 李文光在廣西日報社黨委常委會上還狂叫，要以《億萬人民的心願》為口徑，批鄧還要批，批“三項指示為綱”，“白貓黑貓”。當天該報發表後因“文革”問題被開除黨籍的潘天福的文章：《團結大傷人心，分裂不得人心》。文內還在胡說：“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妄圖翻案復辟，分裂我們的黨，也遭到可恥的失敗”。三版發了五篇表示要團結在華國鋒周圍的稿

件，每篇都點名批鄧。

二十日《廣西日報》一版頭條發表署名“黎軒”的文章《同黨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作堅決鬥爭》，文內說黨內路線鬥爭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還會出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一類人物”。（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

本月下旬，全區各市、縣黨、政、軍民、學，上千萬人舉行盛大集會遊行，熱烈歡呼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擁護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城鄉一片歡騰。區黨委、區革委會、廣西軍區給華主席、黨中央發了致敬電。（據二十五日《廣西日報》）

從一月到十月，《廣西日報》刊登我區“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稿件共一千七百三十八篇，共六百五十四個版，平均每天六篇；有時一天四個版都是批鄧文章。而打倒“四人幫”後，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廣西日報》共發我區批“四人幫”稿件七百二十九篇。據平南、博白、岑溪、百色、平果、武鳴、扶綏、天峨、羅城等縣的統計，批鄧中共開批判會一萬八千五百九十多次，出批判專欄牆報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二版，批判文章達七十二萬九千多篇，詩歌九千五百多首。（據廣西日報社“文革”大事記、各該縣“文革”大事記）

十一月

上旬，自治區黨委以及各地、市、縣黨委和廣大幹部、群眾紛紛舉行大會和座談會，憤怒聲討“四人幫”，批判他們的反革命罪行。（據《廣西日報》）

二十六日 喬曉光在區黨委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議上講話，傳達全國宣傳工作座談會精神。主要是三個問題：一是突出宣傳華國鋒主席；二是大力宣傳粉碎“四人幫”的偉大意義；三是揭發批判“四人幫”罪行。強調要大贊大頌華國鋒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當之無愧的英明領袖，要繼續提高突出宣傳華國鋒主席的自覺性，要在全區城鄉普遍書寫讚頌和擁護華主席的大標語，要普遍張掛華主席的標準像。（據區黨委文件16號）

一九七六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本“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書：（一）《回擊右傾翻案風》，印了四十三萬五千冊。（二）《評三項指示為綱》，印了五十萬冊。（三）《翻案不得人心》，印了二十萬冊。（四）《批判修正主義路線，回擊右傾翻案風》，印了十萬冊。（五）簡評《水滸》印了二萬三千冊。（六）《論總綱》選批，印了十萬冊。（七）《從蘇聯變修看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印一萬六千冊。以上七本書共印了一百三十七萬四千冊。竭盡全力宣傳“四人幫”極左理論，流毒全廣西以至全國。（據廣西人民出版社“文革”大事記）

《廣西“文革”檔案資料》

編審委員會

黃 霖 金賁生 區濟文 李殷丹 韋章平

黃 嘉 陳 泳 黃 英 鄧少東 楊振宗

王昇階 黃 耿 孫善佑 劉洪濤

主 編

區濟文

副主編

黃 英 孫善佑 林靜中 李文忠 何 俊

陳緒倉

編 輯

熊景德 藍秀珍 陽孟瓊 覃振鳳 安 潔

伍 權 李翔 王 走 賴 偉 黎明光

張國強 秦崑江 林慶芳 藍 天 周國成

楊梅梅

後記

廣西於一九八三年開展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簡稱“處遺”）工作，一九八四年開展整黨工作，把“處遺”工作納入整黨中一同進行。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自治區黨委四屆八次全體會議宣布“處遺”工作結束後，自治區黨委整黨辦公室根據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辦公室，國家檔案局聯合下發的中整辦（1984）22號“關於認真做好整黨文件材料歸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和當時中指委辦公室關於編好整黨工作大事記的指示精神，及時向全區部署編寫《廣西“文革”檔案資料》，作為史料存檔備查。這是一項細緻、複雜的工作，加上排印工作量大（八個單位承印），在各地、市、縣委整黨辦公室的通力協作和有關單位的支持下，經過近四年的努力，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完成了印刷、發送任務。

《廣西“文革”檔案資料》按地區和區直機關共編印十八冊，分兩大部分。第一冊至第七冊為“文革”大事件部分，並編印了中央對廣西處理好“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的批復等三個文件和全區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總結；第八冊至第十八冊為“文革”大事記部分。全套資料比較系統的記載了廣西“文革”中發生的大事件、黨政和各造反組織的重大活動的主要情況以及廣西各級黨委對“文革”遺留問題處理情況。但是由於“文革”資料有的已被燒毀、散失，因此，本《資料》的錯誤之處在所難免。而目涉及到當時的派性鬥爭和有關人的處理問題，機密性較大，請妥為保管，供內部參閱，不要公開引用。

——編者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原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三張大字報

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第一張大字報：

《揭發劉少奇、鄧小平的幾個問題》，全文如下：

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我對毛主席的著作學習很差，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站錯了立場。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經過中央工作會議的挽救，廣大革命師生、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的熱情幫助，使我醒悟過來。我決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徹底拋棄錯誤；決心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徹底清除資產階級思想；決心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保持革命晚節，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

劉少奇、鄧小平兩人，是潛藏在黨內的危險人物，是兩顆“定時炸彈”。過去他們背著主席和黨中央，幹了許多壞事。現在，根據我的記憶，初步對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揭發如下：

一、劉少奇不僅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混淆黑白，顛倒是非，圍剿革命派，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制定出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抗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且）在中國革命很長的歷史過程，在每一個關鍵時，他都犯錯誤，都反對毛主席的思想，是一貫的左傾機會主義。比如到延安馬列學院講演時，只強調理論修養，不講革命實踐的重要性，這是修正主義的理論。又如在一九四五年，我們正和敵人對峙，隊伍正在擴編，主席在臨去重慶談判前，起草了對黨內的通知，告訴全黨絕對不要因為談判而放鬆對蔣介石的警惕和鬥爭；劉少奇卻背著主席，屈服於敵人的壓力，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問題。在他這種錯誤方針指導下，有些地方把地方武裝縮編，如果按照他的辦法做，中國革命必然遭到嚴重的挫折。幸虧主席發現得早，很快得到了糾正。再如他派彭真到東北局當書記，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戰場佔很重要的戰略地位，派彭真去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不是主席指定林彪同志在那裏負責，東北戰場肯定要失敗，中國革命勝利就要推遲。那時，我們還只是以為彭真不懂軍事，現在看來，那時他派彭真去東北，是別有用心的。劉少奇“用人唯親”的宗派主義幹部政策，還表現在只重用原來他親信的舊部下，例如饒漱石、彭真等，而對毛主席親手締造下的人民解放軍的幹部不信任，對部隊幹部轉業地方工作，也表現很冷淡。一九五五年吹合作社，以後反“冒進”、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當時刮起的這股妖風，實際上他是幕後直接指揮者。特別嚴重的是，二十多年來，劉少奇不但不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主席的指示，他不積極去執行，而且公開與主席唱對台戲，如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主席講民主集中制，他卻講分散主義；主席在杭州定了第一個十條，以後他又搞一個十條；主席強調充分放手發動群眾，他卻積極推廣桃園大隊“神秘主義”的所謂“四清”經驗，借以抬高自己；同時，他到南寧，在推廣他那班左賈右的錯誤路線的講話中還公開講毛主席的調查研究過時了（大意）。從這一系列的事實來看，劉少奇是在背離主席的思想獨樹一幟、另搞一套的。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違背主席的指示趁主席不在北京的時機，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代替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企圖把這場文化大革命引到邪路上去。這次是他的問題的總暴露，如果不及時戳穿，把他駁倒批臭，還讓他來接班，中國革命就要變顏色。

二、鄧小平除了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與劉少奇合謀，制定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外，還有一系列嚴重錯誤。早在一九三〇年，紅七軍從廣西轉戰江西與中央紅軍匯合的途中，鄧小平是紅七軍的政委，當時紅七軍在樂昌的西南被敵人截斷，部隊分成兩路前進，在大敵當前，兩路隊伍還沒有匯合以前，他卻離開了隊伍。當時下面議論紛紛，究竟他去那裏了！為什麼離開？弄不清楚；以後據說是到上海彙報去了。在當時正在打仗的情況下，離開部隊是臨陣脫離的行為。近十年來，

鄧小平作為中央總書記，從不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還曾經公開反對學習主席著作，說什麼天天學老四篇就變成了老四件了。這是惡毒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證。每次中央開會，大家都很忙，他卻照樣打麻將；他更不深入農村、工廠作調查研究，也不同幹部談話，有時幹部找上門來，他還拒絕。鄧小平對上違背主席的思想，中間脫離幹部，對下脫離群眾。如果讓這樣的人仍然竊據黨中央的要職，的確危險得很！

由於過去我對劉少奇、鄧小平的錯誤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同時也由於我學習和領會毛澤東思想很差，因而對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僅沒有堅決抵制，反而錯誤地執行了這條反動路線。這次文化大革命給了我很大的教育，我決心從中深刻吸取教訓，徹底肅清劉、鄧反動路線的影響，堅決地、徹底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韋國清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據當時的群眾組織“廣西工交幹校革命造反派團”翻印的印件）

韋國清的第二張大字報：

《揭發兩面派——陶鑄》，全文如下：

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代表人物，把陶鑄揪出來，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新勝利。陶鑄頑固堅持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黨內外耍兩面派，搞陰謀詭計，是個危險人物。

現將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問題，初步揭發如下：

一、一九六六年四月，主席在杭州給各大區指示，對學校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當時陶鑄回中南區沒有傳達，以後也始終沒有跟我們講過。這是他封鎖主席思想的一條罪證。不僅這一次，早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二十三條》時，據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席曾批評過劉少奇，但陶鑄沒有向我們傳達，只是無頭無尾的講劉少奇自我批評得很好。實際上是在表揚劉少奇，提高他的威信。這也看出劉、陶關係是如何密切。

二、一九六六年五月，陶鑄在廣州中心紀念堂作報告，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最後消滅階級的一次革命。這是在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是與毛主席的思想相對抗的，是反對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的。

三、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南寧和桂林的“文化大革命”正掀起高潮，形勢好得很。這時，據傳陶鑄在北京接見革命師生時，就改組桂林市委和絕食問題講了話表面上還是支持學生的，當區黨委打電話問他時，他又不認帳了，併發來兩份電報，對當時蓬勃發展的運動潑了一瓢冷水。這裏也看出他在耍兩面派手法。

四、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陶鑄在北京接見中央民族學院在三江搞“四清”和“文化大革

命”的師生時，說“對區黨委的看法，還是一看二驚，……，中央是信任區黨委的，我相信他們是願意改正錯誤的。”這等於封了革命師生的嘴巴，不讓他們大力揭發區黨委的錯誤。

五、十月份在中央開會時，張平化提出，有的省委委員宣布脫離省委，同革命群眾站在一起了，可不可以聽這次會議的傳達？陶鑄說，這是叛變嘛，不能參加。這是對革命的領導幹部的污蔑；也說明他又在耍兩面手法，口頭上支持革命造反，卻不准領導幹部革命造反。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陶鑄忠實地執行了劉、鄧路線，並成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代表人物以外，還有以下的嚴重錯誤：

1、愛吹噓自己。如常說他在廣西剿匪時，如何如何有功勞。這真是貪天之功為己功，把在毛主席英明領導下的解放軍和革命群眾取得的偉大成績，掛在自己的帳上。

2、使用幹部任人為親，重才不重德，拉拉扯扯，不講原則。只重用少數“才子”，不重視廣大革命幹部。如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王匡，就是陶鑄一手提拔的直到為中南局宣傳部長；王蘭西，也是他重用的“才子”。

3、不貫徹階級路線，不培養學毛著積極分子和工農幹部，對舊文人卻很重視。如在困難時期給舊知識分子加薪，發補助油，搞資產階級的物質刺激。

4、陶鑄到廣西檢查工作，不是宣傳毛澤東思想，而是諷刺、挖苦地批評。如到百色，說百色百色，應當是顏色美艷，但沒搞什麼建設，是白色恐怖。到桂林時，說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不出糧食。並引用古書諷刺說：“道路失修，田野荒蕪，亡國之象徵也。”

過去陶鑄以（耍）兩面派的手法，（是）偽君子。在這以前，我沒有識破他的陰謀。另一方面，由於我自己學習和領會毛主席思想很差，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因此站錯了立場。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沒有抵制，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我決心同革命師生、革命群眾、革命幹部站在一起，徹底批判自己的錯誤，同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及陶鑄這個新代表人物的錯誤路線作徹底的決裂，大力揭發他們的罪行，堅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革命造反有理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韋國清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據當時的群眾組織“廣西工交幹校革命造反兵團翻印的印件）

韋國清的第三張大字報：

《揭發王任重的幾個問題》。全文如下：

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王任重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過去，他給中南地區及直接給我們作了一些指示。由於自己對毛主席思想學習和領會很差，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站錯了立場，同時認為他是中央文革副組長、中南局第一書記，又在北京工作，認為他領會毛主席、中央指示精神總比我們好一些。因此對他的指示當時是相信的。現在看來很多地方是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相違背的。比如他在七月三日給湖北省委常委的信中提出的所謂“大暴露、大考驗、大批判、大提高、大

改革、大改組”的指導方針，及談到有的單位可以“槍打出頭鳥”：曉光同志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向他彙報、請示桂林問題時，他比較肯定地答復我們，師院“多數派”後面可能有壞人操縱等等，都是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敢於革命造反的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是極其錯誤的。除了同志們、同學們已經大量揭發的以外，我主要揭發他直接與我電話、電報聯繫的幾個問題：

一、八月十八日下午徐為楷遊街後，我根據當時書記處的幾個同志從市委的一些同志中聽到的片面反映，彙報了當時桂林的情況，說是徐為楷被師院“多數派”拉去戴高帽遊街，還說用繩捆綁著他，勒著脖子，快沒有氣了，現在找不著徐了；同時學生還到處搜查黃雲、蘇玉山，工農群眾、機關幹部與學生嚴重對立，公安局也無能為力了，學生不相信公安局（因蘇是兼公安局長），請示王任重怎麼辦？並要求中央“文革”派人到桂林來。王任重答復這個問題時，要我們不要怕亂，並收集材料，整理出來；還說要照像。現在看來為什麼這樣做呢？還不是要我們暫時沈住氣，後期來一個反右嗎？

二、八月二十一日，王任重給師院革命師生的電報，是我們事先向他彙報了兩個情況後發來的：一是工作隊撤不出來，二是我們講話不盡了，要求中央“文革”小組派人來桂林，於是，他在來電中授權給我與區黨委全權處理桂林問題，而沒有要求革命師生充分揭發區黨委的錯誤，這是與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相違背的。這份電報，事先曾用密碼發給我們轉師院，因為防止密碼泄密，建議他改用明碼直發師院；由於當時我害怕學生到工廠、農村去，又建立他刪去“與工農相結合”一句。這份電報後來大量在桂林和南寧印發，是我們決定的，想借這個電報來提高自己的發言權，是我的錯誤。

三、八月二十二日，王任重給我一封信，是用電話發來的。要我“不要怕亂”，“越亂敵人越暴露得清楚”；還針對我當時要求中央“文革”派人來桂林的問題，說“坐山觀虎鬥”，運動“讓各地自己搞，一律不派人出去，不要再發電報要求派人了。一切按《十六條》辦事。”王任重把轟轟烈烈的革命學生運動看成是“亂”，把敢想、敢鬧的革命師生看成是“敵人”；同時，不強調依靠革命的左派，而說是“坐山觀虎鬥”，都是非常錯誤。

王任重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我們有著重大影響。今後，我決心努力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從根本上改造世界觀，端正立場，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同時，從這裏也得出一個教訓，就是要堅決按照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的：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韋國清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

（據當時的群眾組織廣西工交幹校革命造反兵團翻印的印件）

中共中央文件“七·三”布告

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8)103號

照辦。

毛澤東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

布告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勝利迅猛發展。全國形勢空前大好。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全國一樣，形勢也是一片大好。

但是，最近兩個月來，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蒙蔽和欺騙一部分群眾，連續製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壞鐵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復通車；

第二，膽敢搶劫援越物資，拒不送還；

第三，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

第四，在中央發出“六一三”特急電報以後，拒不執行，繼續頑抗。

中央認為，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抗美援朝鬥爭、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廣西兩派革命群眾組織和廣大革命群眾是要革命的。他們對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極其不滿，極其憤慨的。有些人跟著別人幹了壞事，絕大多數是受蒙蔽的。

為了迅速制止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號召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在廣西革籌小組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駐廣西部隊的支持下，努力實現以下各點：

一、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點。

二、無條件地迅速恢復柳州鐵路局全線的鐵路交通運輸，停止一切干擾和串連，保證運輸暢通。

三、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

四、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

五、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下鄉上山青年，應立即返回本地區、本單位。

六、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衝擊監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台等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

黨的政策歷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兩派群眾組織中的壞人，由兩派群眾各自清理；同時，要把一個組織混進了壞人同這個組織嚴格區別開。

中央相信，一小撮階級敵人製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駐廣西的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廣西廣大革命幹部，一定能夠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牢牢地掌握革命鬥爭大方向，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陰謀必然遭到可恥破產。廣西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會越來越好，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必將在階級鬥爭的凱歌中誕生。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發

共印六、六〇四份。

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中國人民解放軍廣西軍區

關於破獲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反革命案件的公告

“千鈞霹靂開新宇，萬里東風掃殘雲”。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規模空前的革命群眾運動，象大海的怒濤沖垮了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把那些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以及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沖刷出來，粉碎了他們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闢資本主義，恢復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反革命罪惡陰謀。

最近，我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專政機關共同破獲了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給了那些面臨末日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又一次沉重的打擊。這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代號“57125”，是一個以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為其主要成員，以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陰謀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恢復國民黨反動統治為其罪惡目的的反革命集團。

這個反革命集團的主要骨幹，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就相繼集中南寧，乘機四出活動，發展反革命勢力。今年二月二十三日，由國民黨特務、偽憲兵朱錫生、壞分子梁漢忠、反革命分子韋國書、偽自衛中隊長、勞動釋放犯楊德標、堅持反動階級立場的地主子弟覃德達、盜竊犯農培相，等等，在南寧召開反革命骨幹分子會議，正式成立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制定並通過了反革命綱領和組織章程；由梁漢忠任團長，楊德標、韋國書等任副團長；分團、政治部、作戰部、情報部、經濟部、外事處，下轄縱隊（支隊）、大隊、中隊、分隊、小隊。分團部設

在南寧市××路××街××號。

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政治綱領極端反動。他們聲稱其總後台是人民公敵蔣介石，總團長是匪首蔣經國。他們公然叫囂要推翻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中國人民解放軍，破壞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恢復國民反動統治。他們目前的反革命行動計劃是：加緊反革命宣傳，網羅牛鬼蛇神，發展反革命組織，結成反革命的“統一戰線”，“在城市和農村”建立反革命“根據區域”，“儲蓄力量，暫時埋伏，以待時機”，“在條件成熟時，以農村為中心，以山區為重點”，發展反革命武裝，組織反革命暴亂，夢想配合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

這個反革命集團有計劃地派出一些骨幹分子，有的借“革命”串連之名，有的以“行醫”、“經商”作掩護，四出活動，先後到柳州、玉林、欽州、靈山、浦北、寧明、橫縣、邕寧、德保、靖西、來賓等縣、市，網羅牛鬼蛇神，發展反革命組織；並到廣東、江西等省，與當地反革命組織勾結，進行反革命活動。同時，他們還從外地流竄來南寧的壞人中物色對象，發展組織。他們出版了《太陽報》、《燈塔》報等反動刊物，刊載蔣匪幫的反革命宣傳資料，進行反革命宣傳活動。

這個反革命集團的一些骨幹分子，混入某些群眾組織，有的還當了壞頭頭，打着“造反”旗號，狡猾地利用群眾組織掩護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在匪骨幹會議上，匪“廣西分團”政治部副部長梁孟隆布置：要“插手兩派鬥爭，掌握×××（某群眾組織）的領導權，利用矛盾，挑起武鬥，奪取武器，實行武裝奪權。”分團長梁漢忠叫囂：“要拖住革命委員會的成立，破壞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以便有利於‘反共救國團’的發展。”他們利用群眾組織中某些人的資產階級派性，或者直接操縱一些人，或者在背後煽陰風，點鬼火，挑動武鬥，製造混亂，破壞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他們從某些群眾組織中騙取槍支、彈藥和爆炸物品，並大搞打、砸、搶、抄，越境走私，攫取反革命活動經費，建立反革命武裝。主犯覃德璋、農培相等人，通過南寧市某些群眾組織據點中的塗水成，取得了該群眾組織的出入證，並在該據點接待、聯絡這個反革命集團的外地成員。主犯梁漢忠、朱錫生、廖鈞琅、梁孟隆、黃廷敏等，在革命群眾協同專政機關追捕時，有的從某些群眾組織弄來的槍支開槍拒捕，有的逃到某些群眾組織的據點隱藏起來。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革命的同志們：

我們這裏公布的只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一部分罪惡事實。在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小撮階級敵人“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闢”，“如果我們喪失警惕性，那就會上大當，吃大虧。”現在這個反革命集團並沒有完全摧毀，必須徹底追查組織，緝拿漏網的主犯歸案。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反革命分子怎樣要兩面派手法呢？他們怎樣以假象欺騙我們，而在暗裏卻幹著我們意料不到的事情呢？這一切，成千成萬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為這個原故，許多反革命分子鑽進我們的隊伍中來了。我們的人眼睛不亮，不善於辨別好人和壞人。我們善於辨別在正常情況之下從事活動的好人和壞人，但是我們不善於辨別在特殊情況下從事活動的某些人們。”事情正是這樣，當我們對階級敵人的破壞麻木大意的時候，特別是當我們被資產階級派性蒙住了眼睛，分不清敵我，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矛頭對著自己的階級兄弟，在革命群眾組織之間大打“內戰”的時候，階級敵人的黑手就伸進來了。從蔣匪“反共救國團”的反革命案件中，我們應當很好吸取這一教訓，學得更聰明一些。還應當看到，在這一反革命案件公布之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決不會就此甘休，束手就擒的。他們必定還會以種種手法，進行挑撥離間，製造事端，興風作浪。對此，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再上敵人的當。

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必須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鬥爭大方向，牢記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教導，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增強階級鬥爭觀念，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進一步克服資產階級派性，增強無產階級黨性，認真清理階級隊伍，純潔組織，團結一致，共同對敵，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堅決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革命大

軍，主動地、不停頓地向階級敵人發動全面的、猛烈的進攻，徹底摧毀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並乘勝追擊，開展大揭發、大檢舉、大鬥爭，把隱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統統挖出來！我們希望，通過這場鬥爭，能夠更好地促進、鞏固和發展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推動革命大批判更深入地、持久地開展起來，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參加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所有成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擺在你們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向人民投案自首，低頭認罪。我們在這裏向你們宣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如能主動投案坦白者，從寬處理，並能主動檢舉其他反革命分子者，將功贖罪；如果頑抗到底，必將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砸得粉身碎骨。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

廣西壯族自治區機構領導人名錄

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這時的區黨委有委員48人，候補委員19人，常委16人，其中書記7人。

“文革”初期廣西自治區黨委領導機構人名錄

第一書記 韋國清（壯族，1962.10.31—1988.8.16）

代理第一書記 喬漢光（1966.9—1967.1）

書記 伍晉南（1962.10.31—1967.1）

賀希明（1962.10.31—1967.1）

覃應機（壯族，1962.1.31—1967.1）

安平生（1962.10.31—1967.1）

候補書記 霍泛（1964.5.15—1967.1）

常委 歐致富（壯族，軍區司令員，1962.10.31—1967.1）

傅雨田（滿族，區人民政府副主任1962.10.31—1967.1）

李殿丹（區人民政府副主席，1962.10.31—1967.1）

盧紹武（壯族，區人民政府副席，1962.10.31—1967.1）

鍾楓（區人民政府副席，1962.10.31—1967.1）

尚持（區黨委組織部長，1966.1.15—1967.1）

段遠鍾（區黨委工交部長，1966.1.15—1967.1）

黃一平（1966.1.15—1967.1）

劉世昌（空七軍政委，1966.1.15—1967.1）

67年3月6日，廣西軍區黨委成立廣西軍區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主任委員歐致富（廣西軍區司令員）。副主任委員賀希明（自治區黨委書記）、李殿丹（自治區人委副主席）、陳開路（廣西軍區副司令員）、何紀元（廣西軍區副政委）、範迪波（空七軍副軍長）、魏德安（廣西駐軍二〇分部副部長）。委員13人，並設辦公室，下分政治工作組、生產組、秘書組，負責具體工作。

(廣西軍區黨委黨字<67>第一號)

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同意廣西軍區的檢查和韋國清、伍晉南、安平生的檢討，決定建立由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鏞（廣西軍區政委）、孫鳳章（五十五軍副軍長）、焦紅光（空七軍長）、郝忠寰、王斌、伍晉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由韋國清負責領導革籌小組工作。下設政治部、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保衛部、同時撤銷廣西軍區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

(1968.8—1971.2)

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於1968年8月26日宣告成立，革委會主任韋國清，副主任歐致富、魏佑鏞、焦紅光、霍成忠、安平生、韋世經、林福文、毛鳳鸞、廖煒雄、龍智銘、顏景堂、曾春生。常委29人，委員133人。

1970年4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增補劉重桂、趙欣然為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免去歐致富自治區革命會副主任職務。

1971年2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任命韋祖珍為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

自治區革委會正副主任名錄表

職務	姓名	社會身份	任職時間	現所在地區單位職務
主任	韋國清(壯族)	領導幹部	1968.8.20-1975.10	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副主任	歐致富(壯族)	軍代表	1968.8-1970.4	回部隊，八二年離休現住廣州
	魏佑鏞	軍代表	1968.8.20-1970.11	回部隊，1985年離休住廣州
	焦紅光	軍代表	1968.8.20-1976.10	回部隊
	霍成忠	軍代表	1968.8.20-	回部隊 1983年離休住廣州
	安平生	領導幹部	1968.8.20-1975.10.5	北京，中顧委委員。
	韋世經	工人	1968.8.20-1976.10	廣西柳州航運公司港務所調度員
	林福文	工人	同上	廣西黎塘水泥廠一般幹部。 (群眾組織派頭頭)
	毛鳳鸞	農民	同上	廣西區農業銀行辦公室機要科長
	廖煒雄	一般幹部	同上	“文革”中造反起家，1984年7月開除黨籍。梧州市一般幹部
	龍智銘	一般幹部	1968.8.02-1971.	群眾組織派頭頭 1971年自殺死亡
	顏景堂	學生	1968.8.20-1976.10	“文革”中造反起家，嚴重違法亂紀，1984年開除黨籍經法院判刑12年

自治區革委會工作機構領導人名錄表

機構名稱	職務	姓名	社會身份	任職時間	現所在地區單位職務
辦事組	組長	徐其海	軍代表	1968.11-1973.8	回部隊，1984年12月病故
政治工作組	組長	魏佑鏞	軍代表	1969.11-1973.8.1	回部隊。1985年離休住廣州
人民保衛組	組長	宋治平	軍代表	1968.11-1973.8	回部隊。1984年離休住南寧
生產指揮組	組長	陳開路	軍代表	1969.11-1973.8	回部隊。1980年11月離休住廣州
鬥批改辦公室	主任	盧繼昌	軍代表	1969.11-1973.8	回部隊。1983年離休住南寧
“五、七”幹校革命領導小組	組長	任國璋	幹部	1970.1-1971.8	廣西紀檢會
	組長	季興華	軍代表	1971.9-1972.3	回部隊。1978年12月離休住南寧

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及其主要工作機構的黨的核心小組

(1970.4—1973.8)

1970年4月3日，經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到1971年2月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三次代表大會選出委員會為止。

自治區革委會的人民保衛組於1968年2月成立黨委會；辦事組、政治工作組、生產指揮組於1970年2月成立黨的核心小組。1971年7月撤銷三大組黨的核心小組，成立黨委會；1972年5、6月間，四大組均改為黨的核心小組。1973年8月8日，經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決定，撤銷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四大組工作機構。

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名錄

組長：韋國清（壯族1970.4—1971.2）

副組長：劉重桂（1970.4—1971.2）

成員：趙欣然（1970.4—1971.2）

魏佑鏞（1970.4—1971.2）

焦紅光（1970.4—1971.2）

安平生（1970.4—1971.2）

趙茂勳（1970.4—1971.2）

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要工作機構黨組織領導人名錄

辦事組黨的核心小組（黨委）

組長：徐其海（1970.2—1971.7）

書記：徐其海（1970.1—1972.5）

組長：徐其海（1972.5—1973.8）

政治工作組黨的核心小組（黨委）

組長：魏佑禱（1970.2—1971.7）

書記：魏佑禱（1971.7—1972.6）

組長：魏佑禱（1972.6—1973.8）

生產指揮組黨的核心小組（黨委）

組長：陳開路（1970.2—1971.7）

書記：陳開路（1971.7—1972.6）

組長：陳開路（1972.6—1973.6）

人民保衛黨的核心小組黨委

書記：宋治平（1968.2—1972.5）

組長：宋治平（1968.2—1972.5）

注：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於1979年12月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而從1971年2月選舉產生中國共產黨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三屆委員會後，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不再行使黨委的職權。

中國共產黨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三次代表大會

（1971.2—1976.10）

中國共產黨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三次代表大會，於1971年2月9日至16日在南寧召開。韋國清代表自治區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向大會作工作報告。參加第三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852人，其中：工人代表221人，佔26%；貧下中農代表204人，佔23.9%；解放軍代表174人，佔20.4%；幹部代表172人，佔20.2%，知識分子代表43人，佔5%；其他勞動人民代表38人，佔4.5%。選舉產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三屆委員會，委員78人，候補委員16人，共94人（其中，解放軍31人，佔33%；不脫產黨員32人，佔34%）。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二屆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67人中，只有16人參加第三屆委員會佔24%，其餘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為“走資派”、“叛徒”、“歷史反革命”、“特務”等還在被批鬥被審查。

2月17日，召開中共廣西第三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常委13人，其中書記、副書記四人。

第一書記 韋國清（壯族 1971.2.17—1975.10.5）

書記 韋祖珍（壯族 1971.2.17—1973.8.17）

副書記 劉重桂（1971.2.17—1973.8.17）

安平生（1971.2.17—1973.10.5）

常委 趙欣然（1971.2.17—1976.10）

焦紅光（1971.2.17—1976.10）

趙茂勛（1971.2.17—1976.10）

陳開路（1971.2.17—1976.10）

徐其海（1971.2.17—1976.10）

許聖亭（1971.2.17—1976.10）

喬曉光（1971.2.17—1976.10）

覃應機（壯族 1971.2.17—1976.10）

宋治平（1971.2.17—1976.10）

這屆委員會的委員和候補委員，在1985年“處理文革遺留”時中被定為“三種人”和嚴重違法亂紀的有6人，已開除黨籍；犯有嚴重錯誤受黨紀、政紀處分的3人，以上佔9.6%。犯有錯誤免予處分的5人佔5.3%。

1973年8月17日，自治區報請中共中央批准，劉重桂、安平生、喬曉光、覃應機自治區黨委書記，梁吉泉、曾小平、杜易、肖寒、廖燿雄任自治區黨委常委。免去韋祖珍自治區黨委委員、常委、書記職務（1981年7月中央同意給予韋祖珍平反、恢復政治名譽）。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廣西的代表有張雲逸、岑國榮、韋忠均、劉富貴、鄧月瓊、沈少卿、蘇慶樸、農瓊、羅耀芳、盤美英、梁雲禧、盧永興、溫樹玉、覃其修、萬瓊英、胡運江、林純波、葉觀孫、韋國清、劉重桂、安平生、崔鳳鸞、李秉兒等23人。會上，廣西代表當選為中央委員的有韋國清、安平生、岑國榮；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有盤美英、郭耀卿。韋國清併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據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查明岑國榮、盤美英是“三種人”，郭耀卿犯有錯誤）。

1975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調廣西壯族自治區常委第一書記、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二書記；安平生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廣西軍區第一政委。

12月27日，中共中央同意喬曉光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趙茂勛、杜易任自治區黨委書記，岑國榮、廖生東任自治區黨委常委

這時第三屆委員會有常委18人，其中書記6人：

第一書記 安平生（1975.10.5—1976.10）

第二書記 喬曉光（1975.10.27—1976.10）

書記 劉重桂（1973.8.17—1976.10）

覃應機 (壯族1973.8.17—1976.10)

趙茂勛 (1975.12.27—1976.10)

杜易 (壯族1975.12.27—1976.10)

常委 趙欣然 (1971.2.17—1976.10)

焦紅光 (1971.2.17—1976.10)

陳開路 (1971.2.17—1976.10)

徐其海 (1971.2.17—1976.10)

許聖亨 (1971.2.17—1976.10)

宋治平 (1971.2.17—1976.10)

梁吉泉 (1973.8.17—1976.10)

曾小平 (1973.8.17—1976.10)

肖寒 (1973.8.17—1976.10)

廖煒雄 (1973.8.17—1976.10)

岑國榮 (1975.12.27—1976.10)

廖生東 (1975.12.27—1976.10)

自治區黨委的工作機構

(1973.8—1976.10)

1971年12月選出中共廣西第三屆區黨委，但未單獨建立區黨委的主要工作機構。1973年8月8日，自治區黨委決定，撤銷自治區革委會主要工作機構的辦事組、政治工作組、生產指揮組、人民保衛組；建立自治區黨委的主要工作機構三部一廳，即自治區黨發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辦公廳。

1975年2月18日，自治區黨委決定，成立自治區黨委農村政治部、工業交通政治部、財貿政治部，並在上述各部建立黨組。

同年四月，自治區黨委決定，將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政策研究室改為自治區黨委政策研究室。

自治區黨委常委工作機構領導人名錄

區黨委秘書長 喬曉光 (兼) (1973.8.8—1976.8.30)

肖寒 (1976.8.30—1976.10)

區黨委辦公廳

主任 劉毅生 (兼) (1973.8.8—1976.9.8)

董坤 (原在軍區保衛科工作

“支工”人員1976.9.8—1976.10)

組織部

部長 趙茂勛 (兼) (1973.8.8—1976.10)

宣傳部

部長 許聖亨 (兼) (1973.8—1975.11)

廖煒雄 (兼) (1975.11—1976.10)

統戰部

部長 梁華新 (壯) (1973.8—1976.10)

農村政治部

主任 杜易 (壯) (1975.2—1976.10)

工業交通政治部

主任 岑國榮 (1975.2—1976.10)

財貿政治部

主任 廖生東 (1975.2—1976.10)

政策研究室

主任 張羅 (1975.4—1976.9)

廣西日報社

黨委書記 鄭新生 (1976.6—1975.3)

張鴻泉 (兼) (1975.3—1976.5)

鍾紀民 (1976.5—1976.10)

黨校

校長 趙茂勛 (兼) (1972.4—1976.10)

黨委書記 陶雲萍 (1975.12—1976.10)

自治區級、軍、群團組織 (黨委)

自治區級地方軍事系統黨委

(1969.8—1976.10)

1969年8月12日至21日，中國共產黨廣西軍區第五次代表大會在南寧召開。大會選出了中共廣西軍區第五屆委員會第一書記韋國清、第二書記歐致富、副書記劉重桂、魏佑鏞、焦玉山，委員48人。

1969年12月16日中共廣州軍區委員會批復，增補趙欣然、劉重桂為廣西軍區黨委書記，免去歐致富廣西軍區黨委第二書記職務。

1971年8月2日，增補韋祖珍廣西軍區黨委第二書記，王泮文為廣西軍區黨委書記。

1975年10月5日韋國清調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11月6日，經中共廣州軍區委員會批准，增補安平生為廣西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第一書記 韋國清（壯族，1969.9.10—1975.10.5 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兼廣西軍區第一政委）

安平生（1975.10.5—1976.10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廣西軍區第一政委）

第二書記 歐致富（壯族，1969.8—1969.12廣西軍區司令員）

韋祖珍（壯族，1971.8—1973.8廣西區黨委書記、廣西軍區第二政委）

副書記 劉重桂（1969.8—1970.11廣西軍區第三政委）

魏佑鏞（1969.8—1970.11廣西軍區政委）

焦玉山（1969.8—1969.12廣西軍區副司令員）

書記 趙欣然（1969.12—1976.10廣西軍區司令員）

劉重桂（1969.12—1976.10廣西軍區第二政委）

王泮文（1971.8—1976.10廣西軍區政委）

自治區總工會於1974年1月經區黨委批准重新成立。區工會黨組書記、主席岑國榮（1974.1—1976.10，“文革”時造反起家，被開除黨籍）。

自治區共青團委於1973年11月15日經自治區黨委會批准成立。

區黨委黨組書記 梁吉泉（1973.10—1976.10，“文革”時造反起家，“處遺”時被開除黨籍）

自治區婦聯會於1973年11月經區黨委批准重新成立

婦聯會黨組書記、主任曾小平（1973.10—1976.10）

自治區貧下中農協會於1974年12月產生，1976年8月經區黨委批准成立。

區貧協黨組書記、貧協主任杜易（壯族，1976.8—1976.10）

版權

書名：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

編者：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美國收藏本據《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

發行人：何頻

封面設計：紐約客設計所

責任編輯：辛曉葵

校對：楊茜

出版：明鏡出版社

封面設計：紐約客設計所

網址：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104台北市復興北路174號8樓之一

版次：2014年3月第一版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未經書面許可，不得擅自轉登該書內容

本書內容和觀點不代表本出版社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

ISBN：978-1-63032-123-9